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ZHENGGRONGSUIYUE

# 峥嵘歲月

劉潤清



回 忆 录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峥嵘岁月  
刘润涛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  
回忆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峥嵘岁月 / 《峥嵘岁月》编委会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ISBN 978-7-224-09712-2

I. ①峰… II. ①峰… III. ①师范学校—优秀教师—生平事迹—绥德县 ②师范学校—模范学生—生平事迹—绥德县 IV. ①K825.46 ②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969 号

## 峥 嵘 岁 月

---

编 著 本书编委会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35 印张 10 插页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712-2

定 价 65.00 元

---



SUI SH



歷史不會忘記綏師  
綏師不能忘記歷史



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  
编 纂 委 员 会

主 任：冯泽福

副 主 任：武 军（常务） 尚品山 马海树  
陈彦荣 马润喜

委 员：张 杰 闫宏谋 刘联春 张治雄  
张雁兵 康 宏 赵生筱 冯 毅  
曹荷霞 曹道勤 丁许浩 马 瑞  
李维宇 张仰峰 张恩军 贺向党  
延晓强 周俊兰

主 编：武 军

副 主 编：张 杰 闫宏谋

执行主编：闫宏谋



李子淵校長



20世紀30年代校徽



20世紀40年代校徽



20世紀50年代校徽

奮鬥  
精神  
作伴

張士英  
貴州省  
貴陽市  
貴陽市

學子  
貴陽市  
貴陽市  
貴陽市

1941年8月，毛澤東同志為陝師學生代表題詞

廣東省醫院 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 王曉籟 廣東省醫院

243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

图 1 为图 1 所示的模型。图 1 为图 1 所示的模型。

馬文瑞題

二〇〇〇年六月一日

革命搖籃  
育才基地

支親族師建教之十周年

卷之四  
 四  
 四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

[illegible]

1777-48

原中组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国光  
校友为领导顾问

李國忠認為區青年校友會應將旺角資金的用途詳列。

慶祝陝西省解放六十週年

八十載英才輩出  
新世紀再創輝煌

2005年10月12日 遲浩波 題



祝賀陝西省解放六十週年

發揚革命傳統 堅持教育創新  
為西部大開發培養優秀人才

彭佩云 二〇〇五年十月

自古驍心無定河 駁自苦恨美佳  
春風吹醒花千 百里萬國青出則  
萬里回首中碑已賀五邊時勢盛  
漢陽破陽光玉 駁群湧雲竹幾來  
竹下藍歌

張世祥 張世祥 二十月年 許嘉駱 題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駱  
同志為題詞贈詞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佩云  
同志為題詞贈詞

國務委員、國防部部長遲浩波  
同志為題詞贈詞

陝西解放六十週年紀念  
六十年風雨兼程

奮進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

張學良題

原中組委委員、張學良副司令員張學良為題詞贈詞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  
張學良題  
張學良副司令員張學良為題詞贈詞

張學良題

原中組委委員、陝西省人大副  
主任張學良為題詞贈詞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南海合影，前排左一为安子文校友，左二为刘澜涛校友。



刘澜涛校友（右二）于二〇一二年  
在福建省委十二次全会（左二）期间下  
基层校，右一为刘澜涛校友，左一为刘  
澜涛校友。



马文瑞校友（右二）于二〇一二年  
在夫人回母校，图为刘澜涛校友  
握手合影。

教育家、原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原渭南市长刘秉世同志一千三百五十年前诞生地渭南



留学生在校友一左一手为的在留往校图力在助像性校长的陪同下察看校园



留学生在澳门时院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留国友为，原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发收水一在二一和江泽民，何厚铧等在一起





1953年，湖北軍政廳廳長陳伯符漢



范志海，原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委書記，曾任校友一左三。在房縣領導抗暴鬥爭，書記劉德仁咬友一左三，開闢了縣城校園新發展局勢。因為新發展局勢，校長一左三。《東坡詩集》一冊半的工段。



以1937年，康國泰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即現任安惠文學校）友一主任，為該校校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耀年校友（右一）和康國泰校友之子曾文國（左二）四時合影。解嚴後，陳耀年校友之子曾文國（左二）四時合影。解嚴後，陳耀年校友之子曾文國（左二）四時合影。







2006年，中组部副部长张全（左二）在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右左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清山（右左一），绥德县委书记曹继玉（右一）的陪同下视察绥德，图为宋永华校长介绍情况。

2008年，原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全国政协常委黄狮波同志（右）在榆林市人大主任周文选同志（左三），市委副秘书长崔高升同志（左一）陪同下视察绥德，学校党委书记武军同志（左二）作陪。



2006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委办机关工委书记伍绍荣同志（左）视察绥德，图为伍绍荣同志为绥德题词。



1983年，  
黑龙江省省长  
(左)齐世英、行  
署副专员赵兴  
国同志(中)的  
陪同下视察绥  
化。绥化学校  
长(右)作陪。

1986年，总  
理、副总理  
(中)在绥化地  
委常委、教育  
局长(左)的  
陪同下视察  
绥化。图为听  
取绥化学校  
长的情况介  
绍。



2000年，陈政高副省长(左二)在  
省教委主任刘瑞琦(右一)、绥化地  
委书记马德山(左一)、绥化行署副  
专员智林(左三)、绥化市委书记曹  
玉(左四)陪同下视察绥化建校工  
程。图为听取永华校长(右二)的  
情况汇报。

七八级毕业生为纪念胡若愚建的反  
战学校光荣历史的大型浮雕《光荣历  
程》。



## 序 言（一）

绥德师范学校从创办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在七十周年校庆前夕，为了回顾学校光荣的革命历史，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为了使一些校友能有机会回忆当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学习、战斗和成长的过程，学校编辑出版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热烈地祝贺。

绥德师范学校创建于1923年。她一诞生，就由李子洲、王懋廷等先烈撒下了革命种子，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从此，革命种子就在这所学校生根、发芽和成长。学校七十年间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反动势力统治下办学，后一阶段在革命政权下办学。

从1923年到1939年这段时期，绥德地区由当地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动当局经常对学校的革命势力进行摧残，曾经两度解散学校。怀有革命热情的学生乘机深入农村，点燃了革命烽火。有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生者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势力发展壮大。他们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绥德等五县被划为警备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八路军开进驻防，但政权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掌握。当时日本军队打到黄河东岸，绥德师范的学生为抗日战争所激励，抗战热情高涨，组织战地服务团，走出校门，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战。这种革命行



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专员公署的恐惧,他们想方设法对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进行欺骗和镇压,并暗中策划撤换进步校长,委任反动校长。消息传出,全校哗然,进步学生纷纷离校,奔赴延安。反动校长到校后,在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实行法西斯反共教育,迫害留校的进步学生,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反动的国民党专员公署专事摩擦,破坏抗战,当地党委和我八路军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初反动专员逃跑,国民党政权垮台,绥德地区革命政权随即建立。在革命政权领导下,绥德师范更换了领导,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派了大批水平比较高的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反共教育,从此绥德师范获得了新生。学校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用革命的、乐观的、向上的精神,鼓励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因而他们进步较快。从此一批批饱含革命热情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布到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切实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绥德师范继续为地方培养了大批教师和干部,成绩依旧显著。

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集中精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地方来说,要大力发展农业,发展乡镇企业,这就需要大批的地方干部,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地方学校的绥德师范,其主要任务,就是继承革命传统,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和较好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一批脱师资,为地方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出不懈的努力!

刘克曾

1993年3月20日

## 序 言 (二)

陕西省绥德师范和她的前身第四师范,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第四师范创建于1923年5月。在1924年夏李子洲同志任校长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里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这座“革命摇篮”培养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为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数先烈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也激励着后继同学走上革命的道路。当然,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绥德师范也有坎坷的经历,她的发展也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总的来说,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党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始终坚持了教育和现实斗争相结合,使学习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不仅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新中国成立以后,绥德师范培养的人才多又为陕北的基础教育和榆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可以这样说,从第四师范的创建到以后绥德师范的全部历史,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在纪念绥德师范建校七十周年的时候,编辑出版这套六卷本的丛书,以此来讴歌前辈,启迪后学,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材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



正按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90年代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而在老革命根据地，要抓住机遇，改变社会经济面貌，必须把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放在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使更多的读者了解绥德师范，认识绥德师范，从而深刻体会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促进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使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尤其是师范教育的发展，以发展教育促进老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陕西省绥德师范，能够继承七十年光辉历程中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新的任务，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喜看后人超前人。

安志文

1993年3月18日

## 服务社会，教书育人（代序）

——绥师光荣传统初探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武 军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自1923年5月建校，至今已近90年了。由于她在创办之初就受到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东等陕北旅京津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以及陕北名士杜斌丞先生等人的影响，特别是自1924年夏李子洲同志出任校长，当年初冬就在学校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以来，学校绝大多数时间是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实际控制之下的。特别是她作为“西北革命策源地”，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曾经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军事和群众基础，使得陕北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这一特殊的历史贡献，决定了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殊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绥德地区解放后，学校又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所重要的干部学校。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走上了正规的中等师范教育轨道，为陕北地区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人才。在近90年的办学历程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李子洲同志于1923年在北大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是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指派回陕北开展建党工作的。1924年夏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今“绥师”的前身）校长后，学校制定的《学则》明确提出四师的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李子洲校长讲得就更具体了：“本校的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并且还提出四师的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明轩》第118页）。他认为，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由此可见，在四师创立之初，李子洲校长就把教育和改造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教学和革命实践。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校长亲自讲授（李子洲同志系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国文课以“爱国主义教育 and 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观，反帝反封建、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谚语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强调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四师时期，星期天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形成了制度。图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共进》、国民党一大《宣言》等。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

教师随时笔答。学校还接办了绥德的平民学校，由学生轮流执教，既使学生得到了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寒暑假都要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化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

为使四师能够感受到八面来风，凡来绥德的名人，学校从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被请来给师生们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情况，讲辛亥革命；共进社社员严敬高留美归来，被邀请来校讲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苏观感的报告。杜斌丞、杨虎城、耿炳光、魏野畴、马雅堂等知名人士途经绥德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在李子洲校长的领导下，四师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从1924年11月起，由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人发起，四师在“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基础上，先后建起了党团组织。从1925年起，党小组逐步扩建为党支部、陕北特支、绥德地委、陕北特委……起初，四师的党团组织分属在北京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和在由邓中夏领导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后来统一到北方区委领导，一度还曾划归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又划归陕甘区委领导。四师党、团组织的建立，在陕北，乃至整个陕西省和西北地区，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党团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东至山西汾阳，西到安边、定边、银川，南至延安和驻守在宜川的国民军李象九部，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的广大地区。米脂、葭县（今佳县）、清涧、吴堡、安定（今子长县）等地

也都在四师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建起了党团组织，从而使四师成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地吸引着陕北各地的有志青年。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总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既教育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1924年冬，在李子洲、杜斌丞等人的策动和促成下，杨虎城将军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部由榆林南下讨伐刘镇华途经绥德时，曾住在四师。四师组织全校师生及地方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和欢送会。李子洲和杨虎城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大地激励了杨部的士气，同时，使四师的师生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1925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中小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陕北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的作用，争取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四师又成立了“青年社”，后与各校联合统一为“陕北青年社”，出刊《塞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弊。组织学生针对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和反对基督教等斗争，在实践中锻炼青年学生。

1925年3月15日，李子洲校长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加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并立碑铭志。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李子洲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绥德、榆林、葭县（今佳县）等地于1925年春先后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分部。自此，四师绝大多数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便于开展群众运动，他们同时又加入了经过改组的国



民党。教务主任杨明轩先生又以国民党陕北特派员的身份，尽量选派四师的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对推动陕北革命群众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5月初，西安爆发了驱逐吴新田的斗争后，四师积极响应，召开驱吴大会，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井岳秀的反动统治。“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方面成立“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一方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到民间去”的口号下，分赴葭县（今佳县）、吴堡等地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而在整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德为中心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斗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文化侵略，四师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陕北非基同盟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的阴谋在陕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3月24日在绥德联合召开市民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过了给被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警告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产党员田伯英老师主演了由王子休老师赶写的三幕话剧《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昂，使校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1926年，四师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脚户”（即脚夫，专门从事牲口搞运输的人）和农民，于6月成立了“脚户自保会”。会长白明善，副会长杜嗣尧、高光祖，以及李明轩、罗百福、赵通儒、邓重庆等委员，均为四师的学生和教员。脚户自保会

领导脚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几次冲击打砸“骡柜”（又称厘民局，是官府设办的一种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迫使官府取消了“骡柜”，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下半年，在5月1日成立的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绥德县总工会，使工人运动走向自觉的道路。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向农民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还发展党团组织。并在1927年农历正月初七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县衙和地主、高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虽经1927年8月和1928年4月两次封闭，但四师的革命火种并未被扑灭。到1930年底第三次被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仍然秘密地存在着，组织学生发动农民运动，抬龙王斗县长、砸蛋厂、驱除国民党绥德党务指导委员会等斗争，深深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古国桢、刘澜涛、苏耀民、常应黎（即常黎夫）等中共陕北特委负责同志以教员的身份来四师任职后，又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条件，组织“学生军”，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的人才。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争服务、教书育人的方针，在环境险恶的四师时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高光祖、白明善等数十位四师学生，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安子文、马明方、刘澜涛、马文瑞、张达志等同学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时期成为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的就有40多位。正如刘澜涛同志于1986年4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绥师在京校友座谈会上所说，“我们的母校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主要的是当时革命的学校里培养了新的人生

观，经过革命实践的磨炼而成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方针，谱写了四师时期这一绥师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 二

1930年底学校第三次被封闭，长达近三年半之久。1934年秋，学校才被正式恢复，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当时，由于党组织尚未恢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学校的空气是沉闷的。“西安事变”的爆发，给绥师师生带来了很大震动，绥师沉闷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部分思想活跃的学生渐渐地开始注意国家大事了。一些进步书刊，甚至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也秘密地传开了。大家对“西安事变”，对谁抗日谁不抗日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七七事变”爆发后，曹孟村老师（东北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和一些进步学生每天晚上用收音机收听、记录关于抗日的消息，经整理后以大字报的形式，一抄数份，张贴于绥德城内的主要街道路口，成为新闻渠道不畅、消息闭塞的古城绥德的重要消息源，为绥德人民及时了解抗战形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11月，我八路军驻防绥德，设立警备区，使绥德成为国共统战区后，绥师的政治空气更加活跃。学生秘密组织起读书会，学习邹韬奋主编的《永生》、《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流》、《译文》、《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俗哲学讲话》等革命书刊。学校邀请八路军的干部来作报告。霎时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

校园齐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展现在礼堂和操场的舞台上。还办起了抗敌壁报。在警备区民运科和“青教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重建的学生会也改建为学生抗敌支会。在学生抗敌支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以班组成工作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而推动了绥德及周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4月,学校党组织得以恢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轰轰烈烈。当黄河防线吃紧的情况下,学校曾组织战地服务团,在曹孟朴、刘亮普、李国璋(当时已均为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带领下,分别挺进葭县(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横山、米脂等县的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保卫河防。还有两支宣传队曾东渡黄河到山西农村进行宣传活动。绥师师生的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此惊恐不安,而我方军民则大受鼓舞。

1940年端午节,绥师被反动校长白焕亭分裂后,我党、政、军当局接收了未出走的师生,又从延安调来一些教师,保住了绥师。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暑假期间,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绥师党员学生和部分进步学生赴延安参观,用事实澄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给青年学生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改校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到下半年,将原来分属不同系统领导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党的有效领导下健康地开展起来。当时明确规定绥师的教育方针为:“(一)新民主主义教育。(二)统一战线的学校,在不违背抗战的原则下,允许各党派的存在及思想自由。(三)提倡新启蒙运动,培

养青年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有独立人格的良好作风；反对盲从、独断专制、迷信、奴役等思想。（四）正规化的师范学校，有一定管理制度与工作制度，兼干部教育的学校……”训导方针为：“（1）克服自由主义与散漫现象，加强集体生活的训练。（2）提倡遵守校规服从团体纪律的精神。（3）克服保守、自私、褊狭等不良现象，发扬为公服务精神。（4）养成活泼、紧张、切实、朴素的作风，提高学习情绪，加强学习效能。（5）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民主精神。（6）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7）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这年暑期，绥师学生代表再次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赴延安参观了医科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女大、陕北公学、鲁艺、抗大、高级法院、中央医院、解放日报社、保育院、光华农场、纺织厂及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部分学生代表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大家“团结”、“向上”、“奋斗”、“学而时习之”……通过参观，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1942年暑期，又有部分学生参加了由警备区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晋绥解放区参观团，听取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开辟根据地、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民兵抗日等情况的报告，参观战利品展览和日寇烧杀掠夺后的惨状。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得同学们更进一步认识了国共双方对抗日救国的不同态度，增进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赖，并且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转变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见1942年3月2日《解放日



报》)此间,边区高干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都明确地提出了边区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见1944年2月8日《解放日报》)绥德分区也提出了“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见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据此,1943年起,绥师便转为以干部教育为主。先后增设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及无线电训练班和会计班等专业培训班,以及到1948年的文艺班等,学制不定,应急培养。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十分重视为社会现实服务,教书育人。从而适应了战争和边区建设、开辟新区等方面的需要。1946年冬防空期间,仍然坚持上课,学习适用于战争需要的政治、军事和救护等一些基本知识。1947年学校转移于黄河两岸,也每天坚持四小时以上学习时间。教师们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战时教育方案》的要求,自己编写讲授提纲,搜集利用驻地的活教材,在国文和政治课上,注重对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军尚武精神的培养;并向学生讲解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宣讲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以及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事迹;同时联系战争形势,介绍各解放区的形势概况,以提高保卫边区的热情;在自然课上着重介绍防空防毒、急救护理、熬硝、制造火药和地雷等;体育课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学习侦察、通信、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实际技能;并注重培养学生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以形成一定的自卫能力;还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课程及授课时间,如增加时事、军事及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一些不急需的课程等。

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联系学生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实际。例如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初期，为帮助学生提高对劳动的认识，国文课上学习《毛主席这样爱我们》和《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等文章，并配合介绍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引导学生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鄙视劳动人民和生产劳动的封建思想，分析了陕北劳动人民为什么习惯称劳动为“受苦”，从而使大家认识到了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提高了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每人平均生产成果以小米计，在一斗三升（约合50斤）以上。1945年收蔬菜16万余斤，高粱1.4万余斤，豆类2000多斤，棉花3000多斤，还建起校舍窑洞27孔。1946年11个班种洋芋45亩、棉花24亩、花生15亩、高粱6亩，教职员又另种棉花3亩。1948年春，除帮农场种6亩蔬菜、24亩洋芋、6亩南瓜外，另种1300株南瓜，并还拟开井种6亩秋菜……从而维持和保证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支援了人民战争。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意志和品质，增进了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感情，提高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绥师还积极开展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1942年寒假期间组织回乡工作团，学生们回乡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办冬学，办识字班，宣传文明、卫生。1943年冬，组织了宣传工作团，自己创作了17个秧歌剧，排练了22个节目，利用假期先后到马蹄沟、周家硷等7个区22个村镇进行宣传演出，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和征粮的意义。宣传过程中，还进行农户调查，组织识字组、补习班，办大众黑板报、读报组等。仅1943年到1945年，《解放日报》对绥师学生的下乡活动，就曾有过五六次报道。解

抗日战争中，学校曾多次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进行护理伤员和文艺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这些社会活动，直接地培养了同学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当时的绥师学生，几乎没有学制的限制，只要前线或边区、新区需要，都能随时随地接受调遣。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6年暑假，绥师有530余名学生被调出工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调往延安工作。1947年7月29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当时绥师自动报名参军的教职工有15名，其中包括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刘定曾同志，以及两位教育处的副主任。学生自动报名参军的有56人，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40%。其中女生15人，占当时在校女生总数的86%。1948年4月17日《群众日报》报道，“该校为抽调一批干部至新区工作，除前已派出学员一百余名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方医疗工作外，短期内又有70余名干部派往新区”。1948年8月2日《群众日报》报道：“绥来中学（1948年4月7日由遭受敌人侵犯破坏的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合并而成）白华祥等20名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分区地方武装，到达部队后，都要求分配到连队，参加直接对敌斗争。”1949年6月的一期《大众日报》也曾报道绥师自动报名去新区的有217名学生，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70%以上。

正是在“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宗旨下，使40年代成为绥师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那时从绥师出去的学生（包括毕业的和未毕业就被调出去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从事教育事业的并不多。他们在实践中学到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技能，也未必都能用得上。然而，正是在绥师时期所打下的扎实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所养成的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作风和习惯，特别是所培养起来的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自立观念，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他们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和

始发条件。当年的绥师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我党、政、军较高级别的干部，如安志文、汪洋、任远、白介夫、白纪年、安致远、李嘉玉、柳随年、张汉夫等。还如党风德、马援、刘森民、马倬、王森等，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翻译家、经济学专家，以及医务界和其他科研部门的专家和业务骨干，还有企业家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绥师作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为当地基础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师资。虽然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提并论，可她长期的革命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却依然有着不竭的生命力。今天我们总结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再回顾一下我党在建国 60 多年来对教育方针表述的演进过程，从“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7 年 2 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 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后来的“一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强调德智体全面发

展；三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0年李鹏总理会见参加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谈话），“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直至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乃至我们追溯到前面所述40年代我党的教育方针，不难看出绥师所走过的道路同党的教育方针的一致性。从中也可发现作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自身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教育事业的生命力就在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这一普遍规律曾经存在于绥师这个特殊的个别之中。同时，绥师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绥师辉煌的历史，才有绥师发展的今天和灿烂的明天。也更昭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不断前进。

## 前 言

“绥德师范学校是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的学校。我们党今年是71周年，绥德师范是69周年。就是我们党的幼年时代就在党的领导之下办起来了。所以，这个学校一开始就和共产党是不能离开的，也是离不开的。这种师范或者中等学校全国是很多的，但像这样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学校，却不是很多的。”1992年5月7日，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校友在接受学校派员的采访时如是说。

是的，早在1924年冬，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后称北方区委）指导下，李子洲、王懋廷等早期的共产党员就在这所学校建立了直属于北京区委领导的中共党团组织，并迅速向周边地区发展，组织领导陕北的革命活动，逐步创建革命的武装，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终于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初创时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存在的价值，绝非仅仅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习近平同志曾经讲过：“陕西是根，延安是魂。”而这“根”与“魂”的源头，则在我们光荣的绥师！

自从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争取建在绥德，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这一历程，无时无刻不凝结着陕北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精神的引领下，经过一代代绥师人的不懈努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写就了学校辉煌的历史。

历史不会忘记绥师，绥师不能忘记历史。为了记述艰苦卓绝的辉煌历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学校曾几度着手编写校史：

——早在1943年初，就写出过约6400字的简略的《绥德师范历史》，曾呈送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原件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1959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庆祝伟大的祖国建国10周年，向学校征稿。学校随即组成“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革命教育史编辑委员会”，着手编写校史。通过翻阅档案材料、访问校友、和老校友举行座谈会、给外地老校友写信请他们回忆在校时的情况并供给材料等办法，经过3个多月的辛勤劳动，编成了近10万多字的《绥德师范革命教育史》一稿。人民教育出版社阅稿后，征得学校同意，将书名改为《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师范学校》，并经陕西省教育厅审查，决定出版。1960年3月发稿付排，并已制成纸型。但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纸张供应关系”，未能付印。1961年6月27日，陕西省教育厅致函学校，称考虑在陕西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要求学校在10月1日前，对1959年形成的书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后送教育厅。但之后，不知何故，此事被搁浅。

——1982年，那是学校恢复后的第四年。为了迎接建校60周年，学校再次启动了校史的征编工作。征编工作由黄海老师负责，经过大量的走访和信函联系，收集了一些史料。到1984年，整理出约35000字的新中国成立前校史初稿。

——1987年，学校委托原任校长孙爱悦同志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前校史初稿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续写。至1989年5月，完成了约85000字的校史征求意见稿《绥德师范六十五年》，内部印刷。并被绥德县政协编入《文史资料》。

——1991年12月，为迎接1992年李子洲同志诞辰100周年和1993年绥师建校70周年这两个有意义的日子，邢宏校友又发出倡议，倡议由各地校友组织编辑出版一套《雕山文集》（分三册：《雕山火种》、《雕山火花》、《雕山火星》）作为献礼，并亲自起草了《雕山文集》编辑出版计划，列出组织机构，甚至连人选问题，他都作了具体安排，计划争取于1993年5月前出版。但由于病魔夺去了邢宏同志的生命，他的宏愿未能得到实现。

——1992年3月，在7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为了讴歌前辈，启迪后学，弘扬传统，开创明天，正尊师重教之良风，奠基础教育之厚基，学校决定编印《绥德师范学校》丛书（内含六卷：第一卷《光辉历程——校史》、第二卷《峥嵘岁月——回忆录》、第三卷《雕山忠魂——英烈传》、第四卷《群星璀璨——学生传》、第五卷《为人师表——教师传》、第六卷《历届领导人小传》），并指定由闫宏谋同志负责征编。学校还请刘澜涛、马文瑞、贺晋年、刘宪曾等知名校友分别题写了书名，刘宪曾、安志文校友分别作了序。在广大校友和省、地（市）、县各级党史机构、档案部门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10个月的辛勤劳动，收集整理了部分回忆文章和英烈事迹资料，编印了《峥嵘岁月——回忆录》、《雕山忠魂——英烈传》各一册。尽管略显粗糙，并且是内部印刷，但毕竟为学校70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好评。特别是《峥嵘岁月——回忆录》一书，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便停顿下来了。

——2009年，学校再次启动了校史建设工作。这次校史建设工作包括编纂出版校史丛书和建设校史陈列馆两部分，由校党委书记武军同志亲自负责组织实施。组成了由武军同志任主编，张杰、闫



宏谋同志任副主编，武军、张杰、闫宏谋、刘联春同志任编辑的编辑班子，拟定了编纂校史丛书的具体规划（包括《光辉历程——校史》、《峥嵘岁月——回忆录》、《雕山忠魂——英烈事迹、逸文（墨）、回忆纪念文章》、《群星璀璨——知名校友介绍》、学校建党历史专题研究成果《陕北革命的策源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光辉历程——校史画册》等），在以前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征编史料，计划于2010年至2013年5月1日前陆续出齐。目前，经过参编人员的不懈努力，部分图书已经开始相继面世。

在史料征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广大校友及家属子女、有关档案、史志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谨致由衷的谢忱！

由于史料征集难，考证难，且又来源纷杂，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人物事迹介绍的稿件，大致以在校时间为序，但仍可能有排序不准确的现象存在；章法体例亦因材料不足而无法统一并且还有许多应该入编的校友，因没有资料来源而致明显的缺憾等等，遗漏和差误在所难免。回忆文章我们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相关事件进行考证，对文字进行必要的处理，但仍不能保证事事准确。校史及学校建党历史专题研究成果，尽管我们力求尊重历史、尽量客观地还原历史，但仍可能有失偏颇。凡此种种，敬请读者，特别是广大校友见谅，并请及时向我们反馈意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积极地为我们的提供资料和信息，以便于我们进一步收集整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适时地再结集出版。

编 者

2010年5月1日

## 目 录

|                           |                      |
|---------------------------|----------------------|
| 赵通儒同志回忆 .....             | (1)                  |
| 绥师一月印象记 .....             | 王子休 口述 陈江鹏 整理 (2)    |
| 子洲派我们去延安 .....            | 刘尚达 (4)              |
| 与杨明轩往来的几件事 .....          | 吴中哲 (8)              |
| 共进社始末 .....               | 杨明轩 (10)             |
| 陕北建党及活动情况 .....           | 田伯荫 (17)             |
| 绥德四师党的活动简况 .....          | 何寓映 (23)             |
| 徐步骊回忆录 .....              | (29)                 |
| 绥德建立了平民学校 .....           | 李明轩 (34)             |
| 绥德脚户自保会宣告成立 .....         | 李明轩 (36)             |
| 绥德县工会成立回忆 .....           | 李明轩 (38)             |
|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的回忆 .....         | 李明轩 (40)             |
| 绥德县农民协会成立的回忆 .....        | 李明轩 (42)             |
| 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霍维德 .....      | 张达志 (43)             |
| 战士终究是战士 .....             |                      |
| ——悼念马明方同志 .....           | 马文瑞 (45)             |
| 马明方勋业垂千秋 .....            | 张达志 (53)             |
| 高山流水 浩气长存 .....           |                      |
| ——为纪念马明方同志逝世 25 周年作 ..... |                      |
| .....                     | 李经纶 霍瑞芳 刘 静 曹相如 (60) |

亦师亦友 情同手足

——忆拓夫同志 ..... 常黎夫 (68)

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

..... 习仲勋 马文瑞 汪峰 白如冰 (84)

贾拓夫在绥德第四师范 ..... 白寿康 (94)

我所熟知的常黎夫 ..... 杜鸿泰 (96)

刘澜涛同志轶事 ..... 杜鸿泰 (103)

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回忆往事，缅怀张德生同志 ..... 常黎夫 (109)

营救张德生同志出狱 ..... 杜芳铭 (150)

怀念唐洪澄同志 ..... 马文瑞 刘景范 张方海 (152)

怀念唐洪澄同志 ..... 强晓初 (159)

我的读书求学经历 ..... 马文瑞 (161)

二七年四师活动简况 ..... 关中哲 (164)

戎马一生 风范长存

——深切怀念张述志同志 ..... 1

刘澜涛 马文瑞 张秀山 高克林 贺晋年 王世春 (165)

二七年四师被查封的回忆 ..... 关中哲 (169)

回忆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情况 ..... 马文瑞 (170)

龙王斗县长 ..... 马仰西 (175)

让革命的旗帜代代相传

——献给母校绥德师范 60 周年校庆 ..... 白如冰 (177)

陕北党团特委的活动情况 ..... 常黎夫 (181)

回忆柳青 ..... 冯德兴 (184)

忆高协和先生 ..... 常黎夫 (185)

回忆在母校时的几件事 ..... 张述三 口述 赵国清 记 (188)

|                          |                           |
|--------------------------|---------------------------|
| 怀念我的母校·····              | 任 达 (192)                 |
| 一九三六年绥师教师罢教事件·····       | 白华相 (195)                 |
| 为纪念绥德师范学校六十周年片断回忆·····   | 蒲政文 (197)                 |
| 难忘的记忆·····               | 刘 静 (209)                 |
| 回忆在绥师学习的二三事·····         | 马 健 (211)                 |
| 三八年前后我在绥师·····           | 冰 峰 (常有恩) (213)           |
| 忆白龙同志·····               | 李秀珍 (216)                 |
| 母校——您指引我走向革命征程           |                           |
| ——献给绥德师范 70 周年校庆·····    | 延国钧 (219)                 |
| 一场《亡国恨》演出激起的反响·····      | 张网士 (226)                 |
| 情系母校                     |                           |
| ——祝贺绥师 70 周年校庆·····      | 冯桂舟 (228)                 |
| 记忆中绥德师范的一段历史             |                           |
| ——从 1940 年到 1942 年·····  | 何楠若 (240)                 |
| 活跃在绥德的少年救国团·····         | 张维锦 (243)                 |
| 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我们·····          | 刘星汉 郭守道 (执笔) (245)        |
| 雏雁南飞                     |                           |
| ——记绥师组织的一次参观访问延安的活动····· | 王玉祥 (251)                 |
| 上绥师去·····                | 黄光耀 (283)                 |
| 优秀离休干部张宗耀·····           | 张 昭 (287)                 |
| 艰苦岁月 远大理想                |                           |
| ——回忆在绥师的学习工作生活·····      | 霍毓贵 (291)                 |
| 回忆在绥德师范学习、生活的片断·····     | 白秀珍 (312)                 |
| 我对绥师的回忆·····             | 荆 蓝 (315)                 |
| 难忘的四年·····               | 张 昭 马健忠 马尔赤 李莲葆 刘 格 (320) |
| 忆热爱母校的邢宏同志·····          | 王振敏 (326)                 |

## 培育红色种子的革命摇篮

- 回忆党在绥师的领导核心作用····· 贺登文 (331)
- 访问晋西北····· 刘星汉 王五祥 (执笔) (334)
- 1942 年整风片断····· 白炳书 (350)
- 回忆在绥师的岁月····· 李 心 (363)
- 短暂的经历 永久的记忆····· 张静仪 (366)
- 绥师——我终生怀念的母校····· 霍 芸 (370)
- 绥师对我的培育····· 杨玉伟 (374)
- 绥师创办作坊的回忆····· 李润华 (377)
- 怀念母校绥师····· 高 智 (379)
- 向毛主席报到····· 高 智 (381)
- 离开毛主席的时候····· 高 智 (385)
- 回忆母校学生会工作····· 牛峰华 (388)
- 绥师学生参加重大社会活动片断回忆····· 张承然 (398)
- 歌坛星座白秉权····· 王 巍 (401)
- 回忆进出绥师前后····· 田泽民 (410)
- 《兰花花》醉东欧····· 刘青霞 白炳书 (412)
- 著名歌唱家刘燕平漫笔····· 刘青霞 白炳书 (412)
- 母校培养我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呼雄应 (430)
- 忆锡林····· 田生玉 (432)
- 忆母校生活十点····· 张德仪 (442)
- 我们看见了徐老····· 赵如卿 (455)
- 回忆在绥师的有关情况····· 马 龙 (458)
- 战火纷飞中的绥师····· 张耀成 (461)
- 母校绥师的教育给了我精神支柱····· 马炳房 (476)

## 老魏泪

——回忆绥德师范第二战地服务队在攻打榆林时的片断

..... 白斌华 口述 贺国义 整理 (479)

## 厚土育硕果

——记绥师文艺班..... 黄锡林 (483)

## 风华正茂

——回忆绥德师范时的生活片断..... 高雄科 (496)

抬菜与做人..... 崔凤金 (503)

母校生活回忆..... 阎尔雄 (504)

与团省委书记的一次谈话..... 白鹤晨 (506)

甜蜜的回忆..... 王来英 (507)

教师集训会的两段回忆..... 崔凤金 (510)

在绥师的日子里..... 高仰霖 (513)

## 忘不掉的身影

——回忆校办农场工人姬长胜..... 高仰霖 (516)

## 天地人和起壮图

——学校迁址重建纪实..... 武 军 (519)

附录: 绥师校友聚会实录..... (527)

## 相约兴庆宫

——1985 年西安校友团聚会..... (527)

绥师旅居西安校友 1985 年团聚词..... (529)

绥师在京校友 1986 年联欢会联欢词..... (533)

## 京城盛会话同学

——记在京绥师校友团聚会..... (536)

# 元宵之夜话初八

——记西安绥师校友尊师敬老茶话会…………… 红 木 (539)

# 新老校友喜相逢

——记绥师校友 1987 年春节联欢会…………… 武 军 (544)

1991 年延安绥师校友会成立…………… (546)

# 名州桃李会

——绥师七八级同学聚会侧记…………… 武 军 (548)

80 岁学生谢 90 岁恩师…………… 陈 樱 (550)

## 赵通儒同志回忆

在1924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绥德四师开学的第一天，李子洲郑重公开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移职，并非只为师资教育，个人职业，为以马克思主义唤醒青年，唤醒农民工人及一切劳苦人民，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两个初建的党与团支部已成为领导学校学生一切革命活动的核心了。陕北的地主豪绅、政客、官僚、井氏的附属，也开始嘟囔：“李子洲的学生不好好念书，老在街上讲这讲那，天上地下不知说些什么，造反呀！”里民局豪绅首先向镇守使公署告状，状告四师不法。反基督教运动砸了天主教的牌匾、教堂，同宗教徒在大街上辩论，驳斥宗教迷信害人。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利用宗教奴化中国人。四师成了当时陕北党与团的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成了西北革命的策源地，成了马列主义的大本营，成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实际“党校”，成了革命的工、农、军、妇、青年运动的司令部，也成为反革命企图扑灭的唯一目标。

（选自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2期）



## 绥师一月印象记

王子休 口述 陈江鹏 整理

1925年冬，先父病危，催我回家。葬父之后，已是翌年初春。我急欲返回北大复学，但正逢直、皖战争爆发，铁路不通。与几位同学商议之后，决定绕道陕北，渡黄河，经太原，而至北京。一到绥德，我便住到四师。当时，李子洲任四师校长，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其他老朋友也不少。共进同仁在此相聚，实在难得，岂不快哉！

到绥德之后，一经打听，才知道由此赴京的路也中断了。经过李子洲及许多友人的热忱劝留，决定先在四师教书一段时期，静候路通再走。即任该校临时国文教员，为期一个多月。

李子洲同志曾在《共进》半月刊上发表过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对于当年陕西的教育事业，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文章我都拜读过，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当我亲自到了绥德四师，目睹了李子洲同志的革命教育实践之后，对这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更是敬佩不已。

四师的教师队伍是极强的。除上述几位之外，尚有王复生、王懋廷等。当时，他们都是知名的共产党人，不仅思想先进，而且都有真才实学。一所中学，竟有如此坚强有力的教师阵容，难能可贵。“名师出高徒”，难怪四师培养出那么多栋梁之材！

四师的学生是极好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与四师学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四师学生不但思想开阔，富于理想，

善于思考，勤学好问，学习成绩优良，而且懂礼貌，讲道德，爱劳动，守纪律，忠诚老实，艰苦朴素，已蔚然成风，成为每个学生的自觉的行动。我曾暗暗惊叹：这样好的学生！这样好的校风！

四师的课余活动是活跃而有意义的。我曾与四师的教员和学生们一起，参加过学校在清明节前后举行的春季郊游和其他文娱活动。我看到，这个学校的课外文娱活动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密结合实际，很富于教育意义。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发生，共进社社员张仲超英勇牺牲，共进社社员李维屏等十数人受伤，消息传到陕北，子洲和我们大家都十分悲愤。四师组织了有全校教职员、学生及绥德各界群众参加的盛大追悼会。会前几天，子洲同志让我编写了一个剧本。他把剧本的主题、内容、形式、要求，都对我讲了。我遵照他的意见，应急临时草成名为《被毁的血书》的三幕话剧，并连日赶排。追悼会后该剧由田伯荫（饰张仲超）、杨明轩（饰段祺瑞）和我一同登台演出，气氛悲壮，观众深受教育。

四师民主办学的风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参加过子洲同志主持的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不仅有教职员参加，还有学生代表参加。凡属学校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认真开展讨论。与会同志，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人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在某些问题上，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但大家都能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会议气氛是那样融洽、和谐，生动活泼。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紧密地团结在子洲同志和四师党组织的周围。

我在四师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走南闯北，这种良好的印象总难忘怀。在我有生机的八十年中，我所经历过的学校，无论是我当学生，还是我当老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所见到的教师阵容的坚强有力、教

学工作的严肃认真、学生理想抱负的远大、学业成绩的良好、遵守纪律的自觉，以及课外各种活动的生动活泼而富于教育意义的情况，当年绥德四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而不可多得的。这主要是由于李子洲同志把改革教育与改造中国的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善于领导、知人善任，王复生、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等人赞助得力的结果。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子洲派我们去延安

刘高达

陕北的绥德四师、榆林中学、延安四中的建党活动，是我党在陕西及西北建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三校的建党工作中，革命先烈李子洲是开拓者、播种者、奠基者，确实发挥了“中枢神经”的“大脑”作用。

1926年暑假，在北京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本部，开过共进社年会之后，我和罗端先、康俊阁（女）同行，应绥德四师李子洲校长之聘来该校教书。我们到学校时，李校长已去榆林开陕北三校教育会议，杨明轩同志以教务主任主持校务。教员中，许多同志都是共进社社员。大家在此会聚一堂，分外亲热。不论在四师教员中，还是在学生中，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革命朝气。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自己投身于火热的熔炉之中，温暖的怀抱之中。开学后，明轩同志指定我先教一段历史课。

不久，李子洲校长和延安四中校长呼延震东回到绥德，向我们传达了陕北三校教育会议详情。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名义上是“教育会议”，实际上是解决了三校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的大问题。李子洲他们回校后，又对延安四中建党工作专门开了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由李子洲主持，地点在四师教务处的窑洞里，参加者有杨明轩、呼延震东、田均田和我，还有几位同志。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子洲同志严肃而亲切地向我们宣布了延安四中进一步建党的三大方针。

第一，认真搞好“国共合作”工作。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使其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办事。

子洲说：要把国民党扶施县党部的招牌挂出去，县党部要设在街面上去。

震东是扶施县党部委员，要与驻军高双成的参谋长张彩芹在县党部工作上多加联系，发挥你“胡编”的作用嘛。

尚达去后任延安四中教务主任，同时任扶施县县党部宣传部长；均田任训育主任，同时任县党部组织部长；原在四中的陈玉廷、易厚庵两同志任县党部农民部长，充实县党部，使其面貌一新。

尊重老国民党同盟会会员、清涧县惠又光先生，邀请他到延安去做一些工作，起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在非基运动（即反对基督教运动）之后，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信任。

子洲说：教务、训育、史地、语文、公民等课的教员，尽量先把课文讲得很清楚。最好配合现时的宣传工作，使学生一面在学校课程得知识，一面出校就是宣传员。不必讲得多了，要少而通俗易懂，学生能消化得了。

身教重于言教。你们当训育、教务和教员的，应该在一切工作上做榜样给学生看。学生得先生直接的熏陶影响效果很大。你们青年，当先生的既要庄重严肃，更要叫学生喜于接近，是“敬而近之”，不是“畏而远之”。均田、尚达都是青年，脾气躁，当“主任”了，要拿稳自己的“火候”。不能轻易冒火。临行前，我们或许有些操心多了吧。

“教育救国论”咱们不大赏识，可是革命教育正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是真理。我们就是要办教育，我们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活读书，把书读活！读书是为了活着革命，叫大多数人能受教育，活得好好的，旺旺的！把一个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工作嘛！

第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子洲说：这一次的安排，充实教职员队伍，就是从充实党员队伍做起的。李容鉴同志也跟你们去四中，在训育上做些工作。学生焦维炽在榆中待不住了，原想就近转至四师，现在也叫到四中，焦维炽年轻能干，是个很好的学生，跟尚达在教务、宣传上做一些工作，你们去了以后，要积极发展和壮大党团的组织。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你们当先生的先要学明白，再向学生讲清楚，要宣传好，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不能忽视。

《共产主义ABC》一书和上海大学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讲义，党员，尤其是当先生的党员，应当切实阅读领会，逐步建立起牢固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建党的根本。

关于党员生活的“六化标准”：（一）精神革命化；（二）思想系统化；（三）行动纪律化；（四）工作劳动化；（五）生活平民化；（六）兴趣文艺化。也要根据四中学生的实际情况，设法试行。

此外，他还细致、具体地谈了一些措施、办法。这次会开得既严肃认真、又轻松活跃。特别是直接研究我们的工作调动问题。因此，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会议中，明轩同志插话不少，我们也坦率地说出了我们的一些顾虑，甚至还同小孩脾气似的。我一听要把我派到延安去，首先表示“不愿意”，“我就不去”！子洲同志反复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这是经过认真考虑，从三校全局商定的。我们是想到你和均田同是躁脾气的！但是，震东说：‘你们放心，交给我好了！’现在，党组织决定了，我们就一定要执行才是。震东有信心，你和均田还有什么想法？”均田和我相视而笑起来。我接着说：“我不会当教务主任呀！”明轩马上说：“那好办，你在我这教务处学上几天，包管就会了！”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子洲也笑了。窑洞里的笑声，格外响亮。确实，我是临阵磨枪，连问带抄，又带了一些教务上的常识和教材，才壮了胆子，随呼延震东校长和均田，到延安去的。

我们到延安之后，完全是遵照李子洲同志提出的“三大方针”开展建党工作的。后来，延安建党工作蓬勃发展，证明了子洲同志提出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1982年夏于西安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



## 与杨明轩往来的几件事

关 中 哲

1923年，我到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的正副校长，虽然是于右任和邵力子，但实际负主要职责的大都是共产党员，如邓中夏负责校务，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等。1923年冬到1924年夏，杨明轩任职上海大学并兼附中的主任，和瞿秋白、邓中夏等来往密切。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我们在上海大学读书的陕西人都非常尊敬他，乐于和他交往。他让我在学生中多做些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我担任了学生中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书记并兼学生会的负责人。

上海大学的进步力量很强大，引起了反动派的不满，准备对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下毒手。一天深夜，杨明轩到我的住处对我说：“反动派要下毒手了，你赶快离开上海！”说着就把一张船票交给我，要我第二天就走。当我问起他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你先走，不要管我！”

回到陕西后，我去绥德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绥德四师的校长是常汉三，校内有一个党的特别支部，蔡楠轩是书记，何离负责组织，我负责宣传。1927年秋，宋哲元命令井岳秀在绥德“清党”，我在绥德四师待不下去了，便和赵少西、雷五斋商量，一起回西安。绥德县长是进步人士韩兆鹏，他给我们雇了三条毛驴。当我们经山西大道，将要进潼关的时候，碰到了从武汉返回的杨明轩。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任内，推行进步的教

育改革措施，多有建树，大革命失败后不能在西安立足，去了武汉。他对我们说，西安还在“清党”，他欲去绥德。我们说了绥德的情况，便和我们一同进潼关，到了我的家乡华县。他与华县咸林中学的创建人和负责人都有关系，因此我们就吃住在咸中。过了几天，他们三人继续西行，安排我留在咸中教书。临走时，他还嘱咐咸中的负责人注意保护我的安全。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失掉了党的关系。1943年至1947年间，我在三原中学任校长。当时民盟西北的组织已在各地活动，杨明轩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知道我在三原后，对我十分关心。通过张锋伯给我带话，让我参加了民盟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8年8月到1949年春夏，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西安的几所大学南迁。时在陕甘宁边区的杨明轩对此事十分关心，通过西北大学学生、地下交通丁光（王顺命）、毛西超，指示我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做工作，阻止学校南迁。我当时在西大任秘书主任。实际上，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反对迁校，学校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些应变准备。即：一方面，派几个最反动的教职员到四川找校舍，以削弱校内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强调迁校需要一大笔经费，天天给南京政府打电话要钱，拖延时日。胡宗南曾当面强迫校长杨钟健迁校，他就以还未找到合适的校舍和没有迁校经费来应付。

解放以后，杨明轩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他的意见还要杨钟健继续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并指示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他到校任职。后因杨钟健要从事他的专业研究，才由侯外庐任校长了。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杨明轩》）



## 共进社始末

杨明轩

共进社酝酿于1919年五四以前<sup>①</sup>，成立于五四以后，是当时陕西留学北京的学生，（1）承继了十余年来西北革命历史的传统，（2）受了国内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3）痛恨关学余孽郭希仁的尊孔读经复古反动教育，（4）鉴于反陈刘桐院所组成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

共进社社员基于上述几种原因，他们又寓于革命性，很纯洁，毕业后，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不愿到政界去，反对贪污腐化。所以共进社从开始，它的斗争目标，就是反军阀、反封建，就是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新文化的。

总社设于北京三眼井，天津（南开）、上海（上大）、广州（黄埔）、武昌、开封、西安、三原、渭南、华县、绥德、榆林、南郑均有分社。

社员开始有一百五六十人，1919—1920年之际（原注：应为1921年后），部分分化出去，另组织了与之对立的进化社，社员减到六七十人，嗣后共进社员毕业，服务教育界者日多，陕西出外留

① 关于共进社的酝酿孕育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谓源于五四运动前陕西北京学生从事驱逐统治陕西的军阀陈树藩的斗争；一种是从五四运动后，1920年初在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泰种》，向陕西传播新知识，到1921年10月《共进》创刊，作为其酝酿孕育阶段。本文作者持前一种说法，这一说法作为历史地阐述在京陕西学生的斗争情况是正确的，但作为划分共进酝酿阶段，值得商榷。



学的进步青年，大多参加了共进社，社员日渐增加，至1926年极盛时代，在总社注册者，已经有六百多名，再加上陕西三道各中学进步的学生社员，总数约在一千名以上。

共进社的领导人：在1921年以前总社有李子洲、杨克强、赵次庭、韩述之、侯又可、段大成、呼延震东、刘天章、韩卓如、魏野畴。1921年至1924年有刘含初、屈经文、武止戈、耿炳光、方仲如、安子文、刘尚达、潘自力、王子休、白超然、刘天章、魏野畴。1925年以后，由魏惜言、梁鼎、何寓砧、赵少西、冯一航等人主持总社社务。关中有杨明轩、郝梦九、赵宝华、韩述之、魏野畴、张耀斗、王尚德、常汉三，汉中道有熊文涛、易厚庵、周彬如，榆林道有魏野畴、李子洲、李象九、杨明轩、常汉三，军队有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刘志丹、阎揆要等先后负责。

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共进社开始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总务、组织、宣传、交际这一套部或股之类是没有的，只是从实际工作需要推出几个同志，分门别类地去做就是。但大家做起来，都很起劲，做得很好，这也是出于自由自愿的缘故。因为只有自由自愿，才能激发出做事的热情和责任心。

经费来源，出于以下两途：（1）抽有薪金收入社员百分之三以上的累进所得税；（2）其他社员与社会人士的自由捐赠。

它的宣传刊物叫做《共进》（半月刊），是总社在五四时出刊的（原注：应为五四以后，1921年刊）。开始发行五百份，以后逐渐增加到三千份。这个刊物不间断地出了八九年之久，直到1926年9月24日，在北京的总社被封才被迫停刊。这一刊物的作用，实在不小，它以新工具白话文（当时白话文才流行，教育部尚未通令小学课本采用，我记得1920年初，教育部才通令小学采用），给西北社会，

尤其是中小学校学生、教员这一阶层，输入了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新的民主（介绍苏联）与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同时翻印《共产主义 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及其他小册子多种，广为传播。1925 年夏，西安社员发刊《西安评论》，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当地各方面事件。这一刊物差不多做了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的机关刊物，到 1927 年初，刘天章主办《西安民国日报》（原注：1927 年刘天章在西安主办的报纸，名为《陕西国民日报》）。下同。大革命时代，西安民国日报社出版多种革命理论的书籍，同时教育厅社员（该厅编审委员会）又翻印了四种科学教本，供给各中小学阅读，所以说共进社在思想上给西北党做了启蒙的工作。

共进社一开始就做学生运动。1919 年中国史无前例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学生爱国运动发生在“五四”、“六三”、“六二八”各次运动中，共进社员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五四”被军警捕捉的三十二人内，共进社员有两名（杨明轩、郝梦九），“六三”在北大法科捕押的一千多名，几乎那时共进社员全在内。当时北京学联设立在北大，距共进社总社址三眼井近在咫尺，因之学联的总务科，清一色的是共进社员（杨晓初、呼延震东、杨克强等数十人）。学联对外交通联络，也有不少的共进社员，他们都做着实际工作。“五四”以后，共进社一部分社员回省，任教一中、三中、一师、成德各校，领导了当时西安各校教职员、学生索薪、改良课程及各次爱国运动。

1921 年后，共进社一部分进步的社员，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启示，先后参加了 CP（原注：英文 Communist Partg 的缩写）、CG（原注：疑为英文共产主义团体 Communist Group 的缩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CY 的笔误。本书编者倾向于后者）。从此，共进社奋斗的方向，有了大的转变，一切文字宣传和活动，都完全执行了青年团的路线。到了 1925 年，总社开会，讨论全

体参加 CG，还是个别参加 CG？当时虽决议了后者，但实际参加组织的却占了过半数。

从五四到大革命的前夜，这一期间，共进社回陕社员，除了上述在西安各校教书者外，散布在陕西三道各县、私立中学任教的、主持校务的日渐增多（如魏野畴在一中、三中、成林、榆林等中学，王尚德主办赤水职业学校，韩述之创办渭阳中学，杨明轩、张耀斗、郝梦九办湖北中学，李子洲、常汉三、杨明轩等办绥德四师，熊文涛在汉中中学教书），因之灌输革命思想，发展青年团务，介绍《共进》（半月刊）和其他进步书报，指导学生各种实际行动，推动全陕大部分学生走上革命大道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社员（当然不止上述那几位，还有其他的社员）在各校不但负责执行了分内职务，并积极的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学术团体（自治会、讲演会、辩论会、时事研究会、升学补习班、夜学校、平民学校等），指导学生做社会活动（如组织农民做抗税抗捐运动；在布会集会时，做破除迷信、时事报告等宣传），连纪念日也令学生散传单、贴标语，到城乡讲演。曾记得绥德有一个期间，县府把脚户的骡子、驴子拉了去，四师学生帮着脚户硬要出来，因之农民很称赞学生，县府很讨厌学生，这使学生不但初步学会了和官府斗争的经验，同时又培养了为人民、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观念。

这个时期，总社在三眼井左巷附近设了三四处升学指导小组，给初到北京的学生，分门补习功课。

现在再说一说共进社与国民党的关系。1924 年底，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不久到了北京，反对段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南京学生总会通电拥护国民会议，上海、北京都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共进社员屈经文、董汝成被派回陕发动全省这一运动。关中、陕北各校社员起而响应。这是共进社

公开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开始。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北京，共进社与北京各团体于5月7日在天安门召开民众大会，追悼孙中山，之后愤而赴教育部示威，并到教育部长章士钊住宅，捣毁什物。当时学生、市民被捕十数人，有共进社二人在内。9日又与各校学生包围段执政住宅，要求罢免教育部长章士钊，得国民军协助，11日段氏始不得已罢章，释放被捕者。是年6月，“五卅惨案”扩大，共进社执行党的路线，积极参加上海、北京各校罢课及历次宣传示威运动。陕西各校亦起而响应。1926年“三一八”北京学生、市民为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游行示威，到国务院门前请愿，段祺瑞令卫兵开枪射击，死四五十人，伤二百余人，共进社员李维屏等十数人受伤，三原张仲超死，这是共进社员第一个为革命牺牲者。（不久他的哥哥张宝泉也在平汉路做工人时牺牲<sup>①</sup>）

1925年夏，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等在西安筹备组织临时省党部，发展全省国民党党务，直到大多数县党部及省党部正式成立，全陕国民党党务大半都由共进社员所主持<sup>②</sup>，到1927年夏，始被迫离开岗位。

1926年国民党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进社员屈经文当选为候补中委，活动范围扩大，这也是应该提到的。

共进社自国民党改组，一方面在党领导下通过国民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一方面介绍社员入青年团，竭力扩大团的组织，所以说在干部上共进社给西北党做了准备工作（关于最初有我党组织的地

① 张宝泉是1928年在上海担任党中央地下交通工作时牺牲的。

② 大革命时期，陕西国民党组织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建立并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的。这些党团员中许多人也是共进社社员。作者在这里是从共进社角度上讲的。

方，是渭南赤水职业学校，那里是王尚德<sup>①</sup>负责）。陕北给我党做奠基工作的是李子洲。

现在再来说一说共进社的军事活动与士兵运动。1925年初，刘天章在国民二军练学生军（在开封），是年秋天，魏野畴、宋树藩等参加办理杨虎城部的三民军官学校（在耀县），同时，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红彦、王有才等也在安定驻军做士兵运动。他们指导士兵阅读《共进》、《共产主义ABC》，同时又组织农民抗捐抗差。1926年，他们驻扎宜川，又同四师几位教员、学生，在那里帮宜川县小，帮助农民收获，推动兵农学合一运动。他们不但宣传共进主张、共产主义，后来还插起红旗轰轰烈烈地搞起社会革命。

末了谈一谈共进社的结束。1926年夏末，奉军及直鲁联军进驻北京，掀起反共逆流，高喊“讨赤”，一时空气紧张。到了9月24日，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总社址被查封，连续捕去社员四十二人，完全是当时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前后为时三月，虽经各校长极力交涉，分批都脱了险（最后释放的杨晓初、雷郁青、原禾生、何寓砧、梁鼎等五人，是由前陕督陈树藩保释。因陈那时正企图回陕，故借机向陕人表示好感）。但是从此社务停顿，《共进》停刊。那时因为北伐军占领武汉，西北军到了关中，被困八个多月的西安已解围，国民革命在全国展开，共进社员基于客观环境的需要，纷纷参加实际革命工作，一时京、津、沪、汉、广州等处都有共进社员的活动，尤其在西北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共进社员确实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责任。

现在把1927年上半年第一次大革命浪潮高涨期间，在西北担负

① 王尚德最初在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建立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不是党的支部。

——出处原注

重要工作的几个共进社员列举出来。

(一) 党：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杨明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赵宝华、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西安民国日报社社长刘天章。

(二) 政：陕西省财政委员杨晓初、王授金，高等法院院长段绍九。

(三) 军：政治保卫部长兼中山军事学院院长史可轩，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

(四) 民：陕西省农民协会负责人亢维格。

(五) 学：教育厅长杨明轩，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教育长李子洲、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渭南中学韩仲范，四师校长常汉三，四中田伯荫，二中校长韩叔勋，成德中学校长魏惜言，三职校长缙老钦，一女师校长呼延震东。

经过八年惨淡经营，有历史意义带地方性的青年革命团体——共进社这时完成了它的桥梁作用和挹注使命。大多数社员都投入到长期艰苦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阵营，它的本体便随着这一革命的开展，光荣结束。

1946年10月29日

(节选自《共进社与西北革命》，见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杨明轩》。题目为编者所加)

## 陕北建党及活动情况

田伯荫

### 引 言

陕北地区 23 县，到处是童山秃岭，丘陵起伏，平原绝少，水土流失很严重。在全省比较起来确是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因僻处边区虽未多受战祸的摧残，表面上秩序安定，但是在黑暗政治的压制下，苛税杂捐，层出不穷。人民负担的繁重不减于关中、陕南。这样喂肥了井岳秀（陕北镇守使，群众叫他“北山王”）日益壮大（原有不到一团人，后来扩充到两个多师，独霸陕北二十多年），加之贪污土劣，地主恶绅，多方压榨剥削，一般人民的生活显得贫困不堪，终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广大青年在这种生活环境下，革命的要求较为迫切。这给发展革命工作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

### 绥德地区

1923 年秋末，魏野畴同志由榆林回到北京，介绍我参加了共进社。1924 年 7 月，我由北京师大毕业，他又介绍我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去教书，同时共进社委托我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的组织。共进社是陕西旅京学生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后组织起来的，有着共产党员参



加和领导的进步团体。在四师的老社员有校长李子洲（参加过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教务主任杨明轩，训育主任常汉三，教员韩叔勋和我（在陕北时名字是田伯英），在榆林中学的有呼延震东等几个人。我是教英文的，功课最轻松，课余时间较多，搞这些活动比较方便，也不引人注意。我们先在四师，继在榆中；后在延安四中，吸收最优秀的师生参加共进社。不到半年，社员人数增加到五六十人，其中以学生为最多。共进社的迅速发展，给以后建党打下基础，并以此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预备学校。

和我住在一处的国文教员王懋延同志（南方人，野畴介绍的，原系威林中学教员），对于共进社的组织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共进社是个小组织，活动的范围不大，没有高深的理论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不如参加共产党。他常给我讲有关党的组织，介绍阅读有关的书籍、刊物，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我也将我的心事和思想情况和他交谈。我的眼光逐渐明亮了，对党有了认识了，我们的思想一致了，就研究入党的事。

他在北方区（北京）党组织有熟人，我们俩就给北京党组织写了一封申请入党的信。约有半个多月（1924年10月间），北京党组织回信说，已经批准我们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在陕北开展党的组织工作。从此，对共进社的发展就放松了（那时入党还没有什么仪式）。在此以前，屈经文（屈武）同志介绍我参加国民党，由北京寄来了党证，正好对外利用国民党员做掩护，进行党的工作。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我们先吸收共进社社员和其他方面先进的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在绥德四师起初只有三四人，到年底增加到八九人。超过五个人就成立四师的党小组，我任组长。不久在榆中，延安四中也先



后成立小组。四师的小组到1925年初扩大成为支部，我任书记，惠廷任宣传，李瑞阳任组织。青年团的负责人是赵仰普（赵通儒），他任团书记时间比较长。不少学生，甚至教员，受了宣传教育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党、团组织，以入党、团为荣，不人为耻。

榆林方面在1923年，野畴同志任榆林中学教员时，即做过马列主义的宣传，并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深受欢迎，而为反动派所忌，因此离开榆中，到北京去了。1925年初，榆中的刘景桂（志丹）、杨尔瑛、刘景向等参加了党。是年秋季，王惠廷利用四师、榆中比赛篮球之便，到榆林召集党员成立榆林支部，负责人是刘景桂、杨尔瑛等。他们近在井岳秀的掣肘之下，受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活动比较困难，但工作、学习反更积极。

1925年8月开办延安四中，呼延震东任校长，延安小组亦于此时建立起来，不久也扩大为支部，负责人是陈俞廷、易厚庵。

1925年3月间，绥德党支部转为特支，负责人员无变动。到5、6月间，组织越来越壮大了，特支转为地方团（党）地委，除书记、组织、宣传外，又增加军事、农运两委员。初次是王惠廷担任地委书记，我任宣传，瑞阳任组织，李象九（石谦旅的连长驻瓦窑堡）任军委，李映旭任农运（农民，长于讲话和秧歌舞，在农民中有影响，有联系）。惠廷在七八月间到北京去了，先说到苏联去，以后未果。他走后，由我任书记（到1927年1月离开为止），瑞阳以后到宜川去，由蔡南轩任组织工作（北方区派的）。

这时，我们的工作展开了，事情繁多了。四师窑洞不够用，也不方便，由于洲借用高家祠堂（四师东边）作为教师宿舍，实则是开会和办公的地方。师生白天上课，晚间复习、备课、改作业，忙个不休。各支部、小组都利用深夜开会，负责同志又须分别参加，工作忙时通夜不睡，次日照常上课，从不请假，习以为常，也无倦

容。星期日各支部每借郊游。采标本为名。常到城外稍远的僻静地方去开会。那时地委的办公费每月五元。远不敷用。我们派人去外地开会、工作或求学所需旅费。全由教职员自愿捐助。党组织为培养军事人才。派刘景桂等数人到广东黄埔军校去学习。路过绥德时大家踊跃资助。其中以李子洲、杨明轩捐助的数目为最多。

1925年6月以后。党的活动遍及陕北各地。榆林、延安以外。一些县城及重要村镇均有党的组织。学生们每届寒暑假回家。随时随地做宣传教育工作或办短期夜校。杨家沟的学生马瑞生说。他们在家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后。妇女们兴奋地道：“共产主义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实行呢？”

1925年秋。杨虎城将军由榆林带兵南下。驱逐占据西安的军阀吴新田。到绥德时。我们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和群众在东门外热烈欢迎。他住在四师。并对学生做过一次生动的讲演。勉励大家。他到耀县后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四师学生不少人前往参加（马明方等）。次年杨将军守西安。嵩匪刘镇华围攻了八个多月。死伤人甚多。西北军在五原誓师后。和于右任部南下解围。到达绥德、延安时。我们都予以欢迎或招待。

1926年暑假。我到北京去出席共进社的代表大会。一个下午。由耿飏光引导。到俄使馆会见避难的北方区李大钊同志。他穿一件灰布旧大褂。神采奕奕。异常安闲。和蔼可亲。我们见面谈话后。他叮咛说：“外面有密探。你们晚一点再出去”。他关心我们的安全。岂知他们卒未脱险。以后竟遭万恶军阀的毒手。言之痛心。这一次。我受四师、四中两校委托。请了罗端先、刘尚达、赵绍喜诸同志到校任教员。很受学生的欢迎。也加强了我们的工作。

延长石油厂无故欺压工人。工人反抗。反被开除。我们支持工人。用四师全校师生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严斥该厂的无理行动。

号召各界援助工人的正义斗争，获得了胜利。

1926年秋季，北方区党组织派钱竞（清）泉等同志到兰州协助冯玉祥创办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路过绥德时，我们在四师开会，请他讲话。他讲话的技术很高明，句句打中人们的心坎。开始讲了几句全场就激动起来，欢欣若狂，丁光智等很多同学立即表示决心，要到兰州去学习军事政治。我的弟弟到绥德看我，也一路去了。四师在党的领导下，培养了很多革命青年，给这个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

我们党组织还经常支持其他的正义行为。榆林某校女教员王佩珊（河北省人），对学生讲了反动势力在榆林的黑暗统治，揭露了反动派种种欺压剥削的事实，触怒了他们，群起攻击，逼她离校。党组织在各方面援助她，并在西安的《国民日报》上批判这件事，更揭穿反动派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报社社长刘天章同志对我说：“说得对，说得好，就要这么做，以后多投稿。”

绥德党组织，每遇大节日、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五卅”，十月革命，列宁、孙中山纪念日等，经常进行宣传教育。贴标语、散传单、作漫画、讲演、演剧、演唱、放留声机、唱秧歌等文艺活动，宣传马列主义、爱国主义、国民革命。在开大会以前，积极筹备，搭棚、搭讲台（也是临时戏台）、确定讲演人员（大会公开讲演多系子洲、明轩、慧延、徐梦周担任）和讲话内容提纲。戏剧多系自己编拟（李瑞阳、刘尚达、王子休都是研究戏剧的），由师生自己排演，新鲜动人，每次大会都获得成功。我们又及时积极配合、响应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反对军阀内战、反对帝国主义、庆祝北伐胜利等。3月18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举行请愿，段贼下令开枪，用机枪打死打伤学生数百人，造成重大惨案，陕籍学生张仲超也被打死。我

们所到这些消息，召开追悼大会，痛斥段贼卖国行凶的罪恶，并编演戏剧（明轩扮段，我扮仲超），激起观众的极大愤慨。

通过这些事实的宣传教育，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动派的真面目，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爱国心。

李瑞阳同志于1926年2月到宣川石旅旅部去（到年底离开来西安），和史唯然搞政治工作，随后阎揆要也到了。李象九此时已任营长，自集义镇回到宣川。他们成立宣川特支，瑞阳任特支书记，象九任宣传，唯然任组织，在石旅展开了党的工作，直属北方区。宣川特支建成后，石旅的政治气氛逐渐高涨起来。象九早在他的连部发展党员，这时就在其他营、连尽量吸收忠实可靠的分子入党。后来石旅的连、排长多半成了党员，很多士兵也参加了。除康子祥等少数人以外，可以说已掌握了差不多一旅的兵力，后来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瑞阳等主办的墙报宣传革命的道理，鼓舞士兵的革命情绪，深受士兵的欢迎。每日下操士兵们挤到日报周围，争抄报上的言论，作为学习资料。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校长李子洲同志应省方的召唤，将校务委托罗端先代理，只身来西安，不就司法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之职（认为自己不是学法律的），在中山学院任训育长。不久，明轩（原国民党员）接到驻陕总部电报，将回西安就任教育厅长。先一天晚上，我们地委开会，通过了介绍明轩入党的建议，由我征求明轩意见，他立即同意。我写信给子洲说明轩已经入党了，子洲回信表示很高兴，说我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后各县的教育局长，尤其是陕北，大多数是委派党员充任的；省立各校更不用说了，因此党在全省教育界影响很大。四师校长，教育厅另委任常汉三负责。我于1927年1月离开绥德，来省开会，绥德地委书记由蔡南轩担任。

七八月间，四师被井岳秀解散。人事变动，工作停止了一个时期，一些县里的党团活动转入地下。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7期）

## 绥德四师党的活动简况

何寓础

陕北是我省有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有许多革命先辈、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活动家诞生在这里。如李子洲、刘志丹等同志。毛主席曾给李子洲同志的墓碑题字称为“共产党奠基人”。李子洲同志主办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期间，曾经是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培养了许多革命干部，是有光辉革命历史的学校，对革命是有功绩的。

我是1927年上半年在四师任教的。记得大概是1927年1月初，我离开北京师范大学，由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局派到绥德地委（属北方区委直接领导）去工作。在社会工作上，要我到李子洲同志主办的四师去做教员。这时，我党还和国民党合作，我国正处于北伐军胜利前进和工农群众革命高涨的时期。北伐军已占领武汉，并把吴佩孚的残部打到武胜关以北；转而进攻福建、浙江、江西，进攻孙传芳盘踞地区，到处震撼着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全国形势的发展，使西北的形势也在大变。冯玉祥、于右任等在五原誓师后，占据了宁夏、甘肃、陕西等省，解了西安的围困，革命势力打到了

潼关。陕北当时还在反动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之下，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井军名义上已编为国民革命军，悬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实质上仍是军阀统治。

我离开北京以后，独身走上旅程，路经太原、汾阳、离石等地，沿途好些站上，行李都受检查，除夕到太原。山西当时币制混乱，印刷的方法十分巧妙，各县有各县的石印钞票，还有一种铜币的钞票，互不通用。当时山西各地仍悬挂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但一过黄河第一站就望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旗帜当时还象征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光明力量，表示国共合作。我看见很兴奋。我于阴历正月十五前两三天到达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四师。

四师，这时是绥德地委机关的所在地。我在这里工作只有半年，到7月初就离开了。我到绥德后，地委书记田伯荫才调延安，由蔡楠轩（名正鞭，湖北人，北京大学学生，在四师任英语教员）担任。我当时是地委委员之一，负责组织部工作，宣传部由关中哲负责。另有青年工作由赵仰普（后改名赵通儒）负责。妇女工作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李恩涛（又名李波涛）负责。绥德地委除领导绥德城乡组织外，还领导过榆林中学支部和驻在清涧的李象九营的军队支部。记得到了5月中旬，陕西省委通知把绥德地委改为县委，榆林另立了县委，四师党支部由绥德地委直接领导。我到四师时，李子洲偕同教务主任杨明轩已于不久前起程南下到西安工作（李任省委组织部长，并担任中山学院的领导工作；杨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长）。这时校长为常汉三（名士杰，绥德人），教务主任罗耀先，训育主任韩叔勋（中途被调走，由赵绍西继任）。开学不久又增设了政治主任，由关中哲担任。这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但都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在教员中也有许多党员，记得有：赵秉彝、雷五斋、李恩涛。学生党团员有：赵仰普、贾拓夫、张德生、

刘澜涛、常黎夫、吴志洲、常紫钟、张兆繁、王志匀等。学校党支部由常汉三负责，共青团由赵仰普负责。我当时不在校内住，和蔡楠轩同住在学校东边的高家祠堂（绥德地委办公的地方），党的好些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谁常去高家祠堂多被认为是党员，因此有些人就暗暗把高家祠堂叫“苏联大使馆”。在高家祠堂里服务的工友叫李映旭，当时是党员，曾做过挖炭工人，是县工会负责人之一。

四师共设六个班（三一八班），另设一个预备班，共有学生三百名。

在当时局势下，党对学校领导的总的方针是通过学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向非党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扩大革命影响，推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扩大国民党组织，扶植国民党的“左派”，孤立“右派”和顽固分子，并和他们作斗争。在学校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实现教育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命的宗旨。

为了实现上述方针，党当时采取的主要方法是，首先注意学校人事配备和课程设置，注意教材的思想性和革命性。如语文课教员都由党员担任，我和关中哲、赵绍西、雷五斋等都担任语文课。学校在教务、训育、事务科外，增设政治科。常汉三校长除忙于全校工作外，兼任事务主任，为学校的经费（当时经费由拨到税局的款中提取）到处奔波。其次，国民党的组织（县党部，校内区分部）领导人都由党团员负责。群众性的组织如县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妇女会和校内学生会也全都掌握在党团员手里。甚至县教育局长也抽调党员学生担任。

当时绥德地委共有党员一百人左右，团员很多。我到校后，学校已开学，尚未正式上课。国民党县党部在一两天内就要开成立大会，大家都忙于筹备，几乎每个教员都分配有具体工作。有同志告



诉我：“别的工作都已经给别人分配好了，不好变动，你刚到可参加公开接收国民党员的工作，那一方面还缺人。”这时要增加国民党员的工农成分，以利于我们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同时也便于发展我党的组织，所以要在成立国民党县党部的那天，在绥德各城门口，机关、学校门前，各大街上设立桌案，携带国民党入党表格，公开征求工农群众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到了那天，我便到派定的地点去工作，遇见过往的工人或农民，就宣传他们加入国民党。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我害怕”。我就解释国民党是一个公开的政党，革命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谋利益等等，用不着害怕。到了黄昏，回学校吃饭，别人都说谁今天征求到几十个国民党员，有的竟征求到上百个人，我难为情地说到我遇到的情况。“我宣传过的人数倒不少，只是他们多说‘我害怕’”，这话刚一出口，惹得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最后才知道是我不懂当地语言，我把“我解不下”即不懂得的意思，错听成“我害怕”。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实现党的任务，党对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以及校外群众深入开展教育活动。主要内容是：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主义浅显的道理，帝国主义侵略史。具体材料是：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并有《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当时的国文课没有课本，完全由教师速编讲义。另外又举办政治课问答栏，向全校师生进行一些革命知识的解答。学校图书馆中，收集的进步刊物不少。活动方法上，每周有一个定期的集会，如总理纪念周末班会、学生讲演会、时事报告会、时事讨论会等，广泛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国内外的局势。在社会活动方面，学校成立了剧团，开办了平民学校和夜校，组织学生每星期下乡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大会（学生也

参加)，利用一切群众集会来开展工作。

记得1927年上半年，在地委直接领导下，我们发动组织过：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大会，纪念妇女节反对英帝国主义大会，学校成立纪念会，拥护国民军出师中原肃清后方大会，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四二八”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五四”、“五七”、“五卅”都举行了集会。通过这些，不仅扩大了革命影响，而且培养了许多干部。有不少师生都分配到各省各地工作。如教员王惠廷到黄埔军校工作，徐梦周任中山学院教员，田伯荫到延安负责党的工作，并任延安四中校长。四师学生代表团到西安去开会，路经延安，田伯荫询问四师的情况，有的学生很生动地说，四师革命空气多得由学校大门往外流理。那时学校有不少学生都不愿穿制服，觉得穿上制服不好深入群众。

当然，四师的革命活动也遭到一些反动分子的破坏。党采取了孤立反动分子的方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当时落后的教员是王翰屏，党组织了全校教职员对王的言行进行了多次驳斥。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社会上也进行了不少工作。如在农民协会成立时，蔡楠轩化装成农民，带领了一部分学生，逮捕了吉镇的劣绅王明洁，在成立大会上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揭露了地主劣绅的罪恶活动，对群众教育影响很大，使一些反动分子感到害怕，把四师视为眼中钉。当时绥德县长韩兆鹏很巴结四师，他深知没有四师的帮助，他这个县长就很难维持下去。

6月末，我和罗瑞先回西安。我是由绥德党组织派向省委汇报工作的。这时已是“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陕北的军阀残余和反动分子又重新抬头。当我由西安返绥德路经洛川时，就听说学校已被封闭，工作需另布置，大家都劝我们不要回绥德了。从此我折回西安，由省委

改派至渭南县委工作。

我在四师工作虽然仅有半年时间，但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四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我一起的教员同学，有些今天已是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有些经不起革命疾风暴雨的考验中途叛党或脱党，有的则英勇奋斗而光荣牺牲。特别使我怀念的是，当时四师的校长常汉三。他诚恳直率，生活俭朴，工作认真，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当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要封闭时，有的人惊慌失措，他却拍着胸膛说：“学校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若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枪毙我！”他这种正气磅礴、临危不惧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学校封闭后，敌人将他软禁年余，不准他离开绥德地区。以后他获得自由回到西安，在省教育厅当督学，后来又调南郑第五师范当校长，随后又到三十八军当参议，对该军的进步帮助不少。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病故于河南荥阳县苏寨村三十八军中。临危的时候，同志和朋友们问他要给家里说什么，他不回答。有人假造了一封家信，念给他听，问他给家中回信说些什么。他却只说：“我盼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看不到了！”对家事仍只字未提。他把多年积存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的勤务员，其他衣物送给朋友纪念，并要求不要给他另制寿衣，就穿这身抗日军服，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绝气以前，口中还哼着《黄河大合唱》歌曲。这种临终语不及私的精神若无特殊气质和修养是不容易做到的。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省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7期）

## 徐步墀回忆录

(1983年4月10日)

### 绥德四师的建立

1923年4、5月间，陕西省教育厅派高晋铎筹办绥德师范（当时名叫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地址选在仓粮圪塔下的旧书院。旧书院内有石窟三孔，另外有瓦房十多间，作为教职员的宿舍，新修建的有两大间教室，教室前边修建了两排学生宿舍，每排学生宿舍有七八间。学生宿舍前边，修建了石窟四孔，走道窑一孔，前边围墙外，另建校门。1925年后，李子洲任校长时，又将西边兵马营的旧址扩充为第四师范的校址。

筹建成立后，高晋铎被委派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他聘请高克斌为学监，高璧呈为舍监，王汉屏为数理化教师，白介徽为国文教师，王燕群为英文教师，高克斌为史地教师，高璧呈为手工图画教师，苏景武为事务员。

1923年后半年开学时，共招收了新生甲乙两班。上半年招考了一次新生，录取了新生30人左右，由各县选送来学生20多人。7月间又招考了一次新生，共录取学生57人。上半年招收的新生为甲班，后半年招收的新生为乙班，两班学生约为110多人。

## 1924 年学潮的起因

1923 年开学后，学生学习情绪很高，教师教学也很认真，学校风气也很正派，可以说学校有欣欣向荣的苗头。寒假期考后，将考试成绩通知学生家长，并叫家长督促学生补习功课。来年到校时，每个学生必须带来制服（由八大块布缝制而成）一身，以便上课后穿戴。1924 年开学后，学生大部分带着制服来校上学，只有少数学生未带制服。但学校的领导者，命令学生必须穿上制服上课，不穿制服者不准上课。这种刚愎自用的硬性的规定，激起了学生的反对。学生选出代表向学校领导说：“教育厅所发的伙食费，除吃而外，尚有余款，学校既然为了整齐壮观，可由学校统一筹划缝制，发给学生穿戴为宜。”学校领导却说：“膳食费并没有余款，学生制服必须由学生自己拿去缝制，穿制服者上课，不穿制服者，不服从学校规定者，请离开学校。”学生们在学校领导高压手段下，不受他们的威胁，马上全体搬出学校，只有榆林县的四个学生，在学校领导的授意下，未搬出学校，还在校内继续上课。

学生搬出学校后，向省教育厅控诉学校领导无理压迫学生，不让学生上课，克扣学生膳食费，不让学生过问。学生代表向绥德城内士绅请教反对高校长政策的解决办法。经过研究，决定回校闹事。因此于搬出学校五六天后，又决定回学校赶走高校长。风潮闹了一月以后，经过教育厅的指示和绥德城内士绅的斡旋，才停止罢课，听候教育厅妥善处理。快到暑假时，教育厅即委派李子洲先生担任第四师范的校长。

## 四师团组织的建立

李子洲任第四师范校长后，请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王惠廷任国文教师，田伯荫任英文教师，韩叔助任生物教师，王汉屏任数理兼音乐教师，李致燕任美术教师。由于李子洲先生是共产党员，也请来思想进步的老师，因而学校的气氛焕然一新。就在1924年寒假放学前，由共产党员王惠廷，在学生中组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二郎山上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参加会的共青团员有：白明善、邓重庆、杜嗣尧、乔国桢、张礼廷、王好智、杜振宇、李葆秀、冯景翼、赵仰普（即赵通儒）、李蓉蓂、叶毓荣、李馨香、王祖谋、徐步墀、丁恩贤、马瑞昌、马瑞生、刘光弟、贾耀祖（即贾拓夫）、罗伯福、武丕谋、薛尚英、丁学潜、安志翰（即安子文）、杨应举等。参加共青团的人，并不是对马列主义有了解的人，而仅仅是忠诚老实在学习上比较努力的人。

## 1940年绥师迁往横山响水堡的经过

1938年刘绍华（即刘春园）担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时，绥德专署专员何绍南多次向教育厅报告，绥德师范已赤化。教育厅于4月间，派白进彩（即白焕亭）任训育主任，暗地里却在了解刘绍华的行动，收集材料，随时汇报教育厅。暑假后，白进彩亲自到西安汇报绥师学校的情况，于是教育厅撤除了刘绍华的校长职务，委派白进彩担任了绥师校长。

白进彩在西安给绥德专署打电报通知，委派高仲称会同专署协助办理接收手续。学生组织护校团，守卫校门，拒绝接收。专署派

孙秘书协助高仲称办理接收手续。据当时了解，拒绝接收的人，是一进步教师曹孟朴组织学生护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并没有出面指使。

1938年9月开学后，白进彩聘请高仲称为教务主任，袁本植为训育主任。袁本植在1938年上半年在榆林中学任教时，已参加复兴社。到绥师后，他和学生党自派（也为复兴社员）在军统特务邵杰三的协助下，在绥师的学生中组织成立了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利用忠教会的学生侦侦了解，再加上教育厅委派的中统特务杜振宇为督学，住在绥师校内，协助活动，最后终因石怀璜的告密，破获了学校内的民先地下组织。在1938年放寒假后，经过校务会议的决定，勒令退学的学生十几个人，忠教会的学生继续侦查进步学生在校内的活动。

1939年4、5月间，曾发生过一次向陈其涵司令员示威游行的请愿运动。产生的原因是：在钟楼山下靠近县立高级小学校旁边的篮球场上打球，八路军的战士和绥师学生发生了冲突。由于专署、军统和县党部的教唆挑拨，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运动。经过串联活动，绥师学生联合高级小学学生，从绥师学校出发，经过城内街道到南关尽头，举行了游行示威运动，沿途喊的口号是：反对八路军战士打骂学生；要求陈司令员赔情道歉；保证以后不发生此类事件，最后到司令部要求陈司令员道歉。陈其涵向学生讲话说：“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利，决不是欺压人民的旧式军队；同学们不要受反动派的挑拨离间和八路军搞分裂。请同学们努力学习，搞好救国的本领为要！”学生们随即散队返回各校。

1939年9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从抗日前线转回绥德休养后，绥、米、清、吴的警备区的政治形势来了一个大大的转变。

原任绥德二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专门靠反共搞摩擦吃饭的军统特务。他组织和领导了特教巡回教师、中统 CC 组织、党网，以及复兴社的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等，专门侦查刺探民先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致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日趋紧张和矛盾日益尖锐化。1940 年 2 月，三五九旅的革命武装赶走了二区专员何绍南及其所指挥的地方武装保十二团，从此警备区政治军事才逐渐趋于统一。

赶走何绍南后，当时担任绥师校长的白进彩，也暂时表面上改变了反共的浓厚色彩，采取了联共态度，起用进步民主人士霍仲年为绥师的教务主任，于锡魁为训育主任。但反动的国民党仍不死心，暗地里令白进彩将绥德师范迁移到榆林专区横山县响水堡续办。白进彩接到密令后，决定于中午三、四点钟会餐，他则于早饭后出城去游玩。出城后即雇脚夫连夜赶到镇川堡。到镇川堡后，即打来长途电话给学校里的师生说：他奉教育厅的指令，决定将绥德师范迁移到榆林专区横山县响水堡去续办，师生可以三五结伙，陆续到横山县响水堡集中，食宿问题，他已派人妥为安排。

去响水堡的教职员学生，都是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的人，留在绥德的人，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那一边的人。去响水堡的班级有三〇级一班、三一级三班、三二级二班，1940 年暑期又招新生三三级二班。去响水堡任教老师有栾本植、徐步霖、刘春膏、艾雨亭、王好智等。栾本植任教务主任，徐步霖任训育主任，王好智任绥师附小校长。新聘了任大钧、王雨、曹颢僧（曹雨）三人为教师，另外由栾本植负责筹组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栾担任直属区队长。在当时响水绥师领导认为：响水绥师确实是国民党所办的纯粹是国民党思想的学校。解放后才知道：即使在响水的绥师，仍有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步组织。

1944 年在暑假教育厅撤销白进彩的校长职务，改派党棍栾儒瞻



任校长。1945年9月教育厅撤销梁福瑞的校长职务，改任徐步辉为校长。1946年10月，响水堡被波罗堡起义部队围困后，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命令响水堡师教职员学生撤退到榆林城内。三日后驻防响水堡的十一旅萧营长撤退到榆林，响水堡被解放军和起义军所占领。1948年3月，教育厅命令绥德师范和榆林师范合并办理，逃亡在外的绥德师范学校名义，也不复存在了。

## 绥德建立了平民学校

李明轩

1921年2月间，绥德城里建立了平民学校，学校只有一个教员，也是校长（杏树圪坨的党子蓄），学生有30余人，地址在现在的附小。这地方曾是一个庙，叫忠义祠。那时学校所上的课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其实同私塾差不多，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教育局供给的。

1923年冬天，经四师绥德学生同乡会和教育局交涉，平民学校就由绥德学生同乡会接办了，学校的教育经费则是教育局同乡会的100元助学金。（在四师当时，各县有各县的同乡会，各县教育局均给本县学生同乡会一些资助学费）

同乡会接办平民学校后，学校扩大了。校长由四师学生李明轩担任，并聘请了四师学生白明善、张礼庭、王暖、高光祖担任教员。同时，学校也进行了修补，添置了一些桌子板凳。经过一段准备之后，学校开学，学生一律免费上学。学生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分为四个班。学校课程也得到了改进，《三字经》、《百家

姓》之类统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国民读书》、《唱歌》、《自然常识》，还有教员临时编写的进步教材。

到1924年8月，由四师共进社领导，平民学校又增设了一个成人班。这个成人班不分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均可上学。同时，也开设了夜校。成人班白天上两节课，学生有30多人。夜校四五十人，晚上上课，都有教员辅导，并给每个人发课本。四师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不仅使穷人家的子弟能上学，而且使得四师和社会上有了往来。从那以后，农民、工人经常来四师找学校学生，四师也十分乐意和他们接触，于是人民便和四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平民学校和四师连得很近，中间只隔一条巷子，因此，往来十分方便。1924年10月，党团组织在四师内开始建立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环境不好，具体工作在四师内不好开展，于是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平民学校。当时，平民学校工人也去，农民也去，因此不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党小组、党支部的一切会议都在那里进行。在建党初期，平民学校基本上成了党的活动中心指挥部。后来，工会、农会、脚户自保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927年7月间，井岳秀派兵封闭了四师，平民学校也就解体了。从1924年到1927年这几年中，平民学校前后招收了20个班，共收学生680多人（成人班、夜校的学生不在其内）。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革命英烈》1984年第4期）

## 绥德脚户自保会宣告成立

李明轩

1925年3月间，脚户自保会在恶劣的环境下于平民学校院内成立了。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组成的以组织的力量展开同井岳秀的官兵说理斗争。大会时到会脚户王玉贵、石泰清、郝林瑞、刘三等30多人，各机关群众及各校学生共计四五百人。会场中悬挂孙中山像，满院及街巷大道张贴标语：（1）脚户同志们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2）反对不合理的敲诈勒索；（3）脚户自保会是我们脚户的救星；（4）谁要摧残脚户自保会我们就同他拼到底；（5）誓死维护脚户自保会；（6）打倒帝国主义；（7）打倒军阀；（8）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大会由白明善主持，即席报告开会意义。他说：“陕北交通不便，由甲县到乙县，从乙县到丙县往来商旅不是步行便要雇牲口送，脚户们数口之家唯一的生活来源靠赶牲口过日子，今天多赚来钱就糊口，明天赚不来多的钱就稀粥，赚不来一文钱就要饿肚子。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脚户们连苦日子都过不成，逼得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自己喂几个牲口，碰见不讲理的官兵、老爷们拉去支差，由甲县送到乙县分文不给差费。不但不给钱，稍不遂意不是鞭打就是绳捆，实在逼得活不下去，更谈不上养家。所以自己组织起来救自己，凡遇到不合理的敲诈勒索，我们要誓死反抗。脚户同志们，全体学生愿做你们的后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脚户王玉贵讲话，他未讲话之前大叫一声“天呀！”会场一惊！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接着他说：“为什么我未说话之前先叫声天，就是我们看到天了，看到救星了！我是田庄以南石嘴驿人，家里有父亲、母亲、婆姨、娃娃，他们专等我拿回来钱养活。我赶三头毛驴，一头骡子，上次官兵老爷拉了差从绥德到清涧又到延安，这样长的路整整走了五天，结果分文没给差费。我要求赏我差费，开口就骂，几乎挨了一顿饱打。我到安定又被拉差去延川，同样不给差费。回到家里老的愁，小的哭，这样的社会叫我怎么活人。今天脚户自保会成立了，也就是看到天了，有了救星了，所以叫声天！”

石泰清脚户讲话：“我是石家沟人，我只认识四师学生李明轩，他对我宣传脚户自保会怎么好，怎么对脚户有利。我总是半信半疑。今天我哥哥石泰浩的牲口被官兵老爷拉差了，说要支差到定边。这么远的路往返的支费非卖牲口不可，叫我们怎样活人。我们兄弟商量试试找李明轩，看找脚户自保会怎样？结果四师学生出动了30多人，同官兵老爷讲道理，很快就把牲口要回来了。我们兄弟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这是脚户自保会救了我们的命。今天脚户自保会成立了，我要背着脑袋干革命，与不合理的事实斗争到底，死也不悔。”

刘三脚户讲话说：“我是刘家畔人，也喂了两头毛驴，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上月被官兵老爷拉了差，说去葭县（今佳县）。我对老爷们说，我家里有老母亲病得很厉害，你们救救命放了我吧，另外号别人的牲口，千祷告万祷告不行，还骂我放屁。最后我说老爷们去葭县雇牲口用多少钱由我给，答应了。我白白地花了些冤枉钱。我们赶牲口的真苦啊！今天脚户自保会正式成立，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要求发言的人争先恐后，情形十分热烈。

最后王懋廷讲话。在他未讲话之前掌声四起经久不息。他说：

“今天我有机会参加脚户兄弟们的自保会，感到很高兴！兄弟们靠赶牲口过生活，东跑西走，白天黑里太辛苦了！刚才我听大家说过着艰苦的日子都过不安稳，不但牲口被人拉差得不到分文差费，还要挨打受气，这真是太不公平的事啊！谁都听到难过。兄弟们，我们为什么这样被人欺负，不讲理的人所以敢欺负我们，是我们没组织起来，谁都不管谁的事，我们只好向敌人低头。乞求是没有用处的，他们不会发慈悲的。我赞成石同志勇敢的精神，干革命就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牺牲，要斗争到底，光靠自己个人奋斗不行，一定要有党来领导，没有党来领导是不会胜利的。谁来领导我们呢？孙中山先生说得很明白，就是中国共产党。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我们要遵循，有组织有领导，团结一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祝愿胜利万岁！”

他讲的话虽然不多，但是听众很受感动，在群情激昂的情形之下，推举白明善为会长，杜嗣尧、高光祖为副会长，王玉贵、石泰清、罗伯福、李明轩、张礼庭、赵通儒、刘斌章、邓重庆、刘三、郝林瑞、严念祖等25人为委员，在平民学校挂起了绥德脚户自保会的牌子。在掌声雷动、高呼口号声中散会。

## 绥德县工会成立回忆

李明轩

绥德县工会是1925年8月12日正式成立的。党组织很重视工人运动，在未成立工会之前，曾派白明善、高光祖、李明轩、杜嗣尧等人同工人王进峰、雷忠秀、李邦俊等人数次谈话，提高他们的

政治觉悟，并介绍王进峰、雷忠秀、王进禄、雷万春、李邦俊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经他们积极宣传后，大部分工人认识到，要革命就要团结起来而奋斗，不奋斗就无以生存。

工会成立那天，工人同志们都像过节日一样，换上了自己干干净净的新衣服，欢天喜地齐集于平民学校大院等着开会。在大门口横挂着红布标语，上面写着“绥德县工会成立大会”的字样，大街小巷都贴着“工人同志们团结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反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方针政策！”“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工人、农民、脚户大团结万岁！”“我们同兄弟组织携起手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

大会在掌声中开幕，由王进峰主持并宣布开会意义后，特请王慧廷同志讲了话。王在讲话中说：“今天是工会成立的第一天，我参加这次会议很高兴，希望工会组织发展壮大。在县工会的领导下，各区各镇均要有组织的成立。同志们，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的力量最大，亦最紧密。工人阶级不容轻视，我们的工会也是全国工会的一部分，工人同志们要爱护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不怕牺牲的毅力，为革命贡献力量。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到会的有没有把头颅背在背上干革命的勇气与胆量。只有这种勇气和胆量才不愧为革命志士。”（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他接着说：“人生皆有死，醉生梦死，牛马不如的生活实在没有价值。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们要在他的三大政策指引下，鞠躬尽瘁，努力奋斗！”

在王先生讲话后，木工代表雷忠秀（南关人）、石工代表李怀义（小河沟人）、瓦工代表白鸿儒（白家湾人）、泥工代表李瑞祥（背城人）和栲汉鹏（杏树圪塔人）、银匠代表邢运泰、铜工代表武生枝（井滩人）、理发代表傅三锡（北门湾人）相继发言，一致拥护

王的讲话。

接着选举了工会委员会，结果是：

主任委员：雷忠秀。

副主任委员：王进峰、李邦俊。

委员：雷万春、王进禄、李瑞祥、李怀义、白鸿儒、高如金、梅汉鹏、邢运泰等。

##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的回忆

李明轩

绥德县国民党县党部，早在1925年秋就开始筹备了，负责人是杨明轩，地址设在四师前院三间房，挂起绥德县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开始介绍党员。那时候党组织指示：凡是我们的同志，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工作。当时正在国共合作期间，陕北党组织还不能公开活动，必须利用国民党作掩护，方便开展工作。那时候国内各阶层，都顺应形势，称赞国民党，到处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因此，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成为我党的外围组织。在国民党中又吸收其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杨明轩、王德廷等同志曾以国民党的名义，赴榆林、延安等地，督促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并向群众发表讲话，宣传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1925年秋，山西阎锡山晋军一度派两个团，驻扎在吉镇和葭县螭螭峪一带。团长是陈光斗和庄勤堂二人。那时，党组织以国民党县党部之名义，派我和李波涛二人去吉镇，同陈、庄接谈，以示慰问，借机宣传三民主义。随后，陈、庄二人给绥德县党部写来感谢

信。党内向井军石谦旅派李瑞阳、白乐亭（白明善）、史唯然等人去作军运工作，也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时至1927年县党部正式成立之前，在工人、商人、农民及学生各阶层中，共吸收国民党员约有一千五六百人。其中起骨干领导作用者，是共产党人。1927年3月30日，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成立，时杨明轩已离陕。党内有常汉三、蔡楠轩、罗端先、何离端、关中哲、雷五斋都积极参加领导筹备工作。当时党组织指示，因形势关系，此次大会，要着重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总理遗嘱等。并要特别强调，谁要是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谁就是反革命。此次大会，选举20多人为领导班子，因预感时势有逆转之可能，没有选定谁是主要负责人。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立即笼罩全国。党组织在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之下，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工作。其时革命队伍明显分化，有的同志遭敌逮捕，光荣牺牲；有的畏惧脱党，退出革命阵营；更有甚者，有的人竟背叛革命，出卖组织和同志。大体有三种情况。从此之后，各县历届国民党县党部，就成为反动组织。简言之，经德国民党组织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战期间，在我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是生气勃勃的革命组织；一战之后，即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工具。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革命英烈》1984年第4期）



## 绥德县农民协会成立的回忆

李明轩

绥德县农民协会是在1927年3月1日正式成立的。此前，党组织接到北方局的指示称：“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农民运动，要全力积极地组织农民协会，展开向军阀、土豪劣绅的斗争，决不能因为政治、经济等问题，放弃组织工作。”开会地址在平民学校，因事先做好准备，各村镇均派代表参加，约有1200余人。大会由杨玉峰主持，地委书记蔡楠轩讲了话，农民代表丁镇业（丁家沟）、郝进德（郝家桥人）也讲了话。学校代表李波涛也讲了话。大会决议：

- 一、拥护中华全国农民协会；
- 二、组织农民自卫军；
- 三、废除苛捐杂税；
- 四、取消驴打滚高利贷；
- 五、严密农协组织；
- 六、创办刊印《农民生活》；
- 七、实行农村教育，培养农民干部；
- 八、继续分派代表到各村镇进行调查，宣传组织农协工作；
- 九、农民以组织力量、革命手段解决自身的一切问题；
- 十、铲除一切妨碍农协工作的反动派。

农协是农民进行斗争的工具，无斗争无以生存。会后散发了传单，整队到大街小巷宣传，接着演了内容丰富的戏剧，以示庆祝。城内男女老少均来四师大操场观看，直到深夜，盛况空前。县农协

成立之后，分派人员到各村镇进行调查、宣传，组织基层农协工作。农协的负责人是李仰旭、丁锦业、郝进德等人。

（选自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4期）

## 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霍维德

张达志

霍维德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李子洲在省立绥德四师创建党团组织时，霍维德以四师校役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参加革命斗争是很早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在陕北的革命活动很秘密，一般单线联系，我没有同霍维德发生过组织关系，但马明方多次提起过他，马明方对我说：“绥德县义合有个霍维德，是个老党员，对党很忠诚，是一个好同志。”

革命公开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和霍维德一块共过事，知道他的事很少。

霍维德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副省长时，我在兰州军区任司令员，是省委常委。我们两人虽然一个在地方，一个在部队，但由于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见面。接触中我深刻认识到霍维德是一个正直、实在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从不说假话、虚话，也从不看人行事。1958年，甘肃刮起浮夸风以后，霍维德多次深入农村基层，认真调查研究，敢于把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在各种会议上讲，敢于向中央和省委写实事求是的报告，并且如实向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反映甘肃严峻的粮食问题。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同时触怒了省委某些热衷于搞浮夸的领导人，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斗得很厉害，斗了三四个月。为此还株连了一批省级领导干部。由于把霍维德打成“集团”的“头子”，所以他受的冤枉最大。霍维德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没有错就不承认。一些好心的同志劝他，就承认一下吧，不然就收不了场，下不了台。他坚持到底，不肯低头。后来省上把材料报到中央，作出决定，把他的党政职务全撤销了，只保留了省委常委的虚衔。这样，他连工作权利也失去了。

1962年7月的兰州会议上，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给霍维德平了反，恢复了全部职务。但没过几个月，霍维德又受到错误批判，连省委的常委也撤销了，并被送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我听说他本来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提了点意见，说了些“党内要民主”等话，就不行了。那时候，党内生活太不正常了。

霍维德到山东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后，向毛主席写了个要求平反的报告，经中共山东省委报给中央。毛主席看了后，给中组部批示说，找了解并征求意见。我当时任炮兵司令员，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霍维德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贯实事求是的情况，以及在甘肃两次被错误批判的情况，如实写了个证明材料。约在1973年春，甘肃省委写出了报告，经中央批准，给霍维德平了反。平反决定，是由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向他口头宣布的。

霍维德待人非常热情、诚挚，说话风趣，爱开玩笑。他常到我家里来，同是陕北老乡，话题就多一些，也经常彼此开玩笑，关系是很融洽的。

霍维德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爱吃简单的陕北饭，穿布衣服。他的清正廉洁，关心群众疾苦，在甘肃是有口皆碑的。

霍维德很善于搞经济工作，脑子很好。凡经手的事，记得很牢。更可贵的，他有远见卓识，看问题，想问题客观、实际，的确高人一筹。搞经济建设，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过早地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左”的时期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人民巨大的损失。

（选自1994年1月南海出版公司《霍维德》一书）

## 战士终究是战士

——悼念马明方同志

马文瑞

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从1928年起，我就和马明方同志在一起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一起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他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有人说马明方同志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害死的。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早在1967年，就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发表“打倒马明方”的长篇文章，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随后，又把他送到北京关押起来。林彪的一个死党亲任专案组长。他们私立公堂，刑讯逼供，硬要他承认是“叛徒”，遭到他的严正驳斥。在被关押期间，他用捡来的一些破纸，偷偷地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多次

控告信，诉述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信件根本不可能送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我后来看到一点残稿，是他的大女儿冒着极大的危险，背着看守人员从明方同志那里拿出来的。从这几片血泪斑斑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遭受了多少残酷的迫害，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他在信中说，在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先是进行了几天“车轮战”，一日三审，不准休息，把他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折磨得羸弱不堪。随后又进行了20多天的所谓“清醒头脑”，施用各种刑法，大搞逼、供、信，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面对这伙暴徒，马明方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在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面前，这伙暴徒气急败坏，更加残暴地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到最后，他已被折磨得几乎不能行动了。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怀着极大的信任，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拯救他。1973年，由于身残病重，他被送到医院“关押治疗”。起先不让家属探望，病重时不让家属护理，病危时又不采取抢救措施。在他病情垂危时，才允许家属到医院去探望。明方同志对他的爱人和孩子反复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忠心耿耿、革命一生的马明方同志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指出，残酷迫害马明方同志的，还有那个自命一贯正确的，其实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的“迫害专家”。此人在1968年6月1日听取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就说：“这个案子是叛变自首，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下来，有计划地搞内奸”，“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不要因为敌人向我们斗争就动摇了我们的观点，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马明方同志被关押残害七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就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在新疆监狱中的我方全体人员。经周恩来同志多次交涉和斗争，国民党才被迫释放这些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关押期间，周总理多次指出：新疆出狱的同志无问题，并把注明马明方等同志无问题的材料交给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但他们却置之不理，继续对马明方同志进行迫害。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周总理又指示：迅速给马明方同志复查平反。但“四人帮”横加阻挠，直至1975年5月才作出平反结论。经毛主席批发各地后，“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仍然扣压不发，不准传达，不予平反。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许多冤案、假案得到平反昭雪。明方同志，你的冤案也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出身贫农，上过几年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受党的委派，到西安做军事工作。1927年秋回到陕北，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中共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西省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明方同志回到陕北那年，正值大革命已经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党处于严重困难时刻。在艰难的岁月里，明方同志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胆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任团绥德县委书记，明方同志任党的北区区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农村，秘

密联络同志，进行群众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1928年、1929年陕北连年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处逃荒，绥德县委曾组织上万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我在城内负责指挥，明方同志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城。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使陕北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1年冬，明方同志调陕北特委工作，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党的组织更加发展了，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逐步建立起来的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抗捐、抗税、抗债和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并划分了安定、延川、神府、绥清、佳县等几个游击区。马明方同志亲自起草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次会议，是陕北党组织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一般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派特委委员分赴各游击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我当时被派往神府，明方同志去安定一带整顿第一游击支队。在刘志丹同志为首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支持和配合下，陕北游击队迅速扩大。1934年，陕北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游击战争有了迅猛发展。陕北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1935年，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西北军委主席，马明方同志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5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扩大到20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这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同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足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马明方同志对革命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理所当然地要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抹是抹不掉的。

1941年，马明方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狱。马明方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据同时被捕的同志讲，明方同志被捕时，愤怒地质问：“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未说完，就被国民党暴徒拳打脚踢，五花大绑，推上囚车。入狱之后，他积极同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结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当时狱中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明方同志同他们都取得了联系。他接到秘密传来的报纸后，及时写字条传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他收到林基路同志写词、陈谷音同志谱曲的《囚徒歌》后，传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的字条。他发现个别人叛变时，传出“有臭鱼，注意”，并组织大家同“臭鱼”作斗争，将“臭鱼”挤走。敌人曾提出要狱中同志填写“愿意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作为释放条件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愿意回延安。”敌人审讯他时，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他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方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痛斥和揭露。1944年、1945年狱中全体同志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七天七夜。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敌人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他坚定地答道：“不吃！就是不吃！”敌人要给他灌辣椒水，他翻滚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1945年“双十协定”公布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和斗



争，1946年6月，敌人被迫将新疆监狱的全体同志释放回延安。当时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同志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毛主席设宴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其中有“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的评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要把马明方等同志打成“叛徒”，更加暴露了他们打击诬陷革命老干部的丑恶嘴脸。

马明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尽管那时陕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南方的游击战争对陕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那时都知道，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同志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看过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陕北革命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结果。王明路线传到陕北时，明方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制造红、白区对立等过“左”政策；他反对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梢林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在王明路线危害革命的紧要时刻，毛主席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的党、陕北的革命。因此，他对毛主席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解放以后，他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50年，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两种立场、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文章，批判了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的错误倾向，对于关中、陕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央财贸部和东北局工作期间，同样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服务。他极力提倡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反复宣传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反对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财贸队伍中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他在营口县官屯公社给宋任穷同志一封信上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同志当即批转各地执行。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诬蔑马明方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人。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同志总是赤诚相待，推心置腹；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总是苦口婆心，耐心帮助，从不歧视排斥；对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则深恶痛绝。他的这些优点，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熟知的。人们还记得老舍写的《西望长安》中的那个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吧。195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其中说到李万铭伪造的证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应看出来，但没有看出，擅自做了处理。明方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深表敬佩。

马明方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平常不多讲话，在会上讲话、作报告也不很流利，有时还磕磕巴巴，但他是一个讲求实际、肯动脑筋、勤奋学

习的人。他的许多重要报告和文章，都是他事先找干部、找群众调查研究，形成思想观点，然后亲自起草；或口授大意，由别人写出草稿，再经他亲自修改而成的。他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予同志们的印象是很深的。当然，马明方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缺点，但他从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林彪、“四人帮”一伙苍蝇在他身边嗡嗡叫了一大阵，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像马明方这样的优秀老党员，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的迫害而得不到保护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的准则。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窃据的权力，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给这些干部随意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辩解和说明，更不允许对他们的卑劣行径提出任何异议。如有申明，如有反抗，就说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翻案，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无视党纪国法，随意点名，随意抓人，私立公堂，严刑逼供，刑法之多之残酷，牵连人数之多，不仅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他们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加以歪曲、篡改，当做法律，把他们自己的话当做法令，强令句句照办。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以“左派”自居，大肆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欺骗了不

少人，坑害了不少人。他们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所以能够钻到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核心，他们的罪恶活动之所以长期没有受到阻止和法律制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少了。加之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这就给篡党乱国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这个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马明方同志在生前就一贯主张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现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到来了，举国上下正在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明方同志，你安息吧，你的遗愿一定要实现，你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1979年2月2日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文瑞文选》）

## 马明方勋业照千秋

张达志

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叶家岔人，生于贫苦家庭，自幼刻

苦勤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1925年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革命活动，做过许多重要的领导工作。明方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时，因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含冤病故。

关于明方的生平事迹，马文瑞同志曾写过一篇详尽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值此陕西省组织撰写革命英烈传记之际，谨就我同明方同志以往朝夕相处、倾心交谈留下的几点深刻印象记述于后，以表达对明方同志的缅怀。

对明方同志，我早有所闻，但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地下，我们不便见面，况且也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至1932年冬，中央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赴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特委书记便由马明方代理。后来，明方同志来到我地巡视，检查葭县（今佳县）党的工作，我和明方同志这才算真正相识。

当时，葭县县委尚未成立，只是由我和高长久、刘光显三同志组成区委，我任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教育和动员群众，我特意在本村成立了冬书房，公开身份是教员。

明方同志巡视检查过区委工作之后，高兴地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群众基础好，本村和周围村庄党团组织也比较健全，便于进行活动。所以，决定将陕北特委机关移到我村。明方同志就住在我任教的冬书房里。

冬书房总共有两孔窑洞，学生住一孔，马明方和特委机关的同志住一孔。由于明方同志深入群众，善于宣传群众，他在群众中很快享有很高的声望。尽管明方同志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实际上大部分群众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人们不仅欢迎他，爱戴他，并且很关心他，有时还送饭给他。正是由于有了群众，有了周围各村党组织的保护，才使得明方同志和特委机关较为安全地在我村住了下来。

为了继续发展陕北革命形势，明方同志经过详尽思考，周密计划，决定召开一次特委扩大会议。1933年7月，会议终于在佳县高起家坨村召开了。明方同志亲自主持，并代表特委做了关于革命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且具体规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特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拥护通过。此次会议，在原有特委委员的基础上，又增选了四名新的特委委员，增加了新的血液，充实和完善了特委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特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对陕北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由秘密工作转向公开武装斗争，也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及特委交通员高景孝和米脂县的几位领导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位同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紧接着，敌人又到米脂县委家兴庄抓捕马明方、马文瑞以及常学恭（后自首），被当地群众掩护逃脱，分散于各地知己同志家里隐蔽起来。两三天后常学恭来到我家，经我俩商定派刘光显到米脂县了解情况，得知六位被捕同志惨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另外两名特委委员擅自跑到北京去了，仅留下的几位特委委员陆续来到我和高长久家里，商量对策。

当时，因为马明方同志尚未到来，大家派我到马明方同志家里找他。当晚，我找到明方同志，吃完晚饭后，我俩便星夜赶到葭县寨则沟村，在张清禄同志家里开了一夜会。由马明方提议，决定：一是派常学恭到党的北方代表那里汇报工作；二是特委委员立即分赴各地，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不要因六位同志被杀而垂头丧气，裹足不前，应该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争取团结、胜利。马明方同志在敌人早已通缉之下，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各

地群众之中，坚持革命斗争。他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933年底，北方代表派郭洪涛、李铁轮两同志到陕北特委工作。他们于1934年1月间在葭县南圪村召开了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会上除传达了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的指示，强调了组织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重要性外，特别着重批评和指责了陕北特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对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当时，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坚决不同意这位同志对陕北特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错误批评，马明方更是据理力争。由于明方同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事后特委们分工时，马明方同志原任的组织部长调任为宣传部长，而组织部长却由这位同志自己担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斗争，是坚决贯彻王明“左”倾路线与坚决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明方同志无疑是党的正确路线的维护者，是坚决反对错误路线的勇士。

明方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从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对有的同志下车伊始的错误批评，本来很有意见，但决不犯自由主义。在分工问题上也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不合理，深表不平，而明方同志还是服从组织的调任，仍能坚持积极的工作。又如，1933年特委扩大会议选举期间，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正准备选举马明方任特委书记时，崔逢运同志忽然提出：北方代表指示，特委书记一定要由工人同志担任。明方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崔逢运这一积极动议。尽管陕北当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和雇工还是有的。经过反复酝酿，一致认为崔田夫出身雇工，党龄也长，革命坚决，斗争性强，所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不过大家认为这是可以帮助的。田夫同志当选为特委书记后，身为组织部长的马明方，实际上仍承担着很多重要工作。即使这样，明方同志还是十分尊重崔田夫的。他亲切地称田夫同志为掌柜的，从未表示过不满的情绪。

和意见。

明方同志对人非常赤诚，宽宏大量。同志有了缺点或错误，他总是善意地、耐心地提出批评、帮助，不发脾气，不动辄训斥；唯对那些违法乱纪，伤害群众利益的同志却是极为严厉的。记得1933年秋，神府游击队没收了土豪两头毛驴，作为特委的活动经费，结果一位姓曹的同志把毛驴赶到山西变卖后，挥霍了一部分。明方同志知道后，找来这位同志当面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给了他纪律处分。

马明方同志善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也勇于作自我批评。1934年，也是个秋季，我由佳县地区回到特委常驻的清涧县寺塬村。有一天，我和当地很多群众在一起拉话。有的老乡问我：你们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了，我们欢迎，但大家这么一窝蜂地收，将来打下的粮食该怎么分配呢？这样不行。有的勤劳，有的懒惰，不公平，况且地也种不好，你们总得想出个办法啊？我明白了老乡们的意思，就是要求分配土地。

我将群众这种呼声和意见向明方同志汇报之后，明方同志当即找来特委各位委员进行了商量，决定就在寺塬村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的会议。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委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仍然执行的是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好田除留给红军为公田外，全分给雇农和贫农的错误政策。尽管如此，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是十分重视听取群众反映和意见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在此提及的。1951年，西北军区分配陕西军区为志愿军代买一批骡马。由于他们向上级多报了价钱，结果“三反”、“五反”时被查了出来。在事实未搞清楚、矛盾性质未定之前，《陕西日报》既未讨论，也未通过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马



明方审核同意，仅由担任主管的领导批准，就擅自做了报道。报纸登出之后，明方同志深感不当，除了查询事出原因外，并亲自到陕西军区向司令员刘金轩赔礼道歉。明方同志事后对我说，他对此事虽然事先不知道，但自己作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不能遇事先把自己洗刷得一千二净，而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的头上。可见明方同志的思想境界和革命品德是很高尚的。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明方同志一直过着克己、俭朴的生活。土地革命时，我们特委活动经费很少，几乎连一部急需的油印机都买不起。所以，明方同志出外巡视、检查工作，总是身无分文，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同志家里食宿，即使远行，带着几个铜板，常是吃个半饱，也要把钱节省下来。冬天，他没有衣、被，除了一块毛巾和一双烂布鞋，就是他那件没有面子的、抹得油渍麻花的短皮袄。晚上，我同他常是扯着一件破羊皮大衣和衣而睡。多少年来，明方同志吃的不是南瓜、洋芋，就是小米、咸菜。记得有一次马文瑞同志从安定县巡视工作回到特委机关，由于饿得不行，向明方同志提出想吃一顿小米干饭炒猪肉，明方同志答应了。大家吃得香，都说真像是过了一个好年。

当时革命的生活的确是艰苦的，但是大家的热情却很高。明方同志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无论他任陕西省委书记，还是到西北局工作，甚至以后调到北京，明方同志始终穿的平常衣，吃的家乡饭。明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不利用自己的职权谋个人的私利。1932年，特委机关经费极度困难，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为了帮助陕北特委，曾送来两包特货存放我家，明方同志担心泄露秘密，引起敌人注意，宁肯忍饥受饿，也不愿冒险卖掉。直到1934年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这时才拿出来出手。

1936年，我回到瓦窑堡住红军大学一科，明方同志那时已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一天，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明方同志对我说，他父亲来这里看他。他父亲有点嗜好，明方同志没有满足他，引起他父亲的大怒，并和他吵闹。明方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父亲送回家去。

又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后，明方同志调到北京工作，他母亲一起随他也到了北京。有一年，明方同志母亲病得很重，他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在明方同志去甘肃检查工作没有几天工夫，就接到电报，要他迅速回去处理母亲的丧事。但是，明方同志没有及时回北京，一是他考虑到工作没干完，二是怕自己亲自主办影响不好。所以，明方同志只是拿了些钱，要他兄弟们操办了母亲的丧事。从以上几件事情看，明方同志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很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对党一贯忠心耿耿，坚信不移。即使我们党处在困难关头，他都能不畏艰险，全力以赴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明方同志襟怀坦白，为人正直，总是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搞特殊化，不摆官架子。他工作细心，勤于学习，每当收到上级下发文件时，他总要再三斟酌，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总之，明方同志的长处是很多的，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仅就我记忆深刻的几点写了出来，作为我对明方同志的纪念。明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勋业昭千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4年6月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马明方》）

## 高山流水 浩气长存

——为纪念马明方同志逝世 25 周年作

李经纶 霍培芳 刘 静 曹相如

马明方同志是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西省苏维埃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十年动乱期间，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蒙受不白之冤，饮恨长眠，迄今整整 25 年了。我们是在马明方同志崇高思想品德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晚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多少苦涩，换来春雨。每忆及他晚年不幸遭遇，不禁潸然泪下。值明方同志逝世 25 周年之际，以对马明方同志十分崇敬的心情，现将点滴回忆及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汇集如下，以寄哀思，以慰亡灵，以启后人。

### （一）

马明方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对党无限忠诚。他是无定河畔茁壮的劲草，昆仑山上挺立的青松，寒霜摧不垮，狂风吹不倒。他是一把利剑，宁折不屈，直插敌人胸膛。1941 年从苏联回国途中，留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指使特务头子李英杰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员及其家属约 150 余人，全部软

禁，于1943年1月逮捕入狱。在押上囚车时，马明方同志义愤填膺，置生死于度外，挺身而出怒斥反动派，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在监狱关押的四年中，不屈不挠，和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通过秘密串联，把分散到各个监狱关押的我党我军人员组织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妄图用填表的方式，软化共产党员的斗志，谎称：只要在表格的“信仰”、“志愿”两项中填上“愿意回家，不再跟共产党走”就发路费，立即释放回家。马明方同志当着敌人的面，挥笔而就，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弄得敌人手足无措，目瞪口呆。敌人审判官索文通审讯马明方同志时，拍着桌子狂叫，“你们八路军在大青山捣乱，断我交通线，你们是土匪”，明方同志怒不可遏，痛斥索文通：“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大长革命志气，大灭敌人威风。这不是在谈判桌子上，而是在敌人的监牢里，面对敌人的审判官进行的舌战。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此可见，明方同志的浩然正气和无私无畏的革命胆略，撼山易，动摇明方同志的革命意志难。新疆敌伪档案载：马明方“素性刁顽”，“平时在狱中召开小组会议，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对马明方等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冥顽异常”。从敌伪档案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威武不屈、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大形象。我们党的朋友，1946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1967年8月，在给毛主席信中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写道：“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赞叹不已。就在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敌人关押期间，于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缺席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经党营救出狱，一起出狱

的同志集体返回延安。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达到其篡党夺权、陷害周总理的罪恶目的，人为地制造了所谓“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冤案，于1967年11月非法将马明方同志关押，长达八年之久，1974年被迫害逝世。1975年7月13日，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发出了为新疆马明方平反的文件，而“四人帮”的死党把持的辽宁省委，却公然与党中央相对抗，不但对党中央的平反文件不予传达，反而给已经过世的马明方同志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非法关押的八年中，刑讯逼供，受尽了折磨，但马明方同志襟怀坦荡，趁女儿马锐同志探监时又正词严地对专案人员讲：“你们说我在新疆出卖同志，说有人检举我。你们有根据吗？把他找来当面对质，你们先定案，先抓人，没调查材料，这对党对人民都没有好处。我马明方如若在新疆做过坏事，我情愿一步一叩头到延安请罪处死。”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长期折磨，1974年马明方病情加重，周身血管硬化，四肢僵硬，蹲下站不起来，只好爬着走。但他相信党，坚信真理，坚信天阴总有天晴时。在关押时仍拖着病躯反复学习了《毛选》四卷，读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看过《史记》。对探视他的女儿讲：“我早晚能出去，出去了还能做点工作，比如写写党史，至少还可以提供材料嘛！”临终前，嘱咐亲属，“你们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周总理，说我马明方是好人，我死也放心。”可惜，马明方同志没有能等到这一天，就含冤走了。我们听了马明方女儿马锐同志的泣诉，禁不住泪如泉涌。我们党有这样忠贞不贰的坚强战士，这是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二)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黄土高原的莜草哺育成长的黄牛，吃的青草，挤的牛奶，只知奉献，不知索取。他的心是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紧紧贴在一起的。他于1925年入党，早在绥师上学期间，利用假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抗税、抗捐、抗粮斗争，1929年陕北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处逃荒，马明方同志同马文瑞同志在绥德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万名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在中央红军的影响下，1933年古历六月上旬，马明方同志主持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从陕北革命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作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4年1月谢子长奉命回陕北，领导陕北游击运动，从此陕北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陕北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8月，陕北先后成立了9个县苏维埃政权。1935年1月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马明方同志被选为陕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经过战争严重破坏，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马明方同志竭尽全力组织动员人力、物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支援了战争。马明方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对广大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1949年西安解放，马明方同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任陕西省委书记，同时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进了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他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没有变。他的心始终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解放前胡宗南在西安城外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防护壕，占地约三万余亩。时隔一年之久，壕沟还没有填平。马明方同志看到这种

情况痛心地说：“胡宗南怕群众，挖了战壕，我们又不怕群众，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战壕保留下来？三万多亩肥沃的土地，能打多少粮食呀！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我们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应当很快平沟还地于民。”1951年长安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告状农民刺伤卫兵的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长安县的一个地主逃避土改转移土地十二亩，牲畜两头，农民×××发现后，告到县上，县政府转到乡政府处理，因乡长与这个地主有私交，进行包庇，该农民被乡政府整了六次。无奈，到县委、县政府找县委书记、县长面谈，又遭到拒绝。这位农民气不过就往县委、县政府院子冲，被站岗的卫兵阻拦，该农民夺了卫兵的刺刀，向卫兵砍了一刀，县上把这位告状农民以现行反革命关押。马明方同志了解事实真相后，非常气愤，十分严肃地讲：“群众为揭发地主逃避土改转移财产，被乡上整了六次，告到县委、县政府又拒不接见，进县政府又被卫兵挡住，告状农民气极了，夺了卫兵的刺刀，向卫兵刺一刀，你们把他判为反革命关押起来，这样做对吗？共产党应当如何对待群众，这是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你们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写信批评你们，上访找你们说理，你们又拒不接见，最后群众就拿刀子批评你们，我看这个案子判错了，应该马上给群众平反道歉。”这个案子平反后，对长安乃至全省的震动很大。群众交口称赞：“还是共产党好”，当时，西安解放不久，这件事的正确处理极大地稳定了民心，教育了干部，密切了党群关系。

马明方同志总是把关心群众疾苦同发展生产联系在一起。在1951年至1952年召开的陕西农业生产会议上强调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劳动生产这件事，永远和太阳一样的光明，而长久存在”，“谁不吃饭？农业生产是基础，是命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马明方同志在中央主持财贸部工作时，反复强调，“财贸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财贸工作人员必须明确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论述了社会生产、分配、消费是统一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生产是根本，未有生产不发展而财贸工作能够很好开展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财贸工作能很好解决的”。马明方始终坚持生产第一的观点，他在工作中总是反复强调：“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径。”“发展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马明方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是群众观点最高最集中的表现，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诚实的人，求真务实是他崇高的思想品德。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子女，要“老老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自己则身体力行。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土改整党运动，运动初期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在干部中进行“三查”时，不加分析让基层干部靠边站，并对一些在工作中因工作方式简单得罪了人的干部揪出来进行批斗甚至拷打，在重新评定成分中把家庭生活好坏作为重新划定成分的标志，结果把一些中农、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地主进行批斗，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造成极大混乱。马明方同志下到延属地委检查工作时，听取了各县和试点的汇报，经过深入调查，根据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明确指示：一、对基层干部不能不加分析地一脚踢开，他们都是在历次运动中经过考验选拔出来的，有些同志有些小错误也是教育问题，不能“群众



说咋办，就咋办”，乱批乱斗；二、定成分要看剥削量的大小，不能说谁家生活过得好就是地主富农。劳动致富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总不能奖励二流子；三、对因工作得罪一些人的干部，不能批斗殴打，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坚决制止乱批乱斗的错误。土改整党中一度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由此迅速得到纠正，有力地推动了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马明方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写的许多重要文章和经验总结报告，都是亲自找群众，找干部座谈，调查研究，亲自起草，起草后又多次向群众干部征求意见，反复研究修改定稿。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次，抄写文稿的同志丢了一个字，他把该同志找到办公室，严肃指出：“别小看抄错了一个字，比如杀与不杀，一字之差，一旦写错了，就要掉脑袋呀。”在工作中对同志要求非常严格，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则给予极大的关怀。女秘书怀孕了，因劳累过度流产引起大出血住进了医院，马明方同志亲自去医院看望，叮嘱她好好休息，该同志情不自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马明方同志的小女儿，由于年龄小不慎吞咽了一粒枣核，保姆吓得发颤，马明方同志知道后，没有批评保姆一句话，只是注意观察女儿的粪便，枣核便出后，他只是说大人就不该让小孩吃枣。保姆感动得掉了泪，照管小孩更加精心。跟他多年的贴身勤务员辛平同志，年龄大了，要求上学深造，马明方同志热情给予支持，临行前还开了小型座谈会，送他一个笔记本勉励他“走到哪里不要给人家留下领导机关下来的跟过首长的印象，事事要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十年动乱中该同志也受到牵连，被打成“马明方的黑爪牙”。他冒着很大风险将他保存的马明方同志数十张照片包起来装在一个瓷罐里塞进墙缝，泥封起来，直到马明方案平反以后，亲手交给马明方之子马广同志。1951年政治骗子李万铭，伪造了第二野战军首长给马明方同志的信，骗取信任，分配了

工作，李万铭政治诈骗案败露后，1955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李万铭伪造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当看出，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马明方看了这篇文章，亲自给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当由王礼同志负责。”王礼同志看了马明方同志的说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周围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

马明方同志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他从不参加请吃、剪彩等应酬活动，腾出时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52年全国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中央给马明方同志的工资级别定为三级，1954年他调中央工作后，了解到很多中央的部长甚至副总理的工资级别也比他低，他感到很不安，主动向中央写了申请，要求将他的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他生活俭朴，经常吃的是陕北家常饭。进城后，为接见客人买了一双皮鞋，由西安到北京，七八年后仍然穿的这双皮鞋。他除了事业、工作，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

马明方同志已经逝世25年了。但他高尚的思想品质，优良的工作作风，却永留人间，他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永远向前！

（原载《陕西日报》1999年7月19日第二版）

## 亦师亦友 情同手足

——忆拓夫同志

常黎夫

贾拓夫同志和我同庚，中学同学时相识。我们一起经历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阶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亦师亦友，如兄如弟，和谐无间，相敬如宾，数十年如一日。

拓夫同志出身贫寒，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华出众。他少年参加革命，在党和人民的教养哺育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有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也有长期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有在党务、宣传、统战、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特别在长期担任经济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的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陕西工作过20多年，陕北、关中、陕南都有他的足迹和战斗史绩。他熟悉陕西的情况，与干部有广泛的联系，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这样一位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同志，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判，被下放到基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死，令人痛惋不已。

拓夫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快27年了。但他的品德风范历历展现在我们面前。

## (一)

1926年夏，拓夫和我同时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住第七班。

绥德师范是陕北的两个最高学府之一（另一个是省立榆林中学），从1924年后半年起，在共产党人李子洲校长的领导和杨明轩、常汉三等的协助下，苦心经营，当我们进校时，已具相当规模，教学课业，生气勃勃，师生革命思想日益高涨，绥师成为全省闻名的一所红色的学校。实际上成为适应大革命的干部需要，陶冶青年学子的熔炉，成为陕北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

拓夫于投考绥师前不久，在神木县加入了共青团，我是在绥师入团的，他比我早几个月。入学后，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一起过组织生活，是班上的“活动分子”。我们一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分组进行讨论，并由老师辅导讲解问题；我们一起参加开办平民学校，组织校外青少年学习，拓夫教国语，我教唱歌，结识了一批贫寒子弟做朋友；我们一起到农村宣传国民革命。在1926年的十月革命节和1927年的红五月里，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分赴各县，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到群众中锻炼自己。记得拓夫有次下乡脚部受伤，走路跛了一两个月，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班上有的同学和他开玩笑叫他“贾拐子”。

拓夫在班上既是政治活动的骨干，也是学习尖子。他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短诗、时事短评，投稿在学校办的壁报和神木同乡会油印小报上发表，他的作文有时被语文老师选出，在本班同学中传阅，当时叫做“贴堂”，鼓励大家互相学习，努力向前。

我和拓夫在绥师同学整一年。1927年秋我和刘澜涛等一批党、

团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转到米脂三民二中上学，拓夫仍留在绥师。

1927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和焦维组织任陕北党和团特委书记来到绥德。他们于1928年春节后的两天，在绥德龙湾小学召开各县党、团负责人会议。会议内容有两项：（一）讨论安排召开陕北党代会正式成立特委的准备工作；（二）听取张兆卿（上海大学学生）、张宏锡（北京大学学生）传达“两湖暴动计划”文件精神。就在这次会议上，拓夫和我还有清涧团县委书记崔玉珊三人一起转党（当时叫“跨党”），并获得会议的选举表决权。清涧团县委的另一同志王希勤（家贫，卖烧饼为生）没有得到表决权，会上发生争执，所以这件事我记得清楚。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在绥德甜家坪南丰寨召开，正式成立了党、团陕北特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带来了“左”倾盲动情绪。会后，拓夫等在绥师组织学生掀起反对校长限制学生课外活动、取消学生会等反动行为的罢课斗争。斗争失败，学生会被取缔，拓夫和朱侠夫等学生领袖被开除学籍。从此，拓夫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向职业革命的征途。

四月会议后，陕北党、团特委机关随即设在米脂。拓夫离开绥师后就参加团特委工作。党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组织会后同去西安，常在党、团特委机关工作的只有三人。杨国栋为党特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冯文江管党的组织、宣传工作，拓夫管团特委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米脂的原因，一为利用三民二中作掩护，二为利用党、团米脂县委的人力分担特委的日常事务工作，如通讯联络、文件刊物的缮写、刻印、分发等事务，特委不另设专人。这一时期我协助拓夫的工作，一起相处四五个月，暑假他曾去神府巡视工作，跟随回家探望老母。当时党、团特委领导工作合在一起，下边党、

团组织和实际工作上也是统一行动的。拓夫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通讯小报和对外宣传品，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唯有两件有趣的事情记得清楚，简略记叙一笔，反映我们青年时代的志向和情趣。一件事是拟定个人党内代名问题。拓夫提出他的代名为“红光”，我的代名为“秋云”，我表示不赞成，认为“红光”太暴露，不如虹光，或宏光，并举蒋光赤已改用“光慈”的例子为理由；“秋云”二字过于灰淡，不如用我的字“万青”。拓夫接受我的意见，将“红”改为“虹”（以后二字皆用）；因我的字“万青”已公开不宜用，他并举瞿秋白为例，说明“秋云”二字可用的道理。我心里虽不大满意，还是接受了，但以后我除了和拓夫、德生通讯联络使用外，再很少用它。另一件事是关于恋爱观问题。我们两人都受蒋光慈所著《少年漂泊者》一书中的情趣感染很深。记得我收到绥师同班同学雷从寓由太原中学（由绥师转学）寄来的一本《少年漂泊者》，我和拓夫反复阅读，爱不释手。书中有些诗句如：“天涯漂泊我是一游子，故园深枕你是一淑女，只因柔意怜穷途，遂把温情将我许”，“鸳鸯有翼成双飞，风雨无情故折意”，“吁嗟乎玉梅妹，汝今死为谁死，自伤身势痛哭你；吁嗟乎玉梅妹，汝今死为何死，月照新坟倍惨凄”，我们背得烂熟，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米中同学中更多的人受郁达夫写的《迷羊》等小说的影响深，思想行为比较开放或者浪漫一些；也有极少数人受语文教师吴伯棣所谓《嫖学大纲》的狂言，偷偷地读了一些黄色下流的小本子，为害不浅。

1928年9月28日是阴历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于这天在米脂县城举行第二次代表会。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引起反动地方当局的警觉，传言共产党要在米脂搞暴动，陕北的最高统治者井岳秀立即增派兵力到米脂实行戒严，搜查户口。杜衡、焦维织都由西安归来出席会议。我们发现敌人调兵遣将，情况紧急时，我再三提出与

会人员立即撤离县城，另定开会地点和时间（我负责会议的“交通”），而杜衡执意不肯改变计划。27日晚，住在一个女同志高丽英家的杜衡、焦维熾、贾拓夫首先被捕，接着住在县教育局的李文芳也被捕了。杨国栋、冯文江等人住在城外，我通知他们离开了米脂。杜、焦被解送榆林审讯（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2月获释），贾、李被关押在米脂，敌人未找到证据，并经县承审员王孔生（王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的关照，由高仰云（党员，县教育局视学员）、王和璧（党员，高小教师）具保，关押半月释放。

杨国栋、冯文江等离开米脂后，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开了一次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到清涧折家坪，杨国栋代理党特委书记。拓夫获释后回特委工作代理团特委书记。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于洲）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后，团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扩大会议，由拓夫传达了党特委扩大会议精神，选举健全团特委的组织，书记仍由拓夫代理。我被增选为执委。这时党、团特委机关迁到榆林，会后拓夫去榆林，我因患病卧床未能前往。不久，三民二中学校被迫封闭，米脂党、团县委无人负责，特委决定我仍留米脂主持工作。

1929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吉国植、张文华分别接任党、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到职后，拓夫改任团特委宣传委员。1930年的旧历年关，拓夫回到神木家里，他的工作活动引起反动地方当局注意，6月奉调去西安，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4月陕北党、团特委机关移驻绥德。我被调往特委，分管团的工作。

1930年7月，吉国植、张文华奉调回省委。苏醒民主持特委工作，还有刘澜涛和我三人常住特委机关。我代理团特委书记。9月特委召开合龙山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决定党团组织合并，成立

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我任青委。12月恢复团特委组织，我任书记。

1931年9月，我离开陕北到了西安，没有同拓夫见面，他去了汉中工作。1932年2月我由西安去兰州，几年不见彼此还能问到信息行踪。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大破坏，拓夫只身逃出罗网，进入中央苏区后，他的情况就一点信息也听不到了。

## (二)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西安，我们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盼星星，盼月亮，盼得深山出太阳”。但是贾拓夫、张德生的消息还是一点也没有。直至1936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崔廷儒给我带来一封信，是拓夫和德生写的，信上用的是拓夫给我起的“秋云”化名。信的内容说：他们已经平安返里，嘱咐我不要离开杜先生（指杜斌丞）。指出继续留在杜的身边帮助他工作，学业和事业一定会与日俱进。我捧读来信，真是喜从天降，如获至宝，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但此后一段时间，我在西安的行动和处境更加困难。这一年的夏秋之间，我执意想回陕北，杜斌丞一再劝阻，他取出梁明德带来的毛泽东写给他的信让我看，并说他已领着梁明德同孙蔚如会过面，谈得很好，彼此消除了以往的误会和成见，恢复1933年汉中时期的友好关系。杜说：国事是要变的，但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你若回陕北再出来，立足就更困难了。我想到贾、张来信的嘱咐，听了杜老的意见，就继续隐蔽了下来。

193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拓夫、德生到了西安。德生于到后的第二天就和我接头，建立经常联系，恢复了我的党组织关系。10多



天后，我就带着张德生写给郭洪涛的党组织介绍信，用当时新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的身份，前往延安等10个县建立和开展新委派的县长与我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统战工作关系。1937年2月下旬返回西安，我才同拓夫、杨清（欧阳钦）、德生约定，用一起吃羊肉泡的机会相会。彼此畅叙阔怀。我向他们简略汇报了去延安各县视察之行的情况，他们三人向我讲述了长征路上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物故事。隆情厚谊，高风亮节，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教育。

1938年夏季前，西安的政治环境还好，拓夫如到西安来有空闲，就由德生约我借聚餐（吃羊肉泡）方式加杨清四人一起会面谈谈。我还介绍拓夫同杜斌丞见了面。他们先后谈过两次话。一次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的1937年10月19日前后，我引拓夫去杜斌丞家，当我介绍拓夫爱好文学，长于写作时，杜很高兴地说，我们北方的同志在这方面是要努力向南方同志学习才好。杜主要谈了国民党省政府将利用以孙蔚如为主任的陕西抗敌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国民党省党部过去那套反动机构还没有完全恢复），组织一批地方进步人士分赴各地督促动员抗日备战工作的计划，以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不久我即以抗敌动员会督察员的名义去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等地进行工作。太原失守前赶回西安，担任了动委会的救济组的工作，着重接待安置平津失守来陕的流亡学生。

我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张德生和林伯渠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拓夫第二次和杜斌丞会面的时间、地点，我记不很准，大概是在1938年的夏秋间。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制青年运动，营救被迫害入狱的进步青年，拓夫和杜与韩兆鹗一起谈的，我没有参加。

1939年6月，我到中共陕西省委驻地泾阳云阳镇去汇报请示工作时，拓夫已调回延安，我们没有见上面。

1940年阴历中秋节过后不久，我逃离西安，回到延安。此时拓夫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主持西工委的日常工作。我在交际处住了两天，就按拓夫的安排，搬到西工委领导的蒙古文化促进会（赵通儒负责，我们相熟，距西工委很近），住了将近两个月。此时我的党组织关系还在陕西省委，在拓夫和高岗（时任边区中共中央局书记）接待指示下，我看望了中央和边区中央局的有关领导同志，拜访了久别的一些老战友；学习阅读了西工委给我的一些资料文件；我也为西工委、中央统战部、边区中央局谈过写过一些关于陕西国民党党、政组织结构，人员配备以及敌特机关活动情况的材料，还写了绥米士绅中一些代表人物（李鼎铭、贺连城、安文钦、张哲卿等）的历史情况的材料。党组织为照顾我的活动，不至对杜斌丞先生有不利影响，要我先回来米脂家中过个年，同时帮助绥德特委在绥米士绅中做一些统战工作，为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创造条件，并参加组织绥米士绅赴延安参观的活动。

大约旧历十月初，我和拓夫的母亲一道同行，离开延安。贾母到来时住我家住了两天，便骑着组织上送给的一匹马，由拓夫的舅父护送回神木老家。我送贾母出米脂北城行五里路的班家沟，老人悄然泪下，我们依依惜别。贾母是一位勤劳贤惠、精明能干的家庭妇女，拓夫的父亲去世早，弟妹年幼，全靠母亲一人劳动维持生活。贾母擅长酿造营醋，起鸡叫，睡半夜，历尽艰辛，抚养子女成长，先后去延安学习或参加工作。拓夫十分疼爱、敬重他的慈母，我们从他写的——《吊母亲》的诗文可以领略一斑。

1941年5月，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拓夫为候补委员兼民运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6月，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办事处主任，不久拓

夫被任命为办事处的副主任。1943年1月，拓夫任西北局常委、秘书长，以后又兼任西北局调查局局长。我于1941年5月结束了陪同绥米士绅赴延参观的工作后，即到边区财政厅工作，1944年春到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在边区先后将近10年期间，拓夫一直同我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在多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例如：

1941年至1943年，我担任边区粮食局工作期间，有关政策性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无不得到拓夫的支持和指导。1942年7月西北局作出的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8月边区政府颁布的《1942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和《征草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研究草拟，我们都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和拓夫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我所作《关于1942年度征粮条例的几项解释》，也是经过拓夫的审阅后发表的。

194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集边区政府非党人士举行座谈会。由拓夫传达了边区高干会议的经过及所讨论之各项问题，到会党外人士发表了意见，会后以谢觉哉和拓夫名义将座谈会纪要整理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中央并将“座谈纪要”转发全党。这次座谈会和以后举行的多次座谈会，都是拓夫或杨清会前约我去了解情况，要我和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三人分别联系通气，希望他们坦诚发言。他们交代的任务，我总是认真去做。以后西北局召开的历次边区政府党外人士座谈会我都参加了。

拓夫和德生要我采用各种方式和西安方面的朋友保持信息联系，不要断线。我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出的需求了解的西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先利用米脂“脚户”刘旺林（从1937年起他就自有两三匹驴、骡往来于绥米西安之间，为人运输货物，我利用他为绥德抗敌书店、米脂阿谊成文具店转运书籍和物品，相互结识达数年之久），

1942年又利用赵正策（米脂城内养猪，磨粉供困户，由粮食局给他两条毛驴做资本，他往来于绥米、延安、西安之间，搬运货物谋生，解放战争开始转业，后为省粮食厅做炊事员、管理员至病故），利用他们和西安杜良明（杜斌丞随员）、李长富（早年在甘肃时做杜的马夫班长，后在西安开饭馆，生意搞得很不错）保持联系，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拓夫协助陈云同志搞食盐统销的期间，他们两人对国统区食盐电场情况变化了如指掌，随时告诉我们。他们两人出身贫寒，读书甚少，但为人正直，肝胆义气，同情革命。杜良明为革命献身名列烈士。李长富为掩护、救济革命同志，不计个人安危和钱财帮助我们甘当无名“小卒”，做了不少好事，西安解放后，曾任西安市区政协委员至病逝。值得附笔留念。

刘天鸣，神木县人，地方知名人士，奔走官场，少有成就。因结识杜斌丞、南汉宸、张幼麟等，思想逐渐进步，倾向我党，赞成抗日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后他和拓夫相识，同我认识较早，交往亦多。1941年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后，他决心回陕甘宁边区落足（他和贺连城相熟），1943年7月刘天鸣末到我们打招呼，贸然来到延安，使我们三人感到相当作难。因为康生一伙正在大搞“抢救运动”，追查所谓“陕西地下党是‘白旗党’”，追查所谓“大西北主义”的根源所在。但刘天鸣携带家眷投奔而来，无法置之不理。无可奈何，我们三人一起商量，由我负责刘的食宿接待；由南汉宸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得到毛主席同意，南汉宸用他个人的名义写信给邓宝珊，请邓安置刘天鸣的工作。刘赴榆林后任邓部参议。这件事就算是顺当地应付过去了。西安解放后，刘天鸣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反右斗争中身亡。

以上略举几件事例，可以说明拓夫同我在统战工作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多的联系。

1944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在贺龙、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拓夫在财经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调东北工作，贺龙一个时期也去了前方，精力主要放在了军事方面，从这时起拓夫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

### (三)

1947年3月，国民党以25万之众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奋起反击，苦战一年，击溃顽敌，光复延安。在此危难时期，拓夫协助贺龙，统一领导，协调管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组织和依靠两个边区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殚精竭虑，历尽艰辛。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忍饥耐寒，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危，坚壁清野，支援和配合野战军。“磨战”强敌，坚苦卓绝，可歌可泣，丰功伟绩，永昭青史。

解放战争期间，拓夫除了外出参加会议或下去检查工作，一般都随边区政府机关和我一起行动。记得在蟠龙战役前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边区党政机关转移至白庙岔。拓夫、杨明轩、高登榜和我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土炕上，地下还用木板支了两个铺，供陈昭、丁良祥（林伯渠主席秘书）睡觉。我们的伙食，除给林老蒸一小碗小米干饭外，大家一起有啥吃啥。以后机关转移到绥德义合黄家川的几个村子里，先后两次住的时间较长。我们的粮食供应愈加困难，边区政府的厅局长大部分随军或在下边帮助工作。有时回机关聚会，时常开玩笑说，大家感兴趣的是在贺老总处开会，可能吃到一顿烩面。如果在林伯渠主席处开会，夜深了，大家肚子实在饿得厉害，我只能拿出一点煮黑豆（留给马的饲料）打牙祭。周兴风趣地说：

“我实在没有想到煮黑豆这样的好吃。”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胜利，4月21日延安光复，西北战场我军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工作，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议事日程。从此时开始，拓夫就肩负起主持和组织这项新的具体工作任务。他先后分别召集了多次座谈会，分别了解和整理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他亲自负责草拟接管工作计划方案。我参加了拓夫召集的有些座谈会，协助他做了一些研究整理资料工作。1949年2月9日，西北局讨论通过了由拓夫主持起草的《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写得很全面，包括“西安情况的搜集与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与研究”、“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接管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八个方面。计划内容也很具体，如规定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三天干粮，以备入城后供应不及的需要；并且提出西安人口以50万预计，每日所需粮、煤、油盐、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具体数字，责成贸易部门早作筹划准备供应。

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16人组成的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拓夫任主任，我是委员之一。4月拓夫主持召开了两次“西准会”全体委员会议，对各项准备工作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检查。为了加快进城急用文告、手册的审定付印，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及干部配备等工作，我于4月下旬脱离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搬住联防司令部，协助拓夫工作。5月12日“西准会”秘书处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西北局通知贾拓夫为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西北局任命了西安市军管会各处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我为秘书处处长和房管会的委员。进城后，为工作需要，我以西安市军管会秘书长，杨晓初以副秘书

长名义出面。

#### (四)

1949年5月20日，我军先头部队突击攻进西安城。军管会的人员于23日赶到西安，24日正式对外办公，首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管字1号，宣布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的西安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军管会为西安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全市的军事、民政、财经、文教接收和管理事宜。由于我们晚到了一步，接管工作有点被动。加之敌军见我军新的部署尚未完成，妄图伺机反扑。胡宗南纠合青、宁马家军，大肆散布夺取西安城的谣言，西安城内一度出现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银元黑市猖狂，物价随之暴涨等现象。6月中旬，我军十九兵团、十八兵团相继由华北入陕，彭总亦由中央归来。7月中旬，彭总指挥扶眉战役获得全胜，歼敌4万，溃军逃窜，军民欢庆，威震三秦大地。与此同时，西安市的接管工作也在紧张而顺利地进行着。经过两月的艰苦努力，接管工作任务大体告一段落。在延安时已经整编好的3500名接管干部，于5月27日前一律进城并随即分赴各接管部门和单位，军代表和各接管组的同志一到岗位便和广大职工群众、教师学生打成一片，同生活、同学习、同工作，注意把接管工作和复工复业复课同时进行，把必要的改革、清查和整顿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起进行。例如电讯、邮政基本上没有停断过，因为那里我党的地下工作基础好。电厂在西安解放第三天就开始供电，大华纱厂和铁路运输等重要行业也都在20天左右完成恢复生产的任务。仅仅两个月时间，为以后逐步加强管理，发展生产，改进业务，有步骤地结束军管工作，加强主管

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对接管工作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还有一批民盟的领导成员在战争中进入边区，又同我们一起返回西安。他们对接管工作，主要是教育方面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军管会的主任贺总从中央开会回来不久，即将精力集中于配合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西棋又都在前总工作，军管会的经常工作全由拓夫主持进行。他还肩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及参与管理财经工作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担子实在不轻。当时在拓夫身边工作的秘书处除我和杨晓初外，还有秘书十多人。人员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拓夫对我们的分工很明确，很具体。我做秘书长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对内和各个接管工作组（处）负责人保持经常的联系，指派各个秘书分工和各有关接管工作部门、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到重点单位了解掌握情况，研究问题，及时综合和交流经验；对外接待来访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来者不拒，一段时期，门庭若市。副秘书长杨晓初主要管房产的调整分配、使用，并有计划地走访结交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动员他们为接管工作尽点义务。至于机关的生活事务和文书事务工作，都由我交给边区政府办公厅负责办理。拓夫作这样的安排，为的是充分发挥我们三人（杨老由西安回到延安不久）在西安人地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广交朋友，较快打开局面，争取工作上的主动；事务工作尽量利用边区政府办公厅的力量，就可以使接管的工作，特别使拓夫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和时间考虑和处理重大的工作问题，减少事务纠缠。拓夫这种放手大胆使用干部，善于调动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领导艺术，我过去是了解不够的。拓夫常说：“不要看咱们军管会人手少，实际上搞接管工作的人手多得很，比如杨明轩老人就是接管最积极，最有成效



的人员。”拓夫虚怀若谷，沉着冷静，敬老尊贤，平易近人，他对别人的尊重，博得了别人对他的尊重。杨明轩、杨晓初那时都已年过半百，是我们的老师辈，他们的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人地熟悉，德高望重，有些事只要他们出面处理，就能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杨晓初主管房产工作，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杨老任劳任怨，废寝忘餐，真是“磨破嘴皮，跑断腿”。他总是不厌其烦，排忧解难，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好成效。值得怀念，记载下来。

拓夫对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十分严肃认真，同时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在延安时就依照中央指出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组建接管队伍时注意干部质量，严格选拔分组培训，工作做得比较认真。因之，一进城各处（组）就按系统带着干部队伍迅即到位开始工作。在脚跟站稳的同时，就注意结合进行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管理工作。

拓夫特别强调接管工作要和学习有关政策、指定的文件紧密结合进行，接管人员必须同原有职工人员一起学习，逐渐消除隔阂，建立感情，沟通思想，合力工作。一个月工作就上了轨道。前线部队急需面粉5万袋，限五日完成，西安市只用三天就如数交齐。两月接管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拓夫向西北局书面报告，及时提出西安市新的工作中心：“必须转移到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农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他强调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每个消费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其他各种重大问题如治安问题、金融问题等，均与解决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是积极生产就业，不是消极的救济维持”。40多年前的话，讲得多么透彻。时人阅读，当有所启发和教益。

8月10日，拓夫在向西北局的报告中还提出：“为便于集中领导，军管会于军管工作总结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所需各种生产事业和行政业务，移交各主管部门领导管理，使工作走入正轨，迅速推进。”根据这一正确及时的部署，军管会的工作逐步交代，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9月底新疆和平解放，10月拓夫就飞往新疆协助彭总处理“三区”问题，并参加了西北局商讨今后西北地区财经工作问题。我负责搞了一个月军管会的结束工作，11月后就将工作重点转到了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筹建的事务上面。

拓夫和我之间，感情融洽，配合默契。那时都是30多岁，精力充沛，满怀胜利喜悦的豪情，事情再多再忙，也不觉得疲倦。有些紧急的文稿，我们总是在晚上写，他先写我早睡，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我起来接着写，他去睡觉。天明后，他就拿着稿子去做报告（如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或者送请西北局审议。这种合作习惯，我们感到很协调，很愉快。

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结束，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拓夫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百事待举，重任在肩。同时，我被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和个人间的往来，仍很密切，互帮互爱，与时俱进。1952年8月拓夫奉调到北京，先后参加中央财委和国家计委的领导工作。1954年大区机构撤销，我奉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我俩都在北京工作了。大小会议，各种场合，相见的机会颇多，但各自忙于本身业务，见面只能三言两语，打个招呼而已。1957、1958年中间，我因病出外治疗，和拓夫失掉了联系。1959年春，蒙周总理和习仲勋同志的关注让我回陕西，一边继续养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行前我

去拓夫家中向他告别，不巧他要出去参加会议，仅有 30 分钟的时间。略叙阔怀，他再三向我叮咛：“再返长安，养病第一，千万不要挑重担子，干重活，工作必须超脱一点，量力而行；生活坚持行之有效的各种锻炼，在德生的关注下，两年工夫，恢复健康。”情深语切，感铭肺腑。拓夫匆匆离家上会。我即前往马明方家告别。和明方相谈的时间较长，并且在他家吃了饭——杂面“抿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同日造访，竟成了我和拓夫、明方最后的永诀！他们两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于康生和“四人帮”的毒箭之下。呜呼！哀哉！痛哉！

鲁迅讲过：“死后倘若不埋在活人的心里，那就真真死掉了。”贾拓夫和马明方同志，革命一生，言芳行洁，志远情逸，“笃礼崇义，抱素守真”；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奉献终身，功勋卓著，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正如宋代欧阳修所云：“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拓夫、明方永垂不朽！

1994 年 11 月 25 日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贾拓夫》）

## 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

习仲勋 马文瑞 汪 锋 白如冰

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终究是颠倒不了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给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贾拓夫同志平反昭雪，对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作

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我们和拓夫同志一起工作过多年，抚今忆昔，思绪万端，情不能已。

贾拓夫同志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我国经济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十年动乱初期，拓夫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的残酷迫害，于1967年5月7日含冤死去。一个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对敌英勇斗争、对党对人民有重大功绩的同志，没有牺牲在公开敌人的屠刀下，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的手里；一个跟随毛主席戎马倥偬，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没有牺牲在雪山草地，却被害死在北京的郊野。拓夫同志逝世时还不到55岁，正是党和人民需要他作更大贡献的时候，每念及此，愤怒难平。拓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

## (一)

拓夫同志是陕西省神木县人，1912年生于城市贫民家庭。1926年考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学校团的支部书记和团县委书记。

拓夫同志入团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了当时出版的《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青年》等大量革命书刊，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和进步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办贫民夜校，并经常到集镇和农村，向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组织农民协会。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进

行了血腥的屠杀。这时，拓夫同志担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进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罢课斗争。他写了许多揭露敌人罪行的宣传材料，寄到陕北各县的学校，号召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的陕北地方军阀。1928年上半年，在革命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拓夫同志由团员转为党员。1928年秋，拓夫同志任陕北团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为恢复和整顿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和党、团活动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拓夫同志任陕西省团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团委书记，又对被敌人破坏的西安市党、团组织和党、团活动进行了恢复和整顿。

拓夫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不辞劳苦。机警敏锐，在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掩护下，多次躲过敌人的搜捕。1930年10月，因叛徒告密，拓夫同志被捕。同年11月间，蔡军阀在西安争斗、监狱内混乱之际，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越狱成功。

1931年，党又派拓夫同志去陕南工作，他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整顿和发展了陕南的党、团组织。

1932年，从事反共煽惑的戴季陶跑到西安，妄图贩卖他的戴季陶主义，破坏革命。党从陕南把拓夫同志调回西安，领导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戴季陶的运动。学生包围了戴季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此后，拓夫同志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任省委委员、秘书长，并负责省委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当时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

拓夫同志在负责组织工作期间，除了组织各地的地下党员和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外，还多次代表省委去渭北革命根据地指导工作，在三原武字区主持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和分土地的斗争。以后又在三原城里主持了一个时期党的工作，领导开辟渭北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

同志的领导下，在组织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2年冬，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与发动土地革命，确定把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拓夫同志派了不少领导干部，如杨森、张秀山等同志去加强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同时还为渭北革命根据地派去不少干部。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以后叛变革命）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省委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提出反对所谓“梢山主义”。他强令红二十六军的主力红二团过渭河南下，使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陕西省委为了挽回红二团南下的损失，根据三原中心县委的意见，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又于7月间领导了杨虎城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的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扩大了部队，振奋了革命士气。但是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遭到破坏。在这危急关头，拓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他立即通知省军委会负责人汪锋同志和其他同志转移住地；派人去跟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同志接头，要他提高警惕，防止波及，并派人去照金根据地对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等部进行整顿，还把一部分干部派赴红军和杨虎城部，一部分干部派到县。由于拓夫同志及时的善后工作，使陕西党的组织和红军避免了遭受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 （二）

1933年下半年，拓夫同志代表陕西党组织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陕甘工作。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他留在苏区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拓夫同志是陕北老同志中间唯一参加了长征的。在长征途中，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还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的工作。1935年7月，一、四方面军会合进至黑水、芦花后，粮秣不足，筹粮成了一件大事。当时中央军委在毛儿盖与芦花城各设立一个筹粮委员，拓夫同志参加芦花粮委，带了一班红军，行程三日到达瓦布梁子筹粮。开头，藏民不了解红军的宗旨和政策，都逃到深山老林。拓夫同志率领的筹粮队到达后，立即出了保护藏民的安民布告，在藏民田里插上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对回家的藏民都发给保护证，并召开藏民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经过一系列的争取工作，消除了群众的疑虑，藏民陆续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喜欢接近红军。拓夫同志号召藏民和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压迫，成立藏民革命政府。他采用“借富济贫”等办法筹粮，同时发动群众去割恶霸地里的青棵，一半归群众，一半帮红军。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完成了筹粮任务，并把粮食陆续运到红军粮站，及时保证了红军的供养。拓夫同志还组织人员熬盐，当时盐贵似金，每天熬的盐，给部队解决了不少困难。

长征途中，拓夫同志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当时同中央久已失去联系、战斗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正在富县、甘泉一带活动。拓夫同志受党中央委派，携带一部电台和少数警卫人员，星夜去找红十五军团。不久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程子华和郭洪涛同志，与西北红军取得了联系，使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很快胜利会师。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使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围困，被捕入狱，有的甚至被杀害。党中央根据边区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映，派拓夫同志协同王首道、刘向三同志一道去瓦窑堡接管陕甘晋保卫局。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审阅案卷，弄清真相，平反了这一重大的政治错案。毛主席到达瓦窑堡后，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恢复他们的领导工作。

### (三)

1936年西安事变，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下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拓夫同志任省委书记，参加省委的有欧阳钦、张德生、汪锋、李一氓、赵伯平等同志。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下，陕西省委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在较短的时间里，西安、关中、汉中等各地的党组织都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了。以后，为了深入开展农民工作，省委指导西安市委学委组织学生“农村工作团”和“回乡工作团”，宣传抗日，帮助各县建立和发展农村党的组织。这个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国民党反动派急忙下禁令：凡学生下乡者开除，学校参与活动的关闭。对此，拓夫同志决定于10月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召开全市学生纪念大会。届时，参加大会的有万余人，邓颖超、江隆基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上散发了省委的宣言，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取缔反动禁令。在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省政府不得不答应学生的要求。以后省委又组织了100多个工作团下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陕西省委的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顾问”，



在1943年整风的时候，居然诬蔑陕西地下党是“假党”。当时在西北局工作的拓夫同志和欧阳钦同志坚决地驳斥了这种无耻谰言，维护了陕西的党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1939年，拓夫同志回到延安，在张闻天、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主持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受党中央的委托，领导陕、甘、宁、青、绥五个省的白区工作和民族工作。1940年白如冰同志从绥远省<sup>①</sup>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开展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拓夫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对争取蒙古族、回族的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对民族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

拓夫同志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42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其中许多资料是拓夫同志提供的。

1940年6月张德生同志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陕西地下党的情况，8月18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政策。拓夫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结合陕西地下党的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的意见和办法。在拓夫同志领导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采取群众化、社会化、朋友多、关系好的灵活方式，不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讲求实际成效。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领导集团内部也建立了党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的组织，并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同盟军。

抗战胜利后，拓夫同志接替陈云同志主持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他坚决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学习运用陈

① 绥远省，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云同志关于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发展边区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贸易斗争，使边区军需民用的物资基本上得到保证，边币<sup>①</sup>和物价基本上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基本上得到平衡。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暂时撤出延安的英明决策。拓夫同志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他率领财经各部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关于“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认真坚壁清野。同时，组织人民群众大力做好支前工作。

由于胡闹和10个月残酷的内线作战，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拓夫同志充分利用前线胜利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恢复经济。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到1948年底，边区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绝大部分灾民得到救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拓夫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并写了《论“转变”》的学习笔记。他对于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指示总是力求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而不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这是拓夫同志学习的突出特点。西北全境解放后，拓夫同志主持西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西北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 (四)

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卓著成效，即将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拓夫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他协助陈云同志抓私营工业

<sup>①</sup> 边币，指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

和手工业的改造。在私营工业改造的高潮中，有些地方发生厂点盲目集中、合并过多、计算盈亏的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等现象。这对于发展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都是不利的。他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些问题。在手工业改造中，有些人忽视了传统手工业。拓夫同志对特种手工艺品做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许多手工艺品不仅人民群众需要量大，而且投资少，盈利大，创汇高，对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时出现的工商税节、供产销不协调的现象，他组织干部认真研究工商关系和产品归口的问题，拟出以销定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推动了私营工业和手工业改造工作进行顺利。

1956年，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拓夫同志在汇报中，说明了轻工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相互比例关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不少是吸收了拓夫等同志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

在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局面。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同生产资料供应的可能性不相适应；职工工资和就业人数的增加过多，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过快，同生活资料供应的可能性不相适应。对于这种状况，拓夫同志根据多年经验明确指出：“基建上马容易下马难，物资出库容易储备难，职工招收容易精简难。”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积极稳妥，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年度发展计划的时候，拓夫同志主张投资规模要切合实际，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力量要集中。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他“保守”了，“右”了，后来事实证明，拓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当我们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脑子热起来了，想把好事一下子办完，“五年计

划一年完成”。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一股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拓夫同志在这种空气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波逐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反对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但拓夫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右倾保守”。

拓夫同志从1959年初到6月，挤了休息的时间，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他写了大量心得笔记，总结了30多个与实际工作密切有关系的问题。如计划工作的实事求是问题，综合平衡不留缺口的问题，不能让一个部门过于突出的问题，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问题，质量问题，投资的经济效果问题，以及群众路线的问题等。拓夫同志对这些问题都有卓越的见识。

拓夫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被错误地批判为“右倾”。在1959年下半年，他终于被迫离开了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岗位，去做基层工作。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消极不振。相反，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的朝气，继续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积极帮助企业进行整顿。拓夫同志在抚顺电厂整顿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受到抚顺市委、东北局和水电部的重视，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和表扬。

拓夫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在什么领导岗位上，从不搞特殊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他在抚顺电厂，利用业余时间 and 节假日，走访职工家庭，问寒问暖，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有时下食堂帮助卖饭，当时因粮食定量不够，有些职工吃“代食品”，职工吃，拓夫同志也吃。凡是接触过拓夫同志的职工，无不深切地怀念他。

十年动乱开始不久，“四人帮”及其“顾问”即多次捏造罪名，诬陷拓夫同志，直至他们的爪牙对拓夫同志下毒手，但拓夫同志都

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拓夫同志的一生，是坚持革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学习拓夫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贾拓夫》）

## 贾拓夫在绥德第四师范

白寿康

1927年，我到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贾拓夫好像在七班，我是八班。学校分配宿舍时，把我和拓夫分在一个屋子。

拓夫学习很好，文章写得好，班里把拓夫和刘澜涛的文章贴出来让大家观摩学习。他学习很努力，除了上课，就是看书，抄东西。他看很多杂志，有《向导》、《中国青年》、《黄埔校刊》，把这些刊物每期“问答栏”里的东西抄了好几个本子。我曾问他：“抄这些干什么？”他说：“不懂的问题，看看，抄下来，就慢慢懂得了。”有时，他也给我们讲讲。

我的印象，神木、府谷那边来的学生都很有钱，经常上街吃饭，买这买那。但拓夫很艰苦，不花钱，不买东西吃。

他很老实，不吭声，不爱说，但很能吃苦，毅力很强。记得一

个时期，他的腿不知咋的，肿得可厉害了，走路一拐一拐。但他不吭，不叫苦，自己洗洗、包包，坚持学习活动，从不偷懒。

1927年4月我加入了共青团，才知道拓夫早是团员了。相互知道是团员，观点一致了，就谈得多了。常谈谈对革命的认识、前途、怎么办。当时是大革命时期，组织不公开，活动是公开的。我们的活动就是上街、下乡宣传，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他很忙，晚上常常回来很晚，星期天不回来，在外边活动。

拓夫同志好打抱不平。不知是让参加童子军，还是儿童团，学校规定必须戴个红领巾什么的。我因为封建，就不戴，校长找我，说不戴不行，不戴就开除我，我说开除就开除。结果校方贴出个布告：“开除白寿康”。拓夫看了后说：“就这么个事随便开除你，不行！不能开除。”不知他们进行了些什么办法，后来校方把布告撤销了，没有开除我。

大约1928年春，我在绥德南门看见拓夫，他夹个伞，慌慌张张走着，我们说了几句话，他就钻进一家饭馆，好像搞什么活动去了。这以后几年再没见他。

1935年中央红军上来，我在瓦窑堡见到拓夫。他是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他告诉我，他是跟中央红军长征回来的。1936年，我参加红军东征回来，分到延安当军事部长，在青化砭见到他。他是布置争取东北军的工作的。他要我们组织群众，组织老人、妇女欢迎东北军，或者写标语欢迎。写“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我是根据他的布置进行工作的。我们招待东北军士兵，争取了那些东北军。后来，东北军抗日士气高，下层基础好，和党的争取工作关系很大。

1979年4月16日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贾拓夫）》）

## 我所熟知的常黎夫

杜鸿泰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委顾问常黎夫同志，1912年5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926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现绥德师范）。当时绥师校长是李子洲，其他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以学校里相对公开地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政治空气甚浓，常黎夫同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入学不到半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次年（1927年）米脂县办起了中学，他和刘澜涛等几位同学转入米脂中学（时名三民二中），开始在这所新学校建立地下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与刘澜涛等同时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反动军阀井岳秀以“赤化”为名，用停拨经费等手段封闭了三民二中，黎夫他们便径直走向社会，深入农村开始了极为隐蔽的革命活动。1930年到1931年，他先后担任中共陕北特委青年委员、共青团米脂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等要职。1932年以后在西安、兰州等地以杜斌丞秘书、省政府视察员等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常黎夫同志从白区回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厅厅长和边区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军（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生前曾评价常黎夫：“从40年代到50年末的近二十年间，常黎夫是林伯渠、李维汉、彭德怀、周恩来和我的政治助手之一。他很有才华，

工书善文，有理论功底，又勤政敬业，处理政务事务严谨细致，井井有条，是秘书工作的楷模，理繁治剧的干才。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行）政委员会和50年代国务院机关的会议、报告、调查研究、文书档案、保密保卫、信访接待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都凝结着黎夫的智慧 and 心血，功不可没。”还说：“黎夫一生坚持真理，光明磊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黎夫同志因积劳成疾，经周恩来总理同意调回陕西，边看病边工作。

下面讲几件常黎夫同志的真实故事。

## 聪敏有才 办事周详

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张德生同志从府谷来绥德参加会议，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组织上决定让常黎夫同志设法营救。对组织上交的任务，再困难也得完成！他首先设法把张德生同志在绥德住地的文件做了处理，然后通过他新认识的一个狱吏打听张德生同志被捕后的情况，从狱吏口中得知张被审讯时只说他是来绥德探望女友的，别无所知。黎夫便抓住“探望女友”四字苦思冥想做文章。他想到了正在绥师上学的一位女同学杜芳铭（后名杜岚）是米脂人，年龄十六七岁，未婚，便在她身上打主意。他找到杜芳铭说明情况，请她帮忙，杜没有推辞。采取的办法是让杜扮作张的恋人去探监，给张写情书，送衣物、食品，假戏真演，十分逼真，完全使敌人迷惑，终于使张得救，无罪释放。



## 实事实干 真话真讲

“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全国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说。从上到下，口径一致：“高举三面红旗，战无不胜”，“形势大好，人定胜天”。人们只得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常黎夫同志带着如何战胜困难，解决饿肚子问题，于1961年的4月至9月带领省委工作组用了半年时间深入到陕北几个县几个公社的十几个生产大队进行了认真、细致、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交知心朋友，谈知心话，掌握了真实情况。向省委写了七八份调查报告，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感受和意见。他借农民的话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说得一清二楚。黎夫同志敢于在一片极“左”的政治浓雾中办实事，讲真话，勇于坚持真理，实在是冒很大的风险的。说实在的，从1957年的反“右”派到1959年的反“右”倾以来，很少有人敢说一句有碍“三面红旗”形象的话，只能高喊“三面红旗万岁”。

## 笃信真理 坚贞不屈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常黎夫同其他革命老同志一样遭受了严酷的磨难，但他坚贞的马列主义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陕西省从6月开始揭批

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在西北地区的“黑线”，常黎夫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被罢了官，靠边站了。1967年2月开始，他完全失去了自由，被轮番“揭批”，11月底对他实行了“军管”，单独关押，任意打骂逼供，连饭也不给往饱吃，残酷的身心折磨达三年多。1972年以后，略有松宽，先后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和去“五七干校”“半劳半读”，但仍然继续强迫他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无止境地逼供诱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无所获。1975年12月的一天，突然宣布他被定为“叛徒”。他无比愤慨，坚决抗议，彻夜未眠，奋笔抒怀，写了一封控诉书，摘其中数句：

我五十年中共党员的光荣称号被你们儿戏般地一笔勾销，但我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被你们毁灭。

你们剥夺了我的党籍，却改变不了我的党性。失掉党籍是暂时的，坚持党性是永恒的。

要活得刚强果毅，宁折不弯，头可断，志不可屈，士可杀不可辱。

要像一块柔韧的钢，顽强地战斗和生活下去。

要记着，你不是只为自己才活在世上的。身体在衰老着，精神不能衰老啊。……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革命一生看最后”，决不蜕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所谓的共产主义者。

这些话实在是“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声讨和鞭挞”，也充分显示出常黎夫同志坚贞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其间，他还作过不少诗词，抒发他的心声。抄录几首如下：

### （一）

大鸣大放非民主，乱抄乱斗乱自己；

诛心之律辨别清，是人魔鬼见高低。

## (二)

刀笔杀人血不流，软段锁骨何时休；

千古奇冤千古有，马列为怀斗志酬。

## (三)

不戚年往心无愧，生不为己死如归。

忧世不治情惆怅，神州又逢迷惘鬼。

真火炼花燃青春，不信上帝斗鬼魅。

我行我素且延年，青云之志永不坠。

## 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

常黎夫同志从事革命工作 70 多年，在地下时期经历了白色恐怖的磨炼和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他都深受其害。但他总是胸怀大志，头脑清醒，为了党的事业蒙冤受屈，“文革”中他遭受了更残酷的劫难，但他对那些被扭曲了灵魂从而推波助澜，扶嫌报复，诬蔑、陷害、折磨他的人们都不计前嫌，采取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在几次同我的谈话中，他总教导我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以大局为重，多看主流。

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工作认真、负责、扎实、细致。在生活问题上也十分严谨。他是高级干部，身体又很不好，特别是胃病严重，但在饮食上从不特殊化。他多次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从不另开小灶。对于自己不能吃的饭，他就少吃一点，回到自己房间吃点儿自带的干馒头，喝点儿开水。由于长此以往，酿成在耄耋之年发展成胃癌，动了大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许多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常黎夫同志是一位勤奋工作的真正的人民勤务员，是一位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老者。”

## 一尘不染 两袖清风

常黎夫同志一生只讲奉献，不计索取，心里只有党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对工作高标准，对生活低标准。无论是公家的或私人的，不该要的钱一分不要，不该拿的东西一点儿不拿，不该办的事一件不办。他对革命事业的具体贡献我知之甚少，但对他的为人处世还略知一些。1960年他在陕南某县搞调查研究，一次在县委吃饭，见食堂里摆了一桌酒席，他当即严加批评，直到撤出酒肉，他才动了碗筷。还有一次下基层到了一个县，县委正准备宴请来该县演出的某剧团，请他接见剧团团员，他知道后礼节性地接见了剧团的演职人员，可是开宴时却找不到他了，原来他是故意不参加宴席，躲着走了。他给秘书定下一个规矩：凡是有人送来东西，一律不收，原物退回，实在无法退原物的，就采取“投桃报李”的办法，绝不白收。一次到某地参观一个村办酒厂，该酒厂送他两瓶自产的酒，秘书实在拒绝不了，回西安后，他让秘书按价付给了30块钱。他的表弟知道他喜欢喝小米粥，喜欢吃豌豆杂面“抿节”，给过他两次这些东西，他也不白收，而是过一段时间给表弟捎去香烟、糕点之类东西，这不就是“投桃报李”吗？1982年朝鲜金日成来西安访问，送他两瓶高丽参酒，这可不能退啊！收下以后，他随即让秘书交省人大办公室去处理。

## 衣食住行 克勤克俭

如前所述，常黎夫同志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他和家里人也是一锅饭，从不另吃。他们的主食粗

细粮都有，副食以菜为主，少荤多素，也不讲究每餐几个菜。穿着方面也很朴素，从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几十年中，我多次见到他，他总是穿一套灰色的布料中山服，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我还不止一次看到他的衬衣领子上打着补丁，鞋头上钉补着皮子。他的住室、客厅里不见一样高档家具，没有一样华丽摆设，最显眼的是挂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巨像，还挂一幅名家书写的条幅：“俯仰天地无愧于心”。他出门办事步行多，坐车少。他在省委上班，他家距办公室约有四里路，每天上下班都是来去徒步。有人劝他：“年纪大了，还是坐车吧。”他却说：“步行好啊，既锻炼了身体，又能节约汽油，何乐而不为呢？”离休后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还不忘“延安精神”，在自己住房门前的小院子里种了西红柿、辣椒、茄子等几种蔬菜，还自己垒了一个鸡窝，养了几只母鸡，副食自足有余。

##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1982年，中央批准他不再担任繁重的领导实职，改任陕西省委顾问。我听过不少人说风凉话：“什么叫顾问？这顾问，顾问，就是顾问了就问一问，顾问不上嘛，那就不问。”可是对常黎夫同志来说，为人民服务的事就不存在顾问不上的问题。退二线后，他照常天天上班，还挑起了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主任的重担，忙得他元旦、春节都不休息。他为开创陕西党史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期间，他同时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参与中顾委的许多实际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搞调研，向上反映情况，向下指导工作，样样工作不误。他一辈子是个只顾上工作而顾不上休息的人。十年前眼病加重，是“右盲左茫”，近乎双目失明，他还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看报纸是秘书念，他听；写材料是他说，秘书写，“以耳代眼，

以口代笔”。

常黎夫是一位年耆德茂、志行高洁的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一辈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艰苦朴素，淡泊自处，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去留，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他40年代供职陕甘宁边区政府，50年代前在西北军（行）政委员会、国务院，粉碎“四人帮”后又回到中共陕西省委，几十年间一直当轴处中，任劳任怨，只讲奉献，不计索取。这段恳切的语言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为常黎夫同志作出的准确评价。

2006年常黎夫同志在西安病逝，终年94岁。我们党失去了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公仆和人间楷模。然而常黎夫同志的精神不死，芳名不朽，音容宛在，风范常存，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为培养出这样的巨人感到无上光荣。他将激励我们把学校办得更好，培养出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为祖国为人民作更多更大的贡献。

## 刘澜涛同志轶事

杜鸿泰

“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学米脂中学，1928年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那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坚强的革命斗志，忠诚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辉煌的工作业绩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其他诸多的方方面面，无不是我们敬仰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我与他家居邻村，但因年龄相悬，早年未曾有过接触，所以对刘老的敬仰，只是从书刊、报纸、文件以及人们的言传中看到和听到而形成的。1985 和 1992 年，我有幸两次见到刘老，亲身体察到了这位革命前辈的不平凡气度与精神，更增加了我的崇敬之情。下面写几件刘老的真切轶事。

### 不忘母校，怀念师情

1985 年春，75 岁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原中顾委委员常黎夫同志回到他们离别 50 多年的家乡米脂县，住了短短几天。这几天他们有多少事要做，有多少人要接见，他们的时间有多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可就在这等情况下，他们约了冯日光同志（部队离休的师级老干部，刘老和常老早年在米脂中学就读时的同学），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光临母校。他们参观了米中的校舍，参观了设在米中校园内的李自成纪念馆（他们上学时搬掉“祖师爷”神像的校舍）。之后，同我们学校的几个负责同志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座谈。我们向几位老前辈校友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刘老他们频频点头表示赞赏，鼓励我们发扬三民二中（米中创办初他们就读时的校名）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接着应我们要求向我们介绍了三民二中时期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他们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情况。在谈到姬伯勋同志的时候，刘老还问及姬老的健康情况。我告诉他姬老的健

康状况很好……他说：“好啊，姬老是个好同志，一辈子不贪名，不图利，对革命很有贡献。姬老是我的老师，我上小学时他给我上过地理课。姬老活到一百岁时我要为他祝寿。”可惜姬老98岁那年去世了。他的学生刘澜涛、马文瑞、郭洪涛、常黎夫联名写了万余字的悼念文章，在《陕西日报》上登了满满一大版。

座谈会结束时，刘老说：“我们没有时间与全体师生见面，请你们转告一下我们的问好。”会毕，还为米中即将举办的六十周年校庆题了词：“发扬光荣革命传统，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而开拓前进。”在离开米中上车时，刘老他们同我们一一握手，向其他送行的师生频频挥手致意。车启动了，刘老还深情地说了一声：“啊，我的母校！”1986年我主持编纂米脂中学校史，想请刘老题笔书名，就给刘老写了一封信，不久，刘老就寄来了他亲笔写的“米脂中学校史”六个字。

刘老对他的母校确实是有深厚感情的。1992年秋他写来信，说他有一些书籍想赠给母校，请米中来人接收。是年初冬我和学校办公室主任前往北京接书。去时没有给刘老带任何礼品，连家乡的一点土特产都没有带，因为我早就听说过刘老的“脾气”。我只带了几张反映米中校貌的照片。到北京后刘老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处。刘老两次接见了我们，第一次是我们拜见刘老，带了那几张照片，刘老接过照片反复细看，一连说了几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歉意地说：“没有给您老人家带什么东西来。”刘老摆摆手：“不必，不必，这照片比什么都好，我想起母校看看照片就好了。”第二次会见是约定时间进行座谈，座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和我们同去的还有时任米脂县副县长的高欣同志。高县长向刘老汇报了县上的情况，我汇报了米中的情况，刘老不断点头，表示满意。刘老说：“米脂人民哺育了我，米脂中学培养了我，我从来没有忘记



我的家乡和我的母校。”“我要赠给米中的书，如果能在办学育人中起到一点点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算我对母校的一点点回报吧。”刘老赠给米中的书共一千多册，除有马恩列斯毛的成套经典巨著和其他一些很好的读物外，还有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二十四史》和《三希堂法帖》。

## 俭朴生活 平易近人

座谈会后刘老请我们吃饭，秘书李冠平同志把我们领进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饭厅，我被安排在紧靠刘老右侧的座位上，酒菜上来了，刘老说：“我不请你们吃馆子，吃馆子不好啊，我从来不吃馆子，就请你们吃点家常便饭。喜欢喝酒的就喝点酒，咱是陕西人，就喝咱陕西的西凤酒吧。”“刘老不喝酒，为陪陪大家，今天喝点甜酒”，李秘书说。这时刘老同大家举杯同饮。“刘老喜欢吃家乡的粉条”，李秘书说着把几盘菜中的那盘粉条炒猪肉移放到刘老跟前，又说：“刘老请大家吃的饭很简单，喝点酒，然后吃饺子。其实刘老平时吃的饭更简单，早上喝点小米粥，中午和晚上也不过三两个菜。”这时，刘老用筷子夹起几根粉条，刚送到嘴边，其中一根掉在饭桌上了，刘老反复夹了几次，才把那根粉条送进口里。听了秘书说的，看了刘老做的，以及我们所观察到的刘老身着的衣服，客厅和餐厅中极其简朴又陈旧的布置和陈设，我对刘老的敬仰之情又增加了几分。这就是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优良作风啊！我们今天的幸福不就是这些老人为我们垫的底吗？

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由于刘老、秘书及其亲属无不平易近人的言谈举止，我们没有感到一点拘束，喝茶、抽烟，言行都很自然。

饭后，大家窃窃私语。秘书同志是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还是刘老

的意思，说：“大家再留一会儿，同刘老一起照个相，留个念。”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同中央首长合了影，刘老并没有给人以不乐意的感觉。当时，我觉得从座谈会开始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再不能影响刘老休息了，可是刘老却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来，米中书记，咱俩照一张吧，你是现在米中的书记，我是早年来中的学生嘛。”顿时，我身上穿透了热流。这张照片我一直牢牢地珍藏着。

## 全国人民的公仆 彻底的革命精神

在刘老招待我们吃饭的席间，大家一直是边吃边谈。刘老问我：“家乡对我有什么反映吗？”我说：“家乡人都很崇敬刘老，祝愿刘老健康长寿。”刘老说：“我是个职业革命者，国民党、共产党（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监牢我都坐过，三次坐牢18年啊！可是我的信仰没有变，我都熬过来了，顶过去了。我是全国人民的公仆，要为全国人民着想，我不是某个地方的仆人，大家可以理解吗？”对此，我们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大家对刘老不为他的家乡或某些人施偏心谋私利的高度原则性都十分敬佩。

1997年刘澜涛同志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5月27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纸关于处理他的后事的报告，全文如下：

亲爱的党中央：

让我向您最后敬礼！

建议我的后事从简，从快处理。

（1）遗体交医院解剖研究后尽快火化。

（2）丧事一定要从简，从快，不通知外地亲友，不搞遗体送别仪式，不设灵堂，丧事要在最短时间办完。

(3) 将我和我夫人刘素菲同志的骨灰一起撒放在树下，骨灰撒放地点不留任何痕迹，不设任何标志。

感谢党和人民的照顾，感谢北京医院的精心医护，感谢身边工作人员的辛苦服务。

致以  
共产党员的敬礼

刘澜涛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曾庆红代表党中央给刘老的回信

尊敬的刘澜涛同志：您好！

您的来信和给党中央的报告收悉并报告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对您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表示敬意。希望您安心治疗，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此致  
敬礼

曾庆红

1997年6月4日

1997年6月5日下午5时，江泽民同志又亲自到北京医院探望了刘澜涛同志。下面是谈话的记录整理：

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医院101房看望。北京医院院长，家属方林及秘书李冠平等都在场。江泽民同志讲：“你的这种精神很好嘛，你给中央的报告收到了，对你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表示敬意。”

刘老说：“共产党人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死后也应当为人民留

下好的东西，设灵堂不好，劳民伤财。”

江泽民同志说：“你这种思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央收到你的报告后，本来可以采取别的方式转达对你的敬意，我想还是自己来当面向你表示敬意，希望你安心养病，健康长寿。”

（整理：李冠平）

12月31日，刘澜涛同志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刘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是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却与世长存！

## 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回忆往事，缅怀张德生同志

常黎夫

1964年8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做过手术不几天的张德生同志。总书记如实地告诉德生同志，他的病经剖腹探查，是腹腔转移癌，原发部位未定，无法切除。中央意见，可以在北京继续治疗，也可以回西安调治，由德生同志自己决定。邓小平并告德生，中央认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德生同志对中央和总书记对他的关切和一生的评价极为感动，表示他愿回西安调治，以便把手上的一些具体工作作一交代。经中央同意，德生同志于9月2日回到西安，虽多方设法，但医治无效，于1965年3月4日不幸逝世，时年还不满56岁！

德生同志病逝已经30年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战斗业绩，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

## 同学相识 患难相交

德生生于1909年，长我两岁多。1926年我们同时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住六班，我住七班。1927年秋我转学米脂三民二中，1928年春德生转入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我们在绥德四师同学一年，因不同班，上课、自习和食宿都不在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活动也分班进行，彼此了解不深。但两人却是网球场上的热心观众，每次相遇，三言两语总要攀谈几句，日子久了也就相熟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27年春季开学不久，有四班学生张庚飏主动来找德生和我交谈怎样写作文的问题，主要由张庚飏给我们讲他写作的方法和心得，还给我们看了他写的两篇文章。这是当时绥师同学中互学互帮、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同学的优良传统，是一种很有效益的教学方法。张庚飏是延川县人，长相和举止言谈与德生很有相似之处，以后我和德生常谈笑此事。德生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文质彬彬，和同学间的交往较少，而为人笃厚老诚，学习刻苦认真。

德生和我在绥德四师同学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子洲和革命教育家常汉三相继任校长，教师大多是共产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教师公开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学生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刊物。党、团秘密组织的“读书会”组织同学在课外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著作中的基本理论，并由辅导教师作解释和回答问题。学校师生还定时走出校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德生和我就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第一次大革命的熏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在

党组织的哺育下，参加了中国人民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行列，跌宕起伏，百折不挠，探索前进，奉献终生。

德生离开绥德四师后，1928年底毕业于榆林六中，1929年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和党、团陕北特委机关的交通联络工作，他的家是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在此期间，我任共青团陕北特委执委、米脂县委书记，代理党的米脂县委书记，虽然同德生彼此没有见面，但信息常有传递，大致情况互有了解。

1930年春，党团陕北特委派德生去府谷，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委员。1930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调我到绥德参加特委，分管团陕北特委的工作。10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扩大会议，德生作为中共府谷县委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又见面了。这次特委扩大会议接受了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决定：合并党、团陕北特委，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计划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举行“飞行集会”，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大门口挂的牌子，就被砸了，造成了绥德县城的紧张形势，巡警盘查行人，清点户口。德生和刘澜涛同行去榆林（德生经榆林去府谷，澜涛去筹备特委机关移住榆林城里的事务），不幸两人出北门后，即被巡警逮捕，关押于县衙门监狱里。

德生和澜涛在动身时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和材料，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刘澜涛和我都是绥师的职员（党特委前任书记古国桢和宣传委员兼军委书记苏士杰都是绥师教员），校长马济川也是共产党员，所以澜涛的话好说，我们以校方名义申诉，说明澜涛系学校派去榆林购制教学和体育器材的，说明张德生和刘是老同学，便同行经榆林回府谷任教，只有德生来绥德干什么的“说法”颇费踌躇。

正在我们为此伤脑筋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狱吏告诉我，张心余（德生到府谷后的用名）在监狱里啥话都不说，只说他是来绥德“看女友”的。我急中生智，立即找绥师女生杜芳铭商量，请他出面掩护营救德生。杜系绥师女生部学生，是由榆林女师转学到绥师的。1929年在榆林时和德生相识，并一起搞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我提出要杜芳铭假装是德生的恋爱朋友，对外说张来绥德是特意看她的。其实德生那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子女，但情势所迫，我只得向杜芳铭提出要她承担这个任务。杜芳铭慨然答应，赶着写了有恋爱情意的安慰信，亲赴监狱探望了德生，并准备必要时出庭对质（后来没有开庭审问）。杜芳铭不畏人言，见义勇为，给我们的营救工作帮了大忙，曾经一时传为佳话。孰料“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为了追查张德生与杜芳铭之间的所谓“历史关系”，逼死了曾任德生秘书的孟服南同志。孟服南曾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一个忠厚老成、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的好同志，是值得我們附笔留念的。

德生和澜涛被捕不久，陕西的政局发生变化。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失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人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邀请杜斌丞、南汉宸、李仪祉、李寿亭等进步人士出任省政府重要职务。我们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以绥德四师学校名义，向省上各有关部门和知名人士发送“快邮代电”，为德生和澜涛申辩，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在杜斌丞的关照下，陕西省教育厅委派横山县教育局局长曹亚华（地下共产党员）到绥德考查案情，同时杜斌丞囑咐赴绥德接任县长职务的高望之（延川县人），要他设法把两个学生（刘、张）放了。曹、高到绥德后，马济川等即出面以学校的名义为刘辯护申诉。在这一年的阴历腊月除夕，德生、澜涛被无罪释放了。

1932年春，我到兰州在杜斌丞身边工作，高望之、贺连城（1930年任榆林井岳秀部军法官，我们曾通过其弟贺辑五写信要求他为张、刘说情开脱，1931年冬贺连城到兰州任杜斌丞秘书）和我们都住在杜的寓所——甘肃宣慰使署三字什招待所。高望之曾向我夸功，讲了释放张、刘两人的具体情节过程。高说：“杜先生叫我放人，岂能不听；但放人得有个手续，档案里要有所交代，我就为他们两人代拟了‘因受人诬陷，致人围困，今蒙获释，出狱后不作越狱行动’的具结文书，由他两人签字就算了事。”当时贺连城在场，他同高开玩笑说：“望之为吏，老奸巨猾，办成一事几面讨好，此事算你有功，把望之不是‘仁君’的帽子可以摘掉。”这些斑斑往事历历在目的史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被“勒令”交代问题时，绞尽脑汁，回忆出来的，现在不避啰嗦，感而记之，以晓来人，并慰亡灵。

张德生出狱后，1931年正月初一（2月17日）步行80华里，到了我家。我父亲热情招待，但内心十分沉重，为我们的活动危险而担忧。此后我和德生先后远离家乡，漂泊在外，而两家人家庭之间时有往来，互通声息。德生在我家只留一天，正月初三，我陪送10里，到了万佛洞砭头，依依告别。德生入狱后，他的母亲忧愁染病，双眼失明，卧床不起，突然独生儿子回到自己身边，悲喜交集，10天出头便去世了。德生寻亲借友，安埋了老母，他在家住了不足两月，1931年4月初，党、团陕北特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活动”的文件落入榆林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手中，榆林当局即大肆逮捕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并以搜捕学生为名搜查了德生的家，准备逮捕他。德生在榆林难以立足，穿着孝服，提着祭品，化装成为母亲扫墓的样子，逃出榆林城，去宁夏找杜润滋等同志，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这年的春天，我参加陕北特委代表团去北平向



中共北方局汇报工作于6月返回陕北，后到西安，又到兰州。1931年冬，德生为营救杜润滋出狱，由宁夏专程赴兰州和杜斌丞见面，并建立了联系。因之，我和德生虽然两年时间没有会面，但彼此活动的去向大体了解。

## 兰州脱险 西安话别

1931年11月，杨虎城派第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入甘，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进取兰州，分理政务。随后邓宝珊出任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驻扎兰州。这样一来，在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地下共产党员随军到了甘肃。1932年初，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做杜斌丞的随员到了兰州。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我负责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组织。我任支书，李玉亭任宣传（河北人，时任孙蔚如部电台台长），周益三任组织（时任邓宝珊行署参谋），兰州特别支部先后配合协助谢子长、杜润滋、张东蛟、杜宏范等筹划和组织了靖远水泉兵暴工作。随后为了开展和统一领导我党在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工作，由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设立并直接领导的中共甘宁青特委于1932年12月初在兰州成立（成立前由我和吴鸿宾、王盾负责进行了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李慕愚任宣传，我任秘书。1933年春，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先后离开兰州回到西安。特委只有吴鸿宾和我两个人（吴还常不在兰州）。不久，德生和梁德元相继从宁夏来到兰州，吴鸿宾去了宁夏，特委进行调整，梁德元任军委书记兼宣传主持特委的工作，德生任组织，我仍为秘书。



我们特委的三个人，梁德元是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邓宝珊教導营的教官，住在部队里。我的公开身份是杜斌丞的机要秘书，留在兰州办理杜老回陕后的善后事务，工作结束后搬住在朱继华出面开的新华洗染店里。朱继华是非党员，和我是同学、同乡关系，我们赞助他200元合资开设了这个西法洗染店，作为特委机关的一个点。德生没有社会职业掩护，住在特委设在“菜根香”营菜园的秘密机关里，梁德元有时也在这里住一下，德生有时也在我那里住一下。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江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投敌。8月，梁德元和“菜根香”的少掌柜康少农被捕。国民党特务搜查“菜根香”营菜园的那天晚上，因德生在我处幸免于被捕。我和德生商量，他先去驻静宁的石子俊旅躲避，因为该部的我党秘密组织比较健全，下级军官中我党的力量较强。我暂留兰州隐蔽起来。看看形势再说。我给德生带了一双布鞋，送他到东校场依依而别。事后得知德生到静宁后不久即派高宣之到兰州来联系，了解我的情况，而此时我亦逃出“虎口”。

送走德生后，我暂时住在马重光家。马是米脂人，老同盟会员，时任甘肃省政府参议。次日，我去贺连城家吃羊肉臊子面。不料天降大雨，晚上没有回去。深夜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贺家，在麻将桌上抓去了张逸民和常雄狮两人，他们总以为抓住了张德生和我。拂晓时我乘机从后墙跳出贺家，冒着倾盆大雨，骗过戒严的岗哨，天刚亮混出兰州城。为预防敌人追赶，我绕道甘南，至清水县善后局避难一月。局长杜宏文是杜斌丞的堂侄，我的堂表兄。9月，甘肃省府通缉张德生（当时名张博五）和我（当时名常应肇）的通缉令下达到县上，我不得不离开清水，翻越关山，经陇县，到了凤翔，出乎意料与杜斌丞巧遇。原来是孙蔚如的参谋长张绍亭特意去西安迎

接杜去汉中，路过凤翔，马豫章、杜理程、刘作霖等是杜的随员。杜斌丞见我安全归来甚为宽慰。深夜相谈，告我说他此去汉中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杨虎城、孙蔚如同意曾先后派张含晖、武志平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但此事却被蒋介石侦知，引起杨虎城对武志平生了疑心，杜说他去了解一下真实情况，设法保持杨、孙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二是孙蔚如的姨太太不知为什么自杀了，孙的情绪很不好，我去宽慰宽慰。这样，我就同杜老一起去汉中，记得大概是在凤县过的中秋节。

到汉中后，我通过傅剑寒与中共陕南特委取得了联系。过了几天，杜老提出，再找一个合适的人来长住汉中，以便进一步沟通孙蔚如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工作。我提出张德生来汉中合适。杜老同意，傅剑寒报告特委，特委同志也同意，我就给德生去信，要他来汉中。德生到后，由我引他见了杜老和孙蔚如（孙、杜同住一个房子），杜向孙介绍了德生，说“张博五”（后又改名张仲房）是他的学生。隔了几天，杜老和孙蔚如的总参议王宗山同德生谈了建立联络关系的问题，我未参加。他们还指定武志平安排德生的生活，并保持与王宗山之间的联系。

杜老在汉中两个多月，大约于1933年阴历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回到西安。在我离开汉中前不久，德生已是中共陕南特委的组织委员。汉中特委同意我跟随杜老到西安，隐蔽在杜家，帮助杜老搞抗日反蒋活动。当我们在汉中的时候，就知道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也听说孙殿英部开赴西北，南汉宸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在孙部活动的传闻。我们回到西安后，杨虎城和杜老活动频繁，如派李龙门去山西、广西与阎锡山、李宗仁联系，派崔孟博去孙殿英部做南汉宸的助手。但时隔不久形势突变，福建事变失败，孙殿英部被阻宁夏，西安派往孙部的人员杜立亭、刘天鸣等杳无音信，杨虎城怕

他同孙部的来往被蒋介石侦知，急于和南汉宸取得联系，就要王菊人向杜老提议，一定要我去宁夏找南汉宸取得联系，我是阴历腊月初夕那天到北平的，又改乘去包头的火车，再改乘汽车到临河，又骑毛驴，到宁夏李岗堡见到了南汉宸等同志。前后一个多月，又回到西安。

1934年的春夏之交，按杜斌丞原来的设想，我约张光远同志去川北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争取留住在那里，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张光远离开西安时，杜老给孙蔚如、王宗山写了信，请孙给张国焘写信交张光远带去；我给德生写信，请中共陕南特委给张光远同志写组织证明信。张光远到汉中后，带着孙蔚如和中共陕南特委写的两封信，由武志平同志护送到川北苏区。光远归来后说，他同张国焘等见了面，只留两日，并未深谈，即被礼送出境。光远回西安不久，因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去了北平。

1934年深秋，中共陕南特委派德生赴上海向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后返回西安，此时我刚考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步训班学生队学习，在东大街一个小旅馆同德生会面。德生说，由于形势所迫，中共中央已离开上海进入了中央苏区，听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苏区的处境十分困难，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领导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派他去红四方面军联系。西北的形势，陕西的形势，都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要有形势骤变的精神准备。谈到此，两人的心情很是沉重！我向他介绍了陕西方面和杜老的一些情况，汇报了步训班学生队的一些情况，以及我谢绝南汉宸之约去天津工作，也没有同王超北建立关系的经过情由。最后，德生肯定地说，我以后只和崔延儒保持单线联系，如有机会他就来信。分别时，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思绪万千，依依难舍。我说：“大势所迫，各奔前程，用杜斌丞先生的话就叫做‘殊途同归’。我们如果活着，一

定要活得有脸相见。”德生沉思良久，只讲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同志’相见。”他把“有脸相见”，改为“同志相见”，两字之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教育。两个字的改动，体现了革命理想信仰信念坚贞不拔，党的组织原则忠贞不贰，也体现了德生同志冷静沉着，思维深邃，见高识远。后来，我曾对德生多次谈及此事，“两字”之差自愧不及德生多矣！而德生总是谦虚地用他的不足之处把话题引开。他常用“勤以补拙”、“笨鸟先飞”的两句成语策励自己，启迪他人。

西安话别后，张德生即返汉中去了川北苏区，一年多时间没有消息。

## 同志相见 抗日救亡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消息传到西安，我们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在黑暗中探索奋斗的共产党人，如同拨云见日，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德生、拓夫同志的消息一点没有。1936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崔延儒突然来见我，带来了拓夫和德生两人给我的信。信上写的是我的化名“秋云”，这是1928年拓夫替我起的化名。信上说，他们已经平安返里，嘱咐我不要离开杜先生，继续帮助他，我的学业和事业一定会与日俱进。我捧读来信，真是喜从天降，如获至宝，精神振奋，信心百倍。

“西安事变”时我在户县，12月12日奉命率兵一连赶赴西安西郊营房集合，而城内战事已经结束。当时我在十七路军警备一旅一团二营四连任副代理连长职务。“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任张学良、杨虎城主持的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新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主持接管原由邵力子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我于14日离开部队，回

到省政府杜斌丞身边工作。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等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的专机从陕北飞抵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衔中共中央之命也来到西安，重新组建中共陕西省委。德生到西安的次日就来和我接头，我俩在钟楼东南角的“曲江春”饭店用餐，两年不见，又得重逢，无比高兴，共吐衷肠，如入梦境。德生说他到川北后，张国焘不信任，上海中央局本来要德生把中央文件送到红四方面军后再返回上海，但张国焘不予理睬，只许随军参加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维汉同志调德生到红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局工作，才脱离张国焘的羁绊，较红四方面军提前一年到达陕北。德生说，中央对杜斌丞和我的情况都很了解，要我继续留在杜老的身边，利用合法身份，帮助杜先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25日，重建的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西安市工委书记。德生告诉我，我的党组织关系，只同他个人保持经常的联系。他要我租赁了两间民房作他的住处，地址在今建国路干休所的对面，以后他同王文结婚一直住在这里。我每周至少去他那里两次谈工作。这里往来的人极少，一年多期间，我在德生家只遇到过并认识了张中（省委秘书长）和吴铁铮两个人。记得一次王文亲自烧蛤蜊给我吃，我不习惯，勉强吃了一个就发呕。一会张中来了，他把一盘子都吃光了。关于我的工作任务，德生讲我留在杜斌丞先生身边工作，是为了配合杜同党中央驻西安的代表林伯渠和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先是李涛，后是伍云甫、周子健），搞好上层统战工作，这是主要的；同时，省委也将按情况和工作需要，让我做一些别的事情，这要通过一段实际工作，逐步明确、具体。从此，我在陕西

省委和林老、德生的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而斗争的行列，在西安坚持工作四年之久。下边略举几件事例说明。

我经手的头一件事，是联系各有关方面，通过杜斌丞、杨虎城，向陕西省政府推荐委任延安等九个县的县长人选。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迁到肤施（今延安），而延安等县的反动县长多已逃跑，新的陕西省政府必须新委任一批真正拥护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县长去任职，以进一步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关系。推荐名单中：马豫章（原地下党员）为肤施县长，曲紫芹为甘泉县长，张执庵为鄜县（今富县）县长，李志洁为宜君县长，艾善甫为中部（今黄陵县）县长，田在养为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县长，王正身为延长县长，李腾芳为延川县长，宋寓三为洛川县长。这个名单提出前，我和张德生及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李涛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表示一致同意。这九个人中，有四人为德生的旧相识。

新任县长赴任后，接着我以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推动他们搞好同我党地方工作人员和过往红军的关系。德生给郭洪涛同志写了我的党员介绍信，由我带去。我大约是1937年1月中旬离开西安，沿途在中部、宜君、洛川、甘泉、鄜县每到一县停留一两天。召集地方各界代表人士座谈和检查执行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情况，处理工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1月下旬抵延安。我在延安约住一周，四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马豫章以肤施县政府县长的身份请客，毛泽东同志应邀出席，还有党和红军在延安的领导人近20人参加了宴会。大家谈笑风生，气氛热烈。第二次是郭洪涛同志领我看望了毛泽东同志。第三次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毛泽东、郭洪涛同志讲了话，马豫章以肤施县长身份，我以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身份也讲了话，我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八项政

治主张，说明西安各界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情绪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要求，说明西安人民是在搞抗日救亡运动，驳斥敌人散布西安已经“赤化”搞“共产”的种种谎言。记得从俄国归来不久的张浩同志站在群众中间，不断引导高呼，要和平，要团结，要抗日，要求蒋介石实践诺言，无罪释放张学良将军等口号，会场军民情绪十分热烈。马豫章特意拍摄了群众大会照片，我保留的一张在1960年送给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第四次是1937年1月30日在徐特立同志的60诞辰会上，我坐在毛泽东同志的身旁，邓颖超等同志先后唱了京剧和民歌，接着观看了以廖承志同志主演的话剧。在两个多小时的晚会中间，毛泽东同志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廖承志同志的家世和廖仲恺先生革命史实的故事。2月下旬我返回西安后，由德生约定时间，我同贾拓夫、欧阳钦、德生一起用吃羊肉泡馍的机会相聚，我向他们三位领导人汇报了这次视察陕北各县的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利用这种合法的形式，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方法。这是我同拓夫阔别六年后的首次聚会，同欧阳钦同志的首次见面。

1937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委员何绍南来陕查看曾用赈济款修建的延（安）榆（林）公路路基情况，准备继续拨款完成全部工程。何绍南东北人，与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主任朱子侨系同乡，关系较深，打着支援抗日的旗号，往来于陕北高桂滋、高双成和绥德傅作义之间的联络活动。我党为了争取早日修通延榆公路，以便促进团结抗日的联络工作，林伯渠和杜斌丞商定，要我陪何绍南赴延安、绥德一行（随我去的还有省建设厅工程师李海珊，东北人）。何绍南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接见宴请了他，并派秘书周小舟同志和我一起陪送何绍南至清涧县城外（城内由高桂滋部驻防）。我同何到绥德城与高桂滋会晤。何住一日即赴榆林、绥远，我留绥德与高桂滋会谈。我向高面交了杜斌丞写给他的信（杨



虎城已先发电报给高)，谈了西安方面的一些情况和杨、杜要我转陈的话。高桂滋当即表示，他完全赞成张、杨八项政治主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高桂滋说：“我本人即将请缨率部开赴前线抗日。在留陕北之日，一定保证维护团结，不发生摩擦事件。”我在绥德停留两天，经延安返回西安。以后的事实证明高桂滋履行了他的诺言。

“七七事变”前后，陕西省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为首的抗敌动员委员会（以后改为抗敌后援会）。我按照德生传达的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以陕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人员身份参加动委会，负责分管抗战救济和募捐方面的工作事务。平津失陷前后，大量学生相继流落西安，我集中力量搞了接待和安置平津流亡学生的工作。首先分批分组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然后分别情况资助所需路费，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有的前往延安、汉中等地求学，一部分人返原籍自寻出路。用两月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0月间，陕西抗敌动员委员会决定聘请一批地方知名人士做动委会的督导委员，分赴各县视察、督促指导抗敌动员工作。德生向我传达省委意见，让我参加这一活动。我同德生具体商量，确定我担任米脂、葭县的督察员，了解一下两县的实际情况，摸摸下边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抗日工作怎样开展，取得一些经验，对省动委会的活动给予支持。德生讲我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国民党西安行营和我党商定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划归陕甘宁边区设立警备区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必要和可能的上层统战工作。

根据以上指示，我大约于10月中下旬，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由西安动身到了延安。适逢高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将赴警备区所属黄河沿线察看防务情况，我便搭乘他的汽车同行至清涧县城，我们一起会见了国民党清涧县长艾善甫（高岗

和艾也相识)，晚间一起参加了县政府的招待会。次日，高去察看河防。我留一日听了艾善甫介绍地方情况汇报。（艾由中部调到这里不久，此时还听我们的话，后来跟着何绍南搞了一些摩擦）第三天我赴绥德，见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刘澜涛同志。他当时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也是中共绥德特委的领导人之一。我在司令部待了一整天，会见了陈奇涵司令员，晚上在澜涛同志的窑洞里抵足而眠，畅叙离怀。此时，何绍南已受命任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尚未正式到任，由姓孙的秘书看守衙门。我同专署没有打交道，分别访问了许多往日的同学、朋友和地方代表人士，参加了由张哲卿、霍仲年等进步知名人士发起举行的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和宴会。第四天我赴米脂，回到离开七年的家中。此时，原来驻防米脂的国民党二十二军高双成的部队已经撤离，接防的八路军部队尚未来到。我和还没有离开的二十二军陈团长两次面谈，他坦率表示，交接防务一定顺利完成，赞成两军合作，屯守河防。适逢八路军贺晋年同志率部增援河防，路经米脂宿营一夜，次日清晨他们启程前全团战士集合，我应邀做了简短讲话，致以亲切慰问和希望。国民党原米脂县党部指导员高仲谦畏罪逃离。前任县长楼铿声（浙江人）在任多年，一直反共反人民，筑新城，办保甲，贪污巨款，被米脂县各界人民代表短伯雄、贺辑五等阻留，清算他的账项。新任县长刘学海是杜斌丞先生在西安候补县长培训人员中推介委任的，安徽人，有点才干，当时表现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救国主张，表示一定按照杜先生的嘱咐和期望为地方人民办实事。刘在任两年多期间，主持修建织女渠工程，扶持地方教育事业，有一定成绩。但以后投靠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反动分子彭昭贤，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先后被升任洛川、榆林专署的专员，做了坏事，最终受到人民的审判处决。在我回县之前，米

脂县就成立了抗日民众运动股（简称民运股），民运股也就是中共米脂县委的组织。罗文同志任主任（也是中共米脂县委书记），负责主持民运工作，县里的抗日救亡活动朝气蓬勃。我在米脂停留三天，主要是配合罗文同志沟通上层统战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协助刘学海县长对县政府科室人员以及县保安队的整顿工作；召集地方有关各界代表人士，座谈制定织女渠水利工程计划方案；支持由姬伯雄、艾斌卿、贺辑五、贺连城等进步人士组成的“清委会”，宣布清算前任县长楼德声贪污案的结果，责令其退出贪污赃款 5000 元后离县。由我动议，经“清委会”的一致同意，在退款中拿出 500 元捐助延安陕北公学筹备处，完成了李维汉同志交给我的这项任务。

此时河防紧张，我即离开米脂到葭县。国民党葭县县长是印象锋，湖南人，行伍出身，性格爽朗，表示坚持团结抗日，固守河防；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冯仁甫是米脂人，榆林中学学生，我们早年相识，他对我也表示赞成国共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县民运股主任曹华山已经早到县，开展民运工作。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针对日寇侵犯骚扰河防的情况，提议由县政府、县党部和民运股三方面联合成立县抗敌动员委员会，并召开群众大会，我和三方面的负责人分别讲话，健在的王辉同志当时是民运股的妇女宣传员，她们还组织学生表演了歌咏节目，会场抗敌情绪高昂，一致表示踊跃支前，坚守河防，保卫家乡。大会后即派干部分赴农村，宣传动员民众积极支前。偏僻小县，民众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闻听日寇迅猛进犯晋南，影响西安，人心波动，形势吃紧，我在葭县也只住了三天，折返米脂只住一晚，次日搭顺车至榆林。榆林不属我视察的范围，那里的情况又很复杂，高双成不在，参谋长徐子佳主持一切，参加了他的一次宴会，纯系官场应酬。在榆林活动很不方便，住了两天，搭二十二军的军运汽车至延安，换车返回西安。

这次往返匆匆，相近一月。归来向德生同志汇报时我说，此行见闻多而办事少，交游广而结识浅，谈不到多少经验。我写了一些有关绥德、米脂等县地方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材料，供中共陕西省委参考。还写了榆林地区近10年间流沙侵袭的严重情况和急需防治的意见，关于修建米脂织女渠水利工程的筹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单行材料，报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经杜斌丞秘书长阅批分交建设厅、水利局办理。织女渠工程的修建费得以落实解决。

以上所述，就是当时一年多的特殊环境条件下，我在德生直接领导下，完成党所交办的几件具体工作的实际经过情况。文字写得长了些，但可借此以澄清“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歪曲历史事实，是非不分，以至有意颠倒黑白的一些问题。

在此期间，我先后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周子健同志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共同为沟通林伯渠与杜斌丞间的关系顺利进行，并且接受他们商定交办的一些事情。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不断委托我承办一些具体事务，如接待一些我党的老同志，郭洪涛、霍士廉、张宗逊、罗文等由延安赴前方路经西安时，都由我个人出面，约请他们洗个澡、吃顿饭，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旅途中的困难问题。同时，我也经过办事处不断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赴延安学习或去前线参加战地服务。

1938年7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免除杜斌丞的秘书长职务。我不能留在秘书处任职。向德生提出回延安学习的要求，德生一再说服，说为了保持党和杜斌丞间的关系，搞好统战工作，要我坚决打消回延安学习或工作的念头，继续在杜的身边工作。由于杜斌丞留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垦荒委员会副主任，我便在垦荒委员会挂了个干事名义待了下来。垦委会设办公室，办事人

员不到10名，下属黄龙山、黎坪两个垦区。1938年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黄河决口，造成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杜斌丞利用本省赈济款，新办开山垦区，但规模很小。驻河南洛阳的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与中央赈济委员会主任朱子侨提出拨专款在陕西增辟垦区，大量安置难民，杜斌丞提出新建马栏荒区的方案。要我首先征求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此时张德生同志已经离开西安，常驻省委机关的新址三原县云阳镇（现属泾阳县）。在德生移驻云阳后，我们之间平常关系通过交通（先后有高贤、聂景德、宋志远等）联络，临时紧急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人转达。为了开辟马栏荒区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于1939年6月间亲赴云阳向省委请示汇报。我在德生的房子里（前后间，他和王文住里间，我住外间）住了三天，向欧阳钦、张德生汇报和商讨了两个半天（张中参加了一次）。主要内容有三件事：一是关于加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加紧反共措施，规定各级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二是关于扩大黄龙、黎坪、开山垦区和新建马栏荒区问题；三是杜斌丞、杨明轩等提议在国民党十七路军内部高级军官中建立“抗日同志会”秘密组织问题。谈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中央已有规定，经党组织批准个人可以加入，省委批准我办理集体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手续（我遵办了）；关于杜斌丞是否加入国民党，省委也认为加入对工作活动更便利些（杜两次撕掉国民党党员入党登记表，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第二，省委和边区政府的意见一致，完全赞成开发马栏荒区的意见。第三，关于在十七路军内建立小组织的问题，须报请中央考虑（后来中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以不搞为宜，杜、杨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此外关于我再次要求回延安学习的意见，他们笑着说不能列为议题。第三天德生带我去“安吴堡青训班”参观，冯文彬、胡

乔木同志不在，受到史洛文同志的热情接谈和招待。在参观学员寝室时，发现堂弟常远亭卧病寝室，我征得史洛文同志的同意，带他一道到西安治疗两月，病愈后返延安。我从云阳到西安后不久，杜斌丞即去洛阳和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商谈移置难民屯垦问题，随员有陕西省救济委员会秘书主任黄通植，一个姓曹的职员，加上我一行人，辗转到达洛阳。适卫立煌外出，杜、黄与卫的参谋长郭寄桥会谈两次，住三日返陕。不料国民党特务得知此事，散布谣言伪称杜斌丞勾结共党，为陕甘宁边区移民屯垦，国民党中央政府遂立即停止拨款，移民屯垦之事被迫停滞。1940年春，杜斌丞向陕西省政府提议，用本省救济款在马栏开辟小型垦区，少量安置难民，逐步扩大。杜的动议得到省府委员张遇支持（张与蒋鼎文私交深，以师礼相待）。这就是我于1940年4月初亲赴马栏荒地进行考察的来由。我去马栏前曾通过办事处周子健同志发电报请示德生，德生复电同意并对我进荒区后的安全问题，做了精心考虑和布置，他给八路军驻店头办事处负责人孙润华同志写了介绍信，嘱咐了部分荒区范围内有我党地方组织活动的负责人（如郭景龙）对我随时加以照料保护。我在荒区考察22天，4月25日回西安，5月10日以“省垦委会干事”的身份，借口为调解刘翰屏（刘含初烈士的弟弟）控诉荒区纠纷案件去荒区，归省后向陕西省垦荒委员会写了《关于马栏荒区的考察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档案中看到这个报告，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史实，把它作为我的主要“罪证”，横加迫害。沉冤11年半的这个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得到平反，我才见到自己写的《关于马栏荒区的考察报告》原文，随即复印，公之于众，功过是非，听人评说。

我从马栏归来，不到三个月，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

人员闻人杜斌丞家，以搜捕共产分子为名，抓去杜家的佣人和年轻的客人。我幸而预有准备，越墙逃出，因阴雨连绵，在友人冯逸农家中躲藏两月。后接德生的来电，由周子健同志亲自接送出北城门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仓库所在地，乘汽车回到延安，结束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10年生涯。由西安回延安同车的有黄火青同志等10多人。国统区的沿途关卡盘查甚多，但因我们有专人与之周旋，通行尚称顺利。汽车过了洛川县的“界子河”，爬上山岭就到了八路军的哨所，我们平安地进入陕甘宁边区了！此时一个个心情振奋，欣喜若狂，谈笑风生，同车的几位女同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奉调回延安）情不自禁地高唱革命歌曲，一路上饥饿疲倦沉闷的情绪扫除殆尽。当远远望到延安宝塔山顶时，大家的情绪又沸腾起来了，女同志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我们终于回到‘娘家’了！”（当时党内流行的称呼）。反映了每个共产党人对党中央的热爱和向往的赤子之心，体现了每个爱国的中华儿女对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坚持和指导抗日战争的冀望之殷。此情此景，终生难忘，爰为之记，以昭后人。

## 勤业勤学 并肩战斗

1940年9月下旬当我回到延安时，德生于不久前离开延安，回到了中共陕西省委新的所在地——马栏镇。德生行前给我留下的信中说，我的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陕西省委，即使将来我不便再去国统区工作，也需要我在省委待一段时间，以便把外面的一些人事关系接好。他还叮嘱我不要再强调提出进延安学校学习的要求，凡事按照高岗（时任中共边区中央局书记）和贾拓夫（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安排和吩咐去办。高、

贾热情接待，让我住在蒙古文化促进会赵通儒处。那里清静，距离边区中央局和西工委都很近，便于往来。关于我的学习和工作问题，高岗对我说，他和拓夫、德生商量过了，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处境和影响，决不给国民党反动派留下造谣生事的口实；也还要看看形势变化能否再出去工作，所以暂时以少露面为宜。学习可采用自学的办法，自订计划，主动灵活，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利用延安学习文件、书刊和辅导人多等有利条件，自修自学，可能要比进学校的学习效果好得多。关于我目前的工作问题，他说党中央提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要实行三三制，边区内有很多统战工作要做，要我在延安住一段时间后，可以去绥德、米脂，协助绥德特委做些上层人士中的统战工作，说我人地熟悉，便于沟通思想认识，同时可以回家住一些日子，过个春节。

于是，我就请拓夫同志帮助，拟定一个简单的自学计划。回顾当时提出的学习内容大致分为四个课题。（一）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课本，同时阅读《〈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求得搞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懂得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及其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懂得中国的革命要“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等基本理论问题。着重提出学习和领会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和实施办法等具体问题，为将赴绥米参加活动有所准备。（二）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联系自我检查，改造和提高思想认识。（三）学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文件，回顾检查长期做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四）学习《实践论》、《矛盾论》，阅读其他一些有关哲学的书刊论著，解剖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



题。自学计划的时间和步骤预定为三段：先在延安学两个多月，再赴绥德两个多月，然后返回延安再学两个月，共七个月时间。第一段在延安按预定计划执行，学得不错，认真读完了第一项内容课题的有关著作，还选读了一些有关党建和共产党员修养方面的著作。在此期间，我还听了张闻天、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分别参加了西北工委和中央统战部约会的几次座谈，并写了一些我所了解的西安方面的社会动态，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以及特务系统的人事关系情况的零星材料，每逢星期日走访一些相知的革命前辈和老战友，认识了不少同志和朋友。这一段的学习和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深感收获和受益匪浅。

11月间，我由延安赴绥德、米脂，先后两次在绥德大概半月左右，都住在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马豫章处，其余时间住在米脂家中。我按照边区中央局领导的意图和指示，配合协同绥德特委张秀山（书记）、李景波（统战部长）和米脂县委书记李万春等领导同志，广泛地接触了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其中大多数是旧相识。我向他们提议，大家都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自愿结合，不拘形式，三五聚会，交谈学习的感受和切磋疑难问题。我有计划地参加他们的座谈，了解各个人的思想认识情况（回到延安后分别写了一些头面人物的单行材料给组织）。我对他们说，杜斌丞先生接到《新民主主义论》的讲稿后，关门三天，捧读之余，感奋不已，满怀激情地四处对人说：“中国的革命只有走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有希望，除此别无他途。”绥米两地的社会知名人士多是杜斌丞的老朋友，或有师生之谊，杜老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其中思想进步人士，如米脂的姬伯勋、贺辑五、马济川、贺连城、艾毓卿等，绥德的张哲卿、霍仲年、霍祝三等人的态度明朗，赞成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拥护实行三三制，表示要为坚持抗

日战争，为边区的各项建设尽一点力量。原来思想认识上有某些顾虑，观望不定的老先生，如李鼎铭、高榆庭、安文钦等，也流露出愿意“出山”参政、议政念头。我们在春节前就做好了组织首批绥米士坤赴延安参观团的准备工作，1941年二三月间参观团抵达延安。参观团进行了各方面的实际观察，并且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向他们开诚布公地阐明政治形势和我党的统战政策，启发他们发表意见。参观团每个人的思想认识都有变化，尤其是对建设边区，对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新的认识。

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参加了参观团的全部活动，顺利完成任任务。在米脂，我还察看了米脂人民盼望很久，我在杜斌丞先生指使下筹措经费奔走几年而刚刚完工的织女渠工程（1941年灌溉万余亩）；参加了地方人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瓦解米脂中学的斗争；倡议并促成米脂同谊成文具店（原计划搞抗日书店）扩大集资，为姬伯勋主持筹办万合毛织厂（民办公助企业）做好了准备，扶助艾斌卿主办的民生纸厂（个人集资政府资助）扩展经营业务范围。这些小型企业的创办，为边区的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7年蒋介石胡宗南大军侵入边区时被摧毁殆尽。回顾此次返里两个多月的活动是紧张而舒畅的，但是这些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加之春节俗习，来往人多，应接不暇，扰乱了我的自学读书计划。

春节前后，因工作去向问题又给我增添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德生写信给我，仍然主张我先到陕西省委。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米脂县长卫邦辅一再想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婉言拒绝，介绍他和王震（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晤谈，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杜宏范（杜斌丞的长子，任国民党杜聿明二

〇〇师的汽车团团长)又从广西全州来信说,杜聿明将扩军抗日,利用时机可有作为,催我去广西。我一面给宏范复信说明,我认为无机可乘,不可能去;一面给杜斌丞先生写信,汇报西安分手后的大概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杜老很快来信,用他习惯的通俗易懂语言,对我的去向表明了他的态度,其中有四句话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留县太乏味,南下惹是非,山中有名师,求学方为贵。”明确指出我该去延安,扎根延安。

随参观团参观完毕,我带着杜老的信去见高岗,恳切地向他提出个人的想法和唯一请求是允许我再继续自学两个月,把原定的读书计划,大致告一段落。高岗同意了我的要求,并指定住在交际处,说交际处条件好,诸凡便利。我没有料想到,就在这时,南汉宸、霍维德同志又邀我去边区政府财政厅帮助他们工作,并说他们要分头向中央组织部和西北局提出报告请求批准。不过我还是争得两月时间在交际处把自学计划中的主要文件、书刊大致阅读一遍。虽然没有思考精读“消化”工夫,但先后两段四个多月的学习,对我随后接着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文件和参加整风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也成为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投入紧张、艰苦的财经战线做好财经工作的精神支柱。南汉宸、霍维德同志的报告获得了组织的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到边区政府财政厅工作。

在我回到延安的大半年时间里,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党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方针,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41年3月击退了这次反共高潮。党中央为了总结陕西地下党执行中央白区工作方针的经验,委托陈云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座谈会于1941年9月在延安开始,此时德生已接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应邀参加会议,前任的两位省委

书记贾拓夫、欧阳钦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由德生汇报了陕西省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8月18日《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的情况。经过认真深刻的分析研究，产生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2月29日发出的《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德生这次在延安住了四个月，我们之间获得了一次十分难能可贵的相聚机会。德生这次来延安仍没有将我的党组织关系转来，他总想争取我去陕西省委工作；而此时我到边区政府财政厅工作已三个多月，他目睹当时边区财政粮食方面紧张和我的工作繁杂情况，立即打消了他原来的想法，鼓励我从头做起、学起，干出成绩，并很快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转来。在此之前大概是三四月间，由张邦英同志（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写信，介绍我去中央组织部送交我写的自传，经乐少华同志负责接谈审查，做了“没有问题”的口头结论。所以，虽然我的党组织关系尚在陕西省委，但是我到财政厅后就一直兼管着机关党委和干部工作。德生在延安期间，我们在百忙中一两周内总要挤出时间会面一次。德生对我在学习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特别是帮助我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政策、策略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解，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近来我又翻阅了当时党中央有关地下党工作的一些文献资料倍感亲切。德生对我讲述了他于1940年和1941年两次参加中央关于白区工作问题汇报和座谈会的情况，说这也可以说是他人党后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两次训练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对我详细讲述了党中央对地下工作的重视，和认真细致、反复深入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德生讲，毛泽东同志对陕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极为关心、重视，对两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说1941年座谈会形成的决定原是由陈云同志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后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定稿，并提议以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德生说，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2月25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我

们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必须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就是被后来实践证明完整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西北局 1941 年座谈会的“决定”，也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精神制定的。德生还用三年期间陕西省委执行中央指示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步骤，并且联系回顾他自身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上的理解变化做检查。历历往事，至今言犹在耳。德生联系实际的回顾检查，也对我回顾检查自身在地下工作的 10 多年的曲折过程，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也是对我实现自学计划中学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政策的要求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辅导作用。德生还向我讲，毛泽东同志向他谈了对杜斌丞先生的评价，说“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见 1948 年延安各界追悼杜斌丞烈士大会上的挽词）。毛泽东同志对杜斌丞的革命友谊，情深意切，关怀之殷，溢于言表。

1942 年 2 月，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举。其基本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德生和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年 10 月，德生到延安参加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住了三个多月，我们又获得了一次较长的相聚时间。这时候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渐有好转，能够吃饱饭，穿上棉衣。通过学习整风文件，大家精神奋发，朝气蓬勃。德生和我的思想认识也有新的进步和提高。将近一年的学习（包括学习“两条路线”的文件），给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和共识是懂得了要取得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必须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把马

列主义中国化。一个人要真正成熟起来，必须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在解决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中的困难问题时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思想和作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还根据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的讲话精神，提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和要求是“勤业勤学，并肩战斗”的誓言。我对自己提出“野鸟还巢”的喻言，策励奋进（李维汉同志同我谈心时说，整风学习使我们懂得了历史路线），彻底改造思想作风，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就好比“野鸟飞回了家”一般。李老的这番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回想起来，延安整风给我们这代人的教诲和陶冶，铭刻在心，永生弗忘。

正当整风运动健康深入向前发展之时，身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先于1942年12月6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作的关于锄奸问题报告中夸大敌情，批判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提出了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后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紧接着各机关单位就召开坦白大会，执行错误的逼供信方针，大搞“抢救”运动。康生等企图制造一场错误的肃反，在许多机关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把陕西地下党说成是假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杀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搅混了水，黑白难分，“特务”如麻，人人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恶果累累，后患无穷，其罪责完全在于康生等人的身上。8月15日，党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审查干部工作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并相继发出一系列有关甄别工作指示，甄别所有的案子。

1943年12月德生来延安出席边区首届劳模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生

产展览会，1944年4月他又来延安参加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候，他对在延安被逮捕关押，或被分送到行政学院、西北党校继续审查的蒙冤陕西干部还没有过问说话的条件（因为不少人的案子是康生及其追随者直接搞的，甄别平反阻力重重，很不容易），但他的认识和态度是明朗的。他说所谓的“红旗党”根本是无稽之谈，大多数人的案子经过历史实践的证明和党组织的考察，是会得到平反的。德生对关中地区的甄别工作抓得积极认真，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满地结束了关中的甄别平反工作。为了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对待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员和干部，德生于1944年8月10日上书西北局，认为必须从领导思想上解决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及其工作，正确对待国统区的党员和干部这个问题。建议西北局加强领导，对延安还没有进行甄别的来自陕西地下党的党员干部尽快进行甄别平反。他还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关中地委统战部会议上，逐点批驳所谓陕西地下党是“假党”的谬论，公开为陕西地下党正名。他总是把陕西地下党的工作同自己连在一起，并为地下党员说公道话，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生于1945年10月调任西北局的秘书长，不久又兼任了西北局统战部的部长，主要任务仍然是做国统区的工作，此时我在边区政府任副秘书长。我们之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个人间的联系交往上都更增多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工作需要，德生指示我设法同杜斌丞先生身边和亲近的人员取得联系，互通信息。1946年2月8日，杜先生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名义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他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和态度，我党中央十分关心杜老的安全问题，曾提出要他到陕北来或去香港的意见，几经设法，未能实现。同年7月党组织将杨明轩从西安护送到延安后，德

生和我商请杨老致电王菊人劝说杜先生进边区，而杜老仍执意不肯，亦未实现，致遭残害。与此同时，李先念、郑位三和王震同志率领的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到达商洛，为配合中原部队在豫鄂陕边创造新的根据地，中央指示西北局在关中、陇东等地开展武装活动进行策应和配合。当时国民党高桂滋的第十七军齐天然团驻在固原。齐有率部起义的意图，西北局决定派我前往固原洽谈。为此，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朱敏同志特意从庆阳来延安接我。离延安时德生来送行，风趣地说：“你学过军事，此行可能有了用武之地了。”他还说我们再见面时有可能不在延安，而关于他也即将前往关中地区布置武装活动之事，概未提及。我到庆阳，迅即与同行的引路人齐应凯同志（解放初任中共甘肃临夏县委书记，系齐天然本家）做好化装衣服等准备事宜，忽接西北局电知齐团已调防离甘，我未成行。旋接边区政府通知，命我协助即将到庆阳的刘景范同志（边区政府民政厅长），代表边府迎接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返回延安。三五九旅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从延安出发转战到华南的，抗战胜利后北返到中原解放区成为中原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次突围到商洛后奉命返回延安。8月底，王震同志率部进入边区，我陪同刘景范同志在庆阳城外20里处迎接，于9月回到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德生奉调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我于1947年2月初协同马明方、胡乔木同志赴陇东搞土改，几月后奉调回白庙岔，回归边区政府，从此，转战四方。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的第三天，我才和德生又会面了。他是随军行进的，比我早进西安城三天。当我进城之前，他就派人把我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在国民党省政府任职的老朋友冯逸农等人（均为民盟成员）。贾拓夫同我于5月28日从延安到达西安，德生把西安同他直接联系的地下关



系全部交给了拓夫（拓夫当时既是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又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德生对西安的“接管”工作和建政工作是大有帮助的。德生还和我一起布置了胡希贤（曾在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过教官）赴宁夏做马鸿宾率部起义的工作，后即匆匆赶回一野总部，进军甘肃。

大西北解放后，德生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1954年5月调任西北局统战部长。在此期间我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我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更为便利。1954年10月德生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大区机构撤销后我调去北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两人相距虽然较远，但联系交往亲切如常，勤业勤学，并肩战斗，互策互励，默默奉献，“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学习林伯渠、谢觉哉同志的座右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关怀之殷 情同手足

1956年秋，我的胃病发作，但病源不清，医治无效。德生闻之极为关注，特意介绍陕西、甘肃名中医贾昆、张汉祥来京为我医治，照顾我的家人生活更是无微不至。1957年初夏，我的病情加重，被迫离职，易地求医，先后去上海、青岛、唐山、北戴河等地练习气功疗法，一年时间与外界联系隔断。1958年5月病情略有好转，我由北戴河疗养院临时回到北京，试试看能否逐渐恢复工作。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德生来京出席会议，我也旁听了会议的大会报告和发言，我们见到了面。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会上有

些省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在整风运动中同所谓“党内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验。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的头目。这些错误做法，造成极大的影响和恶果。陕西在近邻的狂热浮夸风和错误攀比夹击下，被视为“黑锅底”。这时德生的思想矛盾和压力是很大的，但他对我的病体和工作十分关切，主张我应该坚决从国务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到陕西继续疗养，适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长期打算，争取逐渐恢复健康。我把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了他，我打算9月结束气功疗养院的生活，国庆节前回国务院上班试试看能否支持下来，实在不行，明春退下来去西安。谈话之后，我就匆忙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德生参加会议来到北戴河，他在百忙中再次约会我相见长谈。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你采用气功疗法初见疗效，应该肯定，但病源不清，病根未除，体重掉了40斤，没有增加1斤，癌症患者的嫌疑分子帽子并未摘除。你留恋国务院的工作心情可以理解，但已力难从心了。只有坚决退下来，只有回陕西才能取得继续疗养和适量工作的主动权。”他甚至无所顾忌地忠告我，说我的身体处在好歹的“两可”之间，回到地方，孩子、老婆也便于照顾安置，苦心孤诣，侃侃而言，感铭肺腑。德生说：“至于你回陕西搞什么工作，我们之间好商量。名利地位你不会计较，而是在身体条件允许下，能够实实在在做点有益的事情。”我们商谈结果，归纳起来，大致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我所强调提出的下基层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德生表示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他全力支持。二是德生强调提出的统战工作要真抓起来，把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出现的党外人士同我们党疏远，与党离心的严重现象，真正扭转过来。三是我协助德生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具体工作。德生还说 he 已和习仲勋同志交换意见，仲勋

表示同意。在德生的这番盛意感召和精心安排下，我同意了走这个出路。我于9月30日回到北京家中，国庆节假后即上班。12月和曾一凡、卢郁文等同志一道去河南、安徽、广东等省区参观访问，到南宁参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全区秘书工作会议，之后回北京。

1959年春节前，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宣布了同意我回陕西工作的事。总理讲：常黎夫同志因病需要继续疗养，调换一下工作，这样也好，只是仲勋同志少了一个得力助手。总理风趣地说：“红墙里”的水土硬，齐燕铭同志病了，接着常黎夫同志也病了。大家都应当注意，会工作还要会休息才行。总理说：陕西的“元老”本来就多，黎夫同志回去又增加一个。“元老”多也好，“老马识途”嘛！这样一件小事，总理语重心长，慰勉有加，谈笑风生，使人感奋不已，铭刻在心。

1959年3月我回到陕西，在德生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体贴照顾和帮助指导下，三年期间给予我很好的疗养条件，身体逐渐明显改善。同时，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业务范围内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受到实际锻炼。例如：我回陕西不久，4月间叶剑英同志来西安，德生要我陪叶帅去延安，借机聆听叶帅的指示意见，解决好设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指导思想方针问题。归来后我向省委做了汇报，并拟定书面计划，向各方面征求意见，修改定稿付诸实施。随后国家计委、科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来陕视察工作，因我与这些同志比较相熟，德生要我陪同他们到宝鸡峡水利工程工地、渭南双王大队张秋香植棉组等基层实际考察，请求他们在技术、物资、资金上给予指导和解决。同时，我自己也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学习了一些业务知识，成为后来到农村蹲点调查研究的组成部分。10月间，省上召开养猪会议，德生和省委决定由我主持。会前我做了些调查研



究，会上我提出实行“私养和公养同时并举”的方针。但当我要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有的同志反映，这样提法会体现这次会议的精神是“私养比公养好，小养比大养好”。经同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认为还是以“稳妥”为宜，便把会议总结稿中的“私养和公养同时并举”，改为“公养和私养同时并举”。不久，中央开会根据陈云同志在上海调查提出的意见决定，发展养猪必须贯彻“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大家的心里这才踏实了。由此可见当时宁“左”勿“右”，只唯上而不敢唯实的思想状态的一斑。

1960年全国遭灾，陕西也莫能例外，其中安康地区在1959年冬就发现个别社队不正常死人的现象。我受省委之托于春节过后即赴安康实地检查，问题确实，而基层干部思想麻痹，掩盖真情。省委闻讯，立刻动员，全力支援，开仓散粮。省上的大批干部包括省、厅局级领导干部下到安康的重灾区。汉中地区昼夜为安康加工粮食，保证及时供应。经过近半年的奋斗，将近10万群众从“浮肿”、“干瘦”病威胁的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在此半年多时间里，我主要往来于西安和安康地区。在这次严重的灾害中，陕西也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的。但由于德生和省委还是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所以相较之下，我们遭受的损失是轻得多了。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地决定撤走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这时省委和德生要我去搞在陕的苏联专家撤退的工作，因为陕西有苏联专家的企业单位较多，有些工作事务需要相互联系，加以协调。

政协的办公用房，在当时称为一流的西京招待所原址。恢复机关办事制度，特别注意恢复和加强非党人士和党员领导干部一起学习的优良传统。对于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形成的悬而未结的问题，“先复交再复查”，让他们参加一些活动。彼此在

交往中消除隔阂，逐渐沟通思想，统一认识。1959年7月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在西安举行时，工作基本恢复正常。在此期间还召开了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和宗教工作会议，纠正了一些“左”的偏向，制止了一些地方违背宗教政策的错误活动。1962年2月，我离开了省政协。只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西北局和省委决定仍由我主管，至“文化大革命”中停止。

德生十分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以省委常委的班子为例，赵守一、严克伦同志于1958年就进入省委书记处为候补书记，1960年一次就提任赵守一、严克伦、李启明、谢怀德、杨拯民等同志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对此德生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取得众多老同志的理解和支持才通过的。德生不仅完全同情和支持我坚决不进省委书记处的态度、主张，而且委托我和李合邦同志谈心，由合邦主动退出书记处，同我一起做常委。这就是当时省委设“专职常委”的由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正式成立，刘澜涛同志任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我向他们两位提出请求，批准我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他们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我提出用三年至五年时间，在榆林、延安两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陕北的粮食问题。1960年底，抽调地县级和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近20人，集体学习有关文件，拟定调查工作计划，1961年2、3月间下到基层。我们首先在榆林丘陵沟壑地区选定米脂县的高西沟、姜家新庄、白家峪三个大队，做蹲点调查，三个大队中又以高西沟为重点。我们驻队两个多月，不离队，不下山的深入调查，摸清了三个大队的真实情况。先后向省委报送了《高西沟生产大队阶级关系情况的调查》、《高西沟大队干部党员思想作风问题的调查》、《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情况的调查》、《高西沟、

要兴庄、白家峪三个生产大队收入分配情况的调查》等材料。接着分出部分同志去风沙干旱地区的定边县，对砖井公社西高圈、焦湾、北李圈三个生产大队的粮食生产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省委于1961年11月30日批转了我们写的调查报告。省委树立了高西沟治山造田造林，保持水土的典型旗帜，肯定了他们种粮、植树（苹果）、饲养“三三制”种植规划。回顾此次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主要是依照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依据的。指示信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投入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等，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十二条》对于我们的蹲点调查研究工作给予了有利的条件，没有走大的弯路。按我原来打算，下半年将蹲点调查扩大到延安地区，并继续在沿河川道地区选点进行调查。没有料到西北局统战部和民族工作委员会于1961年成立，因当时民族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比较多，特别是甘青藏族地区有些矛盾突出，刘澜涛和张德生同志认为需要我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也对我说：“你该下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在陕北农村的调查工作，不得不半途停止。

1962年春，我奉调西北局任统战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此后的相近五年里，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甘青的藏族地区。由调查和调解草原纠纷，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开展牧区社教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从实际情况来说，我是在范围较前广大的地域继续搞调查研究工作。学到了一些新东西，身体也逐渐得到一些锻炼和好转。

1964年8月的一天，我从青海海南、甘肃夏河检查牧区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刚回到兰州，突然接到西北局的电话，说德生身患癌症，手术失败，医药罔效，不日从京回陕。噩耗传来，如同晴天霹雳，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于8月底赶回西安。9月2日，德生搭乘飞机返西安，我去机场迎接。他情态自若，走下飞机，住进省人民医院（不久为医疗方便，移住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次日，德生邀我到医院会面。他沉着镇静，促膝谈心，安详如常。对我详细讲述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北京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和谈话内容，他对中央给他的一生评价，十分欣慰，十分感激。他说中央要他自己决定在北京还是在西安继续疗养，他决定回来一下。把工作上的有些事给赵守一同志交代一下，把个人家庭中的两件事也处理一下。德生讲：“西北局提出由王甫、赵守一和王文组成抢救小组，支持协同医生继续治疗，王甫、守一工作很忙，王文此刻自顾不暇，没有主意。1930年你把我从狱中抢救出来，这次再帮我一把，向癌症作斗争，当做一次科学研究实验去做，争取半年时间（北京诊断只有两月时间），把西安医学界对癌症的重视和医疗技术工作及医疗条件促进一步，这就算是我对人民最后的一点贡献。”德生还说，他向西北局提出的建议已获同意，请我代替王文参加抢救小组。他娓娓而谈，肝胆相照，促人酸鼻，触及肺腑，我只能表示满足他的要求，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不至辜负40年战友的深情厚谊，从此我挑起了抢救小组的工作担子，邀请并依靠内科专家牟善初（时任第四军医大学内科主任）、外科专家刘绍浩（时任西医一附院外科主任）组成精干的工作班子。牟主任除每周回医院一两次照料一下本职工作外，平时日夜住在西医一附院外科（病人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苦熬数月，终于争得了延长德生生命半年多的预期目的。1979年，牟善初陪同叶剑英同志来西安，我特意看望了牟善初同志（时任北京301医院副院长，主管中央主

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我问他现在搞的保健工作，比之我们当年合作抢救张德生的工作情况如何，牟答：技术、药物方面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医护方面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比过去就差多了，我们在医德、医风方面有许多优良传统被丢掉了，实在焦心忧虑。牟善初同志的一席话，激发了我对抢救德生工作的回忆和思念，深深感到其中有许多经验是可贵的，有责任记述下来，供后人参考研究。所以我根据我当时写的《抢救张德生同志工作总结汇报》中的四点体会，略加改动，记述如下。

（一）明确的任务和方针。把抢救德生的工作作为一次科学实验的具体战斗，依靠科学斗争，尽力抢救张德生，通过抢救德生的实践，积累经验，为千千万万肿瘤病人服务。采取“不空不乱，积极稳进，延长病人生命，减少病人痛苦”的方针。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有计划地学习有关著作，不断地克服对晚期肿瘤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和在医疗技术措施上的保守思想，也随时注意防止“病急乱投药”和某些简单、急躁的思想倾向。在每次出现并发症的危急关头，都是冲破“常规”，集思广益，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挽救了危局，特别是德生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同疾病作斗争的顽强精神，是积极推动抢救工作的重要因素。德生在病中一直坚毅镇定，谈笑自若，对每次手术总是表示“只要对科学实验有价值就做，个人安危是次要的”。在临上手术台前还向医生说“祝你们手术成功”，给大家“鼓劲”。德生的革命战斗精神给了所有工作人员很大的教育和深刻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广为介绍和学习的。

（二）搞好协作，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外地和本地医院结合得好，专家、病人、家属结合得好，西医、中医结合得好，西医各有关科室结合得好，这是抢救工作做到“不空不乱”，“不悔不怨”的重要保证。当每次并发症将要出现的紧急关头，我们总是力争主动，



及早组织西安有关专家并联系北京有关专家，广泛进行研究讨论，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征询各种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展开争辩，尊重老专家的经验，支持青年医师大胆试验，重视少数人以至个人的不同意见，经过充分研究，作出各种方案，权衡利弊，采用使用。

（三）遵循“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肿瘤广泛扩散，病情复杂多变，肠道多处梗阻，各种并发症随时可能出现，抢救工作时时处在各种矛盾困困的被动状态中。因此，必须经常注意在多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抓不准抓得慢了都不行。抑制癌细胞的药物，不论西药、中药、化疗、放疗，几乎无例外地对病人的机体有一定的副作用，应用不得当，不适时，就会得不偿失，甚至引起恶果。特别是在德生这个晚期癌肿病人身上，每次外科手术，需要和可能都存在强烈的矛盾，常有很大危险，必须注意把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反对消极“放弃”态度，又要防止盲目蛮干。几次外科手术我们都采取“准备几手”，“留有余地”，能进能退，稳步前进的办法。其他药物应用和治疗措施，也都是经过反复实验，随时调剂，处处要求合乎“积极稳进”的原则。

（四）技术要求过得硬，作风要求高水平。参加这次抢救工作的几个医院的有关科室都对自己的业务有严格要求，在许多工作的细致环节上练了基本功，能够过得硬。

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特别是经验不足，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难胜任。德生在病中曾经讲过：“现阶段我们对肿瘤的战斗有胜有负，负多于胜，但是只要我们在科学实验中大胆想，大胆干，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我们对肿瘤的战斗一定会获全胜。”怀念先烈，遗言在耳。片言万代，永垂不朽。

## 高尚品德 为人楷模

德生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少吃缺穿，饥寒交迫，深知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厌恶以财富、权势区分人们贵贱的世道。后来，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地苦读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对人剥削人、不公不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了切肤之感，清楚认识，毅然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他参加革命后，母亲因他被国民党政府捕押而忧郁致病中年早亡；他被迫离开家乡后，父亲因不堪反动当局的剥削压迫，生计日益艰难，精神失常，投水缸自尽身亡。不久，他家仅有的几间小平房被日本飞机炸成一堆瓦砾。人亡家破，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剩下的家人不得不飘零四方，投亲靠友，苦度岁月。直到新中国建立，组织上才找到他们，分别安置或入学，或工作。现在，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才，一个个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德生同志为家庭的凄惨遭遇，精神上受到极为沉重的压抑和痛楚。但是，他毕竟是经受过大革命洗礼，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在革命实践的磨炼中，理论修养日益成熟，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韧不拔，义无反顾，“大难不乱，临危不惧”，“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默默无闻，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党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

德生同志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组织工作实质是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做人的工作。长期的组织工作，养成了他重德务实，讲政治抓政治，从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政治上关心他人。他以身作

则，廉洁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要求别人不能做的首先自己不去做，不以己之昏昏而要求他人之昭昭。他自觉地服从党的组织原则，严格地执行党的组织纪律，谨言洁行，老诚笃厚，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管干部任人唯贤，无亲疏之别，无地域之分，公道、正直、无私。他对人以诚相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一旦发现自己做错了，开诚布公承认错误，既不谄过于下，也不推责于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而不谄，廉而不骄，直而不偏，威而不猛”。对于来自同志中间的批评，即使有过分之处甚至不真实的指责，他总是深刻自省，决不斤斤计较或立即辩解。用古人的话说是“持己当从无过中找过”。下级干部工作中有了失误，他尽力为他们承担责任，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团结起来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他自觉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有不同意见的重大问题，从不轻易付之表决，而是反复商量，交换意见，以求得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和行动上的自觉一致。

德生同志是一位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1941年党中央在把中共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任命高岗为西北局书记之前，曾在一些同志中征求对高岗的意见，德生同志毫无忌讳地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对高岗的意见，包括高岗在历史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胸怀。1942年后半年，党中央酝酿调整陕甘宁边区分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拟将德生同志从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分区，征求德生的意见。德生认为，绥德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北线，与同边区保持友好关系的邓宝珊防区接壤，分区辖区内又长期为警备区，无论分区外和分区内，情况复杂，尤其是统战工作，工作量大，任务较为艰巨，自认对待这个任务自己不如习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去绥德比他去合适。后来中央把仲勋同志从西北局党校校长的

岗位上调到绥德去作地委书记兼警备区司令部的政治委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他看到中央提的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立即提出他同原在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工作过的另两位陕西籍同志比较，以这两位同志作候补中委为宜，要求不要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当选为候补中委后多次对我说过，就像毛主席说过的，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不一定都比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强，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不一定都比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差，德生同志说，他在不少方面就不如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

1954年西北大区机构撤销前，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马明方同志对我说过，年前他同德生同志去过一次榆林，他看德生最大的特点是“素质好，杂质少，纯朴忠厚，一个面孔，一个心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中央拟调潘自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不管从哪一方面看，德生是接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明方同志所说的“杂质”，是指私心杂念。“素质好，杂质少”，是对德生同志思想品德的中肯评价，几十年了，我没有忘记这句名言。

德生同志病逝后，王文同志要我给他们的儿女们讲几句话。我说：“德生在重病弥留之际，多次说他是‘无产者而来，无产者而去’，‘是从北京载誉而归’，‘在西安告别家乡含笑而去’。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写照，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实践，我认为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革命的老实人’。这是他给孩子留下的无价的精神财富，可以作为你家的传家宝，是够孩子们一辈子学习和受用的。”

古人云：“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色。”记得鲁迅先生曾在谈论革命烈士时也讲过，他们内心有理想之光，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到底，永不动摇，两袖清风不改样的

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我们纪念张德生同志，就要学习他“坚不可摧，色不可夺”，真正共产党人内心的理想之光，革命到底永不动摇，两袖清风永不改样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德生一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他的高尚品德堪称楷模，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

1995年3月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张德生》)

## 营救张德生同志出狱

杜芳铭<sup>①</sup>

1929年春，我就读于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结识了在榆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张德生。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我是女师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张德生当时在榆林高小任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领导人，我们常到他的家里开会，他给我们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指导我们从事革命活动。后由于榆林中学搞学潮，被反动当局停办，许多革命青年不得不离开榆林，张德生在榆林也站不住脚了，去府谷县高小学校任教，并请我一起去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我们女师支援榆中学潮，在暑假里，我也接到校方“浮幼喜事，飭令退学”的通知书。可我开学后还是去学校报到，拿着勒令退学的通知书，周

<sup>①</sup> 杜芳铭，即杜凤。——编者注

问校长李正斋：“凭什么要开除我？”校长没有证据，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你既然回来了就继续读下去吧。”1930年5月，榆林各校掀起了“红五月运动”，我们参加了社会各界的群众大会及游行，深入到街头和居民中进行宣传活动。我们的行动震动了反动当局，也激怒了女师校长，他请他的老师、我入学时的担保人、社会名流郭长城先生劝我离开女师。我被迫于1930年秋转入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就读。这里也是个具有革命运动传统的学校，我每周都和同学们上街或下乡进行宣传，每月在校内为群众演一次自编的新剧，备受当地乡亲们的好评。

1930年10月初，张德生从府谷来绥德参加党组织召开的会议，会前到绥师看望了我。不幸会议结束后，张德生、刘澜涛被反动当局逮捕。当天夜里，常应黎（常黎夫）来对我说：“张德生、刘澜涛被捕，敌人审讯时，刘澜涛说他是绥师职员，可能好过关，敌人问张德生来绥德干什么？张德生说他是来绥德看望女朋友。”常应黎要我按张德生的口供，扮作张的女朋友出面营救。我便每周去监狱探望一次张德生，每次都送些吃的，有时也送个绣花枕头或毛衣之类的礼物，当着敌人的面说一些热情的话以迷惑敌人。我每周还要给狱中的张德生写一封情义深切、关怀慰藉的“情书”。我当时不会写情书，就在街上买了一本《情书一束》的小册子，摘抄一些寄到狱中。敌人将这些“情书”审查后误以为我们真是相知相爱的情人，加之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扣押张德生的证据，又有组织及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营救，只好将张德生无罪释放。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有许多革命志士被捕被杀，为了保存实力，朋友们商量决定疏散当时进步活动较出名的人，我为了完成学业，亦于1932年春到山西汾阳铭义中学读书。在此之前，我曾接到过张德生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继续在府谷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我也已转入高一级的

进步团体，从事革命活动。

此后，我和张德生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在土改时先后丢失。

1963年我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在西安见到了张德生。他那时已患有重病，见了我很高兴，让我把自己的斗争经历写出来以教育后人，我答应了他，并说将来写出之后送请他修改，他也欣然应允。可惜1963年他却离我们而去，成为终生憾事，今写此短文以示对他的纪念。

1994年10月10日

（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张德生》）

## 怀念唐洪澄同志

马文瑞 刘景范 张方海

今年7月12日，是唐洪澄同志80诞辰。我们追思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老战友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以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

洪澄同志早在60年前就投身了革命。1927年7月，正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党的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中共甘肃定西、天水地委书记，陕西

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并当选为党的七大和八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因长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积劳成疾，1959年，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到北京住院治疗。不幸于1960年3月11日病逝，时年仅51岁。

洪澄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8年了。但是，每当回想起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居职清廉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在当前全党坚持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学习他的崇高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 (一)

洪澄同志早年就在陕北进行革命斗争。他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的陕北绥（德）清（涧）苏区创始人之一。

1908年7月12日，洪澄同志出生在陕西清涧县大马家山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2岁时靠借贷在花岗岩寺小学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苦读勤学，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要用手在腿上将生字默写一遍，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1927年初，洪澄同志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当时在校的很多师生是党、团员。他受到了党的教育，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读物，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宣传革命，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正当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陕北军阀井岳秀封闭了这所学校，他也被迫在7月暑假返回家乡。不久，由党员韩尚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

此后，洪澄同志在家乡一面以当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一面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活动在绥德、清涧一带，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



装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机智地奋战了六个春秋，直到1934年创建这块苏区。

在此期间，他两次领导清涧地区的抗粮抗税运动。一次在1928年，当时陕北大旱，农村粮食颗粒无收，贫困人民饥寒交迫。经过洪澄同志的秘密串联，到第二年春季，在“不纳粮，不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的鼓舞下，上万群众参加了抗粮斗争，吓得反动军警紧闭县城门，不敢下乡催粮收款。后来敌人进行疯狂的镇压，得知他是组织发动者，便到家中抓捕。他隐蔽逃脱了，可他的堂兄却被敌人抓走。在组织的营救下，变卖了家产和借款，凑足了1400元大洋，才赎了回来。第二次是在1933年春，他和李景林、贺生荣、黄山石等再次发动清涧地区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愤怒的群众曾将县城包围，迫使敌人低头谈判，每斗粮减免税款一元。斗争刚结束，狡猾的敌人派一连队伍来抓捕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幸免于难。

在此期间，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建立起党支部。由于敌人的破坏，1931年清涧县党的组织与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系。他领导的党支部主动与绥德县南区区委接上了关系，党的活动从未间断，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一直到1934年春重建清涧县委。这期间他引导一批青年参加了革命，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至今，陕北的一些老同志仍然赞誉他为“革命的引路人”。

他还积极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33年春，他和白如冰、王聚德同志弄到三支驳壳枪，以这为基础，搞起了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7月下旬，他以清涧代表身份，参加了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陕北革命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洪澄同志坚决

贯彻执行了特委的决定，并在清涧县无定河畔的石砭上，召开绥清中心区委扩大会议，做了具体的组织部署。此后，革命的武装力量逐渐壮大，终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那一年的古历十二月初七，在解家沟镇杀了反动劣绅、衙役九个半（一个未杀死，故称半个），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威震陕北。第二年，他领导打店子沟反动民团的斗争，动员了20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缴获了敌人十多条枪，为根据地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2月，清涧县东区成立区委，他任区委书记。4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清涧县在周家山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县委组织部长并实际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书记是一位工人同志）。会后，各区、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支队不久也扩编为红二团，绥清这块根据地逐步扩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歌曲响遍山野，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和葭县、吴堡等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陕北苏区建立较早、基础较好的根据地之一。彭德怀同志当年率领红军东征路过清涧时，高兴地称赞说“清涧不亚于江西的兴国”。

## （二）

洪澄同志大半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他为人正派，居职清廉，是坚持党性原则的表率，团结干部的典范。

1934年底，洪澄同志离开清涧到安定县任县委书记，后到秀延县任组织部长。（书记是一位雇农，没有文化，实际领导工作仍然是他）1935年6月离开陕北到关中特委任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当年10月，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洪澄同志从关中特委回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那时，党中央

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 7000 人，这是陕北省委光荣而艰巨的头等任务。陕北地广人稀，要扩大这么多的红军，困难是很大的。洪澄同志积极主动地参加，搞了两个多月的扩红领导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接着到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西省党校校长，培训党的新老干部。这为他后来做组织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7 年 4 月，他被派往神府特委任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时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然不大，但这个地方很艰苦，也是个很重要的地区，是抗日前哨，要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去工作。”洪澄同志受命于此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不愧是毛主席说的那样一位优秀、得力的领导干部。

1934 年到 1937 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洪澄同志七易其职，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战斗，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毫无怨言难色，为广大干部作出了好榜样。

1938 年 2 月，洪澄同志调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干部科科长、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主管干部工作近十年，直到 1947 年冬。他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培训，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领导的赞许。1946 年 4 月 13 日，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洪澄同志做了《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加强团结；要是非分明，不能随风飘；不搞团团伙伙，更不能有害人之心。

洪澄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干部做到的，先带头做到。在延安时期他的住所经常是干部出人的地方。从非党干部到党员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他都一律热情相待。专员、县长、书记来开会，常和他促膝谈心，不论受表扬的同志，还是犯错误、受委屈的同志，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谈心，领受教诲。他总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诚地帮助每一个同志。他特别重视陕北干部的教育工作，鼓励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学习外地干部的长处。他还在民政厅亲自主持了四期长短期训练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至今，他的优秀品质还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陕北的老同志所称道，说他为人正派，心地纯洁，无私无畏，是一位胸怀开阔、宽宏大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老唐”。

洪澄同志既能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又能委曲求全，照顾大局。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处分时，仍能按照党性原则努力工作。1947年底，西北局义合会议后，洪澄同志背着错误的处分，积极地投入土改工作。他被派往安塞、子洲去搞土改，担任工作团团长。当时，有些分团在工作上出了“左”的偏差，他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政策，主动予以纠正，并不逢迎某些领导同志“左”的思想。工作结束时，他还亲自主持会议，给一位分团团长实事求是地做了鉴定，并亲笔写成，使这个干部深受感动。至今，这份鉴定还珍藏在这位同志手中。

### （三）

洪澄同志一直在领导岗位上，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是我们效法的楷模。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洪澄同志与敌人周旋，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出去活动，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成年累月不脱衣服和鞋袜睡觉，练就了一身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边区大生产运动，和民政厅的同志一起，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种了20亩地，还办起了一个农场，自己动手，种粮食，纺线，打窑洞，度过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

1949年全国解放后，洪澄同志到新区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山西省晋南新绛地委副书记，甘肃省定西和天水地委书记。1955年他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身居高位，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殊待遇，平易近人，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和“老红军”的作风。他经常深入第一线作调查研究，1958年前后，他四次去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为培养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同志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他十分反对唱高调，订高计划，搞高征购。他亲自召开老农座谈会，让王保京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小麦增产计划订在可靠的基础上。第二年，丰产试验田没有完成计划，洪澄同志又去帮助总结经验，鼓励群众不要泄气，并请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讲师指导他们。至今，王保京同志对他的帮助还铭记在心。洪澄同志每次下乡，都吃住在农民家，同群众亲切交谈，以掌握第一手材料。这种深入实际、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令人叹服。

洪澄同志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告诫他们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不能靠父母的资格和地位。在延安时，寒冬腊月，孩子没有袜子穿，他不许公家特供，由自己亲自针织。他一家五口人，住一孔窑洞，吃大灶饭，从不搞特殊。洪澄同志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唯一遗训是，要永远听党的话。他身后的丧葬一切从简，听从组织安排，不要提任何要求。

洪澄同志的一生，正如当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安灵时，中共陕西省委送的挽联上写的：“献身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功绩永垂不朽；对党无限忠贞终生不渝品德堪为楷模。”

洪澄同志一生的光辉风范必将长垂青史！

（原载198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 怀念唐洪澄同志

张晓明

唐洪澄同志逝世已经35年了，他的革命事迹和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心中。

洪澄同志是清涧县人。他本姓贺，名生春。为秘密工作改了姓名，后来大家熟悉了，就这样叫下去。他是西北一位有名的老同志，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党的各级领导，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洪澄同志早期参加革命，经历了出生入死的艰苦战斗洗礼，他的经验很丰富。在他领导下，成功地开创了绥（德）清（涧）地区根据地工作，为创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一提起“老唐”来，可以说无不起敬赞扬。

我对洪澄同志是敬重的。在和他一起工作中，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35年洪澄同志在中共秀延县任组织部长时，我任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那时的县委书记是雇农出身的李光旺同志（以后叫李子厚），由于他的水平低，县委的大量工作就落在了洪澄同志身上。他考虑问题很周密细致，对工作抓得很紧，敢于负责，对发展秀延地区作出了贡献。他对县委工作兢兢业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立场很坚定，组织观念很强。他虽然实际全面负责县委工作，但他对光旺同志仍非常尊重，全县的大事都同光旺同志商量后处理。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出身的同志是多么重视和尊重。那时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出身的，只要把农民出身的干部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工作

就会顺利地开展。此外,他对青年干部也非常关怀,经常抽时间和一些青年同志谈心。我当时只是18岁的青年团员,他以老大哥对小弟弟一样的关怀,多次谈心、开导,讲自己的革命经历,讲革命道理和工作方法,讲学习等问题,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同年6月组织调他去关中工作时,人们对他十分留恋。

1937年他任神(木)府(谷)特委组织部长时,正好我比他先去两个月,任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互相了解,所以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合作得非常密切自然。他平易近人,每到一地和当地干部团结得很好,和军队干部关系也很快密切起来。人们有意见愿向他反映,有问题愿同他商量。“七七”抗战开始,我被组织调回延安另行分配工作,总觉得同洪澄同志一起工作时间太短了,感到很遗憾。

我在三边工作的三年期间和在中央党校学习与工作期间,总是把洪澄同志所在的西北局组织部和边区政府民政厅看成干部之家,常来常往。有时谈谈学习与工作,有时议论议论别的问题。遇有星期天“改善”生活,觉得很随便,毫不拘束。

全国解放后,1955年冬我因病去陕西汤峪疗养,正好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洪澄同志也在那里疗养,我们又一次相聚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互相介绍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也谈及一些当时的工作问题,可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同吃同谈同玩,心情很舒畅。之后,我又远在东北工作,同他就很少见面了。但相互音讯不断,思念牵挂之情依然如故。

洪澄同志一贯坚持原则、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作风正派,能团结干部、联系群众,对党忠贞不渝,对己艰苦朴素。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原载《陕西日报》1995年5月10日第二版)

## 我的读书求学经历

马文瑞

我开始读书，其实还不是在学校，而是自学。我的两个哥哥都会念过书，祖父、叔父也识字，所以小时候首先由他们教我识字。七八岁独自在山里放羊的时候，我就看两个哥哥用过的旧书。先念《三字经》、《百家姓》，随后又看《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等到开始报名上学时，我已经是粗通文字了。

1921年，也就是我9岁那年，阳湾村附近的马家坪办起一所小学。在祖父和大哥的说服下，父亲终于同意送我到学校去念书，后来又转到吴家场小学念书。那时虽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提倡学习新文化、新思想，但因陕北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消息闭塞，加之我所上的学校又在更为偏僻的乡下，学校教学仍沿用陈旧落后的方法，生吞活剥，死记硬背，先生动不动还体罚学生。我开始念书的时候，已经有些志向。因为家穷，能供我念书很不容易，所以家里人都叮咛我要好好念。另外，有人认为我虽自小没了母亲，却是祖母娇惯大的孩子，一定吃不下苦，书必定念不好。这些都激发了我的求学信心。我暗暗下决心要争这口气，读书特别用功，考试常常名列第一，练毛笔字也很认真。记得当时家里没钱买那么多麻纸供我练字，我就用手指在小书桌上练。后来又做了个木盘，里面铺上沙子，每天放学后就用手指在沙盘里反复练习写字。这样，天长日久，手指上也磨出了茧子。由于勤学苦练，我习字长进较快，时常受到先生夸奖。

1925年，我由吴家场初小考入周家硷高等小学。那时候的高小



学生年龄都比较大，我在学生中还算年龄较小的。开始到该校时，城镇有钱人家的学生见我们山沟里来的学生穿得不好，土里土气，就瞧不起，有的还故意欺负。后来见我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公认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才不敢欺负我了。

在周家硷高小上学期间，离我家较近的冯家渠也办起一所高小，在那里我还上过半年学。后来觉得冯家渠高小的教学质量不行，就又转回周家硷高小。

1927年暑期，我高小毕业，就去投考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绥师办了个讲习班，由高级班学生讲课。讲革命理论，也讲文化知识。此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也于同年6月倒戈拥蒋。7月中，汪精卫政府步蒋介石后尘也叛变革命，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我进绥师讲习班学习不到一个月，盘踞在榆的军阀井岳秀也积极配合蒋、汪的反革命行动，在陕北发动了疯狂的“清党”运动。白色恐怖来了。绥德师范当时是陕北革命的大本营，校长、共产党员李子洲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他的职务由共产党员常汉三接任。学校有许多教师、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那里培养出来的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分布在陕北各地，办学讲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了不少党、团组织，影响很大。反动军阀井岳秀下令让解散绥德师范，妄图摧毁革命营垒。记得是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井岳秀部的旅长刘润民，带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伙同绥德县县长韩兆鹗前来解散绥师。他们一来，就包围了学校，朝天放枪，校园里乱作一团。学生没经验，吓得满院乱跑，有的还慌慌张张地烧书。他们下令让学生一个一个带上书走出教室接受检查，凡有“共和”字样的书都没收。“禁书”很快堆了一堆，又强令携带“禁书”者站到一旁，听刘润民训话。我当时拿两本书，里面免不了也有“共和”字样，也就听了一通训

话。记得他讲了一通反动的话，说什么“革命是胡闹”、“共产党是捣乱”等等。随后，将绥师强行封闭，教师学生被武装遣散；校长常汉三被限令三年不准任教、任职，不准离开绥德。与此同时，井岳秀还下令对延安四中、榆林中学进行“清洗”。结果，延安四中被关闭，党、团员多数被迫离开学校。榆中的一批进步学生也被清洗开除。在井岳秀发动的这次反革命“清党”运动中，陕北地区的党、团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在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党、团员革命意志动摇了，变得消沉下来，少数人甚至变节投敌，革命斗争转入低潮。陕北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过去后，反动势力更加嚣张，剩下为数不多的党员、团员，有的在本地待不住，就跑到外地躲起来，有的分散到乡下，隐蔽到农民中间。绥师解散后，没办法，我只好又回到周家硷高小上学。

1927年，米脂县创办了米脂县立中学，不久又改名为三民主义第二中学（榆林中学为三民一中）。这是米脂县的第一所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学校，设一班、二班、师范班和女子部。学校除在本县招生外，从1927年下半年起，也开始招收绥德、葭县（今佳县）、横山等县的学生。1928年春，我去投考三民二中。前去报考的有300多学生，只录取50名，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我们住在米脂街上一家小客店里，穿着土里土气，很不起眼。学校出榜以后，许多并不相识的学生都来看哪个是马文瑞。在三民二中我只读了半年，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这就是我早年的读书生活。1959年我出访苏联，《真理报》记者采访我时，问我上过大学没有，我说没上过旧中国的大学，但我上过我们党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高级党校。因此，我的读书求学，也应该包括以后的这两段学历。

（节选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文瑞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 二七年四师活动简况

关 中 哲

我是1927年2月经杨明轩介绍，由上海到四师，担任学校政治课（即科）主任，并兼任张达志所在班的国文，至同年7月被拘留、驱逐离校，为时不到半年。当时校长是常汉三，教务主任是罗瑞光。党组织担任书记的是蔡南轩（湖北人），组织委员是何寓础，宣传委员一职尚缺，后由关中哲充任（我到四师后）。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局势下，党只开秘密会三次。开会时共四人，除我们三个委员外，还有一名叫李仰旭的农民参加。党员会和团员会均未开过一次。当时党员约有十余人，大多是教职员；团员约三四十人，全是学生。团的负责人记得是赵仰普，他跟我往来较多，其他的大多不认识。当时党的活动全在校内。活动有：（1）用黑板报对学生时事介绍与形势分析教育；（2）组织学生举行讨论与辩论会；（3）举办“农民暑期讲习会”，决定由蔡南轩、关中哲、雷五斋、赵少西和韩卓儒等五人组成筹备会，并拟定了具体计划。

## 戎马一生 风范长存

——深切怀念张达志同志

刘澜涛 马文瑞 张秀山 高克林 贺晋年 王世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军委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这些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就和他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志，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

张达志同志 1926 年参加革命活动，1927 年 3 月加入共青团，1929 年 2 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建国后，1955 年 4 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兼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9 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八、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还担任过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等重要职务。

###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

张达志同志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对党忠贞赤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执著追求。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政委，和团长孙超群同志带领部队挺进山西、綏远（现内蒙古）两省交界的长城内外抗击日寇。1940 年 5 月，他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

任。大青山是个战略要地，日军侵占后，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安全。1941年他亲自组织力量开辟了绥东地区的工作，发展壮大大青山根据地，形成了大青山、蜜汉山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大好局面，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对日寇是个巨大威胁。1942年7月，驻内蒙古的日军集中2.5万余人的摩托化步兵，骑兵，炮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倚仗军事上的优势，兵分五路首先向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绥中腹地压来。此刻，姚司令员正在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反“扫荡”的重任全部落在达志同志的身上。面对来势凶猛十倍于我的敌人，他既不惊慌失措，又不麻痹轻敌，沉着冷静，认真对待。带领骑兵支队直属部队和骑兵二团与“扫荡”的敌人巧妙地“捉迷藏”，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穿插隐蔽。这时，我部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人困马乏得不到休息，指战员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凉水。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以致电台无法架线工作，达志同志曾一度失去了与晋绥首长的联系，一切都得由他自己独自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吃不下睡不着，忧心如焚。当分进合击的敌人将包围圈步步紧缩，即将陷我军于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他凭借熟悉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选择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果断地率领部队从两股敌人的阵地间隙突出重围，转移到绥南地区，与骑兵一团会合在一起。敌人获悉我军突围后，马上尾追而来。达志同志率领我军避敌锋芒，转到敌人侧翼，抓住战机或袭扰或歼灭，拖得敌人疲于奔命，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大青山党政军机关的梦想，成功地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受到晋绥军区的通令嘉奖。

达志同志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讲党性，顾大局，执行党的指示从不打折扣。1947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委

习仲勋同志为了解决西北野战军生活物资困难，任命张达志同志为西北五省游击司令员，到关中、晋南一带执行筹集资金的特殊任务。他率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一方面自筹资金，一方面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开展活动，先后筹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受到贺龙、习仲勋同志的称赞。

##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和政治工作本领

张达志同志是一位骁勇的战将，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达志同志主动要求到前线抗日。毛泽东同志批准了他的请求，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与他谈话，鼓励他到前线英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写了委任状。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达志一行十余人又见到周恩来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同志与他进行了亲切谈话，并叮嘱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当时很缺的奎宁药水，治愈他的疟疾。这使他感佩不已，终身不忘。达志一行在神池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见到贺龙师长。当贺龙同志得知他得了疟疾不能骑马，特地准备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警备六团。

达志同志带领的部队特别能战斗，这与他治军严格、注重抓部队建设是分不开的。在部队建设中，他特别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杀敌本领。1945年他参加党的七大后，牢记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方针，为做好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及时地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克服盲目乐观、和平麻痹思想，以增强革命斗志；

同时突出抓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绥包、集宁、晋中、太原、兰州等许多重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革命战争年代，达志同志长期担任我军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很重视加强部队政治建设。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政治工作原则，对部队不间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激发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大力抓部队党组织建设，特别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各方面纪律，充分发扬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最可贵的是，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德来影响指战员。从解放战争开始，他一直担任我军部队军事主官，职务变了，但重视政治工作、亲自抓政治工作的作风没有变。

## 崇高的革命风范

张达志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错误的东西总是刚直不阿，坚决斗争。1935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陕北进行了一场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领导同志。达志、晋年同志虽未入狱，但已被列入被捕的黑名单。达志同志已被剥夺带兵的权利，改任红十五军团民运部长职务。他对“左”的错误非常气愤，向党组织写信反映，并要求调动工作。当周恩来同志到部队找他谈话时，他感到有希望了，毫无顾虑地向周副主席倾诉了“左”的错误在陕北的危害，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当从周副主席谈话中得知党中央已纠正这一错误时，他欢欣鼓舞，异常

激动地表示：“党中央来到陕北，挽救了西北红军和苏区，我一定干好民运工作。”在整个“文革”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力地保护了一批老同志。

达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情谊。部队一驻防，他利用一切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找老乡攀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对干部战士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现了一片深情。部队在行军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解放后，他虽然当了高级领导干部，但始终保持普通一兵本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吃的是西北老家饭，穿的是布衣微服，被西北人民誉为“布衣将军”。

（原载《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第五版）

## 二七年四师被查封的回忆

关中哲

1927年7月，快要放暑假的前夕，即7月间的一天中午<sup>①</sup>，学校中五六位教师应高伯定（他在北京上过学，与校内的教职员认识）之请，在他家（在四师近旁）吃饭。应邀参加者有校长常汉三，教务主任罗端先，教师蔡楠轩、关中哲、雷五斋、赵少西，还有韩卓儒（绥德县长）作陪。吃饭将罢，在大门外，窗口突然有士兵向屋

<sup>①</sup> 此时间可能有误，多数记述为8月4日。——编者注



内窥探。一伪军官（后知叫刘润民）走进客厅，跟认识的韩卓儒、常汉三搞事寒暄，除将蔡楠轩、关中哲、雷五斋、赵少西四人拘留在室内以外，其余的人都让走了。那伪军官掏出伪省长宋哲元的一纸公文，对我们四人宣读了一遍。公文的主要意思是：将蔡楠轩、关中哲予以“正法”（即枪毙）。伪军官宣布之后，将我们四人拘留在高宅，他出去了。约两三小时后，他又来对我们说：“学校搜查过了，也没有什么，可是你们四人不能再在学校，要离开绥德。”说罢，让我们各回宿舍收拾行李。从此，我们同校内师生再未见面。第二天（或第三天）就离开了绥德。蔡楠轩一人去北京复学，我和雷、赵三人由山西公路回陕，途中遇见杨明轩（他只身离西安，要去四师），接谈后，四人一道回陕。

自被逐离绥德后，听说四师被查封，情况不得而知。

选自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4期）

## 回忆陕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情况

马文瑞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陕北就有党的组织、团的组织。大体是1923年开始有党员、团员，像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等。这些同志当时在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当教员、校长。他们是北京来的，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1924年开始在陕北发展团组织和党组织。先是

在绥师成立了绥德地委，活动主要在学校，负责人先后是田伯荫、蔡楠轩。以后榆林也成立了地委，书记是马云程。紧接着延安也成立了地委，负责人是田伯荫（由绥德调去）。王超北同志当时在延安四中当教员，也是地委负责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地委下面设有县委、区委，就是几个支部，直接由地委领导。革命活动是在1926年掀起高潮，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陕北没有什么产业工人，工人运动少，主要是搞农民运动。再就是组织学生会，搞学生运动。1926年我14周岁，上小学，那时叫高等小学，我是高年级学生，搞过学生运动，也搞过农民运动。因为当时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在学校，所以学生很吃得开，连当兵的也怕学生。老百姓说：“若要强，背钢枪；强上强，住学堂。”大革命时期，绥德一带到处成立农民协会，把土豪抓起来游街，政府也不敢干涉。“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陕北的革命组织仍在活动，因为那时冯玉祥还没有叛变。后来，冯玉祥叛变了，也开始反共，进行清党，陕北的反革命势力就嚣张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井岳秀派部队解散绥师。那个时候，我正在绥师补习功课，准备上绥师。我到绥师不几天，风声就不好了，接着敌人把学校包围了，强迫学生、教职员离开学校，在学校门口一个一个地搜查，还放空枪。学生们毁书籍，烧文件，乱成一团。那时校长是常汉三，他也是共产党员。包围绥师、勒逼解散绥师的，是井岳秀派来的一个旅长，叫刘润民。记得他讲了一通反动的话，说什么“革命是胡闹”、“共产党是捣乱”等等。绥师一解散，陕北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就过去了。反动势力更加嚣张，我们的党员、团员，有的躲不住了跑到外地，有的分散到乡下，有的消极不干了。这就是陕北革命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秘密活动即地下活动阶段。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后，直到1931年，这几年主要搞地下活动。原来陕北的

党、团组织在学校，以后逐步转入农村，在农村发展党、团员。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员大部分是学生、农民，工人中也有党、团员，但很少。如李仰旭，是绥德人，石匠，当时很红。霍维德是农民，曾在绥德师范做校役。高长久，葭县人，也是农民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党、团员就多了，党团组织发展很快。整个陕北党、团员约有三四千人。清涧、绥德、米脂、榆林、府谷等县，都有县委，延安等地有区委。我在绥德工作过，当时党、团员就有几百人，绥德县的东区、南区、北区、西区、中区都有区委。党的活动主要是发展党、团组织，做群众工作。1928年六大的主要精神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再就是过党、团生活，学习党团文件，提高党、团员对革命的认识，准备在条件成熟时搞武装斗争，建立我们自己的部队和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过曲折。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在陕北也搞过，但影响不是很大。那时有个口号叫“提拔暴徒、泼妇”。陕北的土话就是提拔“二杆子”。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有些地方还把这些发展到党里，后来纠正了。1930年6月11日的党中央决议，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内容，一来就是“左”的一套，提出要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把我们党团组织合并了，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那时我在安定任区委书记，做过行动委员会主任。可是当时无论是主观力量还是客观条件，都搞不起来。暴动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你没有这个基础怎么行！所以就到处写标语、散传单，内容是：“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杀尽土豪劣绅！”等等。这样一搞，党团组织就暴露了，负责同志也待不住了，受到很大损失。使陕北当时几乎没有了县委，只有区委。米脂、佳县、绥德就叫区委，由特委领导。刘澜涛、张德生同志在“立三路线”传达后不久被敌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都放出来了。被捕

的人不多，被杀的同志没有，整个组织被敌人破坏了很少。至于白乐亭（即白明善）是以后即1931年被敌人抓去，受绞刑牺牲的。党在秘密期间的活动，就是由城市转向农村，发展党、团组织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搞武装斗争。

第三阶段是搞武装斗争，发展游击队，搞游击武装活动，力量由小到大。陕北从1931年开始搞武装斗争，后来就成立了红军，创建苏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一直至中央红军到陕北。

1928年秋冬，我调到绥德工作，开始任西区团区委书记，分管西川周家硷、苗家坪一带团的组织。后来特委派白乐亭来做党的县委书记，他把我提拔为团县委书记。那时绥德、清涧、米脂、榆林等地都有县委。1929年春，白乐亭调去米脂工作，绥德县委书记换为周发源，我仍任团县委书记。周发源原在绥德一个商店以当掌柜作掩护，后来他真的当了老板，做了买卖。

那时绥德党团组织工作比较好，比较活跃。1928年下半年，党的县委书记是白乐亭，当时没有部，组织是周发源，宣传是赵通儒。团县委，我是书记，也是党县委常委。搞组织的是周自岐，搞宣传的是李景林。后来搞组织的是高纯实，搞宣传的是高植民。团县委就我们三个人，马明方当时是北区党的区委书记，他的社会职业是四十里铺小学教员。

1929年春，县委改组，白乐亭被派到米脂当县委书记，后来参加特委工作并在府谷也做过县委书记。赵通儒被派到清涧当县委书记，绥德的县委书记是周发源。延长曾经成立过区委，有个董耀卿，他是延长比较早的党员之一。

我们党、团县委在绥德领导过一次饥民斗争。民国十七、十八年（1928、1929年）农民本来受剥削就很厉害，生活困苦，又加上

两年的大旱，没有什么收成，不得不跑出去逃荒、要饭，自动组织起来吃大户。好多农民挑个担子，拖儿带女，跑到山西、宁夏等地逃荒要饭。于是，我们组织饥民进城向县政府要粮、要救济，向地主安文钦要粮。县委书记周发源对领导饥民斗争不积极，到山西做生意去了。我那时是县委常委，还有个宣传委员胡永华，是个农民同志。我和胡永华，还有团县委的一些同志一起开会研究了如何组织饥民进行斗争。确定在11月间，发动农民进城。党团组织下通知，还采用鸡毛传箭办法，到处传送和散发传单，发动几千饥民从南门、北门，西门，东门一起拥来。我负责县城指挥，党团员到饥民中活动。记得那时崔田夫是南区党的区委书记，他亲自带领农民进城来了。马明方是北区的区委书记，也发动农民进城来了，但他自己没进城来。农民都背着口袋，头绑“羊肚子”手巾，手里拿着农具，准备要粮。国民党把四个城门都关了，进不去，我们组织农民硬冲。我当时在南门跟前。国民党的军队（一个营）开了枪，但他们不敢向农民打，只是朝空中放。农民没有被他们吓住，冲进城了。那时，绥德师范的党、团员如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吴志洲、李光白等（李光白是绥德师范团委书记），化装成农民，到群众中进行工作。农民拥到国民党县政府里面，县长已经跑了。又到地主安文钦家里搞粮食，也没有弄到多少。以后农民到圪圪里打了鸡蛋厂。这是山西的一个资本家办的，向农民收鸡蛋，弄成粉，然后销外地。有百八十个手工工人，主要是童工。那时有个迷信说法，说鸡蛋厂敬的是“火神”，他们的大烟窑弄得天不下雨。因此把鸡蛋厂砸了。有的饥民吃鸡蛋粉吃得太多，结果胀死了。绥德打鸡蛋厂，并不是原来计划的，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弄到粮食才去的。后来我把同志们找到二郎山开会，有党永亮、李光白等参加。大家认为，按照党内文件，要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反对国民党，

推翻国民党。但是怎样搞没有经验，提不出具体办法。后来，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张建南和国民党的县长联系上了，要了一些白洋，站在南关搭起的台子上讲了一番话，给农民一人散了一块银圆，斗争有了结果，农民就都回去了。这个斗争是党领导的，团也起了很大作用。

（选自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第3期）

## 龙王斗县长

马仰西

1928年旱灾是陕北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造成人吃人、狗吃狗的悲惨景象。再加上军阀官府的苛捐杂税，比如什么烟亩捐、军饷捐、地亩捐、富户捐，以及屠宰税、牲畜税、架子税、烟筒税、羊圈税等等，其名目繁多，真是举不胜举。同时土豪劣绅又乘此机会，大肆敲诈勒索。因此，陕北群众就陷于天灾人祸的悲惨境地。

根据这种情况，绥德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利用封建迷信招牌，发动群众大搞“龙王运动”，借以反对贪官污吏，与旧势力作斗争。运动一开始，绥德城内的二郎庙、三官庙、西门娘娘庙、南关老爷庙各设一个雨坛，每坛设一座龙王楼，全城共有四座龙王楼，参加群众约有数百人。我和高承恩同学抬着二郎庙雨坛的一座龙王楼，这座龙王楼出马最早。我俩抬着龙王楼首先闯向劣绅马炽庵的金库“永泰祥”，接着又到“二城隍”安文钦住宅示威，让他知道人民群

众力量的伟大，最后才把龙王楼抬进县太爷的衙门，对敌伪政府进行了一场最尖锐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

当我同高承恩同学把龙王抬进衙门，走上了大堂时，县太爷威风凛凛地从二堂走出来，大发雷霆，说什么“胡闹”、“迷信”、“赶出去”、“押起来”……群众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为愤怒。我们抬着龙王楼直向县太爷闯去。狗腿子看见情况不妙，一个一个地溜走了，县太爷也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悄悄地溜进三堂。这时群情激昂，精神百倍。我和高承恩抬着龙王楼，紧跟着县太爷涌进二堂，冲进三堂，就把龙王楼放在县太爷的窑洞门口，堵住他的去路，防止他逃走躲藏。至此，县太爷不但不发威了，就是拉屎撒尿也不能出此窑门。情况虽然如此顺利，但是抬进衙门的龙王楼只有二郎庙的一座，力量是有些单薄，我们派了两位团员和几位积极分子，跑到大街上，跑到城门洞，迎接城外及四乡来的祈雨龙王楼和群众。当关外及四乡龙王楼抬进城门口时，被伪城门警挡住了，又引起了群众对伪军的抗议和愤恨。

那时，绥德城驻扎着井岳秀部队田润农和杨××两个营。田、杨两营长与县太爷有点不睦，暗中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尤其伪营长目睹群情沸腾，众志成城，县太爷又吓得心惊胆战，神魂颠倒，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并罚令阻挡龙王楼进城的士兵跪在城门洞，以示认罪。自此，四乡来的祈雨龙王楼浩浩荡荡，直奔衙门。一时，衙门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真是一场龙王大聚会，也是一场反贪官污吏富有政治性的群众大会师。在群众的威力下，县太爷无可奈何，不得不暂时掩藏起他那狰狞的面目，摆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假惺惺地低头赔罪。这时群众说：“把劣绅马炽庵拴在县衙门的石狮子上！”他答应说：“对！”群众说：“老天什么时候不下雨，什么时候不放马炽庵！”他答应说：“好！”群众齐声说：“开放富户

仓库，赈救饥民！”他满口答应，全都允诺，至此群众才提起有劲的脚跟，迈着所向无敌的步伐，将龙王楼抬出衙门。就在龙王楼未抬进衙门时，安文钦见风声不好，深知大祸来临，早从县太爷的后门溜出，飞也似的逃往山西躲难去了。只有马炽庵如瓮中之鳖，自知罪大恶极，若逃走了，又怕群众捣毁他的金库永泰祥。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不得已假装仁慈，做了许多饭菜，送往三官庙，邀请城里和四乡祈雨群众吃饭——每人蒸馍两个，还有米汤和黄瓜菜，让群众吃饱喝够。不但祈雨群众如此大吃大喝，就是非祈雨群众，只要找上一顶雨帽（柳条编的圆顶帽），也可以混进去吃一顿饱饭，真是新奇！

事后的伪县太爷和豪绅们深感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怒火冲天，唯恐再有不测灾难，为此，特制金匾“体恤民情”一只，响吹细打送给杨、田两个伪营长，挂在城内大街木牌坊上，乞其救助。虽然如此，但不久之后，又爆发了上万群众捣毁绥德鸡蛋厂的事件。

## 让革命的旗帜代代相传

——献给母校绥德师范六十周年校庆

白如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作为党的一名战士，做过党的秘密工作，经受了革命战争的考验，走过了民主革命的战斗里程，也度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但在任何时候，我都时刻怀念着母校——引导陕北广大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绥德师范（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天，当母校6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



向母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写下几句表达自己心情的话。

绥德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腥风血雨的旧世界，她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向黑暗势力冲杀的战斗堡垒，被人们称颂为陕北革命的摇篮。早在1924年，陕西著名共产党人李子洲同志就到四师任校长。他到职后，即聘请了王懋廷、杨明轩等同志到四师任教，使四师成为陕西早期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在李子洲、王懋廷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党、团组织。于1924年10月建立了共青团小组，冬天建立了共产党小组。1925年2月，建立了共青团特别支部，这是陕北最早的共青团组织。同年5月，建立了党支部，又于8月旋即成立了党的特支。1929年下半年，四师教员吉国桢任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马济川任四师校长后，中共陕北特委就迁至四师。那时，北起神木、府谷、榆林、横山县，南至延长、宜君、甘泉诸县，周围几百里的有志青年，争相到四师求学。他们不仅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同时，来探求革命的真理。一时间，四师成为群才荟萃的、为陕北劳动人民所称颂的学校，成为陕北进步青年所爱戴的、向往的学校。她在陕北革命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四师的党组织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思想建设，在师生和群众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播下革命的火种。1924年下半年，王懋廷同志就向进步师生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并向师生们推荐《向导》、《先驱》、《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那时，师生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认识都还是初步的、不深刻的，但却使在黑暗中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师生，耳目为之一新，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把朴素的爱国主义热情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四师的党组织，领导进步师生在校内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打击反动统治阶级。当时，陕北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四师的党组织非常重视农民运动，积极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师生到农村去，办农民夜校、平民学校，帮助农民学习文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他们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提高了革命觉悟。我们知道，在旧社会，陕北是个有名的穷地方。反动军阀、土豪劣绅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广大劳动人民在严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9年夏，陕北遭到特大干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而反动统治阶级仍不顾人民死活，继续催捐催税，宰割群众。绥德四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深入到群众中去，启发群众的觉悟，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并借绥德城一个资本家办的打蛋厂，收购农民的鸡蛋价格不公，引起当地群众不满和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工人，激起工人起来反对的机会，动员了数万农民进城，砸了打蛋厂，冲击了县衙门。伪县长在激愤的群众面前，被迫减免了苛捐杂税。

还有一次校内斗争。记得1929年5月，我在四师任特支书记，我书写并散发的传单落入校长手中，查对笔迹后，认出是我写的。此人思想保守，怕把学校搞乱了，给他招惹是非。但又慑于四师革命力量的威力，不敢公开开除我，便偷偷地将我除名，想把此事敷衍过去。当我向党组织和进步师生通知这一消息后，党、团员和进步师生向校方提出抗议，全校师生罢课三天，谴责校方的错误决定，强烈要求他们收回成命，恢复我的名誉。校方被迫恢复了我的学籍和名誉，使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显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广大师生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敌人对四师是恨之人骨的，他们不断施展鬼蜮伎俩，欺骗、恫吓、迫害进步师生。但他们的阴谋屡次被进步师生所挫败，不能得逞。最后竟采用封闭、解散学校的恶

劣手段。在1927年秋和1930年冬，敌人曾两次查封四师。（实际上1928年4月还曾被封闭过一次。编者注）但他们只能封闭学校，却不能封闭进步师生的革命思想行动。革命师生被迫离校后，并没有停止革命行动，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及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和群众一起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敌人不仅没有扑灭四师的革命火种，反而使火种更加广泛地蔓延到广大城镇和农村，而且越烧越旺，展示了这所正义的、革命的学校的强大的生命力。

四师的党组织领导师生参加社会革命斗争，既宣传、组织、发动了群众，也使师生经受了严格的革命锻炼，使四师成为培养优秀革命人才的基地。四师的党组织为了培养坚强的革命者，聘请了不少优秀教师。这些教师思想进步，博学多才，治学严谨，不仅注重文化课教学，而且关心学生们的进步成长。尽管教学条件很差，生活待遇很低，担着风险，但他们具有高度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辛勤耕耘，在四师乃至陕北大地上，传播着红色的种子。为此而作出重要贡献的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我记忆最深的有李子洲、马济川、王德延、杨明轩、吉国桢、苏醒民等同志。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一批批优秀革命青年加入了党的队伍，投入了火热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其中有很多人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还有不少人成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从四师走出来的革命者，勇敢、坚定、不怕牺牲，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我记得起的有白乐亭、白雪山、惠金瑞、王聚德、刘光显、惠泽仁、李成安同志等。

四师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人才，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解放后的绥德师范，又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陕北的革命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应当载入史册，永远值得纪念的。

## 陕北党团特委的活动情况

常黎夫

陕北团特委 1929 年春在米脂召开扩大会议（先在三民二中，后在北街小学，我是米脂团县委书记，赵颢龙是宣传，杜洪章是组织）。会上决定我为团特委学运执委（当时的说法）。会后赵颢龙去三边工作（后病逝在定边），李俊藻任米脂团县委宣传，杜洪章去榆中上学后，毕维周任团县委组织。

1930 年 4 月间，我由米脂到绥德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主管共青团特委工作，社会职业是绥师教员。我从李文芳手中接收了特委的文件和曾写油印工具，紧接着就参与“红五月”的活动。此时贾拓夫已回神木探索，将去西安工作。

1930 年春，特委机关设在绥德师范。当时党、团特委在一起。吉国桢（在绥师任教时，改名为纪凤洲）、苏耀民（绥师教员）、刘澜涛（绥师职员）和我在绥德。张文华、李文芳在榆林。我是在四五月间到绥德做团特委工作的。我先去义合等地了解学校的工作情况。刘澜涛是陕北党特委秘书长，1929 年 10 月间参加了特委工作。那时人手有时多点，有时党、团特委一起只有几个人，工作时分时分合，合时多。

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大约是在暑假前一月调走的。我把他送到东门外无定河岸，握手告别。吉国桢是位很好的同志，受到

大家尊重。他刚毅沉着，艰苦朴素。走的时候雇了一头毛驴，带着来时老婆做的一条蓝印花粗布被子，别无他物。吉走后，特委工作由苏醒民主持。

绥师放暑假期间，苏醒民和我留绥德，处理特委日常工作，接待听取各地来人的工作汇报，刘澜涛去各县巡视工作一个月。

回顾1929年夏至1930年夏这一段期间，陕北特委的工作是比较好的，是有成绩的。1929年2月绥德张家岔会议和4月榆林红石峡会议相继贯彻六大精神，提出了纠正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一些做法。群众工作较扎实的进行，白军内的兵运工作成绩较为明显，特委直属军支有十多个。井岳秀直属部队、榆林兵工厂、神木高志清部队以及陕甘宁边的王子元、石子俊部党员不少，工作基础不错。两次会上还批判撤销了思想作风坏的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的职务，刘志丹主持了短时期的特委工作。1929年秋季，吉国桢、苏醒民、张文华先后来陕北，特委的工作作风大有改变。据我了解，这段期间，工作中没有搞“左”的冒险蛮干，表面上不是轰轰烈烈，实际工作隐蔽发展。当时陕北党组织处在幼年时期，在统治者井岳秀骄奢偃安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杜衡1930年春到陕北以及他回到省委后形成的报告，指示，对陕北工作的估价都是从“左”的观点出发，先说不好、右倾。他巡视了一趟，很快就说好起来了，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为给他个人表功。

1930年9月间，北方局派高维翰、孔叔东（孔祥植）和杨璞由天津到绥德。接着赵伯平由西安来绥德。

10月上旬（古历八月中旬），在绥德城西合龙山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立三路线，即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和陕西省委的几个文件，然后由高维翰讲国际、国内形势。讲

得很长，特别是对苏联的形势讲的多，所谓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口号，从此就在陕北传开了。

刘志丹没有参加会。他到绥德后，在开会的前一两天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候淇发现，就离开了绥德城，我把他送到东门外，先送去义合，后来听说到马云泽家住了十多天。刘志丹原准备在绥德检查病，我托刘季常（党员、绥师训育主任）给约好戴大夫（天主教徒，在绥师讲卫生课，思想进步），也没有来得及检查。

会后，贯彻立三路线，把党、团特委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搞暴动。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斌，正副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秘书刘澜涛，工委常立德，青委是我。这次会议还决定特委机关迁往陕北的中心城市——榆林。刘澜涛拟先去榆林筹设行动委员会机关事务，张德生同行去府谷工作，他俩出了绥德北城门，即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经多方营救，主要是：一、由绥师校长马济川名义，向有关方面申诉呼吁；二、查案人曹亚华帮助解脱，写报告说了好话；三、是杜斌丞嘱咐新任绥德县长高望之说：“你做件好事吧，把刘、张两个学生放了。”刘澜涛、张德生于古历元旦那天获释。

11、12月间，赵伯平、孔祥斌先后去榆林，李文芳已先在榆林，特委机关移驻榆林。我为设法营救刘澜涛、张德生出狱事，延迟至12月中下旬才到榆林。我先一人单住，几天后迁出和常立德、杜洪章住在一起。赵伯平、孔祥斌另住。由张子明（“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还在世，住武功女儿处）做交通联系。特委几个人有时分别在乔乃文家中碰头，商量问题。

（选自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第3期）

## 回忆柳青

冯德兴

1965年5月我调任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革委会成立之后担任常委、副主任直到1973年6月。

在长安县工作期间，我有幸结识著名作家柳青同志。柳青是我的同乡，他的作品《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我早就读过，十分敬佩，但未见其人。

1966年夏季有一天，柳青同志突然来县政府找我，说他所住的皇甫村中宫寺山崖走动，居住不安全，想在韦曲（长安县政府所在地）附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以便写作。我答应积极想办法，但时隔不久，柳青同志的房子还没有落实，“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最先受到冲击，随后我也身不由己，我们长期失去联系。

1972年的夏天，柳青同志恢复了自由，到家中来看我。我见到了他很高兴，但看到他身体垮得很厉害，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可是他的精神境界很高，一心扑在事业上，念念不忘他的《创业史》。说他一定要完成四卷《创业史》的创作计划。我对他的这种精神很敬佩，以后也常去看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76年在韦曲干休所他的住宅里。当时正是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中国大地上布满了乌云，人们的精神受到极大压抑的时候。因此，他见到我滔滔不绝地谈吐他心头上的话。除了谈他忧国忧民的心情之外，还谈到他们在绥师闹革命的惊险故事。这次，我才知道他在1930年就读绥师，我俩成了校友，更为亲切。

然后又谈到他的《创业史》，他说他能够写完这部作品。他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十分感人。但他能否完成这一巨著，我却非常担心。因为他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跟我的谈话都是非常吃力的，怎能完成这么大的创作任务呢？我只能安慰他要多加保重身体。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他终因病魔夺去了生命而没有能够完成这部巨著，这实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憾事。

## 忆高协和先生

常慕夫

高协和先生原名增斌，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896年。幼年在米脂县崇海学堂读书，1911年在西安陕西高等学堂上学，1915年东渡留学，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商学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在天津益世报馆、庸报馆担任编辑工作。1927年任河北《民国日报》分社社长，宣传进步思想，迎接北伐，被北洋军阀通缉离津。1928年回津至1930年期间，先后任华北水利委员会秘书、唐山交通大学和北平法商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野心毕露，1933年，侵占热河，国民党政府节节退让，民族危岌，国事日非，高协和毅然离京返陕。1934年夏恢复绥德师范学校，高协和出任校长。在校期间，治校严谨，作风民主，主张学术自由，增添英语，为学生日后深造创造条件，学校生气蓬勃。当时师范学校给学生每月津贴四元，而学校经费常常不能按时划拨，屡有断炊停课威胁。高协和校长对此十分关切，多方奔走，筹集款项，使学校教学继续进行，受到师生赞扬。



1934年冬至1935年夏初，国民党曾几次逮捕过学生，而后又以校内发现反对杭毅（国民党政府专员）的传单为借口，要挟校方清理共党分子。高协和维护正义，严词拒绝。此乃高协和酒醉之后，公开吐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阴险计谋。学生聆听之下，莫不对他肃然起敬。杭毅竟以此为借口，诬蔑高协和有共产党嫌疑，密电省教育厅免去校长职务。

1936年“西安事变”后，高协和任陕西省政府参议，1941年秋病故于西安。据高协和的子女讲：他父亲于1939年把他们兄妹和母亲送回米脂家中，住了一个时期，并去延安见过毛主席等领导人，后因肺病严重，赴西安治疗。他父亲生前的诗集和著述，在解放战争中敌人侵犯米脂后散失，他们只记得父亲临终前在西安作的一首七言诗：“秋雨连绵逆旅愁，午夜犹思人间苦；病躯昂首向北望，战马长嘶解民忧。”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寄希望于北方（延安）的感怀。

以上事迹，是我1982年7月去米脂前后同几位协和的亲属和当时绥师的学生中了解的，下边是我和高协和先生交往中的一些回忆。

大概在1920年前后，我上小学的时候，高协和由日本毕业归里。他宣传剪发放足，有时拿起剪刀亲自给人剪辫子。他到学校参观，对小学生说说笑笑，有时打打闹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叫他“高七老”（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调皮的大班学生背后叫他“假洋人”。以后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我们相熟是在“西安事变”后，他任陕西省政府参议，我在杜斌丞先生身边工作。1937年、1938年期间，同他经常接触。另一个因素是两人都嗜酒，逐渐由酒伴结成忘年之交。

我同高协和先生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开始交往，很少有共同语言。可是，每当听了 he 那些酒过半酣的滔滔不绝的议

论后，逐渐引起我对他的注视和对他的为人品德的了解。协和先生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平时不多说话，酒后则吐真言。他当时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深恶痛绝，对国民党的所谓抗日、民主，不抱任何幻想。他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左”倾行为不满，直言不讳；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地位和作用，不很理解。但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主张则表示完全赞同。他对民国以来的国事演变，各派系军阀混战，蒋介石本人的丑史，以及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特务罪行，了如指掌。往往讲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十分感人。协和先生多年办报，结识各方人士，交游很广。但他孤傲自负，绝不投机取巧；具有独见之处，从不轻易随声应和；出入豪门，而不攀附钻营。他常引“纵横古今，褒贬百代”的古语辩解自己酒后的一些论点；常用“名不虚传，士不虚附”作格言要求自己，观察别人。他做人做事不是首先为自己打算，而是为正义说话，往往要得罪许多人，到处碰钉子。有时甚至弄得生活潦倒，满腹牢骚，借酒消愁，嗜酒成癖。这反映了旧中国黑暗时代，一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文人学士的精神状态和共同命运。协和先生胸襟磊落，生活俭朴。几乎终年戴一顶旧礼帽，穿一双旧皮鞋，安步当车，走路好像小跑一般。他没有那种文人学士的架子和习气，平易近人，扶贫济危，公正廉洁，“更畏民怀”。有人说他的作风受了古时“布衣之侠”的影响，也有人笑他像“卓别林”做戏不需要化装。的确，不了解他的人会感到他有点“古怪”。但是，我认为高协和先生思想和生活方式方面，是有些明显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他确实是一个秉持公道的爱国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无党派民主人士。1934年，在形势恶化、条件困难的时刻，他毅然接受了恢复绥师的重任，坚定地把学校办起来，出了大力，作出了贡献，是值得怀念的一任校长。今

逢母校——绥德师范学校 60 周年校庆大喜之时，写此短文缅怀故人，并供在校教师和同学共鉴留念。

1983 年 4 月 26 日于西安

（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革命英烈》1988 年第 4 期）

## 回忆在母校时的几件事

张连三 口述 赵国栋 记

1934 年秋到 1937 年 2 月间，我在绥德师范学校上学。近 60 年了，有几件事总是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

### 驱逐陈粹芳

1935 年 4 月间，省上给绥师拨来价值 3000 元的教学仪器，经山西军渡运到宋家川。当时，因交通和其他原因未能及时运回学校，部分仪器被盗。时任绥德国民党专员杭毅硬说是绥师校长高协和不负责任，被红军抢走了。因此，要撤高协和的校长职务，并派他的秘书陈粹芳接替。

高协和校长办学严谨，也很体贴学生。我当时是二七级级长，他叫我谈过几次话，问过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了解过同学们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同学们也很尊敬这位校长。

全校师生对杭毅的决定非常气愤，但因杭毅勾结军阀，所以十

分注意斗争策略。当时学校学生会主席丁锡奇（共产党员）对我说：“陈粹劳是个大烟鬼，大流氓，不能进校当校长。”在共产党的活动下学生罢课将近三个月，终于胜利了。陈粹劳未能进校。

1936年4月间，高桂滋离开绥德，大权由副师长代替。学校也改变了斗争方式，让陈粹劳进校后再见机行事。否则，杭毅可能会动用军阀武力。一天，高协和校长再三说服学生才进了礼堂，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了任命书，接着陈粹劳就职演说。当我们看见脸色蜡黄、咳嗽吐痰的国民党的烟鬼、流氓站在讲台上，个个义愤填膺，大家一齐接着他的咳嗽，也“咳！咳！”开了，接着又是跺脚，又吹口哨，逼得陈粹劳的演说不到30分钟，只得草草收场。

陈粹劳上任后，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大部分教师都换成他的亲信。这一伙对学生横加指责，学生怎能安分守己地学习？有的因听不懂口音而离开了教室，有的考试中因不会而交白卷，有的改名外出，有的到延安住了抗大。我原名张继述，5月间改名为张连三，考入高桂滋在绥德办的汽车司机短训班学习。我记得，当时因日本进攻了绥远神林庙，短训班提前结业，我又回到绥师。

陈粹劳进校后，学生运动表面上处于低潮，但实际上已出现了校内外的结合。10月间，校内外师生联名写信上诉<sup>①</sup>，指出陈粹劳一伙多报师生人数，贪污巨额钱物。省教育厅派来督学员住校一月左右，在寒假前，陈粹劳被省上调离，演出了绥师，刘春园任了绥师校长。

<sup>①</sup> 此同事实上是11位教师联名罢教，经高桂滋转给平遥（请参看195页空白学校的回忆文章，编者注）。

## 一百张传单

1935年腊月初的一天，从北平给我寄来一包邮件。拆开看时，里面裹的是一百张传单，最醒目的标题是：“陕北旅北平学生援助绥师学生学潮——驱逐陈粹芳”。这些传单，我没敢让别人看，随即穿了大衣，将传单暗暗藏在腋下，便走进李登霄老师公寓。李老师看过传单后对我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能张贴：今天是星期六，傍晚将传单沿街撒下。

下午，我们穿着大衣，腋下夹着传单，随几个同学下街。到傍晚时候，我有时溜到同学后边，有时走进厕所，将传单一张一张地撒在绥德城内大街小巷。第二天，在校外住宿的同学捡回了传单，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传开了，同学们高兴地说：“北平也在援助我们，我们是正义的。”这件事轰动了绥师，也轰动了绥德古城人，加速了陈粹芳的垮台。

那时候，我虽然不知道李登霄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传单是谁寄来的，但我只是放心李老师，李老师也只是再三叮咛我“要特别注意”。我们师生间的这些交往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言明了。

1936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在绥德城内偶然遇见了我在小学时的延川同学马志明，他询问给我寄来的传单一事，我才知道传单是他寄的。

是年，马志明被国民党匪徒暗杀在绥德三皇庙。绥师校友缅怀这位烈士，延川革命烈士纪念碑铭记他的功绩。

## 伪县长“散政”

1935年延川解放后，国民党延川县长房向礼带了批地痞、流氓逃到绥德。伪县长笼络人心，向在绥德的延川籍人“散政”。对我们绥师上学的几个同学也没例外，并派曹必达（是我们在延川城关小学时老师，延川早期共产党员，革命低潮时自首）来绥师给我们每个学生送来2元钱。我们几个见了曹必达这样的人，内心非常气愤。又知给张志英（后任延川伪县长）之类穿皮鞋、戴眼镜的都是三四十元，我们几个商量说，这个秋后的蚂蚱还在挣扎，并向曹必达回话说，给别人好了，我们不困难。

这件事听说被马彦若（延川人，是高桂滋的参议）知道了，他大骂了一次房向礼，说房向礼扶有不扶设，穷学生几年没回家才给2元。后来给我们每个学生发了3元。

## 扰乱敌军

一天，学生会主席丁锡奇悄悄地给我布置了任务。

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带着几个同学走出绥德北门。到了公路上，我们用小石头摆成向西行的路标，并在路上用木棍写了“红三团三十人”的字样。当我们经西门回校时，看见在大理河的石崖上用粉笔写出“红一团八十人”，画出了向东的指向箭头，也有用草绳编成指向路标，摆在地面上，并在路上写出“红军某团、连、排几十人由此前进”的字样。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发现了“情况”。晚上，我们睡觉时，听见敌军在城墙上喊着口令，并听见推动枪支的声音，我们知情的同学

说敌人害怕了。星期一见面，都是高兴地一笑，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 怀念我的母校

任 远

5月1日，是伟大的国际劳动节；今年的5月1日，是我的母校60周年校庆。真是巧逢双喜。不禁把我们这些花甲之人引入那青春似火的学生时代。那时正是我们伟大的母亲——祖国处在水深火热、生死存亡的岁月，又是我的母校把我们这些天真纯洁的一批青年苦心培养成为革命大军的普通一兵。因此，我要为母校欢笑，为今天幸存的老同学而庆幸，为已故的同窗学友而哀痛。让我们远离母校的学生谨向母校60校庆致以衷心的祝贺，诚挚的敬意！

我是1934年秋天考入绥师二八（甲）级。原名马耀武，家在城内东门隔。1938年1月，绥德特委书记郭洪涛同志（现国家计委顾问）带我到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1939年3月调中央考察团，深入敌后工作，从此改名任远至今。全国解放后我先后两次回家省亲，每次均要回母校看看谈谈。因为自从1934年秋天入学一直到1938年1月23日离开绥德到延安前，我一直住在学校。因此，我是以校为家的。因为家贫，全家七口人挤在一间破窑洞里。所以，我一考上学就再未回家住过。不论寒假暑假，同学们都回家度假，唯独我一个人留在学校。我到延安去时就是秘密地从绥师宿舍里偷跑的，家中亲人一概不知。所以，除带了随身衣物外，其他东西都存放在学校。因为特委通知不让我告诉家庭，怕国民党特务机关——肃反委员会李幼龙和反动专员何

绍南抓我，因为我当时是绥师党小组的负责人。那时党不公开，还没有合法地位，更不允许学生到延安去，所以我是唯一被组织上正式批准离开学校到延安去的第一个（在我之前走了几个同学，都是自己找关系到延安去。1937年前，绥师党组织被破坏后一直没有恢复）。由此可见，绥师这个母校对我来说，真正是母亲般的家园了。现在向我的母校汇报一下当时历历在目的片断情景。

1934年考入绥师前，我在绥德城内高小学习时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少共团。当时只有同学张振声同我个别联系。所以考入绥师二八级甲班后，我即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由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白区活动十分困难，所以我开始从苏区来的一些同学中了解党的活动。当时绥师同学中有不少人家在苏区，每年寒暑假可以回家，这样逐渐了解到红军情况和党的政策。当时陕北的红军就是由原在我们绥师（原为四师）学习，在1928年被国民党把学校封闭后跑到乡下的同学发动群众打土豪闹革命组织起来的，所以刘志丹、谢子长这些陕北红军领导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活动，在同学中久有传闻。特别是到了1935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快到陕北的消息早就秘密的传开了。当1935年10月党中央住进瓦窑堡时，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内心里真是喜出望外。对国民党报纸——什么《中央日报》、《扫荡报》上报道什么红军“流窜”陕北的新闻，我们都十分认真地阅读，从中了解、分析我党我军的动向。当时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广泛地在同学中间传播。我为寻找党的关系，并且迫切希望参加革命，于1935年冬放寒假时，背着家庭随同班同学王应宪（现在浙江省杭州工作）到绥德王家沟（离城80多里）他家中去找到绥德县委。当时有位姓王的区委书记秘密的和我接头，并且将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八一”宣言等政策给我讲



解。我要求到瓦窑堡，但组织上动员我仍回绥德，利用我在城里的有利条件，让我回校继续学习，便于在城内进行党的地下活动。我在苏区王家沟住了半个月后，放在棉裤裆中带着县委交给我的三份文件，回到学校，秘密压在褥子下面。从此，我就这样开始在绥师进行工作。1936年开学后，我就首先在思想进步的一些同学当中秘密传播党的文件精神，并组织进步同学多读进步书刊。如《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并与进步的老师如李国章（他是我的班主任，国文教员，现已故，原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全国五届政协委员）、曹孟朴（现在西安军队工作）经常联系。同时在学生中组织一些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活动，如对反动的训育主任黄××、军事教员×××、校长陈粹芳（军统特务、复兴社）的斗争。特别是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学生中间开始掀起拥护张、杨二将军的爱国热潮，这与当时驻军高桂滋倾向张、杨有关系，如教员中一位有位叫杨毅的就是高桂滋派来的，所以从西安事变后到1937年活动比较活跃。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学生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如1936年寒假组织同学下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暑假举办抗战壁报。并在张明远同志（他当时在榆林女中教书，原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亲自领导下，在绥德南关一家店里秘密召开了陕北民先总部的会议，有榆林六中、女中和绥师三个省立的学校，分别成立民先组织。决定成立三个区队，指定绥师由我担任区队长。所以1937年暑假后一开学，为了响应全面抗战，我们发起成立了绥师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有80多人参加，我们二八级甲、乙两班较多。这时有红军改编的部队进驻绥德、米脂、吴堡等一带担任河防任务，绥德成立警备区，陈奇涵同志任司令员，郭洪涛同志任政委，并亲自到校作抗战形势的政治报告，很受同学欢迎。这时绥德县委在警备区利用民运科掩护，当时有县委书记黄静波同志（现青海省省

长)，还有安志文同志（绥师二六级学生，原六机部部长，现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接领导我们，并发展了张孟晋（现名张帆，在沈阳工作）、常月亭（陕西省农林厅工作）和我三人于1937年11月秘密入党，并指定我为党小组的召集人，团结进步同学，积极发展成分好、思想进步的学生入党，同时做好教师中的团结工作。入党后不久到了寒假，鉴于我的身份比较公开，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因此，由组织上决定秘密送我到延安学习。我只差半年没有毕业，就提前离开母校，投入到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去了。

今天回忆起这短短三年半的学生生活，犹如昨日发生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热烈地期望亲爱的母校继承绥师（原名四师）第二任校长李子洲同志的伟大遗志，发扬母校的光荣传统，为祖国“四化”建设，尽快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坚信：“青出于蓝胜于蓝”。无定河边尽忠良，英雄出自少年郎！愿母校的同学们为实现“四化”贡献你们青春的全部智慧！古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现在也是属于你们的！同学们，努力吧！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发奋勤学，茁壮成长！

## 一九三六年绥师教师罢教事件

白华相

一九三六年秋，我们考入绥德师范学校秋二九级。当时的校长是陈粹芳，他是国民党绥德专员杭毅的秘书。教务主任是黄善济，训育主任是余得选。这三人都都是外省籍人，他们又聘请大部分外省

籍教师，把持了学校的大权，排斥陕北籍教师。陈粹劳又伙同黄善济私吞学校经费，和外省籍教师经常一起聚餐，请国民党专署的官员吃喝。这些举动引起了陕北籍教师的不满，也引起了驻军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对陕北籍教师的同情。

秋冬之季的一天早晨，校园内贴出了以王璞（高桂滋的干儿子）、杨毅、马润芝、马润德、刘崇高（八十四师来的）、梁醒民、李盛安、曹文郁等 11 位教师签名的罢教公告。当时陈粹劳去了西安，公告上指名的是陈粹劳和黄善济。黄善济害怕而逃跑了，学校秩序处于瘫痪状态。学生们不上课也没有事干。在宿舍内烤火，因发的煤炭少就到学校东北角的雕山书院内的煤库里乱搬拿到宿舍。

在罢教过程中，不知哪位编了四句顺口溜在校园内很快就传播开了。“粹劳、善济爱吃钱，用的韩起、秦松、魏忠贤；十一位教师来罢教，亚子、关羽当校奸。”韩起指的是余得选，亚子是指图画教师吴亚子。有的是起的绰号，姓名记不起来了。

罢教的结束是由高桂滋出面解决的。高暂代理校长，由王璞、杨毅、马润芝具体负责学校校务工作。学校的经费和学生们每人每月的五元伙食费也由高桂滋供给。高桂滋还给每位学生发了一件棉大衣的布料和棉花供学生自缝。我们年级的七位结拜弟兄穿上大衣合影留念。七位是李友楠、赵定国、延祖铎、白瑞生、张之温、许绍英和我。

## 为纪念绥德师范学校六十周年片段回忆

萧政文

### 一、我考进了绥德师范学校

1935年7月，我考进绥德师范编入二八级乙班学习。1938年因学生流动大，原考入的100学生只余50多人，所以，甲乙两班并为一个班。

我入学时的校长仍然是高协和先生，教务主任是高定侯先生。当时还有高师<sup>①</sup>一班二七级，三班共三百人。这时，绥师是处在白色恐怖的地区，尽管绥德地区靠近苏区，但是边界封锁很严，在红白交界的地区基本上有20华里左右的无人区。我们绥师由于前一段的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和逮捕过无辜的青年学生，所以只是在白色恐怖的黑暗中学习正常的师范课程。我后来才知道，绥师教师和二七级学生中有一些国民党员，但国民党的组织向来是散漫和没有严格组织生活的，也没有明显的活动。所以，从我进校到离校的1938年，也未再发生逮捕学生和教师的现象。

<sup>①</sup> 高师，即后来的中等师范。——编者注

## 二、我对高协和校长的印象

高协和先生是一位自命清高的人，也颇有些社会地位。他兼教我们的英语，但师范是不重视英语的，每周只教两个课时，他虽教的不错，英语也很流利，但教课非常快，我几乎没有学到一点普通的英语基础。他派头很大，对教师学生都以老资格的态度对待，甚至谩骂。他好喝酒，走过去经常可以嗅到酒气，有时甚至疯疯癫癫。他有句名言是“我来了”。他教育学生要大方、有派头。确实，他与国民党的官员，当时的驻军汤恩伯军长、高桂滋师长，及伪专员何绍南等在一起时，总是摸着他的日本小胡。他在国民党惯常举行的纪念周会等活动中，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位。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在公众的场合发表演说。就连绥德地区一次迎接张学良的集会中，也是他陪同张学良，其他伪官员，都处于次要的地位，和张学良讲话时，也是摸着他的日本小胡。平时在学校他看到教职工、同学有不顺眼的地方，往往也是高傲地谩骂挖苦。但他确实很有些威信，教职工和学生总对他回报以尊重的微笑。他在学校的讲话中，或某些场合，总好说些有趣的笑话。1936年春，他买回一批教学仪器，转运到绥德县的义合镇，适逢我红军东渡黄河向日寇占领的华北挺进时，阎锡山驻陕北的军队撤回山西，义合镇一度为红军占领，这批仪器在混乱中掉失。据传说当时陕西省伪教育厅认为是高协和送给了共产党，这样，这位有资历的教育家被迫辞职。

## 三、反对陈粹劳的斗争

因为陕北地处苏区，当局为了防止学生赤化，要开办什么特种

教育。伪教育厅就委任了一个湖南籍国民党军统特务陈粹劳担任绥师校长。学校的同学和部分教师反对特种教育，在陈粹劳到校后，举行了罢课。当时汤恩伯的军队已撤离绥德，绥德地区的驻军是高桂滋的部队。因为地方势力的关系，对这一罢课的行动没有进行干涉。罢课至少有一个月之久，经过商谈，取消了特种教育，教职员工全体留校，才算开课。但陈粹劳上任后，逐步引进一些南方的教师，调换了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这样引起了当地教职工的反对。1936年秋天，在高桂滋的支持下，有11位教师发动了罢教运动。我记得，他们抓住陈粹劳在建教室宿舍中有些贪污事实，就出了张反陈的启事，学生也纷纷响应。罢课有半月之久。经过高桂滋的周旋，赶走了陈粹劳，以高桂滋的同乡杨毅为教导主任，主持校事，正式开课。年底寒暑假前，伪教育厅任命陕西省吴堡籍的刘春园先生担任校长。

#### 四、刘春园校长领导下的绥师

1937年由刘春园校长主持工作，绥师才有了正常的气氛。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白色恐怖才基本结束。刘春园是一个同情我党的民主人士，而且绥德地区1937年10月之后，高桂滋部队撤离绥德，八路军接防绥德地区，以陈奇福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地方政府是伪专员何绍南主持。绥德地区中共特委会也以警备司令部政治处的名义逐步建立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绥德地区国民党设有特别党部，是李幼龙和杨朴两个叛徒、反共的死顽固主持。地方政府伪专员何绍南也是积极反共的分子，他掌握有几百人的反共保安团。加之当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蒋介石反共的逐步升级，绥德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摩擦中心。一直到1940年元月

王震司令员率领的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地区，赶走了反动的伪专员何绍南及其国民党的特别党部，绥德才得到了完全的解放。

1937年冬，八路军进驻绥德地区后，抗日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绥师学生完全恢复了过去的的光荣传统，青年学生自然是倾向共产党，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学生中先建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也恢复了党的组织。1937年底，由郝振邦同学等建立党的小组，1938年2月我光荣的经过王朗超同志介绍入党，4月我转正后正式建立了党的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郝振邦同志，组织委员是李增荣（抗大后改为李毅平），我为宣传委员。各班大都建立了党的小组。我党在同学中已发展有20个左右的党员，这些党员的分布和名字列下。（因党员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可能不全）

二七级有常远亭、张孟晋（1938年暑期脱党）；

二八级有李增荣、蒲政文、白万年、李仰高、叶国选（叶光宇）、高玉升（据说后来脱党）、李文华（在土地革命时曾入共青团，经过自首，入党时隐瞒，在1939年抗大查出后开除出党）、李玉昌（1938年暑假在学校反顽的激烈斗争中自行脱党，进入国民党地区后不知音信）、叶振民（抗大时改名叫叶树巷，因做保卫工作严重失密后以嫌疑而开除党籍）、冯子华（抗大改为冯健）、刘庆元（病亡）；

二九级党员有郝振邦、赵定国（抗大改名赵先锋）、李景荣、拓克俭（解放战争叛变）、赵景贵、折永春；

三〇级党员有石怀璞（叛变）、延祖铎、马义。

党支部党员都是由当时的绥德特区青委王朗超同志和安志文同志领导，郝振邦同志（去世）、李增荣（毅平）健在，可能记得更清楚吧！教师中党员有曹孟朴、李国璋。

## 五、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绥师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极活跃的。绥师当时已有一台电池收音机，在微弱的广播声中听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八项宣言，激动的学生和教师顿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事变几乎是一致同意的，但对放蒋杀蒋的意见争论得比较激烈。事变后的第二天，绥德各界群众由高桂滋召集到东门外飞机场开了群众大会。高桂滋这位驻军首脑，讲话时很圆滑地说：“剿共即将胜利，不幸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家大事自然由国家领导商讨决定，我们要保持安定。但抗日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凡主张抗日，全国都拥护。”当时国民党党政头目何绍南、李幼龙等大谈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特别是学生，则抄写大幅的八项宣言在大街上张贴，也写了一些拥护抗日主张的标语。国民党反动党局也写了少许讨伐张杨的标语口号。但由于驻军高桂滋的作用，绥德在“双十二”事变后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双十二”事变之后，统一战线也逐步形成。1937年春，延安党中央曾派周小舟同志路经绥德到神木、府谷一带和当时驻那里的王兆祥同志的部队联系。他们就住在绥师东边小院，大约有20多人，他们穿着崭新的灰军服，戴鲜红的领章帽徽，接触同学彬彬有礼，谈笑风生，也简短地讲述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抗日必然胜利的道理，给教师学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可惜，他们只住了四五天，这是我们处在白区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对党和红军的极好感受。除过这次短暂的接触，白区对苏区仍然封锁得极为严格。在反动的国民党军政统治下，抗日救亡活动仍很低沉。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绥德师范学校也由于强烈的



民族意识，不能安心学习。由于当时还没正确的领导，只是自发的出了街头墙报，主要刊登抗战的消息，而很少有正确的评论。一直到1937年初冬统一战线完全形成，绥德地区进驻了八路军，在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处（实际是绥德地区中共特委）的领导下，绥师才有了明确的抗日救亡的正确方向，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冬，学校组织了救亡宣传队在城市和乡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征集抗日报费、救国公粮、慰问伤病员等等活动，在先进的学生中建立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组织，个别吸收共产党员，在驻军和我党的领导支持下，和反动的国民党作了顽强的斗争。

当时日寇占领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黄河东岸渡口、军渡、延水关东岸，日寇已经几次占领，重炮激烈地轰击了陕北沿黄河的村镇，日机也轰炸了绥德、榆林等陕北较为重要的城市。绥师曾组织几次战地服务团，在清涧、绥德、吴堡、葭县（今佳县）等县的沿黄河岸东西两边进行战地服务。我记得二七级的战地服务队在清涧县的黄河边，二九级的战地服务队在绥德县的枣林坪和吴堡县的宋家川一带，我们二八级的战地服务队在葭县的沿黄河边。曾经搬运伤员、转运军粮、演出宣传，大唱抗日歌曲，大写墙头标语，救亡活动极为活跃，收到了唤起民众的极好效果。绥德街上的墙头报也发表了大量的抗日反顽固派的评论，秧歌队、演出队等在城乡的活动也更活跃。

## 六、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在绥师，反对顽固派和反动派的斗争也很激烈。绥德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派，看到绥师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极为仇恨，扬言绥师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的

学校，应该保持所谓的“三一主义”（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我们学校的街头墙报则大力评论“三一主义”的反动性。1938年春，日寇再次占领绥德地区的黄河东岸靖口、军渡等重要市镇，加紧了对陕北黄河沿岸的炮轰和对榆林、绥德等县城的飞机轰炸。国民党伪专员何绍南竟然散布，日伪军王英、李守信曾经是他的部下，何某在绥德，他们不敢进攻，要老百姓不要恐慌。我们绥师的街头墙报，大力评论这种汉奸言论。何某转为解释说他是为了安定民心。我们更大地开展了评论，在日寇进攻的面前，只能动员群众全面抗战，哪有这样安定民心的“高明言论”？何绍南及其国民党党部则要禁止学生出街头墙报，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党派出特委书记刘澜涛，国民党派出国民党专署的秘书孙家乃，我们学生救国会则派出郝振邦同志作为代表和国民党反动当局争辩。在刘澜涛等同志的支持下，振邦同志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激烈争论，在斗争中取得了政治上的有力宣传，争取到社会人士的赞扬支持，保持了街头墙报的长期出刊。只是因为统一战线的关系，同意由八路军做宣传工作的漫画家张晓光同志画了一幅凶恶的老虎覆盖了我们激烈的墙报评论。进步学生在校内也刊出《挺进》周刊等墙报。

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又要流氓手法，一次通知召集了绥德城区他培植的商团队和地方绅士富户以及反动的地方势力和学生伪专署开会，大谈什么由于某军的干扰，无法主政，向地方父老告辞。在反动的绅士及国民党大小官员及商团队的骨干带动下，举行了所谓“跪哭”挽留何绍南的丑剧。我们绥师学生则高呼“热烈欢送何绍南专员”，惹得全场大乱，群众自行解散。而何绍南还是厚着脸皮，赖着没有离开绥德专署的那个“宝座”。

## 七、反对暑期军训的斗争

何绍南一计未成，又生一计。1938年暑假，为了防止所谓绥师学生的赤化，进一步组织暑期军训。这一招引起学生的不满，提出利用暑假，再组织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支前工作。但当时可能受王明右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吧，认为绥师是国民党政府经办的学校，就说服我们同学接受暑训。在暑训中继续开展斗争。我们学生向反动的专署专员何绍南提出：决不接受法西斯训练。何绍南答应是抗战时期正常军事训练。这样，就只好接受暑期军训一个月。

在暑期军训中，我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消极抵抗。

国民党保安团派来中队长正副两人主持军训，并派有区队长十多名管理各班的具体训练，实际是排长的职务，班长则是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所以统治并不是非常严密，还派一些党政文职人员讲所谓《三民主义》等反动政治课程。我们要求绥德八路军警备司令部的人员讲游击战术或统一战线，国民党当然始终不答应，为此我们开展了消极抵抗。训练是军事基本动作为主，单个教练时有些同学大出洋相，站在旁边的学生则哈哈大笑，教官在这个班指责学生，站在他们后面的那个班则大肆捣乱，大嚷大叫。弄得他前后难顾。跑步时采取过快或过慢的动作。他们喊叫跑慢些，我们就越跑得快，甚至全部跑乱；他们喊叫快了，我们就原地跑，这使他们哭笑不得。更有趣的是散兵演习，我们跑得很远，使他们难以收回。但他们也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如说某一区队较好，可解散，某一区队继续罚训。那些解散了的区队同学，并不离开操场，站在四周乱喊乱叫。他们也抓住个别捣乱的同学训诫责骂，甚至用拳推打，同学们大喊，

为什么用法西斯办法打人，甚至蜂拥而上，在背后也推打教官，致使军训在无结果的混乱中收场。

讲政治课都是国民党政府或党部的职员，他们比较胆小谨慎。如讲解《三民主义》的刘文玉是县党部职员，又是绥德县城内人，他的弟弟刘文斐、刘文炳及其子刘庆元都在绥师上学。他上课前就声明：“我是奉命而来，讲的也不好，听不听在于同学……”当然也有反动的党政人员来讲课，如景仰山（叛徒）、马瑞生（叛徒兼托派分子），他们曾经常在托派的杂志《抗战与文化》上发表反动文章。他们一到场，尚未进礼堂，我们就喊“叛徒来了”或“托派分子来了”。专署秘书孙嘉奶、杨朴、李幼龙等比较高级的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总在每周惯常的纪念周会时分别来训话。孙我们称之为汉奸，李、杨我们称之为叛徒特务。他们到场训话，我们发动学生，大扇扇子。一般是用书来打脸，发出拍拍的声音，表示他们不要脸，或此起彼伏喊几声真热。如果在礼堂讲，我们发动学生趴在靠背连椅上睡觉。有一次杨朴训话，前排同学睡觉，马瑞生下台推学生，喊不要打瞌睡，后排学生就喊不要打人。大概杨朴这个家伙怕太乱出事，叫不要推学生。当然，我们对这些上层家伙也怕惹起过大的事端，因而斗争也是有一定节制的。会散后，他们夹尾逃跑，我们同学们蜂拥而出大喊“特务、汉奸、叛徒”，他们回头盯认一些同学，这样同学们也有些回避。就这样，军训一个月没收到任何效果而仓皇结束。在结业时，发给每个同学一张所谓的“结业证”，但在发后的当场被同学们扯得粉碎，像雪片一样撒得满地都是。

在军训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并不是不想用武力镇压学生。首先因为驻军是八路军，在全国人民拥护统一战线的抗日高潮中，在绥德那个特别地区，当时绥德地区出布告一类重要政治性公文，署文是以第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绥德专员公署、绥德地区抗敌后



援会三个机关单位，所以搞学生还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敢那样做。但也曾有过所谓找谈话威胁和扣留学生等事件。我记得一次学生会开讲演会，有一位姓崔的同学公然讲了共产党好，积极抗战，国民党消极抗战，大搞摩擦（他不是地下党员）。他们就以找去谈话拘留其在专署。二九级的一位同学张永贵因我党发动学生向社会发信，控诉国民党当局残害青年学生，被国民党一教官发现，用手枪威胁，他逃跑到我警备司令部。为此，我们绥师地下党支部在上级党的支持下，发动学生大闹了一次学潮。我们支部郝振邦、李增荣、我和各班个别党员在学校食堂以吃油馍、凉粉为名，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传达，利用中午午睡打钟在礼堂召开学生会，发动学生声讨和派代表要求释放被扣留的崔同学和找寻失踪的张永贵同学（我们当然知道已到司令部后转延安）。那天中午午睡，国民党军官并没提防我们在打钟后，高喊在礼堂内集合开学生自治会，大家让一些灰色同学主持，通过发表了要求释放和找寻失踪的同学书，还选派了几个代表去见专员。那些熟睡的军事教官慌忙跑到礼堂，大会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组织的纠察队守着礼堂门，说是学生开学生抗敌救亡自治会，没有你们的事，不许你们干涉学生自治会。在这样的压力下，国民党专员何绍南释放了姓崔的同学（崔同学的名字我记不清，只记得他原是高桂滋部队的小司号员，高桂滋部队走后，他是以工读生身份在绥师的二九级随班上学）。

## 八、反对白焕亭的斗争

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派来反动的白焕亭担任训育主任。在绥德特殊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高潮中，他讲近代史时仍旧大讲旧的“三民主义”，散布某些反共和抗战中要保持国民党的绝

对领导权等等。为此，我们党内集中力量设法反对和赶走这一反共的CC派教师。我们二八级党员多，进步力量大，这一责任就由我们班负责起来。在中期考试时，我班以交白卷方式，发传单控诉他散布失败论，破坏国共合作等罪行，赶他出校。全校各班同学响应，赶走了这个反共的家伙。但他并不甘心，又去西安活动。国民党省教育厅在暑期免去刘春园的校长职务，任命白焕亭为绥师校长。我们得到消息后，组织护校团发表宣言，保持绥师抗日救亡的光荣传统，挽留旧校长，反对白焕亭进校。但国民党政府趁学生暑期军训，委派绥德大地主绅士高铭九的二儿子高承炳偷偷地接收了学校的财政大权。我们在暑期军训结束后派代表要求高某交回学校。我当时是派去的二八级代表。我们当时二八级、二九级、三〇级各派两名代表，大都是党员或积极分子。我们二八级当时是学校的最高年级，受党支部的委托，可以说我和李文华是首席代表。高某非常刁滑，招待我们在他家的大庭并要求签名，以便谈话和联系。我们说：我们是学生派的代表，没有个人签字留名的必要。他又说：白校长未回家，我只是受托接收了印章，办理下半年的开学事宜，并不知同学不愿叫白校长接事。我只能转告西安的白校长和省教育厅。我们要求他把印章经费交回原刘校长的教职员。他说财务人员都是原教职员，至于转交给刘校长，刘本人也去西安向省教育厅交代手续，他的教务主任高承斋先生等如果愿回校，那当然很好，我想白校长会聘请他们连任，我个人倒无所谓，不一定要任教。当然反动派下了决心要摧毁这个有着革命传统的绥德师范，我们只好组织护校团，成立纠察队，守住校门，不让白焕亭的新教职员进校。但是，学校已停发学生的五元津贴费，绥师学生都是靠五元津贴费上学。因此，要留住学生是比较困难的。其中大部分学生，特别是我们党员中有奔向延安的愿望，坚持斗争遇到了严重困难。这时，白焕亭出布告

招收新生，社会上高小毕业的青年学生又急着报考。我们留校的学生对白焕亭的招考虽然进行了捣乱，比如砸窗户，推翻教室桌凳，但国民党专署则派来保安队守护考场，也有逮捕激进学生和党员的企图。上级党委又怕暴露了地下党员的身份（事实上有的已经暴露，我和郝振邦、李增荣等也不好公开出面），留校学生又极少，反抗势力不足，所以经我党特委决定，由青委王朗超等同志执行计划，撤退大批学生去延安，组织少数没暴露的党员另建新的支部。我们当时发动了有近 150 多名学生去延安，企图拉垮绥师。但白焕亭居然招收了 200 多新生。这些新收的青年学生，是没有政治觉悟和斗志的。我们去延安的同学，绥德县的由我负责带领，葭县吴堡学生由李增荣带领，清涧子长等学生由郝振邦带领，分批以少数行动，分赴延安。我们到延安后，年纪小的或胆子小的住边区中学，年纪稍大或有勇气的送入抗日军政大学。我们去延安后，白焕亭出榜开除了我等 60 余人。

留校的党员我能记得的有石怀璞，新考入的学生党员马健飞，我班的高玉升等组织了新的支部。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白焕亭进校任校长后，开始发展“三青团”、“复兴社”等反革命组织，使学校一度进入黑暗时期。后来竟然参加了所谓“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反共示威游行。从 1938 年 8 月至 1940 年初，绥师在白焕亭统治下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气氛中度过，自然我党和当时绥师的党员马健飞等同志也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 年元月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后，彻底赶走了何绍南等一批反共分子，绥德地区和绥师得到了彻底解放，我党领导的绥师开始大量的培养新的革命干部。反动的白焕亭校长则率领了一批教师和落后学生，到横山县响水堡镇重新建立了所谓的“绥德师范学校”，直到横山县解放。

## 难忘的记忆

刘 静

我是1936年秋考入绥师的，于1937年9月奔赴延安。虽然在校时间不长，但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永远难忘的。

我上绥师期间，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时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党在全国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尽管作为陕北反共大本营的绥德，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何绍南继续坚持反共，对爱国学生运动实行高压政策，但并没有能阻止爱国潮流在绥师的发展。记得在1936年先后有不少进步教师来绥师任教。其中有曹孟朴、李国璋同志。他俩可能来校前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来校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下子就打破了学校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很多同学被卷入到抗日救亡的旋涡中来了。据我了解，当时在同学中组织了不少抗日爱国团体。其中有以郝振邦为首的抗日救国会，有以王民为首的读书会（王民同学系二八级学生。据霍毓贵同志讲，他当时就是党员。1937年上半年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后来再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我当时也是读书会的成员，参加读书会的成员还有汪占洋（现名汪洋，北京部队副司令员）、杜修爵（二九级学生，1937年五六月到达区人边区师范，牺牲在抗日前线）、石怀璞（二九级学生，1938年初，八路军进驻绥德后，绥师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曾任学校支部书记，后在白焕亭手枪威胁下自首叛变）、杜丕茂（二八级学生，不知下落）等人。读书会订购了许多进步书刊、杂志，



有《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流》、《译文》、《中国怎样到半殖民地》、《论联合战线》、《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很多书籍，我却记不得了。当时，只要生活书店出的书刊，我们都买，想尽一切办法买。绥德那个小书店，曾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后来我还看到了延安出的《解放》周刊。这些书刊搞到后，互相传看，并定期组织讨论，活动完全是秘密的。

到了1937年9月间，汪占洋、张民权、延振寰（他们三人都是二八级学生，延振寰到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上前线，中途逃跑回家了）和我秘密相约，冲破敌人封锁，投奔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据1938年随后来延安的同学讲，我们走延安不久，校方发现之后，即以投共、图谋不轨的罪名，出布告开除了我们的学籍。

总之，我上绥师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永远难忘的。1981年8月，我去北京开会，有机会同阔别40多年的汪洋同志相会，共同回忆起绥师这一段历史，一下子变得年轻了。但回忆终究是回忆，毕竟我们都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张民权同志打仗致残，现于兰州休息。）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我衷心祝愿绥师的同学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继承和发扬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努力把自己培养造就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师资人才，为彻底改变陕北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作出新的贡献。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定比一代强，我坚信你们一定会胜过我们。

## 回忆在绥师学习的二三事

马健

我于1938年1月考入绥德师范学校师资班学习。当时是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绥德驻军司令员是陈奇涵，政权是国民党的，绥德专员是何绍南。学校教员中虽有国民党派来任教的，但绥师校长刘春园、教导主任高成斋比较进步，开明。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绥师任教，如刘宪曾、李国璋、曹孟朴等。由于学校中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共产党员任教，所以，学校生活中团结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对我在政治前途、思想认识、学习等方面影响很大，给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回忆在绥师学习的二三事，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我刚进学校，一下得了重感冒，在床上躺了十几天，病情比较重。学校师生对我十分关怀，犹如在家一样。记得病刚好那天参加上早操跑步，因身体虚弱，两腿发软，面色苍白，连气也上不来。就在将要支持不住的时刻，刘春园校长在操场上散步，看到了我当时的情景，把我叫了出来。当听说我患病的情况后，告诉我可以不参加跑步，自己自由散步就行了。那么多学生跑步，刘校长发现了我的情况，关怀备至，真使我感激不尽。

学校领导对学生生活十分关心，但也严格要求。一天晚上熄灯后，我们宿舍的同学还在点着灯说话。忽听窗上敲了几下：“满屋子烟气，点着灯，嚷甚？”我们所出了是高成斋主任的声音，从此再也不敢违反作息规定。

记得1937年，我在古镇小学上学，正值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从前线下来的很多大学生，做抗日宣传工作，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当时给我印象很深，激起了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后来在师资班学习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做亡国奴。一天，李国璋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叫我到 he 那里，鼓励我要努力学习，提高文化，将来做爱国家、爱人民的人。此时柳青正在场（柳青是刘春园校长的弟弟，正在绥师体验生活、写作），以后柳青找我谈过好几次话，帮我改过几次作文、日记，使我在政治认识上、文化水平上，获益匪浅。

正值学校生活十分活跃，抗日气氛日趋浓厚，抗战歌声到处嘹亮之际，何绍南派来一个叫白焕亭的人到学校当训育主任。他一到校就别有用心地讲，学生在求学期间，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国家的事不是我们这些人管的，不要耽误青春。这一席话大煞学校生活中的抗日气氛。一天，我同班一位姓常的同学（他是米脂县人）告诉我，新来的白焕亭主任是米脂县人，他要米脂县的同学组织同乡会，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反映情况。这位姓常的同学说，你是四十里铺人，地处绥德、米脂交界，也可以参加米脂同乡会。我当时不明白他们的用意，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说。第二天，我找刘克曾老师（他给我班上统战课、游击战课）说了上述情况。刘老师讲：抗日战争要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战，米脂同学组织同乡会，圈子未免太小了，难道绥德同学、清涧同学就不是同乡了吗？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姓常的同学说，我认为没必要参加。白焕亭在学校师生中，拉拢一派，排挤一派，搞了很多挑拨离间的勾当，引起了很多师生的不满和反对。

我们同班郝振中同学的弟弟郝振邦在学校搞学生会工作。我和

郝振邦彼此接触过多次，关系比较密切。郝振邦给我介绍了学校中的很多情况，对我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认清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帮助很大。一天晚上，郝振邦叫我到 he 那里，要我参加学校搞的一次活动，要把白焕亭搞下台。他给我一卷标语，记得主要内容是打倒白焕亭，白焕亭从绥师滚出去，揭露白焕亭在学校中的特务活动，白焕亭是何绍南的走狗等。当晚，我们很多同学把标语在学校四处贴出去，有的同学喊口号示威游行。过了两天，郝振邦告诉我，训育处给你的评语是：“查该生思想背谬，行动失检，品行列为丁等”。我原先曾找过高成斋教导主任，提出想转入正式班继续学习。高主任已答应我，师资班结业后，转入二九级（1940年毕业）继续学习。可是现在要继续学习已不可能。后来何绍南解除了刘春园绥师校长的职务，武装护送白焕亭任绥师校长。当时我曾为未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遗憾，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抗日进步，并没有什么不对，又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 三八年前后我在绥师

冰峰（常有恩）

绥师是一所富于革命传统的好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许多革命干部。是她培养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对绥师是有感情的。提起学校的名字，就想起了自己过去在学校的一段经历，还真有些留恋的心情。

我是1937年暑期由米脂县城来绥德报考上师范学校三〇级甲级读书的。1937年9月正式上学念书。当时正是1937年卢沟桥“七七

事变”后不久，也是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把原陕甘宁红军根据地划为陕甘宁边区，绥米葭吴清五县划为陕甘宁边区警备区。我进绥师的第二个月，即1937年10月正是八路军（红军）进驻警备区的时刻。当时，我才是十几岁的青年，听说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10月的天气在陕北已是比较冷了，有点冻手冻脚的感觉。但是八路军同志进驻绥德警备区（八路军驻防区）时，还穿着草鞋、单衣，精神振奋。第一次见到红军，许多同学看后，都很敬佩八路军。八路军来绥德后，警备司令部就驻在绥师学生宿舍窑洞的上边，中间只隔一墙，八路军民运股就驻在学校附小旁边，离得很近很近。由于抗日任务的紧迫，当时学校的校长刘春园和一些教员刘宪曾、李国璋、曹孟朴等又比较进步，开明（后来知道有些教员就是共产党员），请来了八路军同志来学校做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在1937年冬天和1938年上半年，抗日救亡运动在绥德师范那里十分活跃。八路军在学校组织民先队，教抗日救亡歌曲，出抗日救亡墙报，街头化装宣传、演讲，组织战地服务团到黄河边一带，深入到义合等农村，组织自卫军训练，战时演出等（当时我是抗日战地剧团的副团长，刘宪曾教员是团长）。经过三个多月才回到学校。学校还经常在大礼堂组织辩证唯物主义宣传，与唯心主义者进行辩论。辩论实际是学生中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与一部分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在思想领域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对学生当时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有一定影响。当时，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很流行。总之，当时全校的抗日救亡空气浓，学生中进步势力占统治地位。听说学校有那么几个校奸，即与国民党反动派县党部何绍南等有联系的学生，他们也不敢

怎么活动，只可能是有些偷偷摸摸的活动罢了，他们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他们在暗地仍是有活动的。当时学校已有中国共产党的部分组织，1938年6月以前，我还是一个非党员，我和几个同学还只是以党领导下的非党积极分子活动而已。我们经常与八路军民运战士王朗超等同志取得联系。

记得1938年上半年大概是四五月，我们敬爱的校长刘春园在西安被日本飞机轰炸时牺牲了，省教育厅传言要派白焕亭（原是学校教员，是国民党员，对抗日不积极，学生们都了解）来当校长，同学们很不愿意。当时地下党支部就组织同学在刘春园灵柩运回绥德时，在校外一个叫钟楼旁的一个地方开了一百几十人的追悼会。会后向省教育厅发电报，反对白焕亭来学校当校长。

快到暑假了，伪省教育厅决定，学校学生都要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在训练期间，派来几十个军训教官，据说都是黄埔军校学生。在训练期间，除军事知识和操练外，在三民主义的名义下，加了不少国民党反动教育。每天还要升国旗，唱国歌等。学校学生大部分都对军训很反感，但也没有办法，还是得接受军训。在军训快完时，伪省教育厅不接受同学们的请求，仍要白来当校长，同学们继续发电报反对白来校当校长（在军训期间，学校教员都离校不知到哪里去了，一个看不到）。军训完了，到放暑假了，在党支部领导下我们就发动大批学生继续反对白来当校长，说如白要来当校长，就用砖头砸死他。放暑假了，学生们还坚持不散，继续反白。将近一周，因放假了，学校不再供给学生伙食费，再加上绥德何绍南专员传出话，再坚持闹学潮，就要抓人。此时，党组织看到坚持下去不可能（因学生大都家穷，没钱吃饭），又得不到个结果，于是就串联学生，发动学生，如果白来当校长，那么就不上学了，到延安去上学，参加革命去。这一下发动不少学生纷纷去延安学校，原来有360多名

学生，一下走的只剩下 160 多人，去延安参加革命去了。后来我去延安后，都见到了原绥师同学。

1938 年暑期，我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8 年暑期我动员了十多名同学去延安，从米脂到绥德后，党组织将我继续留在绥师搞地下工作。1938 年下半年我仍在绥师学习，1938 年下半年和上半年比较完全是两个样子，抗日救亡活动无声无息，学校一片死气沉沉，学校完全为白焕亭校长及其爪牙所统治，国民党的复兴社以白焕亭为首。据我所知，还有栾木植等人。他们在学校大肆发展“国民党复兴社”社员，到处搞侦察，调查谁是共产党，谁是赤化分子与八路军有勾结，……一片黑暗统治，他们不抗日，专搞反共活动。1938 年底，我被学校怀疑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寒假时，接到通知，因行为不轨被开除出学校。后经党组织同意，介绍到延安去工作（我是 1939 年元月去延安陕甘宁边区中学工作的）。我到学校后，刘宪曾又是我们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学校教导主任。

## 忆白龙同志

李秀珍

白龙同志，原名白国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陕西省作协、剧协、音协三分会会员，历任绥德小学教师，绥德群众剧社指导员，绥德县政府文书，西北文艺工作团（后为陕西歌舞剧院）演员、创作干部，西安市《工人文艺》副主编，延安地区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延安地区创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主任等职。

他在革命的征途中，近 40 载从事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文艺方

针指引下，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热爱人民，紧握文艺这个武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怕苦，不怕累，不惧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党，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白龙同志在校期间，是一个好学向上，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学校在白焕亭统治的日子里，他曾因为学习列宁论共产主义而被将品行列入丙等开除出校。赶走了国民党何绍南、白焕亭，他才又得以继续升学。那时，为了争取白区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上学，他参加了经师党组织领导的“三青团友会”。每逢寒暑假召开的联欢会、座谈会等活动，他进行演讲、宣传边区的政策，鼓动他们回经师来上学。他经常办墙报、板报。龙，这个字便是他当时写作用的笔名。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印教材，有时还为附小代教。他也是学校文体活动的骨干，不时地活跃在运动场上。排球打得猛，砸得准，跳高动作轻盈自如，姿态潇洒，是个好胜者。

在那抗日烽火燃烧的年月，他毅然撑起抗日的秧歌伞，高歌英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号召人民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记得那时，我正上小学，就看过他演出的《查路条》，扮演一个老太婆。他在小学任教时，经常带领学生上街扭秧歌、演节目搞宣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积极地参加了延安鲁艺文工团，深入工农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减租减息，为壮大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消灭国内外敌人而努力地工作。

当蒋介石、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时，他坚决地奔赴前方，随军转战，为解放战争服务。既当宣传员，写标语、拉洋片，又当演员，搞创作。一个战役后，一个捷报传来，他立即去采访，随编随演。他自编的快板长达50多分钟，颂扬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辉煌战绩，直至全国解放，鼓舞着战士和群众的必胜信心，受到广大指战



员和群众的好评，组织上表彰他所作出的优异成绩，为他记了一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热情地投入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和合作化等运动中，坚持深入生活，边学习边辅导。工矿、农村、部队、学校以及铁路等广阔的天地，他交上了许多朋友。有他的老师，也有他的学生。曾先后创作和参与创作了《保卫村政权》、《白杨寨的早晨》、《烽火南越》等大型歌剧，有力地配合了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保卫村政权》被改编为连环画小人书，在西北各地甚至全国广为流传。1956年，陕西省首届戏剧观摩演出会上，歌剧《白杨寨的早晨》荣获剧本创作二等奖。他创作的歌剧《居民委员》由西安市评剧团移植演出，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他还创作了中型歌剧《关不住的心》、《妈妈》等。他写的歌词在全国不少刊物上发表，其中有些词配了曲，不仅得到作曲家的支持，更受到歌唱家的喜欢。

为了支援延安，发展老区的文艺事业，他听从组织的调配，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哪儿去……”的歌率领60多位同志，携带全家老少十口人，重返革命圣地。他要负责文工团的全盘工作，还重点抓创作。为了应急接待赴延安参观的内外宾，赶排了一台具有地方色彩的歌舞节目。配合学习王杰同志，搞了大型歌剧《王杰》在延安上演。以懒汉、扁担、枪三个主题的中小型歌剧，参加省调演，深受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遗憾的是，他以延安的革命史为题材，构思出一部大型歌剧，歌颂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十三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夭折。他的这一雄心非但未能实现，反而惨遭迫害，以致病残。更值得怀念的是他在身抱病痛的几年里，还下乡蹲点，为革命老艺人韩起祥整理书词，撰写他的革命生涯。日日夜夜为他负责创刊的《山丹丹》（《延安文学》）操劳不息。他以坚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已经病

危之际，还期盼重返工作岗位，还念想着《山丹丹》。然而，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白龙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奋进的一生！

## 母校——您指引我走向革命征程

——献给绥德师范 70 周年校庆

延国钧

1993 年 5 月 1 日，是绥德师范建校 70 周年纪念日，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又是光辉的节日，这对在校的每个师生和各个不同岗位的校友，更加是值得庆贺的。

我作为母校——绥师培育成的普通革命者，回忆在校学习生活、社会实践、参加革命斗争的片断事迹，聊表对母校——绥师的怀念和敬意。

我于 1937 年 6 月，由绥师附小保送绥师秋三〇级甲班读书。当时校长刘春园，教务主任高诚斋，班主任刘宪曾，老师有曹孟朴、李国璋。他们都是革命者或进步老师，有的还是党员、党总支（支部）的负责人，对学生进行一系列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动员学生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不抵抗政策，在我们的心田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华北、太原、武汉相继沦陷，中国的大好河山，生灵涂炭，人民遭受欺凌、烧杀、抢夺的苦难，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先后开赴华北前线抗战，从而发动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参

加抗日救国运动，动员群众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高潮。

在蒋介石片面的抗战路线下，日寇如进无人之境，相继侵占了山西风陵渡和黄河东岸的军渡（距绥德约100华里），直逼西安和威胁着绥德警备区。敌机频繁轰炸，绥师也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学校为了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抗日救国，首先从思想理论上、军事上武装全校学生，邀请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同志讲授党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刘亚生同志讲中国革命运动史，赵安博同志讲日语，叫任课老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校内出战报、贴标语、发传单、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剧，从而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

风陵渡起狼烟，军渡告急，正值寒假，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分别到绥德警备区所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秋三〇级甲班由班主任刘宪曾带队到绥德李家沟、土地岔、圪针湾、冯家岔、雷家砭、曹家四坪等地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们每到一个村子，向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黄河颂》、《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丁铃铃》、《抓汉奸》等活报剧，还向群众宣传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人民遭受杀害的惨状。所到之处，群情激昂，“打倒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汉奸卖国贼！”的革命号口此起彼伏，震撼着祖国大地。同时，还帮助组织训练人民自卫军，手持红缨枪，站岗、查哨、送鸡毛信，顿时出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临战状态。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实行“限共”、“溶共”、“分共”、“灭共”的反动政策。蒋介石派嫡系、特务头子何绍南出任绥德专署专员，专搞“摩擦”，诬蔑共产党

八路军“游而不击”，到处煽动对共产党不满和不明真相的人，打出“欢送八路军北上抗日”蛊惑人心的反革命旗号，到处制造“摩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及进步人士，妄图撵走八路军，实行国民党独裁专制。当时学校在党的领导下，绝大部分师生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的革命主张。当时，学校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共，抗战与投降的斗争十分激烈，绝大多数的师生是要求进步与抗日和革命的。有一小撮反共特务，好“摩擦”的分子进行反革命宣传和反共阴谋活动。反共特务头子何绍南借口绥师学生“赤化”了，于是，1938年电求蒋介石从庐山军校派来十多名特务教官，实施“纯正”绥师学生思想的毒化教育，也称谓“洗脑筋”的“净化”反共教育。没有政治课、军事训练（主要学步兵操典）。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教育，“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八路军游而不击”等反共内容，由何绍南的秘书孙嘉弼主讲。他在礼堂讲话时，同学们在台下咳嗽、顿足以示反抗，时而出现“拥护共产党”，“打倒何绍南”的口号声。在孙嘉弼气怒之下，将二九甲级张云贵和我班王民俊（现王汉民）、张××等三人押送专署，逮捕入狱。当时群情激奋，在学校党总支和支部负责人曹孟朴、郝振邦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有近百人到专署游行请愿，高呼“爱国无罪”，“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还我无辜同学”的口号，并静坐绝食。特务头子何绍南无可奈何，下令放回被捕的三同学，我们终于斗争胜利。敌人还不死心，教唆特务教官施行暗杀革命进步学生，他们把秋二七级至三〇级四个年级九个班中思想进步、要求革命、抗日爱国的学生，列入要镇压的黑名单。一次我和郝振

邦同学正在校门口持枪站岗，忽接特务教官邓教之通知我和郝振邦同学到二郎庙山上进行个别谈话，我们察觉他心怀叵测，邓走在前面，我和郝振邦跟随而行，走至南关，正遇庙会演剧，人群拥挤，水泄不通，我借机拉了一下郝振邦同学的手，并使了一个眼色转身跑入人群，几步跑向田家后沟，幸免了一场暗算。事后得知，特务教官邓教之等人事先在二郎庙内挖好活埋人的土坑，真是可恶可恨。

国民党蒋介石的走狗——何绍南为了统治绥师，排挤走革命校长刘春园，党员老师曹孟朴、刘宪曾、李国璋等，委派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白焕亭、栾培芝等人分别任校长和教务主任，学校当时呈现出一派白色恐怖气氛。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大批革命和进步同学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迫害，日夜兼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抗大、陕公、女大、延大、鲁艺、边师、泽东青干等革命学校学习，追求革命真理，学习马、恩、列、斯、毛主席的革命理论。经过短期学习，奔赴最后战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许多同学成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和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坚骨干。此时此刻，我怀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高年级同学张镇基（张旭初）、白万年和赵先峰等。他们都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幸存的校友学习。

为了坚持革命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学校党组织决定留一批进步同学在校继续坚持斗争，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因为我已是抗日民先队员，服从组织决定，留校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斗争。记得有一次军统特务分子、教务主任栾培芝找我谈话，他用威胁恐吓的语气对我说：“你哥延国民（秋二九级甲班）密去绥德警备区和王朗超（民运科负责青运工作）接过头，谈了些什么？接受了些什么任务？你好好讲清，否则开除你的学籍。”当时我已有一定的革

命觉悟，在革命正义感驱使下，我对革命同志，加之又是我的同胞长兄，不能不保守秘密，我就下决心守口如瓶，不要说开除学籍，就是杀了我也不能给敌人告密。这次我们以不怕杀头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击退了敌人的诱逼和威胁。

由于王明否认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妄想依靠国民党求得速胜，从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影响，妨碍了党在警备区工作的发展，同时助长了“摩擦”专家、反共头子何绍南的反革命气焰，到处攻击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寻衅滋事，肆意捆绑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设置障碍，限制抗日，威胁革命圣地延安和通往各抗日根据地咽喉——绥德警备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加强战备力量，以应付突发事件，王震司令员奉命率领三五九旅主力由华北开赴绥德警备区，于1940年2月赶走反共头子何绍南。从此，拔掉国民党埋在陕甘宁边区的一颗反革命钉子。

特务头子白焕亭、荣培芝等，随反共头子何绍南带了少数对共产党、八路军怀有敌意或不明真相的学生到响水办起了一所伪绥师。有的学生觉悟了，又回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就学。这说明党领导下的革命学校是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的。

1940年6月，绥德分区青联组织绥师、米中两个学校的革命进步学生30多人，由党员老师杨滨、汤般若、刘云等率领到延安参观学习。记得我们同学有王炳坤、王少武、马松林、丁锡慧、马绍良等，我们个个心情激动，有说不出高兴的那股滋味。大家认为能去革命圣地延安是一生最光荣的事，像领受奖赏那样喜悦。当听到第二天要出发的消息，都欢喜雀跃，有的拥抱，有的握手，有的交谈

在途中应注意的事项，到延安买《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毛主席《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在五天的旅途中，我年纪最小，但总是走在队伍的前边，不甘落后。每到住地都是自己烧水、做饭，一共 50 多人的队伍，排成一字形，有说有笑，你拉我唱，一路上长途跋涉，一点倦意都没有。每天凌晨出发，午饭后稍事休息，接着起程上路，烈日炎炎不觉干渴，也不觉累，大家的心情只盼早日看到宝塔山，见到毛主席，聆听毛主席等革命领袖的教诲。

我们到延安，组织安排住在宝塔山下的西北旅社。在一个月內，我们先后到抗大、陕公、女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边中、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参观，聆听各学校领导同志的介绍和重要讲话。每到一处，他们都要关心地询问绥德警备区的情况。记得我们在鲁艺时，男女学员都问三五九旅赶走“摩擦”专家、反共分子何绍南的情况，我们根据自己耳闻目睹实况介绍给他们，大家都感到高兴。在边区参观学习时，聆听林伯渠主席的重要讲话，这时我们每个人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1940 年“七七”正是卢沟桥事件三周年紀念大会，我们有幸也被邀请参加，聆听了朱总司令关于抗战三年战绩的总结和今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重要讲话，从而提高了对团结抗日打持久战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信念。

特别值得欣喜的是，一天晚上（不记得具体日子）我们在抗大看苏联电影《被开垦的处女地》时，大约 12 时至凌晨 1 时左右，通知我们参观团全体师生立即出发，向王家坪行进。当时，也不知道向何处去，干什么。大家都在肃静的气氛中急行军，谁都怕掉队，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急速行走着，心里还在捉摸着怎么回事，还未来想出个道道，竟然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门前。啊！莫非是要见到

毛主席了吧？我们按大小个一字队形，从东侧鱼贯而入。由于当时我不仅年龄小，而且个子最低，就坐前面第一排，靠门的第一个座位。大家都在端坐静候革命领袖的到来，一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终于盼到了。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全体起立，行注目礼，鼓掌欢迎，表示从内心对革命领袖的崇敬。毛主席向我们走来，伸出慈祥温暖的巨手和前排就座的同学一一握手，并在我的头上亲热地抚摸着。当时我和同学们都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幸福。毛主席身着灰色的军服，头戴列宁式帽，魁梧雄伟的英姿健步走向主席台，并挥手向我们致意。大家停止鼓掌齐声坐下后，毛主席开始讲话：“同志们：你们好！中国已经抗战三周年了，我们取得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除陕甘宁边区外，在敌后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解放区……”接着论述《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听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重要讲话，最后还讲到三五九旅赶走何绍南的问题，并说王震同志是党中央的卫戍司令。大家还想听，但是领袖的时间是多么宝贵，他为中国革命劳神操心，哪能占用他更多的时间呢。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小时，足以说明我们党对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视，对革命青年的关心爱护。这个夜晚是不寻常的一个夜晚，是难忘的幸福时刻，一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后，每想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就激动，就奋发，增添了革命力量，增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心，从此一心向往革命。

9月初我们返回学校。在返回时，我们到延安新市场新华书店买了《联共党史》，《社会科学概论》，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



主义论》等革命书籍，从此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自觉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并向党组织写出入党申请书。由于我在校革命觉悟的提高，思想上的进步，社会实践的锻炼，支部认为我基本具备一个党员的条件，于1941年2月发展我入党。由语文老师欧阳正（杨述）和同学马松林二人介绍入党。那时绥德警备区还有一定的反革命势力，形势严峻，要求秘密入党。于是欧阳正、马松林引我到西山寺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分校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我在党旗前举手宣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我就踏上革命征途，走向工作岗位。我毕业的上半年组织分配我和丁锡慧、马绍良二同学到绥德特委专署干部子弟学校任教。那时，校长袁博之同志以及高峰等都是从延安抗大、女大、陕公派来的革命教师，我们同志关系融洽，团结和谐的工作，得到学生的好评。6月我到特委组织科报到，吃住在特委，一月后分配到米脂县，到县委报到，尔后县委将我分配到县青教会工作，下半年又调到东校任教，开展青年学生工作。

1987年8月于新疆哈密地委

## 一场《亡国恨》演出激起的反响

张闻士

1939年，八路军文工团来绥德，在我们母校绥师大礼堂演出《亡国恨》。当舞台上出现沉甸甸的庄稼被日寇马队践踏后铺在地上，出现老人、儿童、妇女被日本鬼子毒打后倒在地上的情景时，我们台下的师生悲痛万分，大家共同产生了走上抗日前线，誓与日寇血

战到底的决心。李国璋老师坐在我的前一排，他的短发顿时竖起来了，淌着的泪水湿透了衣裳前襟，愤恨得马上要冲上台与鬼子拼了似的。坐在我们排的郭凤鸣同学一下子哭出声来。这时全场响起了“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遍了雕山，震动了全城，回荡在陕北高原……

一连数日，师生们不论在操场、饭堂，还是教室、宿舍，到处都是声讨声，共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在这些日子里，绥德地委在机关、学校、农村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座谈会，我们绥师一连开了七天。记得座谈会上，八路军司令员陈奇涵给我们师生讲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警备区负责人刘澜涛、张际春、郭洪涛等同志给我们师生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各战区的抗日运动情况。同时要求各地尽快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援正面的抗日战争。师生们积极响应，一致要求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座谈会后，除一部分师生继续上课外，其余师生在绥德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是战地服务队，由曹孟朴老师带领赴延安，同延安抗大师生组成战地服务队，奔赴抗日前线支援抗日战争；一支是下乡宣传队，分赴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县的广大农村，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保卫家乡，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和建立抗敌后援会。

## 情系母校

——祝贺绥师 70 周年校庆

冯祖舜

“母校”这一称谓不知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我觉得它的含意是亲切而深远的，这也可能是多少年来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的原因。绥德师范学校，在教育机制中虽属中等专业学校，但论其造就的人才和产生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与它所处的地理、时代等条件不无关系。

我爱绥师母校，在这里度过了四个难忘的春秋。它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使我认定了自己一生所要走的道路——1942 年的元旦，我被正式接纳为中共党员。离校迄今虽已近半个世纪，但每当有人提及到绥师或回忆起当年亲身经历的往事时，总是激起我浓厚美好的兴致，许多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 入 校

1939 年，整个中华大地，人民正处于火热之中，以无比的愤怒、强烈的民族气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动员、大组织的阶段。但与 1938 年相比，这时人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出现在天空中的一片乌云正有扩大之势。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的情况，审时度势，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进

步，反对分裂倒退”的代表了全国人民意愿的号召。我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考入绥师的，公布的录取名单上，我是排在米脂县的首位。当时的绥、米、葭、吴、清五县（这时还没有子洲县制）统称为警备区，绥德是警备区的政治中心。由于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专员公署和各县的地方政权、保安团队都是属国民党分管的；警备区的司令部是属共产党分管的。专署专员何绍南是国民党的右派，顽固的反共分子；警备区的司令员是王震同志（当时是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旅长）。绥德城的划防是：东、北门和飞机场为八路军的驻防地；西、南门和钟鼓楼，还有二郎山是保安团的驻防地。1939年的下半年，我刚入校不久就听人说，东门外飞机场的哨兵被黑枪打了（查其枪伤的方向是从钟鼓楼射的）。共产党分派到各县、镇的民运干事（专做发动群众抗日工作的），被保安队们排挤得连个宣传抗日的群众会都开不成。王震同志来绥德后，在司令部召开了民运干事会，听了各地的汇报。为了坚持抗日，果断决策：凡是保安中队驻防的地方，都派驻三五九旅的一个连队，针锋相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极大地支持和鼓舞了民运干事的工作和抗日人民的斗志，对反共搞摩擦的家伙们的捣乱，给予了有力地回击。这一立场，当时讲，光明磊落；现在说，无可挑剔。因为许多事实已表明，只有以斗争求团结，才能坚持抗战到底。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在飞机场召开大会，绥师师生也参加了。何绍南首先讲了话，接着是王震同志讲话，他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变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蒋委员长”，他略作停顿。台上台下国民党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一个立正姿势。接着他说，“蒋介石，狗日的，这个剿共家伙……”台下保安团的机枪架着，重兵对峙，会场气氛一时很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台上何绍南还是一个立正姿势，一动不动乖乖地站着，直到王震同志讲完话，他始终未动。我看到这一情景，

内心很是高兴。1938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叔父冯文江给了我几本小册子（有《怎样争取抗日胜利》、《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传》和张闻天著的《活跃的肤施》等），读后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虽然在理论上还说不出什么渠渠道道，但在感情上总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王震同志骂得好，骂得痛快！也就在1939年的下半年，司令部写了标语，从司令部所在地一直贴到二郎庙被专署所在地的街道，时隔不久被专署的人撕掉了，又贴上他们的什么“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统一意志”等等标语。据说这件事叫王震知道了，他亲自带着卫队，又用新写的标语盖贴了专署的标语。可见当时国民党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们，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导思想下，不顾国家民族的命运，已明目张胆搞分裂、摩擦，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独裁政策。当时的绥德师范学校是隶属于陕西省政府教育厅主管的，校长白焕亭、教育主任裴培芝、训育主任徐级升（听叔叔说他是个叛徒），都是效忠于国民党的。我之所以报考绥师，主要是家长们认为我年纪小，离家近，每月可以领到五元助学金，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当时学生的伙食费每月是十一二元，五元的助学金扣过一元讲义费，学生实际领到的只有四元。一个月自己还得拿出七八元才可上灶。在这学期离放寒假还有三四十天时，我和本村的一个同学都只剩下五六元了，上不了灶，吃饭成了大事。我到训育处向徐级升请几天假回家要钱。他摆着一副凶神的脸，不紧不慢地说：“没有钱，就不要上学！”还拉长腔调说：“要回去么，也可以，把铺盖也背上回去。”这是我第一次人格上的受辱，在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出无奈，我只得和那位同学，通过校友在二郎庙坡住的王老婆家借了一个小铁锅，好在教室和宿舍都已生了火炉，每天煮点小米粥，外加开学时背来的炒面和干菜，苦熬了43天，才放了寒假。到家中就和

父亲闹了几次，问他多次信催为什么不寄钱。看到他那阴郁内疚的脸色，我意识到下学期的学费也无望保证，父亲要是稍有能耐，也不至于如此无情的。为了不放弃学习，我就串联了三四个同学（也有小学的），大家商量背着家长去延安求学。

## “绥德事变”

1940年的春节刚过不久，春寒料峭，大地还是冰封雪覆，一个喜讯从天而降，绥德学校发来了通知：从本学期开始，学校管吃，个别家境困难的还可以资助衣服，希望同学们开学按时到校。我们欢欣若狂，飞奔相告。矛盾解决了，又可以继续求学了。

“绥德事变”的核心，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何绍南及其爪牙一味地搞分裂、搞摩擦，他们忌恨共产党的壮大和抗日人民力量的兴起，制造和挑起了许多无端的事件，因而激起了群众的无比义愤。“赶走何绍南”成了广大爱国群众的普遍呼声。在群情愤怒之下，他站不住脚了，夹着尾巴逃跑了。从此警备区的天变成明朗的天，警备区就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人民政权。随着政治气候的好转，绥师也有了新的生机。学校除了给学生们管吃外，也新增了老师，党组织的活动也有了新的进展。尽管有的时候，学生们要离家40华里的旧庄去背粮食，但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光阴荏苒，不觉临近了端午节，白焕亭借口回老家扫墓（他家在米脂），绕道去了榆林（当时是国统区），不久就公布了他在响水堡又办起了“绥师”。暑假过后，返校后方知许多学生去响水住伪绥师了。我们三二级原是甲、乙两班，100多人，由于学生减少，新学期就合并成一班。在暑假期间，原先的教务、训育主任和不少的老师也去了响水，真可谓“泾渭分明”，各走各的道。现在我倒觉得，这一下也倒促进了学校

的改组，摆脱了旧势力的干扰，从此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看来人生的道路，在关键的时刻，也正如打枪一样，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我们村里有几个住绥师、米中的学生，当时去了响水，除一二人及早回头返回警备区，有的人不回头，就落得个一事无成的可悲下场。离我们村五里地的车家沟，我的两个姑姨表兄，在绥师是比我高班的学生，也去响水住伪绥师了，以后又都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送了性命。时隔40余年，1988年我重返故里，去车家沟探望年迈的三姨，临离村时，见到一个衣着破旧披头散发的老太婆，她自言自语：“我是一直在这里看车的。”（进村时我的车停在村头。大概是表弟怕孩子们玩耍敲碎车上的玻璃，让她看人，我方得知她就是表兄的遗孀，她“恪守妇道”，不再改嫁。我给她照了个相，也一直没有看到她脸上有一点笑意，可想她生活的坎坷！

绥师的校长白焕亭之后，继任的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派的霍仲年。这期间，许多老师都是从延安来的，校风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此，在这所欢乐的校园里处处充满了生机。园丁们的辛勤劳动是永远令人怀念的，值得赞扬的。就以欧阳正来说，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我对他的崇敬，并不是因为他将我的一篇作文《我最敬仰的人》（朱德）推荐给《陕北青年》发表了，而是他的文理造诣，言教和身教，令人心悦诚服，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刘宪曾一度是绥师的训育主任，在校期间可谓德高望重，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也是我敬重的师长之一。时隔20多年，20世纪60年代初，我去天津参加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又见面了（他当时是陕西省委文教部的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们私下接触得较多，他还是一如既往得诚恳热情。一次，当我代表甘肃省教育厅在大会发言之后，他很高兴地给我以亲切的鼓励。

## 延安参观团

1941年的暑假里，由绥师和米中两校的部分学生组成了赴延安参观团，冒着暑热，兴高采烈，走到延安。参观团的顾问是两校的几名老师。团长是延祖铎（绥师三〇级学生）、副团长高得成（米中学生），赵新民（米中学生）和我是第三队的正、副队长。到了延安，我们住在西北旅社，先后参观了“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鲁艺”（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解放日报社等处，聆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当时不在延安）。毛主席的讲话是在我们参观“女大”的当天下午，地址就在“女大”的教室里。他讲了一会，室内的光线就暗了，有位同志提来了“马牌灯”（是可以提放两用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放到讲台的课桌上，我是坐在第二排的中间位上，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可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大幸事，对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是既高兴又够紧张的了。高兴的是盼望已久想见毛主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还聆听他亲切的教诲；紧张的是一边要用心尽量弄懂那浓厚的湖南方言，一边又不由自主地想多看他的面容和风度，讲的许多话没有记上。第二天还和霍仰山等同志核对笔记，作订正和补充（遗憾的是我的笔记本在1947年战乱中丢失了）。这次见面后，直到1964年在北京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此次见面他没有讲话，只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临近的场地和大家一起照了相，这是一张珍贵的合影，至今我还一直保存着，寄予怀念之情。

在“女大”，毛主席给我们讲完话，正逢延河发洪水，我们回不了住地，不得不留宿“女大”。参观团的女同学们是幸运的，被邀去住了宿舍，男同学们就都在教室铺草为铺。“女大”的学生怕我们受



凉，送来了她们自己的毛毯、呢子大衣等物。她们冒雨赤着脚，裤筒挽得很高，为我们费心操劳。我们在感激之余也觉得新鲜和惊奇，她们不像我们的女同学们那样羞答答的别扭劲儿。

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两回话。他一边讲话，一边用烟斗在小黑皮袋里装上烟丝点燃吸着。他的面容憨厚朴实，讲起话来虽不像毛主席那样洒脱而风采，但让人听了也是很富有感染力的，会使你对他不知不觉地产生崇敬的感觉。尤其是讲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更使人欢欣鼓舞。我们还听了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丁玲等的讲话。王明当时也在延安，他还兼任“女大”的校长。一天晚上在边区政府的大台上，他也给参观团的人讲了话。听后大家议论多的还是他的口才。现在还记得我们到自然科学学院的时候，院子里堆放了许多小卵石，徐老指着卵石问大家：“你们说这些石头是干什么用的？”他自问自答：“可不要小看它，我们造玻璃可离不开它。”在延安，我们处处感到亲切、新鲜。“女大”的学生穿的是野鸽色的淡灰衣服，让人看了感到清爽中还有些飘逸，原来这是用白土布浸水后放在草灰中揉搓着色的，以后越洗越清亮。她们的举止、风采，也令参观团的女同学们很是羡慕。她们大多是袖子挽得见肘，头发和腰中都用毛线绳扎着。我们参观团的女同学们，在参观延安之后返回的路上，许多人也仿效着她们，比起来的时候开脱得多了。尽管延安当时的生活艰苦，但很活跃，处处充满了生机，不仅增添了我们的美好亲切之情，也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奋进精神，好似“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这里再说说两个小的插曲。

延安当时也为日本战俘举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我们到这所学校参观的时候，有的人正在草坪上打棒球。我们去了他们都回到各自的宿舍，我们分散到各组和他们座谈，当问到“是不是想家？

想不想回去”时，他们说：“是想家的，但现在不想回去，等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再回家乡……”有的人还说：“延安好，给我们以人道主义的优待。在这里我们不被歧视，还可以学习、娱乐。”我们感到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在这个巨大的熔炉里也变得很渺茫了。

参观团除过几位老师，都是年轻人，除了紧张的参观和学习，青年人当然也有点浪漫的色彩。在一月余的共同活动中，两校的同学渐渐地混熟了，开玩笑的事也就多了起来，大家议论着团里的“两枝花”，米中的沈××和绥师的张××。据说张××在返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收到了很多的信，有校内的，也有来自米中的向其表示好感受意。开初的几封还是拆阅了的，但来的多了，感到烦了，就干脆原封不动地化为灰烬了。这也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在校内传播着。过后，人们才琢磨着，这不是什么清高不可攀，而是在学生期间，就应当专心致志打好知识基础，不可动情分散心神。这种谨慎的态度，得到了老师和许多同学的赞赏。青春是美好的，宝贵的，要使自己活得有意义，就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宝贵时期，珍惜它，掌握它。在校的青年校友们，你们以为如何？思索一下吧，思索会增进人的智慧！21世纪，是属于今日和明日的青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珍重呵！

参观延安尽管是短暂的，但它给人的印象至深，至今每每忆起我们不免心潮激荡。

## 寒假宣传团

1942年寒假，学校组织了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救国。这在当时文化不发达的陕北，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由于我在当年被选为校学生会的主席，被校方指定为宣传团的团长。随团的老师有杨兴、

陈士斌等。宣传团是以演戏为主要形式开展活动的，排练的剧目大小共十多个，大本戏有《穷人恨》（秦腔）等，小的如《十二把镰刀》、《两亲家》、《兄妹开荒》等歌剧。这些剧种、剧目，当时是很受群众欢迎、喜爱的。我们所到之处（今子洲县各镇），地方政府很为支持。如在双湖峪，县长曹华山同志还亲自领我们安排住食和演出事宜。演出多在逢会遇集的日子，戏场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变化起伏、悲欢，每当我们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多是挽留叫再演一两天。剧团的成员有杨达（副团长兼拉板胡）、邢宏（演员兼拉板胡）、姜应宗、田家凤（女）、张彩萍（女）、安全、薛增禄等，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从此一生从事文艺工作了。

宣传团在随团老师们的指导下，如期完成了任务。这种大众化的宣传形式，是群众渴望而乐于接受的，因而也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如在演出《穷人恨》时，不止一次，会场上有人伤心落泪。我觉得通过下乡宣传、演出，对学生们也是深入实际接近了解群众的良好机会，是一个参与社会实践的锻炼。全国解放后，我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了16年。当时正逢学校教育强调“正规”，教育部一度也很是强调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即使在假期，学生们也要完成繁重的作业任务，因而就很少看到学生们参加社会活动了。我以为，适当地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校外活动，对学生来说，既可以丰富知识，扩大视野，增长实际工作能力，又可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采取多种形式做些宣传教育群众的事，这是有益的。当时绥师参加宣传团的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绝大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

## 整 风

警备区的整风较延安来得晚些。1943 年的上半年，是我们三级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整风”临头打乱了原定的教学计划和安排。社会上的“坦白”风一时也吹进了宁静的校园，上课停止了。不知为什么学校这时出了几个模棱两可的题目（如共产主义是不是舶来品等等），让学生们讨论和辩论。有时社会上的坦白大会也在绥师的操场召开。记得在一次大会上叫雷加上台坦白，他只反复地说：“我，雷加，山东人。”后边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人们认为他不老实，不坦白，高呼口号，可他总还是那两句话。雷加，何许人也？学生娃们是不知道的。1943 年下半年，我被分配到专署保安处工作，又见到了这个山东大汉雷加（他也是调来保安处工作的），过了一段，混熟了，有时就说“我，雷加，山东人”和他开个玩笑。日本投降后，雷加和许多外来的同志被陆续调走了，我们从此就再未见面。以后在报刊上偶尔看到他的一些文章，并得悉他在作家协会工作。在那次坦白大会上，还有位老太婆硬是要上台坦白，人们拦她不住，问她坦白什么？只听她说“坦白好，坦白好”，坦白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在这种气氛下，校园的空气也逐渐加温紧张起来。一个低年级同学张某坦白说，他每天吃半升黑豆，任务是在课堂上打屁扰乱秩序，竟然有人相信。一个黑夜，中院黑板栏上贴出了一张匿名条子，推波助澜把学校的整风引向高潮。条子的内容是：“××吾儿，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三日之内要你们的狗命！”特务的气焰竟如此嚣张。绥师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也向上表白，180 余名学生党员中，只有 8 名是可靠的（是保安处长说的）。难怪在我进牢的同一个晚上，还有十几个同学遭到和我同样的

命运。在如此混乱、困囿中，许多人是身不由己地滚动着，磨砺着。有位低班的同学刘××，在牢里丢甩火柴盒，自我默测：如火柴盒立起了，自己就可以逃跑出去。可巧盒子立起了，坚定了勇气，他就借“放风”之机越墙跑掉了。也有的同学在学校幸免挨整，但在暑假（10天）回家被当地政府抓捕，如我同班的张××等。我是坐了31天牢房被放归学校的，虽含冤忍辱，而胸中却是坦荡的。假期后，我们班因上半年停课整风，又延长了半年。可校方叫我到地委宣传部去谈话，部长李华生要我去保安处工作，我也觉得在校被整得灰溜溜的，早点离开也好。内心中我激励自己：人活着，要活得硬朗，活得豁达，绝不可因一时的挫折而自暴自弃。

幸好，整风后期党中央进行了甄别工作，号召所有“坦白”的人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保安处的甄别工作，是在1944年冬到1945年春进行的，对我的甄别结论是“历史清白，政治上无问题”。（党籍直到1945年夏才得到恢复）嗣后，人们才弄明白，整风中出现的逼供信，根子还是康生的那本《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混淆了两类矛盾，造成了一度的扩大化。好在中央一经发现，及时做了纠正，使整风得以健康发展，取得了伟大成绩，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组织上、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1943年的后半年，有两次我被处长派去绥师参加了一些老师的坦白会（在学校图书馆开的），当我看到上半年还是整人的人，这时也在坦白会上唱主角，我想象不出此时他们内心作何感想！我只悟出了一个理，大凡引火烧人者，最终往往也烧到了自身。这绝不是什么幸灾乐祸，而是告诫人们，凡事不可怀有私心。

记不准是1944年夏还是秋季，保安处曾借用绥师中院的一套房子，举办了一次整风甄别工作的展览会，我也参加了展出工作。为了揭开绥师那张匿名条子的迷雾（这时其他问题在甄别中都已澄

请)，在展出之前，保安处派杨华同志到绥师召集所有的教师，要求每个人照匿名条上的话，一字不漏，正、草各抄一张，一律不具名。在收集各人抄写的纸条时，杨华在可疑者的纸条上打了小记号，为了进一步核实，又将所有写好的纸条，连同那张原始的匿名条，一同送给绥德城里一位有名望的书法爱好者，让他辨认其中哪一张和匿名条的字相同。不谋而合，再次证实保安处的侦断，实为条上点名的人自个儿写的。随即就找他谈话，事已至此，他也供认不讳，写了交待材料，说是为了借整风之机，抬高自己，进而捞取个“官”当。我们展出的时候，就将原始条子、以后本人抄写的两张和交待材料一并展出。真相大白，消除了人们当时对此现象的不解。这个案例，再次告诫人们：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必须坚持，不老实的人，最终是占不了便宜的。

离开母校已经快半个世纪了，现在我也年近古稀，真可谓岁月流逝。但岁月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却带不走在母校那些温馨的往事。当你轻轻启开那记忆屏幕的时候，根本无需翻阅什么资料，就会随手检索到许多可贵的历史镜头。人们不会忘记那些为革命事业发展呕心沥血的创业者。值此母校 70 周年校庆之际，仅将在校期间照片断回忆献上，作为一点微薄之礼，寄托我对家乡和母校的深切怀念之情。

## 记忆中绥德师范的一段历史

——从1940年到1942年

何杨著

绥德师范由我党、我军和政府从国民党统治下接收过来，经过大量工作，变成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

1940年初，绥德的国民党专员逃跑了，绥德师范的校长白焕亭也带着绥师的部分教师和学生逃跑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校舍和100多名学生。教师留下的只有丁子文、李腾九、栾丁生、栾耀民。课程不上了，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中除地下党员外都以国民党为正统思想，不信任共产党，有的还惧怕共产党。

当时离绥德米脂只有一二百里的响水和榆林是国民党统治区，分别设有师范学校和中学，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但是经过我们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国民党的这种企图彻底失败了。那时绥德地区是警备区，驻军三五九旅首先派女党员杨滨同志进入绥师（相当于军代表），还派许多部队干部到绥师代课，如宣传科长刘亚生和刘澎等都代过课。

绥德公署派霍仲年同志为绥师校长，丁子文为教务主任，还有训育主任。先由党员温×××（名字记不清）担任，后来由有教学经验的老党员刘宪曾担任。公署接收绥师后，又新招学生100多人。全校分五个班，三一级一个班，三二级一个班，三三级甲、乙、丙三个班，教员奇缺。除前面说的三五九旅派许多干部代课外，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就陆续派教师到绥师，有延安中学教师，有

中央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还有中央青委系统的同志，如杨述（当时称他欧阳）和韦君宜同志也带过课。师资质量也在边区是很高的，教学效果都很好。

学校设有公民、教育、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课程。记得杨滨同志主讲全校公民课（就是政治思想课），教育课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汤般若主讲，我讲全校的数理化。

回想这段绥师的历史，很怀念杨滨同志。她原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念书，参加革命后，上过陕北公学，后来到前线，参军后在三五九旅宣传科工作，是绥师最早由部队派入的女党员，当时才24岁。那时她要做繁重的学生工作，还要代课，在边区派教师到绥师以前，公民课和数理化都由她讲。她讲课有很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学生们没有不被她感动的，学生都很钦佩她。就是被她批评，有缺点的学生都钦佩她。记得她讲的党的抗日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对消除学生的正统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绥师发展党员是很慎重的。在1940年的时候，教师中党员只有两人，学生党员多于教师党员。1941年以后，教师才有党支部，教师党员增加了，学生党员也有发展。

那时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都要经过长期了解，发展的党员在学校学生中有威望，能在学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发展党员很注意自愿。有一位同学是发展对象，经过谈话，让他看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现这位同学没有迫切要求，也就没有发展。另一位同学，经过谈话，态度很明朗，在班上各门学习成绩都优良，在学生中有威望，家中很贫苦，经过政治学习，个别教育，觉悟提高很快。这位同学被发展入党，他入党以后在班里起一定作用。他



的嘴很笨，但遇到问题时敢于争论，并有说服力。

记忆最深的还有暑假时期到延安的参观访问。延安到绥德有400多里路，中间有九里山，一路都是步行，要走六七天。1941年暑假，米脂中学、绥德师范两个学校共100多个学生由高云屏（米中教员）和何楠若（绥师教员）领队到延安访问。一到延安就受到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热情接待，所到各机关单位，招待所都很好。特别幸运的是，受到毛主席两次接见。中央领导同志除刘少奇、周恩来不在延安，其他领导都接见了。最值得提出的是毛主席第二次和同学见面。他从延安北门外来到南门外边区政府，由谢老陪同。一进入会议室，和师生一一握手。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何楠若”。以后就坐下来向学生们询问绥、米地区干部情况，和学生研究绥、米地区人多地少怎样解决吃粮问题，是不是可以用精耕细作的办法，最后丁浩川和高云屏把准备好的笔墨、粉红色的16开马兰纸交给主席，请主席在师生名单册上题词。我记得题词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学而时习之”、“向上”等等。这都表明党中央对绥、米青年学生和边区人民的期望。进一步说明我们党是坚持抗战，关怀青年的，关怀边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在我们参观时期，还遇到山西省民主人士的参观团，说明全国进步人民是向着共产党的。

这期间还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该学校的学员都是我军从华北各个战场上俘虏过来的，这就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宣传我党“游而不战”的谎言。这个学校人数记不清了，校长是野坂参三。他们热情欢迎我们，为我们表演歌舞节目。在交谈中知道，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

总之，通过参观，学生们亲眼见到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人才。延安虽然是个穷山沟，只有100多万人（指整个边区），四面被国民党重重包围，但是学生们清楚地看到，国家的前途希望就在革命圣

地延安。以后绥师学生再也没有像1940年暑假那样往榆林那边跑的了。绥师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

1983年4月25日

## 活跃在绥德的少年救国团

张雄伟

1940年初，发生了绥德事变。何绍南逃跑了，绥德师范的校长白焕亭带领一批教师逃到了响水，办起了一个伪绥师。绥师的一批有钱有势的学生分别到了榆林、响水去上学。绥师面临着：第一，缺乏教师；第二，留下的学生极少，难以开班。如三二级在入学时分甲乙丙三个班，而当时只能凑合三四十人开设一个班；第三，缺乏经费。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接管了绥师，指派霍仲年任校长，从延安调来一批革命的老师，陆续招收了一批批学生，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国共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一面打着抗日的旗号，一面制造摩擦推行反共政策，调集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绥德作为八路军的警备区，地处抗日前线，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又有东边的阎锡山，北边的高双成、傅作义，西边的马鸿奎、马步芳等军队的封锁，给我们党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学习期间经常受到日本的空中骚扰。当时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害怕日本人打过黄河，家乡沦陷；害怕国共打起来，八路军抵敌不住；有钱的人害怕打土豪、分田地。

在革命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初步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树立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是全国人民唯一共同目标。

1940年秋季，邢宏谋和我商量，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娃娃，如何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作一点贡献呢？捐钱吧，是短期的个人行为，再说自己没有经费来源，经常和家庭要钱有困难；参军吧，年龄小，不够资格，况且我们正是长知识、长身体阶段。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绥德成立一个少年救国团，组织一批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采用各种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两人分头到各年级找一些同学说明这个想法，取得他们的赞同，然后通过各年级的积极分子，采用滚雪球的办法，个别工作，个别吸取，没用多久，绥师的少年救国团正式成立了。邢宏谋同志任团长，我任副团长。

少教团成立后做什么具体工作，怎样进行宣传？经过多次研究和实际探索，只能利用课余时间，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唱歌演戏的方式进行宣传活动。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怎么开展工作，没有人指导，经过商量，决定找绥德分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丁秀同志，说明我们成立少教团的目的和遇到的困难，请求他们帮助。结果，得到了青教会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派人来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有时在经费上给支持一点。为了好开展工作，我们商量确定，请刘采石、俞平老师教唱歌，教指挥；请延安来的老师排戏、当导演；请政治课老师辅导我们解决矛盾，使我们懂得党的领导的重要。

绥师的少教团成立起来开展工作之后，我们两个又商量，认为仅绥师有这个组织还不够，应该让其他学校也组织起少年救国团。经过我们的工作，很快在女小、附小也成立起少教团，绥师成为总团，其他学校为分团。平时以各分团单独活动，必要时由总团统一

组织全市活动，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老一批团员毕业参加了工作，新一批团员又产生了，这样持续了几年。1943年我们离校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这个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向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第二，教育群众，首先自己受到了教育，坚定了团员们的爱国信心，逐步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三，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通过这种文艺宣传活动，使一些同学在文艺方面发生了兴趣，向文艺方面发展，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在文艺工作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全国音协的党允武，陕西音协的李作柱、马倬，出国歌唱的刘燕平，京剧演员刘燕贞（已故），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郭阳庭、姜应宗、刘斌、李景元，陕西作协的王绳武、王丕祥，陕西歌剧团的李鸣九、安锡爵、安芝琴，西安市歌舞团的张彩萍，陕西戏剧学校的薛增绿，陕西舞蹈协会的王富贵，陕西歌舞团的刘怀礼、白秉权。在北京的刘燕生、刘荆兰等等。至于邢宏谋和我等人，锻炼了组织工作的能力。

我们在学校的中心是学习，增加知识提高文化。在党的培育、领导下利用课余时间，为抗日救国作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今天写成短文，献给母校70周年。

## 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我们

刘星汉 郭守道（执笔）

抗日战争时期的绥德地区，是延安通向我各解放区战场的咽喉，是一个统一战线区。国民党政府任这里的专员何绍南是一个反共摩擦专家。他不但经常拨弄是非，破坏团结抗日，而且还贪污白

烟，贩卖鸦片，欺压百姓，坏事做尽。

1940年春，这个专靠吃摩擦饭过日子的何绍南，竟然指使保安团发动叛乱，进攻八路军。为了保卫抗日的总后方，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进行抗击，一举击溃敌人的进攻，肃清叛乱，将这伙恶棍赶出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此后，这五个县就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当时，我们正在绥德师范读书。在何绍南统治下的绥师，不许学生发表抗日言论，不许唱抗日革命歌曲，不许组织学生自己的团体——学生会。学生被打进闷葫芦里，整天地死读书，读死书，被迫接受法西斯教育。进步的教职员工遭受迫害。赶走何绍南后，学校像换了一个世界。三五九旅和中共绥德地委向学校派来了进步的教员，与原学校的进步教员和学生一起，冲破了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枷锁，使学校生活活跃起来了。学生会成立了演剧队、歌咏队、读书会，墙报也办起来了。在五四青年节时，还举行了一次绥德地区的大型的运动会，盛况空前。同学们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经常自由结合，召开辩论会，讨论国家大事。了解实际，探求真理的欲望，使他们十分向往延安。在1940年上学期将要结束时，很多学生向学校提出要求，要到延安去参观。

在国民党法西斯教育下的绥师学生，因受欺骗宣传，中毒较深，在赶走何绍南后，一部分落后的教工和学生对共产党、八路军仍抱有很多的错误认识。如说：“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八路军游而不击”呀，“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何必要共产主义”等，因此，到延安参观很有必要。

三五九旅、绥德地委、青教会、学校当局对学生们追求真理的要求都十分支持，并给了具体的帮助。1940年6月下旬，我们开始了去延安的准备工作。不巧，遇上了日本鬼子要进攻河防，绥德天

天发防空警报。为了安全，我们每天清晨出发，天蒙蒙亮时跨过无定河大桥，到绥德城东五里的辛店村去组织队伍、学习和准备给养，做一些同学家长的解释动员工作，晚上返回学校休息。

辛店是刘星汉同学的家，我们的大本营就设在刘星汉家里。刘伯父、伯母对我们十分热情，十分喜欢我们这一群勤快活泼的青年。老两口主动地为我们去延安的人烧水做饭，处处操劳，使我们能够早日成行。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一切都准备就绪。正式组成了六七十人的参观团，名称叫“绥清青年赴延安参观团”。1940年7月1日，我们从绥德出发。带队人是三五九旅派到我们学校的教员杨滨同志，团员主要是绥德师范学生，还有绥德少数的小学教师。到清涧后又吸收了清涧少数青年，所以叫“绥清青年赴延安参观团”。

我们参观团，是按照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自背行李和粮食，到宿营地后自己挑水做饭。一路上我们唱着黄河对口曲，唱着我们陕北的信天游，你问我答，歌声此起彼伏。大家情绪激昂，精神饱满，十分愉快。虽然暑天行军，并不感到疲劳。杨滨老师是一个坚强精干的受我们尊敬的女同志。她处处给我们带头，我们男同志更不能落后。经过六七天的长途跋涉，终于看到了久久盼望的，象征革命的宝塔山，我们顿时心花怒放，精神为之一振，步伐加快了，比预计提前到达了延安。我们被安排在延安的东山西北旅社，住进了窑洞。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是十分简陋的。但就当时来说，我们是受到优厚的待遇。此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参观和联欢活动。

在延安的活动大约近一个月。我们参观了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工厂、群众团体。受到了负责同志的接见，高岗、王明也接见了我们。高岗满脸大麻子，讲话很粗野，譬如他给我们讲话说，白焕亭

压迫学生，如狼趴在巴儿狗身上硬干。而王明，大家说他像白焕亭，长得矮，养得又白又胖，嘴巴很会讲话。这两个人，我们当时对他们还是尊敬的。在延安的青年领袖冯文彬、李昌给我们讲青年运动。在鲁艺，还见到了茅盾先生。遗憾的是，到延安不几天，我腿上长了一个疖子，肿疼疼痛不能行动，因此对有些地方的参观，我只好放弃。可是每当别人参观或联欢回来，大家得到的巨大收获和极度兴奋的情绪，总是感染着我。这样白天参观访问，晚上接待单位还招待我们看电影，看演出。利用空闲时间，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们的热血在沸腾着，我们完全被陶醉在幸福与欢乐中。

大概在7月下旬，杨滨同志通知大家，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地点在杨家岭。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高兴极了。虽然我腿上的疮未痊愈，但我想爬也要爬到杨家岭去。1935年后的陕北，是红、白两军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宣传机关为了丑化毛泽东同志，不知用了多少笔墨，如说他长着蓝眼睛，红头发，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造成一种很坏的印象，视朱、毛红军有如恶魔。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国民党的宣传不起作用了，然而我们还是急切地希望见到这位被丑化的领袖，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接见这一天，我们来到了杨家岭，被安排在一个有三间教室大的长方形的大厅房里。靠墙的中间的一端，是由黄土垫起来的一个长方形的土台，算作主席台，台上放着一张长条木桌。主席台下用石块和檩条木方子架起几排座位，像是临时架设的，这是专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六七十人，排成长队，鱼贯而入，每个人找了自己的座位，很有秩序地坐定。招待我们的同志给我们倒茶、递烟，不一会儿我们都安静下来。从门口传来了脚步声，毛泽东来了。我们大家起立致敬，鼓掌欢迎。毛泽东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稍作询问后，就大步登上主席台，开始给我们作报告了。记得报告的题目是《中

国的前途》，内容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社会主义则是它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毛主席的讲话，我们感到十分新鲜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师，受的是法西斯反共教育，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宣传，什么“中国要向土耳其的凯末尔学习”；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什么中国现在不能实现民主宪政，要经过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宪政……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话之后，真是茅塞顿开，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思想上得到了武装，觉得自己明白了很多道理，也觉得有资本去说服那些受蒙蔽的同学。

主席谈问题幽默而形象。比如他谈到中国前进的步伐时，用骆驼进行比喻。他说，抗战以来中国的进步，如骆驼式的。他在讲台上边踱着步子，边绘声绘色地讲：嗒嗒，嗒嗒，好像一匹任重道远的骆驼在前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当时体会他的意义是：中国的进步看起来很慢，但步子迈得很大。

主席身体高大魁伟，穿着一身旧的灰色军装，脸面黑黄而清瘦，不断地吸着纸烟，看来身体不够好，像是很困倦似的。我想这大概是他忧国忧民长期辛劳的结果。他讲起话来，紧锁双眉，像时刻在沉思着。可是他目光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很有节奏的一口湖南方言，有力地抓住了我们。大概讲了两小时，最后，微笑着结束了他的报告，并征询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就将平日在绥师时同学们在一起辩论过但未能解决的问题，写在小纸条上递上去。如：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假三民主义？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为什么是错误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主席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做了回答，而且对我们的提问做了评价，说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政治水



平还不低呢！这当然是对我们青年人的一种鼓励。回答完问题后，有的同学拿出自己的手帕，请主席题字。我现在还记得主席给我们的领队杨滨同志、延祖铎同志题了字。然后，主席在我们的簇拥下，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大厅。

主席走了，那平凡而伟大、朴实而深沉的形象，却永远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有意吹捧毛主席，在主席名字前面加了四个“伟大”。主席接见斯诺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中说，他感到“讨嫌”，他承认他只是一个“教员”。确实，从我们当时做学生的角度看，主席给我们的印象，他是一位热爱青年、受到我们十分尊敬和爱戴的、循循善诱的“老师”。见过毛主席不久，我们就结束了参观，准备返回学校。可是很多同学感到延安什么都好，不愿意返回绥德师范，愿意留在延安。这说明在延安我们接触了各种事物之后，我们已经被完全“赤化”了。但是我们却不能留下来，因为我们到了延安之后，在绥德特务们造了很多谣言，说延河发大水，我们被山洪卷走了。我们被迫当八路军了。为了揭破谣言，为了安慰家长，新接管的绥师，更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在8月初，我们平安地返回绥德。

绥德师范学校在绥师大礼堂为我们召开欢迎会。我们的代表向大家报告了参观见闻。我们几个人还向大家演唱了在延安学会的几首歌曲。如《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等，赢得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此后的绥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管，就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下前进，成为革命的摇篮，为党培养出一代一代的新生力量来，散布在祖国的大西北，以至全国的各个角落。

## 雏雁南飞

——记绥师组织的一次参观访问延安的活动

王孟祥

### 一、旅途上

1941年暑期。

警备区青联组织的赴延安参观访问团，在一面鲜红的队旗引导下离开了绥德古城。出南门，过砭上，翻越一步岩山，走上蜿蜒的咸榆公路。这一群男女青年排成队列，像一群南飞的大雁，缓缓地行进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好不热闹。他们那清脆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不时地飘荡在天空，招引出无数的山村姑娘、年轻媳妇和小娃娃。他们纷纷走出柴门站在硷畔上，有的人搭手眺望，有的人倚门伫立，笑吟吟目送着这一伙同龄人从坡底下的大路走过。她们那捉摸不定的眼神是好奇、羡慕，还是想往呢？那一伙小娃娃们，更是活蹦乱跳地呼喊著、追逐着奔跑在队列的左右，一直护送到村庄的尽头，这才依恋地望着远去的队伍渐渐隐没在山峦背后，才又打闹着喊叫着跑回村去了。

我们这支队伍是由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青年联合会组织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去延安参观访问的。人数共计135人，其中女生37人。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由何楠若、欧阳正（杨述）、高云屏三位青年教师率领，延祖铎、高保成分别担任正副

团长。

从1940年赶走了伪专员何绍南，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权以后，这已是绥师学生第二次赴延安参观了。1940年暑假，曾经组织过一次，但那次人数比这次少。因为那时绥米解放时间还很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反动宣传，许多人对共产党还不了解，甚至怀着恐惧心理都跑到榆林、镇川（伪米中）、响水堡（伪绥师）上学去了。留在绥米的学生中除过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外，大都是一些家境贫穷无力外出就学的人。也有人持一种观望态度，看世事会不会再变。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教育青年，彻底肃清国民党的反动影响，才组织了这次活动。所以看起来这是一次普通的参观访问，但实际上是一场同国民党争取青年一代的斗争。由于家庭情况不同，思想状况也各异，在组建队伍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队伍刚建起来，社会上立刻便谣言四起。有人造谣说，“八路军借口征兵哩，娃娃们去了再也回不来了”，也有人造谣说，“骗到延安去先洗脑筋，洗完脑筋就送上前方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不仅动摇着家长们的心，也动摇了青年们的心。有的人临行前决定不去了，有的家长挡住孩子不让走。致使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混乱。鉴于这种情况，警备区的领导都很重视反复动员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团结互助，排除困难，搞好这次参观访问。事实上这次参观意图，不仅对于广泛地团结青年学生，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今后推动绥米的青年运动，争取旅外青年学生的工作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保证这次访问的顺利进行。

离家出远门，对于仅仅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思想顾虑本来就多，更加上社会上许多流言蜚语和可恶的谣言，使同学们都心事重重，疑虑很多。有的同学是经过家庭斗争才参加的，

但精神上总是带着一些不愉快。所以对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仅在感情上带着一些离别的忧愁，思想上也还多少有些疑虑和恐惧。但一到旅途上，情况就完全变了。这么多的男女青年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关照，有说有笑，又唱又闹，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了。开始的那种离家后的孤寂，对未来命运的疑虑、恐惧和困惑，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反倒觉得这种生活新鲜有趣，充满了生气。

这支不大的队伍，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道路。出没在黄土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有时候一直爬上高高的山巅，俯瞰脚下的千沟万壑连绵不断，就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在脚下荡漾。我们就像一只小小的雄鹰飞翔在浩荡无涯的空中。走在队伍前边的小红旗，迎着灿烂的阳光随风轻轻地飘扬，显得格外艳丽夺目。道路的崎岖更增加了行军的乐趣。我们一会儿爬行在山腰里，活像一条蠕动着的长虫。一会儿行走在高高的山岭上，把群峰都踩在脚下，显得豪迈无比。一会儿跃进深深的峡谷，抬头望去，只见一径蓝天，使人心里特别憋闷。有时候从肥沃的田野上走过，绿油油的禾苗在清风中摇曳发出低沉的瑟瑟声。有时候又穿行在大片的荒草丛林之中，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草！一路上看不完的自然景致，时刻都吸引着青年人好奇的心。每当我们从密林荒野中走过，就让那些美丽的山花和悦耳的鸟鸣吸引得止步不行。生活在这广阔美丽的大自然中，确实使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然最有趣的还是一路上我们往往被野鸡捉弄得哭笑不得，枉跑了许多路程。

那时候，山里的野鸡很多。每当我们从荒山野岭或林木草丛中走过的时候，猛不防就从你的脚下窜出几只，用并不悦耳的歌喉，嘎嘎地惊叫着从你的头顶上飞过，拖着长长的华丽尾羽又躲进离你

不远的草丛中去了，画了一个不小的半圆形。这种突如其来的遭遇，往往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因为这种野鸡在绥来一带很少见到，便觉特别新奇。那雄鸡生得特别美丽，披一身华丽的羽毛，拖一条长长的尾巴，红红的鸡冠，真是光彩艳丽，惹人喜爱。所以，每当它们出现的时候，立刻便引起大家的兴趣。特别是我们几个年幼的男学生，不顾一切地冲出队列，顺手捡起几块石头，飞也似的追了过去。别的同学也都站在路旁给我们呐喊助威，指示目标。几个年龄较小的女同学，更是兴奋地尖着嗓子又喊又跳地嚷着：“捉住它，捉住它，就在那里，再往上走一点点，就在那棵小树旁藏着哩！嗨……”她们终于失望了，因为那些家伙还不等我们猫着腰接近的时候，便又嘎嘎地惊叫着飞到对面的小山坡上，匆匆钻进草丛中去了。女同学们惋惜地叹息着，男同学们愤怒地咒骂着。而我们几个勇敢的猎手又飞也似的跟踪了过去。可是那些精灵似乎有意要捉弄我们。每当我们在同学们的指点下屏住气将要接近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扑”地惊叫一声飞走了。又是飞到不远的地方迅速地钻到草丛里去了。愤怒和失望使我们高声叫骂也奈何它不得。就这样往返几次，往往累得我们汗流浹背，大口喘气。尽管是徒劳的，但也却振奋了精神，给同学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们从这道山坡追到那道山坡，从这道沟又追赶那道沟，追到了兴头上，就什么也不顾了。这时候往往还是老师站在路边上大声地呼唤着我们。回头看时，队伍早已走得很远了，我们才不得不丢掉手中的石块，悻悻地朝野鸡躲藏的地方骂上几句粗话，飞也似的追赶队伍去了。

这种有趣的游戏大都发生在上午。因为野鸡这种性灵大都是太阳冒花的时候乘凉出来觅食，天气一热它们就躲在树林和草丛中歇凉去了。等到它们再出山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太阳压山的时候了。对于我们这些长途跋涉者来说，上半天精力充沛，有说有唱。而到

了下半年差不多已是筋疲力尽，叫苦不迭了，所以再也没有精力去追赶野鸡。此刻最盼望的就是早点歇息。

当然，最难熬的是炎热的中午。

仲夏，在陕北来说也是炎热的。尤其是爆热的中午，比南方还要使人难过一些。火毒的太阳向大地喷射着灼人的烈焰，田野上没有一点儿风，燥热的空气窒息得使人心慌，没有水喝，嗓子眼儿干得冒火。队列中一切都似乎停止了。没有歌声，没有欢笑，只有一声又一声的叹息。越是这种情形，人们就越感到疲劳和烦闷，简直是有点儿昏昏欲睡了。行军的队列更加散乱了，每个人都像被太阳晒蔫了的禾苗一样低垂着头，无精打采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蹒跚在滚烫的道路上。长长的队列就像一条有病的长虫缓缓地在山间的小路上蠕动。连周围的山野里也没有一点声音，大地就像死了一样的沉寂。年轻人最受不了这死一般的沉默，这种憋闷的气氛简直使人受不了。可是在这种时候谁又能唤起人们的乐趣和热情来呢？就连平时最爱闹活的小百灵，人们也只见她哭丧着脸，噤着个嘴连一句话也不说了。还有那几个最爱采摘花的女同学，此刻也一颠一簸地远远地落在后面，即便看见崖畔上的山丹丹花红得像火一样的绚丽耀眼，也再引不起她们的兴趣了。只要碰到一块阴凉地，她们便会一屁股坐在地上喊一声“哎哟！我的妈呀！累死人了！”于是便连也把她们拖不起来了。每当这时候，老师就派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跟在她们身边，等着她们稍事休息便连哄带扶拉扯着往前走。但是看到她们当时的那副可怜相，真叫你哭笑不得，恨不得把她们背着往前赶呢！

最辛苦的是带队的老师们。他们跑前跑后，招呼着队伍，照顾着小同学们。特别是我们的欧阳老师，往往在这种时候倒显得更加精神。上午，他走到队伍前边，严格地控制行军速度。唯恐小同学

掉队。我曾几次被他按着头坐在路边，一直等到队伍过去了很久才赶上队伍。因为我最爱往前跑。下午他就走在后边和掉队的小同学走在一起。他不时照顾这个，搀扶那个，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为鼓励同学们继续向前，他不停地给同学们讲故事，吟诗词，想尽办法做着鼓动工作。凭着他博学识广，才鼓起青年人的热情，打破了旅途上的沉闷。

欧阳老师在学校就很受同学敬重。他中等身材，体格瘦削，黧黑的脸膛上闪耀着一双聪慧明亮的眼睛。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对待同学也很热情。所以同学们平时也和他接近。在学校他给我们上语文和政治。尽管他操一口难懂的江南口音，而且口才也算不上流利，但人们依然爱听他的课。原因不仅是他讲课特别认真，深入找出有趣生动，而且每讲一课总要讲一些课本之外的东西，大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开阔了思路。同学们时常在背地里爱议论老师，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最有学问的老师。特别是他的古文学修养造诣很深。在行军的路上，他背诵了许多诗词，从唐诗宋词到《红楼梦》、《水浒传》中的许多诗词，他都能背得很熟。此外，还讲了许多故事，诸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天方夜谭》中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青年学生的心。对于欧阳老师的过去，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他是在赶走何绍南之后从延安派来的。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且还是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组织者呢。在一次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活动中，青联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他生动地叙述了“一二·九”那天的情况。那天早晨天气很冷，他们住在城外的清华学生，冒着严寒冲进了西直门，和爱国学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前同反动派的大刀水龙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那悲壮的情景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舞着我们这代青年人，于是大家把欧阳老

师不仅仅看做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且还看成是革命道路上一位可尊敬的导师。所以不仅在课堂上，即使在课堂外，也都敬重他，都愿去找他谈心。而他也时刻关心青年的成长。即使在艰苦的行军途中，他也结合着背诵的诗词，和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当他给我们念到“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苗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油煎，公子王孙把扇摇”时，结合当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实，说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这样讲解同学们就很容易理解。经过欧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鼓动，同学们的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了。静静的群山中又回荡起嘹亮的歌声、笑语。大地似乎苏醒了。

我们的队伍在烈日的照射下继续向南走，向着我们心中的明灯——延安前进！

## 二、山村夜宿

我们这支队伍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既感到新鲜又觉得陌生。白天行军在路上，大家一起，说说唱唱，打打闹闹，采野花，追野鸡，觉得特别有趣，玩得很痛快。所以不感到离开父母和家庭的孤寂。到了夜晚，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黄昏以后，听不到妈妈的呼唤声，看不到自己熟悉的窑洞，便不知有一种什么滋味莫名其妙地袭上心头。这时候，人们的话也少了，都想着心事。特别是那些年纪很小的女同学，还偷偷地抹眼泪。离开家虽然只有两天，但在心理上似乎已经过了很久。

看看那陌生的山峦，听着那异乡的语音，突然觉得离开家乡已经很远了，一切都和家乡不一样了！

今夜宿在拐郎，离延川县还有好几里。有一条小河把马路和村



庄分开。我们为了方便就住在马路边上。这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住房也很少。四面都是高山环绕，只有河上的小桥可以通向县城。村子虽然并不起眼，但是沟里的那条小河清澈得十分诱人。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借来三孔破窑，其中一孔还是几年前圈过羊的。如今羊虽然已经不圈了，但是那股刺鼻的羊臭味和羊膻气闻起来很难受。况且窑洞都很简陋，没有门窗，只用酸枣条编成的笆子挡在门口，有一方小小的土洞，栽了几根细棍，权当做窗户。窑里又黑又暗，土炕上没有席子，更没有毡，借来一些麦草铺在炕上。今晚就要在这里过夜了，这种住宿条件在绥米一带还是很少见的。对于出身贫寒的学生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对于那些出身富裕的学生情形就不同了。特别是那些多少还带着些娇气的女孩子们，简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更何况，有些人还得露宿在院子里。尽管这样，经过解释以后，大家也就没什么怨言了。因为人们总还是愿意革命的，而革命总得要艰苦一些。几小时，坐也能坐得明。

但是想不到一件意外小事，却给同学们带来了恐惧和不安。

我们到达拐沟的时候，天气尚早。由于天气炎热，一路行军早已把人们的衣服都汗湿透了，大家都想去小河里清除一天暑热和满身的污垢，凉快凉快。特别是那些在无定河耍水耍大的男同学，更是见水就没命了。得到允许后，大家都纷纷跑到河边去了。在小河谷里，碰到一位老大爷，他刚刚给一群绵羊洗完，正在石岩下歇凉。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孩子们本来就好奇，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更想问问民情和乡俗。我们一群男同学围住老大爷问这问那，和善的老人家也笑嘻嘻地有问必答。突然一个小同学问老汉：“大爷，这里有狼吗？”老汉毫不迟疑地说：“有啊！夜黑间还来了个狼，拖了一只羊！”

就这样一句生活中极为平常的话，想不到在这群稚嫩的孩子

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犹如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微波，牧羊老人的话很快像风一样地传开了。“这里有狼，昨夜还在院子里拉走一只羊，这是放羊老人说的，不骗你！”同学们就这样传播着，越传越玄乎，致使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很紧张。特别是那些小同学和女同学，胆子本来就小，这一来胆子就更小了。她们看着这门窗就连觉也不敢睡了。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山野里笼罩着朦胧的夜色，远山近山都有些隐隐约约地模糊了。窑洞里黑乎乎的连什么也看不清。人们都依偎着挤在一起不敢睡，甚至连门外也不敢看。似乎只要朝外边看上一眼，门口蹲着的大灰狼立刻就扑进来了！偶尔听到山野里传来几声野狐和猫头鹰的啼叫时，就吓得推一推伙伴说：“你听见了吗？”“听见了。”那低微的回答带着恐惧和不安，接着便是低微的嘤嘤咽泣了。

夜，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闪烁着耀眼的微光，使得北方山区的夜空更加深邃而高洁。

这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在继续蔓延着，自然会影 响大家的休息和睡眠，也会影响次日的行军。为了确保安全，也为了安定人心，只好组织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巡逻，从心理上解除大家的恐惧感。

夏夜在北方的山区，有着一 种特别的景色。山峦是黑黝黝的如同剪影，天空都是特别的清亮明净。深蓝色的天空上闪烁着璀璨的星星，像淘气的孩子眨巴着晶亮的小眼睛。望着那神奇莫测的苍穹，觉得这宇宙太空是多么高远而又广阔，而一个人在大自然间又显得多么渺小啊！夜深了，山风吹来感到微微有些凉意，倒也特别舒心。远山沉浸在苍茫的暮色中，隐隐绰绰仿佛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格外的迷人。沟底下的溪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出潺潺的声音，无止无息，仿佛有人在不倦地弹琴，再加上热烈的蛙鸣和促织的歌声，

以及猫头鹰的啼叫，组成天然的一曲田园交响乐。我热爱这夏日的夜晚，也爱听这山野里的歌声。

那还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也就是我还没到城里念书的时候，每年夏天，也就是这样的暑假，我家的瓜园就要开园了。就在这瓜熟果香的季节里，我最爱待在瓜园里。且不说随时有新鲜的甜瓜、西瓜可吃，最使我贪恋的还是那夏天的田野。那绿色的庄稼，金黄色的南瓜花，以及各种各样的昆虫的鸣唱，尤其那幽静的夏夜最使我神往。所以每年夏天我最爱住在瓜园里，特别是到了晚上，躺在瓜架上看星星。天也像今夜这样的明亮、湛蓝，星星也像今夜这样的晶莹闪亮。我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天上的星星，但我怎么也数不清。人们都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个人。我在寻找天上的星星，哪一颗代表着我呢？不知道。当然，夏日的夜晚也有使我恐惧和不安的时候。那大半是黄昏，这时候，父亲和哥哥都回家吃饭去了，只留我一个人在瓜地看瓜，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乖乖在瓜架上待着，别下来胡跑。庄稼深了，小心有狼！”于是我就不安和恐惧地呆在瓜架上，点着了艾绳，人们说狼是怕火的。看看周围的高粱、玉米地黑黢黢地，不时还发出“格吧！格吧！”的声音，据说它们也是在长个子哩！但我还是有些害怕。心里暗想：也许是有人来偷瓜，也许是狼躲在庄稼地里。我盼望着父亲或哥哥快来，但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就是不见他们到来。为了壮胆，我只好拼命地唱山歌，一首接着一首，谁知唱了多少！有几次我确实听到过从无定河畔沙滩上传来过呜呜的狼嚎，那声音悠长而哀婉，仿佛在哭吼，又像在哀叫，听起来真使人毛骨悚然。那时候我真的害怕了，有一次还吓得哭起来了。但那时候我毕竟是躲在高高的瓜架上，我知道狼是不会爬上瓜架来的。可是今晚同样是美丽的夏夜，然而我却不是在故乡，更不是躲在瓜架上，而是在陌生

的异乡一个偏僻山村的院子里。因此，尽管此刻的夏夜绝对不比故乡的逊色，但心里却总有一些特别的、说不清的滋味。

为了使同学们有安全感，早一点进入甜蜜的梦乡，轮流巡逻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条枣棍，不时在门前窗户边走动。有时轻声地说几句话，或者是咳上几声。实际上是告诉同学们放心睡吧！外边有人在守护着你们。

夜深了，自然界的喧嚣更热闹了。同学们都渐渐地进入了梦乡，也同自然界那千奇百怪的声响一样，从窑洞里传出来各种各样的梦呓和鼾声。有的叫爹，有的喊娘，有人哎呀，有人畅笑，也有人叽里咕噜不知乱喊些什么！奇奇怪怪，听了叫人好笑。

黑暗渐渐地隐去，天空显现出淡蓝色的曙光，山雀发出了第一声清脆的鸣唱。紧接着，村里的雄鸡也开始争先恐后地歌唱了。黎明即将到来。我们伸个懒腰看着还在熟睡着的同学们，不由得欣慰地笑了。

当太阳从高高的山巅上喷射出第一道灿烂霞光的时候，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行军。

### 三、初识延安

一连几天的艰苦而有趣的行军，终于到达日夜盼望的延安。从东川远眺，巍巍的宝塔庄严地矗立在嘉陵山巅，傲然地雄视着古城山川。就要进入延安市区了，人们那紧张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少同学都雀跃着说：“到了，到了，看，那不是宝塔！”的确是到了。然而就在此刻，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因为延安，这个神圣的地方对于这些人来说，毕竟还是个未知数，等在前面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不知道！

奇怪吗？其实用不着。试想：从1937年设立警备区以后，绥、米、葭、吴、清五县一直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八路军仅仅在绥德建立了一个警备司令部，驻有一部分军队防守河防。而事实上行使统治权力的是国民党的绥德专员公署，以及各县的县党部和县政府。专员何绍南是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有名的反共专家。他在统治期间，忠实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表面上他也高唱团结抗战，实际上却处处与八路军为难，成为有名的“摩擦”专家。为了诋毁八路军，破坏八路军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他不惜暗中指使一些特务分子，造谣生事，大搞破坏活动，然后又嫁祸于八路军，诬蔑八路军不去抗日，专门留在后方捣乱。1939年春天，他们制造事端，挑动蒙蔽一些青年学生闹过一次反共游行请愿，恶毒地诬蔑八路军殴打学生，镇压人民。至于他们利用合法的统治权力，在学校里利用周会、朝会进行反动宣传，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更是随时可见的事了。而八路军的正常宣传工作则处处受到限制和刁难。因此，在社会上和学生中，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还是很深的。1939年秋，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进驻绥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1940年春天，赶走了反动透顶的何绍南，绥米一带才真正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专区。解放一年多的时间，新政权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人们的思想进步也很大，但是要彻底清除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要人们真正地理解认识共产党、八路军，肃清头脑中的反动余毒，还得一段时间和过程。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哪一种灵丹妙药在一时三刻便能解决，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事实去教育人们。就以学生来说，别看他们年幼，但思想还是很复杂的。长期的反动教育，使他们不仅惧怕共产党，也反对共产党。所以在解放之初，不少学生便跟着搬迁在响水、镇川的伪绥师、伪米中去了。

有些家庭富裕的人索性去榆林和西安上学去了。即使留下来的学生中，思想也很复杂和混乱，因而在学生中经常发生两种不同思想认识的辩论，有时候甚至是很尖锐激烈的。当然在学生中的争论，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和家长们的不同的思想、政治态度。正因为这种情形，才组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青年赴延参观访问，让事实去教育这些中了毒的青年吧！我们这次参观访问，就是吸收了学生中各种不同的思想类型和不同的家庭出身的，让他们到红色的首都去走走、看看、听听，进行一点实际考察，接受一点实际革命教育，消除在青年学生中由于长期的反动宣传和反动教育而产生的对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通过他们去团结影响更多的青年人。因此，领导上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从建队之初，到行军的路上，都特别注意根据青年的特征，做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要求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做好团结青年的工作，保证这次访问顺利成功。

这批年纪不大，但是思想还比较复杂的青年人，已经度过了艰苦的旅行，来到了圣地延安。然而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呢，会发生些什么问题呢？此刻是否有人还相信临行之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谣言呢？这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同学来说，看到了宝塔，来到了延安，心里确实是异常激动的。

延安这红色的首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神秘的。但是当你真正地来到了延安，却又感到很平常，并不像想象中的首都那样富丽堂皇。初看起来，她也和北方的山城一样普通。三山围抱着一座古城，延河和南河从古老的城墙下流过。而且那古城的街道早已在1938年被日寇的飞机轰为平地了，如今只留下古老的城墙仍在坚强地盘踞在延河之滨。凤凰山下，留下了行行窑洞，城内则成了一片

瓦砾，很难找到一间完整的房屋了。唯有十字街头，还有一棵古老的槐树伸出一截被弹片削剩下的枯枝挺立在残破的石牌坊旁边，犹如一个独臂巨人屹立在古城街头愤怒地挥动巨手，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日本法西斯野蛮地摧毁中国的和平城市，残杀无辜的平民百姓的罪行！

我们的队伍从东门外绕过古老的城墙，朝南关交际处走去。那时候的交际处，并不像现在的一些招待所那样阔气。在南关小学不远的半山坡上，盖了几间平房，在山根下挖了一些窑洞。平房旁有一个井台，离井台不远有几间大一点的草棚屋，那就是交际处的食堂和厨房。不过我们吃饭经常是蹲在井台旁边的地上，围成一个小圈子。我们最初被带到南关小学的教室里和几间石窑洞里住宿，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大家就在草铺上睡觉。可是第二天日本飞机轰炸，小学校住不成了，就转移到对面山上的土窑里去住。土窑里又湿又潮，晚上睡觉跳蚤的袭击更使人讨厌。白天出去参观，跑一天少说也有几十里路，晚上回来躺下去头一着地照样睡得很香。吃饭仍然要去交际处食堂。十个人围成一个小圆圈，中间放着盛菜的瓦盆，每餐都有香喷喷的小米干饭，还有茄子、南瓜、西红柿做的菜。这样的伙食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那种艰苦的岁月里，也算是对我们的优待了。像我们这些出身贫苦家庭的子弟，一日三餐能吃上这样好的饭菜，已经是很满足的了。更何况过几天还要举行一次会餐，吃一顿白面蒸馍再加上一两个西红柿红烧牛肉，或者红烧猪肉，那简直是等于过大年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大家围蹲在地上，一边吃饭一边谈笑，有时候也谈一些参观访问的印象。也有时说一些笑话，惹得女学生们连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一天，我们去柳林店白求恩医科大学参观。看到外科解剖室的箱子里有一具尸体，颜色很黑，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来苏药味。胆小的女孩子连

看都不敢看。几天来大家想起来就觉得恶心。那次会餐的时候，有个调皮的同学指着红烧牛肉说：“这不像医科大学的肉？”于是几个女同学便连喊带叫地跑开了。诸如此类的恶作剧还发生过很多，但每次都惹得大家笑闹上一阵子便算完事了。

交际处有一个姓金的同志，经常陪我们出去参观访问。我不知道他是否是负责人，但为人和气，同我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金。吃饭的时候，他总要来饭场上转悠一圈，亲切地问我们生活过得惯吗，饭能不能吃饱，菜是不是做得可口。他一再表示，现在条件很差，招待不周，有什么意见请随时提出来改进。有时候他也到我们住的窑洞里看看，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觉得他关心大家，问寒问暖，说话亲切，像个长者，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一点架子。他老穿一套洗得已经发白了的灰布制服，可经常是干干净净的。对于我们这一群远离家乡不识延安的年轻人来说，老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也许他是我们来到延安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这个印象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快就同他混熟了，难免还要开一开玩笑。有时候，他故意拿腔拿调学着我们的绥米话，“你咋吃好了没？看你跟窝红红的，准是想妈妈，夜里偷的哭鼻子了！”每当听他这南腔北调时，大家都会捧腹大笑。他也乐得和大家一起开玩笑、聊天。

最初几天的印象是强烈而深刻的，也是永难忘却的。我们虽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而她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并不陌生。人们仿佛都曾经是熟识的。不论走到哪里，人们是那样地热情、诚恳、亲切，给人一种友好、和谐和团结的气氛。所以，尽管我们都还是些年幼无知的孩子，又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丝毫的陌生与孤独。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和睦友爱的大家庭里，处处都会有人来照顾。大家都生活在紧张、热烈、友爱、诚挚的集



体中。我们走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关心、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走到处看到的都是和蔼可亲的笑脸。于是从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延安的确是一个新的天地，我们都深深地爱上了延安！

#### 四、一位慈祥的白发老人

晚上，老金同志通知我们，明天上午边区政府主席林老要接见大家。这个意外的消息立即使大家高兴地雀跃欢呼起来。林老是边区政府的主席，过去在布告上经常见到他的名字。但是谁也没见过他。在我们的心里自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官了，现在居然要接见我们了。怎么接见呢？他是个什么样子呢？谁也想象不来。许多疑问在脑中产生。因为我们长了这么大，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过去，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只见过何绍南。因为每当周会他就要给学生们训话，笔直地站在台上，连动也不动一下，看起来神气得很呢！或者是每逢他外出的时候，地方上的那些绅士、官员为了讨好，必须要组织全城的学生迎送，手持三角旗列队在东门外的飞机场上等候，一直等上很长的时间才会见远远的地方尘土飞扬，一群人簇拥着何绍南趾高气扬地挥着手从队列前走过。到处警卫森严，看起来是何等的高傲，何等的得意呀！但他只不过是一个专员。而林老呢？是边区政府的主席，管着许多专员呢！更何况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林老是资格很老、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曾经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改组，是国民党的元老。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大家都很敬重他，尊称为林老。所以心里暗想：林老自然要比何绍南官高位显，气派多了！现在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大官就要接见我们了，心里的高兴和快乐自然是不言而

喻的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议论了很久，一直等待着天亮。

边区政府就在南关新市场旁边，离交际处不远。吃过早饭，我们高高兴兴地列着队经过新市场口，再走不多就到了边区政府。那时的边区政府可并不像后来的那样。没有院墙，没有楼房。半山坡有几间平房和土窑，山根下翻了一排石窑洞。此外再没有什么建筑物。窑洞前边是一片空地，种了一些洋芋和蔬菜，还有些向日葵。另外在南边还堆了一些石料，看来是准备要基建的。空地一直延伸到马路边上，靠近马路边还有几个土墙坎，墙坎上还种了一些榆树和刺槐。

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一路上低声地交谈着各自的想法。有的同学谈起他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了林老是那样热情而慈祥。虽然我们都知道她是在做梦，但是那梦有多么幸福，多么美好啊！使我们受到了感染，分享了她梦中的欢乐。今天的读者也许会笑40年前的这些学生娃该有多么幼稚可笑，可是你曾想到过，这样生长在落后偏僻的山区的孩子们，刚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他们何曾受到过重视，又何曾受到过大官的接见？在他们幼稚的心灵里只有苦难和屈辱。人生的道路对他们来说太短促了，而新生活的记忆则更是短促得可怜。所以，他们如今还不能不以旧的眼光和旧的心理来看待新鲜事物。这的确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老金的带领下，怀着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和心情来到边区政府。爬上了一道缓坡，走进一个不很大的平房。房子很低，里边也没有什么陈设。脚地上放了一张白条桌，还有几把木白椅子，一把延安新华陶瓷厂生产的白粗瓷茶壶和几只茶杯。此外还摆了一些小板凳。我们静静地坐在地上等待着。屋里除过我们再也没有更

多的外人。过了一会，从侧后门进来一位老人，个子不高，看起来有些清瘦，但却神采奕奕，显得很有精神。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笑咪咪地朝我们扬扬手表示问候。看他那满头的银发和剪修得十分好看的银白色的胡须，给人一种威严、慈祥的印象。我突然觉得他绝对不像个大官，倒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或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教授。他刚走进门，老师们都站起来拍手欢迎。我们也像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跟着站起来热烈鼓掌。用不着介绍，这一定就是林老了。

林老也像老金一样，穿了一身褪色的粗布灰军装，洗得干干净净，几乎要变成白色了。一双黑布鞋配上一双白布袜，又像一位农村教私塾的老先生，只是缺少了手里拿着的长杆旱烟袋。他走在桌前，微笑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并且客气地说：“让大家久等了！”我们没有说话，只是报以一阵热烈的鼓掌。他缓慢地伸出双手朝大家向下接了接。然后轻轻地咳了一声，说话了。他没有一点老态，也不像有些人的哼哼哈哈。他举止潇洒，说话清晰有力，不时地打着手势。他的讲话缓慢而有节奏，也非常注意抑扬顿挫。与其说他在讲演，倒不如说他在同我们拉家常。就像是上了年纪的老爷爷闲下来同他的儿孙们围坐在一起闲谈一样的自然，随便而又娓娓动听。他那生动有趣的讲话，不时地引逗我们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那时候的首长讲话不像现在这样不论年纪大小，都一定要坐在讲台上，面对麦克风，一字一板地念着早已由别人准备好了的讲话稿，呆板、枯燥，索然无味。那时候开会倒是听众坐在小板凳上，腿上放一块小木板搁着本本做笔记。而首长则站在桌子旁随意地走来走去，一边讲，一边打着手势，有时候索性走在听众的身旁两眼望着对方笑咪咪地仿佛在和你商量。因此空气轻松活泼，大家都无拘无束，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轻松欢快的笑声。

林老的讲话没有稿子，他滔滔不绝地一口气就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过得久了，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记得他曾经讲过国际国内的形势，因为苏德战争就在那时爆发了。又讲到边区的生产建设，同时还讲到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的封锁，给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我们要以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生产来打破敌人的封锁。最后还讲了许多对我们青年人的热情鼓励和关切希望的话。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在精神上既没感到紧张，也没感到疲劳，反而倒觉得轻松愉快，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童话世界里，一群渴求知识的天真孩子们围坐在智慧老人的身旁，倾听他传授智慧和技能一样。

讲话结束以后，林老仍然精神抖擞，兴致很高。还同我们一起走下山坡在院子里窑洞前的坝坎上合拍了一张相。如今那照片也许很难找到了，敬爱的林老也早已离开我们了。但他作为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林伯渠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很有威望的革命家和重要的领导干部，却对我们这些刚刚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不久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这样亲切、热情的关心和教育，使我们幼稚的心灵受到滋润。这重要的一次启蒙教育是永生永世也难忘记的。

## 五、宝塔映着夕阳的斜晖

在延安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安排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听过不少著名人物的讲演和领导同志的报告，参观了不少机关学校和医院团体，也出席了不少次青年朋友为我们组织的联欢会，看过不少文艺团体的演出。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亲切的关怀。在参观访问

的同时，也和不少机关团体举行过友谊球赛。所有这一切活动，都使我们这颗曾经饱受过欺骗和愚弄的稚嫩的心，感受到人生从未有过的欢乐与爱抚。对于延安所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美好、有趣。这种感觉，也是过去十几年来从未感受过的。尽管时间不长，却使我们在思想与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似乎变得聪明了，蒙在眼上的黑纱揭去了，面前是一片光明，整日里生活在友谊、欢乐和激动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是幸福快乐的，从而对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这种心情犹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了春雨的浇灌，尽情地吮吸着雨露的滋润那样。我们每天都在紧张地参观、访问、观察、思考，似乎也逐渐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每天都觉得生活愉快、充实，对未来也有了理想和向往。我们每天都从延河两岸和宝塔山下走过，前去参观、访问。不论在学校机关所见到的男女老少和沿途山沟里的土地上正在劳动的人们，从他们喜盈盈的笑脸上，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生活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是幸福快乐的。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因为他们有理想、有向往。从他们快活的眼神中看不出丝毫的痛苦和忧伤，看到的只是坚毅刚强、勇敢与智慧和对远大理想的向往。为了这个理想，他们才紧张地学习和工作。他们都是乐观的，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歌声和笑声。延安的确是沉浸在沸腾生活的海洋中，每时每刻都发出欢乐的喧嚣，那种强烈地追求、向上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鼓舞、激励着愿意革命的人们。所以我觉得延安的人是自由的人、幸福的人，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尽管延安的生活暂时还是贫困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十分富有的，因为光明的未来召唤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勇敢坚定地前进！

炎热的暑天，延河便成为人们天然的游泳场。在清凉山下，宝塔山底，文化沟口和桥儿沟这几个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游泳场，吸引



了无数的青年男女投身在清澈的延水中尽情地嬉戏。他们游泳、潜水、跳水、打水仗，那个痛快劲儿并不比在今天现代化的游泳池里差多少。每当夕阳西斜，晚饭过后，文化沟的俱乐部，南关体育场和王家坪有名的桃林，以及各机关学校的操场上，更是龙腾虎跃，喊声震天，无数的体育爱好者都在观看各种球赛。自然也有些不好球艺的人便三五成群或双双对对，漫步在延河之滨、宝塔山上。那欢声笑语或柔情细语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鼓。有人引吭高歌，也有人低吟着人们最爱唱的《延安颂》和其他的一些抒情的革命歌曲，使傍晚的延河之滨，到处都飘荡着美妙的歌声。也有些不爱走动的女同志，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高高地卷起裤腿，把两脚伸进水里，一边说笑、歌唱，一边洗衣、洗头，生活就是那么富有诗意，又是那么令人神往。每当我们访问归来，路过延河之滨、宝塔山下时候，看到这愉悦的情景，也不由得会跟着他们低低地吟唱起最近才学会的许多歌曲。假若遇到周末，又是同乡好友互相探访的时候，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开上个客饭，绝不会饿起肚子，晚上和朋友们痛痛快快地玩上半夜，然后打个通铺挤在一起，再亲亲热热地拉上一夜家常，直到东方欲晓。那该是多么使人畅快的事啊！延安就是这么迷人，就是这么美好。人们在这里愉快地工作和学习，自由自在地生活。难怪她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海内外无数的有志青年都聚集在这个古老的西北山城。

那天周末，我们和《解放日报》印刷厂的青年篮球队的友谊球赛刚刚结束，太阳已经西斜了，山川已蒙上了铅灰色的淡淡的暮霭了。唯有宝塔之巅还挂着一抹亮灿灿的斜晖，显得更加雄壮秀丽。这时候暑气将退，比较凉爽了。我们返回交际处，经过南关操场，正好一场激烈的球赛还尚未结束，球场周围围成严严实实的人墙，连南河边的柳树枝上也爬满了淘气的小男孩。球场上发出一阵阵热

烈的呐喊声和笑声，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心想这一定是两个高水平的球队在互相拼搏，我很想挤进去看看，但挤起来很费劲。我转到河边的樟树下，也想学孩子们一样爬在树上，但希望不大，因为差不多树上都已经爬上去人了。只有一半截子树桩，也许可以利用，但是拴在树桩上的小马并不欢迎。我刚刚走近，它便竖起两耳哧哧地呼叫，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没办法我仍旧回到了人墙下，仗着年轻和机灵，硬是从人缝中挤了进去，但却出乎意料，并非想象中的什么强队。而是两个很特别的对手队。从双方的阵容看，个子高低不一，年龄也相当悬殊。年长的也许在40岁以外，而年幼的几乎还是些小男孩。至于技术水平更谈不上是强手了。但不知为什么却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兴趣。他们都不穿运动衣，只穿平时发下的白粗布衬衣，有的小鬼长衣服吊在半大腿上，有的人索性脱掉上衣赤条条光着膀子满场子跑。那位浓眉大眼、个子矮胖的老头恐怕有50多了，但精神很好，和青年们一样地跑来跑去奋力抢球，毫不相让，突然被一个青年推倒了，他爬起来笑一笑又去争球。这人好面熟呀！他是谁呢，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时间不多了，双方争得更激烈了，老头毕竟是年纪大了，行动自然有些笨拙，运起球来也不够快速灵活。他带着球正向篮板运球，猛不防被一个毛头小伙子从背后冲过来抢球给撞倒了。他很快爬起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土，一边操着四川口音叫道：“推人犯规了！推人犯规了！”裁判员自然也看得清楚，立刻吹哨，跑进场里拉住那个小鬼说：“犯规，犯规！罚球！”老头站在篮底下，不慌不忙地举起球看了看篮筐定了定神，随着哨子的响声轻轻地一投，“唰”地一声球进了。场上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老头得意地向那个小鬼瞟了一眼，微笑了一下，那个毛头小鬼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笑了笑做了个鬼脸。时间到了，球赛结束了。人墙渐渐地散了。我还在竭力

搜寻着记忆，那老头到底是谁呢？穿过蜂拥的人群，猛不防他朝着我站的方向走过来了。借着夕阳的斜晖我看清楚了，那不就是朱德总司令吗？我惊喜极了。看他那浓黑的眉毛，大大的脸盘，厚厚的嘴唇，慈祥的面孔，这不是他谁呢？我高兴得几乎要叫出来了，但又没有，低声问身旁的一个同志，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他正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他是在视察过日本工农学校之后，利用周末同警卫、勤杂人员一起组成这个混合球队进行比赛呢。

望着这个闻名世界的伟人，我立刻又产生了许多感慨。谁能想到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八路军统帅，竟然能和一群普通士兵、勤杂人员一起玩得那样痛快那样开心，又是那样无拘无束。跌倒了爬起来，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这时候谁能分得清，哪个是司令，哪个是士兵。他们在这球场上确是互不相让的对手，但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又确是统帅和士兵。这种情形，在古往今来的军事史上，也怕是少有的事情。这就是八路军。这种平等和谐的官兵关系，在当今的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对我说，朱总司令最爱打球，不论在延安，或者在前方，他时常和公勤人员一起打球，总是那样互不相让，你争我夺，和平常人一样。事实教育了我们这群年轻人，使我们懂得了在革命大家庭里什么叫同志关系，什么叫官兵平等。

人们已经散尽了，宝塔山上的斜晖也渐渐地消失了，浓重的暮色已笼罩在延安的上空。徐徐的清风从延河川道上吹来，驱走了一天的暑气，使延安的黄昏变得凉爽舒服了。朱总司令揩去了脸上的汗水，在那个小鬼的帮助下拍去身上的泥土，穿上整洁的军衣，然后拍拍那小鬼的头，同大家笑嘻嘻地握手告别，然后朝拴在树桩上的枣红马走去。警卫人员跟着过去解开缰绳递给他，总司令再次向在场的人们挥一挥手，然后才从容地跨上战马向北去了。他轻轻地



两腿夹一夹那匹枣红马，它便扬起头飞也似的消失在暮色中。

## 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上午参观访问了毛泽东青年干校，从文化沟口涉水渡过延河来到中国女子大学。在女大的礼堂里，我们见到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不仅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而且还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能够亲眼见到这位英雄并能亲聆他的教诲，那也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尽管来延安之前我们就曾经奢望过能见到毛主席，但实际上的希望是很小的。因为会见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们哪会有这样高的礼遇呢？因此这突然的会见使我们喜出望外，既高兴又兴奋。但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我们这次参观访问是十分重视的。不久，毛主席还单独接见了参观访问团的带队老师和负责同志，并且还给他们亲笔题了词。

毛主席身材高大魁伟，留着一个大背头。穿了一身和延安所有的干部一样的粗布衣服，洗得多了，也变得几乎发白了。他动作灵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的人不由得拼命鼓掌。会场不大，人却不少，整个礼堂都快挤满了，那热烈的掌声像一阵狂风从林海中刮过发出的涛声一样。他操着不太好懂的湘音，声音缓慢而洪亮。他从边区的经济困难，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又从团结抗战的重要意义谈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活动，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那个时候毛主席的身体似乎不太好，背微微地有点驼，每讲一句话总要轻轻地咳上一声。由于年龄的关系，有些话我们也听不懂，记不住，但总觉得毛主席会讲话。那洪亮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扫来扫去，是很有鼓动性的。毛主席的讲话正如他以后接见访问团

的部分同志所题词的要团结的精神一样，记得他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详细地论述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大搞投降分裂活动，企图破坏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形势。他还结合实际谈到过绥德地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和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重要意义，并且还鼓励我们回去以后要做团结青年共同抗日的模范青年。

毛主席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并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1940年春赶走何绍南的重要意义。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绥德分区的全部解放，对于巩固陕甘宁边区，确保抗日民主的总后方的安全，沟通延安与华北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的重大意义。于是敌人曾经造过的谣言和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许多糊涂观念，霎时间便烟消云散了。

毛主席的报告使我们很兴奋，很长时间都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报告结束以后，我们接着便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这是当时边区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在校学习的女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她们来自武汉、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有的则是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也有一部分人是来自各个抗日前线的解放区。但她们的不论来自哪里，也不管出身贫富，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才毅然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离开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冒着生命的危险，跋山涉水通过层层封锁线才来到这贫瘠偏僻的北方山区。住的是自己挖掘的土窑洞，吃的是自己开荒种出的小米，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是学的都是马列主义和治国教民的革命道理。她们看来也是些平常的女子，实际却是些巾帼英雄。我们这些刚刚摆脱了黑暗统治和奴隶枷锁的青少年，深深地尊敬这些新女性，热爱这些大姐姐。

夏天的山区气候多变，就和老农们说的那样，实在像个娃娃脸，一时一个样子。上午天气还很好，晴空万里，没有一点儿云丝，可



是到了下午，突然西边天空升起了一团乌云，迅速朝四方扩散。没多久，听得西边远远地传来隐隐的雷声，紧接着便雷声大作，暴雨倾盆。约摸半个多小时，满山遍野便发出一片山洪的电哼声。一眨眼工夫延河涨水了，浑浊的河水掀起排空的巨浪，像脱缰的野马，狂怒地卷着整棵的树木和从梢林里冲出来的枯枝败叶，拧成一条又宽又长的褐色带子，泛着白色的泡沫汹涌着从河心里往下滚滚去。别看延河平时是那样地清澈平静温顺，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姑娘，任凭你随意摆布，可是此刻，却又是那样的狂躁不羁，无情而又凶险。它狂暴地咆哮着冲击着两岸的河堤，吞没了两岸的庄稼和树木，奔腾直泻，扬长而去。

那时候延河上没有永久性桥梁。平时大家涉水而过，或者踩着石头跳跃。冬天踏着封冻的厚冰，或者是从用高粱秆和木头搭成的便桥上通过。如今河水突然涨得这么大，看来一时半刻是无法过河了。尽管交际处离女大也不过几里之遙，可正如俗话说的那样，“隔河千里远”了。我们都站在河畔上，望着滔滔东去的洪水，连一点办法也没有。天就要黑了，过河的希望连一点儿也没了。今晚恐怕是要在女大过夜了。可是那时候的机关学校，都不像现在还有个招待所，也不像现在的一般家庭，差不多都有几床多余的被褥。在那军事共产主义的时代里，什么都是靠公家供给的。每人一条薄被，两年一套棉衣，按时交旧换新，谁还能有多余的被褥。只有那些从大后方进来不久的人，也许还保留着一条毛毯或者一件大衣之类的东西。此外，谁也不会再有什么身外之物了。现在我们这一百几十名青年男女，都要在这里留宿，不是给她们出难题吗？恐怕只能是坐等天明了。我们心里这样想。

外面还下着小雨，我们都集中在食堂里沉默无语。眼望着夜幕慢慢地降临了，大厅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下来，心里就更加焦急了。

正在我们担心不知将如何度过这个夜晚煎熬的时候，门外进来了两位大姐姐。年纪不大，衣着都很普通，不过穿在她们身上倒很合体。腰里扎着一条细毛绳，更显得线条分明，美观大方，也颇有风韵。脚上穿了一双麻草鞋，裤腿卷在半腿弯，露出一双白净的小腿。她们笑容可掬，似乎已猜透了我们的心情似的。一进门便笑着对我们说：“今天延河涨水了，你们回不去了。今晚就住在我们这里吧！”说完把我们男女分成两个大组，然后又分成几个小组，由她俩领到学生住处去安排住宿。

我们的小组由一位高个子的女同志带领着，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半坡上一排窑洞爬去。来到土窑前她向窑里边喊：“快来迎接客人！”顿时，窑洞的门全都开了，挤出一群衣着相同相貌各异的大姐姐，一齐朝我们涌来。她们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热情地拉住我们的手，摸一摸我们的身上是否淋了雨。在她们的手腕下，我们分别住进了几个土窑洞，这时候，我们才看到她们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处。不用问，这是她们自己的宿舍。她们抱来了自己的被子，拿来了自己的棉袄，也有人拿来了自己的毯子，都堆放在床铺上。虽然正是盛夏，但在雨后的延安，气候还是清冷的。尤其是这些土窑洞更显得有些阴湿瘴人。感谢这些大姐姐，像关心自己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一样地关心着我们。她们互相打通铺，却把被子和一切能够御寒的衣物都给我们拿来，还唯恐我们受冷。也许她们考虑到我们这些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小同学偶然又遇到这小小的困难，心里一定会感到难过，所以便特别地关心和爱抚我们。并且还想方设法要使我们快乐。她们逗我们玩，问我们到延安有哪些活动，学习和生活的怎么样，习惯吗，还问我们来延安有什么感想。就这样，很快地我们便熟悉了，觉得此刻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是远道归来的游子 and 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团聚在一起那样亲切、和谐、欢乐与愉快！

这些天安排的活动很多，也很紧张，而且都是要步行。一动步就是几十里。虽然都还年轻，但也确有些疲劳。一切都安排好了，她们就让我们早点休息。还再三叮嘱我们说：“延安不像你们绥米，这里离梢林近，晚上气候冷，不小心就会着凉的，睡觉时候别蹬被子，起来解手时候要穿上衣裳。”就这样千叮万嘱，一直等我们躺在了床上，她们又把被雨打湿了的衣服帮我们晾起来之后，才笑了笑说：“好好睡罢，祝你们做个好梦！”这才关上门走了。

她们走了，我们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这是多么好的大姐姐呀！她们个个都是那样善良、热情、纯洁、可爱。今天如此热情地关心照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小弟弟、小妹妹，尽量使我们过得愉快，睡得舒服。而她们自己呢，今宵睡在何处呢，是大家挤在一块呢，还是坐在那里等着天明呢？于是，我们又联想到在延安这革命大家庭里，人们之间是一种多么特殊而亲切的关系。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有多少个这样可亲可敬的大哥哥大姐姐啊！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颗多么美好纯洁的心灵啊！而这些纯金似的心灵时刻都在温暖着我们这颗颗远离亲人的稚嫩的心。

不多时，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甜蜜的梦中，我似乎觉得我也是生活在这无数个美好、善良的大姐姐中的一员了。她们都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我们，那种真挚、热忱的爱抚使我在梦呓中也忘情地喊着姐姐。

## 七、宝塔山上的钟声

上午，参观完行政学院正从山坡上往下走，突然，宝塔山上敲起急促的钟声。交际处陪同我们的老金立即大声喊道：警报！于是我们便跟着他迅速向新市场的后沟里跑去。

在那战争年代，警报是常有的事情。在绥米一带也是一样。不过到延安来这还是第一次。抗战时期，为了干扰和破坏后方对前方的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经常深入到后方来骚扰，哪怕是一些小的县城。因此，在陕北各县城差不多都设立防空哨。大都利用古庙里的大铁钟悬挂在县城最高的山巔上，一旦闻讯有敌机来空袭，便敲起响亮的钟声，让人们提高警惕及时躲藏。往往一天跑上好几回，学生上不成课，市民们也不得安宁。

空袭对于延安的人民来说，是记忆犹新的。1938年，日寇曾派了大批飞机，对延安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袭击。使整个延安古城霎时夷为平地，变成一片瓦砾。许多平民百姓和妇孺惨死在日寇的炸弹之下。这一惨案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延安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笔血债。现在人们都住进窑洞，所以警报一响，人们便立刻跑进窑洞。任凭敌机猖狂，照旧可以不慌不忙地办公学习。窑洞是天然的防空洞。

我们正在途中突然响起警报，所以老金便有些着急，带着我们拼命往新市场沟里跑。没跑几步，宝塔山上又响起了紧急警报，说明敌机可能要临空了。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雷达设备，只是站在山头上听得隐隐的飞机声或者是从邻县打来的电话告诉敌机似乎朝本县飞来，便发出警报的。所以往往敲起紧急警报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头顶上了。老金果断地说：“快进窑洞！”于是我们很快就躲进路旁草庵的几孔窑洞里去了。这时候敌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不多时就听见飞机似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那声音震得山谷里发出刺耳的声响。紧接着就是轰隆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把窑里的窗户都震得格格响，窗纸也都破碎了。土窑的顶上纷纷地落下土来。我们躲在窑洞里是很安全的，但在心理上总还难免有一点恐怖的感觉。我们都屏住气呆在窑洞里倾听着外面敌机的嗡嗡声

和剧烈的爆炸声，心里都不由得憎恨和诅咒着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担心着延安人民的安危！

过了好一阵，宝塔山上又传来了缓慢悠长的钟声，警报解除了。我们走出窑洞，整理好队伍，顺着新市场沟一直往里走，翻过一个狭窄的豁口，沿着一条山沟一直往出走便可通往北关。在我们将要走出山沟的时候，突然看到在小河滩旁的草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条牲口。它们血肉模糊，显然是刚才敌机轰炸的结果。那些可怜的牲口有的炸断了腿，有的炸烂了头，有的则炸破了肚皮，肠肚流了一地。尽管它们都是些不会说话的牲畜，但是那惨状也是让人目不忍睹。原来，这是一个运输队，刚走到北门口就遇上了警报。他们连忙把牲口赶到临近北门的这条山沟，敌机已经进入市区的上空。由于牲口受惊，暴露了目标，以致遭到了这场横祸。两三条骡子被炸死了，有两条牲口也受了伤。所幸运的是人都躲在岩石下了，还没有伤亡。据他们讲，共来了三架敌机，在延安上空转了两圈，丢了两颗炸弹，又用机关炮扫射了一阵，别的地方还没听到什么响声。

在延安这段时间里，我们参观访问，生活在幸福快乐之中，也亲身经历了敌机的袭击，目睹了敌机轰炸之后的惨景，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只要抗战不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一日不滚出中国去，那么在祖国大地上就没有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不论在前方后方，南方北方，死亡就会时刻在威胁着人们！

这次事件破坏了我们这些天来在心理上的欢乐与宁静，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战争破坏着人们的和平安宁，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了保证。为了自由的生存，为了生活的幸福安宁，我们只有团结一致进行战斗！

走出山沟，来到北关。我们怀着不快的心情，顺着延河往北行。走过文化沟，再往北走不远，便渡过延河，去蓝家坪中央医院访问。

和往日不同，一路上谁也不愿说话，哪还有心思唱歌。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默默地记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欠下的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 八、延安灯火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在延安已度过20多天了。我们以探矿者的贪婪心情走遍了延安的三道川、桥儿沟、柳树店、杜南川、七里铺、枣园、蓝家坪、大砭沟、小砭沟、清凉山、宝塔山、凤凰山、王家坪、杨家岭……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参观、访问或座谈学习、听报告，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走起路来也很累人，但我们觉得生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义。许多同学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飞跃，在这一生中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延安由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挚爱，在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延安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新鲜、有趣而美好。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深深地爱上了延安。延安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熔炉，使许多带着各种思想杂质的人，经过短期的冶炼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在这山沟里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光辉的前程，有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觉得人生更有意义了。在我们同行的伙伴中，再也不会有人担心上当受骗不让他们回家去了，倒是希望能够长久地留在延安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时间很短，但是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延安不愧是革命的圣地和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无怪乎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都冒死冲破重重的阻挠，投向她的怀抱。延安啊！在祖国和民族危亡的时刻，有多少人把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复兴，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是革命的灯塔，革命青年的摇篮。如今你培育着中华民族最优秀



的子孙，时时都准备着奔赴沙场为祖国去献身。这里真正是人生的起点、民族的灵魂。

虽然我们都还年轻幼稚，不懂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已深深地爱上了延安。我爱延安的山，我爱延安的水，我爱延安的人民，但更爱延安的土窑洞。因为延安的土窑洞里有真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光辉灿烂的灯塔照亮了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

每当宝塔山上抹去了夕阳最后的一点余晖，暮色便从延安的上空升起。这时候，延河两岸荡漾着的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了，那三条川道里的岸畔上和山沟沟里的排排土窑洞里都点燃起一盏盏小小的油灯。顿时，整个延安的川道和山坡以及那黑沉沉的沟沟岔岔，立刻都变得通明透亮，那灯光透过窗户投射在延河的水面上，使得延河也变得像童话世界里的水晶宫一样，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格外地璀璨辉煌。于是延安立刻变得异常宁静了，似乎连一点声息也听不到。延安仿佛已进入了梦乡。不，此刻人们都聚集在油灯之下，又投入了更为紧张的学习和工作。这会儿如果你有兴趣在延安两岸漫步，一定会为那排排窑洞里闪烁的辉煌明亮的灯光所显示出来的绮丽壮美的景色所赞叹不绝。假如是位远方的夜行者，一旦进入这灯火辉煌的世界里，一定会误以为那排排层叠的灯光宛如都市里高耸云天的摩天大楼哩！于是，你一定断定这革命圣地红色的首都自然是座高楼林立、美丽壮观的城市呢！但却又不像一般城市那样喧嚣得使人心烦。延安的夜是无比的静谧的。透过这辉煌的灯光，你仿佛能看到灯光下人们聚精会神地工作和学习的神态。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有真理。的确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冒着杀头的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来到这有着马列主义的土窑洞里，伴着这些小小的油灯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主义，寻求真理和救国的方略，以便把自己铸成钢铁的战士。一

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在这些窑洞里，灯光下，同辈好友冬夜围坐在水炭火盆边煮上一茶缸红枣，热烈地讨论国内外的革命形势，设计着革命者如何在艰苦漫长的征途上为人民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此刻，如果你从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经过，便会看见树木掩映的灯光，仿佛是天上的北斗星在闪闪发光，在黑夜中指引着夜行的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在那些窑洞里，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许多多的中央负责同志，正在通宵达旦地坐在小油灯下运筹帷幄，精心设计着如何战胜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延安这西北黄土高原上普通山城的灯火啊，它照耀着黑夜沉沉的祖国大地，照耀着每个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心。它永远是指引中国革命航船的灯塔，迎着胜利，迎着灿烂的黎明。

4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头发斑白的老人了。但是当年延安之行给我们稚嫩的心灵上刻下的印记，却是永远也忘不了的。革命的路是从这里迈步的，尽管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一息尚存，还将一直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因为延安曾经培育过我们，给了我们革命的智慧 and 革命的动力。

现在我们仍深深地怀念和珍惜着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怀念在革命圣地延安所接受的第一次革命的洗礼！

## 上绥师去

黄光耀

1940年秋，从延安回到沿河工委，我已是身体结实的小伙子

了。山西晋西南沿河仍受阎锡山统治。当时沿河上段的工委仍住在界首村，工委负责人有黄石山、王文达、徐登甲等，还有20余名干部。当时由于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就提出要求再学习去。虽然我在延安呆过两年，但文化水平没有提高多少。经工委领导批准“上绥德师范去”。由工委介绍，中共绥德地委派送进入绥师学习。被编入春三四级，开办绥师班次为第十九班。

开始新的学习，学生民主选举由我当班长兼学生会主席，大概是因为我在延安学习过两年的原因。绥德师范不同于延安边师，比较正规，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校长霍仲年，霍调离后是丁子文当校长，训育主任刘宪曾，党支部书记何任仲（不公开身份），支委组织委员高再增，宣传委员刘宪曾，班主任陈士斌兼任美术老师，语文老师杨典，数学老师杨滨（女），地理、历史老师栾丁生，卫生保健老师栾醒民，物理老师俞洁，体育老师郭起昌，政治由刘宪曾兼任，没有军事教官，音乐俞洁兼任，自然课栾丁生兼任。完完全全是一所正规化师范学校。

党、团组织完全不公开活动，处于秘密状态。1941年5月1日，我正式加入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介绍人杨一良、杨致美同志。在校生活比较艰苦，供给制学校，一日三餐小米加豆子饭，吃菜很少。但我的身体健壮，有活力，天天锻炼跑步，还是学校篮、排球代表队队员。学校搞军训，只有我当过“小八路”，担任学生军训营长，对200余名学生喊操、讲话，出尽风头，盛气凌人。全校师生都知道我的名字，大家亲热地叫我“黄耀”。由于当时语文基础较好，加上语文老师杨典热心指教，在地区机关报《大众》上发表几篇小品散文。《大众》特约我为通讯员，到报社帮忙审阅稿子。其实我的文理并不通，回想起当时还很幼稚，真是可笑极了。

1942年，绥师整风运动开始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一场

大运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上下内外搞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运动，我们学生都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本来是大好事，但运动出现了偏差，发生了群众斗群众的过火行为，还严重存在逼、供、信。把开始学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常的个人检讨，反省错误，发展到对凡是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学生，公开斗争，大会、小会轮流斗。有的交代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还有的交代参加过“CC”、“复兴社”、“三农社”等等，甚至有的捏造出参加过什么“太阳社”，闹得人人自危，个别学生吓得逃跑了。如学生刘学良、田家芬等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榆林。整风已进行半年之久，弄不清真实情况如何。中央机关发表康生（社会部长）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文章，更是火上加油。绥德大礼堂开大会，贴出大标语“坦白从宽，不坦白死路一条！”学生完全停课，搞对敌斗争，深挖特务反革命分子。前后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弄得学生互不信任，学生不尊敬老师，老师不敢和学生交谈。最后，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政委习仲勋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反映绥师整风情况。毛主席指示“甄别”，他不相信十二三岁就参加特务“复兴社”、“CC”、“三青团”，而且那么多。毛主席指示西北中央局调查组视察绥德师范整风运动。以中央委员西北局书记高岗、江青（毛主席的爱人）为首的视察小组来到绥师，调查一周了解情况。根本没有那么多反革命，“宣告一风吹”。习仲勋书记兼政委作了总结。绥师整风教育意义很大，但没有反革命分子。停止整风，立即开学上课，恢复正常秩序。虽然恢复上课了，但学生和老师劲头不足，忧心忡忡，提心吊胆。地委和保安处派专人在学校搞甄别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半个月的查对材料，只有桑丁生（地理老师）参加过国民党，而且早已作过交代，职工登记表上就填着。他在运动中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的地下专员”纯属捏造。还有一名高年级

学生在高小参加过“三青团”，到绥师就没参加组织和活动了。两名学生逃跑是害怕受整，并非投敌叛变。诸如以上都公开向学生和老师大会宣布。至此，绥师整风算结束了。地委决定把领导绥师的主要负责人何仁仲调离，新派来党支部书记宋养初（原绥德县委书记）接替。同时，公开党组织活动，党员公开身份。经过半年整顿和党组织公开活动，大唱革命歌曲《南泥湾》、《义勇军进行曲》、《歌唱刘志丹》等等。学生自己排演革命戏《兄妹开荒》、《白毛女》等，还建立学生秧歌队，下农村演出。我当时就是秧歌队负责人，还有一位学生党员贺登文同志，组织男女同学30余人去二十里铺、四十里铺进行演出，受到农民群众好评，给学校争了光，把一所培养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学校闹得红红火火，生龙活虎，受到地区党政首长和党中央的表扬。因此高岗（中央委员西北局书记）第二次来校考察。毛主席还在延安接见绥师学生代表团。代表中就有整风中逃跑的学生刘学良和田家芬。毛主席对学生代表指出：“中国革命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代表团学生刘学良亲自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激起阵阵掌声，老师、学生一起高呼：建设新绥师！

我还清楚地记得习仲勋书记在绥师整风运动结束后的一段话：八个月搞了一场群众斗群众，逼、供、信，出现“人打鬼，鬼打人，人打人，鬼打鬼”的局面。这十二字结论，给当时的学生和教师都留下深深的印象。

1942年秋，整风结束了，我也毕业了。

## 优秀离休干部张宗耀

张 昭

1999年9月，张宗耀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6月，被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还先后被农业部、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农业展览馆多次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张宗耀同志是绥师二十二班学生，1940年秋到1944年夏，他在绥师度过了四年的寒窗生活。

张宗耀同志1922年生于陕北吴堡县的穷苦农村。1982年离休，今年已经是82岁的高龄老人。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学而不厌的老人，也是一位非常诚实憨厚而又勤劳的老人，还是一位情系家乡父老乡亲、关爱贫穷者的老人。

### (一)

张宗耀同志一直牢记周总理的生前教导：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他常年坚持学习。虽然年高、体弱又多病，有时候还要住一段医院，但他说，人老了，思想不能老，要想思想不老，就必须坚持学习。他关心国家大事，关注世界局势，经常阅读报纸和上级的有关文件，坚持看电视，听广播，上级组织的各种报告会他力争参加，还参加各种座谈会，自己还选购一些书籍。对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对党的各项政策，对改革开放的有关方针，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前

景，他心明眼亮，也充满信心。他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贯听党组织的话。在职工作时，上级指到哪里他到哪里，曾经在新疆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有一颗明亮的心，指引自己一生走革命的道路，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他不仅自己 and 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还言传身教给家庭的成员。他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老伴和他一辈子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培养下一代的责任。他们的长子现在是军队的将军，也是全军闻名的专家教授。他们的其他几个子女也都事业有成，在各自的岗位上作着自己的贡献。

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在他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的20多年期间，还非常关心全小组同志的学习。他们党小组13个人，分别住在朝阳区、西城区、丰台区等地，非常分散。为了给他们传达党支部的决定或送有关的学习材料，他跑遍了京都（有时还自己花钱复印学习材料）。京都的各路公交车，他差不多坐遍了。经常是早晨出发，中午1点多才能赶回来。

他们党小组里，有的同志如果生了病或住了医院，他总要亲自去探望和安慰，小组的同志非常感动。他常说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同群众血肉相连。他说自己是党小组长，关心党小组的成员是自己的责任，也体现了党的温暖和关怀，是给党争了荣誉。

宗耀同志还是一个非常正直、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他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刚离休，有一次他发现有人偷窃农展馆的钢材，他勇敢地站出来，将偷窃之人捉住，并将钢材退还。198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他见义勇为当面指认了一个偷女青年手表的人。这些事迹曾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 (二)

宗耀同志是非常诚实憨厚而又勤劳不怕辛苦的人。早年在绥师的一件事，对他启发特别大。他说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为他这一生的诚实憨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绥师的整风运动进入了深入阶段，同时也出了一些偏差。记得就在绥德城内杏树圪塔的中山大礼堂开大会，当时绥德专署的副专员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说吴堡具有个张宗耀，到现在还不坦白。这对他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想来想去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自己能够扛得过去吗？坦白的话坦白什么，不坦白的话又怎么过这一关。而且还是一位高层领导点自己的名，自己只是一位中学生。最后他还是横下一条心，以实相告，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不管他有多大的压力。他当时想，假如自己承认了，就要交代出是谁介绍的，还有活动情况及时间、地点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自己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假如要隐瞒的话，不仅害了自己，还要害别人。没有的事情不管你怎么点名批评还是没有。以实相告是做人的本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要对得起同志。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了什么事，他都实事求是。他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一个人的品德。所以在他一辈子的革命生涯里，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夸大成绩，也不掩饰缺点。在待人方面他始终保持陕北人的憨厚本质，实实在在；和朋友老乡及校友们相处，总是以心换心、心心相印。

宗耀同志在北京绥师校友中，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绥师校友的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已60来岁。记得为了表达



绥师校友对母校的关爱情怀，要筹措一些奖教奖学基金给母校。他当时负责这项工作。京都东西南北中，京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路近的步行，稍远的骑自行车，再远的挤公交车。当时能够联系上的绥师校友有近百位，他几乎都联系上了。这期间经常有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情况，他都能坚持忍受。最后总算筹集到了一些钱，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更可贵的是他这种勤劳负责的态度，他这种对母校执著热爱精神，受到了许多校友的称赞。

### (三)

宗耀同志情系家乡父老乡亲，老有奉献，自得其乐。他说：我是喝家乡水长大的，没有家乡父老乡亲的养育，就没有我张宗耀。我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乐我乐，他们忧我忧。

吴堡是陕北人口最少又最穷的一个县，家乡经常遭遇旱灾，一有灾情吃饭都很困难，碰到了这种情况他的心就不安。他离休后虽然享受副局级待遇，但收入并不多。每当家乡有了灾情后，在老伴的同意下他总能伸出援手。1984年他给吴堡县希望小学和本村小学各捐款500元，并给村里兴修水利捐1000元；1988年他资助家乡园则沟小学1万元，还资助家乡一位上大学的贫困生500元，同年，祖国南方和其他地区有灾情，他捐款600元；1999年，家乡旱灾严重，他送去了3000元；2003年他又送去4000元；同时还给家乡亲友1500元。这期间他还给家乡两位贫困生呼慧和呼苏慧送去5500元，让他们读完职业高中；2001年他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款300元。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他累计捐款27400元，这说明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不仅情系家乡父老乡亲，而且向全国其他灾区也伸

出了援手。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他这种关爱之心，曾在《陕西老年报》和《榆林日报》上登载过。他的这些善行受到了家乡各界人民的赞扬。吴堡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的信中说：“家乡人民永远记着您的这片赤诚之心。”园则沟的村委会来信说：“您希望家乡人民办好教育，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您这种奉献精神家乡人民永不忘怀。”元宋家沟管委会来信说：“您无私的援助，慷慨的解囊，我们发自肺腑地感谢。”还说：“宗耀同志的行动，露珠虽小，霞光四射，可以看得出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好干部，也是学雷锋的好榜样，是值得尊敬和敬佩的革命老人。”

张宗耀同志的成长过程，充分说明了各级领导和党组织对他的培养，也有他年轻时绥师对他奠定革命人生观的根基培养，当然还有他本人严格要求自己一生不懈的努力奋斗。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所做的也都是一些平凡小事。平凡之中确有不平凡，他的这些事迹是感人的，也是值得赞扬和称颂的。这既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母校绥师的光荣。

## 艰苦岁月 远大理想

——回忆在绥师的学习工作生活

霍毓贵

绥德师范学校，是一所培养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摇篮。由于它的创建时代及其领导人就决定了它的先天性和它的革命性。它创建于1923年的5月。1924年

就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介绍的共产党员李子洲同志接任校长。李子洲聘任了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等进步教员，在绥师建立了党的组织，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通过绥师学生与社会结合，对当时旧社会落后、反动的制度、做法，组织学生、农民游行、斗争，极大地震撼了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向社会广泛地传播了进步思想。直至1940年国民党在绥德的地方政权被赶跑之后，陕甘宁边区全部成为共产党统一领导，绥师便成为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从1940年2月至1947年10月，近八年时间，我一直在绥师学习、工作。从19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绥师在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之下，茁壮成长。虽然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经济上、生活上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在校的师生虽然生活艰苦，但在思想上、精神上非常愉快。鼓舞他们的力量是今天努力学习，将来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实现远大理想。

### （一）“绥德事变”后的绥师

1940年正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一阵阵枪声把人们惊醒。第二天知道是统治陕北多年的国民党行政专员何绍南，带着他的保安团逃跑了。这样，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各县城乡都解放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统一领导。1940年端午节，原来的校长白焕亭带了一部分学生逃跑到榆林、响水。原来在校的三〇级、三一級、三二级剩下100多人，秋季开学时招了一个师资训练班。当时任教务主任的丁子文同志的弟弟丁锡奇同志在文庙小学当教员，我当时在文庙小学学习，丁锡奇就介绍我进入师资训练班学习。同班学习的有白瑞生同志（全国胜利后任陕西省委秘书长）、马松林同志（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李嘉玉同志（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

记)、苏桂堂同志(甘肃省政府交通厅长)、党允武同志(后在对外友协工作)等。该师训班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小学师资,学期为半年。放暑假时有一部分同学回农村当乡村教员,有一部分同学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如白瑞生插班到三三级,李嘉玉、党允武与我留在暑假时招收的秋三三级学习。

三三级是绥师自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之下正式招收进来的第一批学员。当时招进来时分了甲、乙、丙三个班,党允武与我甲班,李嘉玉在丙班。每个班四五十人。当时绥师校长是霍仲年(后任绥德地区副专员),后为丁子文同志(全国胜利后任陕西省师范学院院长),教员大多是从延安调上来的,由温建枫任训育主任,杨滨(原三五九旅干部,全国胜利后任北京女一中、男四中校长等,已去世)、何楠若(后被调回延安,与教育厅副厅长丁浩川同志结婚。全国胜利后丁浩川任北师大教务长,东北师大副校长,代校长,她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二人均已去世)、汤般若(全国胜利后在中央组织部任老干部局局长,已去世)、郭琦(全国胜利后任西北大学校长,已去世)、陈士斌(全国胜利后任陕西省美术学院院长,已去世)、余峥(全国胜利后曾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后调陕西省工作,已去世)。

我们三三级甲班的班主任为何楠若同志。这时,因为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变化了,所以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革命理论教育,此外班主任有时进行个别谈话,深入浅出地讲一些革命道理。对我启发教育最深的是班主任何楠若同志对我的几次个别谈话。因为她知道我家很穷,她说:“社会上为什么有穷人有富人?这不是所谓命运问题,不是富人的命运好,而穷人就命运不好。”“所以有穷富的原因这是社会制度问题。”“要解决社会上的不平等,就要改造、打破和推翻旧社会的反动制度。”经她反复地谈心,讲述这个革命道理,我

心明眼亮了，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同时，也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何楠若同志、拓鼓雄同志介绍，我于1942年7月12日，由刘定曾同志主持并带领我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在庄严肃穆的党旗下入了党。

## （二）赴延安参观

1941年利用暑假的时间，绥师、米中两校组织百余学生到延安参观。延安是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有机会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革命斗争或者去看看延安，都是人们向往的事情。当时绥德、米脂算新解放区，以往长期受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污蔑共产党为“匪党”，八路军抗战是“游而不击”等。组织上就利用这种机会，安排青年学生参观学习，了解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

绥师的何楠若老师，米中的高云屏老师（在全国胜利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带队，绥师有三二级、三三级、三四级部分同学参加，我们班有张新贤（已故）、马沁芳（已故）、白秀珍、王绳武等同志，三四级有王丕祥等。米脂中学有马淑性同志（她爱人安志文同志也是绥师校友，曾任六机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

那个时候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全靠两条腿走，当时都时髦地称为“11号”，靠“11号”走得快一些。那时我们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娃娃，较大的十八九岁，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有的同学家长还特别不放心。我们沿路经过田庄、石咀驿、清涧县、延川、临汾，历时五天，行程400多华里，终于看到了宝塔山。走过延河的小桥，到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招待所。那时候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可不像

现在延安招待所或宾馆一样，都是土窑洞，比较潮湿。因为延安是红色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轮番轰炸，把延安城内城外炸成一片瓦砾。当时的政府机关、学校，连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政领导人全部住在这些土窑洞里。土窑洞都是围绕着山势走向，一排排、一层层，夜晚当小油灯点亮之后，好像一层一层的楼阁一样，壮观美丽，在当时能够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可以安全地照常上课、上班。

我们在延安时忙于参观，参观了吴玉章任院长的自然科学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任校长，对日本俘虏进行教育），还有中国女孩子大学等。在参观中还安排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接见。在参观女大的晚上，毛主席在女大礼堂接见了我们并讲了话，给几位同学题字、赠言，还安排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给我们作国内外时事报告。通过这次长途行军和在延安参观，特别是受到林伯渠、毛主席的接见，使我们这一群娃娃受到了教育。延安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从日本占领区及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的数万名知识分子、机关干部，都在艰苦的生活中学习、锻炼，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在延安的每一次参观活动，对我们都是一次教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在心里暗暗地想着，自己如何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好好学习，像延安的同志们一样，将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 （三）整风运动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当时毛主席提出整顿“三风”：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反对教条主义。方法是普遍学习文件，

在提高认识、打通思想的基础上，对照检查，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但运动在实际进行中逐步演变为反特斗争，从机关干部到地方群众，开始揭发检举，进行所谓“抢救运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趋势从延安发展到陕甘宁边区全境，绥德地区、绥师也不例外。

绥师整风运动的导火线，是在1943年初开学不久，在第八教室外贴出小字报，主要内容是反对学校领导指定的代理教务主任与训育主任，并提出要求，要杨典（当时是一位语文教员）担任教务主任，称杨典有能力。紧接着又有类似的小字报。这样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波动，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并选派了一些可靠的同学，每天夜里拿着童子军棍，在几个交叉路口站岗，也有人走动查哨。在一片紧张的情况之下，又有一天晚上，据说发生了在杨典住的房子窗户外面有人用石头进去打杨典的事，而在杨典的胸前也有所谓被打后发红的印痕。这时候学校的气氛更加紧张，丁子文代校长在大礼堂全体师生的大会上，拿着打杨典的石头，极为气愤地揭发这个事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检举作案及幕后人。从这些事件开始，学校就没有正常上课，每个班开始讨论对这些事件的认识，揭发与这些事有关的事与人。运动逐步发展，翻出了这一两年来每个班上出现过的“问题”，比如有的同学一贯表现不好，对共产党不满；有的公开讽刺共产党员与进步同学，他们把共产党员叫“布袍”，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细胞的意思。运动后来发展到就历来有关事例联系到个人，形成重点，进行揭发、追问、批斗，对“有严重问题”的同学捆绑送公安局。在整风运动时期被关押审查的人全校可能有十余人。对于被关押的人，公安部门与有关部门采取逼、供、信的手段，严刑拷打，故出现假口供。比如有一次学校进来几十个军人，荷枪实弹，把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谁也不准动，公安部门在有的

学生宿舍进行搜查，据说被关押的人中承认有枪，说把枪藏在窑洞的坑洞之中。以后听说没有搜出什么东西。

经过这种揭发检举、在班里批斗同学，让公安局抓走同学的暴风骤雨之后，到五六月，学校的运动就转为学习文件，然后对照联系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材料，最后每个人轮流过关，在班上做检查，其他同学提问题、提意见，展开批评，然后个人根据大家的意见整理材料，并把材料交给组织上。到阳历8月15日之前的几天，学校通知所有学生家长来学校参加恳谈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学校当时的总支书记宋养初向所有师生员工和全体家长，作了整风学习总结报告。说明通过整风运动的学习，更进一步提高了同学们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时所有被关押的同学均已返校，学校对学生、对家长都作了人身安全的交代。为什么要所有学生家长都来参加恳谈大会呢？因为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整风以后，学校就与外界隔离，不准学生回家，就连住在城内学校附近的学生也不准回家，也不允许家长来学校探望。这次大会结束后，全校放假。乡下的家长领着学生回家，参加秋种麦子。这时候学校的气氛又恢复了生气，同学们与家长都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在学校恳谈大会后，整风运动结束。但是在运动中，把一些同学整为“复兴社”、“三青团”等等特务组织成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这样就以党总支专职干部白炳书同志为主，还有雷高义、我等人参加。一直到1943年底，对所有在整风中被错整的同学作了结论，说明这些同学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问题。因为当时同学们的年龄都很小，有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属于调皮捣蛋性质的表现，根本不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所以，我在上述回忆中，对当时被整、被关同学的名字均没有列举。那么，学校在一年的时间中，停了课，闹得乱乱哄哄，除按照正常整风学习外，在绥



师引起这场火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在哪里呢？根据当时绥德地区保安处处长布鲁说，他在延安时就是搞谍报工作的。经过保安处的长期侦察，多次检查试验，如用石头打杨典、杨典胸前的伤情、小字报的笔迹等等，这一系列的查验结果证明，绥师这一条导火线的点火人，就是杨典本人。他本人为什么要把水搅混呢？是因为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发作。因为他自己想当教务主任，所以他用不署名的“黑头帖子”来吹捧他自己，反对别人。最后的谜底就是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凡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的人，其结果，既害别人，最后也害了自己。

#### （四）大生产运动

通过整风运动，全校师生普遍地提高了思想认识，都愿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地参加各项生产运动。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在国际上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后期，以苏联为首的同盟国，同以德国为首的，有意大利、日本参加的轴心国的世界大战，正处在相持阶段。希特勒法西斯疯狂地占领了除英伦三岛以外的整个欧洲。日本的亚洲战线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占领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处在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东北抗联，在华北、东北、华中、华南钳制日寇。德国、日本从1937年发动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十年头，无力再扩大和发动进攻性的战争。苏联红军、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等正在准备大反攻。国内的形势，国民党消极抗战，把东北、华北等大半个中国退让给日本。蒋介石自己躲在重庆，而对解放区则封锁围困。陕甘宁边区东边有日本人和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封锁，西边有国民党马鸿逵地方武装，北边

有国民党杂牌军，南边有国民党胡宗南的重兵包围，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严实密的经济封锁。在1943年至抗战胜利之时，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学校有时没有粮食，有时晚上有断炊的情况。没有粮食，同学们到三四十里外的田庄去背米。

这时候党中央、毛主席非常英明地提出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机关、学校掀起大生产运动。1944年初，学校就抽调了部分干部、学生开展各项生产。全校师生无一例外地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洪流中，普遍地参加了用纺车纺棉线，用脚踏车纺羊毛线，也有部分老师同学参加编织毛衣。此外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由三四级同学吴俊仁负责，在东门外征用了马迁繁家的几十亩地（现在的新校址就是当年学校的农业生产基地，马迁繁住在东门塬山上，他是一个开明的地主兼工商业者，他的外子叫马绍武，是绥师二七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学校行政事务科工作。马绍武的女儿叫马英，是二十八班学生），利用这些地种了棉花和各种蔬菜，由各班同学轮流到农场参加劳动，为自己食堂改善伙食。当时张力同志是教植物的老师，她带领学生到农场给棉花打杈、整枝。也有少数同学承包种地，按规定每人一年缴一定数量的小米。三二级的任雄士、邢宏与我在西山寺山上承包了几亩地，从厕所里掏出粪，担上经过小理河，送到西山寺地里，然后用土拌起来发酵。我们种了南瓜。南瓜结瓜要配瓜花，以前我们都不懂，只有任雄士同志家是子洲乡下的，有务农种瓜的经验。当时他给他爱人刘应樵同志教，用雄瓜花配雌瓜花，就是把雄花蕊插在雌花蕊中间，有利于瓜受粉，防止朽掉。刘应樵同志这才闹出了所谓“用男瓜花配女瓜花”的笑话。

学校也办了卷烟厂，由我们班刘绍先同志负责。学校还在街上南门洞附近，即现在邮电局附近，开办了磨山商店，主要经营日用

百货、文具等，由三四级郝向金和我们班周裕祖同志负责。又在四十里铺开了酒厂，由田旺清同志负责。1944年初，我被调到学校商店，在原训育处的办公室卖文具、杂货等。街上逢集我担上棉花，在大街上卖。生产方面主要由余峥老师负责，他曾常住在葭县魏家窑镇，距离绥德140多里路，在黄河边，隔河就是山西的破口。5月的一天，刘克曾同志通知我，要我给余峥同志去送信。头天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太阳出来的时候出发，赶在当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我就到了魏镇。我把信交给余峥老师，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到黄河边，看到那么宽那么汹涌澎湃的黄河。当时陕甘宁边区四周被敌人围困，不少日用品是从山西购买进来。

在1944年大生产的同时，全校师生每天下午到东门坡下去背石头，在学校大门口修建起一排办公室，建起27孔石窟洞。这27孔石窟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在校的师生，由刘克曾校长带头，大家流着汗水，一块一块地背来的。当时有关领导及社会各界十分称赞绥师师生的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

当时学校师生都是上午上课，下午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全体师生员工按照分工，积极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生产。由于各项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有了直接收获，又在农场与学校食堂后边养了猪。所以，学校食堂的饮食有了显著的改善，逢节假日或者每月都能杀一头猪，为大家改善生活，真正做到毛主席所号召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外，通过大生产运动获得劳动成果与思想锻炼的双丰收。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这一批同学们在以后的交谈中，回忆起参加生产运动的经历都深深地感受到，这对于我们一生的工作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有了在困难环境下用自己的双手与汗水换来的成果，就有了满足感。今天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条件都比较好，而我们从亲身的经历感受到，一个人在少年

时期生活条件不要过于优越。在十四五岁、十七八岁时期经过一些艰苦的磨炼，对其身心的发展与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

## （五）绥师的文娱体育活动

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个时期，虽然处在抗战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时期，而在校内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宗旨，出现一片欢腾的繁荣景象，像一个革命大家庭。大家上课时安静地学习，每到下午和晚饭后的活动时间，几百名天真烂漫的小青年活跃在操场上和俱乐部里。在操场上有篮球、排球，俱乐部里有乒乓球、象棋、小台球等。绥师的篮球队在当时绥德地区是有名的，我们球队教练是陈士斌老师，他每天早上带我们晨跑，从学校出发，出北门，绕城外从东门进来跑回学校操场，这一段路程约有两三千米。然后练习各种攻守与传球动作。最盛时期，差不多每周六、周日都有比赛，与三五九旅的球队、抗大的球队和绥德县教师联队比赛，差不多我们每场都是胜者。当时山西晋绥解放区驻扎着贺龙师长的一二〇师，他们有个篮球队叫战斗队，贺龙师长非常喜爱这支球队，他们经常从晋绥步行到延安去参加比赛，每次路过绥德都同我们比赛。其中有个叫刘卓夫队员，在20世纪30年代代表中国参加过世界运动会，40年代他已做了县长，而贺龙还叫他来打球。刘卓夫在全国胜利后曾在商业部担任过副部长，还有全国胜利后在国家体委排球司任司长的张子槐等。战斗队的整体及每个人的技术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三五九旅球队中的张锡初是绥师二七级学生，在抗大学习后调到三五九旅特务连任指导员。还有一个大个子叫王大刚，一个小个子叫刘智，他们的个人技术也很好。我们球队由邢宏任队长，另有杨达、任雄士、我。我们四个作为主力，

另外有张映泰、张树桐、刘怀义、钟继光、苗长茂等。为了保持绥师篮球队的实力，杨达、任雄士、邢宏和我四个主力一直留校工作，直到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才因工作需要调动分散。俱乐部由学生会文娱体育部领导。绥师的学生会主席：1940年时期是三〇级曹庆让，1941年是三一級白瑞生，1942年是三二級杨达，1943年是三三級李嘉玉，1944年是我。在我调动工作后选举了牛锦华。在杨达、李嘉玉任学生会主席时期，我是文娱体育部长。俱乐部主要在陈士斌老师的设计指导下，具体工作由我和一位助手，三四级的白纳秀同志负责，据说她一直在青海省委工作，她是白家硷人。一个学校有较齐全的体育设施并组织开展球赛、田径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直接地活跃了学校的生活气氛，而且配合教学，有利于锻炼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 （六）战地服务团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破裂。国民党于1947年初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为了在战争中抢救、护理伤病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厅命令绥师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延安前线。

战地服务团当时是从二十八班、二十九班、三十班等抽调50多位同学，记得有王英国、白秀明、慕生财、任景方、陈雪清、白素芳、高洛明、王立庭、高仪等。黄岗（王家广）当时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湖南人，他任团长，我任支部书记、副团长。因为战争发展得很快，我们在2月底接到命令，3月初组建之后立即整装出发。行前，刘秉曾校长代表学校、党组织向我们全体人员讲了话，做了动员。我们背上行李，怀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激动心情，离开学校，奔赴战火纷飞的延安。那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全靠两条腿走路，还要背着自己的铺盖行李。第一天走到石咀驿，第二天天一亮又接着走，晚上到清涧。在我们往南走的路上，碰到很多从延安后撤往北走的群众，他们中有延安的机关人员，有家属，有用毛驴两边驾着两个箩筐，装着两个小孩的，其中也有从大后方重庆撤回延安的新华社工作人员。这时候只有我们这支队伍往南走，这种情景在同学中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到延川以后，在第四天往甘谷驿走的路上，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侦察，有时低空扫射，同学们一听到飞机声，立即分散跑到山沟和坡洼的水沟沟躲藏。路过清涧时，有一位姓黄的同学，坚持要回家，不愿跟我们再往延安走，因为我们正在行军，无法拉着他走，无奈让他离队回家。当我们与教二旅医院转移到山西下三交时，他又追赶找到我们。后来才知道搞不单行，当他离开队伍，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的飞机机枪扫射打伤，深感在家里也不安全，所以，又从家里赶到山西归队。在我们经过甘谷驿距离延安还有十几里路时，听到轰轰的大炮声和喀喀的机枪声。再往前走，远远地看到宝塔山以南的土山上尘土飞扬，战士们从山上往下撤退。公路两边的村庄窑洞空空的，已经坚壁清野。这时，大家深深感受到浓郁的战争气氛。我们虽然临近了延安，但也无法找到人，无法打听到延安的消息。根据情况判断，我们不能摸着黑再往延安方向走了，临时决定拐进一个山沟里。那时天已黑，大约走了十余里路后，走到一个村庄，暂时休息。这时黄岗同志与我商量，我们全体在这里休息等待，由他出去打听消息，看可否找到边区政府和卫生厅的领导准备报到。大家默默地坐在行李背包上，从老百姓的窑洞窗户看到一盏盏小麻油灯，一闪一闪地晃动着。记得当时已近半夜三更了，黄岗同志离开我们大约一两个小时，突然听到村里的狗在乱叫，使人听得心慌。过了一阵，黄岗同志拄着一根棍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断断续续

地说：“不行了！什么也找不到！”“敌人已经占领延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该向哪里走，该到哪里去找卫生厅领导部门呢？这里距离延安不远，黑暗中，我们忽然看到很多人群，有抬伤员的担架，有拄着拐杖的伤员，也有医生等等。我们上前打听才得知，他们是保卫延安的教二旅野战医院。他们的领导听说我们是学生，要到卫生厅报到，然后到医院工作，因为他们正有大批伤员无人护理照顾，所以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跟他们走，协助工作。当时我们也因找不到领导，不知所措，便同意先到教二旅野战医院协助工作。同学们开始工作了，主要是为伤病员搞卫生工作，为他们打水、送饭，对重伤员还要倒屎倒尿。我现在还记得，有钟圣祖、高仪等同学照顾重伤员，不嫌脏、不怕累，受到伤病员的好评和领导的表扬。

因为他们是野战医院，随着战争的发展，要不断接收伤员，所以与前线要保持比较近的距离。医院向东转移又到一个村庄，停留了几天。在青化砭歼灭战以后，伤员更多了，我们也更辛苦了。虽然我们打了一些胜仗，但国民党动员了近30万兵力进攻边区，我方仍处在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的形势之下，而且敌人继续北上，企图打到榆林，妄想占领整个陕甘宁边区。在此形势之下，在青化砭战役以后，医院连夜向东转移，我和所有同学跟着该医院转移。当时国民党非常猖狂，白天派飞机沿公路侦察、扫射、轰炸，迫于严峻的形势，我们只有在晚上行军，白天宿营。医院从延川县的农村转移到清涧县，又经过清涧东城外一直往东，过了无定河，行军三天到了高杰村。

当时估计医院在高杰村能长期驻扎下，因为我们离开学校已有一月左右，而又未找到延安卫生厅的领导，黄岗同志在我们刚到教二旅医院后的第二天，他说要回学校汇报工作，借故离开我们。所

以我到高杰村后，安排好工作，带了任景方同学，早上天不亮出发，回绥德向学校领导汇报工作。当天下午赶到绥德，发现学校领导都不在了，只有留守的李槐九老师，他情绪低落，告诉我学校都转移到西川去了，无法联系。我只得回东门墙家里看看。非常不幸，我父亲被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时炸死，学校已经帮助安葬。我听到噩耗后，非常悲痛。当时城里人都转移到农村，战争气氛非常紧张。因为我身负重任，就匆匆离开了家。第二天一早，我便告别家乡亲人，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与任景方同志赶回高杰村医院。

回到高杰村后情况变化了，听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要北上，进攻清涧、绥德，这时医院已经向山西转移，由高杰村下山，从下三交过黄河。我与任景方同志赶到黄河边时，大批人马正在上船过河，有不少老乡也跟着部队医院，准备伤员过河后，牵回自己家的毛驴，所以在黄河边上人呼驴叫，显得一片混乱。

医院过河后，从离石县往北，经过柳林镇，最后到了磧口附近的张家山。这时候同学们已有两个多月的经验，比较熟悉、习惯了这种工作，加之到了山西，形势相对稳定了，是大后方了，所以同学们为伤病员的服务更热忱、积极。当时我在医院负责民运部门工作。战争时期，因不断行军，要做慰问群众、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等群众工作。在我们转移到山西下三交一带时，绥师派杨达同志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同学们，并带来张潜同志到战地服务团工作，任副团长，同我一起工作。张潜同志是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从大后方四川来到延安的，后被分配来绥师任教。她人品很好，平易近人，她来到战地服务团后，特别对女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在全国解放后她与爱人陈佩英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授。

我们在离磧口不远的张家山期间，延安的不少机关转移到山西晋西北解放区，组织上也把一些有名望的人士转移到山西较安全的



地方暂住，其中就有霍仲年同志。霍仲年曾任绥师校长，后来被任命为绥德地区副专员。巧在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张炯是霍仲年的亲戚，张炯去看望霍仲年，霍仲年才知道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前前后后，他帮助我找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厅长。我把学校写的介绍信交给卫生厅长，并向他说明我们赶到延安时的情况。卫生厅长说，原来的计划是分配我们到第一后方医院，该医院当时在葭县，又为我们写了介绍信，并要我们尽快去报到。这样我即向教二旅野战医院的院长与教二旅卫生部长作了汇报，说明我们战地服务团受命卫生厅的调令，教二旅医院的领导希望我们不要走，但是我们的调令在手，最后他们还是同意我们离开。

5月初，我们经磻口过了黄河，回到学校。学校安排同学们休息，我向学校刘宪曾校长等汇报了情况，说明同学们在战争中、在医院工作中的积极表现，也汇报了黄岗在我们刚到教二旅的第二天就说回学校汇报情况等。刘宪曾校长对战地服务团的同学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在医院工作中的突出成绩给予了肯定。

5月中旬，学校对战地服务团的同学调整了一部分，又增加了一些新同学，由我与张潜同志带队，到葭县的第一后方医院报到。6月，胡宗南又向北进，为了安全，医院向山西转移，伤病员有的用担架抬着，有的骑着毛驴，经地峨峪过了黄河，经磻口继续向北转移到临县，形势相对稳定了。第一后方医院比较大，是一个正规医院，当时的院长是李炳之，有名医周泽昭，曾是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私人大夫，全国胜利后曾任北京人民医院、北京医院院长。第一后方医院分四个所，我被分配在三所，所有同学都分配在四个所里作护士工作。同学们逐步地掌握了护理技术，像高仪等同学后来做了护士长。

第一后方医院在全国胜利后返回大西北，成为西安陆军医院和

兰州陆军医院的基础、骨干。我们这些同学也大都留在这些医院做了骨干。1950年我到西安开会时，曾到西安陆军医院看望过白秀明等同学。1947年10月，学校派周裕祖同志接替我在战地服务团的职务。我被调到绥德地区干部子弟学校工作。周裕祖同志在校时与我同班，子洲人，后来在兰州陆军医院任协理员，他以后在医院感染疾病，不幸去世，时年30多岁。

我们战地服务团贯彻了李子洲校长所制定的办学方针：“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也体现了当时学校制定的“学校与社会结合”、“学校与战争结合”的精神。这批同学为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这些同学的优良品质是组织性、纪律性强，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完全彻底为伤病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8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这些同学在母校——绥师的光辉历程中，有他的一份功劳和业绩，我对他们在战争中的坚定意志，在工作中辛勤的劳动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深深的感谢！

我想母校编印的回忆录，有的同学可能亲眼看到。借此机会，我想再一次向你们——战地服务团的全体同学表示真诚的谢意！你们作为一名绥师的学生，在你们一生的经历中，经过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为了推翻国民党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创立新中国，在这一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你们有幸地参加并付出日夜辛勤的劳动。新中国的建立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你们这一段艰辛的经历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母校的光荣，我完全理解你们在那一历程中的心情。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欣慰地去回忆文章吧！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已是2002年3月，我时年已80岁整。我还记着你们！我还要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敬意！

## （七）我在绥师工作

从1943年整风之后的秋冬，我参加了甄别工作。1944年开始大生产运动，不久我就被分配到商店，当售货员，在学校小卖部卖文具、杂货，到街上卖棉花。1944年暑假学校招了二十七班，分甲、乙两个班，班主任由杨滨同志担任，任雄士同志与我分别担任助理员，任雄士同志在乙班，我在甲班。我们在杨滨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做一些具体工作，主要管理学生的生活方面与思想方面的问题。我这一班有张德仪、白秉权、党淑珍、李庆春等同学。李庆春同学是吴堡县人，他的学习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唯有身体不好，当时腿上长了疮，行走极不方便，作为助理员，我代表班主任尽量关心他。

1945年春，学校又招进来二十八班，也是分了甲、乙两个班，我从二十七班调到二十八班的乙班，班主任是宋玲棣同志。宋玲棣同志是从延安调来的一位能干的女同志。她的男朋友当时在东北工作，1945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的男朋友专程从东北回延安参加七大，他们在绥师会过面。在七大之后，她的男朋友带她一起去东北工作。全国胜利后，听从东北回来的同志讲，宋玲棣同志在东北一次土匪的袭击中被杀害，实在可惜。

二十八班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比较高，这是因为从1940年绥德事变之后几年，党和政府重视了教育，并加强了各县的小学教师队伍，教师的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会自然提高。像二十八班甲班的张汉夫，在学校时就一直踏实，埋头读书，全国胜利后他开始在中央组织部工作，20世纪80年代被调任为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乙班有薛永年、苗长茂、黄锡林、马彩英、宋建勋等同学，在班里的

学习表现都是优秀的。我在二十八班后来任班主任近一年半时间。1946年暑假又招进来二十九班，我又被调任二十九班班主任。二十九班的教室、宿舍在附小那边。到1946年秋，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扫射、轰炸，学生不能在学校上课。为了防空，每天早上吃饭后，全体师生到北门外小理河西边的山沟里去上课，到晚上才回来，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47年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学校被迫转移，据说曾转移到子洲，后到岚县，最后转移到山西省交口一带，直到1948年秋冬，解放战争把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赶出陕甘宁边区才回绥德。

我任绥师战地服务团支部书记到1947年10月，学校派周裕祖同志来接替我，并带来专署的调令，调我到绥德地区干部子弟学校任校长。从这次调动工作，我才算离开学校。我从1940年2月入绥师师密训练班，至1947年10月离开战地服务团，在母校学习、工作近八年时间。母校在我一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一生的革命工作、做人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多少年来，我不知有多少次梦见过在绥师生活、学习等的情景片断，母校真正教育培养我长大成人。

## （八）母校对我的教育与关怀

我家住在绥德城内东门隔，距学校仅一二百米远，而我从1940年2月入绥师，至1947年10月离开学校，在这近八年期间，再没有回家住过一天，再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这八年中全部是由学校供养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特别穷困。

我家庭的简单情况是：我的爷爷是剃头的，父亲是一个鞋匠，我兄弟五个，人口多家里又没地，靠修鞋要养活六七口人，确实困

难。我14岁才开始念小学，后赶上1940年正月绥德事变，当时我已18岁，丁子文校长的弟弟丁锡奇同志当时在小学当教员，他为了照顾我，介绍我去了师资训练班学习，给我找了一条生活的出路。师训班管吃管住，1940年暑假后就住在学校。学校知道我家庭困难，也给我发衣服，每到冬天发棉花，填补被褥。因为还有几个外省的同学，如高步文同学，从山西敌占区来的，从延安来的雷高义同志，从冀中来的刘甲同志等，在寒暑假时期我们也在一块学习。在绥德事变时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榆林、响水上学的学生，也回来度寒暑假。绥德的共青团组织与学校配合，把我们这些在校的同学组织起来，与外地回来的学生举行联欢和篮球、排球比赛，目的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学生搞统战工作，向他们介绍宣传解放区、共产党的政策，以便他们回去之后向其他同学介绍。另外我们还利用假期给周围群众读报，宣传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

1942年我在何楠若老师的教育开导之下，学习了共产党党章，了解了党的总纲，知道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使我逐步地提高了思想觉悟，立志为改造旧社会，为解放穷苦人民而进行革命斗争。在刘宪曾同志主持下，由何楠若同志、拓毓雄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60余年来，我虽然个人的能力水平有限，但是始终坚持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对待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抱着认真负责、积极的态度去完成。今天我已离休，回顾一生，主要是因为在校学习，在母校关怀下成长的结果。

我在绥师学习、工作，也在绥师成了家。由28班同学马彩英介绍，我认识了他们班的王淑堆同学。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认识了解，于1946年，利用过年的时候结了婚。结婚时间选在大年除夕，在学校图书馆，由陈士斌老师主持，在校的教职员工参加，仪式很简单。摆了一点瓜子、花生、茶水，那时候也没有糖果。晚上就在我们职

员们的中灶食堂一块吃饭。晚上只是把我们各自的被褥搬在一块，当时住在西斋中间的一个窑洞里。我在前边说过，我在绥师八年再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于除夕在学校结婚，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回了家，家里为我们结婚，只给我们两人吃了一顿饺子。所以说我一生中的大事也是由学校给我安排操办的。

我在学校八年，八年中的生活，八年中发生的事，我入了党，我结了婚，我爱人生了孩子，我父亲之死后安葬，等等，都是学校给安排的，学校是我温暖的家。对我来说，学校比我自己的家还要温暖。在我的一生中我时时怀念母校，怀念母校教育培养了我，怀念母校在生活上、政治上教育我成长。怀念教育关心我的刘宪曾校长、何楠若老师、陈士斌老师、余峥老师等。怀念母校这个革命的摇篮。

## （九）结 束 语

绥师到2003年5月建校80周年。近80年来它走过曲折的道路。虽然从建校到1940年之前，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但是自从李子洲同志任校长开始，就把共产党带到了学校。当时的四师，后来的绥师就一直有党的领导，一直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及以后，在党传播马列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少年、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有许多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领导骨干，比如有副总理一级的刘澜涛、马文瑞，有部长、省长、将军一级的马明方、白如冰、贾拓夫、张达志、贺晋年、安子文、安志文、白介夫、汪洋、李嘉玉、柳随年、刘星汉、张汉夫等同志，

厅局长、地委书记一级的干部就更多。还有一些同志成为文学界、艺术界、司法界、外交界、新闻界的专业人才。经过绥师培养教育的学生有万余名分布在全国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各条战线上，相信他们都会铭记在母校的那一段辉煌历史，都会铭记母校给他们奠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正像刘澜涛同志于1986年举行的校友团聚会上讲的：“我们今天能在北京祝贺校友联欢，我们的母校今天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主要是当年在革命的学校里，培养了新的人生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也有的同志在革命战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同样是我们的骄傲。

母校在过去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今天，我们缅怀母校光荣的历史，庆贺母校建校80周年，相信母校为陕北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繁荣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2年3月

## 回忆在绥德师范学习、生活的片断

白秀珍

1940年重新组建的绥德师范，是一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干部人才的新型学校。学校非常重视教学质量，同时又注意学生的马列主义水平的教育。因而从1940年起，就有意识地从延安派来了不少大学程度的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记得首批从延

安来的有刘克曾、何楠若、汤般若等同志，以后陆续还选派了不少老师到校。同时，绥德专员公署也非常重视学校，曾派当时在职干部到学校教课，如欧阳正（杨述）、韦君宜、蔚肖天等。这里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当时绥德驻军三五九旅也大力支持这所学校的成长，选派了大学程度的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和兼课，如杨庚、刘鹏等同志。同时还经常到学校进行形势教育，党、政、军领导都曾给学生作过报告。如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地委书记习仲勋、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同志都为学校进行过政治思想教育、形势教育，使得当时的绥德师范在教育教学上严肃认真，在政治生活中生动活泼，非常活跃。学生对老师都很尊重，感情上非常亲近，互敬互爱。根据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要把绥师办成在教学上赶上或超过天津的南开中学，在政治上要培养学生具备三大作风，出校后成为能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坚强骨干。

学校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除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外，同时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加深对党对八路军热爱和了解的活动，以便解除对国民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学校除对学生进行校内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外，还特别组织了两次很有意义的到延安参观的活动。

第一次是在1940年夏天，当时只去了一些男同学，参观回来后由学联组织向全校同学传达了参观情况，说明了党和八路军的高级领导同志对我们绥师很关注，对学生很关心，有决心把绥师办成一所很有前途的新型中学。当时我们听了很受感动，也非常羡慕首批去延安参观的同学。于是学校又于1941年暑假同米脂中学联合组织了人数较多的到延安的学生参观团，由何楠若（绥师老师）、高云屏（米中训育主任）带队到延安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

我们到延安后，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关怀和接待。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出面，在不同场合接见了我们。有的领导同



志还给我们作了报告。最值得回忆的是我们曾两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是当我们参观团参观女子大学时，在女大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毛主席。那时的女大校长是王明，也同时见到了。因时间关系，毛主席未讲话。后来毛主席在谢老陪同下到边区政府会议室接见了我们学生参观团的部分代表，开了座谈会，给我们讲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亲切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征求我们对基层干部的看法，最后由丁浩川同志提议（当时的教育厅副厅长）请毛主席为我们参观团参加座谈会的每个同志题了词，人手一份，大家如获至宝，愉快地离开了会议室。这些题词，因战争原因有的同志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我现在尚保存着。1976年中共中央收集文稿时我将原件寄给中央了，给我返回一份影印件。这次为了欢庆学校60周年校庆，何楠若老师接到了学校的通知，在她的指示和授意下，我又影印了一份，寄给学校，以做纪念。同时简单地写了一小段回忆，作为对母校的怀念。

我在母校学习、生活了四年。由于学校的培养教育，使我学到了不少革命知识，走上革命道路，能为党做一些工作。绥师是我的启蒙学校，值得一提的，也是永远尊重、忘不了的老师何楠若同志，她是我们三三制甲班的班主任老师，是我们全班、全校受尊重、受爱戴的老师之一。

我现在在长春市食品工业公司当顾问，这次没机会回校同庆，很遗憾！祝愿老的校友、老师以及现在在校工作的老师、同学，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为把我们绥师办得更好，共同努力奋斗！

1983年4月20日



## 我对绥师的回忆

荆 蓝

1941年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带着“五龙宫女子小学”的毕业保送证书和简单的一小卷行李跑进了绥师的校门。走到报名窗口，递上我的证书后，在等候注册过程中，我为了居高临下能看得清楚些，便纵身跳上了窗台。我蹲着好奇地向里边张望，望着那位弯腰驼背，近视得很厉害，几乎趴在桌子上书写的“老先生”

突然，“老先生”猛然站起身大声吼道：“下去！你还是那优等生咧！”他的双眼从眼镜后面凶狠地瞪着我，一边用手颤抖地扶起滑下鼻梁的眼镜。

我吓得急忙溜下窗台，只觉得脑袋“嗡嗡”的，脸上一阵阵地发热。

待他注册完毕，我的惶恐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才又高高兴兴地夹起我的小铺盖卷——要知道，这是母亲专为我入绥师拆洗缝补的被褥呀！它虽然又小又薄，但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铺盖。现在我夹起它跑进侧院的女生宿舍，在土炕靠墙的一边铺展开来。

就这样，我“升学”了，算“参加革命”了。我不无自豪地觉得自己已长大成人，在我前面展现出一幅崭新生活的充满希望与青春活力的美丽远景。

我喜欢这所宽大的、有着几重院落和沿着山坡建起排排砖宿

舍的学校。它的操场很大很大，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分昼夜晨昏，我们总爱在这儿操练打球、演戏唱歌、开会玩耍……在这儿逝去的春夏秋冬带走了我们无尽的欢笑、企盼、失望、苦恼与奋争……。这些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了，全校停课集中学习毛泽东论述党风、文风、学风的《整顿党的作风》，论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的《反对党八股》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以及中央文件。细致深入的学习，使我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使命，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认识了知识分子与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我白天参加学习、讨论、听报告，担任大小会议记录，夜晚除整理白天的记录外，还常和邢宏、俊珍等几位同学一起到地委帮助整理各种材料，有时弄得挺晚，伙房招待我们吃一餐西红柿鸡蛋疙瘩汤的“夜宵”。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我们觉得真是美极了。这在学校的食堂里，平常是见不到的啊！

紧张的学习期间，常有驻绥德部队的专业剧团的同志来教我们歌舞与表演，如搞戏剧的武克任和“奋斗剧社”的陈瑞，时常来校辅导，陈教舞，武教表演。什么《叮铃舞》、《工农舞》等都跳过。记得我曾在一出小舞剧中扮演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角色。大致情节是：开始有一段希特勒张牙舞爪的独舞，之后渐被工农兵大众围而歼之。我很不喜欢这个女扮男装的角色，因为是分给的任务，只好勉强执行。有一回跳到希特勒被包围起来抱头鼠窜时，我觉得那些舞蹈动作太丑太难，便气得哭起来甩手不干了。此外，教我们表演的武克任常常带领我们八九个小同学在操场上排成一行，做喜、怒、哀、乐的各种面部表情练习，做得不合格的还要重做。如狂笑、大笑、微笑，这倒还容易办到。只是做痛哭、大哭或忧愁表情时，我

们往往忍不住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不久，由老师负责组织成立了“绥师文工团”，我们当然也就成了它的主要成员。大家选我，记得还有安锡爵任编导组的组长。我们“不脱产”地边学边编边排边演，大大丰富了全校的文化生活。到了年底春节前后，组成秧歌队，排演了一些宣传抗日救国与拥军爱民的小节目，到街道市民中演出，收到很好效果。一时间，在绥德城里提起绥师的秧歌还是蛮红、蛮有名气的。

1943年后，我们又陆续排出了不少秧歌剧、话剧，如《夫妻识字》、《二流子变英雄》、《刘二起家》、《把眼光放远点》等。并背起了背包，携带着简单的服装道具，直接步行到县城周围的市镇乡村风餐露宿地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1942年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加紧进行经济封锁的一年。边区政府号召全体人民“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学校及时组织起教职员和同学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各种劳动。如我们吃的粮食都由自己从远处背上山来，轮流帮厨，完成年生产定额任务。

与此同时，整风运动亦在深入进行中。尤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全校更是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加上不定期的演出活动，我们的校园生活真是空前的紧张而有序，严肃而活泼，充满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但是，好景不长，当整风学习正步步深入开展中，一股“怀疑一切”的邪风却卷地而起，顿时“揭发啊坦白啊”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抢救运动”开始了，气氛骤然间变得冷峻起来。大门口、宿舍外，一天24小时轮流站岗放哨，我们已难得有时间回家了。

在秋三四级的一次班会上，有同学当场揭发我说：“她背粮时洒了米是故意破坏！”“到龙湾去接贺龙同志她大喊‘要是现在打警报

就好了’，这是图谋不轨！”（当时敌机常来轰炸，绥德城里时常以打钟报警。我大喊是指来到了龙湾的山沟沟里好躲敌机轰炸的意思）接着全班同学举手一致通过“她有问题”。当时我正在做记录，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诬蔑与攻击，如雷击顶，当即提出不当记录了。可是老师令我继续记下去。就这样，散会后有人找我“谈话”，硬加给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姑姑燕生受到了巨大压力。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针对我们发生的这一切是因为有人胡说八道揭发和“供”出了我们，并且竟然有人相信了！我们更无从想象当时“怀疑一切”的所谓“抢救”是心怀叵测的康生一手制造和导演的呵！它严重干扰与破坏了整风运动的进行。

一方面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一系列著作与党中央文件后受到强烈震动，这些理论与方针政策的论述是那么深刻、生动而精辟，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并富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它们以无比的感召力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使人信服崇拜，并在思想中凝聚起一个信念：跟共产党走是青年的唯一出路！

另一方面由委屈而产生的困惑与彷徨，使我内心感到压抑，告诉自己：假如你的信念是正确的，那么总有一天问题会得到澄清！

我期待着，盼望着这一天……

在那背负沉重压力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姑姑燕生不久前还整日欢笑着形影不离，现在我们像陌生人一样不说话。即使四目相遇，也立刻避开，因为彼此怕见到对方眼里会涌出泪水！

终于，过了一段时间，当进入整风后期，果然传来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纠正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消息。地委领导派来了宋养初同志担任党总支书记，在他领导下全校开始了全面纠偏与甄别工作。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明亮而寒冷的早晨。全班同学集合在教室里，由宋养初在这个会上宣布，经过调查与甄别，我和燕生没有任何问

题，“他们的历史是清白纯洁的！”他大声宣告说。我和燕生听了激动万分，不禁热泪盈眶，我们高兴地跳起来呼喊：真理万岁！

继而，全校被错整的同学——得到平反与解放，甄别工作取得全面胜利后结束。

经过这次正反斗争的严峻考验，好像经历一次烈火的冶炼与锻造，我的信念更加清醒和坚定了。1943年学校调我参加鲁艺文工团，下绥、米、鹿、吴、清的巡回演出近半年；参加农业展览会深入农村搞调查，把农业生产与劳模事迹编辑成文稿展览；参加绥师文工团与抗大宣传队演出，等等。我都全身心地投入，以极大热情去努力完成任务。

1944年7月7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和燕生并肩立于镰刀、斧头的党旗下，由支书白炳书带领我们举手宣誓，一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并为之献身的崇高精神力量鼓舞与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周身热血沸腾！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切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风头主义”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座右铭了。特别遇重大问题的关键时刻，我始终牢记着这几句“名言”，它们是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嘛！

1944年秋三四级全体同学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专署任科员，不久又调到县委组织部上班。但是，为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中国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的伟大号召，我多次请求调我去农村基层工作。县委书记张方海同志经不住我“磨”，只好派我去绥德十里铺任了乡文书。我当即背起背包兴致勃勃地下乡了。

在村里，为了工作方便，说话有人听，行动少麻烦，我给自己加了6岁，说是24岁了，已婚，有四个孩子。当地的妇女主任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她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黑夜，我经常戴上军帽，扮成男人模样，拿着鞭子以防不测，到各村去查看冬学。晚上回来，待我像亲人一样的房东嫂子总是把炕头烧得热乎乎的，锅里还有热水，我简单地洗洗，检查一下备用的“驳枪”，上好子弹，压在枕头下面，很快便入睡了。

这一切，对我如同空气中的氧，泥土中的水，没有它们很难想象禾苗能茁壮地成长啊！回想起来心里是十分不平静的。

1945年初春，小理河的水还在冰冻着，我因被延大鲁艺录取而满怀欣喜地收拾了行装，告别了爸妈，奔向我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开始了我生活的另一篇章。

我时常想到，我在逝去的将近50年的风雨历程中，尚能始终如一坚持实践当年的“誓言”，是和母亲——绥师对我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啊！

1993年3月8日夜

## 难忘的四年

张 昭 马健忠 马尔赤 李蓬葆 刘 格

我们几位都是绥师二十四班的学生，曾在首都党政军各界工作过，现均已离休。1941年至1944年我们在母校度过了四个春秋。这四年可以说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又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

经济封锁造成我们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极度困难的年代，还是学习、生产、整风等一系列活动广泛开展给以精神上压力比较紧张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除了完成学习文化的任务以外，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参加了广泛的接触面极为普遍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说，这四年艰难险阻和曲折复杂的道路，给每个人一生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是最难忘的四年。

四年艰难困苦的学习环境，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也增长了才干。为我们以后在革命队伍中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坎坷的生活，磨炼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毅力，为我们在革命队伍中一辈子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的学文、学工、学农、学军等各项活动的深入开展，对我们革命人生观的确立，一辈子听党的话，做人民公仆，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间在母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风气的熏陶下，对我们学会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搞好团结，怎样发现、分析和处理问题等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四年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现就我们感受比较深刻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 艰苦困难的学习

我们进入绥师都是经过考试的。当年绥德以外的几个县都没有中学，念完高小不是到被国民党占领的榆林去求学，就是到边区政府管辖的绥米去升学。我们当时选择了绥师，并不是我们有了觉悟，



区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界限后的政治选择，只是因为绥德离家较近，又是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个小学教员还赚几斗小米，以解决家庭之困难。可是当我们1941年考入绥师后，才感觉到当时的绥师是相当困难的。国民党何绍南刚被赶走，边区政府的各项事业都没有底子，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绥师当时的教学条件也相当差，没有课本，上课时教员一边讲，学生一边记，能够记全的是极个别的。或者发一些油印讲义。当时的油印条件又相当低下，纸张也非常缺乏，基本上用的都是发黄的马连纸，根本没有见过白纸印的讲义，除了一名外地来的学生有一支钢笔外，本地的学生谁也没有钢笔，用的都是蘸水笔尖。根本没有像样的墨水，用锅底灰和水就算是当时的墨水了。食盐代替牙膏，没见过香皂的则相当普遍。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一直坚持上课，坚持自习，坚持考试。记得有一段时间，日本鬼子的空袭甚是频繁，干扰得我们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只要东门墙的大钟警报一响，就赶快往一亩的防空洞里跑，或者是经过附小往东门滩跑。还有一段时间，由于空袭太频繁、太突然，学校不得不停止在校上课，而是每天早晨太阳没有出来时就吃了早饭，然后整队往丁家沟方向的山沟里走。在那里的沟壑上、水渠边或田园附近上课，整整一个白天都在山沟里度过。当时饿得肚子咕咕叫，只有等到太阳落山后才能返回学校吃上晚饭。中间差不多间隔12小时，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年轻娃娃来说，可想而知肚子饿到了什么程度！而恰在此时，城里的饭铺还专门来这里叫卖油饼子、硬面馒头、黑粉、碗托等等食品，可是谁又有钱能买得起这些在当时来说就算是高档的食品呢！弄得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也只好看看流流口水而已。冬天晚上也是很难过的，学生们轮流烧炕，不会烧的费时不少，还会把衣服弄脏，把脸熏黑，或把灰飞到眼里，到头来还是没有把炕烧热，晚上只好睡冰炕过夜了。



##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1942年，国民党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处于极度贫乏的状态。绥师响应边区政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勤工俭学的活动。这样既可以减轻边区政府的负担，又支援了抗日战争，还可以改善同学们的生活，更培养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时绥师把开展大生产作为一门主课来上，每天都安排有生产任务，如纺线线、织毛衣、织毛袜等，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生产指标，课余时间各种生产活动、生产场面非常壮观。有位同学从距离几十里外的家乡背来了一辆脚踏纺毛线车。这纺车可以说是当时最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为了使它得以充分利用，许多同学就轮流使用，大多数同学是用于捻纺毛线，坐在地上纺棉线线的也很多，织毛衣毛袜的甚至扎破了手指也不肯休息。当时放寒暑假时，学生们还带着生产任务回家。除了这些学工劳动之外，我们还积极参加了学农的生产活动。东门滩的大川里有几十亩农田，这些农田从耕地、下种，到管理施肥、浇水和收获等一系列农活都由学生们担任。尤其是施肥，我们从学校担上或抬上茅粪一直送到农田，有时在路上把茅粪洒在了身上，只好跑到无定河边去洗洗。记得有一次收获南瓜，好不容易把南瓜从东门滩挑到了东门墙，一不小心一个南瓜从东门墙的高坡上滚了下去。这位同学感到非常可惜，抱着侥幸心理跑下去拣，结果南瓜摔得粉碎。只好感叹而归。学校修建房舍，我们轮流去河滩往学校背石头，一背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时还饿着肚子去背。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当时的背粮任务相当繁重，东南西北附近的粮仓我们几乎都跑遍了，最远的跑到田庄去背，来回80里路，还要背上几十斤重的粮食。当

时背来的小米极少极少，大多是高粱黑豆，所以学校的每日两餐只能是高粱饭和钱钱饭。大约每周能吃上一次小米饭。至于白面则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可以说我们在校四年连见也没见过，一直到1944年毕业，从延安分配到关中，路上在张林驿第一次吃了顿大米饭。背粮也有空手而归的情况。记得一次去七里铺背粮，等了几个小时结果什么也没背，当晚的晚餐就无米下锅。学校只好在城里的饭铺借了几十斤白面，给将近400位同学拌了几锅疙瘩汤。事后有的同志编了顺口溜说：“刘主任（刘宪曾）有办法，几十斤白面拌疙瘩，同学们喝了肚子还是呱呱呱。”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存条件。条件虽然艰苦了些，但对我们艰苦朴素思想的养成，却产生了非常有意义而且是深远的影响。

##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培养同学们的群众观点，为了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和认识观念，学校寓教育于社会实践中，组织学生们从各个方面走向社会，接触群众，接触实际。这既丰富了同学们的认识论，又增强了大家实践第一的观念。1941年学校组织了学生去延安参观，他们返校后的报告，使我们深受教育，尤其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更是对同学们巨大的鼓舞。以后还有二批和三批去延安的同学。1943年学校又组织了慰问八路军一二〇师官兵的活动，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参加了这28位同学组成的慰问团。她虽在绥师学习两年多，但还分不清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关系，通过慰问以及其他一些活动之后，她才知道共产党并不等于八路军。返校后她就积极申请参加党的组织，不久她光荣地入了党。这可以说是她参加社会活动的丰硕成果。每到冬季，学校还组

织同学们返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宣传抗日，宣传减租减息，办黑板报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办冬学，办识字班，宣传卫生常识，宣传扫盲，或就近参加当地组织的各种文娱活动。我们几位同学从来没有上台演出过，回乡后居然排了一个向鲁艺学习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当地演出后，轰动了起来，连续演出了六七天，每场都有好几百观众。有的同学在向群众宣传扫盲识字时，边宣传边演唱秧歌《夫妻识字》，效果很好。至于平时和学校附近的抗大、三五九旅的联欢更是经常的。联欢就要演出节目，或唱歌，或跳舞，或讲故事，等等。这对我们这些没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很难很难的。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和抗大的同学联欢时，她唱歌时两只眼睛一直不敢看观众一眼，只好朝天上看，就好像背书一样。就这样也博得了抗大同志们的热烈鼓掌，也可能是人家看我们过于拘谨而有意鼓掌。一二〇师篮球队赴延安途经绥德时，和我们的校队进行了友谊比赛，我们的同学使劲为校队加油助威。当然我们通过和部队的联欢活动，部队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和帮助。如有的贫穷学生冬天没有棉衣穿，三五九旅就送来了御寒的棉衣解决了部分同学的困难。当然也有通过这些联欢活动，我们的女同学就和部队的男同志从友谊联欢发展到恋爱结婚，最后组成了革命的温暖的

家庭。

总之，我们在绥师的四年，既受到了教育，又得到了锻炼；既学习了文化，又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我们在校实行的是供给制，毕业后又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从我们1944年毕业到延安之后，就分别走上了党政军各界的工作岗位。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母校不单纯是一所师范性质的学校了。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在报告中所说的“边区的六所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母校为党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它不愧为陕北高原上的红

色摇篮，它将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 忆热爱母校的邢宏同志

王振战

邢宏原名邢宏谋，陕西省绥德县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秋三二级学生。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入伍。曾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生活报社、陇东军分区、甘肃省军区、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陕西省军区独立师等单位工作。历任职员、干事、秘书、编辑、科长、师副政委等职。

邢宏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踏上了革命征途，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追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投身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46年秋，参加了著名的榆横战役，亲手创办了绥德军分区《战士报》。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生活报社工作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广大官兵的英雄事迹，宣传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陕甘宁边区陇东军分区工作期间，曾参加环县高家滩战斗，并认真负责地开展审查俘虏、动员担架等战勤工作。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军声报》、《挺进报》，利用舆论工具，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国解放后，邢宏同志一直从事我军政治工作和新闻事业，先后负责《战斗队报》、《学习与工作》杂志的编审工作。长期在兰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军队报社任职。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编辑出版了许多内容新、

质量高，思想性、战斗性强的新闻稿件，曾多次受到嘉奖。1955 年被授予解放勋章，1988 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奖章。1991 年 12 月 23 日因患心脏病逝世，终年 65 岁。

我和邢宏同志是 1942 年秋，我考入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二十五班后，由本班同学薛增禄介绍相识的。他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爱好文体活动，是学校的篮球队员。他打篮球跑得快，跳得高，篮板球抢得好，作风勇猛顽强，不管遇到任何强大的对手，他从不畏惧，敢打敢拼，人们称他为球场上的“小老虎”。校球队曾和当时著名的一二〇师青年战斗队、抗大总校球队、绥德教师联队进行过比赛，观看那些精彩的比赛，至今仍留给我美好的记忆。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邢宏同志积极参加文艺宣传队。他和刘燕生同学合演的《兄妹开荒》，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群众的高度赞赏。在课外活动时间，他经常来我们宿舍和薛增禄练拉板胡。他的嗓音唱得非常好，能够自拉自唱。以后到部队工作，经常到连队演奏，活跃部队文化生活。

我和邢宏同志相识近 50 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还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四年，我们的友谊胜过亲兄弟。从几十年的接触中，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邢宏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一生。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直不阿，从不谄上抑下；他清正廉洁，从不以权谋私；他热爱朋友，热爱同事，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关心事业胜过关心家庭。即使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也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体现了一个革命老战士的高风亮节。更使我敬佩的是他非常热爱母校——绥德师范。特别是他离休之后，更加关心母校的教育事业，全力以赴地操办绥师校友活

动。

1963年，为了庆祝母校——绥德师范建校40周年，邢宏同志积极走访串联当时在兰州工作的校友，于5月1日，在兰州五泉山公园聚会留影。参加这次聚会留影的校友有：兰州大学总务长任雄士，甘肃省委群众来访处处长刘英殿，甘肃省人民政府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冯祖舜，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副总编辑邢宏、兰州军区总医院政治处主任周裕祖、兰州军区总医院主治军医马炳房，甘肃省军区兰州军分区科长王振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白素芳，还有白亚平，共九人。聚会后，邢宏同志亲自写了贺信，并将合影寄回母校。

1985年春节后，邢宏和王丕祥、王绳武、张映芳、姜应宗、张增贞、黄文要、薛增禄、张儒华、黄锡林、马绍良、郝生英12位校友，发起倡议，趁绥师校庆62周年之际，组织一次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师生团聚联欢会。他们经两个月的筹备，走东家串西家，邀请了旅居西安、咸阳、渭南的所有校友。5月5日在兴庆宫公园举行聚会，有201人参加。校友们几十年不见，当年的青少年，两鬓挂了霜；昔日的成壮年，成了花甲老人。然而，年轻时交往的好友，久别重逢，带来的总是富有生命的青春活力。校友们忆过去，问别后，谈现在，盼未来，沉浸在幸福之中。在花坛前举行了团聚仪式，特请在母校工作了近十年，培育了几代人，时年已是82岁高龄的刘宪曾同志讲了话。刘老又把参加聚会的各位老师和早期的几位同学，一一介绍给大家。校友们在沉香亭北的斜坡上合影留念。各个班级也都照了相。刘宪曾和张汉武还为聚会题词。刘宪曾的题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绥德师范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张汉武的题词是：“像松树柳树一样耐风耐寒”。聚会之后，邢宏又和寇福年、周鼎铭等同学编印了《绥师旅居西安校友录》，为校友们以后取得联系创造

了有利条件。

1986年春节，邢宏和其他几位校友，发起组织了一次敬老尊师茶话会。会议是在省委党校召开的，特意请原绥德专署的领导杨和亭、张方海等几位老同志参加。茶话会开得很成功。常黎夫为茶话会献诗一首：“饮水难忘掘井人，李杨常（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师苦经营，雕明书院桃李艳，古城长安夕阳红。荏苒光阴六十春，当年师生剩几成？幸存尤须重晚晴，扶正抑邪荡埃尘。”母校绥德师范寄来贺信写道：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你们先后离开母校，毅然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又欢聚一堂，尊师敬老，回首往事，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应该肯定，这既是人生的乐事，更能促进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

1987年12月，为迎接母校校庆65周年，邢宏和其他几位校友，发起创建“李子洲奖教奖学基金会”。他带头捐款集资，并倡导全体校友，采取不限时间，不论多少、不讲次数、不拘形式、自愿集资、自由捐款的办法，筹集资金。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集资2万多元。此款如数存入银行，拿出所得利息，作为奖金，奖励正在母校任教的卓有成效的老师，奖励还在母校学习的真正拔尖的学生。奖励的原则是：不求数量多，只求质量高，使有限的奖金，能够真正为优秀的师生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达到促进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目的。

1991年12月，邢宏同志发出倡议，为迎接1992年李子洲同志诞辰100周年和1993年绥师建校70周年这两个有意义的日子，他诚恳建议：在北京、西安、西宁、乌鲁木齐的校友，通力合作，各尽所能，编辑出版一套《雕山文集》（三册）作为献礼。邢宏同志亲自起草了《雕山文集》编辑出版计划（商议稿）。第一集：暂名《雕山火种》，系统论述从1923年建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这漫长的26年中，从第四师范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期间，在各个



革命时期建团、建党，培育红色种子，输送革命干部，领导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26 年的历史，可分为 1923 年至 1930 年，第四师范时期；1930 年底学校被封闭，1934 年至 1939 年，陕西省立绥德师范时期；（1930 年底学校被封闭）1940 年至 1949 年，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时期。这一集请陕西的编委负责主持编写。第二集：暂名《雕山火花》，发动校友追忆撰写回忆录。从各个时期的各个侧面，通过具体的人和事，真实地记述自己在校的感受，也可以记述自己难以忘却的人或事。这一集既可以作为丰富校史的具体内容，又可以教育感染青年一代。因此，需要尽力做到文体多样，生动活泼，有较强的感染力。这一集请北京的编委负责主持编写。第三集：暂名《雕山火星》，搜集整理从四师到绥师前 26 年中，所教育与培养的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烈的传记或动人事迹，作为革命英烈专辑。这一集请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编委负责主持编写。为了领导和组织编辑出版的顺利进行，邢宏同志建议：成立名誉编委，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联络员。人选问题，他都作了具体安排，计划争取于 1993 年 5 月前出版。由于病魔夺去了邢宏同志的生命，他的宏伟计划未能得到实现。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绥德师范 1992 年 3 月 20 日致校友的信，提出编写《绥德师范学校》丛书，包括了邢宏同志要编写的内容。这样，邢宏同志生前的愿望能够实现，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 培育红色种子的革命摇篮

——回忆党在绥师的领导核心作用

贺登文

1942年春，我入党不久，插班到绥师春三四级学习。那时，外有日寇的疯狂侵略，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学校条件相当艰苦，经费十分紧张。加之，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扩大为“抢救失足者”，有的老师同学被捕，造成人人自危，思想混乱。在这些严重困难之前，绥师不但没有垮，而且在困难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在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方针的指引下，学校办得更好了，更加成熟了。这完全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党在全国十分需要干部的时候，下决心给绥师配备了一套坚强的领导班子，配备了一批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深受人尊敬的老师。他们拧成一股绳，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为绥师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校期间，绥师党的负责人是宋养初、刘宪曾等同志，校长是丁子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郭琦、余峥、杨琪（女）、高醒民、杨典、陈士斌等，他们多数也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不仅给我们讲文化课，而且讲革命理论，讲党的知识，引导我们树立革命人生观，走革命道路。他们把党的光荣传统，党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了学校，处处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们在狠抓教学的同时，大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学生之中，和学生一起玩，一起谈心，一起参加劳动，和学生一样吃小

米饭，穿粗布衣，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他们的模范行动，为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带动着学生刻苦学习，奋勇前进。

1944年的金秋，边区丰收了，满山的像金子般的谷穗，令人喜爱。这时，母校正忙着欢送秋三四和春三四两个班到延安分配工作。绥德分区专员杨和亭同志招待我们在专署院里吃便饭，他语重心长地讲：“你们去党中央所在地分配工作，我们感到光荣。希望你们都要服从分配，争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为培育你们的母校争光！”绥师学生没有辜负党的厚望，个个都精神饱满地奔赴革命第一线，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有的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仍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我深深怀念为革命牺牲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绥师党组织是很健全的，校有总支，班设支部，支部按党员人数划分小组。春三四班支部书记是杨力（杨致美），委员是张波（张海清）、李逢源、李蓬荣和我。党的组织生活是很严密的，对党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党组织未公开前，每礼拜六在何仁仲同志办公室开会或者上党课学文件，党员每周要向小组长汇报学习、思想、工作情况。小组会、支委会、支部大会都要按时召开。寒暑假，按党员分布地区编小组，过组织生活，我和黄文斐、黄光耀是一个小组，我们在河防前线的界首村开过小组会。

党员的任务是非常明确的：一、做学习的模范；二、做遵守校规的模范；三、做团结同学的模范，并分配有具体团结对象；四、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做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模范；五、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六、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并分配有具体培养对象。

由于学校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全校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学校办得朝气蓬勃。“抢救失足者”扩大化问题，很快得到了甄别平反。全校上下思想上达到高度一致，形成了团结友爱，尊

师好学的良好风尚。飘扬在雕山书院上空的是在一片舒心的欢笑声，雄壮的革命歌曲声。想起这一段快乐生活，就感到好像年轻了许多，全身都是劲。

解放前，陕北人民缺吃少穿，更缺少文化。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学习文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们希望绥师学生下乡来。绥师和陕北人民一直心连心，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除输送不少教师外，经常利用假日，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派出秧歌队，向群众讲解时事，宣传党的政策，深受群众欢迎。我参加过在学校操场举办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日寇为什么必败和中国的未来。这是1943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校内外参加的人很多，反映很好。同年寒假，我还参加过一次下乡宣传队。学校党组织对这次下乡宣传很重视，准备也很充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自己编写节目，自己演出。节目内容有的是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有的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有的是歌颂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颂扬劳动英雄，鞭挞懒汉二流子，有的是宣传“三三制”，宣传减租减息等等。

这是全校各班同学组成的宣传队，有秋三三、春三三、秋三四、春三四和二十五班的同学。安全、王丕祥、刘燕生（女）、黄文斐、薛增禄、张彩萍（女）等同学的表演艺术，当时在学校就很有名气。我们几十位同学背着行李，步行几十里，来到古镇、义合等村镇。天天在戏台上演，群众院里演，深受群众欢迎。应群众要求，晚上也演。照明困难，就用一大碗麻油，放上一条棉花点燃照明。不论白天晚上，场场人满。有的群众跟着我们看了一村又一村，看了多次还要看。我扮演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穿一件破棉袄，面黄肌瘦，要饭吃。演完后，在老乡家吃饭，一位老大娘拍着我的肩亲切地说：“好娃娃呢！你要好好干活，不劳动穿什么，吃什么呀！”

我笑着回答：“大妈，我一定改。”

绥师党组织一贯很重视学生向劳动人民学习，接受社会教育。这次出发时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是演好节目，当好宣传员；二是向劳动人民学习，当好小学生。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双丰收。

几年的绥师学习、生活、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绥师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绥师真正是名副其实的陕北教育中心，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成长壮大，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 访问晋西北

刘星汉 王丕祥（执笔）

1942年8月间，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青联组织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的部分师生利用暑假去晋绥前线访问。人数不多，共计约有20余人。其中学生共产党员五六人，女同志四人，教师两人。记得绥师的同学有刘星汉、王丕祥、徐泽尘、姜应宗、李荣珍（女）、刘桂兰（女）、贺学斌，教师何仁仲；米中同学有白丕允、石如岗、白步义、王亚梅（女）、高自兴、姜弼臣、杜立功，教师纪颖之。青联干部刘春（女）。刘星汉、白丕允分任正副团长，何仁仲、纪颖之、刘春任顾问。

这次绥德警备区青年学生赴晋绥解放区抗日前线参观学习，只是陕甘宁边区爱国青年活动长河中一点点的浪花，经过50年的漫长岁月，已被人们淡忘。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它却是警备区

青年一次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活动。“双十二”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日寇侵占山西省大片国土，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成为前线。为了保卫西北大后方的安全，划绥、米、葭、吴、清五县为陕甘宁边区所属的警备区。1937年冬八路军部分留守部队开始驻守该段黄河沿岸，担负起防御日军西渡黄河的重任，警备司令部设在绥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灭我之心不死，在利用八路军抗日的同时，运用它在警备区掌握的政权，进行匪共、限共、反共活动。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绥德警备区专员何绍南秉承其主子的旨意，污蔑共产党图谋不轨，破坏抗战，造谣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捣乱后方，并于5月组织胁迫绥德师范和各小学学生游行示威，向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八路军“撤离警备区”，“开赴前线”，诋毁共产党的声誉，破坏八路军的形象，割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赶走八路军，削弱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力量，把警备区变为反共基地。12月，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陇东地区悍然向我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1940年春根据毛泽东同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导原则，我三五九旅王震部在劳动群众支持下，赶跑了以何绍南为首的一批反共顽固分子和保安团队，在警备区建立了革命政权，称为“绥德事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的政权垮了，米脂、葭县国民党的党部还存在；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跑了，其残余势力和依附国民党的阶级势力还存在；国民党的公开统治没有了，其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和新的破坏还存在。加上许多城市中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不了解，社会思想状况呈现极为复杂的局面。在国民党妖言惑众之下，不少地主富农、商贾和一些老师学生也相继逃往国民党统治的榆林地区。特别是绥师反动校长白焕亭借端阳节之机跑

到榆林后，盛传绥师要迁移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响水，学生思想更为混乱。在暑假期间许多学生去国民党统治区上学。记得在秋季开学时，三一級原三个班 120 余人，留下的还不足 40 人。此后，经过工作，学生虽然稳定，但仍有一些学生流向国民党统治区。在这种形势下，稳定学生思想，教育学生明辨是非，认识真伪，争取青年学生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队伍成为当时青年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1940 年、1941 年两个暑期都组织学生赴延安参观。这次赴晋绥抗日前线参观学习，正是警备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继续。

## 一、艰苦的旅程

8 月初正是盛夏，晴空万里烈日当头的陕北气候也很炎热。我们以绥德出发，步行 80 华里，下午到了米脂，住在当时是米脂中学校舍的盘龙山上。在米脂呆了两天，一方面正式组建参观访问团，另一方面结合实际做了思想动员工作，比如团结互助、克服困难、群众纪律和对这次访问的认识等等。经过学习和动员，大家的情绪很高，都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参观访问学习的任务。会上青联的负责同志把一面“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青年赴晋绥参观访问团”的旗帜授予我们。

为了保证行军途中饮水、吃饭和住宿不发生事故，团里决定选派身体健康、灵活精干的王丕祥和白步义去打前站。他们的任务是每天提前出发，要在大队到来之前，搞好途中的喝水和午饭及晚上的住宿。一路上还要标出行军的路标，同时选择年龄较大、干活泼辣的高自兴同学护送口粮，担任“火头军”任务。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便高举着鲜红的旗帜，肩背行李，迎着黎明的曙光告别了米脂，迈开矫健的步伐朝着东方，朝着黄河

走去。

我们这支队伍，除了几个顾问，大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也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经过长途的行军。所以在开始的行程中，对什么都感新奇，一路上打打闹闹，走走停停，不是上山去采野花，便是下河去玩水，十分开心。但每天行军9至10个小时，爬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要饿着肚子赶路，确是一次艰苦的旅程。

经两天的行军，行程150华里，到达霞县。霞县是一座濒临黄河的石头城，站在城上俯视黄河，就像一条黄土色的腰带由西北往东南滔滔不绝地从眼前流过。黄河的对面就是山西，一眼望去，尽是山峦重叠、沟壑纵横、连绵不断的黄土山峰，气势雄伟，十分壮观。那里便是我们要去的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从霞县出发，到达晋绥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约有四天路程，八九月正是黄河汛期，我们沿着黄河边行军，感到特别新奇。第一次领略了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非凡气势。黄河流入晋陕，大都是峡谷地带，河边的道路崎岖不平，狭窄难行，脚下尽是大小不同的石子。看起来这里本来是没有路，仅有的大概是黄河上的水手拉纤的时候攀岩走石年复一年走出的“栈道”。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没有走过蜀道，无法作出比较。但在这里两边是巍峨高山，中间是急流奔腾，自然形成了抵御日寇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其功之大，“栈道”是无法相比的。可是对我们这些没有行路经验的学生来说，走得腰酸腿痛，疲惫不堪，不少人磨破了鞋，脚上打起了泡，甚至有人生了病。

行军中除行路难外，过河有时也成难题。我们从万湖峪到沙峁头要过秃尾河。赶到秃尾河已是下午了。河水正在上涨，又没有渡船，因不了解水情，只好等河水下降渡河。可是河水越涨越大，眼



看太阳要落山了，河水还没有下降的迹象，心里十分着急。这时打前站的王丕祥和白步义两个同学，在河对面向岸边走来迎接我们。他们一见河水上涨，大队堵在岸边，也很着急，二话没说便脱下长衣服过河探路。何仁仲老师怕出事，站在河边摆手呐喊不让他们下水。可是王丕祥会游水，一般的洪水是难不倒他的。果然他们下河以后，轻松地走了过来。看起来这里河面虽宽，但水并不深，只到了他们的腰部，且水流平稳。于是少数会水的同学扶着不会水的同学，经过多次往返连行李一起送过了河，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后面生病的同学和护理病号的白丕元副团长还未到达，只好安排大队先到宿营地休息，我留下等生病的同学。他们来到河边，天色已近黄昏，河水又涨了很多，我温水返回接应他们时，水深已探不到河底。这时天已黑了，要前进无法过河，后退离村又远，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下，找了船工在高地临时休息的草棚，三个人饿着肚子过了一夜，第二天找了渡船过河归队。不巧何仁仲老师也生病了，又有几位同学拉肚子，大家决定休息一天，进行了总结。我因组织工作不善，两个团长离开大队，队伍无人管理，造成混乱，受了批评。

行军第二个困难是食宿问题。当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口粮不足，菜金甚微。由于早晚都是稀饭，中午的菜油水又少，对于我们这些“吃铁可以化水”的小青年来说，每天行程10小时左右，常常要饿着肚子赶路，真是两腿千斤、步履维艰。记得我们路过一些村庄，路旁枣树遍地，半红的枣子结满枝头，发出诱人的馨香，真使我们垂涎三尺。但由于有纪律规定，只能望枣而兴叹，有的小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拾一些路边自然落地的枣子解馋充饥。如果路边山崖上碰到酸枣，体力好的同学也不放过，总要采摘下来，大家分享。运送口粮，是沿途动员老乡的牲口承担，经常要延误时间，所以大队到宿营地饿着肚子等饭也是常有的事。行军中有时发生没水的恐

慌。记得在河沿头宿营时，村上没有水井，人们都在饮用黄河水。那天黄河发洪水，河里流淌的都是些泥浆水。大家费了好大劲从黄河里挑上一担水，可是放到院子里老半天也沉淀不出一点清水。眼看着大队就要到了，洗脸洗脚水、吃饭喝的水都还没有着落。正当我们焦急万分无计可施的时候，房东大娘看见了。她进屋一手拿个搭杖，一手端一小碗黑豆面，走到桶前一边往桶里撒黑豆面，一边用搭杖在桶里搅。不多时奇迹便出现了，桶里出现了半桶清水。在大娘的指导下，我们一连挑了好几担水，如法炮制，沉淀了满满一缸水，完成了任务。大队到达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向大家叙述了这段故事。

行军中大都要住民房。动员老乡腾几孔窑洞临时居住并不困难，但地处贫困落后的陕北黄河沿岸，窑洞极为简陋，臭虫跳蚤丛生，我们常常要拖着疲劳的身躯忍受着皮肉之苦过夜。

经过三天行军到达彩林。这里黄河水流较缓，渡船平稳。我们渡河再北行数十里到黑峪口，踏上了被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土地。黑峪口是联系晋绥前方和后方的一个重要黄河渡口。由于敌人的破坏，村舍荡然无存。为了让前方的伤病员经这里渡河有个休息的地方，临时用草席搭了几间棚子。晋绥行署和司令部从蔡家崖专门派人带着口粮和饮具来这里安排我们过夜。

黑峪口离蔡家崖有几十里路程，一路上也经过不少村庄。但在沿途看到的全都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的景象。这都是“五一”扫荡时被日本鬼子放火烧的。所有的窑洞都没有门窗，黑洞洞地大张着口仿佛在向我们控诉鬼子的惨无人道。村子里看不到什么人，也听不到鸡叫狗咬，只有死一般的沉寂。这就是侵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山上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荒芜的，唯有村口路边那些海棠果依然挂满枝头，像玛瑙一般鲜艳耀眼，给人们多少带来一点

生机。偶尔也看到路上有几个少女把海棠串在一起套在脖颈里，倒是一串很美丽的项链。可见敌人的残暴和严酷战争也没有使人们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和审美情趣。人民总是热爱生活的。

## 二、在蔡家崖的课堂里

蔡家崖是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我们到后，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尽管当时晋绥的经济情况十分困难，人们都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对我们都非常照顾。按当时的供应情况，首长和重伤员每人每天有一斤掺有三分之一黑豆渣的小米。普通干部和轻伤员一样都是一斤掺三分之二黑豆渣的小米。而给我们的供应则和首长们一样。特别是为了给我们接风洗尘还举行了一次便宴，使我们既感动又不安。晚上还举行联欢会表示欢迎，演出了许多精彩节目，使我们广开眼界，耳目一新。

在司令部和政治部的访问留下的印象很深。特别是在政治部那天由于甘泗淇主任到前线去了，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夫人李真同志。据说她是长征过来仍在部队担任军职的唯一女将军，这使我们非常敬仰。她热情好客，特别喜欢小孩。因为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中，她一直没有生育过孩子，所以她对小孩有着一种母亲特有的喜爱。因此在她面前，我们也就无拘无束，十分自在，就像在家里母亲身边一样，玩得非常开心。首先由晋绥行署的同志介绍解放区创立的经过和根据地各方面情况。此后，李真同志安排我们和师直贺龙青年战斗队的英雄们举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战士大都是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青少年。可是当我们还是些不太懂事的中学生的时候，他们都早已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了。看着他们那瘦削稚嫩的脸庞和带着几分腼腆的微笑，谁会想到这些年轻的勇士竟敢面对着凶残的日本强

盗，以刺刀相见而毫无一点胆怯呢？当然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挂花了，可是有些人则成为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贺龙非常喜爱他这些敢打敢拼、勇敢不怕死的娃娃兵。当然，他们也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和人民的信任，如今已成为威震晋绥全军有名的一支小老虎战斗队了。和他们座谈，就像在同学朋友们之中一样，可以自由地倾诉心声，彼此没有一点拘束，也不感到一点陌生，相反的却感到格外亲切。

他们讲了许多生动感人和有趣的战斗故事，我们听得既紧张又担心。时而屏住气静静地听他们讲述夜袭敌营和巧捉舌头的故事，时而又为他们的胜利爆发出一阵欢笑。我们深深地敬佩和羡慕他们，为有这样的同龄人感到骄傲与自豪。都是同龄人，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民族的精英，而我们却仍是些围着课桌转圈的中学生。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造就了一代英雄。我们也要奋起直追，向他们学习，投身到伟大革命的熔炉中去锻炼自己。

座谈会将要结束的时候，甘主任风尘仆仆披着一身硝烟从前线回来了。一见面他便朗声大笑，一把将我们拥在怀里，用两只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搂住，嘻嘻地笑着，左看看右瞧瞧，还不停地用两只手轻轻地打着我们的肩头说：“不简单呐！你们这些小鬼竟敢离开父母跑到前方来，我们热烈地欢迎哪！”他热情地给我们讲了前线的情况和一些有趣的战斗故事，最后还嘱咐我们到前方来要好好看看，好好听听，然后把看到的所到的一切都带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学和后方的人民，让他们了解前方，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座谈会后，又安排我们参观了一个展览室。带我们去的是一个青年干事。他说：“这个展览主要是田家会战斗缴获的一部分战利品。”

田家会战斗是在我们去晋绥之前不久进行的。这是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后我军在晋绥前线一次很重要的战斗。它不仅重创了敌军，打死、打伤、俘虏一千多日伪军，还缴获破坏了敌人大量的武装和军用物资。因此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和广大人民对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军区为了扩大宣传，教育人民，组织了这次展览，用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及图片、照片和统计数字，向广大人民展示当前敌我斗争的形势和我军取得的胜利，从而鼓舞了斗志。

过去，我们只是在戏剧舞台上看到过一些真真假假的日本武器，而今天则是真实地看到了大量的日本杀人凶器，什么歪把子机枪、大盖三八式和九九式步枪，以及指挥刀和大炮。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军大衣、钢盔、皮鞋等等堆了一院子。看到这些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杀人武器如今作为中国人民的战利品堆放在院子里，心里感到很激动。再从那些战地照片和图表上不难看出，这次战斗的确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我们也从中感到胜利的喜悦，看到了侵略者可悲的下场。从而使我们深信，不管敌人有多么凶残，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造谣污蔑也就不攻自破了。

走出展览室，来到了一块草场。使我们惊异的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样高大的洋马，高得差不多和骆驼一样，这也是这次战斗中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我们怯生生地走近它，转着圈儿瞧，就是不敢靠近它。因为它们瞪着大眼望着我们不停地打着响鼻用蹄刨土，似乎很不服气或者是瞧不起我们。青年干事鼓动我们骑上去试试，但是一看见它们那凶恶的样子，我们心里就有些胆怯，谁也不敢去试。青年干事走近洋马用手摸摸鼻梁说：“别害怕，看起来它们的样子很凶，其实现在当俘虏还是挺老实的，不信你们谁先来骑上试



试。”在他一再的鼓动怂恿下，几个胆大的同学终于要显显身手了。可是马太高，我们的个子小，根本无法骑上去。青年干事想了个办法，让我们站在坝坎上然后再由他抱着爬上马背，缰绳一抖它们便迈大步跑开了。抖了一阵觉得很高兴，别看它们貌似凶狠，其实只要骑在它们背上照样老老实实地驮着你奔跑。只是由于它们的个大、腿长，跑起来一纵一纵，使人有点难受。

### 三、永远难忘的记忆

最难忘却的是参观兴县城。

从蔡家崖出发沿着蔚汾河往北走约有十余里路便是兴县城。这座县城沟通陕晋，连接内蒙，曾是商贾来往，物资交流集散的地方。山城虽小，背山面水风景优美，在晋西北也算得上是一座重要的城镇了。然而就是在今年的“五一”大扫荡中，好端端的一座县城霎时间变成废墟，烧成了焦土。就在这座废墟上，日本强盗还野蛮地屠杀了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

在一座教堂院内，县上的几位同志向我们介绍说：自从日寇侵犯晋西北以来，曾经几次到过兴县，但是以往几次对县城内的破坏还不很严重。因为敌人在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欺骗群众。特别是这座天主教堂敌人连进都没有进过。于是人们都以为天主教堂是外国人办的，日本人不敢得罪西洋人。所以一旦敌人来扫荡，那些教民和乡绅都带着贵重的财物躲到教堂来，以为这里最安全。可是他们错了。这次敌人大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闯进教堂把躲藏在里边的人通通抓走，贵重的物品全都抢光，拿不走的东西都堆在院子里连教堂一把火烧成灰烬。当我们参观的时候，院子里火烧过的痕迹清晰可见。县上的同志领我们

走出院子踏着遍地瓦砾朝小坡上走去。山坡上有一块簸箕形的平地，日本人把留在城内的百姓，都赶到这块平地。他们说是要开会，然而左右架起了机关枪，谁也不准离去。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鬼子又要耍什么鬼花样，那可恶的机枪便突然嗒嗒地响起来了。那杀人的凶器疯狂地喷吐着火舌向人们的血肉之躯无情地射去，可怜几十名无辜的群众便在惊恐的哭喊声中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大都是些老弱妇孺和不懂事的儿童。听他们讲述我们几乎惊呆了，默默地站在这块鲜血浸透过的土地上，想象着当时那可怕的情景，耳边又仿佛听到了凄厉悲惨的哭喊声、强盗们野兽般的吼叫狞笑声以及嗒嗒的机枪声。

在死难同胞们血染的土地上，我们默悼了片刻，转过身来环顾全城，山上山下满目荒凉，尽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一座好端端的县城竟被日寇破坏成这般残破的样子。这就是野蛮的侵略战争留下的历史罪证。这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山上转了一会，又沿着那条铺满瓦砾的道路走下山来，走出那座被毁坏的县城来到了蔚汾河畔。离城不远的蔚汾河畔有一块伸向河心的石头平台。据说那平台上曾经有座小庙，大概是河伯将军安身的地方吧！在“五一”扫荡的时候，鬼子把抓来的二十几个群众绑起来关在小庙里，周围堆上了木柴浇上了汽油，又涂上引爆的药物，然后他们远远地站在河对岸端起枪朝着小庙射击，顿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小庙。浓烟烈火不断地燃烧升腾，无辜的人们在哭喊、呼救、咒骂声中死去。强盗们则站在河岸上望着那烈火，听着惨叫，发出阵阵狂喊狞笑。侵略者丑恶的嘴脸在太阳的映照中投映在蔚汾河面，投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就在鬼子们狞笑狂喊声中烈火渐渐地熄灭了，被害者哭喊叫骂声也由高而低渐渐地变得无声无息了，只有一股浓烈的焦臭味随着烟雾升向高空又飘向四方。日本鬼

子怀着一种杀人后的满足与快乐离开了蔚汾河畔。兴县城从此变成一座死城。作为日寇罪恶历史的见证站立在蔚汾河畔。

不过我们相信,胜利以后,人们一定会重建兴县,使它变得更美!

## 四、夜走蔚汾河

转眼之间已是9月上旬。在晋西北的访问已将近半月。本来还想去临县访问,但由于突然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尽快地离开兴县西渡黄河。

下午,在蔚汾河畔一片树林里的篮球场上,我们和一二〇师战斗队进行了一次友谊球赛。这个球队是很有名的,过去几次渡河西征,在绥德、延安等地可说是所向无敌。这次比赛虽然说他们的主力队员都上了前线,但是我们这支临时拼凑的球队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球赛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夕阳西斜了。在蔚汾河中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返回驻地。这时,上级通知日本鬼子从岢岚、武寨出动了千余人马,分兵向兴、临两县扫荡。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首长要求我们连夜行动,拂晓前一定要撤过黄河。虽然我们再三请求希望留在前方亲身参加一次反扫荡斗争,但领导们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最后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晚上开饭的时候炊事员特别告诫我们说:“今天给大家吃得是山西特产,莜面烙馍。不过这东西吃起还不赖,可就是有点儿后饱,吃得过量要胀肚子,请大家留个心!”话虽这么说,可是年轻人本来就不识饥饱,再加上晚上要行军,谁还敢吃少。万一路上饿了怎么办?因此还是吃得很饱。但是到了晚上行军的路上,果然从队列中不时地传出各种不同的放屁声,惹得大家哭笑不得,幸好还没有人喊叫肚子疼。



从蔡家崖到黄河岸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是一直在河谷里行走。加上天黑地暗，道路又坎坷，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子，一不小心就碰上了脚，疼得人龇牙咧嘴直抽冷气。弱汾河虽然不大，但是河道弯弯曲曲绕来绕去，不停地趟水过河使人十分烦恼。最初趟水的时候，还要脱鞋，但是河底上的石子垫得脚板生疼。再加上还要带着女同学过河，那石头子嵌在脚心更是疼得钻心。趟水很频繁，脱鞋也太麻烦，便索性穿着鞋子过河。虽然石头子倒是不硌脚了，可是拖着两脚窝河水行军也很不是个滋味。

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凡敌人开始扫荡总是先要派飞机来封锁黄河渡口。所以为了赶天明过河，路上走得很急。带路的是两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他们一前一后夹着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不知趟了多少次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在东方发白晨曦初露的时候终于赶到了黄河岸。这时已是人乏马困，累得够呛了。不少人都一屁股坐在黄河岸边的石头上就呼呼地睡着了。

## 五、在河西访问

渡船早已等候在黄河岸边。过河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挤在一条木船上，乘风破浪飘飘荡荡渡过了黄河。我们住在盘塘，这是通往晋绥前线走向华北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渡口。每当情况紧急的时候，晋绥边区的后方机关或老弱病残以及其他一些不适合呆在前方的非战斗人员便纷纷撤过黄河来到这前方的后方暂时安息几天。当时在陕西境内的神（木）府（谷）沿黄河畔几十里路上的村庄，差不多都住着晋绥边区的机关团体。比如抗战日报社、后方医院、兵工厂、干部学校等等。因此住在盘塘我们照样可以参观访问。我们首先和抗战日报社进行座谈，听了他们对晋绥边区的全面介绍和许多动人

的抗日故事，我们对晋绥边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晋绥军民艰苦抗日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会后他们还赠送了我们一本自己印的袖珍本《整风文件》，实在是一份珍贵的礼品。接着又访问参观了兵工厂。看到了工人同志在极其简陋的窑洞厂房里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修复制造了大量的地雷、手榴弹、子弹和各种武器，保证了前方的需要。使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为了祝贺贺龙同志46岁生日，工人们特意制造出一种“四六”式步枪，乌黑发亮，非常漂亮，据说性能也不错。虽然数量还很少，但却显示出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中国人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这样精致漂亮的武器，可以想见日本鬼子离末日也就不会远了。

在贺家山我们访问了一家后方医院，看到了不少从前方转来的伤员。他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到后方医院，希望很快治好伤赶快重返前方，但遗憾的是却往往使他们失望。由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封锁，许多急需的药品都无法搞到，只能依靠自己炮制的中草药和土办法治疗，效果自然要差得多了，许多重伤员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一些不该残的残了，不该亡的人也亡了。当院长十分痛心地说道这些情况时，那自责和痛苦的样子，使我们也深感悲伤。但是这又能怪得了他吗？有一位田家会战斗的伤员大腿被敌人的机关枪穿了个洞，由于战场上抢救不及时受到感染，致使伤口化脓，腿肿得像小桶一般粗。院长指着伤员叹口气说：“像这样的枪伤，本来并不难治。只要有一些磺胺之类的抗生素和消炎粉就可以治疗。但是就连这些普通的西药我们也无法弄到。只能靠盐水洗，再撒上一些用黄连之类制成的草药，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治不好，不只是让伤员受苦，如果控制不住溃瘍，说不定最后没办法还得截肢。”听他这么说，我们的心一收缩。他还那么年轻呀，也许要变成



残废！院长停了停叹气说：“当然也不只是个药品问题，伤员的营养也严重不足。现在重伤员每天一斤小米要掺三分之一的黑豆渣渣，普通伤员和战士的一样掺三分之二黑豆渣渣，虽然说每天有五钱油，但是实际上很难保证，至于肉食那更是一月也吃不到一次。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使他们很快地恢复健康重返前方呢？这是抗战以来最困难的年头。”

可是当我们沿着病床去看望伤员的时候，那些脸色憔悴却充满自信和乐观情绪的年轻战士们总是微笑着对我们说：“不要紧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再过几天伤一好，我们就重返前线，狠狠日本鬼子！”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以威武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培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培育了我们的人民。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正在这些年轻战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吗？就凭着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民族一定能够振兴！

## 六、历史的重托

我们在河西一边参观访问，一边等待着局势的好转，以便再渡黄河去临县访问。但是河东的情况仍然紧张，再次过河是没有希望了。这时已到9月中旬，学校已经开学了。于是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遥望河东，告别了晋绥边区，告别了坚持在抗日前线的晋绥军民，原路返回米脂。在米脂总结了工作，返回绥德结束了这一行程，开始进行传达汇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托。

回到绥德，先在绥师举行了座谈会，向全校师生汇报了我们的晋绥之行。讲了我们的见闻，讲了鬼子的“三光”政策给晋绥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也汇报了八路军和晋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团结一致，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许多动人故事。紧接着又给全城的几个学校进行了汇报，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随后我们又在绥德地委的机关报《抗战报》上发表了题为《隔条黄河两重天》的文章，向全警备区的人民汇报了晋西北人民在日寇“三光”政策下遭受的重大牺牲。同时也告诉人民，敌人的野蛮残暴和毫无人性的烧杀抢掠，绝不能征服中国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坚定了抗战的信心。而且残酷的斗争使人民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勇敢，也更加聪明了。他们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着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敌人屡遭失败，寸步难行。最后还告诉人民，正是由于在黄河对岸晋绥军民的顽强战斗，才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宁，才使我们有条件安心地读书、平安地生活。但是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我们后方的人民理应更加努力生产，全力支援前方，全力支持抗战。

在晋绥的参观访问虽然是短暂的，但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永恒的。虽然我们已离开了晋绥，但我们的心的仍然和晋绥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那短短的几十天里，我们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我们突然间似乎长大了，也懂事了。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此刻想起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八路军的那些谣言，都已在事实面前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同学们的政治觉悟都大大地提高了，给我们上了一次最好的政治课。不少同学还提出了入党申请。

岁月流逝，转眼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那些年轻的朋友如今都已白了头，然而当年访问晋绥的情景却依然记忆犹新，仿佛是昨天一样。这次访问给我们每个人留下的印象很深，教育和启迪是永远难忘的，成为许多同学人生道路上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时至今

日，我们依然怀念那段短暂而难忘的日子。

1992年7月

## 1942年整风片断

白炳书

### 绥师的新生

1940年绥德师范学校由国民党“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改为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这是绥师自1923年创建以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是绥师的新生。绥师从此摆脱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绥师的政治方向、教育方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实行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1942年的整风运动，可以说是1940年大转折的继续和深入。同学们在政治思想上彻底清除了过去所受国民党反动教育的影响，明确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是中国的希望，代表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而坚定了跟共产党、八路军走的信念，进而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此，绥师的面貌发生了更新的变化。

### 学习整风文件

1942年整风初期，绥师和地方各单位一样都是强调要学好整风

文件，领会精神，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转变工作作风。

整风前绥师师生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共产党刚接管，虽然从延安、绥德分区和在绥德驻防的三五九旅调来多位政治思想水平高又博学多识的教师，同学们开始接受了新的教育，组织了参观团多次赴延安、晋西北参观访问，成立了学生会，举办了辩论会、墙报、演戏、歌咏等活动，政治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但部分同学和留任的部分老师过去所受国民党反动教育的影响很深，再加上当时浓厚的封建意识，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势力小，装备差，没有钱，成不了大器，对共产党、八路军种地、纺线、拣粪很看不惯。许多同学羡慕国统区榆林的中学，有些人还把前途与希望寄托于国民党。

我于1942年8月从延安到绥师，在训育课工作。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有附小老师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就在会上，有一位刚从绥师毕业来附小任教的老师，公开讥讽共产党、八路军说：八路军哪儿像个军队，开荒种地拣大粪，八路军什么都要，就是一样不要，不要枪……对于这样的言论当时都无人反驳，进步的同学抬不起头来，落后的同学却很活跃。当时多数同学的主导思想是好好读书，不参与政治，毕业后回乡当个教员，养家糊口。对于整风学习，大多数师生都不重视。

## “三月三”风波

1943年春新学年开始，表面平静的校园里，一石激起了轩然大波。校长霍仲年、训育主任刘宪曾和老师汤般若同赴延安参加边区政府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决定由教务主任丁子文代校长，陈士斌老师代教务主任，余峥老师代训育主任。有人反对这个决定，贴

出了传单，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黑头帖子”，给整风增添了“神秘”，增加了困难。

先从“三月三”说起。1943年的“三月三”我至今记忆犹新，是阳历的4月17日。

“三月三”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古代是北京人在这天徒步或乘车马游览于东郊的蟠桃宫。绥德城西的合龙山年年有“三月三”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月三，合龙山，马尾帽儿单布衫”说的就是庙会的一派新春景象。记得这一天赶庙会的人也很多。经师的同学早饭后也三三两两，成伙结伴去赶热闹了。

“天有不测风云”。这天临近中午，天气突变，狂风大作，霎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们被狂风吹得帽子戴不住，身子站不稳，眼睛睁不开，披头散发，回到学校满身满脸都落上一层黄土。进窑洞，炕上、桌子上也是一层土，搅得人心烦意乱。

这一天的狂风，真是一个不吉祥的兆头。就在这天夜里出现了一张“黑头帖子”。是当时学生用的麻纸作文本上撕下来的一张双页纸上，用毛笔竖写的，贴在操场东边中院教室的外墙上。内容的大意是：我们一致拥护并坚决要求杨典先生任教务主任，余峥先生任训育主任，要求学校一定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署名，也无日期。

发现这张“帖子”的时间是第二天，即旧历三月初四，阳历4月18日晨7时左右。记得是代教务主任陈士斌老师在此经过时看到的。他马上撕下来，交给当时的党总支负责人何仁仲同志，并很快来到我的宿舍，问我看到这张“帖子”没有，我说刚起床，还没有出门。当时分析，看到的人不会多，一是发现得早，二是以后再也没有人反映或谈论这件事。

有的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对当时人事安排的不

满，煽动性大，是经过策划的。并认为写“黑头帖子”的人对学校情况很了解，也很了解同学的思想，所以一定要重视。因为杨典老师当时在同学中有一定威望，记得何仁仲同志很快找我们了解情况，分析传单的内容、笔体、用纸、同学中一些可疑的对象，以及侦破的办法。决定由余峰主任和我先秘密追查。我们经过几天的追查，一点线索也没有发现，心情很是沉重。

## 杨典老师“被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发现“黑头帖子”两三周后，又发生了一件奇案：杨典老师“被打”。

在追查“黑头帖子”的过程中，还陆续发现了几张小字条，有的放在同学宿舍的桌子上，有的夹在同学的书本中，都在杨典老师的那个班。学校的气氛开始有些紧张了。为了查出坏人，研究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当晚在校内的各个行人要道，派人秘密站岗，严密监视。开始派的站岗的人都是各个班最可靠的党员骨干分子，一个岗位两个人，从学生宿舍熄灯开始一直要站到第二天天亮。

杨典老师“被打”那天晚上站岗的是秋三三级的七八个同学，是在我住的校门口西边训育课的平房里开的会，布置了任务，分配了各人的岗位。并特别规定要注意隐蔽自己，谁也不许擅自离开岗位。只有巡逻的总负责人，没有分配具体岗位，总负责检查联络。大概在同学们熄灯之前开的会，会后各人就进入被指定的岗位。

再说杨典老师，他住在校长院子东排的第一间平房。差不多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许多同学到他房里听他讲故事，房子里挤得满满的，有的人进不了房，就在门口、窗下站着听。据他自己讲，那天晚上待同学们离开以后，他坐在临窗桌子前的椅子上看书。桌子上



点着麻油灯。忽然从窗外飞来一块石头，穿破窗纸，打在他胸膛上，打得很重，很痛。记不清是谁先向何仁仲老师报告的。我们是第二天早上得知情况后去探望的。我们探望时，杨典老师躺在炕上，窗纸有个大破洞，桌子上放着拳头大的一块石头。他还揭开衣服让我们看伤处，有块发红的伤痕。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全校岗哨森严，不是插翅，谁能跑到这个小院子来行凶？

杨典老师“被打”的消息，像开了锅的水，很快在校内沸腾。许多老师、同学纷纷前去看望。有好几个同学还从家里拿来梨、红枣等食品慰问。

训育课那几天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夜以继日地开会研究追查凶手。余峰主任和我一会儿找这个同学谈话，一会儿找那个同学谈话，以后又找那晚站岗的总负责人等几个同学一起分析研究那个具体情况。真着急，我们研究来研究去，不仅抓不到凶手，破不了案，而且一点儿线索也找不到。各个岗哨整夜都没有发现任何行人，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能到杨典住的小院去行凶。记得是训育主任余峰和我一起向党总支负责人何仁仲同志汇报我们研究的结果的。那天晚上巡逻人员的岗位、任务是我布置的，我负有首当其冲的责任，出了事，又破不了案，心情自然格外沉重。

大概是由于我的“失职”或办案不力，所以之后追查坏人的许多内情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凶手找到了，就是那天晚上巡逻的那位总负责人，而且已经被保安处逮捕了。我很吃惊，又因为对面前的凶手丝毫没有察觉而深感内疚。大概就在逮捕凶手的第二天早晨的早操后，全体同学和老师都留在大操场，何仁仲老师向大家宣布了侦破案件的情况，介绍了凶手如何利用负责巡逻的方便，穿过岗哨，进入小院行凶的。好像还在黑板上画了行凶的路线图。许多同学和老师听了这个情况，

忐忑不安。我和一些了解这位“凶手”的同志大都暗自在想，他为什么要行凶呢，他的动机、背景又是什么呢。

## 大 搜 查

从逮捕“凶手”后，追查囚犯、特务的活动广泛展开，用原先课余秘密进行的方式，远远不适应了。事实上案件亦已完全公开化了，所以就转为公开的方式，并经地委批准全校完全停课。之后便是夜以继日地分班分组开会，坦白、交代、检举、追踪、审查。逐步从“黑头帖子”、杨典“被打”案件，追查到一些“反动言论”、“破坏行动”；从个人活动追查出反革命组织“三青团”、“复兴社”，以及“石头队”、“美人队”等等。后来又有人供出隐藏有手枪。之后有四五位老师和二三十名同学陆续被捕。记得三二级 18 名同学中就有 8 名被逮捕，13 名“坦白”。坦白的人数骤增。许多人是被逼供坦白的，许多人是害怕被逮捕而瞎说的。

至此学校上上下下都十分紧张，运动夜以继日，星期天也不休息。城里的同学原来住在家中的全部住进学校，师生一律不准请假回家。学校和外面完全断绝了联系。即使在校内，同学们不仅夜间，白天也不能单独行动。至于被重点审查的同学，吃饭、上厕所，一行一动都有人跟着。由于坦白的人增多，夜间站岗的人轮不过来，后来便采取一个可靠的配一个有问题的，并从地干班抽调了一些可靠的同志。

最恐怖的一次是全校手枪大检查。有天早晨传令全校师生在大操场紧急集合。待同学们按班组站好以后，响一声口令：向后转！拉开距离，不许动。这时，事先布置好的保安队的战士便荷枪实弹从操场旁的小门跑步而进，把全体同学包围于操场之中。然后由男

女老师分别对男女同学一个一个地进行搜身。同学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甚为惊惶，不知要干什么，又为什么。有些年龄小入世未深的同学更是心惊胆战。与此同时在学生宿舍也进行了大搜查，每个同学的被褥、书桌、行李都被搜查了。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几个月的批斗、逼供、诱供下，坦白交代出了一个极其“庞大”、“严密”的“复兴社”特务组织，绥德地区有一总社，设一特务专员，是绥师的一位老师。绥师设分社，各班有支社。这些都是后来在群众坦白大会上听到的。在严酷的逼供下，许多同学把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不理解所说的错话，说成是特务破坏；有的把生活中的种种失误，如多用了一点水、盛了一点饭、背粮时袋子破了撒了一点米等等，都说成是特务破坏；有的女同学甚至把和进步同学谈恋爱说成是“美人队”施的“美人计”。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高潮，几十万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并在南线峽台山向我发动了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在延安发动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波及绥师，绥师也召开了“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此后对学生中所谓的顽固堡垒又掀起了突击围攻。在教师队伍中也开展了“抢救”。在康生对某些地区的共产党是“红旗党”的诬陷下，原来领导学校整风运动的党总支负责人何仁仲等同志也坦白了。前几年我在揭发康生罪行的一个材料上看到，“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几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

记得大概是这年的代八九月间，绥师和绥德市还召开过几次坦白大会。有绥师和绥德市一些所谓的“特务”的坦白交代，也有绥德市群众对国民党反动专员何绍南种种罪行的揭发控诉。绥师有几位同学后来还参加了地区组织的“控诉团”去延安等地控诉“特务”罪行。

记得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当时的绥德分区保安处处长师哲同志，对什么是特务有一段很有趣的讲话。他说特务就是鬼，就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专门在黑夜里出来干坏事的鬼，鬼头鬼脑，鬼眉鬼眼，鬼来鬼去，鬼鬼祟祟。

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当时任抗大校长的徐向前同志的讲话，对全校师生和广大群众都教育很大。他主要讲了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讲了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抗击了百分之七十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的事迹。同时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共产党的种种诬蔑，谣传共产党、八路军到陕北来是搜刮老百姓的，是为吃为喝为享福的。他批驳说：我们如果不是为抗日救国，解放人民，到你们这个穷得鬼不生蛋的地方干什么！享什么福！我们劳动生产，自力更生，不要老百姓的粮食，还交公粮，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是来搜刮老百姓的？他讲完话，从四五尺高的主席台上轻轻一跃，跳了下来，许多人都很敬佩他的大将风度。

## 疾风劲草

在严重的逼、供、信情况下，还有一些同学坚定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可谓疾风中的劲草。如二十五班的白焕儒同学，是党员，在发现“黑头帖子”前后进校插班。当时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利用同学还不了解他的政治面目的条件，让他去接触了解几个被怀疑的同学。后来这几个被怀疑的同学都坦白了，并交代说他也是特务。在整风领导人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坚定地为自己辩护，顶住了逼供，始终未承认自己是特务。

另一位是二十五班的女同学党润谢，大概在八九月间，“抢救运动”到了后期。有次我从礼堂经过，看到二十五班的同学在礼堂东

南角上开会，几十个同学围成圈坐著，党润谢同学站在中间，听到她慷慨激昂的辩解：我不是特务，我从来就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我明白这是在围攻“顽固堡垒”。大会批、小会斗、个别谈话，而党润谢同学自始至终勇敢地坚持说理、申辩，实为难能可贵。还有几个学生党员“顽固堡垒”，不顾长时间的隔离逼供，顽强地进行抵制。还有两位同学躲开严密的监视，逃回家乡躲避，一位同学逃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榆林。他们后来都陆续返回学校。另外在保安处关押的几位同学也坚决抵制逼供，有的绝食，有一位用头撞墙，碰得头破血流……当然，逃跑、绝食、流血并不可取，但也说明坚持真理何等不易。

## 甄别平反

紧张的运动历时半年，从农历三月三到八月十五基本告一段落。八月十五前夕，学校召开了城区学生家长会，八月十五学生又放了假。但人们的心里并不平静，“坦白”了那么多的“特务”、两大案件、手枪等等问题，都在那儿摆着，像一团乱麻，怎么个理法。

由于校党总支领导人也“坦白”了，无法再领导运动，所以在地委领导下改组了党总支。由地委派来学校帮助领导整风工作的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党总支书记（并兼教务主任），全面领导学校的工作。我任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分管组织、干部及甄别工作。地干班主任高再增同志任党总支宣传委员。

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如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不许肉刑，不许打骂，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抓典型，以及反对主观主义，等等。同时对原检查了绥师在运动中的问题，研究了进行甄别平反的步骤、方法。

记得最核心的要求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不要轻信口供。

在地委和党总支领导下，专门组成了一个甄别工作班子，有秋三四级的党员骨干齐心、姚学融等同志参加。首先以秋三四级为典型，对“坦白过”和“有问题”的同学逐一进行甄别，并写出每个人的甄别结论送地委审查。以后在各个班都建立了甄别小组，甄别工作在全校展开。大概是在1944年的五六月间基本结束。甄别的结果是一个特务也没有，所有“坦白交代”的“特务”问题全部平反。当然说错话、做错事的人还是有的，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关于杨典“被打”案，我们再次反复进行调研，最后仍然肯定没有人去行凶。自然也为被冤枉的“凶手”平了反，从保安处接回学校。但此案也无证据可以否认，所以只好暂不结论。当时杨典还被关押。以后从保安处得悉，杨典承认“被打”及“黑头帖子”两案都是他自己制造的。真是“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恶作剧，危害了多少无辜，更危害了他自己。这也说明这次运动是深刻地触及了人们灵魂的革命。

每位同学的甄别结论，首先都交本人审阅、同意，然后在各个班开会宣读。学校有影响的师生在全校召开的甄别平反大会上平反。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深得人心，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尤其是曾被冤枉了的同学感到由衷的高兴。整风运动虽然经过了许多波折干扰，也发生过错误，但终于排除了，纠正了，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大家都不因一害掩大德，而且更深刻地体会到胜利之不易，运动之伟大。

整风运动在绥师最大的收获，是全体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同学从思想上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彻底肃清了过去所受国民党反动教育的影响，认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的中

流砥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希望，从而热爱共产党，立志永远跟共产党走，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同学至今牢记整风对自己的教育，深深感到是整风使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树立起革命人生观，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作风。

## 丁校长的两个申请

丁子文校长对党的态度的转变，也是整风中教职员思想觉悟提高之一例。运动前丁校长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但对党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运动初党总支领导人视运动过于神秘，许多情况、措施根本不和他通气，实际上把他架空了。两个案件发生后，许多人都夜以继日地奔忙，而他每天除了上街给自家买点菜，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无事可做。他对学校的恐怖气氛，对学校关起来的秋三三级的弟弟等人很担心，很惶恐。记得6月间的一个中午，教务课的一位小楷字写得极好的姓周先生，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还没有来吃饭。我去看他，他悄悄告诉我，他忙着给丁校长抄一封向边区政府申请辞职的信。但是宋养初同志来校兼任教务处长，全面开展工作后，事事与非党同志民主协商，对丁校长更是尊重，学校的运动情况和工作安排都向他汇报，请他提意见。教学内容的改变、人事的安排，也都请他提意见。学校建“泰山商店”，记得经理还是他推荐的。他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有职有权，情绪好转了，对党的态度也积极、热情、主动了。不仅和我们谈工作，而且谈思想、谈生活、谈经历、谈大革命时期在北平大学的革命活动，并提出入党申请。以后经地委审查批准，他加入了共产党。

总务主任王铭旗老先生，当时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尊称他“老王先”，实在是位清廉、正直的好当家。他爱校如家，经常教育师生要

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他掌握的一间储藏室内，完整无损地保存了20年前四师时期的学生试卷、军训服装，还有地下党活动的资料。尤其可贵的是还保存着一幅五尺长、二三尺宽的白布黑字的“绥德县农民协会”的大会标。这可以说明绥师曾经是当时绥德农民运动的中心。整风运动中期他也是惶恐不安的，他在三二级学习的儿子曾被逮捕。但随着甄别平反，他对运动的认识也提高了，一如既往地抓学校的生产建设。三斋上面的一整排新窑，就是在他领导下多快好省地建成的。

经过整风，绥师的外貌也焕然一新，粉刷了许多新标语。大操场北边墙上有条大标语写的是：“为边区就是为全国，为今天就是为将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延安的大批干部经绥德奔赴张家口、东北各地工作，许多同志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条标语写得好。

### 三个高潮

生产运动掀起新高潮。全体师生的劳动生产不仅热情更高，而且规模扩大，并开拓了新的领域。女同学多参加纺纱、织布、纺毛线、织毛衣、织围巾、织手套等，男同学多数参加农业劳动。东门滩二三十亩地种的白菜、西红柿、洋芋、南瓜、花生、玉米等，连年丰收。后来又在周家硷、四十里铺办起了农业分场。另外建立了“雕山商店”，兴办了纺织厂、酒厂、卷烟厂。全校四三百架手摇脚踏纺车，在生产时间一齐开动，真像一个大工厂。从1943年冬开始，全体同学每天早晨去东门外背一次石头。特别是地干班同学，年龄大，身体壮，背的石头又大又多，很快在二斋顶上堆起了一摞一摞的石头。新建的二斋上面的那一排窑洞的石头完全是同学们背来的。年底全校生产总结大会上，汇报生产成果，表扬生产能手、



劳动模范，一片欢笑鼓掌、热气腾腾的场面。通过生产劳动，学校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师生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

深入农村开展社教、办冬学高潮。整风后农村的生产大发展，文化教育活动也蓬勃开展。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工团到绥德演出，轰动了全城、全县。绥师也很快建立起文工团，排演了许多宣传党的政策的新秧歌戏，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受到群众的欢迎。绥师文工团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中一些同学后来发展成了国家的一级演员、一级歌唱家，有的还获得了世界大奖。

为响应边区政府开展冬学运动的号召，1944年冬学校四个班200多名同学，深入农村办冬学，办识字班，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并通过办黑板报、读报组，组织新秧歌队等形式，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宣传讲卫生、破除迷信，深受群众好评。对农村普及文化知识，推动生产，改变落后面貌起了积极作用。

踊跃奔赴延安，接受工作分配高潮。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边区政府决定绥师经过整风锤炼的同学全部毕业，部分去延安深造，大部分去延安边区政府接受分配。25班和26班不到毕业时间也提前毕业，接受分配。

接到边区政府的通知，起初我们还有些顾虑。当时咱陕北人的乡土观念很重，普遍不愿离开家乡。有句顺口溜代表当时的思想状况：“金窝、银窝，不如咱这土窝。”即使同学觉悟提高了，还有家庭呢。但是向全体同学宣布这一决定后，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同学们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报名去延安，而且都保证一定做好家庭的工作。那时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以后确实也没有发生过家庭阻拦的情况。记得是从1944年秋至1945年春，去延安大学学习和去延安边区政府分配工作的同学，分期分批，齐集学校，背

起背包，迈着矫健的步伐，欢欢喜喜地离开学校，奔赴延安。

1993年4月

## 回忆在绥师的岁月

齐 心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对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满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帖子”（写恐吓信

贴在校内墙上)和杨典被打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总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做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摘自《齐心自述：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年》，标题系编者所加）

## 短暂的经历 永久的记忆

张替仪

我离开绥德已经 48 年，离开绥师更长，已经 50 年了。我在绥师的时间不长，学文化的时间也短，所以离开学校时的文化程度不高。全国解放后，生活环境稳定下来，各机关开办业余学校帮助文化低的同志提高文化水平。我参加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办的业余文化学校，除在职起早贪黑地努力学习外，我还脱产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课。又于 1959 年在北京市委党校、1982 年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校外班学习过政治理论课程并有结业证书。还在 1964 年由中国科学院派去湖南长沙解放军政治学校，学习过解放军的好传统、好经验、好作风等等文化课和政治理论课程。这些学习对我在以后的工作水平、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的提高上，大有裨益，我自己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1956 年从哈尔滨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至 1983 年离休，可以说在知识分子堆中生活了一辈子，耳濡目染，也学到了些科学知识。科研人员谈科研课题、汇报科研工作，我基本上都能听明白。这就是说，我离开绥师后，在这几十年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补上了课。

我在绥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是深刻的，经历的事情也是难以忘怀的。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 在绥师受到了党的启蒙教育

我进绥师前是在女校上的一至四年级，从五年级开始由女校转到绥师附属学校上，1942年秋天我小学毕业后参加统考，9月被录取进入绥师。考进这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大熔炉中，是件不容易的事，当然心情也是非常高兴愉快的。

开学后第一个学期是复习高小的课程。刚进学校很不习惯，上完课再见不到老师，觉得似乎没人管，心里空荡荡的，不像在高小时随时能找到、看到老师，有什么总是随时可以向老师请教。

第二个学期，1943年3月就开始整风，当时我们的年龄只有十四五岁，住在学校，一周回一次家，还不习惯，平常有些想家。整风期间就根本不能回家，家里人一周来看一次，站在校门外送一点土豆淀粉之类吃的东西。这时胡宗南开始封锁边区，边区人民的生活已经非常艰难。我家只有母亲、我和妹妹德仪三个人，没有经济来源，家境极其困难。毛主席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丰衣足食。各机关种菜、种田，补贴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家靠纺毛线赚钱度日。尽管生活极其艰辛，但精神上、思想上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我在绥师读书，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本来我在政治上是个盲人，什么也不懂。原以为八路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更不懂什么是“复兴社”、什么是“CC”等组织。在整风期间，懂得了八路不都是共产党，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够入党条件，还要有人介绍，履行入党手续等。也懂得了“复兴社”、“CC”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突然一夜之间，我们不少人都成了这些组织的成员，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我参加过这些组织，我确也没有参加过这些组织，开始时我都不知道有这种组织。

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于1943年底离开学校调到地委文工团工作，之后由专署又派到一二〇师独一旅卫生部医校学医。离开绥师后，节假日常回学校看望同学们，我又把想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说给郝成鸣（成鸣同志在绥师时是我们班的班长）同志听，成鸣同志告诉我在自己的单位应该去找谁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从此我积极去找党组织，终于在1945年10月初，我在调往抗大前，由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庞文华同志（庞文华同志负责地方派到独一旅学医同志的事）介绍入党，候补期一年，并转了党的关系到抗大政治部。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多么的高兴啊。

## 走上火热的革命道路

1943年底快过春节时，地方上要组织秧歌队，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点名要我参加秧歌队。秧歌队演出的节目都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如《赵富贵自新》、《二流子转变》、《兄妹开荒》等等剧目。当时我不会唱，也不会演，而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为什么要我来参加秧歌队呢？原来是因为我姐姐在延安枣园文工团，演出了一出叫做《动员起来》的秧歌剧，据说轰动了延安城。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周总理还关切地询问：演过《动员起来》的那个“媳妇”在什么地方。她就是我的姐姐张粹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的妹妹张德仪当时是全地区的模范学生，也是参加各种演出活动的积极分子。就因为姐姐妹妹都会唱会演，推断我也能行，所以找到我。这是当时找我谈话的吴江平同志说的，因此我不得不参加了。果真这年春节以吴江平同志带队，组织了一支老百姓的秧歌队，到地委去拜年，到专署、县政府和各机关拜年，还进行拥军优属演出。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演《赵富贵自新》，大街

小巷去演，规劝政治上走错路、失足的人坦白交代，重新做人。这个剧共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媳妇、一个是丈夫、一个是政府工作人员。我演媳妇，规劝丈夫坦白交代问题，改过自新。我演得很实力，唱得很带劲，一场下来看的人叫好，有的老乡演到哪，跟到哪看。1943年底，整风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离开学校，调到地委文工团。当时文工团的领导是刘智、刘传夫、岳瑟、刘江平等同志。但我没有从这方面发展，由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庞文华同志谈话，又派到部队一二〇师独立一旅卫生学校学医。当时派去学习的有霍树丰、傅贵卿、拓如高等援师的同学，米脂中学也调来不少学生，医校女生有20多人，部队同志当副班长，他叫段平（已故去），我当正班长。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课桌，每人一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书本笔记本放在腿上当课桌，养成艰苦环境下努力学习的精神。在学习期间，除完成学习任务外，我还做了许多兼职工作，即过年过节还要编队演出慰劳伤病员。我们住的山下就有一所部队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背粮、挖炭时，我们学生就替他们在医院照管伤员。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忙和累，但精神十分愉快。我们学习将近两年的理论，再有一段在医院实习时间就可以结业，当医生了。194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部队各卫生队派来的学员陆续抽调去了前线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地方上派去的同志回到专署。同年10月我离开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随抗大校部，跋山涉水，艰苦行军四个月到东北吉林省临江县，参加了当地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四保临江”战时工作。1956年离开东北，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至今已36年了。岁月匆匆，1983年离休后，仍做了三届离休支部工作，分工做了两届支部书记工作。

我在异地他乡遥祝母校70周年校庆，感谢母校对我的培育，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离休前行政14级，离





休后享受司局级待遇)，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教诲，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在此，也真诚地向那些为革命献身已故的老师和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悼念。

1992年12月25日

## 绥师——我终生怀念的母校

霍芸

绥德是革命老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李子洲等同志就在这里开展了革命活动。1934年，绥德东南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始终没有停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0年初王震将军率部赶走了绥德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使绥德走向新生，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我是义合桥上村人，我生长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十分幸运。就是我们敬爱的党和老一辈革命者，把我从一个无依无靠的不懂事的孩子，领上革命的道路，并培养成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

1942年，绥德师范招生。那年，我13岁，很想报考，又担心农村学生基础差，怕考不上。在我们桥上小学的支持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参加了招考。过了几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干粮跑了70里路去看榜，见到榜上有我的名字，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入绥师，在班里年龄最小。当时，绥师实行供给制，吃、住都由学校管。绥师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前身是省立第四

师范。1923年创办，1924年李子洲任校长。李子洲是党在陕北的创始人之一，学校始终对政治教育很重视。这所学校是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母校。我在这里学习，不仅学到了较系统的文化知识，也学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树立了革命理想，奠定了革命人生观。

在绥师，我参加了1942年整风运动。整风后，学校政治空气更加浓厚。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学校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男同学开荒种地，女同学纺线打毛袜。我从小就参加劳动，在劳动上不甘落后，纺线纺得很快、很多。但开始三等线多，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很快达到了一等线标准，并受到班里和学校表扬。在体育方面，我参加女同学2000米长跑，还得了全校第一名，得到了奖品和学习用具。学校虽然生活较苦，但我们精神很愉快。吃的是小米干饭和汤菜，大家蹲在一起，亲如一家，不分男女，轮流帮灶、挑水、烧火、洗菜、淘米。这些活我从小在家干，干得又快又好，食堂大师傅们都很满意，也常夸我。

大生产运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政策，边区在经济上发展很快。文化教育也相应发展，各地都在兴办学校，但师资缺乏，绥师遂担当了这一重大任务，抽调一些学生到农村办冬学，开展扫盲教育，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

1944年冬，我被抽调分配到无定河畔的延家岔小学当教员。离校时我依依不舍，老师很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到实践中去磨炼。一位老师还给我写了一首送别诗，其中有几句是夸我“幼时失亲很坚强，离校下乡教几郎；不怕艰苦和劳累，将来前途宽又广”。这是老师对我的希望，因此，我很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绥师——我亲爱的母校，是您对我的启蒙教育，使我懂得革命

的道理，并逐步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如果说60年来我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工作上艰苦奋斗的话，首先应归功于在绥师所受的基础教育。

延家岔小学，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个小站。我从自己的经历，深感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不易。因此，工作很卖力，不怕苦和累，努力克服学校条件差、生活艰苦等困难，自己背粮做饭，经常到有学龄儿童的家中，说服动员家长让儿童入学，并认真耐心教课。区、县政府都说我人虽小，有志气，能吃苦，是个好老师。家长们也很满意。

1944年底，扫盲冬学告一段落。我刚回到绥师，恰逢延安有关方面来绥德招收干部。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多么想到朝思暮想的延安去啊！我从小没有父母，向奶奶诉说了我的心愿，她很支持我，还给了我几元钱作盘缠。我就这样踏上了奔向革命圣地之路。

绥德到延安有500多华里。冬逢三九，地冻天寒，头天步行到清涧，脚上就打起泡，只好用奶奶给的钱雇了个毛驴，冒着漫天大雪，刺骨寒风，第二天黄昏才到桥儿沟。第三天就到西北局组织部报到。组织决定我到西北党校担任文化教员，我很高兴，但又担心自己年龄小资历浅，不能胜任。到党校报到后，分配我去认字班当文化教员。这个班都是工农干部，他们年龄大，工作时间长，懂政策，有经验，就是文化低。文化上我是他们的老师，政治上他们是我的老师，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革命的道理和知识。不久，我被调到党校图书馆工作，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里书报多，我能看到《参考消息》，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知识面。

1945年夏，经西北局组织部介绍，我考进了延安大学，先上高中预科复习文化，后升到文学系。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公然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胡宗南的20万大军，疯狂地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扑来，我军

主动撤出延安。延大采取疏散的办法，本地和年龄小的同学，大都疏散回家。恰好，堂伯父霍维德厅长有病，我随他一起疏散坐架子车回到老家义合镇。正逢和平七分院的伤病员住在这一带，我家也住满伤病员。我见他们忙不过来，就主动帮他们烧水做饭，干得很起劲，自己觉得这也算为解放战争尽一份力量。七分院的领导见我手勤腿快，就吸收我当了兵。从这时起，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转变了我的职业轨迹，并开始了我的白衣战士的生涯。在警二旅四团卫生队，我参加榆林战役和太原战役抢救伤员，后参加抗美援朝。从部队到地方，我都是在基层，大部分在战斗第一线，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全国解放后，我由西北军区总医院调第四陆军医院，实习后成为正式军医。1956年，军队大转业，我转业到甘肃省人民医院内科，后又到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70年代，我被调到甘肃省中医院工作。1988年，卫生系统评职称，我以论文86分和临床实践合格的成绩，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这是对我这一生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工作成绩的肯定。我这一生除过两年从教工作外，50多年都是在卫生战线上度过。抚今追昔，我牢记在绥师所受的启蒙教育，牢记老一辈的教诲，牢记党和人民的哺育之恩。

## 绥师对我的培育

杨玉伟

### 一、我为什么由清涧考入绥师

我祖籍子长县杨家圪则，搬到清涧住的原因，一是我父亲由于多病，生活困难，靠近我舅舅家住地便于照顾；二是由于我父亲也是教书出身，在清涧县府找到缮写工作，也能维持了生活。

1929年4月我出生于清涧，1937年开始在清涧县完小上了学。当时清涧农村已开始土地革命，变为红区，仅县城未解放，由国民党县府统治。我党为了抗日，把清涧县城作为统战区。学校教育是国民党旧的一套，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飞机常来县城空袭轰炸，因此学生只有搬到城外东山寺山沟上课，学习很不正常。比我年级高的毕业生，绝大部分升学到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中心榆林上学，不愿到绥师和延安的学校。

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第一次国共大摩擦，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我地方，于1940年正月23日发动叛乱。王震司令员率我八路军三五九旅追击打散了敌军，何绍南逃往榆林镇川堡。随后我党将清涧县地方政权接收，成立边区人民县政府。我记得第一任县长是黄静波同志。从此，绥、米、葭、吴、清五县归属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管辖。我人民县政府为了维持清涧完小正常教学，派来了几位进步老师，如马瑞生等同志。在这些老师的勤恳教导下，除对学生

热情教授文化课外,思想政治上还帮助学生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民主救国、发展边区经济等方针和政策,鼓励同学上绥师求学,将来为边区人民作贡献。因此,我班1943年夏毕业时都热情地报考绥师。在班主任白瑞生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七名同学经过考试都被录取了。从此,根绝了清涧完小毕业生向国民党统治区去升学的现象。

## 二、母校对我的培育

1943年秋我考入绥师,1945年春离开,仅在校两年。现已相隔40余年,母校对我的培育情况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 我一进校就投入到绥师的整风运动。在开学后的前半个月,整天参加绥德地区教师在绥师召开的坦白控诉大会。有绥德和外县的教员在会上坦白和控诉国民党特务在边区破坏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为保卫边区建设而奋斗的大好形势。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革命的大熔炉,认识到国民党特务猖狂破坏边区的罪恶行为,感觉到边区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随后我们新生也开始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开展小组谈心活动,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写出个人自传,忠诚老实地写出自己的家庭社会情况和学历情况,供党组织审查。班大会有准备地安排了对个别同学的批评帮助。这些会使我第一次见到严肃认真开展面对面斗争的场面。当时在班上我年龄小,又不是党员,有些会就不参加,但感觉到很紧张有压力。大约有一个学期的样子,反特斗争结束,实事求是地对问题进行了甄别落实,给学生作了正确的结论。这样深得人心,这让我认识到,对党要忠诚老实,有错不怕,敢于纠正,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交代问题,就能放下包袱,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2. 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教学中,既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又提高

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如语文课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章节，除认识文章结构和文字精练的特点外，同时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前途问题。史地课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学习，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讲述，再结合报纸上登载八路军各战场的胜利消息，深刻地认识了日寇侵华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目的，以及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了投身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还学习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的模范事迹，参观大生产成果展览，更加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做一个为边区建设服务的有用人才的决心。

3. 寓教育于生活中，树立师生自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风尚。同学们除过上课、自习时做作业外，小组每周有一定时间读报，学习时事政策，了解国家大事。同时，为了克服学生中的自由散漫、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的现象，同学间养成了个别谈话的习惯。对学习情况、个人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问题，通过互相交谈，心平气和地认识缺点，接受批评。每周都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总是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方法和努力的方向，使大家在一起生活，互相负责，共同进步。每学期进行四评（评生活、学习、思想、助人为乐），评出先进，全校表扬。班主任特别注意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学生的知音，使师生关系亲如兄弟姐妹。因此离校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4.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树立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学校也开展了以大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勤工俭学活动，做到自给自足。学校办了农场、商店，还纺棉线和捻毛线。学校为了盖房修窑，同学们经常到北门外背石头，保证了修建按时竣工。通过劳动，不仅解决了学校办学的经济困难，改善了教学设施，而且学生饮食也得到改善，每周能有一次面食和肉食。同时，使我们既

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学们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树立了艰苦创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学校的精心培养下，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也基本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在1945年6月3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几天，组织上找我谈话，提出由于形势的发展，需要调我去延安工作，我就愉快地和同时调出的同学离开了母校。至今离校40余年。如果说我为革命作出了一点成绩，那要归功于党，归功于母校对我的培养。

## 绥师创办作坊的回忆

李润雄

1943年，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绥师全体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掀起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大搞勤工俭学活动，创办了纺织厂、烟厂等作坊，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创造了大量财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锻炼了全校师生的革命意志和自力更生能力。

1944年初，绥师在城内东门墙办起了纺织厂，后迁至城郊龙湾村。当时学校在学生中选派了刘绍先、马汝贵（女）、吴俊仁和我，由刘绍先同志任厂长，全权负责纺织厂的生产。还有十三四个织布工人。刘绍先同志工作负责，平易近人，同干部、技工和工人一道苦干巧干，工作搞得很出色，深受大家的好评。虽然纺织厂的设备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织布的工序又多，但是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



苦干，终于织出了白土布。这种白土布分为两个等级。一等白土布平密，结实耐用；二等白土布稍次些。在当时的条件下生产出这种白土布的确是不易的。它一方面满足了学校自用，另一方面又支援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急需。

纺织厂除了织白土布还能织羊毛呢。那时羊毛呢叫人字羊毛呢。羊毛呢所需的羊毛主要在市场上收购，少部分是学校站的羊毛。有了羊毛，首先要纺成羊毛线，纺羊毛线可不容易。学生们根据学校分的任务，利用课余时间学纺羊毛线。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学生们自己动手制作了脚踏木车、丁字形等纺羊毛机，这样既减轻了人的劳动，又提高了工效。由于自制工具比较粗糙，操作又不熟练，不少学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有的学生在倒毛线时拇指被毛线磨出一道道血口子，殷红的鲜血渗出来都不吭一声。

在创办纺织厂的同时，学校又办起了一个卷烟厂。制作香烟的工序较多，只能因陋就简，全靠手工劳动。首先是把烟叶分类分等蒸好，再用两块木板夹住堆成烟丝，喷上香料，晾干后就可卷烟了。卷出的烟卷又要裁好装盒，每十盒为一条，均要封上商标和税票。在烟厂到处都是烟，我们几个学生干部不会吸烟，工人中有会吸烟的，谁也不随便“吸烟”，偶尔把裁下来的烟把把接起来品品味道。那时，不论在纺织厂或烟厂干活的学生干部、技工和工人，大家一心扑在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上，谁也没有私拿一寸布、一根烟。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师生们都很热情主动。尽管那时的环境恶劣，困难重重，但师生们都争先恐后地为大生产运动作贡献。当时建校劳动较多，比如建校舍劳动，除了石匠外，所用石头都是师生从老远的地方搬运到学校工地上的。背石头这活是重活，师生们在课余时间争着干这又重又累的活，虽说苦些，但心情都是愉快的。

后来学校又在东门外的川地里办了一个农场。除个别工人外，种菜、浇水、送肥全是学生轮流劳动完成的。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各种新鲜蔬菜源源不断地满足了学校师生食用。这说明，只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就能丰衣足食。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往事，心情总是不能平静的。

## 怀念母校绥师

高 智

对母校绥师，我是一直怀念着的。我在这里学了知识，入了党，参加了革命。

1944年在霞县完小毕业后，我就考入绥师，在二十七班（甲）学习。1945年调延安中央机要科。1947年3月，由于蒋介石、胡宗南进犯延安，我随毛主席、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翌年3月过黄河，然后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北坡。北京解放后，又于1949年3月随毛主席、党中央进北京，直到1962年5月调回陕西工作至今。此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系统工作。不论在延安，或以后到北京，以至现在，我都没有忘记我的母校——绥师。

我进入绥师时，正逢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两年。由于尚处战争环境，为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学校也同其他机关、部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学校所有人员都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学习、劳动相结合。记得那时，我们常到无定河畔学校菜地劳动，还打井，常给灶上背柴，为盖校舍背石头，蔬菜做到自给。

我家生活不富裕，在家常吃的是黑豆、小米做的“钱钱饭”，很稀。到绥师后感到生活比家里强了好多，常吃的是稠饭，一勺就是一大碗，够满意的了。同学们在一起，有说有笑，相亲相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心学习。那时上学，不需要家里出什么钱，公家管吃。住校只拿个饭量，穿着也很简单，有什么穿什么，很随便，不像现在这么讲究。我的装束，都说像个陕北放羊娃，穿的是大襟上衣，腰里扎条布腰带，头上扎条白羊肚子手巾，不是冬天的话，常是赤着脚穿双手工纳的布底鞋，前后还要钉上皮子，或钉上几个大圆头的铁钉子，为的是耐穿。

由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同和变化，穿着一个时期与一个时期相较也有不同。但我感到学习好坏不在穿得如何，只要整洁就行，尤其是在校学习更应以俭朴为好，不宜离开实际强求。那时，不允许学生吃纸烟。记得有次晚上，我班有个年纪大些的同学吸香烟（不是什么高级的）被老师发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认为老师说得有理，那位同学也改了。

我的家乡葭县，有个白云山道观，很有名气，每年古历四月初有庙会，届时不少人千里迢迢前去朝圣。每逢这时，我们大些的同学都去演出节目，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爱好劳动生产，表扬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人物，反映边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表达广大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我一进绥师，也就参加了校文工团，假期不回家，下乡演出。有次我们到黄河边，到属吴堡县管的几个村庄去演出，大家正背着行李在黄河这边行走，忽然看到隔河对面山头上有日本鬼子，我真想拿着枪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人们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不容易一下抹掉的。

1952年春，我调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久给他老人

家当机要秘书。我向毛主席报到的那天，他也说到绥师，那是他问我上过什么学校时说的。当毛主席知道我上过绥师时，他老人家说：“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当时还说，我是在他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了。我一听，感到既亲切又很不好意思。事实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很小就参加革命，南征北战，哪有机会上学呢。几位卫士年纪就更小。

我在工作中渐渐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更感到过去努力得太不够。年小时，对爱惜光阴不那么自觉，对诸葛亮说的“非学无以广才”不能体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在这里，我希望正在求学的青年引以为戒，超过我等。至于我，虽已年过花甲，也应“以‘不堕青云之志’的精神再学习！希望我的母校绥师为国家培育出更多的人才。

1992年12月25日于西安

## 向毛主席报到

高 智

1949年3月23日，我随毛主席党中央进北京。1952年春，我被调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做秘书工作。

叶子龙从丰泽园来到西楼他的办公室后，就把我找去谈话。

叶子龙望着我说：“高智，组织上决定，让你过丰泽园那边去，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喉咙口！只感觉一阵阵紧张。我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真不敢相信！过去我是天天想见他，见到他心里就

高兴。在延安，在陕北，只要一见到他那高大的身影，我就看上没个够似的。第一次见他是同江青和李讷散步，第二次见他是看京剧《逼上梁山》，第三次是他同斯特朗女士谈话……以后是在转战陕北的路上，是同他照了集体相，再以后是在中南海。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同他面对面说过三个字以上的話呢。再说，他是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怎敢到他那里去工作呢？万一我在工作中出点差错，可怎么向组织交代？人啊，说怪也真怪，离他远时想见他，现在真让你到他身边去，还真打心眼里不敢去哩！

叶子龙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视，他显然急于听听我的意见。我犹豫了片刻，说：“老叶，我不敢去！”

“哦，为什么？”叶子龙反问道。

是啊，我该如何回答呢？

我想了想，竭力理清我的思绪。“怕胜任不了，”我终于说，“我怕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也怕主席听不懂我的陕北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叶子龙笑了：“毛主席是很平易近人，很好接近的，话也是能听懂的，熟了就好了。”我不觉想起了1947年7月下旬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和毛主席的那次照相，毛主席敞着怀，不扣扣子。那时我也想过：毛主席是很随和的嘛。只听叶子龙又说：“毛主席在陕北住了那么长时间，情况还是知道的，工作一段就都熟悉了。”

叶子龙耐心地说服我，看来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岂有不服从分配的道理，再说，平心而论，我又何尝不愿意为毛主席服务一辈子呢？

我终于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就去。不过我提个建议，是不是让我先试试，行就干下去，不行就请赶快调整。这不是闹着

玩的!”

叶子龙笑着，要我交代了工作，第二天就去丰泽园。

在叶子龙同我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丰泽园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院内，这儿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此时，毛主席还没起床。毛主席原来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就抓紧时间向我介绍情况，并找些文件让我翻阅。快到吃午饭时分，毛主席睡醒了。

罗光禄放下电话就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他这一说，我比刚进丰泽园时还紧张。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毛主席又会问我些什么呢？

我一边应道：“好。”一边在脑子里盘算。

罗光禄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跟着。越是离毛主席的住处近了，我的心越是跳得厉害。含和堂距毛主席的住处仅仅隔一堵墙，只要经过一条走廊，从一个小门进去，就到了毛主席住的院落，再走几步，向左一拐，上几个台阶，便是毛主席的卧室了。

当我走到毛主席的卧室门外时，有意稍稍停了一下步子，屏住呼吸，竭力使自己镇静。然后，我才鼓足勇气，生平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的卧室。

此时，毛主席正靠在床头，右手夹着一支香烟。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静静地似在思考什么。罗光禄向毛主席报告说：“主席，给您新调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一听这话，我不由得三步并做两步走上前去，说：“主席您好！”

毛主席起身了，他“啊”了一声，随即紧紧地和我握了握手，连连说道：“欢迎，欢迎！”霎时间，我的心热乎乎的。

毛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啊？”

我答：“陕北葭县。”

“葭县我去过，”毛主席吸了一口烟，“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去世了，还有哥、嫂、弟侄们。”

“在哪里上的学？”

“我完小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在那里上了一年多学，就到延安去了。”

“哦？”一听绥德师范，毛主席面露喜色，“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所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的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了！”

这一句话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我们这代人上学确实很不容易。那时我们葭县没有一所中学，整个绥德专区五个县才两所中学，我到绥德师范上学，要走200里地呢。

毛主席又问：“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霍碧英。”我回答。

“唔？”毛主席没太听清。

我连忙解释道：“霍是霍去病的霍。”我念书时读过这位汉代大将军的故事，此时恰好在毛主席面前“班门弄斧”了。

毛主席笑了：“哦，听懂了。霍去病我知道。”

我接着一边说一边在手上写着：“碧，是一个王，一个白，下面一个石。”

毛主席又点点头。我于是再拉长了声调，说：“英……是英雄的英。”

“哦，现在我全明白了，霍碧英。”毛主席重复了一遍，会心地笑了。

我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

罗光禄将送给毛主席的文件放下就走了。毛主席又和我谈了一会儿。我知道毛主席还没吃饭，也急着起身向他告别。毛主席说：“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我一听这话，连忙回答说：“好，好。”心里顿时热乎乎的，泪水差点掉出来。“帮我做点事”？毛主席可是全国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啊，而我，不过是个二十四五岁，可以说还不甚懂事的毛头小伙子，我来就是为他服务的，怎么叫帮他做点事呢？我越想越激动。

之后，我也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或许，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得以从井冈山走向全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吧。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毛泽东身上的体现吧。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霞县题词说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吧。

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这是毛主席一生追求的理想。无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无论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并身体力行，终生追求。我在他身边，对此感受极深。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人民中，人与人之间只有工作分工不同，没有政治上的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经济上，毛主席追求的也是“平等”，他怀念战争年代的“经济平等”，几次降高薪，后来连军队的军衔都取消了。一直到晚年，他还为不可能取消八级工资制而遗憾。当然，平等的最终实现毕竟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毛主席终究是一位毕生矢志不渝地追求纯洁社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啊。

## 离开毛主席的时候

高 智

1962年4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下午3时，毛主席



叫我到颐年堂谈话。当我抱着5岁的女儿提前到颐年堂时，毛主席早已坐在沙发上等我。我赶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志照看，便快步走到毛主席跟前。毛主席要我坐在他身边，面带笑容说：“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离开？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他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

毛主席说完后，我沉思片刻，便向毛主席说了我的心思。我说：“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可是您又多次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老浮在上面。经过去河南、江西两次锻炼，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也愿意再下去。”毛主席听完点点头说：“好，如果走的话，你想到哪里？”我说：“到西安，我是陕西人，回我的家乡。”毛主席听我说愿意回家乡工作，就笑着说：“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

谈话中，毛主席还要我回到陕西后，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毛主席说：“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干什么工作，你都要为我继续做点事情！”他老人家还要我在离开他之前，订个学习计划给他。毛主席说到这里时，沉默了好一会儿。即将要离开毛主席了，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几乎掉出眼泪。这时，毛主席又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吸了两口，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说：“高智，你要走的话，也不要急着就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住段时间再说。”我听毛主席这么一说，心里既感激又有些惊奇，我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爱人快要生孩子的事，他老人家怎么知道的呢！我想准是他在平时做了调查了解。当时，我爱人的预产期到了，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是我想，如果她在北京生孩子，我们至少得过两三个月

才能走。如果到陕西生孩子，我便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找人照看，工作、家事都不会耽搁。我便向毛主席说了我的想法。毛主席与我谈话已70分钟，当我准备向他告别时，毛主席把我叫住说：“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张相好不好？”我马上回答说：“太好了。”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到提出和他老人家照相的事。毛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又很宝贵，平时，我们就不忍心打扰他，因此，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毛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我随他走出颐年堂，在院子里由吕厚民同志给我和毛主席合了影。在我与毛主席照完相后，服务科的同志就把我女儿送过来，我抱着孩子，毛主席与我又在原地说起话来。他问我女儿几岁了，我说：“5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叫小妹。”“为什么叫小妹？”“她上边有两个哥哥，所以叫小妹。”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解释，便笑了笑说：“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30多年来，我一直珍贵地保存着这些照片，它给我和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纪念。

离开毛主席前，我把自己的学习计划交给主席，又把毛主席在卧室和办公室的文件都整理了一遍，把各地要求毛主席题字的信也都整理好，并打印了一个目录。毛主席的一些未发表的诗词也整理在一起，随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交代。1962年5月7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毛主席，回到我的故乡陕西。

回陕后，我始终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诲，努力做事。也曾多次给毛主席写信，并给他老人家寄过陕北的小米和苹果。也汇报了自己在地方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也反映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据说，有些材料毛主席阅后，还批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

我永远怀念着毛主席！

## 回忆母校学生会工作

牛锦华

1923年5月1日，绥师诞生了。母校的创始人就是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教育家李子洲同志。他在担任校长时期，从全国各地聘请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老师任教。在抗战时期，五湖四海的专家志士为了革命来到陕北高原古城绥德，在绥师讲学。他们以慈母之心谆谆教诲着我们，以李子洲建树的优良校风熏陶着我们，以马列主义的理论锤炼着我们。在他们的辛勤教导下，几十年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不少坚定的共产党员，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造就出许多骨干，为发展陕北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为全国的革命事业输送了大批干部。李子洲同志创建的优良校风，成为母校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3年8月25日，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跨进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1946年7月1日，我们以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敬爱的老师，走向社会。我们能在李子洲同志工作过的学校就读三个春秋，深感无限荣幸！

在我们学习期间，校长丁子文，教育主任刘宪曾，班主任郭琦、杨滨、赵庆峰、李运以及各位老师，他们教课非常认真，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直至教会为止。他们不仅讲课认真，而且对布置的作业逐字逐句修改，从而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那时，学生非常尊敬老师，老师极其爱护学生，学生亲切地称呼老师“张先、李先”，真是良师益友，亲密无间，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绥师学生会，自李子洲同志以来，就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曾多次组织学生向反动派发起英勇斗争，一次又一次取得重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将我在1944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学生会工作期间的片断回顾写出，献给母校。

学生会是全校学生群众的自治组织，它既受青教会的领导，又受学校的具体指导。学生会的工作任务和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更进一步提高学生文化程度，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速培养大批干部，迎接反攻的新局面。”学校的教学任务是通过学校的各级行政组织和全体教职员积极工作，辛勤耕耘而完成的。学生会是通过自己的组织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各种学习、生活、文体活动，协助学校完成教学计划。在我们学习期间，学生会和学校是协调的，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学生会有什么困难，学校及时加以解决。学校有什么任务需要学生会去完成得，学生会一号召，学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而且完成得很顺利。所以，学校一直认为学生会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得力助手。

在我们学习期间，学校为了充分地发扬民主，广泛地听取学生群众对教学、生活、文体等方面的意见，明文规定普通班和地干班各推选一名学生代表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普通班的校务委员是我，地干班的校务委员是刘占齐同志，我们两人也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刘占齐同志于1943年毕业后，薛永年同志为学生会副主席。我在1946年毕业出校后，全校模范学生薛永年同志为学生会主席。校务委员会每次开会让学生委员充分地发表意见，只要是正确的而且又能办到的，学校就采纳，立即改进。这样，既有利于教学计划的实施，又发挥了学生会的作用。

学生会是依据民主原则，由全校学生选举产生。首先由各班经

过充分酝酿提出候选人，然后在全校学生大会上选举出正副主席和委员组成。学生会有章程，要定期向全体会员作工作报告，会员有审查、批评以至撤换委员的权利。学生会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它通过各委员、各班班委会委员，组织领导学生的一切课外活动。有的委员因任务太重，聘请有专长的同学组成专业委员会来完成任任务，如“大镜子”（墙报）编辑委员会、伙食委员会、业余文工团、歌咏队等都是这样组成的，并聘请有专长的老师做指导。

各班都有班委会。学生会的委员在哪个班的，也是哪个班的班委会委员。班委会由全班学生民主选举产生，由学习、生活、卫生、文体、服务委员组成，分工管理各项事宜。班委会直接受班主任领导，同时也受学生会领导。

一、学习委员的任务。我在学生会工作期间，二十七班的张德仪同志一直是学生会的学习委员，也曾被评为全校的模范生。学习委员主要抓以下几项工作。

1. 配合学校开展模范学生运动。学校把开展模范学生运动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措施之一。要求模范学生首先要学习好，生活、生产、文体全面发展。模范学生要发挥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学生会根据学校的要求积极配合，认真贯彻，大力开展班与班、组与组、个人与个人的竞赛。掀起你追我赶轰轰烈烈的模范学生运动热潮。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学校出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学生在上课时都全神贯注，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做笔记。在自学时，人人勤学好问，专心致志，刻苦攻读，做作业，写日记，整理笔记。在课余时间，处处是读书声。同学间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每次评选个人、小组、班和全校模范学生时，都是互相推让。因此，评出了上进的决心，评出了团结的气氛，评出了模范的典型。我曾几次被评选为全校模范学生。

2. 办好“大镜子”（墙报）工作。为了办好“大镜子”，聘请有专长的同学组成编委会。“大镜子”每半月出一期，凡遇有七一、五一、五四、八一等重要节日还出专辑，大约每年出20多期，每期刊登20多篇稿子。各班还办黑板报，将好的稿件选送“大镜子”。“大镜子”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范围很广，生动活泼。首先是反映学生们开展学习竞赛和模范学生运动的情况，介绍学生模范事迹。提倡鼓励同学们勤学苦练，奋发钻研的精神。同时反映文娱、体育、生产劳动、生活卫生方面的情况。批评表扬栏，以表扬为主，也有批评，但要事实准确，恰如其分。有评论稿件，提高同学明辨事非的能力。还有各种常识介绍和名词解释等等。“大镜子”确实办成了反映同学学习生活的一面镜子，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3. 组织领导同学们的课余学习活动。发动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组织各种自学小组。如古文自学小组，就是我班同学冯德兴同志组织的，聘请黄岗（王家广）老师讲课辅导。还有文学小组、数学小组、自然科学小组、美术小组等。这对弥补正课的不足，发挥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爱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组织报告会和讲演会。记得请郭琦老师报告国民党统治区的遭遇，宋养初老师报告“一二·九”运动实况，王云凤老师报告马克思生平事迹，方仲侠（干行）老师报告双十二西安事变等，讲的内容真实，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记得我们有一次组织全校同学召开讲演比赛会，各班选出参加讲演的有地干班的毛子修、二十八班甲班的郭学洪、二十八班乙班的薛永年。他们讲的有理论、有实践，同学们听后很受启发。

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气氛，大家过着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这对提高同学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当时“大镜子”上刊登一首打油诗说的

那样：“处处读书声，良师慈母心。到处论国事，一心为人民。”这是反映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生活委员的任务。地干四班杜斌（杜修真）和二十九班蔡生才同志，他们先后担任生活委员，主要抓饮食和生产两项主要工作。

1. 伙食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年代，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办好伙食尤为重要。为了办好伙食，每班推选一名代表组成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会起监督和协助管理员丁树清同志办好伙食的作用。每月检查伙食账目一次，公布伙食费开支情况，提出改进办法。当时炊事员较少，每人要做70多人的饭菜，既要在东门外农场挑菜，又要在北门外担水，要做好饭菜困难很多。伙委会针对这个情况，决定每班每天派几名同学轮流帮灶。帮灶的同学洗菜、切菜、烧火、打扫卫生、挑水、担菜、喂猪，样样都干。这样一来，炊事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饭菜做得味美可口，干净卫生，经常还粗粮细作变换花样，同学们反应较好。更重要的是通过帮灶，和炊事员、管理员搞好了关系，亲如兄弟姐妹。如有病号，只要给炊事员孙根德说一声，他想方设法做好病号饭，送到病人跟前，使有的病号感动得热泪盈眶，真是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阶级兄弟的情谊。

2. 生产劳动是生活委员的又一大任务。当时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克服经济困难，边区人民战士人人都有生产任务。我们每个学生每年要完成四斗小米的生产任务。为了完成生产劳动任务，学校决定每天下午劳动两个小时。在短短的两年中，学校新修了几十孔石窟洞，修窑洞的石料全部由学生承包从东门和西门外背回。另外人人纺棉花、捻毛线、织毛衣、织毛裤、织毛袜。记得三五九旅南下和去东北的干部战士穿的毛衣、毛裤、毛袜子，不少是由我们承包编织的。为了防备敌人空袭，全校同学轮流打防空洞，从礼堂

背后的石窟洞内一直挖通到警备司令部上面。有的同学手上打起血泡，继续坚持战斗，无人叫苦。学校在东门外办个农场，有地数十亩，除张尚华任场长和雇一名农民管理外，主要是由各班学生轮流劳动。仅我班就有乔尚直、高文直、蔡生峻、李振旺等同学，固定在农场劳动一年。为了使农场旱涝保收，自己动手打水井。水井打得又大又深，当挖到深水层时，水如泉涌不能停顿，在余峰老师和张尚华场长亲自指挥下各班学生日夜轮流奋战，一直拖到够农场几十亩川地用水时才下木圈，开始砌石头。在这场战斗中，女同学并不示弱。她们组织送饭送水，并排成一字长形队用脸盆往远处倒水，同时帮助男同学烘烤衣服。有的随时将突出事迹编成快板在现场演唱，鼓舞大家的劳动热情。在劳动中，有时翻地，有时播种，有时松土，有时锄草；有的追肥，有的浇水，有的给棉花打掐，有的收割。特别在劳动时间，同学们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农场挑粪的任务很重。几百人的学校，有一个大土厕所，如不及时送粪，便池粪满，人就无法进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地干班的学员是主力军。特别是每年雨季到来，雷鸣电闪，大雨如注，厕所低凹，雨水流入，粪便溢出成害，不仅无法使用，而且影响着街道卫生。在这关键时刻，地干班的姜纯佳等同学脱下上衣，挽起裤腿，不顾脏臭，跳入粪池，用粪桶向外掏粪，并组织大家冒着瓢泼大雨往东门外农场送粪。他的精神得到全校同学的赞扬，评为全校劳动模范，受到学校的奖励。为了节约经费开支，同学们自己组织木工组，解决劳动工具的困难问题。我班的朝鲜学员赵力同志和山西学员张启胜同志当时就是木工组的成员。他们用自己的零用钱购回木料制作劳动工具，并从几十里外砍回柠条，手刺破了，忍痛编制筐子，供农场劳动使用。同时还制作乐器供学校业余文工团使用。他们的这种精神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当时学生吃的粮食，全部由学生自己背回，近则十几里，远的地方几十里。有的同学没有工具，将自己的裤腿一扎，盛满粮食背着。虽然累得汗如雨下，但谁也不示弱。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不仅保证了自己吃菜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伙食；不仅完成了上级规定的生产任务，而且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不少同学从生产收入中分到了自己购买墨、笔、纸张和生活用品的零用钱，收入多一些的还解决了自己的衣服困难问题，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好评。特别是通过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改造了思想，增加了劳动意识，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提高了每个同学的政治素质。

三、文体委员的工作。文体工作学校很重视，也是学生会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战争年代，学习艰苦、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要使同学们生活得愉快，身心健康，就得搞好文体活动。学生会的文体委员是地干班的学员、长征老干部毛子修同志。他们主要抓了几项工作。

1. 俱乐部。我们聘请几位有专长的同学，开展俱乐部活动。学校当时经费十分困难，锅子等紧缺。就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拿出急需的经费购置俱乐部的设备，腾出几间房子作为俱乐部的活动场所。俱乐部设有象棋、跳棋、乒乓球、康乐球、扑克等等，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按照自己的爱好参加俱乐部活动，搞得非常活跃。

2. 业余文工团。将学校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同学组织起来，聘请黄正甫老师作辅导。业余文工团平时认真排练，学校经常组织晚会，每次晚会演出 20 多个节目，一演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歌剧、有活报剧、有独唱、有快板、有诗歌朗诵等等，真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同学们看后赞不绝口。记得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到学校，顿时黉山书院沸腾了。以学校业余文工团为主

吸收其他同学参加，化装上街宣传庆祝，锣鼓喧天，盛况空前。业余文工团每逢暑假就组织下乡宣传，曾到过吴堡、绥德义合镇、子洲县和农村演出，收集民间流行歌曲，深受群众欢迎，也充实提高了自己。业余文工团为绥德分区文工团和边区文艺团体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后来不少同志成为陕西和全国的文艺骨干。歌唱家刘燕平同志就是我班同学。

3. 业余歌咏队。是音乐老师周云深同志辅导的，不仅学唱歌，而且学乐理。这也是活跃全校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每次召开全校性大会，这个班拉，那个班唱，一个接着一个，真是热闹非常，优美的歌声，响彻雕山书院。

4. 体育活动。为了使同学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大力开展体育活动。每天早晨有早操，下午有课外活动。在每天的课外时间，同学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运动场上打篮球、打排球、跳高、跳远、翻高低杠、长短跑、打羽毛球、甩铅球等，真是龙腾虎跃，十分活泼。每学期要举行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锻炼了同学们的身体，活跃了生活。特别是学校的篮球队，在绥德一直名列前茅，曾和一二〇师的战斗队多次交锋，打出了水平，打出了风格。这和余峥老师的精心培训，杨达（杨应举）、任五（任雄仕）、霍六（霍玉贵）、邢宏谋等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5. 军事课。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学校设有军事课程，赵庆峰老师是军事教官。他教各种军事常识，打靶、甩手榴弹等等。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走向社会都懂得一点军事知识，对应付各种战时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四、卫生委员的工作。我在学生会工作期间，卫生委员主要是由薛永年同志担任。初入学校，有的同学缺乏卫生常识，不注意讲

卫生。针对这一情况，首先从个人卫生做起，规定每个学生每天必须洗脸，刷牙。指甲长了必须剪，头发长了立即理。夏天动员同学们有组织的到无定河洗澡。为了解决同学们的理发问题，同学们自己组织理发组，我班同学鹿自来就是理发组的成员之一，给大家义务理发。定期洗衣服，洗被褥，女同学帮助男同学缝补衣服被褥。其次每学期开展宿舍卫生竞赛，要求宿舍要经常保持整齐、美观、干净、卫生。当时我们推广薛永年卫生模范典型，对掀起卫生运动起到积极的作用。再次是大搞饮食卫生，对食堂饭菜经常组织检查，发动同学打苍蝇，搞卫生，请人讲解饮食卫生等，因此，病号大大减少。此外，学校划分了卫生区，各班包干，务必经常打扫干净。

为了搞好全校的卫生工作，聘请陈士斌老师具体指导，每学期要进行几次大的卫生检查和评比活动，好的表扬，差的批评。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同学们逐步养成了抓卫生的习惯，人人衣帽整洁，处处窗明几净，学校也成为绥德城区的卫生模范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全校同学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五、社会服务工作。当时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的是二十八班甲班郭学洪同志。他主要抓这样几项工作。

1. 在绥德城内组织识字班、读报组和业余文化学校，一度组织起来不少，由各班同学轮流去上课。我就在北门一家私营工厂上课，学生由初识字最后基本上达到小学文化程度。这一工作深受社会上的赞扬。

2. 学生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每逢寒暑假，就向响水师范和榆林中学的同学展开宣传争取工作，并将这一工作做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中去。在日本投降后，以学生会名义发出“告响水师范和榆中同学书”，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巩固抗日胜利成果，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告同学书发表在地委办的《大众报》上，并油印了一大

批，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到榆林、响水方面去，对团结学生起了积极作用。几年中我们经过学生的统战工作，争取回不少学生。就我们班来说，从榆林方面回来插班的同学有王鼎甲、王富庆、慕生禄等，他们经过教育表现很好。

3. 学校老师和学生会还组织代表去米中参观学习，取经探宝。1945年上半年余峥老师、张德仪和我去米中参观，我们学习了不少知识和经验，这对办好学校和学生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4. 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学生回家都带有任务，到农村广泛地开展社教活动，教唱歌、办识字班、组织读报组、帮助办冬学、写宣传标语等。特别是在寒假期间，同学们大都是秧歌队的组织领导者，同时也是党的政策宣传员，因此，深受区乡干部、家长和社会上的欢迎。学生每次假期回校后都要汇报回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经验教训和收获。这对提高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充实学习成果起了很大作用。

5. 参加社会实践。各班在学习结业前，都要下乡参加一次实习。1945年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大选举运动时，学校决定我们班分为三个团下乡参加选举运动。我和冯德兴、张辅恩、张文英等十多名同学去子洲县双湖峪、苗家坪、周家硷区搞乡级基层选举和减租减息工作；乔尚直和庞自来、王振铎、马励吾等十多名同学去葭县参加选举工作；慕生峻和马淑芳等十多名同学在绥德城关区参加选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了民主选举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了自己，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学生会工作，主要是训育科余峥老师具体领导。他经常出主意，想办法，关心学生会的一切活动。学生会出了什么问题，他亲自解决，主动承担责任。如果说当时学生会工作有什么成绩的话，与余峥老师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学生会是在党总支领导下工作的。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先后有刘宪曾、何仁仲、宋养初。总支直接领导教职工和各班学生支部。我在学习期间担任过我班党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党支部是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对完成学校各项任务起了保证作用。只要上级有什么任务，党内一动员，党员一呼百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争先恐后带领群众投入战斗。因此，党员在学习、生活、生产、文体活动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是做思想工作的主力军，只要哪个学生有困难，党员关怀备至，舍己为人，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有的同学有思想问题，党员推心置腹，促膝谈心，使其心悦诚服，愉快地接受。所以，那时党群关系很好。

4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学校学习生活的情景，使我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是呀！陕北人民曾经以辛勤劳动的果实供养着我们，无定河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党组织和老师用科学文化知识的雨露滋润着我们，马列主义理论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使我们能够茁壮成长。我们以雄健的步伐走出校门，在革命的烈火中冶炼，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 绥师学生参加重大社会活动片断回忆

张承熙

### （一）欢迎贺龙司令员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为大反攻阶段，晋绥和陕甘宁边区联防

军司令员贺龙将军于1944年4月奉中央军委指示，从延安出发，赴华北抗日前线，指挥抗日战争大反攻。路过绥德时，绥德党政军民商学各界举行欢迎大会，我们绥德师范全体师生参加了欢迎大会。全体师生整队前往，队伍像一条长龙穿过了绥德城区，队首已到南关，队尾才刚出校门。经过一个多小时，到达了七里铺。贺龙司令员骑一匹大白马，身穿灰白色军衣，两个膝盖上补着两块大补丁，口里衔着一个大烟斗，笑嘻嘻地从马上下来，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并站在一块大石头下大声讲话。他说：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积极努力下，经过防御、相持两个阶段，现在全国进入大反攻阶段了。抗日战争将要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我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前赴华北抗日前线，指挥华北抗日战争。

## （二）悼念“四八”烈士

为了全国的和平，陪同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将军及其夫人等人，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时，不幸于山西黑茶山遇难，全国人民和边区军民处于悲痛之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在绥德仓房圪塔召开了追悼大会，我们绥师全体师生参加了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烈士遗像，主席台两旁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会场周围挂满了绥德各界人士送的挽联，会场沉寂在悲痛之中。绥德杨和亭专员代表绥德全专区人民致悼词，号召全区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纪念“四八”烈士，继承烈士的革命事业，奋勇前进。

### （三）自力更生 学生种菜

为了贯彻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指示，我们绥师学生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自力更生种菜吃。全校大动员，在绥德东门滩（原国民党修的飞机场）把飞机场变成了菜园子。各班学生轮流翻地、下种、施肥。学生担着大粪桶，经过街道，群众稀奇说：“共产党办的学校和国民党办的学校就是不一样，处处减轻人民负担。”经过种菜劳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又解决了学生的吃菜问题。

### （四）参加边区三级人民政府的选举活动

1945 年秋，边区三级人民政府实行民主选举，我们绥师学生也参加了选举活动。我们二十六班学生参加葭县的选举工作。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准备工作，组织学习训练，研究计划；第二阶段是宣传阶段，深入农村进行广泛宣传活动，做到选举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三阶段是选举阶段，召开村民会，正式选举三级政府领导干部。

### （五）欢迎陈毅将军归延安

1943 年，陈毅将军从抗日前线归来，回延安参加中央重要会议，途经绥德。绥德党政军和各界人士在绥德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绥师学生也参加了大会。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在大会上讲话。陈毅将军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讲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 歌坛星座白秉权

王 焱

陕北黄土高原，长不出好庄稼，却长出了好民歌。那纵横起伏的沟沟岔岔，梁梁峁峁，到处回荡着的信天游，宛若一簇簇、一朵朵盛开的山丹丹花，挺拔多姿，绚丽夺目，构成了花的海洋。在这民歌的海洋里，徜徉着无数音乐家。其中，著名的陕北民歌演唱家、声乐教育家白秉权，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 (一)

生长在无定河畔的白秉权，自幼就受到了陕北民歌的熏陶。每次去外婆家，60华里的路程中，高亢悠扬的信天游陪伴着她；每当同小伙伴们在山坡上掏苦菜，最开心的是听拦羊人唱歌；夏日炎炎的打麦场上，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崎岖的山道上飘荡的赶毛驴的吆喝声，和脚夫们的脚户调；阴凉地里，窑洞门前婆姨女子们纺线、纳鞋底轻声柔气地哼唱着酸曲，伴着说笑、逗趣声；正月里闹秧歌、跑旱船；土台子上的皮影戏，瞎子艺人们的说书声，走街串巷的道情调……都成为白秉权的启蒙老师。这些山村野调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正是它们的影响，才使白秉权与陕北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它们的陪伴下，白秉权度过童年，走上了学民歌、唱民歌、教民歌、改民歌、研究民歌的艺术道路，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就。



白秉权在新秧歌运动的指引下，12岁就扭起了秧歌，演起了新戏，唱起了民歌。她脚踏实地，执著追求，终于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西安。从朝鲜前线到戈壁，从黄土高原到北京、海南，到处留下了她的歌声。

要唱好民歌，靠热捧现实是不行的，光凭一两首民歌成不了歌唱家。白秉权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成为独唱演员了。她每年都要到农村去采风，搜集民歌。单是1958年就三次下乡，陕北的沟沟峁峁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缭绕着她学唱的歌声。一次，为向一位民间艺人学唱，她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奔波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才找到这位艺人。为学唱委婉动听、迷人的陕北碗碗腔，她曾与已故的音乐家李作柱一道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三天一换台的皮影戏班子，与他们同甘共苦，生活了十余天。不仅采录了整本戏的碗碗腔音乐，而且还了解了碗碗腔的产生、发展，学习了它的演唱方法、风格以及它的润腔技巧。为了学唱陕北道情，曾四次下乡，最后一次，直接下到清涧县号称“道情窝子”的寨沟公社。一天行程80华里，两只脚打满了血泡，拄着拐棍，坚持到羊群入圈油灯亮，才到达目的地。为了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采风，她操起了多年不弹的三弦（当年文工团员一专多能），同艺人们一起边弹边唱，引来了农民的一片好奇声：“呀，省上来了个婆姨，可能行哩。写下些洋码码（音符）就会唱道情了，还会弹三弦，可好听哩。”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轰动全村，引来了外村的人。硷畔上，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的说：“我也会唱，让我进去！”有的说：“到我们村去吧，我们那里也有会唱的！”吵吵嚷嚷无法记谱，只好搬到院子里去，同艺人在一起给大伙唱了一阵子，直到他们满意而去。

白秉权全身心地投入陕北民歌的学习、记录，其态度之认真和

刻苦，给民间艺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著名道情艺人黄金鳌老先生说：“有你这样好的徒弟，能把道情学到这个程度，我也就放心了。”在学习过程中，她同艺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是这位老艺人，在1962年困难时期，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就连城里也难买到的白糖、香皂、毛巾等物品寄到西安。面对着这些物品，白秉权控制不住激动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它们凝结着师徒之间真挚的友谊，闪耀着新老文艺工作者紧密结合的熠熠光辉。

陕北民歌源远流长，浩若烟海。白秉权求贤若渴，四处拜师。她差不多跑遍了陕北的黄土高原。只要知道哪里有艺人，就不怕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前去采访。经她亲自采访的民间艺人、歌手就有丁喜才、张天恩、杨进山、黄金鳌、惠万年、张云亭、胡英杰等近百人。这些多才多艺的民间音乐艺人，既是民歌的继承者，又是民歌的创作者、发展者和传播者。他们对民族音乐作出的不朽业绩，时时激励着、鞭策着白秉权。即使在“四人帮”横行肆虐的时期，民歌被他们贬为“黄色小调”，乐坛一片萧瑟，白秉权仍未放弃对民歌的整理工作。她相信，民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永远不会被泯灭，必以其诱人的芬芳传播开去。白秉权是作为一个民歌演唱者的身份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歌唱家，如此顽强、如此认真而刻苦地学习民歌，不为装点门面，不图哗众取宠，而是刻意学习民歌之精髓，并以求彻底，这在歌唱界来说，实属罕见而难能可贵。也惟其如此，才使她奠定了雄厚的民间音乐的根基。这使她后来从事教学和创作工作获益匪浅。

## (二)

艺术是艰苦的事业，需要付出辛勤劳动，甚至毕生的精力。光

靠偶然的的机会和侥幸心理，也许可能红火一时，但镜花水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白秉权在事业上的执著追求，孜孜不倦，是她获得成功的重要秘诀。

早在1944年秋，白秉权就成为绥德师范文工团，文艺班，延安陕北行署文工团的业务骨干。她一边演戏、演唱，一边兼作乐队演奏员。自卫战争中，背着背包，转战陕北，随军演出。她主演的《刘胡兰》、《兄妹开荒》、《模范农家》、《送郎参军》、《越捞越深》等歌剧、秧歌剧，给陕北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陕北老乡喜爱的优秀演员。1950年调到陕西省文工团工作。1951年在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进修，次年以学生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演唱了自己编创的《托我捎话到前方》、《一封信》和《兰花花》等歌曲，受到志愿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回国后参加了赴天兰路至玉门油矿的赴朝汇报演出。1953年秋回陕西省文工团，主演了大型眉户剧《一个志愿军未婚妻》，连演70场，从未因嗓子不好而中断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1955年至陕西省歌舞剧院任独唱演员。在此期间演唱了大量的陕北民歌。其中如《跑旱船》、《卖菜》、《赶牲灵》、《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民歌，都是经她亲自采录、整理并首唱出去的。1956年陕西省戏剧会演，白秉权由一曲自编自唱的《陕北道情联唱》而荣获演唱一等奖。同年，她带着不满四个月的小孩，赴京参加了全国音乐周，演唱了《跑旱船》、《赶牲灵》等歌曲，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与赞赏，并且灌制了唱片。

白秉权的演唱在保持原有民歌风格的同时，特别注重民歌的艺术处理和感情抒发，使其具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如《跑旱船》这首民歌，刻意表现陕北民间闹秧歌的喜庆场面，人们欢天喜地地逗趣嬉戏的情景，充满了庄稼人特有的机智与诙谐。《赶牲灵》则刻画了少女对情人眷恋企盼的心情和她那纯真、朴实的形象。

歌唱者在如歌的行板的节奏中，生动地描绘出一幅脚夫在山道上行进的图画，情景交融，引人入胜。白秉权的演唱字正腔圆、嗓音洪亮，真假声结合自然，热情饱满，质朴无华，声情并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所演唱的曲目，绝大部分是亲自学习、记录，并且经过整理、改编而成的，而很少是从别人那里照搬过来，或者一味地模仿、重复别人。一个歌唱演员能自编自唱，是不多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她总是独辟蹊径，勇于创新，这除了需要一定的艺术胆略，而更主要的是需要具备全面的音乐文化知识，以及过硬的基本功底。

白秉权的艺术道路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和险阻。在歌唱生涯中，她遇到过困难，也走过弯路。20 世纪 60 年代初，她曾希望自己的歌唱艺术能够步入一个新的辉煌，不料在学习过程中进入误区，差一点中断了歌唱生命。经过痛苦的拼搏，终于找回了自我，恢复了将要失去的艺术青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困难从这位女强者的脚下踩过。正像有人说的：“白秉权身上有着一股女同志所没有的一股力量。”于是，她又开始歌唱了。从 1977 年到 1987 年，只要有机会她就纵情高唱。从 1987 年录制的《陕北民歌精选》盒带中，她所演唱的《跑早船》、《赶牲灵》、《卖菜》等保留曲目，可以听出歌声不减当年。

### (三)

白秉权对陕北民歌太熟悉了，因而人们冠她以“二老艺人”的称号。她立下宏愿：“将陕北民歌无私地传授给同行、专家、年轻一代，让陕北民歌遍地开花，代代相传。”

她传授陕北民歌的教学活动，早在 60 年代初就开始了。1963

年，她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进修，采用边学习边教民歌的形式，向师生们传授陕北民歌。她耐心认真地教学，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周小燕教授评价说：“我们就应该请白老师这样的民歌手来教，不但学得快，而且又容易掌握。”

1979年应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之邀，白秉权在校任教一年。这次教民歌完全是以个别上课形式进行。教了七位老师的十位学生，其中五分之三是学美声唱法的。他们基础不同，学的程度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同。因此，必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如有的学生声音不够通畅、不够圆润、音域较窄；有的学生声音虚、空、漏气，没有音着点。这些现象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讲不足为奇，但是，要唱好民歌却是很困难的。这样，必须采取既教民歌，又教方法，二者兼顾、相辅相成的教学措施。对学美声的同学，从理性上、概念上让他们明白两种唱法的共性和特性，学民歌应该在共性的基础上找特性。同时，也让他们明白特性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达到。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授，并做各种不同的声音形象来示范，让学生从听觉上区别、感觉和体会。当他们明白了道理，学民歌的兴趣大了，速度也快了，从而，也解除了从主课老师到同学思想上存在的怕打乱了声音概念，怕影响教学计划的进行等顾虑。一年中进行了三次汇报，师生一致认为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尤其是第三次的结业汇报，每人唱三首民歌，乐队伴奏，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赵佩院长说：“民歌课开得好，成效显著。看来民族歌剧的女声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解决男声问题。”他问白秉权：“白老师，我们把你调来，同意吗？”沈湘教授激动地说：“民歌课上得很好。我提个问题大家思考：为什么有的同学在主课中一直未解决的问题，可是上了民歌课却给解决了？比如有的同学唱了《五哥放羊》，歌唱状态全对了，一切正常了。”他表示，请民歌老师就应该请白老师这样的老师，不但

有雄厚的民间音乐基础，而且懂得声乐理论，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太难得了！王福增教授说：“白老师教民歌是‘民唱法，洋要求；洋唱法，民要求’，弥补了我们美声教学中的某些不足。”这些评语给白秉权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她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传授民歌的作用与意义，从而对自己的教学充满了信心。

白秉权教民歌采取口传心授的方法，即学生拿着曲谱，老师一句一句地教，让学生模仿、体会，掌握字里行间、行腔中的用文字无法标记的某些韵味和规律，以及润腔特点。同时，从理性上、歌唱机能方面讲解其特性。这样，使学生既领会科学方法，又掌握民歌的地方风格。她对学生演唱的曲目，从理解歌曲、感情处理、风格、润腔、表演风度，到台步、眼神、手势等都提出严格要求和认真训练。因此，经她教出的学生，声情结合较好，能较快地适应舞台演出。

白秉权在唱民歌、教民歌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民歌的唱法。她将民歌、曲艺、戏曲的唱法、润腔技巧，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但运用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开花结果，而且在多次应邀参加的“全国民族声乐理论研讨会上”，将教学经验作大会发言，并撰写了不少有实例、有论证，颇有见地的论文。她勇于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论点，如《民族唱法的“关闭”》等。她在治学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足以证明既不守旧也不崇洋，而是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成功地运用在自己的教学中去。她博采众长，善于吸收、摒弃门户之见，到处去听课、观摩，用她的话说是：“拾到篮子里都是菜。”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白秉权在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她的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多年来，她所培育的得意门生如孙志宽、张华敏、董华、章红艳等，分别在全国比赛中多次获金奖。

另外，还有不少人在省市比赛中获奖。有的则是各文艺团体中的业务骨干。她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福建艺术学校京剧班以及省、地群众艺术馆等院校和艺术团体辅导、讲学、任教，均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肯定。由于她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成绩卓著，曾受到陕西省文化厅的表彰与奖励。

#### (四)

改编民歌是白秉权的第三职业。

20世纪50年代改编民歌，完全是为了自己独唱的需要。后来改编则是为了学生演唱的需要。

陕北民歌大都属于一曲多段词曲体结构，若原封不动地照搬舞台，就会流于单调平冗，显得分量不足。同时，也难以表现演员的演唱能力和演唱水平。白秉权改编民歌主张“万变不离其宗”。她认为假若离了“宗”，就不成其为民歌，而变成创作歌曲了。而所谓“不离其宗”，就是既保持原民歌的风格、特色和个性，又有一定的发展、变化和新意，巧妙地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即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原先的“它”。运用这个原则和方法所改编的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音域，加强了技巧，具备了一定的难度，自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使他们的演唱功力、演唱技巧和演唱水平，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譬如《走西口》这首民歌的改编，就比原民歌的难度大得多。全曲由散板——慢板——中快——快板——散板组成，节奏变化复杂，音域扩展较大，没有相当的基本功和演唱水平是拿不下来的。有人认为它是“民歌中的咏叹调”，学生张华敏演唱此曲曾多次获奖。这首民歌的改编，既有发展，又有提高，

同时还保持了原民歌的特色和风格。该作品被收入音乐院校声乐教材。

几十年来，白秉权收集、整理、改编了大量的陕北民歌。这些民歌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歌》、《群众音乐》、《中国民歌》、《二人台音乐》、《陕北民歌独唱集》和《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等书中。改编、发表并且灌制唱片和录制成盒带的作品有《陕北道情联唱》、《陕北碗碗腔》、《托我捎话到前方》、《摇三摆》、《送情郎》、《九连环》、《信天游》、《绣荷包》等，改编的作品《回娘家》（陕北说书）、《走西口》、《送大哥》、《枣园来了秧歌队》等，获得民歌新编创作奖。

人生苦短。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并且希望获得成功，不下一番苦工夫是不行的。白秉权把自己的青春、智慧、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她所钟情的陕北民歌的收集、整理、改编、研究和民族声乐的教学中去。她在这个浩繁的系统工程中不畏艰难、大胆探索，为建立中国民族声乐体系含辛茹苦，努力奋斗，作出了显著成绩。就是在她离休之后，仍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用她的话说“离不离休，照样教学搞研究”。这种不甘寂寞，甘为人梯的精神实堪敬佩。这几年来通俗唱法受到年轻人们的青睐，对于这些慕名前来求教的歌手，她同样以热情、认真的态度对待。她认为这些歌手乐感好，可塑性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音乐基础差，有的人不识谱，或没琴进行练声。对于这些歌手，她打破常规的训练方法，尝试运用“打哈欠”的方法，其效果十分明显。每个人都是五节课一个小变化，十节课一个大变化。歌手们反映说：“这种速成训练法，对我们太合适了。”1991年开始，她又探索着教8岁至14岁的儿童、少年。其中，一名在1993年全国中学生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四名在省内比赛中获六次一等奖，一名在1995年首届中国少年、儿童卡拉



OK 电视大赛中获二等奖，并出访日本、泰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演出受到好评。还有不少小孩在省内获二、三等奖。

白秉权的成功之路，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路就在每一个人的脚下……

1985 年 1 月 28 日

（原载《经德》1977 年第 2 期）

## 回忆进出绥师前后

田泽民

忆往昔，陕北小米、高粱，无定河水，塞北阳光，雨露养育了我的身躯；黄土高原上辛勤的园丁是我的启蒙老师，教文化、讲理论……使我长大成人。这些恩情永远不忘。

1988 年 3 月，“龙年伊始春风吹，万象更新鸿雁飞”。当我得悉西安校友发起“李子洲奖教奖学基金会”集资倡议后，感到十分高兴。这项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代表了广大校友的心愿。因此，我积极响应，写了“校友的回声”，捐了薄金，以表心情。

近半个世纪了，不论在战争年代或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在西北、华北、中南、西南等地工作、学习、生活期间，我忘不了“天下名州”的家乡，忘不了母校绥师，有时梦中回到了家和校。

在庆祝母校建校 70 周年之际，我回忆进出绥师的前后情景，作为对母校的怀念。

绥师，是陕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诞生的地方，是陕北教育

的中心，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70年来，绥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4年距今已经48年了，那时间我才14岁，在文庙小学算毕业了。学习情况自己最清楚——不算好，对升学问题十分发愁。因为小学比较多，而中等学校只有绥师一家。附近的清涧、吴堡、葭县连一处中学都没有，外县来考绥师的同学背着铺盖、粮食来了，城里南关的、女小的、附小的、文庙巷的、乡镇来的也真不少。我壮着胆踏进了考场，总算交卷了。成绩怎么样，天知地知我不知，管他哩，听天由命吧。想起来那时心慌不安，有时想入非非，有时苦思冥想，有时垂头丧气，总想能考上就太好了。这日子也不好过，每天等呀、盼呀，树底下乘乘凉，山坡上放放羊，天气闷热，就去河里耍水。一次耍水回来，老远看到大门口贴着大红纸，走近一看，原来是学校送的喜报，我考上绥师了！妈妈特意给煮了两个鸡蛋，又给了一根黄瓜，拌了一碗疙瘩汤，算是奖励，吃起来特别香。

第二天，我急不可待地跑到学校，看校园看教室，还想看自己的座位呢。家长、亲戚、同学都说：泽民考上绥师了，真该给他祝贺。我自己当然美滋滋的，高兴得不得了，脸和全身都发着高烧呢。

语文老师王云凤讲毛泽东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陈士斌老师教我画画写美术字，记忆中特别深刻。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年过去了。1946年9月的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去，任雄士老师（解放后任兰大副校长）对我说：“准备让你去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来人要几个学生，根据你的情况，学校让你去延安，还有子洲县的冯振音、刘风华两位女同学和吴堡的寇福年同学，你回去告诉一下家里看同意不同意？”听了班主任的话我又惊又喜。叫我去延安，能干个啥？延安是中共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朱总司令的指挥部也在那里，能经风雨，见世面，学本领，吃干饭，身穿二

尺半。去！一定要去！自己下了决心，回去给父母一说，他们也支持，但马上就说：“你年龄很小，出去早了，我们不放心。”除此没有更多理由挽留了。过了几天，我们四个同学和米脂中学的夏天锡、李海贵、马生好、艾芳琴，随同中央党校文工室的辛大铭、洪禹同志别了母校，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

48年过去了，可是每当我拿起笔写字画画，就想起了老师的谆谆教导；每当我畅游戏水时，就想起了绥师高耸在小理河、无定河之间那雄威的校园风光。啊，母校，你永远年轻！

## 《兰花花》醉东欧

——著名歌唱家刘燕平漫笔

刘青霞 白炳书

1945年的一天。

陕甘宁边区绥德县城里的一座礼堂里，座无虚席。县城里各机关团体的干部几乎是倾城出动，来观看歌剧《白毛女》。这是继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创作首家演出《白毛女》之后，由绥德分区文工团奉献给陕北人民的一台陕北《白毛女》。

黄世仁之母——黄母，身着蓝缎子大襟袄，紫红缎背心，黑缎子裤，额头上束着镶嵌着玉石帽花的头箍，手捻着长串子佛珠，驼背、弓腰、蹒跚出台……至佛案前，她还假惺惺虔诚敬香，边低声吟唱：“一炷香我敬于西天如来，你保佑我……”

谁能相信，这个黄母竟然是由一个13岁的陕北女娃娃扮演的。这娃娃便是后来成为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的刘燕平。

一个满脸稚气，又带着几分娇滴的小娃娃，竟然把一个阴险毒辣、残暴而又伪善的老地主婆，演得如此地道、惟妙，直令观众和行家都赞不绝口。

演员和角色的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

这一角色的塑造，极充分地展现了小燕的天赋不凡，胆力不凡。

岁月的瞬间，有时会久久地凝结在心间，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生命中一个永不消失的印痕。

小燕饰黄母，成为我永恒的记忆。

而小燕永恒的记忆，却是一位伟人、一位巨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对她的厚爱……

## 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

小燕 1932 年出生于北平，缘此得名。

1935 年小燕随父母返回故里——西北边陲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城——绥德。

在这座古城里，说起刘杰三可能有人不知，但是城里无论大人、娃娃，却无人不知这座小城市有着一位备受乡亲们敬重的大人物——刘旅长。其实刘旅长就是刘杰三，他便是小燕的父亲。刘杰三先生少时天赋聪敏，勤奋努力。他步入青年，族人便集资从黄土高原千里迢迢送他进北平读书。他没有辜负众望，不仅读完了北平的大学，又留洋日本，习武备与法律。刘先生归国后曾在爱国将领冯玉祥部下任排长，在与日寇、与反动军阀的无数次战斗中，每次战斗刘先生均身先士卒，与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血战杀敌。他屡退强敌，屡建战功，所在部队，官兵们一致热情地爱称他为刘虎，意为虎虎有生气，英勇无敌。他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

直升至少将师长。北伐战争的经历使他确认真理在共产党一方。他同情共产党，并想方设法掩护过在北平的一些陕北共产党委员的活动。1935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日蒋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刘先生的部队被迫缩编为旅，调防陕北围剿红军。他无力扭转乾坤，但他绝不违心去骨肉相残围剿红军。无奈遂弃官回老家隐居。时隔一年，他即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高级参议。1937年毛泽东热情地用陕北特有的高级交通工具——架窝子，接刘先生到延安相见。毛泽东热情地向刘先生询问了日军的武器装备等情况，并和他讨论了抗日战争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取得最后胜利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一书中，作了系统、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卓越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之后，刘先生又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西省参事室参议。当时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和高级将领都是他的挚友，是他家的座上客。

小燕的母亲名张俊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贫苦人家的女儿。她是一位美貌、和善、知书达理的母亲。她绣得一手好花，又有说不完的故事，唱不完的小曲。小燕十分感谢母亲给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的民族艺术的种子。

小燕三姐一弟，均小小年纪便投身革命。小燕刚刚10岁，父亲便托人把她带到圣地延安，送她进入自然科学学院学习。

陕北是一个令人敬重而又让人遐想的地方。在这一方神奇的土地上，黄土几乎将这里的一切都覆盖了，然而在人们的心灵里，这里却永远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永恒的春天。庄稼人在那荒秃秃的山梁上、沟沟里，拉开嗓子和大山对歌；赶牲灵的脚步，无论是在曲曲弯弯的小道，还是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一路行程，一路歌；石匠用歌声装饰着钎锤声；窑洞里的女人们伴着纺车声尽情倾诉着心愿

……在历史的长河中，信天游成了这方土地上人们抒发感情所独有的语言，信天游是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真实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的总谱。小燕正是在这信天游的旋律声中，吮吸她的乳汁长大的。

1945年，13岁的燕平由自然科学学院调入西北文艺工作团。她的天赋使她对声乐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敏感，又有着一种非凡的表现力，使她一起步就取得了金子般闪光的成就。

她随西工团在无定河两岸，在古长城内外，在福建前线，在青藏筑路工地表演歌剧、秦腔、豫剧、晋剧，唱信天游、道情……

在解放战争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她和西工团的战友们随第一野战军转战西北，常常两天一夜240里路急行军。不停地行军，不停地演出。演出之余，前线喊话、收容俘虏、动员担架、护理伤员，她样样抢着干。燕平想的是，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文艺工作……第一野战军前总曾两次以三等功的荣誉授予这位西工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

1948年，当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著名的瓦子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燕平向党递上了志愿书。有人提出她才16岁。她以“刘胡兰入党还没有我大呢”撅嘴、嘟嘟相对。党终于接受了这位出色地完成了许多超越她年龄的任务的小兵。燕平成为光荣的中共党员。这在小燕的人生旅途上留下了一记明媚的光点。

## 《兰花花》插翅远翔

春天，1951年。

全国首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举行。正在狂风肆虐、飞沙刺人的大西北青海，为青藏公路筑路英雄们演出的燕平，被选

定为西北演出团的歌手，参加会演。她参演的曲目定为《兰花花》、《信天游》。

《兰花花》是陕北高原广泛流传的一首民歌，词儿很丰富，仅当时收集到的就有近百个段子。而各段之间却无必然的联系，全由歌唱者信手拈来。燕平在从西安到北京三天三夜的大车上，与同行的同志们探讨、磋商，在新掌握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改编、创作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八段词，用一个爱情故事作为主线，将八段词贯穿为一个有机体，同时赋予了它深刻的反封建主题思想。让一个聪明、俊俏、刚毅、质朴，有着火辣辣个性的痴情女“兰花花”在这首歌里活了起来。

令燕平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

“兰花花”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了舞台；

由燕平特邀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同志手握竹笛隐身于侧幕后；

明亮、悠扬的笛声响起来了；

高亢、嘹亮的歌声唱起来了；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栽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栽上那个兰花花好。

正月里说媒二月里订，

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

兰花花下轿东望西照，

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坟。

你要死来就早早地死，

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

我见到我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俩死活常在一搭。

歌唱由几句叙述语开始，然而燕平的歌声里却带着无可奈何的

怨气，继而转为憎恨、控诉，之后又转为质朴、纯真，饱含着深切的爱。

蕴含在歌声中的是一层抑郁、一层哀怨、一层激昂、一层抗争，像清澈的山泉，又似山野的劲风……整个剧场，被她这粗犷、豪放、真诚、委婉的歌唱折服，潮水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次会演，也包含着为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联欢节选拔节目。刚刚成立还不到两年的共和国是首次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此次盛会的。

燕平的独唱曲目《兰花花》和《歌唱志愿军》光荣入选。

同往参加此届联欢节声乐比赛的中国选手还有著名歌唱家李波、王昆、郭兰英等几位大姐，燕平那散发着泥土芬芳的，高亢、嘹亮、穿透力和表现力极强的演唱，使她获得了联欢节独唱比赛优秀奖。

联欢节之后，她随表演艺术团开始了东欧八国长达一年的巡回演出。《兰花花》如同插上了奇异的翅膀，高翔于波德平原、多瑙河畔、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莫斯科……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博得赞誉。一曲《兰花花》唱遍了东欧，醉倒了东欧，使世界认识了中国的民歌艺术。1953年，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访华演出时，在中国歌曲一栏里，那仅有的一首，就是《兰花花》。

这次赴欧八国360多天的演出，在我国的演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多少双激情的眼睛，多少次难忘的相会，多少回难舍的别离。燕平她保留着每一瞬间留下的永恒的记忆。

## “你的那首‘对面沟里流河水’唱得好”

在赴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前，燕平被邀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唱。《信天游》和《兰



花花》将燕平推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前。这兴许是命运注定燕平从此数十年备受周恩来总理的教导和关怀。

1953年春，朝鲜战场上的烽烟还在，周恩来总理率慰问团到旅大，解决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等有关事宜。燕平奉调在慰问团的文工团担任独唱和领唱。

在一次舞会上，总理邀请燕平共舞。

“你的那首‘对面沟里流河水’唱得好，有感情，感情真挚。你是陕北人吗？”

从总理深邃的眼神里，亲切、关怀的话语里，燕平充分领悟到了，自己的故乡——陕北，在总理的心中蕴藏着的那一种特殊的感情。

总理喜爱的“对面沟里流河水”，即是燕平演唱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横山也是陕北榆林地区的一个县，地处塞北长城脚下。横山境内有一条延绵起伏的山脉叫横山，横山是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刘志丹、谢子长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在这里建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建立了革命武装。《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正是陕北人民用信天游形式编唱的歌颂刘志丹、谢子长和游击队的民歌。歌中唱道：

对面沟里流河水，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一面面红旗硷畔上插，

快把咱游击队迎回家。

浓浓的米汤热腾腾的馍，

招待咱游击队好吃嘴。

三号号盒子红绳绳，

跟上我的哥哥闹革命。

你当红军我宣传，  
咱们一搭里闹革命多喜欢，  
红豆腐角熬南瓜，  
革命成功再回家。

高昂奔放的歌声，散发着陕北人民的革命战斗气息和陕北黄土地的泥土芳香。歌词中再现了身背盒子枪的刘志丹，游击队的威武雄姿，再现了人民群众迎接游击队的热烈场景，也再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从这次见到总理之后，只要是周恩来总理到场的演出，燕平都要加演这首信天游。总理常常是边听边击节，时而低声随唱。这是总理对演唱者的一种无声而深重的鼓励。

谈话稍有停顿，总理又问：

“哈里玛的演出你看过吗？”

哈里玛·纳赛洛娃，是苏联人民演员，1952年访华。

“她唱的是乌兹别克民歌，非常好，韵味足，功力强。加之身着民族服饰，随着感情的起伏，时而适度地有点民族舞步和舞姿，活泼、亲切，乡土气息浓郁，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高层次的艺术魅力。”

燕平回答对哈里玛深深的敬意后，总理欣慰地说：

“我有她的唱片，回去送给你。”

“一定要经常地向人民学习，要反映他们的感情，要人民喜欢，要走自己的路。”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歌坛上曾掀起阵阵“土洋”之争风波。有人认为我们自己的新歌剧院太土气，民族唱法发声不科学等等。在民族声乐领域中的燕平，感到有一种压力和受歧视之苦。同时随着“向科学大进军”的召唤，文化部亦出台了专业化、正规化的长远规

划。当时的文化氛围使燕平产生了强烈的脱产系统学习声乐技巧、用正规训练武装自己的欲望。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本科录取了这位黄土高原培养出来的歌手。

哪晓得一只小燕的升学，竟惊动了千里之外、日理万机、日夜为国为民操劳的国家的总理。

一天，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同志，把燕平请到北京西堂子胡同1号他的办公室。

一张铅笔字便笺映入燕平的视线。是总理的笔迹，大意是：

“要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艺术要人民喜爱；

条条艺术道路必须有人扛旗！

……”

燕平几乎惊呆了，我一个毛毛兵上学这么丁点小事情，总理怎么会知道的？“扛旗”……我如何承受得起呀！

周巍峙同志转达了总理的指示后，又深情地、中肯地给燕平谈了很多的关于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及它的发展，并勉励燕平在实践中提高。

在如何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上，著名歌唱家王昆大姐也曾得到过总理的亲切的关怀和教导。

20世纪50年代初，王昆曾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进修声乐。

临行前，总理同她谈话，郑重地说：“你去学习是好事，但你学完之后，不要让我们再也认不出你来了，而只能让我们觉得你比以前唱得更好了。但你还是王昆，不是别人。”

在几年之后的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上，王昆大姐想让总理听

听自己学习欧洲声法后的新唱法。她演唱了印度歌曲《摇篮曲》、印尼歌曲《宝贝》。本来她也不相信这些唱法属于她，她心情很紧张。

音乐会结束，王昆大姐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总理严肃地说：“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的，嘹亮的嘛！《宝贝》是齐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

此晚对王昆大姐震动很大，她觉得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一定要把“自己”找回来。

在距这次演唱会四个月之后的一次演唱会上，王昆大姐演唱了《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落幕后，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从侧台走到舞台上来。总理满脸兴奋，快步走向王昆，握着王昆的手激情地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邓大姐也和总理一起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到了延安。”

## “把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品位”

燕平遵循总理的教导，更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心。步子走得更坚实、坚毅，更勤奋，更急进。她懂得了自己坚持的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的民歌艺术的道路，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姿态。

如何闯出“自己的路”？她在艰难地跋涉着，很苦、很苦地行进的着……

燕平深深懂得，作为一名演员，勤奋、苦干是根本的。她苦练，练声，练唱，练朗诵，练形体，练绕口令，练眼神……她唱陕北民歌，但不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她广泛吸取有用的东西。她热衷于西北的眉户、碗碗腔、秦腔，也热衷于晋剧、京剧、川剧，河南梆子和河北梆子。她对各方名家：梅兰芳、关肃霜、常香玉、丁果仙、

牛桂英等的表演，都认真地观察、揣摩、学习、借鉴。对于欧洲传统唱法，她也比较、琢磨、求索、探寻。她也埋头读书，读中外古典名著，读莎士比亚戏剧，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

燕平的演唱艺术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歌曲演唱，一部分是歌剧表演。前者以色彩浓重、韵味醇厚、热情亲切为其艺术风格。从1951年的一曲《兰花花》开始，继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赶牲灵》、《翻身道情》、《歌唱志愿军》、《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刘志丹》、《枣园一盏灯》、《周恩来视察进村来》等百余首歌，组成她的独唱歌曲长廊。

燕平的歌剧表演则更讲究字正腔圆和内在深度，将唱、白、做、舞融于一体，神形一致，使情理既在人物的内心节律，又在人物的外在形体。在她的演唱中，除了以声腔音调对剧情、曲谱作出合乎情理的注释外，还力争对事件和人物作出最美的形象演绎，使民族新歌剧在音乐戏剧化和戏剧音乐化上达到完美的统一。从1945年的《白毛女》、《兄妹开荒》、《军民关系》、《十二把镰刀》，到1966年的《江姐》，几十部戏组成了她歌剧表演艺术的又一个长廊——画廊。在她创造的形象长廊中，最有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表演是《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兰花花》中的小兰、《红珊瑚》中的珊瑚妹、《江姐》中的江雪芹。

燕平的更可贵之处在于，无论演什么角色，在与别人演出的比较中，以及自己的反复演出中，总有新意，体现出一个表演艺术家勇于负重不断创新的风姿。一位曾与她合作多年的老友、老艺术家，对她扮江姐著文赞誉道：“本人自60年代至90年代间，曾先后观赏四个文艺团体演出的《江姐》，燕平的处理是独一无二的。”

延安《群众日报》1953年7月1日刊文，对燕平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扮演小芹一角色有一段评价，基本上可以概括燕平歌剧

表演艺术的独特风采：

……长句子悠扬婉转，飘然入云；短句子珠圆玉润，铿锵有力；再加上那舞蹈性带有节奏的动，直使观众恍然可置身剧中……在表演上，大胆地学习了民族戏曲的表演方法，适当地将现实生活中的动作给予夸张、美化。

我国著名剧作家、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田汉老先生，对于燕平的《兰花花》的演出，予以很高的赞誉、褒扬。称燕平的《兰花花》的演唱，是“把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品位”。

专家们对她的总的评价是：“她演唱音域幅度和形象的多异，只有具有高超演技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达到。”

燕平的路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一个艺术家的品格的力量。

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要走自己的路”、“要人民喜欢”的教导。

## 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暖暖的，亮亮的

1973年，燕平又两次听到周总理的教导。

1973年初春，总理陪同越南政府访华团访问陕西。总理一行由革命圣地来到古城西安。燕平所在的陕西省歌舞剧院担负了欢迎总理一行的招待晚会的演出。演出开始，燕平一直站在侧幕边，她清楚地看到总理就坐在紧靠台沿的第一排的位上。她多么想走下台去向总理问一声好。但这是动乱年代，她是被控制使用的，这个请求谁能批准？

据说演出中，总理也曾问到过燕平的。演出结束的当晚，总理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到燕平，转达了他对当晚演出的《游击队之歌》的意见：“《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没有意境，战斗歌曲不是唱得

越快越好，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群众演员为什么不可以少点儿……”总理从一首歌曲的处理、一个舞蹈的人数，深刻地指出了艺术表演的追求及其深度，同时也指出了艺术要百花繁茂，不可千篇一律。

就在这年的9月，燕平赴京为团里的服装设计定样。在西安，近在咫尺却未能向总理问声好，一直像块石块压在燕平的心头。此次进京，她想如果能见到总理……她把自己的愿望捎话给总理。

6日清晨，燕平的房间里，清脆明亮的电话铃响起。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嘱咐燕平：“等着，别外出，总理要见你。”

燕平惊讶、激动、兴奋、感激……自己也说不清这时是一种什么心情。这电话似乎很突然，其实又是那么合情合理。显然那一次未见面的“见面”，总理是记在心上的。

燕平被接到首都体育馆的休息室。她深思着，等待着……

这是总理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外事活动的间隙……

总理走进休息室，燕平三步两步迎上去，总理紧紧握住燕平的手，高兴地、亲切地说：

“噢，总算在这里见到你了！”

“最近排什么节目了，是不是还是西安看的那台？……”

“搞了一台新晚会，但是质量不高……”

“对了，那场演出，你为什么不下来呢？”

“我看您那么忙，我就没有去打搅……”望着被超负荷的工作和疾病折磨得瘦削而又略带倦意的总理，燕平不忍提起那令人不快的话题。

燕平此时的心情，就像漂泊了多年的游子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多年来的多少委屈、冤屈、疑虑、困惑却一句也吐不出来……

“你还唱不唱？”



“打1966年我就不唱了。”

“哦，八年没唱啦！……”

总理痛惜地望着这位10岁参加革命，19岁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十分肯定又带有安慰和鼓励地说：

“你还可以唱嘛！”

“我头发都白了，眼睛也花了……”

“头发白了也能唱，眼睛花了也能唱嘛！”

“唱，让我唱，我就唱。”

看到当年“兰花花”的那股子质朴、纯真劲儿，总理欣慰地点了点头。

“咱们去东北慰问是哪一年？”

“1953年。”总理的记忆能力是众所周知的。1953年燕平随同总理赴东北慰问演出，至今总理还记得的。

接着，总理又谈起了延安，问到燕平的父母和姐姐的情况。又谈起了《兄妹开荒》，谈起了刘志丹，谈起了民歌艺术的提炼、提高：

“《兄妹开荒》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第一个歌剧，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应该演演嘛！”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这首歌很好，很朴素，很有生活。”

“你见过刘志丹吗？”

“没有。”

“我见过。东征时在山西牺牲了。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陕北人民很热爱志丹同志嘛。”

“要把《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这首歌，好好改改，作为纪念志丹同志的歌。‘红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缺乏远大理



想和目标，可以把词改改。”

总理由此将谈话引向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把民间的东西好好加工、提炼，好的保留下来，不好的去掉。要好好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

“好啦，总算在这里见到你啦！”

就这样总理意味深长地深情地同燕平握别。“总理，延安的许多同志要我向你问好，请你多多保重！”

“谢谢大家，也请你代我问大家好。”

燕平送总理缓缓地缓缓地走去。

燕平有一种从幻梦中国到现实的感觉。她深深地领悟总理对《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歌词的意见。越想越觉得意义重大、深远。它既蕴含着总理对刘志丹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先烈们的深情怀念，也倾注了总理对民族文化、民歌艺术的热爱和关怀。让中华民族的歌声，永远颂扬中华民族的英雄；让人民英雄的英名，在世代的歌声中永远地放射出光彩。

谁能料到，这次和总理见面，竟然成了最后的一次。燕平再也没有机会向总理讲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倒是总理在重病期间，还曾经念叨：

“刘燕平的那件事不知办得怎么样了？看来，我是帮不上她的忙了。……”

总理有着多么伟大的胸怀，国家，人民，一件件事情，他都记挂在心中。

燕平深知总理念叨的那件事，就是关于民歌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总理远去，燕平在痛哭声中立志，一定要把那件事办好。

总理的谆谆教导，如同雨露，一滴一滴地浇灌着她求索的心田。又如同一团火焰在她的心田燃起，暖暖的，亮亮的……

## 一个延伸的音域……

在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里，“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的刘燕平恢复了艺术青春，重新登上了艺术的舞台。她含泪演唱着根据周总理指示改编的《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每次演唱，仿佛敬爱的总理仍坐在台下靠台沿的第一排位子上……

她多么希望能够为关心自己、关心支持民歌艺术的敬爱的周总理再次放歌。

1978年，燕平被选调到北京中央民族乐团任党委书记兼副团长。中央民族乐团是代表国家民族音乐最高水准的艺术团体，也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为了保存民族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实力，“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指示把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央其他艺术团体均集体下放到酒泉农场，编为文艺连，致使这个团和中央大部分文艺团体的人才没有流失。为了让民族音乐后继有人，事业兴旺发达，燕平把舞台让给了年轻人，自己则投入到繁杂的党务和行政事务中。她与乐团其他领导携手努力，迅速恢复了乐团的活力。

中央民族乐团遵循的，即是总理指示，燕平走的那条路。燕平的艺术理想和乐团的面貌是一致的。

1980年，燕平率民族乐团到陕北演出，慰问老区人民，同时要让团员们接受老区人民的教育。陕北的父老乡亲给予了他们最热情的接待。

不久，她又率团踏上了川陕红军走过的路程……

1984年，她作为艺术指导，率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演出。她们带去《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秦王破阵乐》等古典乐曲，以及新发掘整理出的，表现老虎雄姿、山风呼啸，鸣

妈妈和小鸭游水嬉戏情景的中国民间打击乐《老虎磨牙》、《鸭子拌嘴》。首场演出即产生轰动效应。

奥林匹克艺术节必须是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我国是被特邀参加的。开始给我们排的场次少，剧场小，票价很低。但首场演出后，票价由6美元提高到黑市的40美元，后来80美元也很难买到。

在克里弗兰市演出后，一位世界著名管风琴演奏家激动地对燕平说：“原以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就是流行的港台歌曲，真不知道你们中国的民族音乐这么精彩。……从音乐的表现手法到音乐语言，都是了不起的。”巡回演出中，一些留学生、华侨看演出后，流着眼泪说：“你们的演出也是我们的骄傲。”

面对民族音乐在西方引起的轰动，燕平由衷地兴奋和自豪。此时，她又一次想到了她心目中的那位伟人、巨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总理对民族音乐的支持、重视、关怀和指导，才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之林，有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之后除了团里的日常工作，她便倾注满腔热情，使自己奋斗的事业走向社会。

1982年，她和张权、黄苗子共同倡议为群众文化事业办点实事。和她们共同住在北京朝阳区的各方专家、名人共44人，在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朝阳区文化局的具体协助下，成立了朝阳文化艺术辅导中心。燕平担任常务副主任，辅导群众文化艺术，完全义务。

1984年，“辅导中心”和文化局共同举办了朝阳区的第一届“金色秋天”艺术节。有上万群众参加，健康地推动了民间民族艺术的繁荣。“金色秋天”艺术节还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与此同时，燕平还积极参加了区青年业余歌手比赛的组织和评比工作，并亲自辅导参加北京市市级比赛的青年歌手们

进行训练。令她十分欣慰的是参赛的10名歌手全部获奖。因此朝阳区政府特授予燕平“群众文化艺术优秀指导”称号。

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燕平，在政协会议上多次呼吁：“政府要重视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艺术的高雅艺术要给予倾斜政策。”她认为：“在中国文化百花园里，具有中国气魄、中国特色和中国人民感情的民族音乐这枝花，有着广阔的天地。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性，艺术要牢牢扎根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

她虽投身于繁重的党务、事务和社会工作中，但她仍以她的歌声，宣唱着为了民族音乐的发展奋斗终生的誓言。工厂、矿山、地头、田边、营房、哨所、教育阵地，到处撒满了她高亢、嘹亮、热情、质朴的歌声。

她虽然没有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她却曾登上了中国音乐的最高殿堂——中国音乐学院的讲台，为声乐系的学生、未来的民族歌唱家讲授民歌课程。

刘燕平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享有盛名的歌唱家和歌剧表演艺术家。她想着周总理的教导，记着鲁迅先生的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路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一条路，一条通往工农大众的路。

周恩来总理对民族音乐的支持、重视、关怀，所指出的也是这一条路。

燕平正是在这一条大路上，数十年如一日，永不停息地勇猛地向前走着……尽管这条路荆棘丛生，走得很苦、很累，但永恒的记忆使她坚持着……在她的面前，似乎永远有着一缕曙光，一个延伸

的音域……

1997 年春初稿 1998 年二稿

(原载《绥德》1998 年 2 期)

## 母校培养我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呼维应

我是 1945 年考入绥德师范的，那时我已是一名候补党员了，入学不久转为正式党员。

1944 年冬，我在高小没有毕业的情况下报考绥师，信心很不足。但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帮助下，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为什么要报考绥师？因我家庭贫穷，祖父、父亲都曾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土地革命时，祖父为村农会委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父亲较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 年至 1935 年，我的家乡（吴堡县）建立红色政权后，父亲在区政府做优红工作（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土地革命中我家分得了土地及其他物品，和其他穷苦农民一样，得到翻身解放。1936 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围剿，红军被迫撤走。敌人占领我根据地后，以十倍的疯狂大肆屠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地变成一片白色恐怖。地主、富农逼着穷人退还土地及分得的物品，并要以加倍的地租“偿还”。穷人受尽欺凌压榨，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了强烈的热爱共产党和仇恨敌人的火焰。1939 年，我的家乡第

二次解放，土地革命时分得的土地重新归还各家，劳苦大众又重见天日。此后，我家的生活虽有好转，但因弟妹们小，缺乏劳力，我作为老大要继续读书，就成了问题。那时绥师为培养革命人才，不收学费，吃饭不要钱，因此考入绥师就可省家中一笔开支。更主要的是绥师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是广大进步青年十分向往的地方。

我入绥师后，编入二十八班乙班（二十八班分甲、乙、预备三个班），班主任是雷毓贵同志。学生中有薛永年、王丕芬和我三名党员。按党章规定，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党支部，薛永年为支部书记，成为班上团结战斗的核心。后来又发展了薛育华、刘思福等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

绥师的教育要求是很严的。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常识、史地、生理卫生、体育、美术、音乐。语文老师开始是苏××，后来是吕××，数学由丁子文校长兼，政治常识开始是郭琦，后来是一位福建人，名字记不清了，史地是宋悌，音乐马富图，生理卫生袁醒民，体育、美术陈士斌。老师们讲课和批改作业都很认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特别是在全校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宪曾、余铮、郭琦、袁醒民等老师，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除了正式课程，学校还经常进行国内外形势、时事教育。“五一”、“七一”等纪念日开大会，刘宪曾、郭琦老师讲话较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学校还有业余文工队，由师生们自编自演反映革命内容的文艺节目，进行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

我在绥师的学习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它是我学知识、坚定革命人生观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是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我比较喜爱语文、数学、政治、史地，成绩也较好。体育、美术、音乐较差，但都有收获。



二是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坚定了革命意志，进一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三是增强了劳动意识。学校贯彻勤俭办校方针，搞了农副业基地，定期抽调学生去劳动。当年建校，发动学生背石头。我记得停课一个多月，每天背石头六个多小时，从东门外到学校有很长一段路，是很艰苦的。但由于班里组织得好，开展劳动竞赛，党团员处处带头，大家热情很高，争先恐后，我们班的薛永年、薛育华，大力士刘恩福、薛绍良等同学表现出色。回想起来，这一个月背石头劳动，炼人炼思想，是不可缺少的一课。

在1945年下半年，我还担任了学校保卫员的工作（当时是秘密的），是由二十七班班主任白主任介绍，绥德保安分处直接领导的。

1945年冬，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白克明同志到米中，绥师抽调干部，我们二十八班被抽调的有我、薛育华、霍成昌、霍贻武、杜成位、王丰厚、宋盛田、魏继再、曹树信、白树平等十位同学。为了革命的需要，当时，大家都没有来得及回家看看，就在白克明同志率领下，奔赴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 忆 锡 林

田生玉

2002年6月30日，我那亲密的战友、同志，亲爱的丈夫、老伴——黄锡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把无限的悲痛、无尽的思念留给了我和家人们，也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遗憾！家中那每一幅画、每一方印章、每一本书籍，以及笔墨纸砚，都闪现着他那勤奋执著

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时时处处萦绕在我的身旁。我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生活情景历历在目，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是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好老师，是我们全家所依赖的主心骨，怎么会忍心抛下我们妻儿老小就这样永远地走了？是那万万没有想到的病魔夺走了他脆弱的生命。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46年我在绥德师范学习时和锡林相识。绥师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在榆横战役中组建了战地服务团，锡林被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当护士，我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当演员，到新解放的镇川去宣传演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暴行，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任务完成返校后，我被吸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一次过党团组织生活时知道锡林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从心里羡慕敬佩他。1947年边区土改运动形成了高潮，学校又组织了土改工作队，我们又一同出发奔赴各地搞土改，组织发动群众掀起参军热潮，为壮大人民力量，巩固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当时，由于蒋介石胡宗南进犯，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战火已逼近绥德，军民正处在紧急备战状态，土改工作被迫中断，学校也决定撤离绥德城，转战山村并东渡黄河。同学们都在做出发前的准备，不料我却遭到母亲的反对。就在这关键时刻，是锡林同志一次次到我家做说服动员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母亲。记得他最后一次到我家忠告我：“一定要跟党走，跟集体走，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会悔恨终生！”我表示不辜负学校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坚决要跟随学校走，决不做投敌分子！我便做好了一切准备，随即趁机逃出家门。但由于时局紧张，锡林已随学校的队伍转移了，我十分沮丧，不知该走向何方，心中无了主张。在这危急时刻，正好遇到地委机关家属队和印刷厂组织转移，我祈求在印刷厂当工人的三姐带我一



同转移渡过黄河。欣慰的是不久就在山西碛口一带找到了绥师的队伍，我便顺利地归队了。我们既是一支学生队，又是一支宣传队。在行军演出中，大家互相照顾团结友爱，住破庙，睡戏台，从不叫苦。吃野菜杂粮，经常饿肚子没有怨言。由于生活艰苦，很多同学都有了病，我也患了较严重的胃病，得到了大姐姐、大哥哥们的体贴照顾。这段革命的情谊使我永生难忘。我庆幸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这正确的一步，我将永远铭记锡林同志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为我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8年解放战争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进攻。为了适应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需要，根据绥德地委的指示，绥德师范组建文艺班，锡林和我们50多名同学又共同编制在文艺班里，从此便又在这个温暖友爱团结的革命集体中朝夕相处。每天我们认真地学习文化，学习文艺技能和音乐知识，紧张地排练节目。此时，我更进一步了解到锡林能拉二胡、会编剧本，又能导演各种角色，他表现特别活跃，处处展示出他的艺术才华。他为人忠厚、热情开朗、健谈随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当时的我却幼稚单纯、喜笑爱唱、言语不多，是个踏实认真地完成组织任务的人，是个积极追求进步、平淡而不张扬的演员，曾被学校推举出席1949年元月延安首届陕甘宁边区学生代表大会。我们就在这种战乱动荡的生活中接受教育、经受考验，不断成长成熟，在革命集体中自然的友好相处、相互鼓励、相互关怀，虽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轰轰烈烈，却也萌发了深深的爱。当时我们的年龄还不大，可在那个年代已是经历风雨磨炼的革命者了。学校的领导便积极地为年轻人操办起了婚事，校长刘宪曾亲自为我们和其他两对青年人主持了集体婚礼，学校还为我们每对新人请一桌客人。记得锡林的三哥、表哥都从乡下赶来祝贺，我的母亲、哥哥、二姐、小妹都到校参加了简朴的婚礼，就这样我们

建立了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可彼此都心满意足。

锡林家境贫寒，自幼父母先后亡故。他大哥，二哥跟随刘志丹东征，1936年在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日子过得艰难凄苦。而我的家也一样清贫。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父亲过早地去世，使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妈妈，一个善良的家庭妇女，拉扯我们一群幼小的孩子及还未出世的小妹，含泪忍痛，既当爹又当娘，里里外外日夜操劳，含辛茹苦，饱尝人间酸甜苦辣，悉心抚育我们成长。母亲虽不识字，但再苦再穷她都支持子女们上学，再不受那睁眼睛的苦。由于生活所迫，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嫁了人，哥哥在部队的商店里当了伙计，我也考进了绥德师范。家中只有妈妈和小妹文玉，负担逐渐减轻了，这就是我的家，也是我和锡林共有的家。平凡慈祥的妈妈是我们唯一的亲人，锡林是那样善解人意，对母亲尊敬孝顺，百般照顾，关怀备至，妈妈跟随我们从延安到西安共同生活30多年，他和老人从未红过脸，总是非笑不说话。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老人总是有所偏爱或不妥之处，他从不埋怨老人，总是耐心地说服自己的儿女，教导他们正确对待。我个人天性存在许多毛病，总是话语不多令人感觉过于严肃甚至冷漠。而锡林却是耐心热情，说长道短，嘘寒问暖，使家中气氛十分活跃。妈妈看到锡林辛苦，风吹日晒早出晚归，就在生活上给予他特殊的照顾，那种一家人和睦温馨、互相关爱的亲情，成为我永生难忘的记忆。

锡林饱受苦难生活的磨砺，自幼养成了同情贫困的朴素情感。他特别爱交朋友，对邻里、战友、亲戚总是热情大方、宽容大度。只要是他能帮的忙，毫不犹豫决不吝嗇。我们工资收入微薄，又长期过着凭票供应的紧张生活，这对于我们家这样七八口人的大户，本来负担就不轻松。就说小妹文玉自幼随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的学业、就业、婚嫁都要给予关照。她婚后出生的孩子小燕、小

芳、小红等先后在我家寄养，锡林从不厌烦，总是耐心热情地关怀疼爱，尽其所能给予帮助。记得经常来我家暂住。常住的侄儿、外甥、亲戚朋友不断，他从不冷落上门的客人。他担心我不善烹饪慢待了亲友，常常亲自下厨，炒几个拿手的好菜。尤其对烈士二哥的儿子玉田更加关爱。侄儿玉田因大炼钢铁劳累吐血，后转成了肺结核。锡林为此焦虑不安，不顾结核病传染的危险，将其接在家中休养，煎熬汤药疗养救治。直至后期病危入院他都亲自日夜守候，倍加呵护。待侄子病故处理完丧事、安排好后事，留给他自己的是默默承受的悲伤和痛苦……老家三哥因家中缺少劳力交不出队里的口粮款，每年都由他来负担，每逢年关都要额外接济。我的哥哥因极“左”路线被冤判贪污，我们又多方为其筹集资金交付“赃款”。而我们自己的孩子，为解决家庭经济不足，小小年纪就开始担水种菜、拣柴拾煤渣来减轻家庭开支。……由于锡林为人正直，处世公道，待人宽厚，在亲戚中颇有威望，所以不论谁家有了矛盾、亲戚之间有了纠纷，总是邀请他从中调解，他像包公断案一样直言不讳，该批评的决不客气，有失礼的责其赔礼道歉，总能把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双方口服心服，达到和睦如初。锡林这种善于助人、乐于济贫而毫无怨言的精神，使我和孩子们都深受教育。在他那优秀品德的影响下，子女们也都能做到诚信善良、热情待人，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帮助，顾全大局，使家庭关系融洽。

在我们 50 多年的共同生活中，锡林总不忘时常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事业。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省文工团进行调整，对我这样一个缺少一技之长、又不像邯郸不会秦腔的演员，深深感到工作的危机，很可能面临改行。是他坚定地支持我报考西北艺术学院学习声乐专业，并承担了刚出生一个月却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喂养。20 世纪 60 年代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我又到上海声乐研究所进修学

习两年，家里母亲、孩子的生活担子又落在了他的肩上。因为有了他的全力支持，才有了我事业上的不断提高。我们长期工作在文艺单位，很少有节假日，过年过节经常不在家，都习以为常，谁也没有怨言。平常大部分时间都是下基层，到县城、跑乡村、去工厂、到部队、赴外省，为群众演出而忙碌。我们延安歌舞剧团跑遍了陕北的乡村城镇，踏遍西北各省、东北三省、内蒙古草原、山西、江西以及福建厦门海防前线，进京会演直至演到了中南海，曾受到毛主席、党中央首长的接见。所以，虽然工作很忙很累很苦，但却感到工作的无比幸福美好，大家都能一心想着工作，毫无私心杂念。说起来有些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那时由于不提倡计划生育，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是多子女家庭，我们家四个孩子，可每个孩子出生时父亲总在忙工作，没有一次到过医院探望产妇和婴儿。而产妇也严格地执行国家规定的56天产假，产假上班天经地义，没有人不满和埋怨。由于我母亲和我二姐的无私帮助，操持包揽了全部家务，我们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那真是践行了“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准则。

20世纪60年代初，“延歌”与“陕歌”合并，锡林在省歌舞剧院任职，我调入西安音乐学院任教，老人和孩子随我定居学校。从此锡林便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地工作着。我在学校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外，还要每年外出招生、参加社教、带领学生艺术实践，经常去农村、工厂、部队慰问宣传演出。“文化大革命”中到农场劳动锻炼，去秦岭深山学军、到贫困的紫阳山区开门办学等等活动，家里老小就由锡林在百忙中照料。可是，他也刚到新的单位，工作必须更加努力，常常食寝不顾。“文化大革命”中他难于幸免，被打成走资派、反党分子，被揪斗批判，抄家关牛棚。但他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坚信党一定会对自己

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不足，绝不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期他被下放“三线”到了安康，地委分配他到安康文工团工作，一去就是三年！“安歌”人在他逝世的唁电中这样说：“黄老师因时首倡创建安康歌舞剧团，并全力实施：呕心沥血，多方奔呼培训歌剧新人，创作导演安康歌剧第一戏《飒爽英姿》，赴省晋京，为安康歌剧事业的奠基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载入安康戏剧史册。他是同志们的良师益友，他的德才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下放安康这三年里，由于艰苦的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他才过四十的年龄就脱落了满口的牙齿。可他从不叫苦，把精力全部倾注在党的文艺事业上。在数十年的文艺生涯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诚、对革命理想的坚贞不渝、对人民群众的热爱，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工作中。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后在延安歌舞剧团、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安康歌剧团、陕西省京剧团、陕西省交响乐团等单位任团长、书记等职，党把他放在哪里，他就扑向哪里，那里的工作就出成效，就有发展。在工作中他任劳任怨，处处顾全大局，吃苦在先不计得失。他政治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是非界线分明，执行党的政策严肃认真，能关心干部的政治进步，注意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及事业发展的要求。他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所到之处就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刚直不阿，一身正气，从不谄上捧下。他清正廉洁，从不以权谋私。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关心事业胜过关心家庭。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深得同志们的称颂。

离休以后，我们真正开始了日夜相守的生活，体味夫妻间的那种默契与沟通、相互间的包容与谅解，过上了无忧无虑的老来相伴的幸福晚年。他时常告诫我，要利用这退下来的时间好好学习，用

知识充实自己。很快，他就由一个工作狂变成了学习狂，想要把自幼没能如愿的学习时间补回来。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写字，古今中外的文史书籍仔细阅读，认真得就像小学生一样。对不认识的字、不懂的句决不放过。查字典、记笔记，努力补上自己的先天不足。他上了老年大学，先后毕业于书法班及国画、山水花鸟班，多次获得优秀学员称号。他利用工具书自己学习篆刻，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吃饭时在琢磨，睡梦中仍在写画吟诗。在他的刻苦努力下，不少书画、诗作、篆刻作品正式发表并参展，曾多次受到奖励。平时求书、求篆刻者接二连三，有的同志还将所求之书、印转赠香港、台湾、日本的亲友。他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锡林在百忙中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对祖国的建设发展极为关注，对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战略部署欣喜若狂，对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伟大工程精心研究。对铁路、公路的建设尤为关心，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热情更高。当得知“延神”铁路开始试运行的消息，便急不可耐地将消息复印，发至兰州、昆明、江西等地的亲朋好友，相约同乘火车回故乡，共赏家乡巨变的美景。然而，夙愿未果君先去，谁知他走得那么急、那么早！悔恨我当初没能实现陪同他坐上火车回故乡的愿望，使之成了永世无法弥补的遗憾！

由于锡林不注重自我保健，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论做什么事总是拿得起而放不下，拼全力也要一气呵成。久而久之，这样不加节制地看、写、画、刻，使他的视力大大下降，患上了眼皮静脉炎，视物十分吃力。可他从不去看病治疗，仍旧苦学不辍。他的右手掌因严重受伤后留下了疾患，掌心处长了几个大血疱，时有疼痛不能用力，就连厨房的菜刀都无法操持。而每刻一方印章就会更加重肿胀，促使病情发展。他对求章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在家人

百般劝说下，他无奈放手出去散散步，却又利用散步之机一头钻进书店，挑选对自己学习有用的书籍，每次总能购回不少学习资料。

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使疾病渐渐侵入肌体。锡林老年后患过中风，得过胆石症、前列腺增生，住过多次院，做过多次手术，可能为减轻国家负担从不住干部病房，总是要求尽早出院。2002年1月他长期低烧不退，医生诊断为前列腺疾患，必须立即住院手术。术后因输液不当引发了心力衰竭，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但体重大大下降，体质大不如前。出院后总是食欲不佳，人渐消瘦，虽多次求医但因药不对症毫无疗效。当隐患拖到全身出现了黄疸，才做了CT检查，确诊为晚期胰腺癌症，全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震惊了，天——真的要塌啦！孩子们怕我经受不住这致命的打击，不敢告诉我实情，可我从她们的眼神中察觉到病情的严重，我们心照不宣，各自强忍悲痛，把泪水往肚里咽，却强装笑脸鼓励锡林配合医生治疗。我们把病人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总相信只有开刀才能延长生命的诺言。其间，有的战友建议转院另做进一步检查治疗。有的同志帮助打听寻找治疗秘方。我们全家乱了阵脚，整日焦虑不安地担忧，经受了漫长等待的20天，终于盼来了手术的日子，可结果竟是更大的失望，全家人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术后病情加重，进食困难，连喝水都困难。那些灵药秘方无法使用，我悔恨自己怎么没想到病情恶化会渐渐丧失胃肠功能，悔恨那些秘方为什么没在手术前使用？只有悔恨和内疚！度日如年的时光，使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急病慢医生”那种令人焦灼不安的煎熬滋味。领导、战友、朋友们听到锡林患绝症的消息无不震惊惋惜，纷纷亲临医院探望慰问，作最后的告别。而锡林他总是强打精神忍着疼痛，脸上挂着他那特有的笑容表示对大家的感谢。那些懂得疼爱的儿女、侄甥、孙子们，不辞辛劳日夜轮流守护在病床前，尽他们的孝心，用深厚



细致关爱支持鼓励他同病魔作斗争。在手术后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不能进食，就靠几口汤水维持生命。我们束手无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亲人一天天憔悴，一天天衰弱，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一滴滴熬干直到熄灭，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亲人，永远地走了！……

锡林——你就放心地安息吧！再也不用受那病痛的折磨，再也不要那样的辛苦，再也不要那样的忙碌了！就让我那无尽的思念永远陪伴你那孤寂的英灵，直到再牵手相携时吧！

2003年元月



## 忆母校生活十点

张德仪

### 一、考入绥师时的严肃口试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革命干部，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绥师作为六所中等干部学校之一。1944年，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完小毕业的学生经过严格的文化课考试，进入绥师。为了让我们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调动，进绥师考试时对每个人还进行了严肃的口试。记得口试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如何认识已经结束的整风运动。二是如果组织需要，随时调你参加工作或上前线，能否服从分配。参加考试的同学，大部分作了正确的回答。我们二十七班共考取了100余名学生，分甲、乙两个班。我们一面学习，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有同学随时调出工作。经常是正在上课，教导处叫一位同学去谈话，回来后同学们就知道要调他到哪里工作去了。有的同学甚至当天就背上行李起程。虽然我们当时年龄还小，但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同学们也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送行，很少有人为离家离校流泪和难过的。好多同学离家较远（因当时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只有两个中学，一是米中，一是绥师），所以家在吴堡、清涧、子洲、佳县等地同学，也来不及通知自己的父母就走上了革命征途。经常是学校放了寒假，已经离校参加工作的同志未回家，有的家长来校找学生，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参加工

作或参军。由于以上原因，我们班在校学习不到一年，同志们就调出工作已近一半，只好将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上课。

我们这些青少年，就是抱着这样纯朴的革命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 二、艰苦愉快的生产劳动课

193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和服装，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作为学生也不例外。我们考入绥师后，学生的伙食费由学校供给，全校师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生产运动。每个学生每学期要完成一定数量的生产任务，每周有两三个下午搞生产活动，有纺棉线的，有纺毛线的，有打毛衣的，还进行农业劳动。在绥德东门外川地里种了棉花、高粱和青菜。在二郎山上种了土豆、南瓜等农作物。我们按时去田里播种、锄草、收割。经过自己的劳动，做到了学生副食大部分能自给自足，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当然，那时生活是很低水平的。每天基本是两顿钱钱饭。每周吃一次小米干饭就算改善伙食了。副食是冬天用盐水煮南瓜土豆等，夏天大部分是凉拌各种菜等）。现在绥师刚进校门的一排石窑洞就是当时二十六班、二十七班这几期学生从趺上背的石头盖起来的。为此，我们二十七班的杨力忠同学（他原是绥德实验学校毕业考入绥师的，从学校开始就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不慎将脚砸伤，感染成破伤风不到一月，即去世，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当时在学习生产中表现好的同学被同学们选为模范学生，出席

了绥德分区召开的劳模大会，受到分区党政领导的奖励。

### 三、义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大部分无条件接受文化教育，当时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也没有文化。我们这些受过完小以上教育的学生，就成为当时政府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力量。当时我们虽为学生，但经常借出去支援党和政府开展各项活动。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1944年至1945年初绥德分区开展了扫盲运动。同学们义不容辞地当起了扫盲活动的小教师。记得我和雷秀山、延毓等同学分配在绥德城内几个小组，雷秀山同学在北门湾小组，延毓同学在背城小组，我在田家沟小组等。除每周有两三个下午教一两个小时课外，主要利用夜晚妇女们闲眠时到她们家中去教课。没有固定课本，为了使她们容易记住，先从她们每天接触的物品开始识字，如自己的姓名、锅、碗、盆、水、土、火、风箱等。每周小老师们在一起进行一次情况交流，教得好的同学受到学校表扬。

1944年底，绥德县开展了“三三制”选举工作，我和白秉权同学被借出两个月帮助县政府搞这一工作。记得组织完绥德城内圪圪地区选举后，我为此写了一篇作文，叙述了人民群众参加选举的情况，受到了语文老师王云风的表扬。

每逢寒暑假，我们这些学生又成为区县政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人民生活的骨干力量。过春节，大部分同学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秧歌队和板报组。有的当了农闲夜校教师，忙得不亦乐乎，比上学还紧张。但同学们都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怨言。为此，1945年暑假时，二十七班在班主任周笃彦老师倡导下，由当时住校的高尔谦、李荣庆和我组成了一个班内寒（暑）假小报通讯编

写小组，记得半月余内出一期，每一假期出二至三期，由分散在各地的同学寄来自己在寒（暑）假活动情况稿件，由我们三人负责编排刻印出来再寄给各地同学，做到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受到同学们好评。

#### 四、艰苦的学习条件

由于陕甘宁边区军民物质生活极度贫困，考入绥师后，大部分课程没有课本，由老师自编讲义，随编随讲，学生们记笔记。有的学生能把老师讲的课全记下来。讲数学的张竟老师有胃病，经常带病上课，他编写的几何、代数课，同学们很爱听。讲历史的高老师（名字记不起了，女老师）讲历史像讲故事一样，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原任榆林地委书记的霍世仁同学是记忆力很好的学生，他能把老师讲的历史课背下来。同学们有了疑难问题，都爱请教他。语文老师王云凤同志，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能力，鼓励同学多写多练。他不拘一格，不限制题目，要我们这些学生把自己每天所见所闻写出来，交他批改。好的作文在全班会上宣读表扬，大大鼓励了同学们的写作积极性。雷秀山同学写的一篇记事文被选在南关大街上的一块板报上进行登载，我们班好多同学写的作文在全校评比会上得了奖。周笃彦老师讲的化学课，变化莫测，同学们很感兴趣。周老师是四川人，个子不高，全校师生只有他有一双旧皮鞋，他穿上又很大，同学们亲切地叫他“大皮鞋”，他总是憨厚地一笑，说我们是小淘气，并不介意。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家庭经济条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虽为中学生，大部分同学还没见过钢笔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用小木棍绑上钢笔尖蘸墨水写字，有的墨水是用葵花籽煮的水，黑墨是用木炭粉代

替。我们多数同学买不起边区造的很粗的纸，就将用过的笔记本和旧书反过来再用一遍。

1946年底自卫战争开始后，为躲避国民党飞机对解放区军民的狂轰滥炸，学校只能到山沟里去上课。每天同学们很早就起床，吃了早饭后，背上学习用具，由班干部背上小黑板，从北门湾出去过两河口上面的山沟里待一天。以地当凳，以腿当桌，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

1947年胡宗南侵犯陕甘宁边区后，随着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同学到绥德边区野战医院做护理工作。留校部分同学就开始了动荡的战争时期的学习生活。

## 五、秘密的党组织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前，党允许表现好的青年加入党组织（那时没有共青团组织），马运昌、徐立根、雷秀山、张德仪、白招财、李淑珍、李庆春等十来位同学都是在完小入党后考入绥师的。当时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组织要求党员绝对保密，记得刚到绥师的班主任杨演女老师就要求我们党员，连自己父母、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告诉自己的党员身份。要求党员学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自我牺牲精神，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我们班大部分党员同学在学习上是尖子，生产劳动中是能手，表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成为学校各方面的骨干力量。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大部分是党员同学，当时评选出的模范学生也多是党员学生。

由于组织处于秘密状态，都是礼拜天过组织生活。过生活前党员之间互相秘密通知，一个个走到开会地点，有时在老师住的小院

内开会，有时在校外仓圪达快苏墓旁山上开会。开会时除了反映同学思想情况，讨论如何帮助困难同学外，对党员自身的缺点错误，都能展开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记得×××同学在夏夜里闖入女生睡的教室里，引起公愤。党内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他在班上做了公开检查，赢得同学们谅解。党员同学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望，不少同学要求加入党组织。记得考入绥师不到一年时间，我们班即发展了霍世仁、冯振英、张醒民、高再祥等十几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 六、黑板报的风波

1945年间由学生会主办的全校黑板报名叫“前哨”，每半月出一期。各班均有通讯员，报道本班情况。记得1945年上学期，学校有个别女同学讲究穿戴打扮。有些同学看不惯，好像二十六班的几位同学写了一篇不点名的讽刺小品，黑板报登出后反响强烈。为此，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有反对的，有支持的，相持不下。最后教导处余峰老师把我们这些学生会干部找去开了会，谈了他的看法。他谆谆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同学缺点。他引用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教导我们对同学生活中的缺点要从团结愿望出发，要用善意的以理服人的态度，指出她的毛病，帮助她改正缺点。经过老师指点，我们懂得对待同志的错误，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能是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愿望，决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同志的缺点错误。在我以后革命生涯中，在处理同志间矛盾错误时，时常想起老师的这些教导。

## 七、难忘的同学情

陕北人民生活贫困，大部分同学家境都很贫寒，学校除供给同学们伙食外，对家境极贫困的同学给一定救济。我班雷秀山同学考入绥师后连一床破被也没有，第一学期她和我共盖一块粗布被子过的冬。第二学期组织救济了一床被子才解决了她的困难。同学们少有的衣物，互相借用，从不介意。生活条件差，冬天取暖煤很少，宿舍非常冷，同学们穿得又很单薄，每到严冬，大部分同学手脚都长了冻疮。

绥师校址较高，吃水困难。学校除雇有工友担水外，男同学们也轮流值日帮助担水。一二十个同学从小理河担上水从水门内陡坡上排队往上走很是壮观。虽很累，但很愉快，在休息时坐在扁担上还嬉戏打闹或唱信天游，歌声回落在绥德城上空。

学生以露天为饭堂，十人一小组，每天一人值日负责打本组饭菜，然后分给每个同学。吃完饭，一工友给你一勺水，漱口洗碗就是它。一些同学懒得把碗拿回宿舍，吃完饭，顺手把碗放在礼堂外面花砖墙内。花墙内成了同学们的天然碗柜了。记得一次吃饭时，同学们开玩笑把一只蜜蜂放在雷秀山同学碗里，吓得她跑开并气哭了，引得大家哄笑。想起那时的艰苦生活是多么有趣呀。

学生宿舍离厕所较远，在晚上女同学总是三五人一起上厕所，互相照顾。

夏天男同学在僻静处游游泳、洗洗澡，对女同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一次晚上，我班十几个女同学偷偷地在大理河洗了一次澡，学校知道后批评了我们。我班男同学知道后，决定每月帮我们担一次水，学校帮助加热一下，同学们用盆打回去擦擦澡。这对我们是

十分的优待了。我们很感激男同学。

同学家中有什么困难，同学们争相帮忙。我母亲年老体弱，吃水很困难。霍世仁、徐立根、张映台、余士杰等同学经常帮助挑水，以解她的困难。

在战争行军中，互相照顾，大同学照顾小同学，男同学帮女同学，胜似同胞姐妹情。记得在紧张的行军生活中，白秉权同学怀了孕，反应呕吐，吃不下东西，身体较弱，男同学主动帮她背行李，女同学架着她上路。晚上睡不好，女同学们又轮流坐着让她靠着休息，并用小缸子单独给她煮一点粥让她吃，一直照顾她分娩在黄河之畔李家坪的破窑洞内，她爱人赶来为止。

为了躲避空袭，基本是夜行军，又累又困。同学们就设法走路睡觉，两人架一人，中间被架的人就能睡觉了。记得一天晚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们必须马上过黄河，翻越一架高山，走黄河边的悬崖小路。为了保护同学安全，部分大一点的男同学和老师就站在悬崖边。同学们前后手拉手摸索前进。由于天太黑，又值秋末，黄河风大浪急。过黄河时，我们的船险些触礁，过到对岸朝公才敢告诉我们。

我们在李家坪村宿营，住的是破窑洞，大部分窑洞没有门窗，睡的地铺点草。记得有半月余时间口粮供不上，我们每天只吃一餐野菜煮黄豆，好多同学都长了口疮。

## 八、慰问护理战士的同学们

约1947年夏末，学校转移到山西省临县碛口一带，学校派到野战医院护理伤员的同学也过了黄河，住在碛口以南某村（记不起村名了）。学校派我和丁老师（名字记不起来了，米脂县人）代表校



方去看望那些同学。我俩沿黄河往南走了一天路程，到了那个村（村子在半山腰上）。伤员们都分散在每个老乡家中。每个同学负责照顾十来个伤员，每天很早起床，生火、烧水、做饭、换药、打针等，工作很紧张。还要给重伤员喂饭，很晚才能休息。他们还谈到，在黄河西边随部队转移行军时，有时和敌人相隔只有四五里路，一面急行军，一面还得照顾伤员，很艰苦。过黄河后才安定下来。因此，大部分伤员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轻伤员同志亲自给同学们做鞋穿。个别伤员由于伤势过重影响情绪很坏，照顾稍有不周，张口就骂，甚至有动手打人现象，遇有这种情况，同学们擦干眼泪仍耐心护理他们。

我俩转达了学校对他们的慰问，也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主要是他们这部分学生是否还能回校。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对伤员的护理工作，待了约一周，我俩即返校。这部分同学都未能回校，以后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战线一员战士。

## 九、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坚决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决定把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给农民，同时对各阶层的利益做了适当照顾。党的“五四”指示发出后，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土地改革运动形成了高潮。解放区开始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掀起参军参战热潮，巩固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为此，绥师部分同学参加了绥德分区的土地改革工作。1947

年初，我和我们班的王不烈、王月婵等四五位同学分配到绥德县辛店区搞征购土地工作（土改前期，就是把富农地主多余土地购买出来分给贫下中农）。因我是青年党员，并协助区里试办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被分配在三十里铺一带各个自然村。各乡成立了征购土地委员会。因为我们是学生，每天跟着乡长到各村了解情况，开会记录、登记计算土地数目、编造分配花名册都是我们的事。为了不影响群众生产活动，大部分会议在晚上召开。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甚至到次日凌晨，工作很紧张。再加上延安也正作战略撤退，三十里铺村又处在公路边，每天能都见到撤退同志经此地过黄河。有的同志到这里休息一两天再走，我们就帮乡政府安置他们。在这一工作中，同时开展征兵工作。我们又协助乡政府到各村进行征兵的宣传动员登记。一直帮助部队来接兵同志欢送新兵入伍为止。正紧张工作时，发生了国民党飞机轰炸绥德城事件，我们站在三十里铺一带山上，看到了绥德城方向升起的浓烟，知道战火已近绥德，这一工作被迫中断。我们几位同学分别撤回学校。当我们回校后，绥德城完全处于备战状态。为防空袭，大街上白天不见人烟，学校也撤出绥德城，转移到子洲县苗家坪一带。我利用一两个晚上帮助有病的母亲安置了一下家务，回城第三天黎明即背上行囊，直奔四川，直到黄昏才追上学校。

1947年下半年，西北野战军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几个伏击战，粉碎了胡宗南反动军队在西北战场的重点进攻。9月绥德敌军溃退，绥德分区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学校转移在黄河边佳县螭螭峪李家坪村宿营。在校不多的学生，少量的被调到延大学习新闻、财会专业，大部分党团员分别又派往各县参加土改工作。我和黄锡林、魏瑞祥、阎菊芳等同学（有几位同学记不起来了），由沙垠老师带领，沿黄河边的盘山小道到吴堡县所在

地来家川参加了吴堡县的土改工作团。我们分别分到各区工作队，我分到赵家沟一带。带队的有霍维德和吴堡县委一位宣传部长（名字记不起来了。霍维德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某厅厅长）。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最初对基层党组织采取了不信任态度，工作组同志避开党支部直接找最穷苦的人进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当然就出现了违反政策的对地主分子逼供事件发生，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土改工作团不断地组织团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很快地纠正了这些偏差，使土改健康发展。由于我是女同志，不仅负责几个自然村的土改具体工作，并负责发动全区妇女参加运动的任务。每天走家串户，和贫下中农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敢于向地主斗争或开各种妇女会，和妇女姐妹们拉家常，动员他们参加运动，经常工作到深夜。使人不能忘怀的是，人民群众是那样的诚朴可爱。相处长久后，老大娘房东老大娘每天晚上纺线很晚，等我开会回来她才安睡，有时还在锅里留着热乎乎的煮南瓜、山药蛋让我们当夜餐吃。年轻婆姨大姑娘把我当成亲姐妹，记不清我当时和她们拜了多少干姐妹。土改工作经常组织团员在一起学习方针政策，交流情况。那时正值严冬，记得一次在马树泉村子集中学习，我们背上行李翻了几座大山才到。又遇下大雪，我们到集中地后都成了雪人，手脚都冻肿了。

在吴堡土改至1948年春末，我们分别调回学校。

## 十、战争的洗礼——业余文艺演出队

学校在战时转移时，留校部分较活跃的同学成立了业余文艺演出队，为战争服务。当时绥德文工团派了安全、李作柱二同志来校指导我们。演出队约40多人。行军到那就给老乡演出，活跃生活。

宣传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暴行，激发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积极参军，支援前线。并做好后方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一粒粮、一个人。记得我们排了《双报仇》、《无敌民兵》、《送郎参军》等。以后又排了《血泪仇》、《做军鞋》等。我们这个演出队年龄都在14岁以下。行军中除了背自己行李外，还背着各种道具。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每天都是四五点起床，在河边或山上练功、练嗓子，然后背上行李转移，到后吃早饭，排练。部分人负责搭台子，借服装。晚上演出，每天很晚才能休息。1947年5月5日，胡宗南部队第一次侵占绥德撤退后，我们又赶回绥德，到绥德各区乡做宣传动员工作。战争时期，我们走遍了绥、米、佳、吴几个县的一些乡村，协助党和政府宣传动员群众，为支援前线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也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每到一处演出地，老乡们抢着帮我们搬道具、搭台子。有时到一地是派饭吃，老乡们欢迎到他们家去吃饭。尤其是女同志，更受婆姨们姑娘们的欢迎，主动拿出自己的衣服借给我们演出用。

那时演的节目大部分是控诉敌人的暴行。演员要有真实情感，每场都要真流泪。我们这些小演员做不到，为了收到好的效果，有的同志在出场前在眼睛内放点油彩，让眼泪流出来。而油彩又是土造的。为此，有的同志眼睛以后有了毛病。

为了配合形势，我们一面演出，一面采风收集素材，自编节目演出。《做军鞋》就是那个时候集体创作出来的，排演出来后，受到好评。行军、演出，对我们这些小演员来说很劳累的。有时到一地连饭也吃不上，还得按时演出。有时还会有事故出现，记得一次演一个国民党兵凌辱一妇女后，这个妇女拿着剪刀和他拼命，一次演这个妇女的党淑珍同志失手真把演这个兵的傅继元同志的鬃扎破了。

1947年秋，西北人民解放军进攻包围榆林期间，我们这个演出

队到前线给解放军进行慰问演出。为了避开敌人的空袭，从米脂城出发时是早晨两三点钟，天很黑，同学们互相拉着手走。快到镇川堡时，天已黎明。我们正走在川地的大路上，忽听前面有“轰隆隆”响声。这时从我们身边走过来解放军同志大声喊道要我们立即卧倒。我和田萍、阎菊芳、叶生等六七位同学跑到不远处有半米的土台底下刚爬下，飞机就飞过来了。朝我们左上方扫射了好一会飞走了。我们几十人站起后，有的小同志还在发抖，好在没有伤人，在不到100米地方打死一头驴。因为天亮，不能前进了，只好到就近山沟休息、排练。等天黑了才走进了镇川堡。此后，每天天还黑着时，就起床，打背包，吃饭后撤出镇川堡镇，到镇外山沟内排练。任凭风吹日晒，还在山沟周围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宣传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记得在一个破庙里，访问了一个瞎眼老大娘。她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兵，家中东西全被国民党兵抢光了，她一人无依无靠，靠乞讨度日，她唯一的财产是一个破碗。同学们听了老人家哭诉，都流了泪。有的同学把自己带的一点钱送给这个老大妈。就这样，我们白天钻山沟排练，晚上给解放军演出。那时又排了大型歌剧《刘胡兰》，演出后，激发了战士对敌人的仇恨。经常在演出中，战士们哭泣出了声，或呼口号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在前线慰问演出十多天返回绥德。

1948年，绥德文工团调延安后到西安。绥德地委在原绥师业余演出队基础上重新组建了文工团，也就是绥师的文艺班，由安子和薛增禄二同志负责。有张彩萍、黄锡林、魏瑞祥、白秉权、张德仪几位同志为干部（相当绥师教职工）。因成为正式文艺团体，一切要求正规。每个团员除了完成演出任务外，还要学文化、学业务。有学音乐的，有学化妆的，有学创作的，还有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等。没有资金，我们自力更生。记得1949年阴历四月八日

是佳县白云山庙会，我们就背着行李、道具到白云山赶庙会演现代戏，和山西梆子剧团争舞台，轮流演出，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了新思想，新道德，好人好事，又赚了钱。回来后，用这笔钱买了幕布、汽灯等设备，装备了我们自己。

1949年榆林和平解放后不到一月，绥德地委又让我们去榆林演出，配合政府做新解放区的工作。我们走了三天，到鱼河堡后，一路全是沙路。到了榆林，榆林气候很特别，早晚冷，中午热，吃的小米饭内沙子很多。由于演出任务重，再加水土不适，全团50多人都患肠胃病，呕吐、腹泻，全病了，但仍坚持演出。记得一次正演出中，叶生同志休克在舞台上，张彩萍同志临产时才离开舞台。我们一面演出，一面还协助政府到居民区做社会调查，宣传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在榆林工作三个多月，约1949年10月返回绥师。1949年11月，文艺班奉调到延安，成为陕北区党委文工团，我们这部分人才离开母校——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

## 我们看见了徐老

赵如彬

我们在边区中等国文课上，知道了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听到了徐老的好多故事，我们很渴望见到这位奇特的老人。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风声很紧，中央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一些机关。不久，徐特立、郑位三、王明、陈谨崑等来到绥德师范，住在西斋一屋。我们班住在同斋的二层，有幸随时能够目睹徐老的风范。徐老身姿端正，银须白发，容颜红润，慈祥和蔼。

他穿着一身粗布灰色军服，两只袖筒上打着补丁，一双灰布棉鞋的头上也开了花，从外表看去很像一个普通的老兵。他们有时在工作或学习间隙走出窑洞，围坐在门前的一个小石几的周围，交谈着，争论着。徐老在谈话时，喜欢用手势来帮助表达情感，有时还激动地站起来，发出哈哈的笑声。这笑声也感染得我们不禁跟着他们笑起来。他们说什么，辩什么，我们所不清，也不大关心，只是稀奇这么一个看去极平凡的老人，竟是毛主席的老师，总想在他身上找出什么不平凡处，但始终没有发现。就是这位老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毅然走进了革命队伍；就是这位老人，在苏维埃时代，利用公余之暇，提上篮子去挖野菜吃；就是这位老人，在长征路上让马驮着书，他跟着马儿跑。我们看着、想着，想着、看着，觉得他的身影越发高大了。

徐老虽年事已高，却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如果不看他的须发，谁也不会相信他已是年届七旬的老人了。有时，见他从书店或街上的小书摊的人群中走出，左臂下紧紧夹着刚买到手的新书，那样子像是捉到了一只珍禽，唯恐飞跑；又像是带着什么珍贵器物，唯恐损失，不时扭头看看，用右手扶一扶，顶着风寒，急匆匆地向前赶去。从街头到绥德师范，途经又长又陡的二郎庙石坡时，他身体向前微倾，走得飞快，像跟时间赛跑似的。那坚定的步履，显现出一位久经跋涉的老战士的雄姿。平时，起早值日的同学见到的徐老，又是另一种风姿。他气宇轩昂，临境远眺，好像在深思着国家大事。这时，同学们只怕打乱他的思绪，便悄悄地离去。记得还有一次上国文课，以治学严谨而著称的李登霄老师（李子洲的弟弟）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精神显得有点疲倦，脸上却堆着幸福的微笑。同学们正在纳闷儿，只听他说：“昨天，徐老同我们谈编写教材、改进教材问题，从上午十点直到下午四点。老师们坐得腰酸腿困，可是

同大家坐一样的硬板凳的徐老，却精神奕奕，侃侃而谈，我们连伸个懒腰也不好意思。后来，丁（子文）校长多次请他到家用餐，他才离开了会议室。”李老师停了停，赞叹道：真是“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徐老没有架子，态度和蔼，谈吐风趣，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在学校大礼堂给我们讲关于学习与群众路线问题，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深入浅出，给人一种亲切、朴素的感觉。他趁会间小歇，从台上下来，走到学生中，问能不能听清他的口音，能不能听懂内容，讲得快慢怎样……我们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老人家还不放心地笑着说：“可得讲真话喽。”同学们轻声议论：徐老是说到做到呀。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活动时，我们几个同学在宿舍玩，听到门响，“嗨，徐老！徐老！”同学们忽地一下子站起来，鼓掌欢迎。徐老笑哈哈地接过递来的凳子，连声说：“好，好，都坐，都坐。”隔壁宿洞的同学也闻讯跑来，聚拢在他老人家的周围。徐老问了在座的每个学生的简况，当听到小李是从沦陷区来，顿时，他夸赞道：“人小志大，渡河干革命，将来争当模范。”四周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抢着说：“不，不，当英雄！”徐老慈祥地笑着回应：“好，好，当英雄。”停了停又板一眼地说：“模范的路长啊！……”他老人家跟同学们亲切地拉着话，谈话中还插入一些小故事和笑话，不时激起同学们的笑声。

钟声过早地响了，我们恋恋不舍地送他老人家走出门。没走几步，徐老回转身，抬起双手，又朝下压了压，示意我们可以止步。同学们说：“徐老，再来。”“再来，徐老。”他微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吃饭时，同学们围成好多个小圆圈，曾经在场的同学怀着难以平静的心情，自豪地绘声绘色地描述同徐老谈话的情景，没有在场的同学带着遗憾的神情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也分享这难忘的幸



福时刻。

说也巧，没过几日，一天晚饭时，徐老来到我们的露天饭场，关心地问同学们能不能吃饱，有没有肉，吃多少菜……大家抢着——做了回答。徐老应接不暇地认真听着，满意地点着头。他还风趣地问：“没交伙食费，有饭吃嘛？”我们一齐高兴地鼓起掌：“欢迎、欢迎。”可是没有多余的碗和筷子，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焦急中，徐老顺手拿起一位同学用过的筷子，在我们的菜盆里夹起了菜。

“呵，还没洗……”在场的同学都觉得怪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徐老边夹菜，边乐呵呵地风趣地说：“老少一碗菜哟。”他老人家不以为然地说，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充分理解的心情，我们顿时感到安慰，深为徐老对同学的关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动。

不久，党中央把徐老接回了延安。徐老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多么渴望再有机会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 回忆在绥师的有关情况

马 龙

1947年春季，我从绥德实验小学考入绥师。解放战争实际上从1946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我在实验小学的最后半学期，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绥德城，学校不能在城里上课，每天到落雁砭、辛店等地山沟的土窑洞上课。1947年在绥师上学时，一开始就遭到敌机的轰炸。当时绥师的宿舍有的窑洞就与防空洞连在一起。吃早饭时，将饭桶抬到防空洞门口，听到警报钟声或者飞机声音时，端着饭碗就往防空洞里面跑。当时，学校生活十分艰苦，每天两餐小米稀饭，

没有青菜吃，就用黑豆煮熟拌上咸盐下饭。晚上自习点的是青油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形势更加不利。敌人已占据了延安，并且向绥德进犯，学校开始转移。我们三十二班的学生，首先转移到了家沟的窑洞里上课，晚上住在丁家沟的村子里。不到一个星期，在一个天气阴暗的下午七八点钟，我们全班同学背着行李，经五里店坐木船过无定河，向无图沟方向走去。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是听见有狗叫的声音，想象着又到了个村里。当时谁也不戴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又走了很长时间，听见有鸡叫的声音，想象着天快亮了。我们也实在累得走不动了，队伍一个人连着一个，要不是后边的人碰上前边的人，一停下步，站着就睡着了。遇到过河及难走的路段，一个人手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大约在天亮的前后，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住下了。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窑洞里，靠着行李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快晌午了，这时开始吃早饭。因为害怕敌机骚扰，白天不能行军，到了下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又开始了一夜的行军。大约走了四五天，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学校通知我们，年纪小的不能坚持的可以回家，等到学校有了固定的地址，再通知你们来校。因为那一年我只有十六虚岁，就和几个同学离校返家。记得有一位同学叫林树森，从家中拉来一头毛驴，帮助我们驮行李，快到他家时，我们就背着行李回了家。

我到家的当天下午，我们村子里只剩几个人，大多数人响应政府号召，坚壁清野。距城十里以内村子的老百姓都疏散到30里以外的地方，粮食和东西，带不走的就地掩埋。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回村搬东西，我就跟着连夜到了宋家沟（在大会坪东北方向，距城约30里）。不久，敌人第一次占据了绥德城，不几天就逃跑了，搬回了延安。（以后学习党史才知道，我军蟠龙一战，截断了敌人的供给线）大约在八九月间，敌人又一次占据了绥德城。这次驻扎时

间有两个多月，我记得当时玉米已能吃，高粱正在出穗，敌人下令将东门滩的庄稼全部砍掉修飞机场，准备在“双十节”（十月十日）通航。但就在这几天，敌人又逃跑了。（以后学习党史才知道，我军打下清涧后，敌人又逃回了延安）。这个学期，学校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估计敌人走后不久，学校返回原址。

1948年春节过后，我在现在的绥师校址找到了学校。当我在门口传达室说明情况后，一个人回答说：“还得考试。”当时的我非常老实，不知道找班主任证明一下，心想反正我的成绩上等，不怕考试。就这样，我又经过考试录取。这时的学校名称是“绥米中学”。学生很多，我记得上课时，四路纵队站了半个操场（在当时的食堂东边），学校领导记不得了，只记得老师中一个叫沙根、一个叫尚英（即巩重起）。学校除青年班外，还有地方干部训练班（区、乡不脱产或半脱产干部，经培训后派往新解放区）。当时绥德分区党校也设在此校。

1948年的春季形势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开辟的解放区需要大量的干部。学校考试的口试中有一条：“分配工作你服从否？”如果服从，考分低一点也录取。否则，考分高的也不录取。我记得有一考生的成绩比我好，就因此背着铺盖放声大哭，离校回家了。

开学不久，学校通知我们几十人“你们被分配工作了”。当时学校生活十分艰苦，不要说吃肉吃菜，就连一顿白面面条也吃不上。但是，欢送同学可以吃一顿白面面条作为最好的礼物。当时没有鼓风机，下一锅面条，只能十几个人吃，有的人直到中午过后还未吃到。早上吃过的人，到中午又想吃，接着再吃，一直吃到下午才算吃完一顿饭。第二天我们就由领队同志带领，走了一整天，到了当时的陕甘宁晋绥军区联防司令部驻地刘家川、马家川一带参加了工作。延安光复后，回到延安，开办了机要训练班，毕业后分配了工作。

## 战火纷飞中的绥师

张继成

1947年初，我16岁，独夫民贼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惨遭失败，变为所谓的“重点进攻”，集中重兵进犯民主圣地延安和山东解放区。正当胡宗南部、青宁二马、榆林守敌从南、西、北三面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压来的时候，我转入绥德师范继续上学。从3月初开学上课到7月间我参军离校，适应战局变化需要，绥师一直转战于绥德、子洲、米脂、佳县直至东渡黄河破口的山村。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每每是夜行昼宿，连续转移。而且只要环境允许，始终坚持教学活动。当然，那是打破正常教学秩序，完全纳入战争轨道的教学活动。课堂是当年抗大留下來的破窑洞，或者古庙里或者老乡打粮场畔，或者山村沟岔。老师站立高处，既教知识，又教做人。学生面对面席地而坐，既认真听讲，又仔细记笔记。这种战时的特殊教学生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在师生心灵深处孕育下艰苦创业的红色种子，为后来花繁果硕、茁壮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回首时隔了45年的这段经历，历史上的这一页，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那时候的足迹，还是依稀可见，令人欣慰。前辈的召唤，似乎铮铮可闻，催人奋进；校友们的音容，依然栩栩如生，难禁思念。是的，生活像万花筒，像大海洋，多姿多态，宽广深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当年风华正茂、奔波于各种斗争疆场的校友们，变成了雪染双鬓、年过花甲

的长者。在当今改革大潮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弘扬传统，开拓前进。回忆解放战争初期在绥师的点滴往事，也许略可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引起幸存校友们更多更深的回忆与研究，我就欣慰于怀了。借此机会，向曾经并肩战斗过、已经作古的杨达、任雄士、刘荫林、周裕祖老师和魏瑞祥同学致哀！

## 一、动员备战 关注战局

记得入校时老师出的第一篇作文题，是给榆横战斗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作文题。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平的土地上，燃起了熊熊战火。边区军民被逼自卫，绥德分区军民12月发起向榆林、横山敌人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绥师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战斗，鼓舞和教育了全体师生。当胡马匪军以23万之众进犯边区时，绥师全体师生顺理成章地开展了坚壁清野、战勤服务、军事常识教学、战时思想教育等备战活动。其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慰问我军榆横战斗指战员，更具切身教育意义。同学们通过那样的作文，更能启发思索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便于抒发战后的情感，积极诱导投入自卫战争的自觉性。记得作文交卷后，同学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猜度出题老师的本意，切磋各自作文的写法，议论作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等。显然，老师们教学中的良苦用心，当时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有的同学表示要将自己的零花钱给指战员买慰问品，有的说再遇战斗“我也要上前线”，有的说“大事我干不了，给伤员送饭、打水调能成”，有的说“我给指战员们唱歌、说快板”……这些决心、诺言，后来都变成同学们踊跃参军、参战、参加战地服务团、参加宣传队的实际行动了。

## 二、撤出绥德 转战山村

3月初春，学校开学上课。仅半月左右时间，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对此，尽管人们早有思想准备，但也毕竟引起了空前震惊。尤其是敌机开始轰炸绥德城，同学们亲眼看见炸弹成串地落下来。挂在绥德城东门墙的大铁钟，不时响起令人心慌的警报声，同学们难免人心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头等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校的政治课对大家影响最大。杨达老师讲述了我们的战略战术，以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死守在一城一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所以，暂时撤出一些地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陈士斌老师还讲了撤出延安有延安，守延安没延安的道理。对于如此深层次的辩证法，我当时是消化不了的，只是囫圇吞枣。但我崇拜老师们的博学多才，深信他们讲得对。不管怎么样，学校这样教育，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为以后一系列适应战争形势的举措，理顺了思想认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久，奉上级命令，调一部分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护理伤员。起程那天早晨，学校师生整队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沿街欢送上前线的同志，经过南关直到二郎山脚下。从这时候起，留校的师生也难以安心教学了。敌机每天来轰炸，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拂晓前抬着饭桶去十里外郊区，在当年抗大分校留下来的窑洞上课，傍晚才回校食宿。疯狂的敌机，乱扔炸弹，我们在城郊窑洞里上课时，也遭轰炸，尘土落在师生身上。正在上课的吕鼎锡老师，抬手拍打肩上尘土，眼腥红润起来，说：“这正像蒋介石的和平烟幕弹，迟早总要显丑的！抗战时期，日军也扔过炸弹，最后还不是投降了吗！胜利者是中国人民呀！”就这样，我们始终坚

持上课，当敌机走了以后，我们又回校将重要的图书和仪器转移至壁起来。为了抢时间，在转运时，尽走捷路，即从学校西面下山，跨过小理河，直接进入山沟。那时，没有什么搬运工具，同学们摩手擦、怀抱、肩扛。只要是硬皮的、精装的书，就认为是好书，先转移。我们步履艰难地下山、过河、上坡、进沟。一不小心，书籍掉在地上，沾上泥土，同学们又用手甚至衣袖拭泥土。唯恐损坏了学校的财物，充分反映了师生们的一片爱心。

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随着战局变化和工作需要，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我们学校也随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打游击。开始向西（子洲）转移在避开川道的山沟里，分别住在农民家中，吃“钱钱”饭，自己担水劈柴，还为房东挑水、扫院，大家都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离去时还清所借物品，扫净房院。房东说：这些学生娃很好，以后需要时，欢迎再来。在这里住了不几天，整个战局有变化，学校又折东往黄河方向转移。先在米脂农村，后到佳县山沟。由于长途行军，气候也渐暖和，学校动员轻装简行，要大家将棉衣、被套送给老乡或坚壁起来。这尽管是战局需要，势在必行；有的同学还是想不通。学校在耐心说服的同时，还号召同学们互相帮背行李。我帮我们班的薛芝芳同学背毛毯、被褥，终于掉了队，前面走远的人又返回接我。眼看非轻装不行了，才把薛的和我的行李一起送了老乡。我送人的衣被中，有件皮大衣是爷爷送我的。他老人家曾被白军打伤脊椎骨，留下后遗症，雨天腰疼。为了暖暖，他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外甥尚振发，赠送了这件皮衣。他舍不得穿又送与我。当时，我实在不忍丢掉这“传家宝”式的皮衣，而迫于形势，才忍痛割爱了。本想革命胜利后重新给他老人家买件更好的皮大衣，可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是供给制时期，他已作古。噩耗传来，联想起尚未给爷爷买皮衣的憾事，我不禁潸然泪下，泣不

成声。

轻装简行后，接着就是男女生分开编队，班级混合编队。且用代号，男队叫“山东”部，配发了枪支弹药，负责打前站和后卫，女队叫“四川”部，帮助后勤和照顾病号。从此以后，学校同上级联系多起来了，掌握情况也及时了。当转移在绥德县古镇附近的崖马家沟时，得知学校转移前坚壁埋藏了物品，被未跟上学校转移的败类挖出来私分了。我们“山东”部的部分师生连夜行动，追到其家中做了搜查，证明他们是案犯。第二天早晨村干部安排我们在农民家中吃饭时，正好遇上绥德县游击队的几位同志，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嘱咐我们将案犯狠狠教育一顿，交给乡政府后尽快返回学校去，这里不能久留。我们照此做了以后，当天连夜返回学校。

敌人占延安，虽无损我大局，也难挽蒋家王朝灭亡命运。但毕竟是熊熊战火在陕甘宁边区和平的土地上滚滚燃烧起来。胡宗南北进，青宁马东犯，与榆林之敌形成犄角态势，遥相策应。一时大军压境，气势汹汹，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边区千群，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他们组成千百万小型游击队组，监视、偷袭敌人。时而打冷枪，弄得敌人满腹狐疑，胆战心惊。边区军民的勇敢对敌斗争，有力地鼓舞了师生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夜间行军中多次遇上大雨，道路泥泞，滑倒在地，爬起来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进。这种战斗生活和友爱行动，冲刷着“娇”、“骄”二气，师生间团结得坚如磐石，战胜了诸多困难，走过了若干山穷沟岔，每次都胜利到达目的地，没有一个掉队的。在转战子洲、绥米后，到了佳县炮韩峪渡口附近的李家坪。转移来这里的边区经融、贸易部门的职工很多。吃菜很困难，只有水萝卜，吃得多了损伤肠胃，不少同学拉肚子。尽管困难重重，学校还是千方百计做病号饭——稀软面条。在李家坪，环境安定一些，又紧靠渡口，人心不慌，学校便全



面复课。并且动员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了解社会上的一些动态，我便参与了这种活动。偶然之间，见到小时候的好友霍学浩，他腰插小手枪，任务是专门护理战斗中负重伤的我军某团长。他还领我拜见了这位团长。团长让我抽香烟、尝罐头，说：“这些用品和学浩插的手枪都是战利品，蒋介石是个像样的运输队长么！”同学们已捆好行李，还到处找我呢。我一问，才知道今天务必东渡黄河。

### 三、东渡黄河 复课山西

1947年5月上旬，学校奉命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离石碛口镇栖身。同学们多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养育大的。现在，边区人民正忍辱负重，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公务战勤、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敌人入侵时又遭受打家劫舍、奸淫掳杀之苦。此时此刻，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实在不忍撤离这块土地。然而，军令如山，必须服从。我们含泪惜别边区人民，仓促上船。那时候乘的是老式木质船，浪大流急，超载摆渡，不少同学晕船呕吐，女同学竟哭出声来，好在船工都是精选的老舵手，我们终于安全上岸。碛口镇环境比较稳定，同学们急于复课。除了各班级上自己的文化课外，共同的课程内容是围绕战斗问题。讲课的老师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笃彦同志（离休前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他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战争是实力的较量，战争是智慧的较量……四十多年了，我始终铭记周老师的讲述，认为他讲得很好，有深度。

在碛口听群众议论：“抗战八年，我们山西老百姓始终在河东坚持和日本鬼子斗争。现在胡宗南刚进攻陕北，你们这些年轻人就躲来河东，这合适吗？！”同学们内心很不平静，有的提出要回陕北参

加战斗。恰在这时，学校参加战地服务团的部分同学，随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转至磧口镇以南20里路的陈家山。我们很快去陈家山医院看望他们。我们班的薛芝芳（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兰州陆军总院任护士长）、高义同学讲述了前线很多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故事。有个战士左腿负重伤，已无法走路，他从战友手里要来一堆手榴弹，连续扔向疯狂进攻之敌，终于打退了敌人。当卫生人员赶来为他包扎伤口时，他已停止了呼吸。医院的同学见我们兴趣很大，索性领我们进病房，请伤员们现身说法。于是，扶着拐杖，甚至除眼睛、嘴外，整个头、面部包着纱布的伤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英勇杀敌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快被编成教材，有的经过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成为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武器。

#### 四、歌颂三捷 揭露敌人

同学们栖身晋绥解放区，可始终怀念陕甘宁，总想向当地群众宣传边区军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意志和英雄事迹。起初，仅是一般的口头宣讲边区游击队和民兵活跃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击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后来，粗作艺术加工，搬上舞台，主题是“歌颂三捷，揭露敌人”。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撤离延安后，从3月25日到5月4日这40天时间内，西北野战军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进行了三次歼灭战，取得了歼敌三个旅14000人、俘敌10个少将的重大胜利。我军打运动战，创造了以少胜多、歼敌有生力量的战争奇迹！边区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扰乱敌人视线，又封锁消息，使敌人成了瞎子、聋子，积极配合了“三战三捷”。另一方面，胡马匪军所到之处，百般屠杀无辜人民，真是生灵涂炭，鸡犬不留。

我在三公的同学卜爱保烈士，为了坚壁贸易公司的物资掉了队，被敌人抓获，打得遍体鳞伤，他始终没有说出物资埋在何处，竟被敌人活埋了。

我们占有了这些素材，自编、自导、自演了《做军鞋》、《送公粮》、《抓俘虏》等节目，首先在磴口镇戏台上演出。观众人山人海，反响强烈，他们说：“这些学生娃蛮能行！看来，陕北军民把敌人治住了！”从此，当地干群对我们热情起来，由商会出面，为师生们改善伙食，煮了一大筐萝卜面馒头，让大家尽饱吃。群众的热情，又使同学们受到“为了打倒蒋介石，全国人民心一条”的教育。我们的演出有了点名气，陈家山医院和附近群众，都请我们去演出。记得在医院演出时，伤员们举起拐杖高呼：“坚决保卫毛主席！”“用生命保卫党中央！”“重返前线剥胡儿子的皮！”……

撤出延安后，党中央始终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迅速扭转了陕北战局。我军兵员得到补充，装备有所改善，士气高昂，愈战愈强。为庆祝三战三捷重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数万军民5月间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周副主席、彭老总、习仲勋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周副主席以震撼世界的声音宣布：毛主席仍然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大会以后，西北野战军挥戈西进，进行陇东战役，迅速收复了将台、悦乐，歼灭宁马两个团。此时，绥德、米脂一带暂时相对稳定了。适应形势需要，我们又奉命西渡黄河，回到陕北，接受新的任务。

## 五、参军途中 备受教育

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回到陕甘宁边区，好像凯旋，我们心

情舒畅，眉开眼笑！

我们回到边区仍住佳县螭螭峪附近的李家坪村。这里的兵工厂正在加紧为前线制造武器。我们在山西演出的《做军鞋》等节目，在这里再次演出。在揭露胡马匪军的节目中，有这样的唱词“疯狗疯狗，横冲直撞，到处抢夺，杀人放火！”这歌声，引起了工人們的共鸣，因为他们的家乡已被敌人占领，父老兄妹们已经和正在遭受敌人践踏。所以，一时之间，群众中流传开了“疯狗杀人放火！”等讨伐匪军的歌曲。这种情况，引起上级重视，要从绥德师范调人去军队搞文化工作。

一天晚上，刘荫椿老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甘肃纪委处长）找我说，现在前方需要文化生活，你参军去是合适的……我本来就想参军去，马上问她，在哪里报名？她回答说：“党支部。”第二天上午，在李家坪山梁破窑洞召开支部大会，正式动员参军。在会议中间有人便争先报名了，我当时也报了名。学校规定参军者凡是带枪的同学，把枪交回学校。我思想不通，因为那支枪，伴随我到山西，又回陕北。我也懂得了枪的重要性了。支部书记劝我将枪移交给留校的同学，说前方有的是枪……

当时，西北野战军已开始进行陇东战役。参军的同学应向西北野战军前线总政治部报到，但必须按组织层次逐级报到，先去中共绥德地委报到。

参军起程那天，学校为我们佩戴红花，敲锣打鼓，整队欢送。带队的叫郝登玉，他前不久从延安大学转来。他的年龄大，入党早，有经验，决定当天行程80里去绥德义合镇宿营。家在义合周围的同学，可以顺便回去看一下，第二天必须赶到义合集中。我家在义合附近。我回到了村里，得知不少青年人已参军或者支前去了，其中张荣生、卜荣保已经牺牲于前方，尸首装在毛口袋运回来了。妇女

们忙于做军鞋、晒公粮，人们“一切为前线服务”。我渴得很，揭开水缸，缸里空空的，我先挑了两担水，才向哥哥谈起参军的事。他愣了一下，才肯定地说：“你去吧！这年月，不参军活不下去。”晚上，哥哥陪我去寺墙里向刘文表姐告别，表姐送我双新鞋和一元钱。我们连夜回家，翌晨赶到义合，召开了党员会议，大家表示遵守纪律，保证完成任务，为绥师争光！并宣布当天的宿营地是绥德城东二十多里的一个拐沟里——绥德地委驻地。地委组织部负责接待我们，由他们办理有关手续。组织部对参军学生非常关心，伙食也很好，每天吃白面。那种环境，给我们吃白面，是特殊照顾。从给我们吃白面，组织部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敌人5月初侵占绥德仅只四五天就急忙南逃了。为什么呢？我军在羊马河战役中，获悉敌人企图压迫我主力军东渡黄河。毛主席立即命令西北野战军利用敌人这种心理，投其所好。以少部兵力将敌人主力诱往绥德地区，然后夺取敌人规模极大的蟠龙兵站。我军某旅在郭鹏旅长的率领下，假装西北野战军全部的模样，作出一副给养困难，不堪其扰，要从清涧向绥德撤退，沿路故意丢失枪支弹药和假番号，显示出要急于东渡黄河退入晋绥解放区的态势给敌人瞧。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又命令黄河两岸守备部队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使敌人侦察到我军东渡情报。这好比演戏，我军某部演得很像，敌人果然上钩了，以九个旅兵力急忙向绥德“追剿”。结果他们扑了个空。这时候，隐蔽在瓦窑堡以南的我军主力，立刻攻打蟠龙兵站，守敌用无线电向远在绥德之敌求援，胡宗南也电令绥德之敌增援蟠龙。所以，刚到绥德之敌只好慌忙南回。当敌人还在半路时，我军便攻克蟠龙兵站，全歼守敌一个旅，缴获1.2万袋面粉、4万套军衣和其他很多物资。西北野战军从战场上取得如此丰裕的物资补充，还是第一次。真武洞祝捷大会上展示过这些战利品，去的人都看见了。这两天招待参军学

生吃的白面，正是蟠龙战斗的战利品！

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听到我军这样高超的战术，获得这么重大的战果，高兴得眉飞色舞，恨不得当天就到军队去。但地委的答复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他们只能介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西北局当时驻在子洲县马蹄沟，途经绥德县城。上级规定，路过绥德时，只准和游击队接头，不准去别处。我想顺便回绥师看一看的愿望，竟成泡影了。正闹情绪时，巧遇舅舅刘海江（现在西宁工作，他当时在绥德公安处工作，战争爆发后，一直跟地委活动），对绥德一带的情况很了解，严肃叮嘱我：必须按上级的规定办事，否则怎能参军呢？！路过绥德时，不能久停，严防敌机空袭……我们告别了地委，走到绥德城时，恰巧来了三架敌机，绕了几个圈，大概未发现什么目标，扫兴南飞了。在绥德城内杏树圪塔，我们找到了游击队，又遇上我叔叔张培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康乐、宁县县长）。他一身农民装束，在外衣下缠一串手榴弹，怀揣驳壳枪，看样子准备随时出征上阵。他介绍绥德到马蹄沟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时，突然来了一位也是农民装束的青年人，立正向他报告：“地委通知要你带人很快去九里山一带侦察！”我这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他问：“有啥困难？”我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期望，走路慢！”他二话没说，解下黄灿灿的绑腿，给了我，我问：“那你怎么办？”“这是胡宗南运来的，他还会送来……”话还没说完，他就向已集合将出发的队伍跑去。见游击队这样紧张，我们也很快出城上路，沿小理河西进。走到砭上，才吃了几把炒豆子，喝了几口河水，然后快步前进。当日落西山时，到了马蹄沟，住在有门无窗，地上铺麦草的破旧窑洞里——西北局组织部临时招待所。

## 六、子洲焦急 靖边入伍

到了西北局组织部，我们总认为就会马上介绍去军队了。不料西组部要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段。事后才知道，当时西北野战军正在进行三边战役，然后去攻打榆林，途经马蹄沟。所以，让我们在此休息等待。唯因部队行动是军事秘密，不便告诉我们。

马蹄沟、双湖峪、运检寺、周家硷、青阳岔一带是子洲、子长、横山三县交界的百里川道，小理河沿川顺流而下入无定河，是黄河的支流。1947年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曾两次途经这里。再往前追溯，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常出没于这里。1935年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合召开的周家硷会议，将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参军的学生，在马蹄沟等待去前方的命令，的确焦急不安，几乎每天都催促要走。而西北局组织部总是说：“再等几天吧，先组织你们学习。”那时候，西北局、边区政府都驻这里，人很多，也热闹。陕甘宁边区《群众报》社驻地离我们很近。报社虽然只出油印小报，但前方的战事新闻不少，这对近半年来一直游击于山沟、消息闭塞的学生们来说，真是雪里送炭。大家手不释卷地争着看这张油印小报，上级也派姓杜的科长来讲少许战争情况，还布置我们抄写宣传品。但毛笔、墨砚难找。在设法克服困难中，猛然忆起我在三边公学的同学袁世清就是马蹄沟人，从他家里借来了笔、墨、砚，开展了抄写工作。当时抄写的主要是真武洞祝捷庆功会后，我军挥师西进陇东转而北上三边，攻击马家军。在攻克收复环县时，敌人顽抗；收复合水时，敌人打出白旗，玩弄假投降，都被我军粉碎。

马蹄沟川道里生产小盐。盐民打了很深的井，将井水洒在加了

工的教土上晒干，就能得到似雪花形状的食盐，食用很香。我们参军的同学，乐于帮助盐民往上打水，造食盐，求得多产，维持机关食用。这时，有的同学竟发牢骚，说：“参军为了打敌人，收复延安，早知在这里打井水，制造食盐，我可不报名！”这种不满情绪传到西北局组织部，人家才告诉真情，拖着不让我们走，是等野战军靠近这一带时，再去报到，比较安全。那时候，西北野战军前线总政治部已到靖边县张家畔，这才允许我们去报到了。还交代了行军路线，严格要求按指定路线走，特别是到了青阳岔以后，绝对不能走错路，因为南面就是胡宗南部队。西组部开了介绍信，我们连夜准备，翌晨出发西进。到了青阳岔，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人们转移到离开川道的山沟里暂住，过去住人的窑洞，现在缺门短窗，到处凄凄惨惨。原来是不久前这里被胡匪军洗劫过。天黑了，我们啃了点干粮，也不敢进窑洞，乘月光睡在群众打麦场里，半夜间还下了一股阵雨，雷声警醒了我们，但也不敢离开麦场。天不亮就上路了。川路走到头了，要爬上高原走沙漠。实在饿得很，好容易在半山坡上找到一户老乡，他家只有黑豆，我们自己挑水煮豆子吃。老乡观察到“这些娃娃们不像胡匪，是打胡匪的”，便自动把悬挂在院墙上碗口大的嫩南瓜摘下来给我们当菜吃。我们正狼吞虎咽吃瓜豆时，突然来了几个带枪的人，虎视眈眈地喊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知道这一带没有敌人，又从衣着上认定他们是游击队，所以傲慢地答道：“是自己人！”“哗啦”一声，对方子弹上膛，我们慌了，连忙递过西组部给前线总政治部的介绍信，他们似乎看不懂，又像不相信，指着盖印章处问：“这圆坨坨是哪里？”我们耐心说明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这还不行，人家又盘问：“西北局组织部长是谁？前线政治部主任是谁？”我们对答如流：“部长叫马文瑞，主任是张德生。”他们才退了膛，缩回枪，而且关照我们说：“到了杨桥畔时，



有游击队司令部，你们可在司令部吃饭。”我们这些书生，经过这番折腾，虽然心跳了一阵，但总觉得这天下还是我们的。

到了张家畔，西北野战军前线总政部就在这里，我们高兴地跳起来了，豪迈地感到这才真正是“我们的天下”了。到处是解放军，枪炮林立，电线成网，肩扛步枪的，腰插手枪的，敲竹板说唱的，腰挂墨水瓶的……人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各忙其事。我们领略到身处自己大本营，再也不担心安全了，真是无限自豪。

我们去前总政治部报到，接待我们的是前线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惠庆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平凉地委书记、全国合作总社人事司长）同志。他是清涧人，乡音很浓，倍感亲切。他告诉我们，西野正在柠条梁到张家畔一带休整，你们先休息两天，今晚看演出，以后再定工作。他的这几句话，像暖流一般，从头顶灌到脚底，好比是到父母身边那样的亲切而温暖。当晚演出歌剧《红布条》，主题是解放军纪律严明，军民心连心。内容为某日下雨，解放军路过一家户，原拟进房避避雨。但见门帘上挂着红布条，就没有进房。因当地风俗生了孩子不让生人进去，挂上红布条，表示有“月婆”。群众看见解放军在野外淋雨，便想方设法解决避雨问题。演出中观众连呼口号，部队高呼“子弟兵爱人民！”老乡们也喊着“民拥军一家人！”……说实话，那时候，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热烈激动的场面，更不知道跟哪方面呼口号。跟上部队喊么，我们还没穿上军衣不像军人。跟上老乡喊么，我们又坐在部队之中。于是，扮演了“骑墙派”，两方面的口号都喊！自己也觉得滑稽而低头大笑。

当再次见惠科长时，我们的工作已分配好了。有的去宣传队，有的去医院，有的当文化教员。我被分配去新华通讯社西北前线野战分社工作。我平时看报纸常见“新华社×日电”字样，当惠科长问“有啥意见”时，我反问他：“新华社是办报的吧？”他答：“报

纸也办个。”参军的同学都很服从组织分配，当天就分别报到。我也再没提任何意见，领上介绍信就走。野战分社也在张家畔。我去报到时，首先同我接洽的是支部书记毛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同志。他说野战分社正总结撤离延安以来的通讯报道工作，让我跟着听。会场是在老乡院里的树荫下，大家席地而坐。编辑记者们一会儿说青化砭战斗报道及时，一会儿说羊马沟战斗报道不全，一会儿又说陇东战斗报道零碎了等等。有些同志还气呼呼地诉说有枪没子弹，有马没鞍子……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兴趣。便悄悄溜出去看部队摔跤、“捅刀子”（其实是战士们练擒拿术和拼刺刀），越看越出神，竟忘记开会。回分社后受到毛岚同志严厉批评：“你是军人了，怎能乱跑？不守纪律要处分！”我害怕了，不敢说一句话。当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拿定主意——愿受处分。起床后就找毛岚说：“给我处分吧！”不料，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又拍了拍肩膀，才郑重地指出：“分清是非就行了！今后可要遵守军纪。这次是初犯，只批评不处分……。”我这才松了口气，以后再没敢乱跑、乱看，乖乖地参加学习彭老总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的讲话。

部队在张家畔休整期间，还肩负着另一重任——保卫党中央。那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离张家畔不远的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命令西北野战军夺取敌人在陕北的重镇榆林，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策应刘邓大军南下，陈谢大军挺进豫西，把全国战场引向敌占区，展开外线进攻。

时值1947年7月底，我由一个青年学生，穿上了人民解放军军装，参加了榆林、沙家店战役，一直打到兰州。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一直投身于祖国的甘肃这一块土地上，医治战争创伤，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 七、绥师花果 开结四方

母校建校 70 年来，为祖国培养了成千上万人才。他们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作出可喜成绩。且不说别处，仅就甘肃省兰州就有任雄士、周笃彦、刘荫棣、周裕祖、霍仰山、郝锦亭、田泽民、蔡运盘、钟圣祖、拓家林等三十几位校友，分布在党政、经济、文教各条战线，曾经或现在都是所在单位的排头兵、决策者，奉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共产主义大厦加砖添瓦。他们之中，有的已经作古，在遗嘱中写下了肺腑之言：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有的仍在一线无私奉献着；有的年过花甲，退居三线，仍然余热生辉。所有这一切，既是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也是兑现着为母校争光的诺言。

祝愿母校愈办愈好，培养更多人才。祝愿全体校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弘扬传统，开拓前进，不惹花甲之祸，永葆革命青春！

## 母校绥师的教育给了我精神支柱

马炳房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蒋介石向我解放区的中枢延安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我们第七后方医院在保安县（现志丹县）、安塞县以北的石嘴河收治转送了六百多名伤员。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部分伤员痊愈出院，重伤员也明显减少，伤情大大减轻了。这时医院接到了

转移命令，所长林刚给大家做了简短的动员，他说：“同志们：敌人在继续向我们进攻，上级命令我们随大队转移，现在还有十几名伤员不能行动，需要留下几个同志照顾，留下的同志要化整为零进行转移，切实保护好伤员。”我这个实习医生正好分在了留下同志的行列。

大队走了以后，我们留下的同志一时感到孤单，也不知道队伍和医院往哪转移了。加上谣言纷纷，心里都很不踏实。然而战争的紧迫性不容同志们多想，在副所长陈年的带领下，大伙紧急行动起来，动员当地老乡帮助护送伤员，向保安县山沟里转移。

我们百十号人，其中十几副担架，走起路来队伍也不算小。为了防空袭，我们都在晚上赶路白天休息，一路上和老乡边走边谈，轮换着抬担架。一位老乡问我：“蒋介石、胡宗南在延安能待多久？”我说：“他们长不了，我们一定会反攻的，放心吧！有咱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指挥，保准差不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是呀！别看他这会能，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我反问道：“为啥呢？”

前边一位老乡搭话了：“这行不行要看人心向谁，咱们是一条心，你们来了我们就不跑，有米做饭，没米烧开水。抬担架有人，拉东西有驴。而国民党来了，我们就躲到山里，他们见不到人，寻不到粮，能行吗？”

在保安县的山沟里，我管着五个伤员，其中三个是大腿骨折，一个是腹部贯通伤合并粪漏。另一个是胸部伤，伤口还插着闭式引流管。这五名伤员分散在三条沟的老乡家里，每天给他们换药要走二十几里路，都是早出晚归。有时我和一名护士去，有时我自己背上十字包一个人去。

由于这些伤员治疗过程较长，一时难以恢复，有个别伤员就产生了厌烦和急躁情绪。对此我们有些担心，特别是那伤情较重的伤

员。但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在我管的伤员中有个叫杨有飞的，大腿骨折后一直上着夹板。虽然伤情稳定了，但因条件艰苦，营养和治疗药物跟不上，伤口愈合得较慢。一天护士小韩在换药的路上对我说：“敌机散传单说党中央已退到内蒙古了，让我们去投降。这些要叫伤员知道可咋办。”我说：“谣言终归是谣言，只要 we 和伤员共患难，随时在一起就行了。”可光这样行吗？我俩叨咕了一路，心里没个底。但当我们见到杨有飞时，他却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这么远来看我，天天不间断，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们说这算不了啥，我们留下来就是照顾你们的。换完药，我们又问他感不感到孤单。他回答说：“怎能不孤单哩！现在部队不知转移到哪儿了，我却还在养伤。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住在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房东老大娘待我就同亲儿子一样。”这时灶旁烧火的大娘说：“放心吧！有我在就有解放军在，吃的喝的缺不了！”一席话使我和小韩充满了激动和感激之情，心也就放下了。

山沟里人烟稀少一片寂静，这对于一个喜欢热闹的青年来说是十分难熬的。加上恐怖之谣言流传，我们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工作之余躺在床铺上闭目静思，呵！母校绥师的欢乐之景油然现于眼前，犹如电视连续剧一样一幕幕地闪现着。语文老师在读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下课铃响了，操场上一片龙腾虎跃，真是歌声、笑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绥师同学多么勇敢，背上了铺盖下乡宣传，“钱钱饭山药蛋，住冷窑爬高山，只有大家这样干，才能驱除日本滚蛋”的歌声又在耳边回荡。这是歌声，也是革命者的召唤，也是母校在召唤。振作起来，与伤员共存亡，决不给母校丢脸。这就是能使我在寂静的山沟里苦熬三个多月的精神支柱。

一天中午，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人民解放军获得蟠龙

大捷，消灭敌人一个师。这是我军反攻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伤员和工作人员受到了莫大鼓舞。还听到消息说：我第七医院的大队在转移中迷失了方向，是周恩来副主席派龙飞虎同志把他们接回来的。这一下大伙心里也踏实了。这时我们才清楚地知道党中央就在我们身边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更大的胜利就在前方。

## 老 槐 泪

——回忆绥德师范第二战地服务队在攻打榆林时的片断

白斌华 口述 贺国义 整理

塞上野蒿稀，城头枪眼冷，  
犬吠晓鸡啼，烽火晚塞灯。  
时而弹雨稠，子枪母呻吟，  
小院老槐泪，英灵泣鬼神。

1947年3月14日，蒋介石派八架飞机轰炸绥德城，南门洞完全倒塌了，当时我在绥德师范三十二班上学。学校只得搬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嘴头村继续上课。这时，条件差了些，但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谢永宁老医师在时政课上讲：“我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有利条件是：第一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第二条有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第三条有八年抗日战争消灭日本鬼子的丰富经验，还有……还有不利因素是……我们要用三五年的时间消灭蒋匪帮，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8月，学校组织第二批战地服务队，由周裕祖老师带队（共有51名队员）从嘴头村出发，边齐同志带路，赴和平医院（和平医院已编入第二野战医院；第一批队员换

回，赵如彬、张丙成等人就是这次换回上课的)。51名同学分配到三个所里搞护理，我被分配到第三所当护士班长。同学们年纪小，不懂医务知识，只得边学边干，如打针服药、护理等。51人中只有三个党员。白鸿有是党小组长，白国治（现四医大附二院骨科主任）和我是组员。组织生活不公开，白鸿有经常组织我们秘密开会学习，并在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医院我们除搞护理外，还教不少工农出身的同志识字。9月我们回绥德整装待发。一天下午，我们在响彻四野的军号声中集合在东门滩的飞机场，黑压压的人群整整齐齐地按队列排在场上，好多人低声说：“彭司令员来讲话呀。”我注意着台上，心潮澎湃。一会儿，彭司令员来了，他穿着灰色军装，警卫员怕他凉，又给他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时大家都静静地注视着他，只见他那微方形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他的笑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他向大家敬了礼，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暂息。彭司令员说：“同志们，国民党的二十二军已被我们困在榆林，他们已成瓮中之鳖。”他的声音气吞山河，雷霆万钧。他继续说：“地上交通完全被我们控制，蒋介石还想用几只‘乌鸦’送食养活他的军队，可我们要把它困死、饿死，再用赶杖头支在鳖头上，让他瞪着眼睛死去。我们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为时已不远了……”话未说完，全场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二天，部队向榆林出发。药品器械由骡子驮着，人扛行李前进。沿路人烟稀少，处处是战争气氛，不时看见周围山上的战壕，远远还可听见榆林城传来的炮声。我耳边响着彭司令员的话，真想一步到达，“用擗杖支住鳖头，让他瞪着眼睛死去”。过了镇川不久，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了我们。我们立即沿公路两边爬下，只见机枪子弹嗖嗖地飞着，一头骡子被打死了，我身边一个战士被打断了腿，子弹在我身边“吐吐”地响，飞起一股股尘土。战士们宁可被打死，

也不敢动一动。

第三天，到了三岔湾，离榆林只有15里地。驻地是一个小院子，向南三孔窑洞，两边各有一孔厢房，左边还有草房，右边有马棚，四面有六尺高的墙围着，中间有一个并不坚实的大门，这就是抢救伤员的医院了。院中的一棵大槐树，老槐冠大枝壮叶茂，冠成大伞状，遮了半个院子。我们一进去，苏院长就指挥我们安排床铺，整理器械。

第二天凌晨，送来五名伤员。苏院长虽左腿还拐着，可他简直是拐着腿跑步工作。我们护理员又是拿着器械又是用药，又是递绷带。第五名伤员的手术做好，大概已是10点钟了。我走进中间的窑洞，苏院长说：“这个伤员腿上穿了枪子，从手术看还好。”苏院长刚刚做完五名伤员的手术，榆林城的炮弹声时断时续。他习惯地搓了搓手，又把连日来已熬累深邃的眼揉了一阵，摸了摸他在抗日战争中受伤行动不便的左腿，对我说：“小白，你快点去打点开水，让同志们喝点儿。一会儿伤员来，大家又连水也喝不上一口。”我看着他那坚定而蜡黄的方形脸，回答了一声，就提了壶，向大门外的伙房跑去。

就在苏院长让我打水之时，三架B29型敌机俯冲下来，轰炸了近一个小时。“轰隆”一声巨响，古城发抖，大地也动起来了，炸弹在槐树中间爆炸。“噼噼”、“吱吱”是许多树枝的呼救声，大量枝叶哗哗落下，四周一片昏暗。三个窑洞中的三十多个人发出惨叫和呼救声。我见墙边有一米深的坑子，一下跳进去。这时又是一声巨响，硝烟冲天，轰炸声连续，呼了一声“苏院长”，沙石泥土铺天盖地而来，我在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连续的爆炸声。

当清醒过来，抖掉身上厚厚的沙土，揉了揉难以睁开的眼睛，才看见老槐枝叶满地，老槐残留的一丈多高的枝上挂着一片血衣残



片，血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滴，犹如老槐树那一滴一滴的悲伤的泪水……

再看窑洞和马槽，全成了一堆堆的废墟。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拼命地大喊：“苏院长！”我一步步走着，寻着。我脑海中清楚地记得，这里有老前辈苏院长，还有不知名字的战友、伤员，还有我们一同为伤员服务的吴兴、蒲俊德、师养性、杜士月等三十多位，现在他们……

一卷风从西沙飞起，腾过榆西河向东卷来，大地昏暗了。一会儿风静了，阴云密布，稀稀落落的雨点一点一点撒在地上……

残阳点点血，

老槐声声泪。

石上铸千秋，

书中青史垂。

苏根竹院长光荣牺牲了，当时他才40岁。他是跟着毛主席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成长起来的红军战士，现在榆林烈士陵园的第一烈士就是他。我从医大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回忆中才知道他家中的人口状况：他有爱人和三个孩子，当时在山西革命家属所住着，现在住在北京。

苏院长牺牲后，在米脂举行了追悼会。当时我的耳朵已被震聋，随即到山西去治疗，因此未能参加追悼大会，真是一大憾事。

吴兴同志受了重伤，解放初转业到兰州铁路系统任卫生部长，爱人高大夫也在兰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听说又致残了。

蒲俊德，是我同班同学，当时只有18岁，家在绥德大会坪湾。这次轰炸中，腰被打断，肠子外泄，牺牲了。还有师养性、杜士月（河北人）等三十多位同志都牺牲了。

我是苏院长让我去提水去的，不然也不能幸免。回忆烈士，悲

痛万分，现在我被评为副教授，并且过上了舒适的离休生活。儿子和儿媳妇在北京部队工作，两个女儿也都工作了。我们享受着前辈，特别是烈士给我们的幸福，怎么能忘却他们！

## 厚土育硕果

——记绥师文艺班

黄锡林

绥师文艺班成立于1948年3月，1949年11月调往延安，历时一年半时间。这是一个诞生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的特殊班级，实质上是一支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党的文艺宣传队。文艺班建立之后，除学政治、时事、语文、历史、音乐、美术外，主要从事文艺创作、排练、演出活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她在绥师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 一、文艺班的诞生

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已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进攻。为适应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开辟新区的需要，西北局将原绥德地委文工团调往延安，与西北文工团合并成立了西北文工二团。这时，绥德地区已无新的文艺团体。于是，地委决定再培养一支文艺队伍，一年以后重建一个新的地委文工团，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绥德师范学校。这就成为文艺班诞生的直接的现实原因。

同时，更因为绥师有一贯重视文艺工作的好传统，积累了培养文艺人才的丰富经验，并在积极为前方输送多批文艺人才的同时，注意保留下一定数量的文艺骨干力量。这就成为文艺班诞生的必要的历史原因。

尽人皆知，绥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早在1924年，即绥师的前身四师建校的第二年，在陕北共产党的创始人、陕北青年导师李子洲同志任校长时，绥师就成立了文艺演出会，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和部分教师都曾亲自登台演出，为绥师的文艺宣传活动树立了榜样，开了个好头。

抗日战争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校园的大小斋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抗日救亡戏剧展现在绥师的礼堂和绥德大操场的舞台上。同时，绥师的“战地服务团”肩负着战地救护和战地宣传两大任务，挺进河（指黄河）防前线，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保卫河防。

特别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为绥师的文艺活动指明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文艺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蔚然成风。这时，更可喜的是鲁艺来到绥德，把新秧歌带到绥德。他们深入城镇乡村，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形式，通过广场演出、歌咏活动、墙报漫画、街头诗，宣传抗战、生产、整风、教育等任务，并深入向群众学习，搜集素材，整理民间艺术，及时创作排演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目，轰动了全分区。在鲁艺的带动下，绥师也成立了文艺工作团，积极投身到新秧歌运动的行列之中。短期内，即将鲁艺所编排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减租减息》、《二流子变英雄》、《李桂英纺线》、《赵富贵自新》等一大批剧目学了下来，广为演出。

博得了观众的普遍好评，增强了绥师开展文艺工作的信心，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引起了鲁艺对绥师的关注。鲁艺为绥师派来了语文老师黄正甫、音乐老师周云深、美术老师陈士斌等几位艺术造诣精深的同志任教，进一步将鲁艺的好精神、好作风、好技艺传播到绥师这块文艺园地，开创了绥师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这几位老师遵照毛主席“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教导，带领绥师文工团深入到郝家桥模范村，向农民请教，向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学习，编写出《郝家桥》一剧，就地上演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使剧本日臻完善。到王家坪，采访劳动英雄王德彪的先进事迹，现编现演了《王家坪》，当地群众看后，异常兴奋，当晚各家自发地端来黄（米）酒，通宵达旦，唱起酒曲与文工团员们一起狂欢，度过了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美好夜晚。随后，他们又和同学们一起创作排演了《回娘家》、《红孩女妖精》等剧，均深深地刻在了绥德城乡观众的记忆之中，后者还受到领导的明令嘉奖。剧中巫神的扮演者安全同志三十多年后，来到当年曾演过该剧的铁茄坪采访时，群众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握住他的手说：“这不是那个安全同志吗，你扮的巫神演得真个好。”这一切活动，为文艺班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艺班的前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即1946年秋的榆横战役中建立的“绥师战地服务团”。文艺班的骨干力量也都是在这时期成长起来的。战地服务团建起后，就开赴镇川堡前线，在枪林弹雨中，随军进行宣传演出。一方面以文艺的形式歌颂前方将士的战斗英雄事迹，另一方面用后方人民积极支前的范模事例，激励前方官兵的斗志。回到后方，又不间断地深入各地巡回演出。在1947年一年里，服务团的足迹遍及黄河两岸的广大城镇乡村，演出了《边境上》、《李洪良》、《无敌民兵》、《血泪仇》、《双报仇》、《保卫和平》、《送

郎参军》等大小剧目，自编自演了《参军大联唱》、《活杀人》、《地主装穷》、《一口猪》、《做军鞋》等，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敌人三十多万兵力的大军压境之际，服务团唱出了《蒋介石胡宗南快完蛋》（马富图老师创作）的时代强音，鼓舞了人民的必胜信念，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年秋季，服务团从随校转移驻地佳县娘娘峪出发，在古镇、四十里铺、义合镇、枣林坪、山西靖口镇、寨子山、一步塬等地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方的宣传演出中，每到一地，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收集活材料现编现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次在四十里铺，正值召开欢送参军英雄大会，服务团随到现场采访，即席创作出《参军小唱》为大会演出，引起强烈反响。当唱到“张大嫂你太不对，为什么哭鼻子流眼泪，大哥参军你拉后腿，看你气不气”时，台下的乡亲们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好像那个拉后腿的大嫂就在他们眼前。当接唱“叫大嫂你听我讲，胡儿子来了遭祸殃，杀人放火又抽粮，鸡飞狗跳墙”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细心领悟着歌词的内容。接着又用对比的口吻唱出“李二嫂人夸奖，翻身不忘共产党，做军鞋交公粮，送郎上战场”时，观众不约而同地将羡慕的目光投射到披红戴花的参军英雄及其婆姨的脸上。特别是唱到“咱边区齐武装，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要把胡匪消灭光，全国都解放”时，台下群情激奋，响起了充满胜利在握豪情的掌声。通过这些宣传演出活动，既为扩军任务的完成尽了一份责任，更为文艺战线造就了一批新人。

解放战争前期这批人员成长起来后，于1947年底至1948年春一分为三：王焱（原名王祺祥）、傅纪元、安芝琴、张美茵（原名张富英）、党淑贞、白秉权、马运昌、薛绍良、李正发、武兆瑞、陈雪琴、蒲志宏等人调出补充了西工团；张映台、李佩桐、李守纲、叶龙、蔡运盘、高浩鸣、王仰朴、刘玉章等人调到西北野战军三纵

队独二旅宣传队；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绥师，成为重新组建文艺班的骨干力量。

对绥师文艺班的成立，地委十分重视。在地委文工团调离绥德时，特将安全、薛增禄、张彩萍、白秉权四同志（他们也是绥师开展文艺工作的三朝元老）留下来，和原战地服务团的张德仪、魏瑞祥、黄锡林、叶生（原名叶国治）、田生玉、向音（原名魏吉祥）、王龙以及县剧团调来的任振元、张明良、公安处的田家凤（原绥师文工团的老团员）等同志为核心，又从社会上吸收来梁才（原名梁成才）、刘栋梁、田岸、王艺（王淑润）等，还和从绥师各班中挑选的黄玉和、郝振杰、马生采、高芝如、高鸣黎、魏存让、张保仁、刘荣、刘静（原名刘士杰）、李旺春、顾生（原名顾汉武）、王玉祥、杜庆华、马丽（原名马桂英）、波野（原名臧明山）、苗玉瑞、乔如峰、蔡淑梅、张秀英、霍向栋、李健、汪桂生、王存良、马存林、白高山、吴其江、郝光辉、冯思继、张海宽、刘连生、白应升、王浪超等三十多名同学，组成了绥师文艺班。绥师文艺班就这样，为了革命的需要，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

## 二、文艺班的峥嵘岁月

文艺班起步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剧团。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五十来人。可是，剧团虽小，能演大戏；人员虽少，能唱大合唱。在其存在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文艺班显示出了耀眼的光华，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排演了《模范农家》、《送郎参军》、《宿营》、《睁眼瞎子》、《做军鞋》、《血泪仇》、《刘胡兰》、《周子山》、《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比一比》、《越捞越深》、《无敌

民兵》以及《大秧歌》、《推小车》、《三鞭板》、活报剧《和平宝衣》和《参军大联唱》、《西北解放进行曲》等大小二十多个剧目。演出接连不断，高潮一浪接着一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看家戏《刘胡兰》、《血泪仇》、《模范农家》、《睁眼瞎子》、《送郎参军》以及自编的《做军鞋》、《越捞越深》、《比一比》、《大秧歌》、《推小车》、《陕北说书》、《三鞭板》、《和平宝衣》、《参军大联唱》、《西北解放进行曲》等。这些节目的演出，轰动了绥德、榆林、延安三个地区，轰动了整个陕北。

1949年春夏之交，榆林解放后，绥师文艺班奉榆林军管会的调遣，代表绥德地委，携带上述节目开赴榆林新区，慰劳军队，欢庆胜利，连续演出达三月之久。白天的街头广场开展秧歌宣传，晚上在剧场、学校的舞台演出。每当秧歌队走上榆林街头，观众总是挤得水泄不通。除军管会配备专门干部和士兵维持秩序外，每到一演出点，又不得不用很长时间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往开打场子。1949年6月29日《榆林报》曾这样报道：“27日下午5时，绥师文工团（文艺班）在莲花池畔，于锣鼓喧天、观众拥挤中，开始到榆后的第二次公演。在大秧歌扭完后，他们首先演出《歌唱毛主席》一幕，获得了观众的欢呼。继而演出《两姊妹》、《越捞越深》、《和平宝衣》（活报）等三节目，以宣传我军胜利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假和平阴谋，以及提倡劳动生产为主要内容。因剧情内容的吻合现实需要，形式的新鲜活泼，以及演员表演技术的相当熟练，所以观众人山人海争先抢前，很多人甚至爬在树上，站在楼顶，节目进行了三个多钟头，但群众情绪却越来越高。最后一幕已经演完，大家还舍不得散去。”

1949年冬，绥师文艺班又奉陕北区党委之命，调往延安，与原延安地区文工团合并成为陕北文艺工作团。1950年春节，这支队伍

又活跃在延安街头、南关操场、行署大院和边区政府礼堂，用上述的节目又一次轰动了延安城乡。以至当年冬季，又奉陕西省委之命，将这支队伍连盘端到西安，与原马兰八一剧团合并，成立了陕西文艺工作团。绥师文艺班，其所以能两年迈出三大步，由一个师范学校的期班发展成省级的专业剧团，固然与开辟新区的需要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是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文艺队伍，是与绥师这块艺术园地的培育分不开的。

### 三、文艺班何以叶茂花红

文艺班作为师范学校的一个班，竟能演大本戏，夺关斩将，处处受欢迎，不仅当年轰动各地，就是以后人们谈论起，仍不免要赞叹一番。文艺班何以影响如此巨大、深远，这是有她的必然原因的。

首先是她贯彻了一专多能、刻苦训练的培训原则。文艺班在安全、薛增禄二同志的领导下，要求所有的成员，在三个月内消灭音盲，熟读简谱，达到拿起谱子直接视唱的程度；半年之内，每人掌握一件乐器。当时，同学们学习的自觉性很高，天不明就三五成群地在山地上、河滩里喊嗓子，用气息。行军途中，放下背包就打开本本学简谱练视唱。同时，人人自备一件土制乐器，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地练习着。不到半年时间，达到了要求目标，学会吹笛子的有七人之多，学会拉二胡的也在十人以上。这样，上了场是演员，下了场坐乐队，人人都是多面手，一人能顶几人用。

观众都夸文艺班的秧歌扭得好，这是文艺班在大秧歌上肯下工夫，用汗水换来的。为了提高大秧歌的质量，大家非常重视向民间秧歌队学习。哪里有好秧歌队，就到哪里取经。有时化整为零，分



散下去学；有时由专职人员学回来再教给大家。田庄秧歌队是绥德地区拔尖的秧歌队，很讲究身段线条，很合乎曲线美的美学原理。为了把他们的高超技艺学到手，负责训练大秧歌的安全同志亲自到田庄住下来，向艺人们请教，直到及格而归。回来后，又将所学一丝不苟地传授给全体演职人员。安全同志在大秧歌的训练中，和他给大家排戏、指挥合唱一样，态度严肃，要求严格。所有人员必须单兵过硬，无一例外，保证质量，不许滥竽充数，不许有夹生饭。在时间上，不避酷暑严寒，每日坚持，从不间断。一次正值安全同志新婚燕尔，当天大家估量着，今天可以松宽松宽了，哪知话音未落，安全同志出人意料地又出现在绥师的大操场上，一如既往地和大家跌打滚爬，直至训练结束，才从容地回家当新女婿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的汗水没白流，由于训练有素，文艺班的秧歌队，练下一身过硬本领。秧歌队只要一出校门，锣鼓一响，唢呐一吹，队员们便一个个精神抖擞，无一懈怠。哪怕是四十多度陡斜的二郎庙坡上，也要扭着下到街头，一路上越扭越卖劲，不管路多长，总是一直扭到演出场地。场子打开后，紧接着又要在广场上交场子。这时候，鼓点一换，一会儿是“五锤七锤”，一会儿是“凤凰三点头”，唢呐吹起了《打娃娃》、《拍草帽》，秧歌队在斧头镰刀的带领下，套起《剪子股》，安下《九连环》，恨不得把葫芦里的技艺一下子全倒出来。扭呀，唱呀，扭得越带劲，看得越高兴。群众赞美说：“文艺班的秧歌扭得好，个个都像水上漂。”

文艺班当时没有专职创作人员，可是能出新作品，而且层出不穷，其质量令专业人员叹服。这些大部分是初中肄业，文化底子异常薄弱的十七八岁的娃娃们，能够写出出人头地的剧本，能使观众经久不忘，以至几十年后还想一饱眼福，其根本仍是八个字：群策群力，源于生活。文艺班很重视集体创作，差不多每个人都卷了进

去，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既是演奏员，又是作曲家。有的同志早在战地服务团时期，甚至更早就尝到了齐心合力搞创作的甜头。《郝家桥》、《王家坪》、《红孩女妖精》、《参军大联唱》、《地主装穷》等节目就是在集体智慧的结合中创作出来的。文艺班的《做军鞋》、《越捞越深》、《比一比》三出秧歌剧，当时就被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至今保留。《做军鞋》是一出群策群力的代表作品，是集体创作的成功之举。那是在1947年，学校转移行军途中，从足茧千里的深刻感受中得到启示而萌发出边区群众积极支前的主题。到了临时驻地——佳县螭螭峪镇李家坪时创作的。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战地服务团的全体人员，围坐在西山梁下土窑洞前的院子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各人所见到的做军鞋的情景，张家婆姨长，李家婆姨短，先进的，落后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事件，语言性格，故事情节，一一跃然眼前。在此基础上，指定几人分场执笔，进一步加工构思，集中修改，不几日剧本就诞生了。这时搞音乐的同志又坐在一起为剧本设计唱腔，谱写曲谱，随即进入排练。因为剧作者是中角色的扮演者，他们的剧词记得快，剧情体会得深，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出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浓郁地方气息、强烈现实意义的剧本在集体智慧中上演了。这个戏，一次在义合镇附近的农村演出时，被西工团的高歌同志看中了。不久，就将扮演剧中王大的马运昌同志调到他团，还将剧本带到延安出版发行，成为西工团的经常上演剧目。《比一比》是1948年文艺班第一个剧本作品，它是反映土改之后，为颁发土地证，以土地登记时群众中公私的纠葛为内容创作出来的。参加剧本创作人员，深入当时土地登记现场——绥德邓家楼乡的申家峁子，吃住在老乡家里，经过深刻的生活感受而写出来的。在绥德、延安等地演出后，受到普遍好评。陕北文工团团长、剧作家张稼唐同志

观看演出后，兴致勃勃地走上舞台，向大家祝贺演出成功。赞扬剧本写得好，说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比之《越捞越深》更为鲜明生动。提起《越捞越深》，更使人思绪万千。它是1949年3月在文艺班的住地——高家祠堂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它和《做军鞋》都是新秧歌运动后期在陕北各地流传最广、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目。都是绥师文艺班、陕北文工团，以至后来的延安歌舞剧团的长期保留剧目。从问世直到1985年，延安、榆林各地农村秧歌队还在上演。他们上演时，因时隔36年，中经十年动乱，一时找不到剧本，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凭记忆你一句我一句，竟将剧本八九不离十地凑了出来。有些地方，还有所创造。如发财妈在门前用簸箕捞钱时，嘴里诅咒着“灯楼银瞎了，发财猛发了”的歌词，就是原剧本中所没有的，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了。在文艺班离开的很长时间里，剧中角色扮演者回到家乡，熟人相见，还脱口喊出“灯楼”、“发财”等剧中角色的名字，可见其印象有多深。最使人感动的是38年之后的1987年，绥德县委、县政府邀请20世纪40年代曾在绥德工作过的文艺工作者返绥采风慰问，欢度元宵佳节，特意点名要看《越捞越深》。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又一次在西山寺的舞台上一展风姿。结果连演五场尚不能满足要求，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不得不搬出室内，转移到体育广场的露天舞台上，满足了上万观众的渴求。文艺班的创作，其魅力来自生活。文艺班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又经常泡在群众当中，对陕北的民情风俗，乡土人情，对群众的生活、语言、思想体察入微，了如指掌。从而对作品所描写的对象，脑海中有活的形象和具体的模特儿。在进入创作时，剧中人物自然地跳了出来，他们的表情、神态、语言、性格就毫不费力地信手拈来，洒落笔底。文艺班的创作活动，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的论断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

文艺班的基本设备十分简陋，不过是一块幕布、两盏汽灯，几件土制乐器和一些敌伪军服、破旧枪支。大量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均要向群众家借用。当时的化妆品，和现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无非是一碗土红（俗称马马红），一瓶白粉膏，一点油胭脂，一根火柴把，一撮骆驼毛，一缸子熟猪油。化妆时，坏人涂粉红，正面人物一律擦马马红，演出从来不要布景。一次决定排演话剧《模范农家》，不做布景难以表现。要制布景，经济又拮据，在大家的倡议下，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用出卖学校大粪所得，买了点材料，然后大家动手拉大锯，解木料，打糗糊，背报纸，自制了布景，在学校大礼堂演出，开了绥师带景演戏的先例。花钱不多，效果真实，至今传为勤俭佳话。文艺班就是靠这种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精神成长壮大的。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没有经费，自己赚钱；没有骡子大马就自己肩挑背扛。凡是外出演出，女同志一律自带行装，重头活放在男同志的肩上。他们每人一根扁担，除担挑自身行装外，还要分担枪支、汽灯、幕布、笨重乐器、服装道具等。徒步几十里，随到随登台，被陕北人民亲切地誉之为“扁担剧团”。

1949年春天，文艺班为解决开展业务的经济困难，开赴佳县白云山赶庙会演出赚钱。赶庙会不容易，一天三上台，三天九本戏，除了吃饭就是演戏，夜间几十人蜷缩在窄小的庙堂里，头枕着泥像的腿脚休息。虽苦虽累，但大家都很乐意，一为宣传，二为经费。在白云山一地，戏价三十五石小米，折得现大洋七百多元，加之还愿戏又赚来二百多元，返绥途中又赚得一百多元，这次外出共赚回银洋九百多元，文艺班一下子腰粗了。回到学校，如同赶制嫁妆一样，制作了一套耐摔打的牛皮包角油漆戏箱，添置了六盏汽灯，和原来的两盏正好装四个箱子，配了两副骡驮，新做了一套幕布，充

实了服装道具。全部经费都花在了业务基本建设上，为赴榆演出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同学们辛苦这一趟，每人只发了一顶草帽、一副绑带、一条毛巾、一块新华肥皂。就这点赠品，大家都已是心满意足了。

#### 四、厚土育硕果

文艺班出了名，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是因为它植根于绥师这块沃土。据统计，绥师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培养出各类文艺干部 150 多人。其中有 76 人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他们中有《延河》、《音乐天地》的主编、副主编王丕祥、李作柱、王焱、王绳武、马倬等，有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姜应宗、刘斌、郭阳庭，有戏剧作家安全、李鸣九、白龙，一级戏剧导演张彩萍，一级作曲家薛增禄、魏瑞祥、马生采、刘森民、向音、李守钢、王焱、马倬等，有著名京剧演员刘燕贞，一级演员白秉权，著名话剧、电影演员雷飞，有声乐、小提琴副教授田生玉、马绍宽，有担任中央歌剧团团长荆兰（原名刘金兰），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刘燕生，中央民族乐团团长、歌唱家刘燕萍，中央乐团副团长、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党允武，中国广播出版社社长李守钢，中国唱片公司总经理刘森民，中国广播艺术总团副团长李守钢，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七师文工队队长张映台，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王文，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郑中和，省群众艺术馆馆长李秀珍，省戏曲剧院秦剧团团长姜毅（原名姜业粹），省乐团书记黄锡林，省歌舞团副团长海风（原名刘怀礼），西安市五一剧团书记任振元，三意社团长李正发，西影洗印分厂厂长，书记叶生、张美茵，以及陕西、山西、甘肃等省艺术学校校长刘秉、栾世轩、王维藩，省纪检委常驻省文化厅纪检组组长姬存让等。

在上述150多人中，文艺班的就有56人。一直从事文艺工作的76人中，有文艺班的28人。这28人中，有18人分别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以及上海林俊卿声乐研究所等高等学府就读深造。故在1989年的职称评定中，进入高、中级职称的就有11人。他们是薛增禄、魏瑞祥、马生采、张彩萍、白秉权、向音、田生玉、梁才、田萍、刘静、李旺春等。在文艺班保留下来的28人中，有安全、薛增禄、张彩萍、任振元、黄锡林、张明良、叶生、马生采、刘荣、姬存让、刘静、张宝仁、郝振杰等人长期担任着秦腔、眉户、碗碗腔、歌厅、话剧、舞剧、京剧、豫剧、木偶、杂技各个剧种各个院团的以及省艺术学校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多数人既是主要领导，又是业务骨干，在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增辉添彩。这些成就的取得，固然有他们在后来的实践中刻苦努力和在各种艺术高等学府学习深造的原因，但万丈高楼平地起，他们都是从绥师这块文艺园地里起步的，在这块厚土肥田里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熏陶；是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实践《讲话》精神的良好条件，从而使他们奠定了牢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念；在这块沃土里他们受到文艺知识的启蒙教育，学会走路，学会写剧本、作曲子、演戏、唱歌、扭秧歌、打腰鼓、吹笛子、拉胡琴，并在这里打开了他们不断进取奋发求知的心扉，练就了一身吃大苦、耐大劳、困难面前不低头、艰苦创业的过硬本领。总之一句话，是绥师教他们做一个革命者，是绥师把他们引上了革命文艺的康庄大道。

（本文由文艺班的安全、薛增禄、任振元、叶生、

田生玉、黄锡林等同志座谈讨论，黄锡林执笔撰写）

## 风华正茂

——回忆绥德师范时的生活片断

高雄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离开母校——绥德师范，已经38年了。在绥德师范上学仅仅是短暂的两年半时间，但在我的一生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每每回忆起那一段的学校生活，就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那是我一生中再美好不过的时刻。

### 内心的骄傲

绥德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学校。她为我国革命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繁荣富强洒下了热血，流下了汗水。

那是1948年的初春，冰雪尚未消融，胡宗南进攻陕北刚刚败退，我的故乡——米脂中学因战争转移到山西，又回到绥师。我和同村的另两名同学，跑到距家60公里的绥师来报考。报考的当晚，正巧住在师范城畔左侧我的一个户家老爷爷的家里。翌日早晨起来，站在师范城畔上，眺望那灰蒙蒙的绥德城景及眼下历历在目的绥师校园时，听到师范礼堂里传出阵阵悦耳的歌声，这歌声更使我产生了对绥师的爱慕之情。心中暗想，我何时才能进入这校园成为绥师的一名学生？说也幸运，经过两天紧张的考试之后，在雕山小院墙上贴出的大红榜上，我果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此时此刻，我是多

么高兴啊！我的愿望实现了。

进校后，随着对学校情况的熟悉，我的主人翁感也一天天增强起来。课余时间和星期天，我和其他同学自由地进出于镶嵌着“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字样的虹形大门下，内心里不由得自豪起来，似乎自己比校外那些过往行人高出一头了。

## 频传的捷报

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前方胜利的捷报频传。全校师生经常听时事报告，在校内多由地理老师吕鼎锡作时事报告。他把约二米见方的漂白洋布绘制成的全国地图挂在墙上，又用红线绳标出解放区与蒋管区的界限，手中拿着教鞭指着地图，活灵活现地讲述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的革命形势，使同学们听得入迷。

有一次，四六团从山西凯旋，绥德城内各机关、部队、学校都到师范学校顶部部队营地的仓房圪塔大操场里听时事报告。当人称霍老的霍祝三专员开玩笑地讲到“我们扩兵很不容易，国民党给我们一扩就是几千人（指国民党部队缴械投降）”的时候，全场骤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的战时文工团随部队演出，十分活跃。在四六团胜利归来的当天晚上，西北文工第一团在仓房圪塔演出了《霸王鞭》、《腰鼓》等小型节目。演员们那高昂的情绪、优美的动作，使同学们一饱眼福。还有一次，四六团文艺队在南城壕外的巷道里举行跳舞晚会，不少同学也挤在人群里观看，文艺队跳舞的一对对男女拥抱着身子，脚下迈出轻盈的步子，使人看得出神。



## 活跃的文艺

那时，校内的文艺生活十分活跃。学校专门成立了文艺班，为师生演出。除了小节目《红布条》、《做军鞋》、《越捞越深》等外，还有大型歌剧《血泪仇》、《刘胡兰》，校内校外轰动一时。其他各班的文艺活动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大秧歌、小歌舞竞相出台。全校知名的文艺演出者如我们青二班胡渊同学扮演的老汉，青四班雷飞同学扮演的“二流子”，马绍宽同学的笛子独奏，马增杰同学的秧歌乐队总指挥，都受到同学们的羡慕。

1950年正月间，学校的秧歌队下乡演出，声势浩大，人马众多，光执锣鼓家什的就有一二十人，又加我们的秧歌队的衣着、化妆都是最时兴的，在子洲双湖峪街上一演出，把当地进县城演出的十几班古式秧歌压得死死的。无奈，他们的秧歌队领队宣布解散，跑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 “供给制”待遇

那时同学们都享受着“供给制”的待遇，不仅课本、讲义等文具由学校供应，同学们吃的饭菜，穿的衣服都由学校供给。一天三顿大灶饭，早上是白面大蒸馍，中午是小米干饭或是能栽住勺子的豆钱钱饭，下午是大粗面条。同学们把饭菜打出后，端着饭碗，不分男女，面对面地蹲下来自然地形成两行，边吃边说笑，格外欢心。当时发给同学们的衣服是“八路军”式的灰色粗布衣服，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按个子的大小，分三种型号。我是班上个子最小的一个，穿上三号衣服还有些长，同学们看了不由地发笑。

## 幸福的童年

我考进绥德师范的时候，年仅14虚岁，是班上最小的同学之一。好奇、好动、贪玩，但我的脑子是伶俐的，所以，校内外各种活动我几乎都入选参加。1948年过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时，绥德各机关的儿童都集中在中山礼堂开庆祝会。会后，举行了一次智力竞赛，其中有一项“钓鱼”活动，在礼堂内南端挂一排用细线吊着的小铁钩，北端站一排参加竞赛的儿童，哨子一吹，参加竞赛的人要很快跑到南端把手中拿的小木鱼挂在线钩上，然后很快返回原处。我记得我手疾眼快挂上鱼钩跑回原处，取得了名次，受到了物质奖励。

遇星期天，我们相好的同学，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绥德附近的名胜古迹处尽情游玩。到二郎山去领略金城风光，到雕山八角亭下乘凉，到蒙恬墓前赏奇，到城东报警钟楼下观古，到西山寺大众印刷厂去看印刷，甚至过无定河大桥到龙湾去看那“龙洞清流”。同学们除了游览名胜古迹之外，再就是到相好的同学家里去玩。一次，我到我的好友白军年家里去转，他的父亲待我为座上宾，特意为我做了用猪肉、细粉和虾米等做的馅子的蒸饺，吃来味道香美，我饱餐一顿。又一次，我到好友杨汉铭家里做客，因为他父亲杨彩霖是地委书记，我有些胆怯，不愿去。之后去了，正巧其父不在家，其母出来热情接待，当我们进屋坐下，聊天不一会儿，她就为我们端上来热腾腾的夹枣饼和甜米汤，我又如嘉宾一样，受到款待。

我最喜欢的玩耍就是打篮球。在篮球场上，我个子矮但跑得快，投篮准，球友挑人，还喜欢与我搭伴。我的另一兴趣就是传排球，经常参与一个队里，用排球从另一队同学的头上往过扔（叫“推光

头”)。另一队同学则激烈拦截、争夺，当球得手后，便又反过来推我们的头。这个玩耍十分激烈，玩起来人随球跑，拥来挤去，你呼他叫，非常恋人。

我对猜灯谜颇感兴趣。一次星期六晚上，绥德专署大门前举办灯谜晚会，我也挤进人群，去猜那高挂着的灯笼上的灯谜。经过我苦苦思索，终于猜出四个，领得了四小纸袋熟花生米和四支香烟，我高兴地跑回宿舍，让其他同学分享我动脑子所得的意外收获。

## 刻苦的攻读

那时，学校里学习空气很浓。拿我班的同学来说，好像经常处在竞争的状态之中。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做课堂笔记，自习的时候，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懂的问题互相研究，同学解不开的题目就去请教老师。大家为了求知识很注重实事求是，谁也不搞“不懂装懂”。有一次代数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下30个练习题，大多数同学已经做完了，而和我同桌的李义人同学才做了几道题，已到黄昏时分，她还独自趴在桌子上做作业。我跑进教室，见她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就心急如火地要她照着我做下的很快抄出去。可她坚定地说：“我不照抄，要真正自己懂，做一题算一题。”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同学们就三三两两，各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攻读，以取得好的成绩。给我们上历史课的冯健民老师，讲课时有一个特点，就是讲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有的同学不注意他这个特点，不注意做课堂笔记，往往被他下次上课时的提问问得目瞪口呆。那时他就用一句歇后语批评你说：“唉，张飞的屁股——黑圪洞洞。”

我深深感到在绥德师范那段时间里，在各位老师的循循教诲下，同学们学到了比较扎实的知识。

## 愉快的劳动

在那紧张的学习之中，同学们多想出去活动活动，而劳动正是同学们最好的活动时机。

为了改善同学们的生活，学校在绥德东门外约二三里地的川地里种植蔬菜。每到播种的时候，总要同学们从校内把茅粪一桶一桶抬着往地里送。蔬菜上来的时候，又要同学们把蔬菜从地里一筐一筐往学校里抬。虽然抬茅粪又臭又累，但同学们在劳动中有说有笑，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一走出东门，视野豁然开阔，望着无定河两岸那平展的田园，烦闷和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绥德党校和绥德师范同在一个学校，又在一起上灶，吃饭很费。所以，学校每隔一些时候，就要安排各班同学去中山礼堂附近的一个粮库扛粮。每次扛粮的同学如长龙似的，开头走的同学已经到了一里外的粮库，而后走的同学还看不到尾子，扛粮大军浩浩荡荡，气势甚为壮观。

还有一次令人难忘的劳动，就是1949年春，由于粮菜缺乏，学校决定停课一周挖野菜。全校同学一起出动，自我搭伴，自找工具，散出在绥德城周的山山坵坵。同学们每天早饭后出发，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提着盛满苦菜的筐子，拖着疲惫的身子，陆陆续续地返回学校。挖下的野菜，经过洗泡，或者煮入饭内，或者调为小菜下饭。同学们开玩笑地说，挖的是苦菜，吃的是苦菜。这一周对同学们来说，虽然是艰苦劳累的一周，却也是艰难磨炼的一周。

## 革命的友谊

那时，绥师的同学，衣着朴素，不讲究，互相间团结友爱，不封建。大同学如兄姐爱护小同学，小同学似弟妹尊重大同学，男女同学互相帮助，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革命大家庭。拿我班同学来说，默默地做好人好事的屡见不鲜。班上有些重体力劳动如打柴、抬粪等，男同学争着去做，而拆洗衣服、被褥等，则女同学抢着来干。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外出玩去了，赶下午回到宿舍，见每个人的被子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原位上，男同学们看到此情此景，又惊又喜，一了解，才知是女同学们做的好事，可又感谢谁呢？

作为我的人团介绍人崔海明和我同桌的李义人两位女同学，都比我大好几岁，她们对我像小弟弟一样的爱护，而我对她们则像大姐姐一样的尊重。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当我与李义人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延川城关小学任教的时候，李义人同学还总是以大姐的姿态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我因患重感冒卧床不起，她就守在我床边，又是送开水，又是烤馍片，精心地护理，直至我病好为止。

## 随时准备着

我在绥师上学的时候，正是新解放区期待大批革命干部去接收，去建立新政权的时期。绥师作为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自然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记得与我同时进校的李生玉等几位同学，由于他们年岁大，个子大，仅仅住学几个月就被分配出去了。在当时时

局发展的具体情况下，我们每个同学都随时准备着听从分配，奔赴新区工作。我当时虽然个子矮小，但把身子交给革命是我进校前就有的想法。我在学习期间，班主任肖英曾两次找我谈话，说要去新区工作，我都慷慨接受，一点儿也不惧怕。当肖老师第一次找我谈罢话，我上午立即打好背包，收拾好书籍，准备随时出发，可是到了下午，肖老师又说：“你不要去了，另外派了同学。”此后，我慢慢地理解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

## 抬菜与做人

崔凤全

绥师在东门滩办了一个农场。学生吃菜，就靠各班轮流抬。农场的菜很丰盛，最令人眼馋流口水的是水地红萝卜犹如蒲草穗大小，水灵香脆，红中透黄，生咬起来，“嘟嘟”直响。吃不吃是情理之事，学校不管，农场也不计较。抬菜时每两个人一组，又是自愿结合，只要有一个人说吃，多少也没数。我当了好几年班上灶委，负责抬菜，在我的记忆中，从未发现有人贪嘴吃，私自拿。这种现象当时没在意，今天想起来感到很新鲜。

为什么？我想这与做人有关。那时候进绥师，一是求知识，二是求真理，三是求做人。人们追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贪嘴爱拿，人稠面广固然不雅，两个人很难起齿，一个人也没味。特别是遇到生活会，有错的人坐立不安，只有吐了那口“顽痰”，才能正常生活。看来，做人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一种高度的

自觉，一种极好的社会环境。

## 母校生活回忆

阎尔雄

我是1950年正月考入绥德师范，1955年冬毕业（前三年为初春五二级，后三年为师春五五级）。当时我才17岁，是风华正茂的年代。我的少年时期是在绥师度过的。母校啊，老师啊，在您的怀抱里哺育了六年，身体长高了，知识增多了，您的恩情永记心间，至死不忘。

每当我们闲暇和工作之余，想起在母校的生活片断，还记忆犹新。

1950年初，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和群众经受长期的战争创伤，还很困难，需要恢复，还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战争时期，校址不固定，师生一面打仗，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解放后我们是一面学习，一面建设，一面种地。背砖、打石头、挖土，修补校舍，新建大礼堂，增建宿舍教室。种地主要是种菜。东门滩里，大约离校五华里的地方，有学校公地约六十余亩，办了一个农场，每年种各类蔬菜，基本上满足了学校师生灶用菜，很少在市场上买菜。记得农场场长叫罗振声，他管理有方，除领导九名固定工人外，大部分劳动是用学生。各班轮流劳动，劳动时间也排在课程表上。抬菜也是轮着干，每天下午去一个班，抬回第二天所用的菜。那时的勤工俭学活动搞得好。学校给每个学生助学金12元，主要用于伙食费（大约十元左右）。余下的两元左右给

学生发学习用品，发褥单。有一次还将节余的钱给每个学生做了一套学生蓝制服。学校还保存由妇女群众支援解放军的公鞋，满满一房子，衣服两房子（全部是老布做的，用干草叶子染成灰色的），还有一房子“三八式”长枪一千多条、两门炮，几支机关枪。学校把枪、炮缴给了当时驻军司令部，鞋和老布衣服都救济了贫寒同学。我当时得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鞋。师生们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但很乐观。

当时建校，资金是很困难的。其中一部分是上级拨款，一部分是勤工俭学，师生劳动节省弥补。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做买卖，办商店，搞运输。绥师的商店叫“雕山商店”。面向社会，供应学校。当时学校组织了两个运输队：骡队，有22头骡子；骆驼队，有17头骆驼，搞长途贩运，来回买卖，主要是服务于教学，买回学校需要的物品，运出去本地的土特产品，赚来钱增加学校收入。一个月左右骡队、骆驼队回来一次，牲口在学校操场一角喂养，同学们新奇地摸摸牲口，增加了富裕感，增加了对母校的热爱。

1951年，新礼堂建成了，学校的大型活动都在那里举行。开大会，作报告，搞典礼，演节目，师生们高兴极了。礼堂门口两边刻着八个醒目的大字，右面是“学而不厌”，左面是“诲人不倦”，这句话用仿毛体刻写而成。全体师生就是遵照这个精神刻苦地学习，耐心地教诲。母校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合格人才，我们为此而自豪。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一段时期每天两顿饭，一周14顿饭，只能吃到一顿白馍馍，三顿小米干饭，其余十顿都是稀饭。稀饭主要是高粱和小米做成的粥，不太稠，有时还带点面条。份饭，每份只能分到三勺（勺子大，每勺的一碗），中等饭量就饱了，个别大肚子同学，女同学吃不了让给他们能吃到六七成。有一次，五四



级的一个同学吃了15碗稀饭，破了纪录，大家都叫他“大壮汉”、“吃饭冠军”。看来不少同学是在半饥半饱中坚持学习，但从不叫苦，也不浪费一粒粮食。

生活虽苦，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情绪是乐观的。每天除坚持正常上课上自习外，每周还安排有时政报告、讲演会（锻炼口才），生活检讨会，每晚上进行晚点名，唱歌跳舞天天搞，很活跃。清楚地记得，我们刚进校时，学校最高班是“青二班”，就是高雄科同学所在班。他班有个出色的唱歌指挥者、文娱干事李素芬。她指挥有方，动作优美，记得一首歌的唱词是：“灯碗里没有油灯不明，穷人没有地辈辈受穷……”，她起歌准确，大家唱得声音齐整，声音和谱，悦耳动听，新班同学们围观者甚众，喝彩不已。有老大哥班带头，其他班不甘落后，当时绥师的文艺、体育生活搞得非常活跃，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 与团省委书记的一次谈话

白鹤集

1951年春天，团省委书记惠康昌来绥师考察学校团的工作，体验学生的生活。他不仅参加团的一切活动，而且跟班听课，深入同学们的课外活动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他分别找同学谈话，其中也找到我。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我回答。记得当时我从四个方面回答了他。第一，老师们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感染力很强，感召着每一个同学的身心，同学们十分尊敬老师。第二，同学们学习上的钻研和生

活上的俭朴互相影响、促进着。学校在东门滩办了农场，养猪、种菜。每天下午轮班抬菜，同学们不仅抢着抬，多抬，而且再累再渴也不吃一口（当时种的是水萝卜、黄瓜、西红柿、黄萝卜等）。第三，同学们的上进心很强。学校无论发出什么号召，团员们首先打头阵，做示范。要求进步的同学，更是不甘落后。第四，同学们觉悟高，主动性强，只要某些方面做得不好不够，总要在礼拜六民主生活例会上主动做检讨，请求同学帮助。惠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赞叹。和我谈话结束时他对我说，来绥师这一段的亲身体验和同学们的广泛交谈，使他真正感到，同学的组织纪律性使他内心钦佩，绥师同学的高尚品德值得全省青年学习。同时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为党更好地工作。

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真是记忆犹新。几十年来，每当我遇到不守纪律、不求进取的人和事，我就记起了惠书记对绥师同学的表扬，也就想起了我们的母校，想起了母校这个大家庭里的学习、生活以及一切的一切。

## 甜蜜的回忆

王来英

我是母校——绥德师范初春五三级甲班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了整整三年。

三年中，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严肃认真的学习空气，真挚友爱的团结精神，积极进取的传统美德……每每回忆起来，如同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当学习中遇到难理解的段落，难演算的题目，请教老师同学时，各科任老师不厌其烦地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特别注重从理解和运算能力上辅导提高。学习好的同学不惜牺牲课余时间，热忱帮助，反复讲解，直帮到学会弄通为止。就是平日的学习，钻研精神也十分强。课堂上静悄悄的，只能听到老师的讲课声，演算声，晚自习也同样，在煤油灯下也只能听到翻书页声，做笔记声。当时母校学生的学习空气就这样浓，学习风气就这样好。

当轮到本班帮灶挑水、抬菜时，凡排到在雕山脚下小理河旁挑水者，同学们自觉地结成一帮一小组。年龄大的完成任务后，不仅帮年纪小的挑几回，而且常常在水门上面的陡坡上挨着接担子……凡排到东门滩校办农场抬菜者，进入东门陡坡处，热的累的同学们汗流浹背，但谁也不肯歇下来将筛子、笼子、筐子装的新鲜的水淋淋的水萝卜、西红柿、黄瓜、黄萝卜……吃上一口，解解渴，充充饥。同学们都是这样的诚实，这样的自觉，这样的守纪律，这样的爱护班集体。

当一个同学有了缺点错误，老师和同学批评帮助时，有缺点的同学不仅自己从严要求，在生活会上自觉地做自我批评，而且把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帮助，看做是对自己的最真诚的帮助，打心眼里感激不尽。

当课外活动时，同学们按照各自的爱好，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有打球的、拉胡琴的、唱的、跳的……真是心情舒畅，热闹非凡。有的却为学校、为班集体办公益事业，搞义务服务。比如抄写服务公约，书写墙报、黑板报，还有默默无闻地为大家做好事的……同学们就是这样，把这些义务都当做课外乐趣，不用安排，更不用做动员，都是自觉自愿地干起来的。

当同学们在街道、路旁见到老师时，不论带课与否，首先是严

肃地立正敬礼（老师佩戴的校徽是全红底色，好区别），接着礼貌地问声老师好！总之，不管在校学习生活，还是走上工作岗位，都把老师奉敬为师长，当做父母一样尊敬。

当一个同学光荣地入了团入了党，别的同学从内心羡慕，暗暗下决心向这些进步同学学习看齐，自觉主动地向党团组织递交申请书，真挚诚恳地请求党团组织培养考验自己。

当班集体荣誉受到影响时，全班同学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如属品德方面的，党团组织指定专人帮助教育；属文化方面的后进生，班委会指定有专长的同学帮，促其尽快赶上（过关）；属纪律方面的，除个别帮助教育外，分别通过班会、生活会形式，使大家共同受到教育。

当同学们毕业实习时，按照实习日程安排不仅熟读课文，反复理解题意，翻阅大量参考资料，编写教案，而且将写好的教案一次又一次进行修改，一遍又一遍进行试讲，就这样认真负责地对待教学和教育工作的。

.....

可以断然地说，20世纪50年代初，以至60年代，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在品德上、学业上，还是在中小学教学工作岗位上，在当时的绥德专区所属的八个县，以至后来的榆林专区所属县的整个城乡都享有较高的声誉，每届毕业生都争着抢着要。经过几年的实践，大都成为本校的骨干教师。

这一切的一切，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在这共同庆祝建校70周年前夕，我撰写这篇回忆，唯望当年的这种好的校风、好的学风、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为辛勤耕耘、培养教育我们付出心血以至与世长辞的师长，表示由衷的缅怀和真挚的感谢。

## 教师集训会的两段记忆

崔凤金

1952年暑假，我和刘生宽、霍杨举等六位同学，荣幸地被抽调参加了教师集训会。这个集训会是由绥德地委召开的，绥师和米中的教师都住在绥德高中。参加会议的目的，是要代表学生提意见，帮助教师改造思想，进一步搞好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这次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叫我参加感到不寻常，后又叫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传达会议精神，我万万没有想到。特别是在同一个大会上，我外甥刘世华也汇报了全国中学生夏令营活动情况，我们两个人占了全部内容，我的心情特别地不平静。

这次教师会，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对我以后的成长有不小的影响。其中有两件事，使我铭记了几十年，我把它们宣扬了几十年。在我的生活过程中，每每回味，津津乐道。这就是地委书记杨彩霖同志的“脾气说”和绥师李庆春老师的“信任艺术”。为了重新领略我们党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风采，追溯20世纪50年代我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特色，有必要将这两个故事再作回忆。

### 杨彩霖书记的“脾气说”

我们绥师调来了一位姓何的历史老师，讲课好坏不说，唯独因为脾气大出了名。他说话有气，做事有气，不与人交往还总是绷着脸，好像仍然有人在气他。谁惹了他，他一定会出口伤人；没人理

他，他照样找岔子伤害人。为了他的这个脾气，集训会上大家把他提出来，进行批评帮助。他不能接受，强调是性格问题，脾气问题。以“山河易改，禀性难移”的逻辑进行顶牛。地委书记杨彩霖知道后，亲自找他谈话，他仍不在乎。迫不得已，杨书记只好刨根问底，询问他的出身和历史，从中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杨书记对他说：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当过国民党的连长，现在的脾气性格与这些有没有关系？可以理解，一个曾经爬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今天人民群众向他提出改造思想的新要求，他怎能没有脾气呢？站在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立场上，浸泡在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感情中，看事情，想问题，怎会顺心如意呢？请你认真查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不难发现所谓的脾气性格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杨书记这时有意地向他发了脾气。当见他一点儿脾气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十分恭谨的时候，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平素你在学生面前、同志面前，而且多是在大家没有惹你的情况下，你脾气大得要命，而今天我向你发了这么大一顿脾气，你却没有一点儿反应呢？这就说明，你的性格脾气，骨子里完全是思想问题。思想是可以改造的，性格也是可以改变的。杨书记的这通“脾气说”还真灵，我们的这位何老师，开始认真严肃地想问题，从此脾气好多了，大家异地说：“简直成了两个人。”

### 李庆春老师的“信任艺术”

那次集训会，教师情绪都很紧张，叫集训，实际就是整风。有历史问题的，政治表现不好的，自然很难滑过。有思想问题，也要求自觉放包袱。唯独我们六个学生代表，自以为不但不是对象，倒成了“动力”，难免洋洋得意，飘飘然哉，打打闹闹也时有发生。有

一天，负责我们的李庆春老师，召集我们开生活会。他说：大会反映米中的同学很不像话，打架骂嘴，调皮捣蛋，影响不好，我以为我们绥师同学绝不会有这种不良现象。为了进一步发扬绥德师范优良传统，今天请同学们讨论，怎样为学校争光，保证不给丢面子。寥寥数语，就散会了。这个生活会开得比拿棒子打还疼，因为我们比米中同学好不了多少，某些地方比人家更差劲。为什么这个短会有奇效，就是因为李老师把我们个个放在了信任的位置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举措，很可能李老师自己当时和现在也不曾意识到，触动那么大，震动那么强，使人几十年了想来都意味深长，回味无穷。就因为一个信任，使我们几个会后又自动凑在一起，认真地自我反省，都下了模范表现自己的决心。就因为这个信任，使我们极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也为自己找到了模范做人的起点，不断捕捉自我教育的机遇。

在人生几十年的旅途中，我很欣赏李庆春老师正面教育的信任艺术。和认识李老师的人到一起，都对他的信任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共同的规律性感觉是：挨他的批评舒服，受他的表扬觉得幸福。为什么叫正面教育，凡是错误的东西都可以说是反面的。那么如何进行才算得上是坚持正面呢？我寻思了几十年，糊涂了几十年。近年来，就是因为千百次地回味李老师的信任艺术，仿佛明白了许多。毛泽东同志说：方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我理解，正面教育就是信任教育。没有信任作前提，教育很可能就混同于惩办。无产阶级的教育，是由信任的性质决定疏导的方针，又由这个方针决定正面的方法。正面教育，不仅会是指明了方向，而且会是为奔向正前方的内功更强。这一点显然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

## 在绥师的日子里

高仰震

1961年我进入绥师中师班就读。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校舍十分简陋，学生生活极为俭朴。当时绥师坐落在西山寺的小理河旁（现在的二康医院）。有一条用石子铺成的窄短马路和一条简易的经惠渠平行，从校门前穿过。学校有几排破旧的窑洞，有数十间用泥土砖瓦砌成的平房教室。唯有那土操场宽敞，四周用土墙围成，东南角有个学生食堂还显得比较新。每当夜晚在月光照射下，学校周围非常寂静。能听到小理河潺潺的水声，青蛙的叫声……

那时我们生活很艰苦，学校食堂每天两顿饭，都是黑豆、高粱连皮和土豆煮在一起，加些黑面成糊状，每顿还要定量。同学根本吃不饱，饿着肚子上课。农村来的学生还要自带口粮，好些因拿不出粮食，就退学，休学。城里来的学生还能好些，因有定量供应口粮。为了让学校正常办下去，开展勤工俭学，自己动手，办农场，养猪，养鸡……那时我们除了正常的上课时间，每周有一至两天的劳动课，到农场去干种菜、浇水、除草、送大粪等农活。当时农场在东门滩，就是现在的新校址。农活中唯有送大粪最苦，必须把大粪从学校的厕所掏出来，用人力车一桶一桶送到东门滩菜地。那时的粪桶都是木制的，盖根本不严实，加之路不平，随着颠簸粪尿不时地溅到人身上，又脏又累，但同学们还是抢着争着干。每次劳动课都是劳动委员精心安排，男的女的，弱的强的搭配起来。当时同学中流传着颇有风趣的一句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是班里年龄



最小的，又是城里来的，劳动委员每次总是照顾我，让我去菜地拔草、捉虫，干轻便的活。每到收获季节，新鲜的西红柿，嫩绿的黄瓜、菠菜、韭菜……堆成小山似的。师生吃着自己种的菜，改善学生伙食，大家高兴的滋味就甭提了！

那些日子里尽管生活艰苦，学习条件差，但同学们从不叫苦。城里来的学生不撒娇，乡里来的更是勤奋好学。班里能写会画，能弹会唱的人比比皆是。记得从榆林来的朱继宝同学画的山水花鸟活灵活现。吴堡来的张学礼同学弹琴、拉二胡悠扬动听。那时每个教室配一架风琴，每当课外活动，他弹琴我们女同学伴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珊瑚颂》、《红梅赞》、《绣红旗》等等，只要是新上映的电影插曲，我们都会唱。那时我们天真无暇，太幸福了！乔登斌同学脑子特灵，解数理化题的速度胜过老师，每次数理化比赛他都是优胜者。还有白惠琴唱歌好，马有仁、魏奎元戏演得好。还有一位孙汉雄同学，他年龄较大点儿，是学生会主席，他可会关心、体贴大家，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呢！同学们都肯信任他，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大多数是刚从大学毕业来陕北支教的外地人。他们知识渊博，年轻有为，工作认真。我们的班主任俞春明老师，至今让同学们难以忘怀。当时的困难环境，有些同学产生退学年头，俞老师总是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生活上照顾，想办法让他们坚持学下来。俞老师对学生关心爱护。在我上二年级前半年的时候，因营养不良，身体正在发育期，在劳动或文体活动中，自己不注意，碰撞了乳房患了乳腺炎。那时候的女孩子十分保守，不好意思，不去求医，炎症急剧加速，不得已住院动手术。耽误了近一个月的课程。我住院期间，俞老师和同学们拿着水果糖和糕点看望并安慰我，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出院后俞老师用课外时间给我补课，后来我在

物理课兴趣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俞老师带几个班级的物理课，他讲课深入浅出，做实验，练习题，开展各种有趣的科技活动，赢得学生的的好评。还有数学老师李玉仙，她数学讲得很有条理，我们一听就懂。她圆圆的脸庞，矮矮的个子，待人和蔼可亲，百问不厌。陶能武老师也给我们上过数学课，讲课很出色。语文老师刘思聪，政治老师王向林、张步月，教育学老师陶志英、冯光繁等等。都是令人十分敬佩的。他们能在艰苦的陕北安心工作，后来有的在当地成家定居，养儿育女，为陕北的教育默默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最后半年进入实习期，地点是绥师附小。在这紧张的实习期，同学们更是认真扎实。为了讲好一堂课，翻来覆去地试讲。有的同学为了备好一堂课彻夜不眠，有的同学自个悄悄跑到玉米地里试讲，把一株株玉米当做小学生。记得我是做了音乐的示范课。参加听课的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附小的校长及在职教师，大约有好几十人，还有四年级的四十多个小学生。当时我一边弹琴，一边给学生教唱儿童歌曲《六月花儿香》。初次登讲台还是比较紧张，但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的帮助下，还是成功地完成了示范课，得到好的评价。经过半年的实习，同学们得到优异的毕业答卷，奔赴工作岗位。有不少的同学去榆林以北的三边去任教。

我被分配到绥德城关一小任教。后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调到陕南秦岭大山里的某一军工厂子校任教，1984年初调入咸阳如意子校任教，现已退休。我的一生普普通通，极为平凡。35个春秋耕耘在小学的讲坛上，是一名合格的小学高级教师。这都离不开母校的栽培教诲，我深深地感谢母校——绥德师范学校。

## 忘不掉的身影

——回忆校办农场工人姬长胜

高仲霖

1961年秋，我绥德中学毕业后，被保送绥师中师班就读。那时正遇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城镇学生上学，每月还定量供应少量的粮食，而农村学生要自带口粮。好些因带不起口粮休学，退学。当时决定初师班停办，只留了几个中师班。学生情绪低，思想乱，食堂饭菜很差，大都是黑豆、高粱连皮磨碎，煮土豆块加白菜，刷些杂面，稀糊糊的，每日两顿，每顿定量，学生根本吃不饱。家庭经济好些的，还能带些用糠皮加红枣制成的炒面来充饥。

学校面临情况严峻，何去何从？上级比较重视，因为绥德师范学校在历史上是有威望的学校。战乱年代都能挺住，难道困难时期就要退缩？当然不可能。学校大力宣传、动员，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展以农场耕作为主的勤工俭学，每个班级每个老师每周定时到农场劳动。

农场的负责人名叫姬长胜，大概50岁上下，高高的个头，瘦瘦的脸盘，平日少言寡语，总是穿着发旧的衣衫。步伐稳健有力，很朴素很忠厚，好像不识多少字。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给人们感觉他是个吃苦耐劳、很懂农活、办事认真的人。不管春夏秋冬，不论刮风下雨，他安排、指导全校师生参加劳动。人们亲切地称呼：老姬！

那时候，每班每周有两天上农场干活。每逢干活前，老姬师傅

把班级的劳动委员叫去，让体质好的学生干重活，身体弱的学生干轻活。在我的记忆中掏大粪是最脏最累的活，老姬师傅总是站在离粪池最近的边沿，不慌不忙，一勺一勺把人粪尿掏进粪桶，让学生站在上面按粪桶。那时候的厕所很简陋，上面人解手，下面粪池开了个小门随时可以掏粪。掏粪的时候，不时地有粪便溅出来，一不小心溅得满脸满身都是。臭气扑面而来，呛得喘不过气。而老姬师傅无论是哪个班劳动，只要是给菜地上粪，都是他亲自掏粪，并且给学生教掏粪方法。掏粪还得送到菜地，近处大家就挑着，抬着送去。特别是往东门滩菜地送粪，太远了，又累又脏。首先把满满的粪桶放到大车上，一车能载好几桶，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最中间驾辕，旁边有好几个学生拉套。因路不平，粪桶上的盖不严，粪尿不时地往外洒。老姬师傅常常要驾辕，同学们让他休息，他总是再三争抢。

老姬师傅做农活的技术很高，下种，间苗，锄草，整畦，嫁接……种种农活他都很娴熟，并能耐心教给学生。我是城里长大的，没干过农活。一次在间苗中，把好苗子不小心锄掉了，害怕别人知道，我就偷偷地用土埋起来。后来让老姬师傅发现了，他没发火，而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娃娃，不能这样。不会锄地，多问别人。这庄稼像人一样，脑袋割了还能活吗？”于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握紧锄把，放平锄头，站稳身子，看准苗子，留下壮的，锄掉弱的。

他对校办农场很负责，十分注重田间管理。每逢农闲，他把田埂整得高高的，地畦搞得齐齐的。夏天种的西红柿、黄瓜，用枝条架得很整齐，灌溉的水渠修得很顺畅，施肥及时，灌溉适当，科学嫁接。所以西红柿结得又大又红，黄瓜又长又绿。过路人都夸绥师的菜地真好！因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又是城里来的女孩子，每当劳动课，经常派我去看照菜地。当我们班的同学劳动结束回来路过菜

地，又渴又累，老姬师傅让每人摘根黄瓜或西红柿生吃，大家高兴极了！

他十分爱惜大家的劳动果实。秋天，每到收白菜时，教我们首先把白菜最外面一层捋顺，然后用刀砍下不易浪费。陕北冬天有储存白菜的习惯，加之学校冬季有那么多师生吃菜，他把收回来的白菜，找个僻静之地，一颗一颗，一层一层，摆放得整整齐齐，像小山似的，然后用草帘子盖严实。当大雪纷飞时候，他都要去看看白菜是否盖好了，是否受冻了，唯恐师生缺菜吃。

在我的记忆里，三年学习期，我们班辍学的寥寥无几。学生食堂比周边的学校要强得多。农场的菜源源不断地往师生灶输送，每周还有一次白面馍或白面条吃。

老姬师傅的家庭并不富裕，孩子多，妻子身体又不好，经常闹病。我家和他家住得很近，从没见过他私自把学校菜地的蔬菜拿回家。他从不因少粮缺菜而近水楼台。学校为了照顾他，把他的大女儿（姬兰英）编入我们班，视为旁听生，后转为正式生，毕业时正常分配。

老姬师傅在绥师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办好校农场，增加学校收入，保障师生生活，稳定学生情绪，作出了贡献。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而在一批一批的学生的记忆中，总有着他的身影。

## 天地人和起壮图

——学校迁址重建纪实

武 军

每当谈起我校的迁址重建工程，人们多会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尽了。

### —

我校于1923年建校时，选定绥德城内疏属山上原雕山书院和试院为校址。20世纪50年代设立附属小学，便把原试院部分用做附属小学的校址。于是，学校占地面积仅18亩，且是山坡地。1959年学校与陕西省第二教师进修学校合并后曾迁往河西，有了比较宽敞的校园。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的1970年，由于当时战备的需要，陕西第二康复医院迁来绥德，我们的校园被他们选中。从此学校不得不再回到仅18亩的老校园。

尽管这小小的校园也曾培养了无数的精英，创造了无比的辉煌。但毕竟仅有18亩山坡地，学校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种状况，学校着急，更牵动着广大校友们的爱校之心。他们不懈地奔走呼号，希望给学校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大家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积极地努力着。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刘青霞校友在撰写杨滨传的过程中，认识了时任国家教委师资师范司司长孟吉平同志。在交往之中，

刘青霞校友请孟吉平司长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看看她的母校，并提供一些可能的帮助和支持，这便成了我校发展的一个转机。1994年初夏，孟吉平司长顺路来我校视察了！视察后，他对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特殊历史贡献的我校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惊诧，认为我校是当时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中办学条件最差的学校之一。随即，便从发展师范教育的高度出发，向榆林地区党政领导提出尽快改变我校的办学条件的希望。对此，榆林地委和行政公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此，我校迁址重建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96年8月26日，榆林行署常务会议正式作出同意我校迁址重建的决定。

## 二

迁址重建得到行署的确认，对于学校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但要真正实施，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新址建在哪里？

在历史上，我们学校本来是有不少的土地的。20世纪40年代大生产时期，我们曾经在东门滩开垦土地达60余亩办农场。60年代我们在城内河西沿岸也拥有20多亩土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几经周折，仅剩东门滩不到10亩和寺沟的一小块山坡地，且寺沟的已经修建了家属院。学校也曾经就争取东门滩土地权属的问题做过许多的努力和尝试，但终无结果。

靠自行解决迁址重建的土地问题的道路走不通。

在此情况下，一个全新的思路——“产权置换”的思路逐渐形成。时任榆林地区教育局局长刘建胜积极协调，高登峰同志担任县长的绥德县人民政府从建设文化大县的高度出发，给予大力支持，终于达成了以我校原校园不动产置换迁址重建用地的意向，学校亦

不再追究有关原有土地的历史旧账。

这一意向达成后，便着手具体选址的工作了。县上组织了由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正西同志牵头，计划、土地、建设、农业等部门领导参加的选址小组，和我校的领导一起，大家顶着酷暑的炎日，先后实地察看了十里铺原师专校址，张家砭、袁家砭、龙湾、黄家沟原部队营区，刘家湾原县种猪场和位于东门滩的县原种场地段等备选地。在最后的集中、确定的座谈会上，充分比较了各备选地的利弊，认为东门滩县原种场地段最佳。虽然县上许多同志还舍不得，但高登峰县长一番话终于说服了大家。他说，绥德县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大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有师专、绥师及我们这么多的学校的存在。师专的搬离，已经成为我们绥德县的一大损失，我们不能再让绥师也搬离绥德。一所学校校址的选择，一定要考虑其生活的依托问题。那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生活，生活依托问题是首要的问题。师专过去在十里铺为什么发展困难，就是因为缺乏生活依托。所以，我们要留住绥师，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尽可能优越的条件。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最终一致同意将校址确定在县原种场地段，并与榆林地区教育局达成如下协议：

一、绥德县在东门滩原种场处无偿为绥师办学划拨土地 80 亩，其南端由原种场再提供宽 15 米、长 310.5 米的公共道路。此路有绥师管理维修，并按照城建统一规划予以实施；

二、绥师现有不动产与 1999 年 12 月底前无偿交于绥德县人民政府办学使用；

三、鉴于原种场土地减少，由绥师安置原种场 10 名干部职工。

从此，我校迁址重建工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 三

在落实迁建土地问题的同时，学校积极地展开了筹措建设资金的工作。

当年地区同意我校迁址重建的时候，我们榆林地区的财政状况是比较拮据的，基本无力在资金上支持我们的迁址重建。所以曾明确过资金主要依靠自筹。而一所规模不大的中等学校，要“自筹”那么一笔可谓“浩大”的工程费用，谈何容易！

在张怀泽校长和宋永华书记的带领下，展开了艰难的“自筹”建设资金的工作。

首先是内部挖潜。自从孟吉平司长视察将我校迁址重建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建设资金的准备工作。旧址在保证能够正常运转前提下，尽量减少维修和设备的购置。以求尽可能多地结余预备建设资金。控制职工福利性开支的措施，也得到了全体教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是争取政策支持。学校理解地区的财政困难，地区也能够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尽量给予学校政策上的支持，每年都适量地给 我校追加一部分招生指标，以增加学校的收入。

第三，动用社会资源，积极争取建设资金。

我校迁址重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新址问题的落实，使广大校友备受鼓舞，他们支持学校迁建的热情更加高涨。张怀泽校长和宋永华书记在1997年和1998年，数次奔赴北京、西安联系校友。广大校友纷纷行动起来，出主意，想办法，积极为母校迁建献计出力。

年近九旬的贺晋年校友亲自写信给李鹏总理，希望母校迁建得

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此信得到了李鹏总理的批示，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委都据此给予了一定的资助。

陕西省人民政府专门向国务院呈报了报告，并安排了配套资金。省教委还通过耶逸夫基金给予了 80 万港元的支持。

刘澜涛校友将我校报告批转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马文瑞校友将有关文件分别批转朱开轩主任和国家计委办公厅陆洪军主任，安志文校友亲笔给甘子玉同志写信，白纪年校友亲笔给予明涛同志写信，杨随年校友亲笔给国务院秘书长何椿霖同志写信，……字里行间，情真意切，饱含了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张汉夫校友亲自联系国家计委郝建秀副主任接见我校领导；马尔亦校友多方联系有关人士；霍世仁校友亲自引领我校领导去北京找有关部门和领导争取资金；……还有许许多多的校友不辞辛劳地为母校的迁建工作默默地奉献着。

在北京争取资金的过程中，范向梅副省长曾约见了我校的领导，做过积极的协调工作。一次，李涛副专员带领张怀泽校长去国务院汇报的途中，由于堵车，年过半百的二人不得不跑了近两站路，才按时赶到。

为了解决我校迁建资金问题，经时任地区教育局刘建胜局长的协调，2000 年 6 月 5 日，当时主管教育的李涛副专员亲率地区教育局、计委、财政局、建设局等部门及绥德县的负责人来绥德召开了现场办公会。与会领导首先现场查看了我校的建设工地。在座谈中，李涛副专员首先对工程建设情况和质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绥师久负盛名，地区决定搬迁的决策是正确的。要求工程要高起点，不落后，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加强管理。可以边招生，边建设，边完善，按计划进行。并要求地县各相关部门在收费等方面能免则免，能减则减。政策上要给予尽可能的优惠和倾斜。关于投资问题，

要重点解决，三块考虑。首先是地本级要有意见，其次是学校收费要尽可能用于投资，再就是积极向中省争取资金。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实行“校方贷款，财政贴息，收费还贷”，用小钱换大钱来解决问题。在这一精神下，批准我校 300 万元的贷款额度，地区财政给予贴息。这一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我校建设资金的困难。在会上，刘建胜局长就基建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 四

与此同时，迁址重建工程的相关前期准备工作也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96 年土地协议签署后，随即展开了迁建用地的报批工作。

1997 年 4 月，成立了以张怀泽校长为组长、宋永华书记为副组长、王立万同志为办公室主任的校建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校建工作。

根据当时榆林地区制定的“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的总体原则要求，按 30 个教学班、1350 名学生的规模的中等师范学校的规范标准，一次规划，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包括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办公楼、食堂、水暖设施及大门围墙等附属设施，计划 2000 年基本完成，使新址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其余项目作为第二期工程实施。由西北建筑勘察设计院制定了总体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有所调整）。据此，工程建设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

1997 年 8 月 12 日，新址的第一个项目——教学楼工程举行了开标仪式；21 日，就正式放线开始施工。这标志着迁建工程的正式开始。从此，一期工程的各个项目在经费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有条不紊

素地进行着。在张怀泽校长、宋永华校长的高度重视下，施工人员认真负责，严把质量关，使我们的工程成为绥德县建设工程的样板。

这里，有一个让许多人长久地耿耿于怀的遗憾，需要做一个交代——这就是新校园的地平坐得低了。

关于这个问题，绝不是后来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当时的领导疏忽了，或其他什么的。当时的情况是，土地于1996年8月就已经划定，但我们仅有300万元的建设资金。经过专业设计机构测算，如果地平抬高到接近西包公路的水平，就这点儿资金光填方都恐不够。况且，地平抬高后，建筑的基础设计就随之变得更加复杂，费用亦相应增加。而如果在建设用地批准后一年内不动工的话，按政策就要收回土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才不得不忍痛决定在原地平的基础上建设。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说，当时的领导是负责任的，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也都努力了，尽力了。他们是无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他们，感谢他们所作出的每一分努力！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到2000年，一期工程初具规模。我们为了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尽可能地增加收入，当年招收的10个班就办在了新址，实行了边办学，边建设。此时条件十分简陋。老师们没有休息的地方，在空教室里集体办公。进入初冬没有供暖设施，冷得坐不住，不得不站着批改作业；吃饭仅有简易的灶房，经常是连面都发不好；由于供水系统未建起，靠自己挑水维持；因没有供暖设施，学生需提前放寒假。为了尽量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当年国庆长假和2001年五一长假都没有休息；……首批进驻的教职工和学生，为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就这样克服了生活上的诸多困难，顽强地坚持着。他们的这些付出，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2001年，我们的新址一期工程基本完成。秋季，学校全部迁入

新址。尽管是负债建设，但我们毕竟是抓住了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01年10月3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迁址庆典。广大师生员工怀着喜悦的心情，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这新的起点上昂首前行。

## 附录：绥师校友聚会实录

### 相约兴庆宫

#### ——1985年西安校友团聚会

1985年1月18日，居住西安南郊的12位同学发起组织“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师生团聚联欢会”的时候，请柬上留下了已故的春三四级郭远征同学写的这样一首诗：

绥师一别几十春，风霜雨雪各西东。

吾辈半百勤工作，老师花甲育新人。

兴庆湖边共高歌，沉香亭前笑留影。

神州今岁开新史，青山明月更有情。

这首诗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向往。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已萌发了团聚的念头。转眼间快十年了，愿望变成了渴望，团聚依然是缥缈的悬念。

1985年春节过后，我们在倾心的交谈中，都感到应该趁校庆62周年之际，邀请旅居西安、咸阳、渭南的所有校友，自愿参加，举行一次团聚。随即确定在5月5日这一天，在兴庆宫公园聚会，让渴望得到满足，将悬念化为现实。

我们采取口头串联的方法，将团聚的消息通知校友们。两个月过去了，眼看团聚的日子来到了，谁知就在前一天，彤云密布，顷刻间大雨如注，下个不停。我们盼呀盼，终于盼来了雨住风轻、不淋不晒、不热不冷的好天气。

5月5日清晨8点，兴庆宫公园出现了校友的身影。更多的校友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陆续会合了。几十年不见，当年的青少年，两鬓挂了霜；昔日的成壮年，成了花甲老人。然而，年轻时交往的好友，久别重逢，带来的总是富有生命的青春活力。校友们忆过去，问别后，谈现在，盼未来，沉浸在幸福之中。团聚就这样温暖着我们的心。

在花坛前举行的团聚仪式上，特请在母校工作了近十年、培育了几代人、如今已是82岁高龄的刘克曾同志讲了话。刘老又把参加团聚的各位老师和早期的几位同学——介绍给大家。校友们还在沉香亭北的斜坡上合影留念，各个班级也都照了相。

在团聚的校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远在宁夏银川工作的蒲政治同学，在清涧工作的曹树标同学，他们到西安办事，闻讯赶来参加团聚，令人激动！

团聚有201人参加。常远亭、延祖铎、延学诚、安宇吉、白炳莹、田兰、王英、李仲发等同学，或紧急外出，或因事未到，都拜托亲友代为签名；或写信，或带话，表示祝贺。还有高林、郭凤鸣、高锦绥、马润腹、曹庆让等同学，对印制《校友录》十分关心。

团聚的日子过去了，激动的心总不能平静。有些校友由于没有得到团聚的消息而深感遗憾；参加了团聚的，有些是“想见的人，见了面没有认出来；想说的话，时间短没有说够”。大家都渴望着再相聚、常相聚……

## 绥师旅居西安校友 1985 年团聚词

今年是绥德师范建校 62 周年。我们渴望多年的旅居西安校友的团聚，今天在这风景如画的兴庆宫公园，终于实现了。

纪念校庆，欢庆团聚，重温母校的历史，我们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据史料记载，早在 1923 年以前，陕西酝酿筹建一所师范学校，校址拟在关中或汉中地区选定。这个消息，被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李子洲同志听到了。他和白超然、呼延震东等一起，利用暑假回乡的时机，找杜斌丞先生商议，联名上书陕西当局，终于争得把这所学校建立在绥德。这样，在 1923 年 5 月，被命名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的母校，就在疏属山上，我们大家所熟悉并且备感亲切的雕山书院旧址诞生了。后来，学校十分明确地把“五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校庆日。

四师的诞生，是党在陕北的创始人李子洲等同志奋斗的结果。历史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创建了四师，四师很快变成了培育红色种子的革命摇篮。

四师时期，从 1923 年开始，到 1930 年结束。前后七年多，招收学生 12 个班，毕业 8 个班。其中的第 11 班是女生班。这段时间不算长，经历却极不平凡。学校建立不久，就开始了反守旧、反霸道的斗争。1924 年夏，李子洲同志亲任校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史料上说，李子洲同志“一到校，就积极发展共进社员，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革命书刊。在他的指导下，成



立了学生会、各科学习讨论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艺演习会和陕北青年社，出版了《陕北青年》杂志。经过子洲和广大师生的努力，短短几个月，四师一变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就在这时，党团组织也相应地诞生了。史料上说：“鉴于当时陕北只有几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团组织力量薄弱，子洲和王懋廷、王复生与李大钊联系，在四师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不久改为特支）。”“在子洲和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学生运动发展很快，到1926年冬，全校的400名学生，80%以上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军阀井岳秀惊恐万状。他惊呼四师是“炸弹”。就在1927年夏，第一次封闭了我们的母校。经过复校与封闭的反复斗争，到1930年，井岳秀——这个陕北的土皇帝，竟以武装封闭的手段迫使母校荒废达四年之久。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在这个时期，学校培育出来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受党的指派，到日军队中去搞兵运，发动武装起义，组建陕北红军；到广阔的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为陕北革命的骨干力量，给军阀井岳秀以有力的回击，为母校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在这里，我们深沉地悼念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廷、王复生、常汉三、马济川、雷五高、何寓端，以及马明方、安子文、白乐亭、拓克宽、白雪山、张德生、贾拓夫、朱侠夫、唐洪承、霍维德、柳青等已故的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

今天参加团聚的绝大多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校的师生。对于1934年复校以后的情景，记忆犹新。复校时，母校被命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招生广告一贴出，陕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奔

走相告，踊跃报考，求学热情非常高涨。然而，就在入校不久，学校又出现了一片白色恐怖。直到西安事变。

抗战开始，八路军进驻绥德。绥师重建了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了“民先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热潮，激发了蕴藏在师生中的抗日救亡热情。“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日歌声，响彻了校园的大小宿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展现在礼堂和操场的舞台上。当日寇侵占我黄河以东国土，妄图继续向西进犯时，全校各个班级都组成了战地服务团，在共产党员、进步老师曹孟朴、刘克曾、李国璋等率领下，分别挺进假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地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米脂、横山等县的城镇乡村，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保卫河防。这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妄图用“军训”的手段，扼杀广大师生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结果遭到了失败。1938年夏，绥师大批师生排除种种阻力，冲破层层封锁，纷纷奔向延安，投身革命怀抱。在延安，用马列主义武装了头脑，迅速分赴各抗日根据地，与日寇进行了生死搏斗。

1940年绥德解放。不久，母校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在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了大批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文艺团体的成员。在抗战的中后期，解放战争初期，绥师变成了向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向党中央机关输送所需各类人员的重要源泉。

解放战争开始，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许多师生毅然参加了西北野战军，转战西北战场，一次又一次地歼灭蒋胡马匪军，直到大西北全境解放。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土改，许多师生坚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出生入死，活跃在陕北高原。还有大批师生，分别参加了野战与后方医院，

救死扶伤，直接为战争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校友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在全国各地从事各个行业的工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更加不平凡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欣鼓舞，济济一堂，庆祝母校建校 62 周年，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

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特别怀念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强雄、白力峰、赵先锋、张劲锋、蒲政仁、姜纯仁等等革命烈士！

我们非常怀念在西安牺牲、病逝的高协和、刘春园、霍仲年、丁子文、栾醒民等我们尊敬的各位校长和陈士斌老师！我们同样怀念在西安与我们诀别了的郝振邦、叶光宇、郑忠和、白龙、王复、刘怀义、张学增、刘嘉、白树吉、郭远征、郭占明、柳靖、王维景等我们亲密的同学！

我们的校友，有的已经退居二、三线，有的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继承和发扬母校的革命传统，相互勉励，共同努力，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给子孙后代作出榜样！

候得康居西安校友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于西安兴庆宫公园

## 绥师在京校友 1986 年联欢会联欢词

1986 年 5 月 1 日，是绥德师范学校建校 63 周年校庆日。我们在京的绥师校友们，以极其激动的心情来庆祝母校的诞辰。昔日，在疏属山上的雕山书院，我们共同度过革命的春秋。今天，在北京市委党校小礼堂，我们欢聚一堂，叙旧谈新，重温革命友情。这幸福的团聚，必将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我们举行校庆，所以在今天集会，是因为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中，有从远道而来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热烈地欢迎他们来参加庆祝活动。

84 岁高龄的刘宪曾老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人大会议间隙，前来参加我们的欢聚，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刘老是 1924 年参加党的老革命家。60 余年来，刘老是革命家办教育，教育家闹革命，为党的事业，为青年的成长，辛勤劳动，深受我们的尊敬与爱戴。潘开沛、刘采石、李冰洁、周云深、白炳书等诸位老师，也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当我们还是破土的幼苗的时候，他们这些园丁，就以辛勤的劳动，精心地培育我们茁壮成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那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饮水思源，在此特向老师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刘澜涛同志、张达志同志、贺晋年同志、常紫钟同志、霍源丰同志是母校四师时代的优秀学生，是我们的老前辈，是西北革命的先行者。在黑暗笼罩着陕北高原的时候，是他们点燃了革命的火炬，照亮了千百万人的心。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他们率领千军万马，

驰骋转战在祖国各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在为“四化”操劳。母校为培养出他们这样的人才而增加了光辉。我们特向敬爱的老校友、老前辈致敬！

我们邀请了安子文同志、白明善同志、李国璋同志的家属，作为家属代表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对她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还邀请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榆林地委书记，我们的校友霍世仁同志和绥德县副县长黄永萍同志，来参加我们的联欢，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几十年来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校外老朋友李平、田方同志参加联欢，对他们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参加庆祝活动的绝大多数，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友，很多同志在学校即投入了革命斗争，走向社会，经过长期锻炼，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学、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成为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含辛茹苦，几十年来如一日，努力奋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因之感到欣慰！

今天，我们在欢度校庆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悼念那些为了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我们学校的创始人李子洲同志，四师时的老师常汉三、王懋廷、王复生、雷五斋、何寓础，优秀学生李嘉谟、白明善、张承忠、张慕时、张德增、田作勤、乔国楨、王兆卿、白雪山、高光祖、拓克宽、张德生、朱侠夫、唐洪澄、柳青和校工霍维德等，绥德师范时期的强雄、白力峰、赵先锋、张劲峰、康文林、姜纯仁、蒲政仁等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

我们特别怀念在北京和我们诀别了的四师时期的老校友杨明轩、马明方、安子文、贾拓夫和绥师时期的师生李国璋、杨滨、杨述（欧阳正）、宋养初、张润繁、张定繁、徐立根等同志。

我们十分怀念已经病逝的我们敬重的几位老校长马济川、高协和、刘春园、霍仲年、丁子文、秦醒民。

今天，参加庆祝活动的每一位校友，都是母校光辉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人的革命活动，都为母校增添了光荣，共同谱写了母校的光荣历史。我们母校所以值得庆祝，就是因为她从1923年创建到现在63年来，经历了第一次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伟大斗争，为革命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他们中有知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将领，以及教师、教授、教育家、著作家、经济专家、法律专家、外交家、工程师、出版家、作家、作曲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导演、摄影师、体育工作者、编辑、记者、医师等等。

母校所以能作出这样巨大的成绩，就是因为她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一所教育与革命相结合的新型学校。

目前我们的国家在各方面贯彻改革方针，加快步伐，实现四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校友中，有的已退居二线、三线，但仍在继续发光发热。有的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不懈。我们今天聚会就是要重温母校的光荣历史，在建设“四化”、端正党风斗争中，继续发扬母校的革命传统，互相勉励，共同努力，并教育好子女，为祖国的美好前景作出应有的贡献，永远顺应历史的潮流奋勇前进！

## 京城盛会话同学

——记在京绥师校友团聚会

1986年4月6日，是在京部分绥师校友欢聚一堂同贺母校诞生63周年的喜庆日子。会议定在北京市委党校小礼堂，于下午2时半开始。

这天，校友们迎着和煦的春晖，从京城四面八方前来聚会。共有111人参加了这次盛会。积极筹备这次聚会的任远、霍毓贵等同志，更是早于大家在会场内外忙碌着。他们热情地招呼到会的校友们签到，引导大家就座，热心为会议服务。

5月1日是绥德师范学校的校庆日。在京的老师与校友为了能和来京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老师、校友共同庆贺欢聚，特别是由西安来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德高望重的刘宪曾老师，为此，将这次聚会提前到4月6日。84岁高龄的刘老，在紧张的会议间隙，早早来到了会场，同阔别三四十年的同事、学生们亲切交谈，他那慈祥的微笑和关切的问话，使校友们备感温暖。同时，还有在北京的刘采石、李冰洁、周云深、潘开沛、黄翠英（已故李国璋老师的夫人）、许绍英、白炳书、霍毓贵和从西安前来的邢宏等老师也都来参加了聚会。到会的同学们热情地向辛勤培育他们成长的老师、先辈们致敬问候，畅叙别后的经历。师生们共同回忆在绥德师范学校度过的那些战斗的岁月。那一段生动、活泼、团结、友爱的学习生活使大家永远怀念。校友们欢聚一起，无拘无束，追忆着过去，展望着未来，表叙着和伟大祖国共命运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境，会场

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校庆会于下午2时半在欢快的唢呐乐曲声中开始。会场正中挂着“绥德师范在京校友联欢会”红底白字大横幅。各位老师、四师时代的老校友以及特邀的来宾们就坐在会场中心的大台前，各位同学们则以班级为序分别环坐在会场四周的桌前。由绥师二十七级校友、原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同志主持会议。他很风趣地说：“由于自己在北京工作多年，所以今天除以一个在京校友的身份来聚会以外，还以半个主人的身份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前来参加这次难得的聚会，聊尽东道主之谊。”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热情地把各位老师、四师时代的老校友、特邀贵宾和从外地赶来参加校庆的校友们一一介绍给大家，并向校友们多次表示了欢迎的感情。之后，他请春三四级马尔赤同学代表全体到会校友致校庆联欢词。联欢词中对母校60多年的光辉历程作了简要回顾，表达了大家对母校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的衷心谢意；表达了同学们对各位老师们的深厚敬意和慰问；表达了对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校友们的深切怀念！

接着刘克曾老师对大家作了亲切感人的讲话。刘老是在抗日烽火年代到绥师工作的，前后在校耕耘九年，深受学生爱戴。他深情地说：“各位老师和他一样，在思想上时时系念着同学们，很希望有个见面的机会，在分别了三四十年后的今天，能和在京的校友们相见，也还了我多年的夙愿。回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呢？除了师生的关系之外，更为主要的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革命事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他希望同志们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加倍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四师时代的老校友刘澜涛同志代表在座的张达志、贺晋年、常紫钟、霍源丰同志作了即席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讲道：我们今天能



在北京祝贺校庆联欢，我们的母校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主要的是当年在革命的学校里培育了新的人生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长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

全国人大代表、榆林地委书记、二十七班校友霍世仁同志和绥德县女副县长黄永萍同志向与会校友介绍了母校的情况、故乡——榆林地区和绥德县的建设情况及发展远景。当听到贫穷的家乡人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时，大家高兴地热烈鼓掌。他们还代表家乡父老，热情欢迎校友们回乡探望，互通信息，共建家乡。

专程从西安赶来参加盛会的邢宏、郝生英同志，代表在西安的400多位校友宣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还有在石家庄的田安民、济南的苏明堂校友也赶来聚会。苏明堂同志还将他珍藏了40多年的印有子洲同志头像的一枚绥师校徽和毕业证书献给母校留念。

二八级校友党凤德、马国骧同志向母校63年校庆献词一首：“桃芳李艳六三年，理张义扬西隅边。燕京盛会新颜开，鸿图再展七五间。”党凤德同志还向母校赠送了他的著作《英汉词典》。老将军贺晋年同志向母校和刘定曾老师赠送了亲绘巨幅“苍竹”，给母校的题词“凌云苍竹秀，新厦永无穷”。挺拔秀丽的竹画，博得了校友们的一致赞赏。校友们还向刘老师赠送了篆书《百寿图》，祝愿刘老健康长寿！

今天参加聚会的还有外省籍校友齐心、刘甲同志。刘甲同志将他的著作《新基调杂文创作谈》赠送给了母校。

在热烈的欢呼声巾，有中央民族乐团的刘燕平、铁道兵文工团的刘华、东城文化局的叶龙、电影乐团的王蓉等校友以及地司的严波（马秀珍）分别为大家演唱了陕北民歌《兰花花》、《三十里铺》等，使会议气氛再次达到高潮。大家欢快的心情，好似当年学校生

活情景再现。马健忠同学特意为大家演唱了抗战时期绥师同学创作的下乡宣传歌曲，歌词是：“绥师同学真能干，背上铺盖下乡宣传，住冷窑，爬高山，钱钱饭、山药蛋……只有大家这样干，才能驱逐日本强盗浪蛋！”她激昂的歌声唤起了大家对母校的深深怀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雷飞同志，即兴表演了模仿彭总在联欢会上讲话，精彩动人，恰如彭总亲临会场，顿生敬意。

联欢会在欢快的歌声中圆满结束。校友们余兴未尽地走出了会场，聚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 元宵之夜话初八

——追记西安绥师校友尊师敬老茶话会

红 木

元宵之夜，几位绥师校友，促膝交谈。我们深情地回味着，回味着一周前举行的尊师敬老茶话会。

正月初八，这是我们久已盼望的一天。

清晨，漫天银花飞舞，遍地雪水滋润。我们迎来了第一个瑞雪天。校友们顶风雪、踩泥泞，从渭南、从咸阳，从西安的四面八方，奔向小寨。这里的陕西省委党校学员二食堂，就是我们已经布置好的会场。

书写着“西安绥师校友尊师敬老茶话会”13个大字的横幅会标，悬挂在会场的北墙上。特邀的38位老师、老领导、老前辈的座位，一字儿排开，设置在会标下。以这里为中心，伸向东、南、西三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50多张方桌。这是同学们按班级依次入座的席位。

8点整，会场的门开了。40多位受聘的热心人，一个个准时赶来了。今天，他们既是校友，又是工作人员。8点半以前，全都上了“班”。这时，会场上响起了校友们喜爱的陕北唢呐曲——得胜回营。这动听的乐曲，在召唤着我们：“欢迎您，亲爱的校友，请来参加这庄严的尊师敬老盛会！”

怀着激动心情的校友们，陆续来到了会场。

今天，人人喜悦，个个振奋。多年不见的校友见面了，老相识变成了新知己。一肚子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校友们越来越多，畅谈的时机越来越少。哪一位老人不是交谈的中心？三言两语，应顾不暇；哪一个同学不是久别重逢？欢声笑语，热情洋溢。多么幸福的团聚。多么可贵的时机！秋二六级的赵仰刚刚安家党校，良辰吉日，巧遇这样的盛会。秋二七级的高林，费尽唇舌说服老伴，今天支撑着病弱的身体，来到了校友们中间。秋二九级的刘广，一阵奔忙，安排好病危的二儿子，急匆匆赶来团聚。还有秋三一级的侯颢坤，体弱多病，从不外出，今天，他竟出人意料地迈步走进了会场。

尊师敬老，多么崇高的欲望！多么可贵的情！

在秋三三级席上坐着的李树春，在春三三级席上露面的刘成业，都是从我们怀念的革命圣地——延安专程赶来的。二十五班的霍芸，青年班的李桂兰，这两位女同学，更是从黄河之滨的兰州赶来的！他们的到来，给我们以鼓励，给我们以鼓舞。

我们敬爱的各位老师、老领导、老前辈，是我们特意请来的尊贵客人。他们的到来，吸引着各个班级的同学们。年已八旬的曹孟朴老师来到会场，恰巧遇到了王朗超同志，他们亲密地坐在一起。那些抗战初期从母校投身革命的校友们，一个个围拢来问寒问暖，与他们的老师、老领导亲切交谈。李亦然政委，是我们的老前辈，

老红军。在陕北的土地革命中，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从陆军到空军，在建军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勋，他为母校争得了荣誉，是母校的骄傲。他的到来为茶话会增添了光彩。我们的老师，当年来自五湖四海，今天在座的就有冀、鲁、川、晋等省籍的人。当郭琦、余峥等各位老师相继走进会场的时候，同学们一批又一批地问候、祝愿。这一个个动人而又和诣的场面，正是尊师敬老美妙的前奏曲。

9点钟，茶话会正式开始。沉浸在幸福会见的313名校友们，久久不能平静。主持人放开了嗓门，向大家一一介绍了38位老师、老领导、老前辈。会场里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宣读了《西安、咸阳、渭南绥师同学尊师敬老祝词》，宣读了首都绥师校友敬致刘宪曾老人的贺信和给与会全体校友的贺信。在会前，还收到来自江河源头、来自天山南北、来自甘肃兰州、来自首都北京的许多校友个人的贺信，今天实在无法宣读了。只有秋三三级的张映芳同学，将他转给茶话会的马朝房同学从兰州寄来的贺诗，书写成条幅，张贴在会场的南墙上。校友们来自山南海北的祝愿，给我们尊师敬老的活动，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在这振奋的时刻，我们崇敬的刘宪曾老人讲话了。

刘老已是84岁高龄，今天他带病从医院赶来与校友们团聚。他是1924年入党，党龄比年已花甲的校友们年龄长，他是我们敬佩的老前辈。他曾经是我们母校的校长，以后又是陕西省委科教部负责人，无疑又是我们敬重的老领导。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更是我们爱戴的好老师。他操着浓重的冀中口音向大家祝贺新春愉快的时候，那声音是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呀！他在追述我们母亲的光荣历史之后，恳切地说：“绥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革命传统和革命风格的学校，所以它培

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他们都是在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严格的纪律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应当说绝大多数校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刘老高度评价了这个会，最后提出：“不仅希望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而且希望绥师今后仍需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新的建设人才。”他希望：“在当前，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为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作出自己应有的表率。”他强调说：“这是我对于同志们的诚恳希望，也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尽的责任！”刘老语重心长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请杨和亭专员即席讲话，他希望我们从十亿人口出发，在端正党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十分详细地讲述了母校光荣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他的讲话，使我们对老专员更加敬重。

今天，我们久已渴望见到的常黎夫老人，不仅来到了会场，而且赠给茶话会一首诗：“饮水难忘掘井人，李、杨、常师苦经营。雕山书院桃李艳，古城长安夕阳红。荏苒光阴六十春，当年师生剩几成？幸存尤需重晚情，扶正抑邪荡埃尘。”李、杨、常，常老注明是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老师。今天，我们特邀出席的老前辈，除常老和李政委之外，还有李瑞阳、李明轩、张维培、马仰西、王海帆、马晋、白凤章、曹光芝、白世雄、张慧英、马淑芝、马淑昭等各位老人。当我们尊师敬老的时候，他们也怀念着自己的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等老师。

尊师敬老是我们母校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崇高美德，更是我们党今天提倡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在我们敬献给老师、老领导、老前辈的纪念品——册小小的影集上，请黄锡林同学书写了这样一首诗：“平生端有树人计，四海

桃花满春芳。育人勋绩垂洪范，尊师醇酒举寿觞。”我们衷心地祝愿各位老人健康长寿！

茶话会到此，全体校友转移到大礼堂前，由薛增禄、寇山主持，西影的刘斌、郭阳庭两位导演积极协助，请柏雨果同志给我们拍摄了全体合影和老人们以及各班级的照片。

从1985年5月5日的仓促团聚，到1986年2月16日（正月初八）的茶话会，中间已过去了287天。这期间我们失去了姬超和李作柱两位校友。谁知就在会后的第六天，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正在有为之年的校友周鼎铭。让我们沉痛地悼念吧。姬超、李作柱、周鼎铭同学永垂不朽！

话初八就要结束了，一位校友意犹未尽，突然问道：初八，在会场的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看见了吗？当时请秋二七级的马继同学辨认。照片上的人认出了三位：前边坐着的有母校的创始人之一的白超然，后边站着的有两位我们的校长刘春园、霍仲年。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牛锦华同学从吴堡的资料馆里找到的。校友们想：母校珍贵的资料一定不少，母校的老前辈们依然健在。何不及早动手，编写一部详尽的《绥德师范校史》，让她的光荣革命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千秋万代，发扬光大，这是校友们的又一个共同心愿。

1986年2月23日

## 新老校友喜相逢

——记绥德校友 1987 年春节联欢会

武 军

1987 年元宵节前的 2 月 9 日，绥德师范学校校园里，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一进校园，首先映入人们视野的是随风飘扬的彩旗和两盏大红宫灯，写有“热烈欢迎老校友返回母校”的横幅更是格外醒目。在礼堂的门口，贴着一副上联为“母校育英才岁岁春风催桃李”，下联为“桃李含春风今日英才回母校”的对联。在礼堂内挂着的枣红色平绒大幕上方，悬挂着三只欢蹦乱跳的大白兔模型，下方写有“绥师校友春节联欢会”九个金黄色大字。全校的领导、教职工和学生，个个喜气洋洋，在为联欢会的举行而忙活着。

中午 1 时半许，73 岁高龄的老校友常紫钟和身体欠佳的老校友李鸣九同志乘坐学校派去的小车进了校门。车刚停稳，在校的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张孟民同志和已经离体的前任校长孙秉悦同志、老教职工刘学智、姬常胜，以及在校的部分师生就热情地迎上前去，将他们扶下车，亲切地交谈开来。不一会儿，在副校长王旭亮同志的陪同下，由叶生同志带队，白秉权、安志顺、马倬、刘静、马绍良、马绍宽、田岚、田生玉、张英茵、严谨、张彩萍、王龙等 30 多位绥师老校友和随西安地区赴老区采风慰问团来绥的部分青年文艺工作者一行共 40 余人，排着整齐的二路队形，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走进了校园。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在绥的部分绥师老校友冯文理、张亮廷、黄龙飞、高满福等人。一见面，争相热情亲切地互相握手，

互致问候。有的甚至喊起他们的乳名儿来了。一句句热情的话语，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勾起他们多少幸福美好的回忆……

礼堂里播放着热烈欢快的乐曲。等候在礼堂外的 200 多名在校的学生们刚看到老校友们交谈着走过来时，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把校友们迎进了联欢会会场。

少顷，校党总支副书记张孟民同志宣布联欢会开始，并代表校党政及全体师生员工向返回母校的老校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常紫钟同志代表返回母校的老校友作了发言。他回顾了绥师光荣的革命历史，勉励在校的师生员工继承和发扬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搞好工作，搞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常老话音刚落，联欢会就开始了。绥师现任音乐教师白良彪同志一段绥德秧歌和一段清涧民歌，掀起了联欢会的波澜。白秉权同志站在话筒前激动得热泪盈眶，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才以她刚写成的一首诗，表达了她激动的心情。紧接着，田生玉同志以她清脆甜润的歌喉，演唱了一段清涧秧歌。马绍宽同志小提琴独奏了《庆祝》片断，白秉权同志演唱了一曲信天游，安志顺同志表演打击乐《鸭子拌嘴》和《老虎磨牙》，57 岁的张彩萍同志跳起了刚健奔放的迪斯科。随同前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尹华表演了唢呐独奏，马笛同志表演了笛子独奏，洪中同志表演了青春迪斯科。67 岁的马绍良同志伴着音乐表演起了气功，王龙又打起了少林拳，还有不少同志都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在另一边，黄锡林同志即席赋诗题词，洪中同志又即席作画，以作纪念。联欢会高潮一个接着一个，整个会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非凡。

最后，在铿锵的锣鼓声中，秋兰同志第一个扭着秧歌走进了会场的中心。紧跟着，新老校友一起扭起了秧歌。其中有全体从北京



和西安返校的老校友，有在校的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已经离退休的部分老同志，还有在绥的李善庄、冯文理、黄龙飞等老校友。热烈欢快的陕北秧歌，将联欢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在热烈的掌声中，联欢会结束了。大家依依惜别，互相祝愿，共同祝愿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能够进一步发扬光大，共同盼望日后再能欢聚一堂。

## 1991年延安绥师校友会成立

1988年5月1日，是陕西省绥德师范建校65周年纪念日。延安市区的近百位老同学，接到母校《致校友书》后，心潮澎湃，奔走相告。茶余酒后，语中话里，无不倾吐对母校的深情怀念，无不展望母校更美好的未来。

3月初，北京绥师校友、首都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雷飞同学来延安，在拍摄《巍巍昆仑》新影片中扮演彭总的伟人形象。我们绥师延安校友得知此事后，为他骄傲，更为母校自豪。在百忙中他给我们介绍了北京绥师校友会的活动情况。此后，校友们便根据党的十三大“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的精神，参照北京、西安等地建立绥师校友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做法，并借鉴他们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绥师光荣革命传统的新经验，反复酝酿绥师延安校友会的成立。

3月27日这一天，我们谁也不会忘记，老同学犹如潮涨燕飞般地欢聚一堂，人人都仿佛年轻了好多岁。彼此相见，真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尽的情。有人说：“这一天真怪，以往熟悉的人相见，倒是

陌生起来；过去陌生的人，反而一见如故。”感情的距离一下子缩短十万八千里。“啊！我们原是老同学……”每一个人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陶醉于未来的想象中。难得能相见，贵在更相知。此情，此景，此境地，无酒也大醉。

校友会成立大会，由邱振孝同学主持，王来英同学宣读了绥师《致校友书》，崔凤金同学介绍了成立校友会筹备经过，雷飞、张同士、安宇柱等同学发了言，延学斌同学讲了话。他列举了母校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 and 作用之后，强调了延安校友会建立的宗旨是“继承绥师传统，发扬延安精神，促进延安建设”，指出了校友会的具体任务是：“继承绥师传统，关注母校建设，做好本职工作，活跃校友生活”，提出了办好校友会的要求是：“自觉积极，乐而可为；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实心出力，廉洁办事；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校友会成立后，同学们渴望两件事。第一是创办“会刊”，刊名为《雕山赤子》。撰写回忆录，表达我们对母校的怀念，反映“圣地”校友的工作、学习、生活，报道我们各条战线上的喜讯。第二是编印“校友录”，以相互往来，相互激励，交流感情，交流信息，取长补短，增长才智。我们相信，会刊必将为校友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生机和欢乐，《校友录》将成为联结同学间革命友谊的纽带。

让我们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为建设延安、开拓陕北、振兴中华而倍加努力！

绥师延安校友会秘书处

1991年3月27日

## 名州桃李会

——绥师七八级同学聚会侧记

武 军

公元1993年4月30日和5月1日，这是两个让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

4月30日，明丽的阳光，把素有“天下名州”美称的古城绥德装扮得更加秀美。上午8时许，在和煦的晨风中，迎着融融的春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120余名绥师七八级同学，簇拥着我们尊敬的孙秉悦校长，以及当年曾施教于我们，现仍在绥的各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走进了飘荡着欢快乐曲的绥师附小电教室。母校现任校长张怀泽同志在百忙中也来到了同学们的中间。诉不尽的师生深情，道不完的同学友谊，全场师生沉浸在无比欢乐幸福的海洋里。

8时30分，原学生会主席申佩保同学宣布“绥师七八级毕业生联谊会”成立大会开始。大会首先由曹效棠同学介绍了聚会活动的发起和组织过程。他说：“这一活动首先由佳县同学于1991年提出倡议。我们在绥师、附小及在绥德的部分同学经过反复研究，并在孙校长和在校的老师们的指导下开始了联络和筹备工作。在联络和筹备过程中，靖边的杜旭东，横山的魏国鹏，榆林的任平，米脂的曹殿来，宴启亮，孙占文，佳县的申佩保、刘秦川，子洲的李俊忠、吕学清，绥德的丁锋、魏宁，吴堡的李成泽，清涧的贺海军以及进校的张有仁等同学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母校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表达了同学们由衷的谢意。在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绥师七八级毕业联谊会章程》和联谊会人员组成后，孙秉悦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七八级同学在母校恢复时期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我们成立联谊会和为母校敬立李子洲雕像的意义和影响。母校现任校长张怀泽同志也即席讲话，祝贺我们联谊会的成立，并对我们尊师爱校的实际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后，刘秦川同学代表全体到会的同学表示了不忘母校光荣革命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我区教育 and 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决心。会上，张耀冰同学和杜旭东同学还代表全体同学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赠送了纪念品。

大会各项议程完成后，转入了联欢。白良魁老师一曲《九十九道弯》，又把大家带回到那上学期间的记忆之中。李一鹿老师和王万达老师充满激情的讲话，以及薛应平老师的现场吟诗，抒发了师生情谊。赵富强老师悠扬的陕北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李海燕、黄义祥、曹效荣、常英兰等同学也都即兴表演了节目。杜旭东同学现场在签名簿上书写“师恩永泽”四个大字，表达了全体同学的心声。会后，与会的全体师生在我们为母校敬立的李子洲雕像前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下午，各班分别举行了座谈会。师生欢聚一堂，大家分享了每个人13年来事业与生活上成功的欢乐。

5月1日，是母校绥师70周年校庆的大喜日子。上午8时，全体返校同学和从北京、西安、青海、新疆、宁夏、四川、湖北及延安、安康等省、市、区和地区的老校友一样，受到了母校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参加了母校的校庆大会。在校庆大会上，申佩保同学还代表我们七八级全体同学讲了话。下午，由我们捐资敬立的李子洲雕像落成典礼，再次把校庆活动推向高潮。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是，我们为雕像征得了老校友、原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

同志的亲笔题词。中共榆林地委副书记黄文选同志为雕像揭幕。任平同学和母校现任党委书记丁宪钧同志先后在落成典礼上讲了话。李子洲雕像落成典礼结束后，部分同学参加了盛大的校庆游行，并在游行中加入了欢快的秧歌队行列，尽情地扭呀、跳呀。

紧张的两天活动结束了。师生间、同学间，热泪沾衣，依依惜别。与此同时，大家都为还有一半同学没能相聚深表惋惜，更为没能看到定边的同学而感到深深的遗憾（所幸，没有得到通知的高红萍同学于5月2日下午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总算是补了定边的缺）。大家都期盼着在10年之后的下世纪之初，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再相会，向母校奉献更加丰厚的礼物。

## 80岁学生谢90岁恩师

陈 樱

“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共同咏诵起唐代诗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93岁的王家广老人依旧字正腔圆、音调高亢。“瞧，我们的老师风度不减当年啊！”80岁的学生牛锦华给老师鼓劲儿。60多年前，31岁的王家广就是操着这朗朗之音，站在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的讲台上给像牛锦华这样十六七岁的激进青年们传授知识。“五一”期间，借校庆84周年之机，还健在的这批“老”学生重访了身在西安的六位资格最老的老师，送去了学校特制的功勋水晶纪念杯和慰问信，重拾回忆，铭谢师恩。

## 学生谢老师 老师以学生为荣

“战争年代，你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远离家乡亲人，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绥师，用你们的品德、学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良师而自豪！”宣读着千余字的《慰问信》，学生牛锦华字字真切。借着助听器，老师王家广努力听着，笑容溢满了皱纹。

昨日，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一批目前健在的、年事较高的“老”学生们登门拜访了自己曾经的老师。“黄先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学问可大着呢，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年79岁的高智是四四年级的学生，62年没见师面的他很激动，更让他感慨的是至今才知道老师的真实姓名，“原来那时候他是地下党，在校所用的‘黄岗’的名字居然是假的，难怪我毕业这么多年都打听不到恩师下落！”

接过由学校为纪念84周年校庆而特制的“人之楷模，师之典范”功勋水晶纪念杯，王家广的手也在颤抖。“咱们学校，天天都在我心里装着呢！能培养出你们这些优秀学生，更是我的荣耀！”学生谢老师，老师则以学生为荣。“我们绥师人才辈出，不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多少高级干部。像今天来的高智就曾任毛主席的贴身机要秘书，牛锦华曾任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巧的是，20世纪80年代，王家广和牛锦华竟是同一任的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他比我强，现在还是离休办的党支部书记，管着我喽！”学生成了老师的“上司”，王家广反倒很荣幸。

## 造杯送慰问 汲取老前辈革命精神

这次重访恩师的活动是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84 周年庆的一个重头戏。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 1923 年 5 月 1 日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作为陕甘宁边区最著名、最激进的一所师范院校，曾被誉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培养红色种子的革命摇篮，为国家育出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教育工作者。

“如今，学校的规模扩大了，设施更新了，但革命激进的立校精神永不能忘却。饮水思源，目前健在的这些老前辈教师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们为了革命信念投身根据地教育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汲取。”于是借校庆之机，该校现任校长冯泽福发出了慰问老前辈教师和赠送功勋纪念杯的倡议，立即得到了西安绥师校友会的支持。“如今，年事较高的一批师生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校执教和学习的这些前辈。老师只剩下汪占非、王家广、周笃彦等六位，年龄最大的已经 96 岁高龄了。而在西安，40 年代的那批学生大多也已七八十岁，不足百位了。‘五一’劳动节又恰巧逢校庆，由当年的学生送去学校的慰问是对这些老师最大的慰藉，也是我们对他们的辛劳付出最真切的回报。”

（原载 2007 年 5 月 7 日《华商报》，作者为《华商报》记者）



##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地址：陕西省绥德县名州镇镇定北街150号

电话：0912-5658051      0912-5651190

传真：0912-5658051      0912-5651190

网址：<http://www.suishi1923.com>

邮编：718000

ISBN 978-7-5326-9712-2



9 787226 971222 >

定价：65.00元